THE LIMITS TO CAPITAL

资本的限度

英——大卫·哈维——著
张寅 译

DAVID HARVEY

中信出版集团

世界著名思想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大卫·哈维

关于资本、危机和城市化进程的预言性著作

从基本概念出发，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与地理的发展

借马克思的经典，为我们时代的难题寻找解答

我们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所谓的自然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正在迅猛地发生结构转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转换结构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 大卫·哈维

一部权威的作品。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里程碑式的著作……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几大流派透彻的批判、总结和延伸。

——《伦敦书评》

一本深厚、巧妙，颇具才智和洞见的书——尤其是它对于租金和金融资本的论述，无论何时都是越多人读到它越好。

——《环境与规划》

ISBN 978-7-5086-7316-5

9 787508 673165

定价：88.00元

见识城邦

手机扫描二维码
成为中信书店会员

THE LIMITS TO CAPITAL

资本的限度

[英] 大卫·哈维 著 张寅 译

DAVID HARVEY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的限度 /（英）大卫·哈维著；张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9

书名原文：The Limits to Capital

ISBN 978-7-5086-7316-5

Ⅰ．①资… Ⅱ．①大… ②张… Ⅲ．①资本－研究 Ⅳ．① F014.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6365 号

The Limits to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Copyright © 1999 David Harv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资本的限度

著　　者：[英]大卫·哈维
译　　者：张　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40mm　1/32　　印　张：23　　字　数：49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316-5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译者说明

● 在本书中，经济概念的符号当然使用了英文写法，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中译本用的是德文写法。由于本书中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未曾使用的符号，所以我统一保留了英文写法。所有符号如下：

中文	德文	英文
商品	*W*（Ware）	*C*（commodity）
货币	*G*（Geld）	*M*（money）
劳动力	*A*（Arbeitskraft）	*LP*（labour power）
生产资料	*Pm*（Produktionsmittel）	*MP*（means of production）
剩余价值	*m*（Mehrwert）	*s*（surplus value）
生产	*P*（Produktion，production）	
不变资本	*c*（konstantes Kapital，constant capital）	
可变资本	*v*（variables Kapital，variable capital）	
利润	*p*（Profit，profit）	
时间	（无此记号）	*t*（time）
工资品	（无此概念）	*W*（wage goods）

- 译注中的《全集》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集》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均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

- 本书中提到的人名如果见于书后的“人名索引”，正文和脚注中就不再标注原文，否则以括号标注原文。哈维本人的名字也不再标注原文。

- 哈维有时会提示读者参考本书的某页，这里的页码都是英文版的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 马克思的一些术语也出现在后来的经济学中，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中译本与其他许多经济学著作的中译本常常采用不同的译法，如“Gleichgewicht/equilibrium”在前者那里译作“平衡”，在后者那里则译作“均衡”。对于这些术语的译法，我按照自己的认识进行了选择，并在全书中保持一致。

目录

2006 年唯首出版社 [VERSO] 版导言 / 003

导言 / 034

第1章

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 043

第2章

生产与分配 / 098

第3章

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 149

第4章
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 183

第5章
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 237

第6章
积累的动态 / 263

第7章
过度积累、价值丧失和“第一块”危机理论 / 311

第8章
固定资本 / 332

第9章
货币、信用和金融 / 382

第10章
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 445

第11章
租金理论 / 511

第12章
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 575

第13章
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 632

后记 / 680

参考书目 / 689
人名索引 / 704
主题索引 / 707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我写《资本的限度》（后简称《限度》）是为了争取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更加容易让人理解，更加切合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那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这样的词还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欧元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还只是白日梦，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和实质性的（而非名义上的）左翼政党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在《限度》成书时，撒切尔（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权，中国尚未开始推行令人震惊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还显得不正常，外包和资本在全球的机动性还没有开始在某些方面严重挑战民族国家调节自身事务的主权力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本家阶级所发起的攻击——它针对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福利国家和一切形式的国家调节——还处在早期，仅见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处扩散。本书的写作还远远早于“冷战”

的结束、原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市场化”、对共产主义的全盘质疑和对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广泛拒斥。简言之，本书早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发动。

然而，《限度》变成了一个预言性的文本。现在它在某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所绘制的理论路径来抓住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运作时固有的矛盾。它的当代意义的上升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种批判方法同样适用于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后者主要源自18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做了修改（这些教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赞同边际主义原则，由此为无尽地阐述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义身上远远比用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身上更加适合——后两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个原因出现得相当凑巧。为了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当时我的兴趣直接聚焦在这上面——我需要扩展马克思的一些未经展开的范畴。固定资本［特别是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必须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从这里产生的理论工具非常适合于应对后来出现的戏剧性的全盘变革。所以，我其实构造了一个强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批判性地探讨一个由金融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限度》试图在马克思的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

析的方法来把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整合起来；它曾经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文本。它在基础理论（在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阐述）与实实在在的力量的表达之间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

第三个原因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性。20 世纪 70 年代充满了纷争。当时呈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在 1945 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率。由 1973 年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禁运标志着衰退的开始，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流入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过金融体系回到全球经济当中。1973 年初发生的世界性房地产暴跌、多家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以及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协议的解体——这些都带来了令人迷惑的问题。已经有人把去除金融调节和预算紧缩作为解决方案来贩卖（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件——纽约市在 1975 年实行的财政规训——起到了带头作用）。英国在 1975—1976 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惩戒，智利则随着 1973 年皮诺切特（Pinochet）针对阿连德（Allende）的政变而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劳工的动乱四处蔓延，左翼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取得了进展。就连在美国，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也联合起来搅动着政治体系，威胁着政治经济精英，也威胁着公司和国家的合法性。简言之，资本积累出现了普遍化的危机，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1]。30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2]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需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评论。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绝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的人口——共计23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在到1998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

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到2000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年，“从低往高第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年的美国，《福布斯》400位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亿美元”。到了2005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万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年可以挣160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万美元。布什（Bush）当局的税收政策令人愤慨地使这些差别更加悬殊了。税收减免的大多数好处都流向了前1%的收入赚取者，而且最近的税务法案只为“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削减了大约“20美元”的税负，而“前1%的人当中的前十分之一尽管有530万美元的平均收入，却平均可以省下82415美元”。[①]

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年的《福布斯》世界

① Se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Dash, E. 'Off to the Races Again, Leaving Many Behind,'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Section, April 9, 2006, pp. 1 and 5; Krugman, P. 'Graduates versus Oligarch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06, p. A19; Munk, N. 'Don't Blink. You'll Miss the 258th Richest American,' *New York Times*, Weekend in Review, September 25, 2005, p. 3.

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排在第24位。在2005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随着市场改革，东欧和中欧也同样显示出了不平等程度的剧增。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最初还能够把强劲的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平等结合起来（如韩国），但自1990年以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的增加。在印度尼西亚，少数贸易巨头的大笔财富避开了这场创伤的侵害，却有大约1500万印尼人失业。

同时，全球的劳工力量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报道纷纷生动地描述了工人的绝望处境，例如越南的耐克工厂工人、萨尔瓦多的盖璞（Gap）工人和达卡的制衣工人。一名出色的美国电视名人、喜爱孩子的凯西·李·吉佛（Kathy Lee Gifford）很震惊地得知，她通过沃尔玛出售的系列服饰要么是出自洪都拉斯薪水极其微薄的13岁儿童，要么是出自纽约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辛劳女工——这使她感到十分愤慨（值得赞扬的是，她随后就加入了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在巴基斯坦的地毯制造业和足球制造业中，关于童工的丑闻成了媒体上的家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耐克工人的条件也十分恶劣，而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给耐克的3000万美元律师预付金则被用来对付新闻界的相关报道。近些时候，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出现了令人深感不安的报道，因为流动工人离开了土地，涌入了迅速发展

的工业化城市。主流媒体大量记录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可以毫无破绽地插进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一章。据说有10亿左右的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来挣扎求生，还有20亿人是每天两美元，而富人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全球四处累积财富。

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的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复兴、迅速增长的不平等和对分配公正的漠视？在印度等国，高度碎片化的、有时被推测为具有革命性的骚乱随处可见。在拉丁美洲，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转向了民粹主义，而不是更为直接的社会主义；查韦斯（Chávez）等领导人一次次挫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而智利的阿连德当初就是死于军事政变。法国的街头抗议使得政府取消了进一步使劳工市场新自由化的法律。一场关于全球公正的运动突然活跃起来，最盛大的场面出现在西雅图、日内瓦、魁北克市、曼谷和墨尔本的街头；这场运动最一贯的代表是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及其无数区域性的分支。许多人现在都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要说那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却极少有一致的意见；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现在是少数派，而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带头的是非政府组织）来开展的社会运动则走进了一种前卫的立场，同时又坚持认为首要的组织形式必须是网络，而不是等级制。至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也没有任何普遍一致的意见。

一部分困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人们广泛接受了个人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和自由市场据说可以给予的自由，还接受了个人对于自身福祉的责任；这些看法共同构成了一道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使人们无法创造针锋相对的团结形式。这些意识形

态指向的是以人权和志愿社团（例如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反抗方式，而不是社会团结、政党和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新自由主义者。但较为传统的反抗形式也很难开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无常是难以置信的，个别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主权遭到了明显的削弱，而且由于有必要培养良好的商业气候来招徕投资，所以国家的行为被重新界定了。进一步讲，敌人及其所在的位置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了。远方的事件——例如发生在中国或班加罗尔（如果你住在美国或英国），或者发生在华盛顿（如果你住在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约翰内斯堡）——经常会在本地留下深远的后果。再者，一些地方（如台湾、巴伐利亚或班加罗尔）或一些行业（例如信息学）一度取得了成功——衡量成功的尺度是强劲的资本积累乃至贫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新自由化未能刺激总体的积累，更没有增进社会的总体福祉。

但从上层阶级的立场来看，新自由化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要么恢复了统治精英的阶级权力（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墨西哥、印度和南非），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如在俄罗斯）。媒体在上层阶级利益的支配下宣扬了一则神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上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够有竞争力，
xiv 也就是不够符合新自由主义。一片领土上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被解释成了一种必要，仿佛它可以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增长。倘若下层阶级的处境恶化了，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出于通常是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而未能（通过投身教育、遵守新教的职业伦理、服从劳动纪律）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或无论什么地方之所以会出现特殊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竞争力，或者是由于

个人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失败。这种论点认为，在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只有最适合的人才应该存活、才可以存活。

然而，一场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首先在1997—1998年淹没了东亚和东南亚，然后倾泻到了包括俄罗斯（1998）和阿根廷（2001）在内的各个地方；这使得一些人认为资本家也是脆弱的（强大的韩国财阀也破产了），还认为从工人的立场来看，低微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末破灭了，衰退在2001年开始了，“9·11”事件发生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发动了——这一切成功地掩盖了一个事实：财富和收入一直在飞速积聚。资本家挣到了钱，阶级权力得到了巩固，而金融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既对此有害，又对此有利。

但是新自由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因此，分析这些矛盾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要求运用强大的理论工具，比如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工具。这项任务不是照搬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延伸、修正和改编这些文本，以便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马克思本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在《大纲》中，他概述了需要整合到资本的一般理论中的各个“环节”：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

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大纲》，第108页)[3]

在《限度》中，我仅仅从马克思的文本里挖掘出了这个丰富的话题领域的一部分。然而，我在汇集马克思关于其中某些话题的思想碎片时意识到，只有通过恰当地运用辩证方法，
xv 才能将马克思所说的任何“有机整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作用”[4]编织成某种统一的外表。我在这一点上追随的是马克思的做法，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后者主要源自一种关于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恩惠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必须被把握为“不断的运动”[5]，而这正是辩证法所要做的。[①] 马克思的做法是一种巧妙的基于过程的辩证法，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精细地把握了资本的流动。我越来越认为马克思权威性地倡导了一种基于过程的哲学，而不是仅仅实践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即使是以“倒过来用双脚立地”的形式)。

《限度》尽管是预言性的，却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从我们自己的时代出发延伸并改造了马克思的观点。它所提出的创新固然触动了核心议题，但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阐明不平均的地理发展、金融体系、食利行为、侵占和剥削的各种模式以及阶级形成和解体的各种模式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所谓的自然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正在迅猛地发生结构转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转换结构的，为什

① 奥尔曼(Ollman)(1993)和哈维(1996)的第2章更加完整地叙述了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看法。

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工作有一个坏处：这个框架有时会妨碍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表述。当然，就“虚拟资本”的形成、金融和信用流通而言，我仍然感到马克思的粗略论述（我在第9章和第10章进行了讨论）一如既往地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写作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额外的马克思主义（Marxian）著作可以利用。现在，就货币和金融的本质、职能和矛盾而言，《社会主义文摘》（*Socialist Register*）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等刊物的版面上充满了理论性的论述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综合。最近30年的金融创新是无法忽视的；鉴于近期的历史，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明显必须处于我们理论关怀的前沿。但还有一种不幸的，尽管是可以理解的倾向，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来看待金融问题和货币问题。例如，信用体系与各种资本不同的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之间的联系是相当重要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衰落，房地产投资不仅在美国，而且以不平均的方式在大半个资本主义世界（从伦敦和马德里到香港和悉尼）吸收了许多闲散的剩余资本。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又一次成了股票市场的宠儿。《限度》所提出的理论的这方面不幸只得到了极少的关注，尽管眼下我们有理由会看到1973年（当许多心比天高的不动产投资信托破产时）全球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重演。

阶级权力越来越通过租金支付来展开，而这与凯恩斯所 xvi
预想的“食利者的安乐死”完全不同。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在某些方面仍然够用，但还是需要加以重新评价。正如克罗尼尔（Coronil）在《神奇的国家》（*The Magical State*）中指出的

那样，委内瑞拉等石油国家在组织它们自身时是以对租金的榨取为中心的，而租金来自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然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何种价值（第 11 章只是简要地触及了这个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这些租金的流通（即使是在查韦斯手下）。石油输出国组织之类的组织攫取的是垄断租金，而不是马克思主要关注的绝对租金或级差租金。由于出现了全球性的房地产市场，城市化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扩张渠道，所以资本主义的某些活力中心——如香港——得以凭借开发房地产和榨取租金（包括垄断租金和级差租金）来存活，正如它们可以在其他任何基础上存活一样。人们对文化活动迸发了难以置信的兴趣（包括把城市作为独特的、真切的旅游商品来出售），知识和信息产业得到了强调，人们还组织了奥运会等场面盛大的赛事［更不用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这样的招牌性建筑（signature architecture）所起到的作用了］——这一切所处的范围都是当代形式的对垄断租金的追求［参见我的论文《租金的技艺》（"The Art of Rent"）］。尤为阴险的是当代对知识产权的强调，例如遗传物质和生命形式变成了专利。许可、专利和版权协议的推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核心问题，而为了保障这些知识产权，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agreement）变成了在全世界维持公司和资本家的阶级权力的重要手段。专利与垄断租金是如影随形的。

于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分析当资本主义开始吞食自身时所发生的事情［后面会提出这个问题，例如在第 437 页（边码）］。我当初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倾向是多么广泛而复杂。在 1980 年之后横扫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一些情形下是由国际机构的权力所强加的（带头的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另一些情形下则是由本地的阶级联盟所实行的——导致了新一轮的对共有之物的圈占。卢森堡的开创性著作《资本积累论》指出，在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这里的关键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与通过暴力、欺骗、掠夺和对资产的洗劫来进行的积累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别，后者一般是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马克思倾向于将后一种形式的积累降低为资本主义的前史，但在卢森堡看来，积累的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的"，而且一直都在进行，因而"只有把这两方面总合起来，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事迹"。[6] 在她看来，与掠夺性的一面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抢劫。然而在《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7] 中，我论证了这种掠夺活动已经被内化到了资本主义当中（例如借助私有化、去工业化或退休金和福利权利的流失，这种流失主要是通过信用体系和对国家权力的运用来策动的）。由于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内化的过程，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称作"剥夺式的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这个范畴对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当代的帝国主义形式十分关键。但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必然会展现出双重性质。针对剥夺的斗争（包括对土地权利、福利、退休金和医保权利的剥夺，对环境品质的剥夺，对生命本身的剥夺）与围绕劳动过程的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后者长期支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政治任务的核心不仅是要在当代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积累之间确立有机的联系，而且是要理解它们所引发的两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针对剥夺的斗争支配了大多数关于另类的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的运动，例如汇集在"世界社会论坛"中的运动。

xvii

国家在剥夺式的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也向我们的分析提出

了挑战。正如我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限度》并没有就资本主义国家给出一种具体的理论，尽管国家的参与在整个文本中无处不在。我之所以留下这项“未竟的事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不愿意涉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辩论，这场激烈的、令人畏惧的、内容广泛的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十分盛行。现在看来，那场辩论多半已是明日黄花（passé），尽管它所提出的问题仍旧具有关键意义。它已经被一场内容更加广泛的辩论所取代了［除了杰索普（Jessop）之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只扮演了被压制的角色］：如何理解当代国家及其权力。人们似乎只有一点共识，即国家的含义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而且这场转变的主要推动者是某种所谓的“全球化”（不论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左翼和右翼现在都有一些人宣称国家无关紧要，一些反抗性的社会运动也公开怀疑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治上具有怎样的价值。我在这里决不可能探讨这些复杂的论述。但我站在另一边，即把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矛盾辩证法和矛盾动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同时我也愿意承认，国家权力的结构已经变得与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结构相当不同了。各个空间级别（从本地到全球）上的“如同国家的”制度安排现在起到了关键的协调作用。相当不同的国家形式［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发展型的（developmental）、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在当代国家体系中不安定地共存。但在这一点上，《限度》同样有一些有趣的，尽管并不完整的说法，原因不仅在于它指明了资本积累如何必然会产生并转化各种空间性和领土结构（由此证明了就算国家之类的东西不存在，资本家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而且在于它所突出的一些要点适合于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干预。

因此，我们不难从《限度》中（按照后记所说的方式）推导出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特有的本质相关的一些看法。[①]

《限度》的第三部分坚持了资本积累所固有的空间性，而这是它为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最有创见的，同时却也是最不完整的贡献之一。我当时感到，我们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来把帝国主义理论重新编织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模型当中，这些模型原本是纯粹用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方式来说明的。我所找到的办法主要是一种简化的“空间修复”理论（空间修复指的是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把它看作一种解决危机的临时方案——危机是从资本的过度积累出发来理解的（见第 7 章）。资本的剩余本来很可能会丧失价值，却可以由于地理扩张和时空转移而得到吸收。我还试图阐述空间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是如何由于内嵌在土地当中的资本投资（例如运输网络、通信网络和建成环境）——这些投资是长期的，通常要依靠债务融资——而产生的。这种固定投资的不动性与流变的、在地理上十分机动的资本是矛盾的，后者要为过度积累寻求空间性的解决方案。因此，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地理景观注定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场所，也是阶级斗争的所在之处。这一切还会导致空间格局和活动“区域”的生产（例如通过把资本资产内嵌到城市的建成环境当中、通过劳动的领土分工等），而且区域性的阶级联盟、领土性的组织形式和领土性的治理形式都会围绕这些空间结构而出现——这一切由此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会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的价值丧失而产生，而这些冲突主要可以通过国家体系来展开，而且的确会这样展开，虽然国家体

① 见《新自由主义简史》第 3 章。

系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在后来的《新帝国主义》中，我将这个理论重新表述成了一种空间和时间中的“自相矛盾的融合”，融合的一方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活动，另一方是资本积累的微观过程。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不同的，也无法相互还原。这种帝国主义理论要求仔细地重构这两者彼此交织的方式——它们的交织尤其关系到积累的动态，包括剥夺式的积累和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积累。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试图把国家和国家体系的作用自 1980 年以来的变化整合到阶级权力的重建当中，这种重建凭借的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剥夺式的积累和由金融主导的、基于信用的、食利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兴起。我论证了危机的形成和资本的价值丧失在某些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如果说危机的源头总是具体地点或具体区域的资本的价值丧失，那么危机的普遍化就依赖于传输或传染的过程。在过去 30 年间，倾泻而下的金融和信用危机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机构的作用则是企图遏制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我在原版导言中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里需要再强调一次。《限度》的直线叙述使资本看起来仿佛在降生于可感知的空间和时间之前就具有了某种幽灵般的、完全属于自身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看起来仿佛可以按照顺序来设定，即从普遍性（例如利润率的下降）到时间性（金融危机），再到空间性（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地缘政治）。然而，倘若以为《限度》所陈述的三块危机理论是有顺序的，那就错了。它们应该被理解为危机在资本主义这个有机的统一体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三个同时存在的方面。

我可以给出两个论据来支持这个立场。首先，任何一种唯物主义都要求把空间、时间、过程这三者视为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统一体。怀特海（Whitehead）曾经评论过，一切关于自然的问题（包括人类活动在内）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不幸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极少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本质的反思。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倘若对时空性的辩证法没有扎实的领会，历史唯物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就无法存在。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其实有一个基础性的时空框架，它的立脚点是理解时空性的三种基本方式的辩证融合。按照绝对的时空理论——它主要与牛顿（Newton）、笛卡儿（Descartes）和康德（Kant）这些名字相关——空间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网格，是与时间完全分离的；物质性的对象、事件和过程可以在其中清晰地被个体化并得到描述。空间秩序是地理知识的领域，而时间的展开是历史的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从一开始就是使用价值的首要领域。正是空间界定了对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国家的边界、工厂的物理格局、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劳动者个体化的身体。按照相对的时空理论——它主要与爱因斯坦（Einstein）相关——运动的世界所界定的时空结构既不是固定的，又不是欧几里得式的（Euclidean）。运输的联络从物理距离、成本和时间出发产生了不同的度量标准，而变动的拓扑空间（例如航空枢纽和网络）界定了商品、资本、货币、人口、信息等事物的流通。纽约与伦敦的距离是相对的，不是固定的。相对的时空是交换价值——运动中的商品和货币——专有的领域。关系性的时空观——它主要与莱布尼茨（Leibniz）相关——断定时空没有独立的存在，它是物质和过程所固有的，而且是通过物质和过程

来创造的。例如，宇宙并不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起始的。大爆炸通过运动中的物质才创造了时空。资本创造了时空。关系性的时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首要领域。马克思认为，价值既是非物质性的，却又是对象性的（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8]这样一来，价值虽然“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9]，却把它的关系性隐藏在了商品拜物教当中。价值是关系性的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我们只有通过它的对象性后果才能以可感知的方式来掌握它，但是由此也会被抛进一个奇特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是物质性的关系（我们是通过我们生产和交易的东西来相互关联的），而社会关系是在物与物之间构造的（我们为自己生产和交易的东西设定了货币价格）。如果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总是非物质性的，却又总是对象性的（倘若想要直接衡量某种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就一定会失败），那么所有企图给出某种直接的、本质主义的价值尺度的尝试就会变得缺乏意义，甚至可能是错位的。但这里预设的是何种社会关系？价值是一种内在于商品的关系。它在世界市场的时空中内化了劳动过程、商品生产和实现以及资本积累的整个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这三种时空框架——绝对的、相对的和关系性的时空——必须在相互之间保持辩证的张力，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恰好是以相同的方式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倘若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具体劳动并没有在无数地点（工厂）被建设起来，那么在关系性的时空中就不会有价值。倘若没有无数交换行为，即持续的流通过程——它们在相对的时空中把全球市场拼接在了一起——那么价值就不会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却又是对象性的力量而出现。通

过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从事具体劳动，纺纱工人才能把价值（即抽象劳动，它是一种关系性的规定，并没有物质性的尺度）内嵌到衣物当中。只有商品进入了交换关系的相对时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一旦纺纱工人被迫放弃了制作衣物，一旦工厂陷入了沉寂——因为世界市场的状况使这种活动在那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变得没有价值了——价值关系的对象性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一切也许看上去很明显，但若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识到由此得出的不同的时空框架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就会造成概念的混乱。例如，许多关于所谓的“全球与本地的关系”的讨论已经变成了一个概念的泥潭，因为人们没有能力理解与此相关的不同的时空性。我们不能说价值关系导致了工厂关门，仿佛它是某种外在的、抽象的力量一样。中国的具体劳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要经过相对时空中的交换过程的中介，才会在世界市场中使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发生转化，由此将墨西哥的具体劳动过程推向了倒闭。“全球化”之类的流行词也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了关系性的职能，尽管它当然轻易地遮盖了阶级关系。我们假如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寻找全球化，就不可能找到。

这类见解后来让我得以在《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0] 中表述了“时空压缩”的观念，并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11] 中表述了“空间和时间的社会生产”的观念。最近，我还在《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走向一种关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理论》（*The Global Spaces of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中进一步延伸了这种论述，把绝对的、相对的和关系性的时空概念同列斐伏尔所区分的物质性的社会实践（经验中的空间）、空间

的表象（构想出来的空间）和表象的空间（活的空间）进行了对照。我认为，我们无比需要更加充分地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空性，原因不仅在于这在存在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于以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许多失败都是由于未能了解人类事务中时空关系的复杂性。

虽然这一切也许听上去非常抽象，但关于权力的空间性和对空间的掌控在阶级斗争中作为一种生产力和一种政治资产，借助一种时空透镜来阅读马克思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如，《共产党宣言》说明了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凭借一种地理战略来掌权的，这种战略用贸易和机动性（它们运行在相对的时空中）打破了基于土地的封建权力的绝对空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虽然现在只是衍生的资本形式，却出现在生产资本这种首要的现代资本形式之前，原因恰好在于它们更好地掌控了空间（《资本论》第 1 卷，第 165 页）。货币形式的兴起总是紧密依赖于历史的和地理的运动与联系。货币源自时空世界的持续内化，它的流通创造了这个世界，它的估值也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空间经济处于无休止的动荡和流动当中；假如没有这种空间经济中的信用、信托和贸易联络，货币，即资本的首要计算尺度，就什么也不是。当代著作表明，早在货币形式和由它代表的价值兴起之前，信用和作为社会关系的信托也许就已经出现了。进一步讲，资产阶级的权力总是关系到世界市场中的地缘政治的定位，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帝国主义的支配形式在资本主义兴起时起到了塑形的作用，尽管资本主义彻底重塑了帝国主义实践的本质［伍德（Wood）最近论证了这一点[①]］。例如，马克思在描述了货币如何必定会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Verso.[12]

冲破一切时间的和空间的壁垒之后，立刻提到了危机的可能性——在危机中，“商品内在的对立和矛盾显示出来了”（《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13]。这意味着危机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时空性之外。在过去40年间，当代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彻底重塑了时空性，还因此扰乱了资本流通的其他形式，也扰乱了日常生活。通过加快速度和外商直接投资（这里只提两种近期明显在起作用的力量）来打破现有时空形式的刚性也成了危机的一个关键方面。例如，东亚和东南亚在1997—1998年的困境同时空性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我要强调的是，《限度》在理解危机的形成过程时虽然分了三“块”，但它们必须被解读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的既可以相互区分，却又一同存在的环节。

在写作《限度》时，我当然免不了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1975—1977年的所谓纽约财政危机非常戏剧性地把城市与全局结合起来了；凭借后见之明，我现在把这场危机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和阶级权力的恢复所打出的关键的第一枪。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旧是如何理解危机的形成。不仅在这一点上有多个不同的思想流派，而且解释上的差别长久以来都为不同的政治战略提供了支持。

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态来理解危机。这导致他淡化了环境约束或人口约束的根本地位——在许多人眼中，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约束的主要表达方式是李嘉图式的农业回报下降或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动态。马克思对两者都有尖锐的批判。（他批判李嘉图说：“在危机面前，他就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14]）在最近

大约 30 年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同道中出现了一批可观的文献，它们认为我们无法维护，也不应该维护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立场。许多左翼人士现在都认为，正是环境危机界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我们的政治活动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革［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我不赞同那种立场，特别不赞同那种真伪难辨的关于“自然的终结”或某种“环境崩溃”的措辞。然而，我确实也极其严肃地看待环境问题，例如臭氧洞和全球变暖、栖息地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资源枯竭、森林的砍伐和沙漠化、流行病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等等。租金的作用和对自然的估值需要重新成为分析的核心。我同样非常明白环境公正的问题对当代政治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也未曾忽视人口动态的问题。我严肃地对待所有这些问题，正如我严肃地对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状况和争斗，这些状况和争斗不仅产生了，而且持续巩固了贸易战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军事冲突。

但我们倘若拒绝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拒绝把它作为我们的问题的关键，就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东西。我比 25 年前更加坚信，一种避开了核心矛盾的政治活动永远只能对付
xxiii 征候。有人企图把对政治经济矛盾的理解从我们的眼界中移走（乃至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移走），我完全拒斥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果说首要矛盾是在危机的进程中被揭示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只有转向危机理论，才能弄明白我们在政治上要奉行怎样的长期战略。

我在第 6 章考察了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三大思想流派。第一个流派通常被描述为“利润缩减”理论，它认为劳工组
 织和劳工的稀缺会驱使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以至于使资本

家阶级，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危机（在当前的局势下固然没有这个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这种迹象的）。第二个流派将有效需求的缺乏或“消费不足”看作问题的关键，因为资本家会不断投资，而工人所消费的价值按其定义就少于他们生产的价值。马尔萨斯把对外贸易和“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视为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答，卢森堡则认为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劫掠是唯一的选择。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在资产阶级那边对应于凯恩斯主义理论。诸多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流派把国家的财政管理和货币管理看作问题的答案。尽管消费不足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很多这样的迹象。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则立足于一种观点：资本家争相寻求可以节省劳动的创新，结果将活劳动（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切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头）从生产中移走了。如果其他事情（例如劳动力的受剥削率）保持不变，这就会产生利润率下降的持久趋势。马克思本人为这个理论附加了许多告诫、限制条件和补偿情况（见第6章），所以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危机理论来加以维护，尽管它的确聚焦于一个关键问题，即技术变革的潜在后果是使资本主义的动态失去稳定。我的结论是：这些理论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动态的某些重要方面，却也都是些其他东西在表面上的显现。

更加深层的问题是过度积累的倾向，我在第7章论证了这一点。当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数量不断增加，却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时，危机就发生了。这里必须用到“盈利”（profitably）一词（而且我要说明，这与所谓的利润下降的规律并没有直接联系）。我认为，这条围绕“资本剩余”的论述思路拥有压倒性的证据。资本主义是从贸易商和商人的本地化

群体所累积的剩余中产生的，他们自16世纪以来就在肆意劫掠世界的其他地方。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出现了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它成功地吸收了这些剩余，同时又扩大了剩余。在雇佣劳动和工厂生产的基础上，吸收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得到了内化、体系化和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更加清晰地、更有扩张性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结构的中心。这也使得资本主义成功地内化了技术变革的力量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造成了更大的剩余。这些剩余在哪里能得到盈利性的运用？资本的剩余一旦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就会丧失价值、遭到毁灭，这些阶段就叫作“危机”。

剩余资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商品可能会在市场上供过于求（从而出现消费不足）。剩余资本有时可能会表现为货币的剩余或信用的过剩（从而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或者它有时可能会表现为生产能力的剩余（即闲置的工厂和机器，这是资本丧失价值的通货紧缩阶段的特征）。它还有可能表现为投资于建成环境的过剩资本（即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和投资于其他资产的过剩资本（股票投机和债券投机的剧增和暴跌、商品期货或货币期货等等），或者表现为国家的财政危机（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福利国家职能上的过度开支——或许是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强行推动的）。资本的剩余所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每次都使危机获得具体的特征。然而，从一种形式调换到另一种形式有时能缓解压力（倘若把信用的过剩传递到消费者身上，他们就可以缓解消费不足的问题，并使陷入萧条的工厂重新开始经营）。进一步讲，对所有这些理论来说，出现资本剩余的地点和时间当然是以一种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方式来确定的。《限度》有两个重大创新：它在长期的资本投资中（例如英吉利海峡隧道）引入了剩

余在时间中的转移这个观念（这些转移是通过信用体系和通过依靠债务融资的国家开支来策动的）；它还引入了剩余在空间中的转移这个观念，而这是通过地理扩张来完成的——这种扩张不仅包括创造世界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组合投资、资本输出和商品出口，而且包括一些更为残忍的形式，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深化和拓展。把时间和空间中的转移加在一起（例如依靠信用融资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得出的机制可以在宽泛的基础上非常有意义地回答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尽管这些答案从超长期来看都是暂时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整合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的理解当中了。由此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尽管对剩余的吸收或价值丧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本地化的危机——高度本地化的、基于地点的资本价值丧失（在这一处是去工业化，在那一处是金融危机）——可以成为平息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关于环境压力和环境恶化所看到的许多东西都是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案时的表现。

可见，核心问题是对剩余的吸收。一旦这种吸收的能力失效了，就会导致价值丧失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讲述了这些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如何在全球经济中运行的。让我从资本剩余的角度来重新表达一下这番论述。20世纪70年代是慢性资本剩余的阶段，大多数剩余在1973年之后都转移到了石油生产国家，然后在纽约的投资银行那里作为货币资本得到了回收。人们很难为这些剩余找到盈利的用途，因为现有的出路——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国家战争开支的剧增、福利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要么已经饱和了，要么具有让人难以牟取暴利的组织形式。慢性的滞胀危机来临了。

随后的转向是新自由化：为了使剩余得到盈利性的运用，就必须拆毁一切可能的壁垒。工人阶级如果足够强大，从而阻碍了盈利，就必须受到惩戒；他们的工资和待遇必须降低，他们迫使利润缩减的能力也必须被去除，使它无迹可寻。这个目标在智利是通过暴力达成的，在纽约是借助破产达成的，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政治活动中则是以打击通货膨胀的名义来达成的。倘若这一切还不够，公司也能够亲自动手，搬迁到国外的某个劳工更为廉价、更为驯服的地方。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碎对外贸易所面临的一切壁垒。必须降低关税，建立反保护主义的贸易协定，并开辟一种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在全世界流动的国际秩序。倘若不能和平地做到这些，就要动用金融强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策动）或秘密行动（由中央情报局来组织）。对多种空间修复的搜寻开始了，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也在剧增。“冷战”的结束给外商的经营和扩张带来了更多盈利的机会。但是资本必须找到为它提供方便的政权，还要在它为此渗透的国家找到充足的运用剩余的机会。从英国到墨西哥，再到俄罗斯、印度，私有化的浪潮为资本的盈利性运用开辟了全新的部门。公司税较低的体制（这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而设立的）、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轻松地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方便的国家调节环境、良好的商业气候——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满足，否则资本的剩余就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倘若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剥夺人们的资产和与生俱来的权利，那就不用客气。这正是新自由化的成就。在这背后，还必须建立制度性的协定来为全球性的金融业务提供方便，并保证它们的安全。这要求运用国家的霸权力量——它们的后盾是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力——来保卫国际金融体制。以美国的帝国权力为后盾的——欧洲和日本则是同谋——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一系列其他机构的权力，它们对全球体系的调节确保了生产出来的剩余资本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却可以在一片不断扩大的领地上得到盈利性的吸收。

但这个体系并非完美。不仅资本主义所吸收的剩余价值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扩大，而且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再度破坏了稳定；结果无非是生产出了更大规模的剩余。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许多这样的剩余都以投机的方式得到了吸收，流入了各式各样的资产——如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股票市场、2000 年之后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现在的商品和货币市场，或者亚洲和拉丁美洲高风险的“新兴”股票市场。对冲基金所管理的金额“从 15 年前的 400 亿美元飙升到了今天的 1 万亿美元”，因而到了“2004 年末，共有 3307 只对冲基金，比 1999 年增长了 74%”。[①] 投机所得现在对于上层阶级的存活十分紧要，但这显然会在各种资产泡沫破裂时造成重大的价值丧失的威胁。正如马克思很久以前评论的那样，“虚拟资本”这个难以把握的范畴对于资本主义是某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它实在太容易失控了。虚构终将瓦解——就像巴林银行（Barings Bank）和安然（Enron）所编造的虚构那样——随后留下的是一堆金融残骸。但是马克思也评论说，信用体系立足于信心和期望。资本主义越来越单纯地以信心为生。提升信心，特别是消费者的信心，对于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变得紧要了。

在最近大约 30 年间，新自由化在全世界拆毁了无数壁垒，让资本的剩余得到了吸收——这是一段令人震惊的历史。它

① Anderson, J. 'Fund Managers Raising the Ante in Philanthropy,'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Section, August 3, 2005, pp. 1 and 3.

还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对资产价值进行投机的新形式，而这同样吸走了数量巨大的剩余资本，尽管风险也相当大。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它能够在全世界组织并策动规模庞大的资本价值丧失，却直到今天也没有毁掉整个体系。剩余如果得不到吸收，就必须丧失价值或遭到毁灭。价值丧失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蔓延。财政危机在1970年以前是很罕见的，后来却倾泻到了世界各地，往往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例如1982年和1995年的墨西哥，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韩国，2001年的阿根廷）。美国也逃不过价值丧失的严重发作。为了扭转1987年的储蓄与贷款危机（Savings and Loan Crisis），美国花费了近2000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和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重大破产也都是严重的事件；随后，股票市场在2000年的暴跌从美国股市抹去了7万亿美元的价值。虽然一些资本家也遇到了困难，但是目前的制度结构不仅有分散风险的天才，而且有不对称地分散风险的天才：它可以确保为价值丧失付出代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最没有承受能力的人。当墨西哥在1982年走向破产时，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保了纽约的投资银行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损害，而墨西哥的普通民众被迫偿付欠款，蒙受了巨大损失。金融危机实际上成了使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精英手中加速积聚的最佳手段。

目前在全球存在的不平衡达到了令人瞠目的水平。资本的剩余无处不在，不过现在特别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另一方面，美国所经营的债务经济具有人类历史上从未设想过的规模。这个局面只能在刀刃上维系，正如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论证的那样。若要纠正目前在全球存在的不平衡，很可能就

会造成痛苦乃至灾难。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在环境、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切危难都是一个体系的产物，这个体系要寻求剩余价值，为的是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后者又需要得到盈利性的吸收。“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15]是永不停息的，由此给社会、政治和环境带来的灾害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处在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极其“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大纲》，第749页）[16]当中，也许应该听从他的结论：“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17]

关于文献的注释

《资本的限度》全书所使用的《资本论》是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年的版本。不幸的是，后来印刷的这个版本改变了页码，因而要找出引文的准确位置就变得困难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提前向读者告知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

Arrighi, G.（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 of Our Times*, London.

Arrighi, G. and Silver, B.（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Brenner, R.（2002）,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Duménil, G. and Lévy, D.（2004）, *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Coronil, F.（1997）, *The Magical State: Nature, Money and Modernity in Venezuela*, Chicago.

Fine, B. and Saad-Filho, A.（2003）, *Marx's 'Capital'*, Fourth Edition, London.

Gowan, P.（1999）,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Global Dominance*, London.

Foster, J. B.（2002）,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Harvey, D.(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Harvey, D.(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Harvey, D.(2001),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in *Socialist Register*, Colin Leys and Leo Panitch(eds.), London.

Harvey, D.(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Harvey, D.(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Harvey, D.(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Jessop, B.(2002),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and Urban Governance: a Stat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Urban Restructur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Neil Brenner and Nik Theodore(eds.), Oxford.

Luxemburg, R.(1968),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O'Connor, J.(1997),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New York.

Mertes, T.(ed.)(2004),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Ollman, B.(1993),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Panitch, L. and Gindin, S.(2005), 'Finance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in *Socialist Register*, Colin Leys and Leo Panitch(eds.), London.

Pun Ngai(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Saad-Filho, A. and Johnston, D.(2005),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Woods, E. M.(2003), *Empire of Capital*, London.

译注

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43—744页。

2. 中译本见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版。

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0页。

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41页。

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2页。

6. 彭尘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9年，第364—365页。

7. 中译本见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

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1页。

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91页。

10. 中译本见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版。

11. 中译本见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版。

12. 中译本见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版。

1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35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4.《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5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86页。

1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9页。

17.《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9页。

导 言

xxix

有人说，任何研究马克思的人都会感到不得不把研究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既然拿出了这部著作，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命题。但我的确还有另一个理由。在写完《社会公正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之后（近十年前），我决定改进其中一些试探性的表述——后来我发现它们是错误的——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决定性地陈述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过程。我越是深入地卷进这个课题，就越意识到我所试图援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更为基本的方面还完全未经展开，在一些情况下几乎未曾得到考察。所以我的打算是写一种关于城市化的理论，把它整合到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城市化过程的详细历史研究当中，并顺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随便将几个“空箱子”装满。这个课题很快就变得异常艰巨了。这本书虽然很厚，却仅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箱子”。让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在马克思那里，每个东西都同其他一切东西相关，这既是一个长处，又是一个难点。若要研究某个“空箱子”，就不可能不同时研究理论中的其他所有方面。若要理解我所必须理解的一小部分——例如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信用的作用和在空间格局的生产中起中介作用的机制（比如租金）——就必须仔细注意它们与理论的其余部分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例如我发现，先前对租金的错误解释恰好是由于未能把分配的这个单独的方面整合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分配所提出的一般理论当中。然而麻烦的是，关于这个一般理论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不仅如此，在考察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时，正如预期的一样，我也获得了思考价值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新方式。我别无选择，只能一般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一部论著，并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流通、信用体系和空间格局的生产上面。

这一切使我大大远离了我最初关注的问题：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奥斯曼（Haussmann）管理巴黎的详情以及随后巴黎公社的光荣和恐怖，巴尔的摩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和阶级斗争——因为我移居到了巴尔的摩市。不过联系还是存在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一切拉到一起，超越理论与历史之间，即抽象的表述与具体的记录之间，仿佛存在的边界，并超越理论在概念上的明晰性与政治实践看似无尽的混沌之间仿佛存在的边界。但是时间和空间迫使我仅仅将理论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写了出来，却没有涉及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担心这部著作不过是为一种宏伟的认知做了苍白的辩护。此外，我还担心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

若要为自己辩护的话，我可以说别人似乎也没有找到一种整合理论与历史的方式——既维持两者各自的完整性，又超

越它们之间的分离。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费尽千辛万苦才使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保持完好，结果却很可能只覆盖了他所预想的工作的大约二十分之一（他从未写完《资本论》，而他所规划的关于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危机、国家等问题的书完全是一片空白）。在构成《资本论》第2卷的预备性研究中，历史也几乎彻底消失了。对我来说，为了讨论我所感兴趣的一些特定话题，我想要贯穿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和《大纲》中汇集的材料。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从理论中剥掉一切直接的历史内容。

但我希望这里陈述的一般理论会对研究历史和开展政治实践有所帮助。我已经发觉了这一点。这个一般理论帮助我理解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大规模地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1868年让奥斯曼下台的金融困境为什么同20世纪70年代困扰纽约的金融困境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危机阶段总是明显需要同时对技术、对区域性的生产格局进行重组，如此等等。我只能希望他人也会发觉这个理论是有帮助的。若非如此，我就认定自己担起了一副重担：今后要在具有更加明确的历史、地理和政治内容的著作中证明这个理论的功用。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当然应该接受各种各样的修改，包括批判性的评述，更好的、更为全面的理论构造，对照历史记录做缜密的检验，以及政治斗争的火焰。我之所以发表这些理论性的探索，是为了给共同的探索过程做出贡献。我之所以现在发表它们，是因为若不彻底改变方向，我就很难再推进这个主题，而这种改变还要过若干年才能结出果实。

我可以用貌似博学的评论来塞满这篇导言，例如关于认识论和存在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辩证法

“真正的”本质。但我更愿意让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通过文本来呈现，并让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显现出来，而不是先天地设定研究对象，如同将某个用硬纸板剪成的图样放在一个背光的舞台上一样。但关于我试图做什么、怎么做，一些总体上的评论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我的总目标是把一种我认为是辩证的思考方式与一种尽量简单的阐述方式结合起来——尽管我的主题显得十分复杂。这些目标是不容易调和的。在一些地方，对简单性的追求将我逼近了还原主义的危险境地，而在另一些地方，我力图忠实于相关主题错综复杂的完整性，却走到了蒙昧主义的边缘。我并没有以令自己满意的方式来避开这两种错误。另外，一些在专家面前——他们长期浸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表现为还原主义的东西也许在初学者面前会表现出不必要的晦涩，这一点我再明白不过了。对此，我的策略是在开头几章追求足够的简单性，以便尽量让初学者——如果他们愿意同一些确实很困难的概念做斗争——有机会应付后面几章更为实质性的贡献。有几章写的是固定资本、金融和货币、租金，以及空间格局的生产，我在这几章试图更加忠实于这些主题错综复杂的性质。

然而，我不想让这种论述被解释成一种线性论述，尽管它的流程仿佛是一条直线。前面几章并不是坚固的、固定的构件，仿佛接下来的几章是树立在它们之上的。后面几章也不是从一组早先提出的初始命题中衍生出来或推论出来的。毋宁说我的起点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最简单的抽象，然后我试图通过在不同的语境下考察它们来扩展它们的含义。对整体的看法若要演化，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现象整合到一幅巨大的复合图景当中，而这幅图景所呈现的就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困难在于想出一种叙述方式——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叫作论证形式——它不能违背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内容。每一章的焦点都是整体的一个特定方面。困难在于一边维持焦点，一边与大致处在视野中的其他东西保持关联。不断提到“其他一切”会使后面几章平白无故地变得杂乱，并使开头几章显得不可理解，因为我必须提到一些未经分析的主题，却不能予以解释。在《资本论》的开头几章，马克思也试图讨论这个问题，却打造了一种密度很大的、极端抽象的语言，让大多数普通的凡人至少在第一次阅读时完全不知所措。我找到了一个中间立场。我运用了对立、对抗和矛盾的概念，通过这些线索来把材料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就运用了一种在马克思那里卓有成效的逻辑手法。后面会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但是大致的策略值得预先加以阐明，至少这可以让读者对随后的论述将如何展开有所了解。

xxxii

在理论表述的每一步，我们都会遇到对抗，这些对抗造就了由*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所形成的耐人寻味的格局。每个矛盾的解决都只会激起新的矛盾形成，或者将它们转换到某个全新的领地上。我们的论述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向上、向外行进，以便涵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方面面。例如，马克思《资本论》最开始的观点是：物质商品同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这两种价值形式必定是相互对立的。通过一般商品（使用价值）与货币（交换价值的纯粹代表）的分离，这个对立（它是内在于商品的）就获得了外在的表达。但是货币随后就把相互矛盾的职能内化到了自身当中，如果再要解决这个矛盾，货币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流通，即成为资本。我们的论述像这样前进，就可以涵盖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抗以及技术变革的矛盾动态，并最终演化为一份详尽的、长篇的探讨，揭示出一些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把资本主义引向了灾变

性的危机。前七章按照这个逻辑概括并解释了马克思的论述，一直讲到了我所说的“第一块”危机理论，它的典型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

在余下的几章，我运用同样的逻辑手法将马克思的论述延伸到了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地带。第 8 章对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形成过程的分析表明，虽然在“第一块”危机理论所描述的条件下产生了资本和劳动的剩余，但它们可以通过新的流通形式的创造来加以吸收，而这些形式是以未来的而非当前的使用价值为导向的。但我们随后就会发现，这些新的形式长期来看与技术变革的持续动态是有冲突的，而技术变革本身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于是，固定资本所背负的“价值”就成了一个不稳定的量。资本的持续流通由于剧烈的干扰而受到了威胁。

然后前来救援的是信用体系。我们在第 9 章和第 10 章发现，信用体系是一种调节资本流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它的潜在能力是解决资本主义容易遭受的一切不平衡，解决先前识别出的矛盾。但它这样做的代价是把矛盾内化到自身当中。金融权力的极度积聚——这是与金融资本的花招相伴随的——既可以轻易地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又可以轻易地破坏这种稳定。在金融体系——把货币作为信用货币创造出来——与它的货币基础（把货币用作价值尺度）之间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对立。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我们考察了危机形成过程的金融方面和货币方面，包括金融恐慌和通货膨胀。这构成了“第二块”危机理论。

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名义上只是讲完了分配理论，但它还让我们得以从理论的视角来考察空间动态和时间动态。如果进一步分析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就能说明资本主义的

矛盾如何至少在原则上容易获得一种“空间修复”——虽然资本主义容易面临矛盾，但是地理扩张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为它纠正自己提供了可能性。这直接走向了“第三块”危机理论，它从空间的方面讲述了危机的形成。在这个标题下，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处理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寻求“空间修复”最终只能把它们抛向世界舞台，尽管这些矛盾也会具有新的形式。我认为，这会让我们得以构造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相关的理论框架。

我并没有宣称这是问题的终点——鉴于这种理论思考的方式，这怎么可能是终点？我在后记中提到了一些领域，它们都属于未竟的事业。我也没有宣称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原创的或无可争议的。这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值得通过导言来谈论的问题。

在过去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这场复兴的标志是热情的争论和激烈的辩驳，再加上不少尖刻的批评。我力图赶上大大增加的文献，甚至在五年左右的写作中也是如此，不过并不总是成功。若要注明文本中的每一处思想受到了何种激励，所需要的注释就会多得难以置信。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向许多作者、思想家和实干家的共同努力表示谢意，我深受他们的恩惠。保罗·斯威齐、莫里斯·多布、保罗·巴兰、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等人的勇气一直鼓舞着我，他们在困难得难以置信的年代也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火焰熄灭。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所带来的激励——策划这场复兴的是极为不同的作者，如阿尔都塞（Althusser）、普兰查斯（Poulantzas）、沃勒斯坦（Wallerstein）、阿明（Amin）、

曼德尔（Mandel）等——我很可能早已放弃了这个课题。在这些思想家当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维桑特·纳瓦罗（Vicente Navarro）可以算是我个人的朋友，他们时常会提供帮助和鼓励。

我还力争尽我所能地理出这些辩论的头绪（虽然我必须坦白，我怀着深深的沮丧放弃了一些梳理工作）。但若要面对出现在每一场论战中的各种立场，就会使文本漫无边际，而且一些著作——如宇野弘藏（Kozo Uno）的著作——登场太晚，我无法给予应有的密切关注。所以我决定仅仅直接探讨最根本的辩论，因为这些辩论触到了我本人论述的要点。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倾向于抛开辩驳，仅仅顺便提一下在辩论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我希望叙述的流畅平滑可以弥补词句技巧的不足。

最后，还有一些个人和机构以种种方式对我有过直接的恩惠。由于获得了古根海姆纪念奖（Guggenheim Memorial Fellowship），我到了巴黎，这让我得以有时间研究法国城市化的经验，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让我得以了解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活跃的复杂情况——我很乐意为此致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与环境工程系主任沃尔曼（M. G. Wolman）对研究自由原则表示出了深切的承诺，从而帮助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工作条件。

我的运气也很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遇到了一群参与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那时的探讨格外令人振奋。迪克·沃克（Dick Walker）和李·乔丹（Lee Jordan）、吉恩·麻米（Gene Mumy）、约恩·巴恩布洛克（Jörn Barnbrock）和阿尔特卢德·巴恩布洛克（Altrud Barnbrock）、弗洛·托雷斯（Flor Torres）和查克·施耐尔（Chuck Schnell）、里克·费弗

尔（Ric Pfeffer）、拉塔·查特吉（Lata Chatterjee）和芭芭拉·柯佩尔（Barbara Koeppel）分享了他们的见解，而且他们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剥掉环绕在我们身边的神秘化外壳。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怀着趣味和享受来这样做的，这在人类的情谊中实属罕见。近些年来，比阿特丽斯·诺法尔（Beatriz Nofal）和奈尔·史密斯（Neil Smith）延续了这个传统。他们还逐页检查了我的手稿。他们对我有极大的恩惠。芭芭拉、克劳迪娅、约翰和罗茜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支持。最后，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asil Blackwell）的约翰·戴维（John Davey）在等待最后的成品时充满了耐心和鼓励，并善良地允许我征用他厨房的一角——有时还有阳光——来写下包括这几行在内的许多文字。

第1章　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资本论》第1卷，第21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分析中考察了商品的本质。乍一看，这个选择似乎略显随意。但若回顾一下《资本论》的预备材料——它们延续了近30年——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选择绝不是随意的。这个选择出自全面的研究，出自一段漫长的探索之旅，它让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只有揭开商品的秘密，才能解答资本主义本身错综复杂的秘密。我们的起点实际上是一个结论。

马克思把商品视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物质体现。他似乎又一次以随意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这些概念，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a priori*）结构了”[2]（《资本论》第1卷，第19页）。这些概念对于接下来的一切都具有绝对根本的意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整个分析都是以它们为枢纽来展开的。我们必须理解它们，才能理解马克思要说什么。①

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困难。要充分理解这些概念，就需要理解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由于我们在一开始绝不可能拥有那样的理解，所以我们被迫在不知道这些概念准确含义的情况下使用它们。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前进方式还是关系性的，而这意味着他不会把任何一个概念当成固定的、已知的或至少是可知的构件，仿佛在这个基础上就能解释高度复杂的资本主义。他似乎告诉我们，倘若不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无法解释价值，可是倘若没有充分理解价值，也无法解释另外两个范畴。马克思从来不会孤立地看待任何一个概念，不会以为概念就其自身便可以得到理解。这些概念之间有三种可能的关系——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以及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马克思的焦点总是其中的某一种。概念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要紧的。

随着《资本论》的进展，我们可以观察到马克思从一对关系性的概念转向另一对，运用自己在前一个立脚点上收获的见解来建立对另一个立脚点的解释。不妨借用奥尔曼（Ollman）

①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有一个标志：讨论的起点是考察人人熟知的物质对象的特性。“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关于阿道夫·瓦格纳的笔记》，第214页）[3]

的一个比方：马克思把每种关系都看作单独的“窗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任何一扇窗户的视野都是平坦的，缺乏透视。当我们转到另一扇窗户之后，我们就能看见先前隐藏在视野之外的东西。在新的知识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重新解释、重新建构我们从第一扇窗户得到的认识，让它更有深度、更加立体。我们只要从一扇窗户转到另一扇，仔细地记录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就能越来越准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内在矛盾。

这种辩证的进展方式对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被迫在黑暗中摸索，手中只有高度抽象的、仿佛先天的概念，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我们也还没有资格评价自己运用的视角。因此，大多数读者在阅读《资本论》的前几章时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时常令人沮丧的摸索，我们就会逐渐觉察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自己观看的对象。我们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因为马克思从不同的方面一点一滴地向我们阐明了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性质。随着分析的进展，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的含义也变得更加清晰了。我们越是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就越是理解这些概念指的是什么。[①]

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构件”出发来对待知识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极为典型，而且在广为接受的资产阶级思维方式中根深蒂固。按照这种思路，为了给知识

3

① 奥尔曼（Ollman）（1973）。恩格斯也特地告诫我们要防止一种“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资本论》第3卷，第13—14页）[4]

建立牢固的基础，就要把社会体系的基本成分孤立出来，并予以详细的探讨——据说这既是可能的，又是可取的。一旦基本成分得到了理解，我们就可以向前推进，仿佛它在随后的研究中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当然，知识的基石经常会显得不足；当这些基石的裂痕变得有目共睹时，我们就会见证一场戏剧性的思想革命——有时叫作范式转换——这正是资产阶级科学的特性。

在“西方”思想传统的养育下，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对这样一种研究手法感到亲切。马克思则脱离了它；我们假如对此稍有理解的话，就会觉得不安，甚至觉得这是不折不扣的乖僻。我们总是受到一种诱惑：试图用更加简便易懂的方式重新说明马克思的论述，以便把不熟悉的东西还原成熟悉的东西。对马克思的许多错误解释——既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也出自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植根于这种倾向。于是，《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遭到了一种我所说的“线性”解释。①

这种“线性”解释是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的。马克思之所以向我们提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概念，据说是为了设定三个构件，它们的潜在能力是解释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据说他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撇开了使用价值的问题，之后就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自己的目的无关，尽管这种研究仍然具有历史的趣味。考察交换价值也只是为了表明不能仅仅通过研究交换价值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所以马克思构造了劳

① 罗宾逊（1967）和萨缪尔森（1971）关于这个主题的陈述都是以这样一种“线性”解释为特征的（他们虽然很少相互赞同，但在这一点上似乎达成了一致）。更加令人厌烦的“结构主义”版本可以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68）和埃尔斯特（1978）那里找到，而且连斯威齐（1968）似乎也掉进了这个陷阱——除此之外，他的那部著作是万分值得赞赏的。在我看来，他之所以会陷入这个困境，是由于没有充分领会马克思在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个概念之间建立的联系（见第51页注①和第63页注①）。

动价值理论，把它作为一种牢固的基础、固定的构件；仿佛只要向前推进，它就会讲出我们关于资本主义需要知道的一切。按照这种观点，劳动价值理论的合法性在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的发现——由于劳动价值理论表达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所以它必定是正确的。

将马克思的理论变成这样一种“线性”版本会遇到诸多困难，我们将简要地考察其中一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考察了“价值到价格的转化”。这个转化程序是否准确对于“线性”解释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似乎正是从价值理论这个固定的构件中推导出交换价值的。由于所有人都承认，资本家操作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价值，所以按照上述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分析是成立还是倒塌就取决于这个转化在逻辑上是否连贯。

不幸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转化是不正确的。在商品所体现的价值与商品的交换比例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诋毁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一些同情他的资产阶级）得以大做文章。他们把《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3卷描绘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说，马克思到了第3卷才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了第1卷的价值理论无关紧要、让人分心，只会使人难以理解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实际过程。为了达成这种理解，人们需要的不外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不用考虑价值。从线性解释来看，这个论证十分有力，足以让马克思主义者陷入某种自我怀疑，仿佛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是无关紧要的；对这个理论的捍卫听起来也只是断言，缺乏连贯性和说服力。

但对马克思著作的考察表明，交换价值远远不是在事情进入后来的某个阶段时才从价值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他研究的根本。倘若不对交换价值有所理解，我们关于

价值就无法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交换价值与价值是关系性的范畴，两者都不能被当成固定不变的构件。马克思一直在考察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对上述转化问题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步。他并没有像线性解释所以为的那样企图从价值推导出交换价值，这一点确凿无疑。这可以解释马克思为什么尽管完全明白他的论证有逻辑缺陷（不过，他也许并不清楚这些缺陷的全部后果），却把这些缺陷撇在一边，认为它们对于他在那里真正关注的话题并不重要。不过，我们要在第2章才会回到这个问题。

可见，我们应该避免以任何有“线性”意味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若我们遵循马克思的方法，那就意味着我们必定会遇到任何阅读《资本论》的人都会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们一开始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作为凭借，却至多对它们只有片面的理解。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避开这种困境——“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我在这一章试图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为前提，重构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同时，我还试图解释马克思要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达到光辉的顶点，必须攀登陡峭的山路，我希望我可以让这段攀登不至于太辛苦。

1.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

（1）使用价值

5 马克思对世界的认知立足于一个观点：人类必须占有自然，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和需要。这种占有是一种体现在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中的物质过程。在商品生产的前提下，交

换把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分离开来了。但对自然的占有始终是根本。由此可见，我们决不能忽略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物质方面”。否则，我们就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掉了人的欲求和需要的满足。

商品的物质方面——它关系到人的欲求和需要——是由使用价值的概念来把握的。使用价值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看待。作为“许多属性的总和”——从而“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商品拥有一定的质，这些质与人不同种类的欲求和需要相关。食物消除了我们的饥饿，衣物满足了我们对温暖的需要，住房则满足了我们栖身的需要。虽然马克思坚持认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但他也坚持认为，我们“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5]（《资本论》第1卷，第36页）。

马克思是联系到交换价值——它首先被看作一种量的关系——来强调使用价值的量的方面的。但在精致巧妙、错综复杂的商品生产体系里，使用价值的量的方面会变得极为重要。生产者使用一定量的投入——劳动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来创造一定量的物质产品，这些产品则被用来满足一定数量的人的欲求和需要。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投入和物质产出的比例规定了效率的物质尺度。对总投入和总产出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总体图景，借此说明了对自然的占有同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有怎样的关系。

在一个以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为特征的社会，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特殊产业的产出量（如钢铁）——这些产出满足了其他所有产业的要求（如汽车、建筑、机床等等）——来界定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再生产的状态就是投入与产出达到平衡的状态。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体系中识别出了剩余，它

就是剩余产品：它是一定数额的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却超出了
6 在给定的状态下再生产这个体系所需的数量。这种剩余产品有诸多用途，比如建造纪念碑，或者创造新的生产资料来促进更多剩余产品的生产。不同产业的剩余产品可以重新结合，使得产出的总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这要么只是由于现有的产业扩大了，要么是由于形成了全新的产业。

这样一个物质生产体系的量的特征是相当有趣的，虽然这里当然有一些有待说明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可以再生产或扩大劳动力（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主题），如何识别产业，如何说明固定资本、联合产品等等。但我们明显需要让投入与产出的量达到平衡，而这使得对生产的物质方面的直接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潜在的启发意义——因此，这些方面自魁奈首先发表《经济表》以来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中提到了这项技巧，而里昂惕夫（Leontieff）在近些年里打造了一种细致的方法，以此来研究经济体内部的物质流动的结构。现在，许多经济体——国家、区域和被选中的城市——都可以是投入产出研究的对象。问题在于，我们在孤立地研究了这个生产体系的物质特性之后，可以从中推导出哪些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相关的见解？

马克思当然承认，任何社会若要存活下去，就必须在物质上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从生产的立场来看，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方面是由一种关于劳动过程的描述来把握的。我们可以从普遍的角度给出这种描述："有目的的活劳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6]（《资本论》第 1 卷，第 178 页）[①]

① 从斯拉法（1960）的出发，斯蒂德曼（1977）按照物质生产体系的特性重新解释了马克思。法恩与哈里斯（1979）概述了对这条进路的批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研究使得他对这种普遍的范畴抱有深深的怀疑。他把范畴本身看作特殊社会的产物，他所寻找的概念要能有助于把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由此才可以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试图让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的历史性。

马克思仿佛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撇开了剩余价值，因为他认为对人的欲求和需要的确切本质的认识“是与问题无关的”，是对政治经济研究毫无帮助的。我们无法从不同的使用价值出发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因此，“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7]，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事情。

按照有些人的解释，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在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得到考察。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远离事实了。事实上，马克思假如真的走了那条路，就会摧毁他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他在《资本论》的第一页拒绝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却在第二页就把它作为一个关系性的范畴重新引进来了。商品被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者的体现。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使用价值是在同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中得到考察的。①

处于关系性的形式中的“使用价值”这个范畴对于随后的分析极端重要。马克思声称：“只有对我的《资本论》一窍不通的 vir obscurus（蠢汉），才会做出结论说：……使用价值……

① 罗斯多尔斯基（1977，第73—98页）出色地讨论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概念的用法和他运用这个概念的方式——主要是《大纲》的方式，但也有《资本论》的方式。罗斯多尔斯基还注意到了斯威齐（1968，第26页）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说法，这个说法的大意是“马克思之所以将使用价值（现在叫作‘效用’）排除出了政治经济研究的范围，是因为它没有直接体现社会关系”。正如罗斯多尔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斯威齐在这里重复了一种对马克思的错误解释，这种解释至少可以追溯到希法亭在20世纪初的作品。

没有任何作用。”[8]（《关于阿道夫·瓦格纳的笔记》，第215页）马克思在《大纲》中[9]（第881页）相当明确地解释了他的手法。使用价值是“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体系的物。这是商品的物质的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他随后补充道：“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说法。它解释了马克思是如何把对使用价值的研究编织到他的论述当中的，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使用价值是按照现代生产关系来塑造的，也会反过来影响并改变这些关系。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生产的社会组织和技术组织、固定资本的物质特性等等——这些全都是从使用价值的立场来考察的——都以最错综复杂的方式同交换价值和价值交织起来了。例如，就固定资本而言，我们发现马克思反复宣称使用价值在这里“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10]（《大纲》，第646页）。机器就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它体现了交换价值和价值。它对劳动过程、生产结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等方面的改变也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机器的生产和使用完全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

当然，我们还没有资格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改变了使用价值，同时后者又如何改变了前者，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解释。但我们可以详细考察一个重要的例子，以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对使用价值的理解是如何随着分析的进展而演化的——这也许会有所帮助。

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的欲求和需要，马克思仿佛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把它降低为一个单纯的历史问题。到了第一节的末尾，在简要地考察了交换价值和价值之后，马克思修改

了他的论述，并坚持认为商品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倘若不能满足一种社会欲求或社会需要，就无法具有交换价值或价值[11]（《资本论》第1卷，第41页）。使用价值的范畴现在被理解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同交换价值和价值相联系，因而毫无疑问已经发挥了经济职能。

这要求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如何改变了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在整部《资本论》第1卷的大部分篇幅里，马克思都假定这些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是已知的。例如就劳动者而言，他们被看作“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产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12]（《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但之后马克思就转过去考察了资本积累如何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现在就被当成了某种按照资本积累的动态来变化的东西。

在《资本论》第2卷接近结束时，马克思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再生产的物质体系总体被拆分为三个部门，它们各自生产的是生产资料、工资品（必需品）和奢侈品。简单再生产若要存在，或者生产若要有秩序地扩大，这些部门之间的流动就必须达到平衡（包括量的、价值的和货币的平衡）。对劳动者的欲求和需要的认知现在经历了进一步的修改。劳动者必须依靠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商品生产者也需要劳动者花钱消费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资本家所控制的）生产体系既回应了劳动者的欲求和需要，又创造了这些欲求和需要。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将生产新的消费视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方面了。这种对消费的生产可以通过诸多方

式来实现——“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13]（《大纲》，第 408 页）。于是，对使用价值的认知就不再内嵌于“人的需要的任一体系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得到塑造的［见勒博维茨（Lebowitz），1977—1978］。

（2）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体系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初级的交易更加基本了：在这种交易中，我们购入一定量的使用价值，并付出一定数额的货币。这些交易会产生信息——那种小麦每蒲式耳卖多少钱，那种鞋每双值多少钱，那种钢每吨以多少钱来交易，如此等等；由此给出的信号引导了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决定。生产者知道了一种商品的平均售价，才能决定要生产多少，然后以买入价格来购买一定量的商品，以便进行商品生产。家庭知道了一种商品的价格，再联系到他们的欲求和需要以及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就能决定要购买多少。这些交易——它们对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日常生活极为根本——构成了经济活动的“表面世界”或“现象形式”。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来不是去解释商品为什么是按照某种价格来交换的。

假如我们不加质疑地接受两个初步的假定，那么由价格体系表达的交换价值就相当容易理解了。第一，有一种商品具有不偏不倚的价值单位（numéraire）的职能——货币的职能——因而其他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表达为价格。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生产的世界中——所有物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才被生产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假

定近乎“自然”——它们之所以仿佛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困难，不过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状况。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展到对价格体系的分析了。我们看到，商品是按照相对价格来交换的，而价格是随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变动的。价格体系分明提供了一种高度精巧的分散化的机制，可以协调无数不同经济主体的各种活动。供给和需求的规律看上去足以解释相对价格。

马克思也承认供给和需求对于市场均衡的重要性，却强烈反对供给和需求可以充分地告诉我们关于商品均衡价格的一切。

> 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14]（《资本论》第3卷，第189页）①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断言，我们必须查看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我们将在第3章最终澄清这个问题。但他论证的一大关键就在于他对货币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论述中把交换价值当成一种

① 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追随了李嘉图。李嘉图把供给和需求视为一种重要的均衡机制，却与马克思一样并不把它视为一种足够有力的对世界的认知，从而不认为它可以构成价值理论的基础。他给马尔萨斯写信说：“你说价值是由需求和供给所调节的，但我认为这是空话。”（转引自米克，1977，第158页）供给和需求处于新古典主义价值理论和边际主义价值理论的核心，但是斯拉法对后者的批判（1960）至少已经把一部分当代的经济理论推回到了马克思和李嘉图——他们至少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所提供的基础。米克（1977，第10章）对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讨论。

仿佛很简单的东西，以便对价值理论做出最初的陈述。但之后他立刻回到了交换的问题，并表明它不仅的确是成问题的，而且通过它与价值的关系来研究它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他的大致思路是说明倘若不分析“货币”的本质——货币让交换价值得以毫不含糊地表达为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无法得到理解。他特别质疑了一种观点——任何商品都可以成为不偏不倚的价值单位（*num*）——并试图反过来证明货币包含了根本的矛盾。

他断定，我们的基本任务“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15]（《资本论》第1卷，第92页）。货币形式是一种社会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16]（《大纲》，第239页）。货币不是任意确立的，也不是单纯由习俗确立的。货币商品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一种特定的社会过程——参与到交换行为当中——才产生的，我们必须理解这种社会过程，才能洞察价格体系的内在逻辑。①

11 马克思将简单的商品形式当作货币形式的“胚胎”[17]。对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分析表明，商品可以取得他所说的“等价”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一个共同体在衡量它所购入的物品

① 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非常少，间隔也很长。罗斯多尔斯基（1977）出色地讨论了马克思如何得出了他最终对货币的认知。德布伦霍夫的《马克思论货币》（*Marx on Money*）（1976）也很有用，但正如她最后的自我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她漏掉了几个要点，但在后来大体上很出色的著作中（1976b 和 1978），她也试图把那些要点包含进去。哈里斯（1976；1979）和巴雷尔（Barrère）（1977）也汇集了一些有趣的材料。然而令人苦恼的是，对马克思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经常把货币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推到一边，而不是把它当作整个分析的核心。唯一的例外是曼德尔（Mandel）（1968），他令人赞赏地把货币和信用整合到了他的文本中。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兴起的一些专门研究——它们认为在讨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时，可以脱离马克思在其他方面的理论——也包含了内在的危险。我希望在第9章和第10章可以避开这个陷阱。

的价值时，如果参照的是它所卖出的某一种物品的价值，那么后者就具有等价形式的职能。在初始状态中，每个共同体或讨价还价的主体都拥有可以用作等价形式的商品。随着交换的扩大，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或一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种基本的货币商品，如黄金。于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都可以通过这种货币商品来表达了。“价值”由此取得了一种清晰可见的、独特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尺度。关于交换价值的许多不同的（主观的、往往是偶然的）规定转变成了一种标准的货币尺度，这是由交换关系的扩大所造成的——随着这种扩大，为了交换而生产物品最终成了一种“有规则的社会过程”[18]。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总的商品交换体系不可能脱离货币，因为货币为它提供了方便。因此，交换的增长和货币商品的出现必定是如影随形的。

商品一旦披上了“货币的外衣”，就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了。对它的特殊性质的分析可以肯定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货币的谜就是商品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9]（《资本论》第1卷，第93页）。

货币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并且反映了生产它的劳动过程的具体社会条件和物理条件。货币商品的这些具体生产条件构成了一条准绳，借此可以衡量其他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这个立场来看，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它的交换价值想必也应当反映出这一点。货币的使用价值则在于它为其他一切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方便。从这个立场来看，它又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然而，在使交换变得润滑的过程中，货币又取得了一种交换价值，它的形式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20]（《资本论》

第 1 卷，第 90 页）。于是，货币与它要买的东西就是相抵的。结果是：货币商品取得了两重交换价值——其一是由它自身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这是它“固有的”交换价值），其二是由它要买的东西所决定的（这是它所“反映”的价值）。

马克思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重性，是因为交换价值虽然最初被看作一种内化到了一切商品当中的属性，现在却被一种外在于商品本身，而且与商品本身完全分离的测量杆所代表了（《大纲》，第 145 页）。如何代表并衡量价值的问题由此就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解决方案也必须付出代价：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被内化到了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当中。简言之，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21]（《大纲》，第 200 页）。这一切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后果。

12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如果在社会中按照给定的速度流通，那么流通的总量必须充足，才能为一定量的商品按照适当的价格来交换提供方便。我们可以将对货币的需求记作 $P \cdot Q$（其中 P 是价格的矢量，而 Q 是商品各自的流通量），并将货币的供给记作 $M \cdot V$（其中 M 是可用的货币量，而 V 是流通速度）。均衡的情况就是 $MV=PQ$（《资本论》第 1 卷，第 123 页）。倘若商品的流通量突然增加了，而 M 和 V 都保持不变，那么货币商品的反映价值就会上升，而且可能远远高于它的固有价值。货币供给的增加或流通速度的增加可以纠正这种情况。但是商品交换的体量每天都会持续不断地波动，而一个特定的商品被挑选为货币商品所需的条件（稀缺性等）却妨碍了人们即时调整它的供给。为了走出这个困境，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创立储备基金或货币贮藏，一旦商品交换的体量有可能发生重大波动，就可以灵活地使用这些贮藏。另一种可

能的办法是利用某种信用体系，在一段给定的期限结束时（一天、一个月或一年）用货币商品来支付账户的余额。这样一来，对货币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而且商品交换的体量即使日复一日地波动，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这立刻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货币的某些额外职能上面，即作为价值的储存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两者的前提都是货币能够作为社会权力的一种独立形式来运行，而这种能力的起源又在于货币是价值本身的社会表达。马克思指出，“个人……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2]（《大纲》，第 157 页）。这种社会权力“是绝对可以让渡的”[23]，因而可以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24]（《资本论》第 1 卷，第 110、132 页）。对那种社会权力的贪欲会导致强占、偷窃、贮藏、积累——可能会导致一切。马克思花了大量篇幅——特别是在《大纲》中（尤其参见第 145—172 页）——来描述货币化如何通过社会权力关系扰乱了传统社会。

但在《资本论》中，他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只有将货币用作价值的储存手段或支付手段，才能让内化在货币当中的两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保持一致，这就要求货币这种社会权力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来使用。倘若贮藏对于交换过程的均衡是必要的（《资本论》第 1 卷，第 134 页），那就意味着贮藏的货币要按照某些合理的原则来使用——当商品生产减少时，货币就必须退出流通，而当商品生产复苏时，货币就必须重新投入流通。倘若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交换过程的所有主体就同时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而这又意味着债务合同的签订与债务的偿还都必须服从某些一贯的原则。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注意力都聚集在一种特定的流通形式上面。我们理解了货币的流通——它成了一个自在的目的——为什么会成为“由

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25]（《资本论》第1卷，第136页）。

马克思把流通的商品形式（商品—货币—商品，简写为*C–M–C*）界定为使用价值的交换（例如用鞋子的使用价值来交换面包的使用价值），这种交换在本质上取决于所交换的物品的质。货币在这里的职能是一种方便的中介。现在我们遇到了另一种流通形式*M–C–M*，它的起点和终点恰好是同一种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不过是让货币重复出现，这只可能有一种动机：在流通的终点所得到的货币要多于在起点所拥有的货币。一种量的关系取代了质的交换。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即利润。以这种方式流通的货币就叫作资本。

我们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般商品交换的条件使流通的资本主义形式具有了社会必要性。这一点有不可胜数的社会后果。为了让交换关系保持稳定，一种社会空间被创造出来了，资本家的经营在这种空间中具有了必要性。但是

> 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通过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26]（《资本论》第1卷，第152—153页）

我们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利润从何而来？但若要向这个问题发起挑战，就只有价值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手段。

（3）价值理论

我们现在要考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所蕴含的价值理论。与使用价值和价格不同，这里的分析并没有不言而喻的出发点。我们要么从一些关于价值本质的先天假定开始，要么通过唯物地考察社会的运行方式来寻找一种客观的理论。马克思采取了后一条道路。既然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现象世界是由众多使用价值的价格所支配的，这就为建立一种初始版本的价值理论提供了材料。一旦这种初始版本就位了，我们就可以考察价值、价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此来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资本论》开篇的论述简单得异乎寻常。马克思把商品界定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体现，并立刻撇开了前者，直接进入了对交换价值的分析。在交换中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等同起来（它们本身有质的差别）意味着两种使用价值具有共同之处。一切商品共同拥有的唯一属性就是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7]（《资本论》第1卷，第38页）

这番论述与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28]中所做的论述几乎一样。马克思仿佛在这个阶段完全追随了李嘉图，认为价值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合适的价值标准。[①] 唯一的修改

① 关于马克思如何用李嘉图的论述打造了他自己在《资本论》中的概念，伊藤（Itoh）（1976）做了出色的研究，皮林的文章（1972）也相当有趣。亦见艾尔森（1979）。

是他引入了“具体的有用劳动”和“抽象的人类劳动”之间的差别，前者被界定为“有目的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人类劳动”，后者则“形成商品价值”[29]（《资本论》第1卷，第41—46页）。但是马克思的论点现在显得纯粹是同义反复——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的那一面！

马克思分析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差别，由此打破了同义反复。一切劳动都是具体的，因为它关系到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但是市场交换倾向于抹掉个体的差别，包括生产条件的差别和从事劳动的人的差别。假如我按照商品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来付钱，那么劳动者越是懒惰，我应该付的钱就越多。但是一般而言，我支付的是现行的市场价格。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商品在交换中获得的可通约性使得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具有了同样的可通约性。如果制作一双鞋平均要花费一天，体现在一双鞋中的抽象劳动就是一天，不论个别劳动者花费了两个小时还是五十个小时。因此，抽象劳动被界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0]（《资本论》第1卷，第39页）。

马克思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这种理论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标准——插入“社会必要”这个限定。这难以让马克思的版本强大到足以支撑随后的所有分析，而且看起来也不够深刻，没有理由认为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也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命题。除非我们追问：“社会必要”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社会必要性的谈论应该让我们警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他对资本主义的解剖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马克思到最后会向我们表明——他的话语充满了一种深切的关怀，即为资本主义之下的自由与必然划分边界——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从看似无穷多样的具体劳动活动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提炼

只有在非常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才能最终完成。我们会发现，只有在一种特定的人类劳动——雇佣劳动——变得普遍之后，抽象劳动才能成为价值尺度。

这立刻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理论）区别开来了。马克思把一种非历史的、普遍的陈述转变成了一种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运行的价值理论。同时，价值理论也超出了单纯为价值界定标准的问题——这种标准只是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格。价值理论现在反映并体现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它们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简言之，价值被当成了一种社会关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武断地把这种概念作为一种先天的构造丢给我们。毋宁说他试图一步步向我们证明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价值概念，并证明他所说的价值规律的确作为一种指导力量运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对这一点的证明肯定必须位于他的分析的末尾，而不是开头。①

马克思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对“社会必要”的解释。他告诉我们，它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1]。倘若不回过头去分析使用价值，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解释。第一，劳动生产率是从纯粹物质的角度来考察的：它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来确定的[32]（《资本论》第1卷，第40页）。第二，劳动若不创造社会的使用价值——对他人而言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创造价值。马克思在这个阶段并没有阐述“社会

① 后面第35页（边码）的附录将考察这个观点与对价值理论的其他解释之间的差别。

的使用价值”是什么意思。他仅仅断定，价值若要保持为价值，就必须在生产中被创造出来，并通过交换和消费来得到实现。这里只是简要地返回了使用价值的领域，让我们预先体验一下——后面还会返回多次。

但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决定更加仔细地聚焦于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他考察了价值通过交换所得到的物质形式，由此揭示了如果价值实体——抽象的人类劳动——要调节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价值就必须以某种物质性的方式被代表。我们很快就看到了结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33]（《资本论》第1卷，第94页）

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再次提到了必然性。我们只要回过头去把这一点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念联系起来，就能得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抽象劳动若要与具体劳动相分离、从具体劳动中被提炼出来，货币的存在就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交换关系的增长有什么后果，就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增长依赖于货币形式，同时也产生了货币形式。但它还造成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分：

>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他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

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34]（《资本论》第 1 卷，第 73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迅速地从一扇窗户移动到另一扇，由此带领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交换的增长、货币形式的兴起与作为价值尺度的抽象劳动的出现这三者的相互联系。但我们对这些相互关系的透视也足以让我们看到，当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向我们显现时，这种显现的方式既有可能揭示它们的社会意义，也有可能掩盖这些意义。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把握了这个观点。

交换的延伸使得生产者进入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他们是通过他们所交换的产品才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直接作为社会存在者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被表达为物的关系。另一方面，物本身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的，而价值是通过抽象劳动来衡量的。抽象劳动则通过一种特定的社会过程才成了价值尺度。在“商品拜物教”所描述的状态中，“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5]（《资本论》第 1 卷，第 73 页）。

马克思在考察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出现之后，立刻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这个一般原则，这并非偶然。[①] 他在这个地

① 鲁宾（1972）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这个主题有一些让人着迷的评论。

方的分析是想要用“拜物教”的一般原则来解释价值及其货币表达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可疑的性质：

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6]（《资本论》第 1 卷，第 75—76 页）

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非常现实的，可是它将我们的社会关系隐藏到了一种单纯的物的背后——这种物就是货币形式本身。比如说，交换行为没有告诉我们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并使我们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处于无知的状态，因为社会关系是由市场体系来中介的。我们只会对众多使用价值的价格做出反应。但这还表明，我们在交换东西时“预设了价值的存在……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货币的存在——价值形式的存在——掩盖了价值本身的社会意义。“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37]（《资本论》第 1 卷，第 74 页）

这里隐含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我们现在要加以考察。如
18 果价格体系使价值得以形成，同时又将价值的社会基础隐藏在视野之外，那么相对价格的数额就未必对应于相对价值的数额。马克思认为，这两个数额的相互偏离“并不是……缺点”，因为这些偏离“很好地让价格形式适应了”我们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似乎是以相互抵消的盲目的无规则性为特征的[38]（《资本论》第 1 卷，第 102 页）。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是起伏不定的——这是由无数生产者的自发决定所造成的——而价格体系可以顺应这种起伏，原因恰好在于价格的波动是自由的，严格的价值尺度则不然。价值最终表达了交换比例的均衡

点，这时供给与需求都已经在市场上达到了均衡。价格的灵活性让这种均衡过程得以发生，因而对于价值的界定至关重要。

然而更麻烦的是，“货币形式……还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至于“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一些对象尽管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如土地、良知、荣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39]（《资本论》第 1 卷，第 102 页）。因此，由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同“商品形式”区别开来，后者有价格，却没有价值。在《资本论》第 3 卷之前，马克思都没有严肃地谈论这个话题。我们到那时才会发现，拜物教也可以依附于租金的范畴（租金使土地具有了价格，仿佛货币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和利息的范畴（利息使货币本身具有了价格）。眼下我们也得将这些棘手的问题放在一边。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鼓励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价值的社会意义。在他关于这个主题最早的一个说法中，马克思把价值视为“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40]［《全集》（与恩格斯合著）第 1 卷，第 229 页］。马克思在整部《资本论》中远远不会这么生硬，但这个维度在他的论述中仍然极为重要。

商品交换的前提是私人所有者有权利自由地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司法关系只是“反映着实际的经济关系”，即交换[41]（《资本论》第 1 卷，第 84 页）。倘若在确立交换比例时要准确地反映社会的需要，生产者就必须将“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42]。这意味着“司法个体”（juridical individuals）［人格体（person）、公司等等］[43]必须能够在交换时平等地看待对方，把对方看作商品唯一的、排他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可以自由地从任何人手中购买东西，也可以将东西卖给任何人，只要他乐意就行。这

样一种状况若要存在，就不仅要求交换具有坚固的法律基础，而且需要有维护私有财产权并执行契约的权力。这种权力当然存在于“国家”当中。为了确立价值，某种形式的国家是一个必要条件。

私有财产权和契约的执行越是有保证，生产就越是成为“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或群体的劳动”，而且这些生产者通过交换他们的产品表达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44]（《资本论》第1卷，第72—73页）。价格体系——它同样需要国家的调节，否则就不能保证流通的货币的品质（见后面第10章）——让无数个人的自发活动更加容易协调了，因而生产获得了“社会的比例尺度”[45]（《资本论》第1卷，第75页）。在这些状况下，我们就可以研究“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采取了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46]（《资本论》第1卷，第92—93页）。

这是一个初步的模型，涉及市场社会及其所有政治的和法律的圈套；它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相当盛行，而且正如麦克弗森（MacPherson）教授极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它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洛克。[①] 马克思显然主张价值规律的运行依赖于这些基本的社会条件的存在。进一步讲，他还认为“个性”“平等”“私有财产”和“自由”的观念在市场交换的语境下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含义——这些含义不能与诸如自由、

① 我并不想借此暗示我完全赞同麦克弗森（1962），因为他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忽视了家庭的父权组织等许多问题，同时也略过了许多现实的复杂情况——见特莱布（Tribe）（1978）和麦克法兰（Macfarlane）（1978）。马克思本人在《大纲》中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这些主题（第157—165页）。

个性、平等这些更为一般的意识形态混淆起来。一旦这些高度具体的含义在资产阶级的宪政观念中普遍化了，我们就会在思想和实践中制造混淆。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平等的观念，它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提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马克思引用了这条原则并表示了赞同[47]。这并不是说所有人在一切方面都被认为是平等的，或者应该被认为是平等的。这只是说，我们若要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用一个使用价值来交换另一个使用价值，就必定会认为两者至少具有同等的价值。或者从货币的角度讲，一美元就购买力而言与另一美元是相等的，不论它在谁的口袋里。价格体系运行的全部原理都立足于一条原则：“商品的流通过程……要求等价物的交换。”[48]（《资本论》第 1 卷，第 160 页）因此，对价值的界定就立足于这种局限的、相当具体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人类劳动的各种具体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各种使用价值都在市场交换的进程中被还原成了同一个标准。它们可以进入一种等价关系。但我们一旦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平等观念，就可以用它作为杠杆，将整个关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更有内涵的话语层面。让我们看一下马克思是怎么做的。

20

（4）剩余价值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提出一种资本的概念，其中整合了我们所理解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应该被界定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这种过程的物质表现是作为一种转化而存在的：先从货币到商品，再回到加上了利润的货币，即 $M–C–(M+\Delta M)$。但我们既然已经把货币界定为价值的物质代表，就可以说资本又是一种价值扩

大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作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流通的进程中，资本必须在不同的环节分别采取货币形式（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使用价值）：

但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

然而，我们不应当将我们对这种“价值的自行扩大”过程的理解同价值的物质表达分割开来。出于这个原因，

价值……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它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49]（《资本论》第 1 卷，第 153—155 页）

对资本的这种界定会产生一些内容广泛的影响。首先，它意味着在社会中运行的资本并不等于货币的总存量，也不等于使用价值的总存量（我们可以将后者界定为社会的总财富）。放在我口袋里的货币倘若是购买我赖以为生的商品所需的一种手段，就没有被用作资本。我居住的房屋的使用价值或者我在花园里挖土所用的铲子的使用价值也没有被用作资本。因此，社会中有许多事情并不直接与资本流通相关，所以我们应该抵制一种诱惑：将所有东西都还原成马克思的这些简单范畴。可见，如果货币的总存量有一部分卷入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流通过程，这个部分就成了货币资本；如果社会的总财富有一

部分卷入了这种流通过程，这个部分就成了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由此可见，只要以赚钱——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来转变货币和使用价值，并把它们投入流通，就可以形成资本。

其次，用“过程”来界定资本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资本家”界定为一种经济主体，他把货币和使用价值投入流通，为的是产生更多的货币。人们未必会享受这个角色，未必会把它人格化并把这样做的理由内化到自己的心理当中。资本家可以是善良的人或邪恶的人。但我们不用关注这一点：我们可以仅仅将“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当作“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50]（《资本论》第1卷，第85页）。就眼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专注于角色，而不是人本身。这让我们得以撇开人的动机的多样性，并在社会必要性的层面进行思考——要把握这个层面，就要研究经济主体的角色。

最后，这一点同样很重要：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证明了资本主义流通形式与价值的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而不是巧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所以我们应该总结一下它的依据。

我们已经看到，交换的延伸和货币的兴起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还看到，若要解决内化在货币形式当中的矛盾（即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必须有作为储备基金的货币，它可以按照商品的交换状况的需要来投入流通或退出流通。货币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开始流通。由于 $M–C–M$ 并没有使处于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商品的本质发生质的变化，所以这种流通形式的唯一系统性动机就是要求量的变化；这意味着流通过程具有如下形式：

$$M–C–(M+\Delta M)$$

马克思向我们证明的是，即使人的多种动机（对黄金的渴

求、对社会权力的贪婪和对统治的欲望）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流通形式也会出现，以便回应货币所受到的相互矛盾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交换的扩大和延伸。但是交换也会将价值确立为交换比例的调节器。我们由此就能推导出一种联系：资本主义流通形式和在交换中作为调节器的价值是一同兴起的，因为两者都是交换的延伸和扩大的产物。

但在马克思的书里，他极少解决矛盾，却几乎总是转移矛盾。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立足于一种不平等，因为资本家在过程的终点比在起点拥有了更多的货币（价值）。但是价值是由交换过程确立的，这种过程立足于等价原则。这造成了一个困境。资本家如何能通过一种以等价为前提
22 的交换过程来实现一种不平等，即 ΔM？简言之，利润在公平交换的条件下是从何而来的？

马克思认为，我们无论怎么尝试，都不可能在交换领域中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倘若违背等价原则（通过欺骗、强行交换、抢劫等等），我们就只能让一个人的利润等于另一个人的损失。这可能会导致货币和生产资料积聚在少数人手中，但若一个社会中的无数生产者都理应追求并获取“公平的”利润，却不曾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吞食，那么上述办法就不能为这个社会提供稳定的基础。

因此，我们若要寻找答案，就只能仔细地审视生产领域。我们必须不再把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当作我们观看世界的“窗户”，必须转而考察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从《资本论》第 1 卷第 6 章一直到第 3 卷，马克思大体上都假定——只有少数重要的例外——所有商品都是按照价值来交易的，价格与价值并没有区别。于是，利润的问题就与价值扩大的问题等同起来了。在解答这个问题时，也必须完全不诉诸价格与价值相互

偏离的观点。从这扇关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新“窗户”出发，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路会通向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让我们看一下这番论述是如何展开的。

生产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的语境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家控制了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对最终产品的处置权。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来出售，以便换取工资。简言之，我们的前提是生产发生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定的阶级关系的语境下。

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力具有两重性：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则，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由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设定的——这种再生产要依照一定的生活水平，并让劳动者有一定的能力参与到工作过程当中。劳动者舍弃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便换取它的交换价值。

资本家一旦购买了劳动力，就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运用它。由于资本家购买了一定长度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持有劳动力的使用权，所以他们可以组织生产过程（生产的强度、技术等等），以便确保工人在这段期限内所生产的价值比工人拿到的价值更多。对资本家而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在于它可以投入工作、生产商品，而且在于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它所生产的价值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更多——简言之，它可以生产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分析立足于一个观点：“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51]（《资本论》第 1 卷，第 193 页）劳动者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如果与他们自己的再生产所需的价值相比有所剩余，这个剩余就可以衡量劳

动在生产中所受的剥削。然而我们要注意，即使生产了剩余价值，交换中的等价规则也完全没有被打破。因此，交换领域中没有剥削。

这样来解答利润的起源既简单又优雅。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好像晴天霹雳”一样击中了要害[52]（《资本论》第2卷，第14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得出这个解答，因为它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与在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易的劳动力。因此，劳动与劳动力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至关重要的差别。马克思断定：“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倘若不这样想，就只能以为我们仿佛可以衡量价值本身的价值。不仅如此，“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资本家）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么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53]（《资本论》第1卷，第537—541页）。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售的不是劳动（价值实体），而是劳动力——在商品形式中实现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能力。

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将马克思引向了一个相当关键的结论——这个结论让他得以纠正并转化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如果劳动与劳动力是无法区分的（正如在李嘉图的理论中那样），这个社会中的价值规律就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水平上运行。价值规律“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54]（《资本论》第1卷，第536页）。这也就预设了与雇佣劳动相关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55]（《大纲》，第704页）。

这里的意思相当简单：价值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密不可分

的。其中一个若要充分发展，另一个就必须兴盛。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在某些具体的生产关系当中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这些生产关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理解雇佣劳动的起源。

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和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56]（《资本论》第1卷，第169页）

现在，马克思已经把一个复杂论述的所有逻辑线索拉到一起了。他的起点——这也是我们的起点——是一种简单的商品概念，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体现。他从交换的扩大推导出了货币的必要性——货币是价值的表达——并证明了资本主义流通形式必然与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规定的交换比例相关。他现在向我们表明，若要解决由此产生的矛盾——交换所预设的等价关系与利润所隐含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识别出一种商品，它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它能够生产出的价值比它本身拥有的价值更多。这样一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只要运用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就能解决上述矛盾。但这就意味着存在雇佣劳动。剩下的任务不外是解释雇佣劳动本身的起源。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项任务。

2. 阶级关系和积累的资本主义原则

马克思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语境下考察了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条根本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植根于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价值理论是这种阶级关系的表达。这条结论促使马克思离开了李嘉图，并构成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核心。但是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是万分谨慎地把阶级概念放到《资本论》的分析中去的。他并没有直接宣告“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类信仰，我们也不会看到他把“阶级”作为某种解围神（*deus ex machina*）引进来，仿佛它可以解释一切，却不需要被解释。阶级的概念是随着他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考察而演化的。一旦得出了一个初始的界定，马克思就可以无可估量地拓宽他的研究范围，把关于阶级关系的一些特定的观点包含进来，并自由地在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和阶级关系之间转移，以便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由此，他才得以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紧身囚衣。

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角色。追求利润的人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舍弃了剩余劳动，却滋养了利润的人则扮演了劳动者的角色。在
25 整部《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把资本家当作“人格化的资本”，并把劳动者仅仅当作一种商品的承担者，即劳动力的承担者[57]（《资本论》第 1 卷，第 85 页）。简言之，他们都被当成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有时会阐述这些不同的角色在社会、道德、心理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有时还会脱离用两个阶级来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观点，这都只是由于他相信这样的阐述和脱离对于分析是必要的。

然而，对阶级概念的这种形式化的、相当严谨的讨论却与一些更为丰富、更为混乱的含义并肩存在，后者来源于历史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注释者都喜欢区分两种阶级概念，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①] 这个区分是有用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式化的分析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的严格逻辑，剥掉它身上的所有复杂特征。这里所用的概念仅仅预设了对于这项任务具有严格必要

① “生产方式”这个术语到处散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态”则不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在阿尔都塞（Althusser）（1969）、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Balibar）（1970）、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等人的著作中成了一个热门的辩题——他们所属的传统被称作“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随后的辩论从不必要的晦涩和艰难（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走向了荒谬［辛迪斯（Hindess）与赫斯特（Hirst）（1975）］并在辛迪斯与赫斯特的著作（1976）和卡特勒（Cutler）、辛迪斯、赫斯特与侯赛因（Hussain）的著作（1978）中达到了自行毁灭的最低谷；亦见哈里斯对后者的评论（1978）。奥尔曼（Ollman）（1971）、戈德利耶（Godelier）（1972）、瑟伯恩（Therborn）（1976）、拉克劳（Laclau）（1977）和最近的科恩（Cohen）（1978）等作者为这场辩论注入了一点理智，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见解。E.P. 汤普森（1978）被这场辩论很大一部分所具有的非历史的和愚昧的性质所激怒——这也是有道理的——并把它们全部撇在一边，认为它们都是糟糕的、高傲的理论胡说；但在这个过程中，安德森（Anderson）（1980）正确地指责他丢掉了金块，尽管安德森也承认金块外面是一大堆虚浮的糟粕。

马克思本人对“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有三种相当不同的用法。例如，他讲过“棉花的生产方式”，意思是指在生产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时所使用的实际的方法和工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经常是指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特有的形式（当然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假定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马克思在整部《资本论》中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方式（例如第1卷，第510—511页[58]）。这个概念抽象地表示了一组界定得较为狭窄的关系，这种狭窄性也是有理由的［后面第4章讨论了生产力（转化自然的能力）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并由此界定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是马克思有时——特别是在《大纲》等预备性的作品中——也以整体主义的方式、以做比较为目的来使用这个概念。于是，这个概念指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再加上制度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安排、政治组织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特殊形式。按照这条思路，我们就可以比较“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亚细亚的”和其他的生产方式了。这种无所不包，却又高度抽象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有趣的，但也制造了最大的困难。大多数辩论都是由于这个术语的这种用法而爆发的。（转下页）

性的东西。但是社会形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建立的一个特定的社会——要复杂得多。在讨论实际的历史事件时，马克思就会使用更加宽泛的、数量更多的、更加灵活的阶级范畴。例如我们在《资本论》的历史学段落中发现，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被当成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一个要素，而资产阶级（bourgoisie）指的又是另一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发现——这通常被看作马克思生动的历史分析的典范——为了分析法国在1848—1851年的事件，马克思讨论了流氓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成产业家和金融家两个派系的资本家阶级、土地贵族以及农民阶级。这一切大大远离了《资本论》大多数篇幅从两个

（接上页）

我将把“生产方式”的第三种用法当作一个初步的概念，我们还需要通过仔细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才能了解它的内容。有人正确地在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用法中觉察到了一些含混，而这证明了他本人的表述具有试探性，我们最好在追随他时考虑到这一点。阿尔都塞做法的问题是他认定可以通过某种严格的“理论性的实践”来达到一种完整的理论化。尽管他确实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但只有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之后——其中肯定必须包括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观念的充分含义才会变得明显。但我们必须在某处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手中的概念在一开始还有待充实。为了这个目的，我将主要诉诸第二种较为局限的生产方式概念，以便一步步走向一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为全面的理解。我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我们探求这个概念完整含义的方式之一。

“社会形态”的观念主要是用来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中多种多样的人类实践都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由支配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实践。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提出了两种思考社会形态的方式。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性的实践在社会中都是“相对自主的”。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度内，文化的、制度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许多变种在资本主义之下都很可能有存在的机会。第二，在实际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肯定会看到几种生产方式相互交织、相互“接合”（articulated），即使其中一种方式也许明显处于支配地位。过往生产方式的残留要素、未来生产方式的萌芽以及从某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中引进的要素都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被发现。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纯粹的特色，但为了理解它们，我们所要采用的分析框架会远远比任何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分析框架更为复杂（这里的生产方式是狭义的）。出于这个原因，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两个术语并举是非常有用的。

阶级出发所给出的简洁的分析。[①]

若要充分地解释阶级的概念，关键就在于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概念体系——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只要加以延伸，就成了理解价值本身的性质的关键。但这种联系是很难建立的，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例如在《资本论》的大多数篇幅中，马克思“在理论上把握着”雇佣劳动这个“事实”，当时的资本家则恰好以同样的方式“在实践中”接受了这个事实[59]（《资本论》第1卷，第169页）。但在这个理论事实背后潜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货币所有者究竟如何能找到、为什么能找到一名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没有“自然的”基础——它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才出现的。所以在《资本论》第1卷的末尾，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所讲的故事在细节上是有争议的，但它的基本观点很简单。[②]资本家阶级的兴起与无产阶级的形成是如影随形的。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61]（《资本论》第1卷，第271页），因为参与到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当中的人力求找到一种合适的生产方式，并在这个系统性的基

①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开始将资本家阶级拆分为独立的“派系”或“阶级”：商人资本家、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地主；他的依据是他们就资本流通而言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还简短地考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相互分离的后果以及支付给管理层的“监督工资”。可见，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阶级结构的理论应该是一种最终产物，应该在分析的末尾——在详细考察了价值规律如何运行之后——才浮出水面。

② 马克思所说的英国的“原始积累”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对马克思版本的“原始积累”的考察不能脱离关于封建主义如何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个论述。多布（1963）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仍然很值得推荐，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辩论的总体情况则可以在希尔顿（Hilton）（1976）那里看到。围绕在汤普森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60]周围的辩论也值得仔细研究。

础上产生利润。两个阶级陷入了共生的却又无可抗拒的对立。两者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可是它们之间又有深重的对抗。它们的协同发展采取了诸多中间形式，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是以不平均的方式前进的。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最终在社会形态中获得了霸权和支配地位，因为社会发展的整个结构和方向主要是随着它们的步调起舞的。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有理由把这样一种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关键的要点已经出现了。雇佣劳动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和这种关系所表达的价值理论都是历史的创造。

（1）资本家的阶级角色和积累的命令

28 让我们回想一下，交换领域的特性是个性、平等和自由。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交换领域中（包括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62]（《资本论》第1卷，第586页）。那么，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个性在交换领域中显得比阶级更为优先，这又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证明了在交换关系的外表下“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因为“交换价值……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63]（《大纲》，第248页）。这种强制出自一种需要：在为他人提供使用价值时，这种使用价值的价格是由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调节的。这种强制背后的机制就是竞争。

我们有必要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诉诸竞争原则的。[①]他认为，

① 完全竞争的假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起到的作用与在传统经济学中的作用非常不同。马克思用它证明了资本主义即使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完美方式来运行，仍然会导致把劳动力作为利润的来源加以剥削。

竞争可以解释为什么物品的售价是它们的价值，或者接近它们的价值，却不能揭示价值本身的性质；竞争也丝毫不能说明利润的起源。利润率的平均化可以通过竞争来解释，但是利润的来源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只有一处重要的例外——并不觉得有必要详细地分析竞争。

个别资本家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善意或恶意”，因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64]（《资本论》第 1 卷，第 270 页）。个人只要承担了资本家的角色，就会被迫把追求利润的动机内化为他们的主观存在的一部分。渴求、贪婪和守财奴的嗜好都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找到了表达的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这些性格特征上面的——正是竞争把它们强加给了不幸的参与者，不论他们是否情愿。

资本家还会受到另一些影响。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可以用自己占有的剩余来做什么。他们可以选择消费或再投资。这里就出现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65]（《资本论》第 1 卷，第 594 页）。在一个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世界上，进行再投资的资本家在把剩余作为收益来享受的资本家面前就会取得竞争优势。资本积累的热情驱走了享受的欲望。资本家并不是由于天性而戒绝享乐的：

> 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

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66]（《资本论》第 1 卷，第 592 页）

可见，在一切资本家的行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规则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67]（《资本论》第 1 卷，第 595 页）。这条规则是由竞争推动的，它的运行独立于资本家的个人意志。它是个人行为的共同印记，因而把自身印在了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成员身上，成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还将所有资本家结合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让累进的资本积累拥有更好的条件。

（2）资本家的积累对劳动者的后果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至少要按照社会的平均效率来使用劳动力。但是积累得较快的资本家倾向于把积累速度较慢的资本家逐出市场。这意味着个别资本家拥有一种无休止的动力：加大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使剥削水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以此来增加资本积累的速度。这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

例如，工作日的最大限度受到生理的和社会的约束，然而它们“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68]（《资本论》第 1 卷，第 232 页）。由于竞争或天性，资本家有可能试图延长工作日，以便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倘若资本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资本积累表示出必然的热情，劳动者显然就会受苦。战斗打响了：

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

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69]（《资本论》第 1 卷，第 234—235 页）①

我们到这里终于明白，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行得通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一个平等、自由和个性的世界——这是交换的舞台——掩盖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世界，而这种斗争在生产领域中同时影响了资本和劳动。

个别劳动者可以在无论什么契约条款之下（无论工作日有多长）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只要他们乐意就行——原则上是如此。但他们还必须在劳工市场上相互竞争。这一切意味着“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家的积累驱动面前“是无抵抗地屈服的”[70]。劳动者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反抗资本的劫掠[71]（《资本论》第 1 卷，第 299—302 页）。劳动者越是采取集体的抵抗形式，资本家就越是被迫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以便共同确保累进的资本积累所需的条件可以得到维护。

通过研究与工作日长度相关的阶级斗争，另一个要点也

①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这样的受阶级制约的社会中，力量是两种权利之间仅有的决定方式；这个观点促使他激烈地批判了蒲鲁东等人，后者试图诉诸某些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念，以此来打造一种社会性的公正。塔克尔（Tucker）（1970）关于这个话题的那一章是很出色的。

被揭示出来了。如果劳工没有阶级组织，资本家之间不受制约的竞争就有可能摧毁劳动大军，而这恰好是剩余价值本身的来源。资本家必须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并对他们自己的竞争程度加以限制。马克思将早期的英国工厂法案解释为试图“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已经“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72]（《资本论》第1卷，第239页）。可见，这类调节有别于——这个区别常常相当模糊——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要求合理工作日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所确立的调节。

资本家也可以通过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马克思识别出了两种形式。当生产“工资品”——劳动者需要的商品——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绝对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劳动者可以掌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量来衡量的——保持不变：只有交换比例（价格）和价值改变了。然而，工资品的系统性降价不是个别资本家力所能及的。他们需要某种阶级策略（针对基本商品的补贴、廉价食品和廉价住房的政策等等），这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才能转变成一种系统性地加快积累的手段，而不是零星出现的、不受控制的手段。

31

第二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处于个别资本家的掌握之内。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他们自己的私人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资本家只要运用更高级的生产工艺，使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为交易的价格是按照社会平均水平来设定的，而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具有转瞬即逝的倾向，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他生产者追赶上来或退出市场。但只要在生产率方面保持领先，个别资本家就可以加快自己的积累，超过

社会平均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73]（《资本论》第1卷，第320页）。

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会在后面回到这一点（见后面第4章）。眼下我们仅仅想要说明，当个别资本家试图通过协作的扩大、分工和机器体系的运用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者会受到哪些影响。

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和分工意味着把工作活动和劳动者集中到一处地方，并建立协作的手段和资本家专制权威的控制权。竞争会迫使工作活动越来越集中（多半直到规模经济完全走到尽头为止），也会迫使工作地点的权威结构和控制机制越来越紧迫。与这些如影随形的是等级组织和一些专业化的形式，它们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层，并创造了管理者和监督者这个社会阶层，后者——以资本的名义——统治了工作地点日复一日的运行。

机器体系的运用和工厂体系的降临对劳动者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对个人技能的要求出现了下降［这种过程现在被相当不优雅地描述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和“去资格化”（de-qualification）］——工匠成了工厂的操作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得到了强调，前者倾向于转变成一种“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74]。女性和儿童也可以更加方便地加入劳动大军了，因而整个家庭的劳动力代替了个人的劳动。劳动过程的强度增加了，工作的节奏变得更加严格、更加紧迫了。在这一切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都有一种新的、强大得多的调节劳动者能动性和生产率的办法——机器。劳动者必须服从机器的指令，而控制机器的是资本家或他的代表。

全部后果正是如此。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要求资本家在工

作地点、在工人阶级身上施加日常的暴力。这种暴力的强度是不受个别资本家控制的，特别是在竞争没有得到调节的情况下。对剩余价值不停息的搜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劳动力遭受了价值丧失和贬值，更不用说工人还丧失了尊严，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工作过程，无休止地遭到监督者的骚扰，而且无休止地由于必须服从机器的指令而遭到骚扰。作为个人，工人极少有抵抗的资格，尤其是因为生产率的上升一贯会让一定数量的工人获得“自由”，即进入失业的行列。工人若要发展出抵抗的力量，就必须借助某种阶级行动——不论是做出自发的暴力行为（破坏机器、焚烧和暴徒动乱不仅存在于较早的时期，至今也绝没有消失），还是创造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发动阶级斗争的组织（例如工会）。资本家想要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但这种强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战斗又一次开始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阵线也在若干问题的周围形成了：比如机器体系的应用、劳动过程的速度和强度、女性和儿童的就业、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在工作地点的权利。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证实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所不在的，而这种追求必然蕴含的暴力必定会在工人那里激起某种阶级性的回应。

（3）阶级、价值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矛盾

这里对阶级概念的解释还远远不够完整。我们还没有谈论一个“阶级”在给定的历史情境中具有何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建构；我们也还完全没有贸然谈论一些复杂的问题，即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自我的身份认同——阶级行动无可避免地要以这些为前提。我们仅仅提出了阶级概念的一个局限版本，但它足以带来一些反思和结论。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必须附带怎样的含义。资本家阶级必须再生产它自身，而且只有通过累进的资本积累才能做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同样必须在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相适应的条件下再生产它自身。最重要的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也必须被再生产出来。由于所有这些特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都具有社会必要性，所以它们都进入了价值的概念。因此，价值失去了单纯的技术的、物质的内涵，并逐渐被看作一种社会关系。我们已经洞察了商品交换的拜物教，并识别出了它的社会意义。这样一来，阶级的概念就恰好内嵌于价值的概念了。

但我们现在有资格更加明确地讨论价值规律的本质了。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怎样的。雇佣劳动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是历史的产物，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社会所特有的。我们描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目的是要揭示这样一种过渡是如何发生的。首先，货币形式的出现和交换的增长逐步瓦解了人身依附的纽带，把它们替换成了市场体系中非人身的依附。市场体系的成长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流通方式，它的出发点是追求利润。这种流通方式包含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它的前提是自由、平等和个性，而另一方面，利润本身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这个根本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诸多不稳定的形式，这时对利润的追求并不涉及对生产过程的掌控。银行家运用货币来掌控更多的货币，商人通过交换来寻求利润，土地投机商用租金和房地产来做交易，如此等等。不公平的交换、掠夺、抢劫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强制性做法可以暂时维持这些体系。但对生产本身的驾驭最终成了一种必要，否则就无法解决交换所预设的等同性与获取利润所要求的不

平等之间的根本矛盾。工业化的诸多阶段——比如种植园体系的尝试——尽管一开始处于弱势，却为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化开辟了道路，这种形式立足于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解决了交换的矛盾。但它是通过转移矛盾来做到这一点的。另一类完全不同的新矛盾出现了。

《资本论》的阶级分析是为了揭示这些新矛盾的结构而设计的，因为它们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推而广之，我们就能看到价值理论包含并内化了一些强有力的矛盾，它们构成了社会变革的根源。

让我们首先回想一下竞争如何把交换的平等、个性和自由转化成了一个胁迫和强制的世界，从而迫使所有个别资本家都
34 要为积累而积累，不论他们是否愿意。然而，平等、个性和自由的领域从来没有被完全废除。实际上它也无法被完全废除，因为交换仍旧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交换规律也仍然完好无损。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按照交换规律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只有在生产中，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才变得清晰了。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这造成了交换所预设的个性与组织生产所必需的阶级行动之间的矛盾。这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是因为生产与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中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有机地相互关联的。

马克思分析了与工作日的长度相关的斗争，我们从中可以生动地看到上述矛盾。我们发现，由于个别资本家全都是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的，而且被封锁在相互竞争的斗争中，所以他们加起来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与他们从整体来看的阶级利益相冲突。他们的个别行为可能会危害资本积累的基础。由于积累是资本家阶级再生产它自身的手段，所以他们可能危害他们自身再生产的基础。于是，他们被迫把自身建构为一

个阶级——往往会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并对他们自己的竞争加以限制。但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迫要干预交换过程——在这里就是劳工市场——从而要违背交换中的个性和自由的规则。

资本家阶级内部的个别行为与阶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来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预设的规律中得到解决。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资本主义积累形式的许多内在矛盾都植根于这个矛盾。它还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的和政治的两难，这些两难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都困扰着资本家阶级。他们一直在两种需要之间摇摆：既需要维护自由、平等和个性，又需要采取往往是镇压的、强制的阶级行动。剩余价值的生产之所以解决了资本主义流通方式中的矛盾，只是由于它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设定了一种新的矛盾——为了把积累的一般前提再生产出来，个别资本家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会出现矛盾。

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所预设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是按照正常的交换规则在市场上交换的。但我们看到，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不能真正放任劳动力市场不受约束地运行，双方也都会在某些时刻采取阶级行动。工人阶级必须力争不仅在生理方面，而且在社会、道德和文化方面维持并再生产它自身。资本家阶级则肯定必须 35
对工人阶级施加暴力，以便维持资本积累，同时还必须制止它自身的过分行为，并抵制工人阶级的一些使积累受到威胁的要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既是共生的，又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这也在资本主义积累形式中产生了一些内在矛盾，同时还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的许多进展。

只有到了《资本论》第 1 卷的最后几章，我们才能最终了解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做的转化。我们现在把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价值标准，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转化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创造了雇佣劳动，把它作为对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范畴。在走向这个根本性的结论的途中，马克思顺道积聚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的结构的有价值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通过所有权和国家对所有权的贯彻来表达的某些司法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提到了某些种类的自由、个性和平等的重要性。

因此，价值理论内化并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这些矛盾是通过阶级关系来表达的。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以及它们之间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都是具有社会必要性的要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并且构成了阶级斗争的根源，而资本和劳动的再生产都包含了个性与集体的阶级行动之间的矛盾。价值的概念一旦脱离了阶级斗争就无法得到理解。

李嘉图发表了劳动价值理论，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现在是他做梦也远远想不到的。不论它会将我们带到何处，我们都必须做好追随它的准备，因为我们已经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创造了一种极为有力的手段。

附录：价值理论

如何恰当地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辩题。相互争斗的思想流派在近些年里渐行渐远，如今它们的共同根基几乎已经见不到了。有人想要彻底丢弃价值的概念——这种声音越来越喧闹，由此显示了上述分裂有多么严重——因为它对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研究资本主义是一道“沉重的枷锁”（斯蒂德曼，1977；霍奇森，1980；莱文，1978；森

岛，1973；埃尔斯特，1978）。这种要求也许有一点道理，因为有一种解释把价值当作纯粹的会计概念，即一种由作为投入品的劳动来约束的固定不变的测量杆，而且它据说不仅可以解释商品的相对价格，还可以解释分配的份额、剥削等等。在如此宏大的目标面前，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很快就显得不足了。它很难毫不含糊地描述价值与相对价格的关系，而且固定资本和联合产品似乎也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问题（见第 8 章）。价值理论的批判者已经对传统的解释——例如由多布（1940）、斯威齐（1968）和米克（1973）所提出的解释——发动了一场相当成功的战役。

许多人在回应时重申，他们所说的是传统的立场向来具有的真正含义：价值是资本主义的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的统一表达，这两个方面一旦脱离对方就是没有意义的（斯威齐，1979）。因此，价值所包含的意义“超出了严格经济学的意义”——它所表达的“不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物质基础，而且是这种剥削的社会形式，后者与前者不可分离”（克拉克，1980，第 4 页）。尽管一些人——比如德赛（1979）——显然不觉得同时探讨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对价值的更加“激进的”解释实际上拒斥了定量的数学方法的严格性——运用这种数学方法的是一些“模型建筑师”[主要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例如森岛（1973）、罗默（1980）等等]——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了一种更加尖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时也奚落一下那些模型建筑师）和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更有生气的阐述。这里的危险是“价值”会退化成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观念。道德愤慨的代价是失去科学的连贯性。价值理论假如涵盖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的整个宏大范围”，就会受困于琼·罗宾逊（1977）的反对意见：“一个意味着一切的

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宣称自己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一种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述指责却让认同这个说法的人感到不安。

这一切呼唤人们更加仔细地重构马克思所说的话［按照鲁宾（1972）、罗斯多尔斯基（1977）等学者的传统］。虽然我们必须抛弃两种对价值的看法——把它看作会计工具或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数额——但是价值仍然可以被当作一种“有具体后果的实际现象”（皮林，1972；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2章）。它可以被解释为处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日常生活的拜物教背后的“社会现实”。所以，只要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解释和理解具体的后果，就可以借此评估它的有效性。价值的概念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错综复杂的动态，如阶级关系（包括生产和交换中的阶级关系）、技术变革、资本积累和所有与资本积累相关的特征，比如周期性的危机、失业等等——这是其他任何价值理论都做不到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对价值的传统解释——不论把它解释成何种在生产中通过劳动所获得的东西——就必须让位于一种对社会劳动更加复杂的理解，这种社会劳动是在生产与交换的统一体当中通过分配关系的中介来得到表达和协调的（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2章）。

37

但就马克思在他的思想方法中所完成的真正革命而言，即使上述观点——尽管它显然大大接近了马克思的意图——也没有很好地把握这场革命的意义。艾尔森最近汇集了一组有趣的论文（而且加入了她本人一篇洞察力超乎寻常的文章），它们从政治与严格的科学相统一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革命方面。我高度赞同这些论述，并将我本人的著作视为沿着艾尔森等人首先界定的思路来进行的一次尝试性探讨。

我本人的解释立足于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凸显了某些观点的支配地位。首先，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中出现的“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75]（《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6页）。因此，马克思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打造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甚至不是为社会产品的分配确立固定的规则。他更直接地关注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如何具有了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会这样？（参见艾尔森，1979，第123页）。对劳动的规训出自商品交换、货币关系、社会分工、生产的阶级关系、劳动在工作的内容和产品中的异化，以及“为积累而积累”的命令；这种规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真正成就和局限。人类劳动的能动性是与这种规训相反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76]，也是人的创造力的自由表达。这里需要理解一个悖论：作为过程的活劳动是如何把它的自由和易逝性对象化到一种固定性——包括物的固定性和物的交换比例的固定性——当中的？价值理论探讨的是对劳动加以规训的一连串力量和约束，仿佛它们是从外部施加的必然性。但是价值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归根到底生产并再生产了价值理论本身的支配地位所需的条件。这里的政治抱负是把作为“活的、造形的火”的劳动从资本主义铁的规训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劳动并不是，也绝不会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价值标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劳动确立为这种价值标准，马克思则嘲弄了他们（《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150页；第3册，第134页）。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处理不了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劳

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77]（《资本论》第1卷，第74—80页）马克思在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一封信中写道——《资本论》的批判者——

38

当时正让他满怀愤怒——“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就是“对现实关系所做的分析”，因此“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我们无法在研究的一开始就界定价值，而是必须在研究的进程中发现价值。马克思的目标是阐明在资本主义所支配的生产方式当中，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物、过程，以至于人为什么会具有价值。倘若反过来在一开始就界定价值，那就意味着“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马克思的结论是：科学就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它自身的”[78]［《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208—209页］。

要完整地讨论这个“如何”，就需要严格的理论思考。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无情地运用辩证的推理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方法的原则与数学的形式主义非常不同，却与后者一样棘手、一样严格。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同样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而我们不仅要极度诚实，还要毫不妥协地尊重科学的唯物主义形式所特有的“现实关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从而“材料的生命”就“在观念上反映出来”了[79]（《资本论》第1卷，第19页）。

《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我在本书中试图复制这种方法——是一步步阐明人类劳动的自由运用在资本主义之下所受的约束，是指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矛盾包含了另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矛盾的萌芽。对材料的反思处于无休止的转化过程中，正如这种反思所描述的主题一样。对上述“如何”的严格

描述不是教条主义的章程，它在关于人类历史的真正革命的、创造性的科学面前是开放的。这种科学也只是一种远远更为广阔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是为了对规训本身加以规训，“剥夺剥夺者”[80]，并由此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对价值形式的自觉重构。

译注

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4 页。
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2 页。
3.《全集》第 19 卷，1963 版，第 412 页。
4.《全集》第 46 卷，2003 年，第 17 页。
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8—50 页。
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08 页。
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7—48 页。
8.《全集》第 19 卷，1963 版，第 412—413 页。
9.《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293 页。
10.《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37 页。
1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4 页。
1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99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3.《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88 页。
1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11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12 页。
16.《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193 页。
1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7 页。
1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07 页。
1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1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09 页。
21.《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151 页。
22.《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106 页。
2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31 页。
2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56 页。
2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60 页。
2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78—179 页。
2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1 页。
28. 中译本见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62 版。
2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5—6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2 页。

3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2 页。
3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3 页。
3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14 页。
3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0—91 页。
3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0 页。
3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3 页。
3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1 页。
3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2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2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0.《全集》第 1 卷，1995 版，第 247 页。
4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0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07 页。
43. 此处的司法个体相当于包括了法人和自然人的、能够享有权利和义务并发起或接受诉讼的主体。人格体则相当于自然人（natural person）。
4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2 页。
4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1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74 页。
4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86 页。
4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80—181 页。
5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04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25 页。
52.《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19 页。
5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15—621 页。
5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14 页。
55.《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100 页。
5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97 页。
5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78 页。
58. 大致相当于中译本第 14 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开头。
5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97 页。
60. 中译本见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版。
6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12 页。
6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77 页。
63.《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202—203 页。
6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12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85 页。
6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83 页。
6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86 页。
6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69 页。
6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71—272 页。
7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46 页。

7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49 页。
7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76—277 页。
7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72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87 页。
75.《全集》第 33 卷，2004 版，第 19 页。
76.《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29 页。
7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91—98 页。
78.《文集》第 10 卷，2009 版，第 29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1—22 页。
8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74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第2章　生产与分配

39 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形式则有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等——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从来都不容易讲清楚。马克思想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纠正其中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非常成功。鉴于他的解释被论战的喧哗和怒火所包围，他要么实在是太成功了，要么就是在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马克思发现自己面前有两条基本的论述思路——虽然这里还有许多微妙之处——两者的起源都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相当令人困惑的价值理论。一方面，斯密似乎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工资、利润和租金也是这样来调节的。于是，在斯密那里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利润和租金可以被看作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另一方面，斯密又认为在“文明社会”中，工资、利润和租金“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1]。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要把租金、工资和利润各自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加在一起，就得到了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看出了这个矛盾，并坚定地赞同劳动价值理论，拒斥第二种解释。但是随后在价值理论（价值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与分配理论（分配是由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所决定的）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缺口。这实在令人苦恼，因为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确定三大社会阶级——土地所有者、股票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产品分配是按照什么规律来调节的。他甚至坦白说（引自斯拉法），他觉得“有时很沮丧，因为租金、工资和利润这些重大问题”与价值学说完全分离了，解释这些问题的依据成了“总生产在地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是按照何种比例来划分的”。[①] 这意味着分配是一种与支配生产的社会过程相独立的社会过程所导致的；这一点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明确地讲出来了，他画出了一条坚固的界线，一边是“财富的生产规律，这是真正的自然规律”，另一边则是“财富的分配方式，这要服从某些条件，因而取决于人的意志”。因此，穆勒的社会主义的焦点是分配问题，并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另一回事，而且是不会改变的。[②]

生产与分配的这种分离在当前的“新李嘉图主义”学说中有诸多回响。斯拉法证明了如果没有规定工资率，遍布于商品体系中的相对价值和价格就无法确定。由于劳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可以再生产的商品，所以对工资率这个变量的规定就必须外在于在商品生产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技术关系。由于工资率与利润率在斯拉法的体系中是反向变动的，所以只

① 见斯拉法为李嘉图（1970 版）写的导言。

② 多布（1973，第 125 页）。多布所做的综述总体上是很出色的。

要往前迈一小步，就能看到阶级斗争的根本性。斯拉法在最终决定利润相对于工资的份额时也诉诸阶级斗争，尽管这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但他所提倡的观点与马克思所陈述的观点相当不同，而且最近在“新李嘉图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发生了一场略显尖刻的辩论。①

我们要考察的第二条论述思路采纳了斯密的另一个观点，即租金、工资和利润同时是价值的来源和收益的来源。这最终导致了一种观念：租金、工资和利润在分配中的份额仅仅反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资本是价值的来源、土地是租金的来源，乃至劳动是工资的来源，那么这种观念相当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拜物教的叙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了他一贯所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他很少有更加严厉的时候。假如认为租金是以某种方式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那么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3]，是把现实描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3—540页；《资本论》第3卷，第48章）。

41 这种观点的“庸俗性”与其说源于单纯的错误，不如说源于对概念的刻意炮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辩护（马克思毫无

① 见斯拉法（1960）；斯蒂德曼（1977）是新李嘉图主义立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罗索恩（1980）则是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法恩与哈里斯（1979）为这场辩论做了很好的概述（在他们反击新李嘉图主义时），而多布（1975—1976）在去世前不久发出了一次有些不耐烦的呼吁，要求双方加强相互理解。

疑问从来不认为亚当·斯密有这种动机）。一旦将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独立的、仿佛自主的生产要素分离开来，对于统治阶级就会产生双重好处，因为这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5]，同时也完全压抑了剥削的概念，因为生产行为原则上可以被描述成单独的、独立的生产要素的和谐组合。

在这个方面，新古典主义框架几乎等同于马克思尖锐地指责过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论点的本质是：追求生产要素的竞争——这些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会迫使企业家所支付的数额与每种要素的边际单位（即所投入的最后一个单位）所创造的价值相等。只要给定了特定的技术状况和要素的相对供给（即要素的稀缺性），竞争就会确保每种要素“创造多少，就得到多少”，因而“不会出现对一种要素的剥削”。只要再迈出一小步，就可以推论出租金、工资、利息等等在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具有社会性的公正和公平。这在政治上意味着阶级斗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而且政府的干预应该主要局限于确保完全竞争处于主导地位。在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的词典中，这可以算作“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复仇。①

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和《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陈述了他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的总体观点。有些人固守一种经济观念——把“分配……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6]——他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人（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被描述为“荒诞无稽”[7]。马克思同样批判了喜

① 戈德斯（Gerdes）（1977）、贝内蒂（Benetti）（1976）和贝内蒂、贝托米厄（Berthomieu）与卡特利耶（Cartelier）（1975）持有强烈的反边际主义立场，米克（1977，第9章）则对边际主义持有一种不那么敌对的观点。

欢将所有东西都考虑“两次”[8]的人：把它们既当作生产的要素，又当作收入的来源。马克思所达到的一般结论“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些不同的“环节”之间的“相互影响”只有在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9]。这些都非常抽象，我们必须更加明确地考察其中的含义。

马克思强调说，分配形式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他提出，
42 “参与生产的特定方式决定了分配形式”，而且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0]（《资本论》第3卷，第882页）。从这个立场出发，分配仿佛是由生产的因素所决定的。

但是马克思随后就讨论了分配的另一些含义。他的目的是说明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是如何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他指出，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这个历史过程依赖于把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还依赖于从直接的生产者那里剥夺土地。他继续论证说，分配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产品和价值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还应该被当作生产工具、土地和个人（通常是由于出生）在各种阶级地位之间的分配。这些分配形式“赋予生产条件本身……以特殊的社会的质”[11]，因而对生产的考察不能撇开“包含在其中的……分配”，否则就会造成一种“空洞的抽象”[12]（《大纲》，第9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与分配才可以被看作“一个总体内部的差别”；如果不考察两者相互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就无法理解它们。

马克思又一次打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紧身囚衣，以便在阶级关系的语境下观察生产和分配。用于思考分配的整个框
102 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重新表述。他评论说：“在考察分配

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13]（《资本论》第3卷，第878页）。从之前对使用价值、价格、价值和阶级关系的探讨所得到的结果出发，我们只要仔细地向前推进，就会明白为什么这种“所谓的事实”实际上是对问题的“错误”认识。

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把资本界定为一种过程（前面第20—21页）。价值的扩大是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发生的，资本家在这里运用了一种具体的劳动——雇佣劳动。这也就预设了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的存在。只要让这种关系接受仔细的审视，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工资根本不能被当成一种“收益”或通常意义上的“分配的份额”。劳动者之所以在产品中取得了自己的份额，并不是由于他对产品价值的贡献。这桩交易的本质完全不是这样。劳动者放弃了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利，也放弃了对产品和包含在产品中的价值的权利，才换来了劳动力的价值。后者与劳动对产品价值的贡献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可见，劳动者获得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仅此而已。其他一切都成了整个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随后被分割为产业资本不同形式的利润、地租、货币资本的利息、商人资本的利润等等；分割的方式是由相当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与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派系（产业家、商人、食利者、货币资本家、地主等等）之间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相比，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只有聚焦于生产才能揭开分配的秘密；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关系只有在生产中才会变得非常清晰。

马克思每每称赞自己能够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

论并不涉及租金和利息这两个分配范畴——来解释利润的起源。但用剩余价值来说明利润的起源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利润起源于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而确定利润的数额，并找出把社会总产品的划分固定下来的规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划分包括工资、产业资本的利润、租金、利息等等。

应该首先说明的是，与理解社会关系相比，马克思对数额是不太关注的。但他的确在分配的某些量的方面顽强地努力过，《资本论》中无数数值计算的例子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正如为他做编辑的恩格斯所评论的那样，“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还不太熟练”[14]（《资本论》第2卷，第284页）。他的诸多数学错误让他的许多批判者，特别是一些实证主义者——他们的看法是：倘若一种社会关系不能被精确地量化，我们关于它就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得以在马克思对分配的实践方面和量的方面的讨论中敲开诸多漏洞，这些漏洞加在一起就可以被用来使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的起源本身名誉扫地。

于是，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周围出现了一场漫长而杂乱的论战。毋庸置疑，这场论战涉及了相当有分量、有力道的问题。然而，困难在于在这场论战的前沿——它在细节方面无可避免地是由计量问题和数学问题支配的——保持马克思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起源的关注。这项任务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难：我们要有精致的数学技巧才能评价人们提出的各种数学“证明”，它们要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探讨生产和分配时完全是前后矛盾的，或者并非如此。

在这个方面，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最近的著作十分有趣。他们指出，劳动价值理论直到最近为止都是单纯用一个联立方程的体系来表述的。森岛曾经用这样一条

思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遇到一系列问题时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并由此总结说它应该被抛弃——这个提议不出意外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引起了不和善的回应。在他们的新作中，森岛与凯特福雷斯则证明了如果用线性不等式组来表述价值理论，大多数问题就会消失。这使得他们收回了先前的提议，即“把价值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去掉”[①]。

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极为严格——马克思本人显然赞赏并追求这种严格性——但它的数学化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就其本身来对待数学证明：它们是以某些假定为基础的严格演绎，这些假定有可能把握了马克思所讨论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性质，也有可能并非如此。

然而在马克思的批判者看来，有两个领域的论战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基础本身。十分有趣的是，两者都没有涉及在诸多范畴中——包括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对社会的总价值进行分配的一般过程。第一个领域讨论的是异质的劳动如何能被还原为简单劳动——“还原问题”，这是通常的提法——这也关系到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在工人阶级的诸多个人之间分割的方式对价值理论的影响。第二个领域讨论的是马克思是如何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简言之即“转化问题”。这关系到剩余价值是以何种方式在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之间分配的。这两个领域一直都是激烈辩论的焦点，这些辩论远远没有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停顿，而是变得越来越有争议。

因此，接下来我不仅会阐发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的论述，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探讨这些实质性的论战。我

① 见森岛（1973）和森岛与凯特福雷斯（1978，特别是第19页）。

将试图专注于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在任何合适的地方，我都不会否认严格数学证明的重要性——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关怀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和当前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它们全都要面对自身内部的慢性问题——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这一点将得到彰显。实际上，为了使这种挑战名誉扫地所花费的种种苦心似乎表明马克思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严重的困难：在这个方面，过去的和当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发出了批评的炮火，而这向来有助于确定我们还需要怎么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体系。

1. 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劳动力的价值和工资率的决定过程

45 在给定的一年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可以被表达为 $C+V+S$，其中 C 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包括机器、原材料、能源的投入等等），V 是支付给劳动力的价值，S 则是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以年度为基准，我们可以将不变资本也当作劳动力，即用劳动力的耗费来代替被耗尽的生产资料所对应的价值。因此，不变资本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进入分配理论。可见，这种理论关注的是解释新创造的价值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比例在劳动者（V）与资本家（S）之间划分的。我们还必须考察 V 是如何在个别劳动者之间划分的，以及 S 是如何在个别资本家之间或在资产阶级的诸多派系之间（作为租金、利息、企业利润、税收等等）划分的。

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我们必须探讨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因为它们界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劳工的生活水平和工资率。这番探讨将有助于同时说明马克思对

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的起点是工资率（这是一个交换价值的概念）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一个经济体中的工资总额可以被看作就业的劳动者的数量（n）和平均工资率（w）的乘积。同样，总的可变资本可以用 $v \cdot n$ 来表示，其中 v 是一个叫作劳动力价值的量。我们立刻就能看到，工资总额和 V 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都会随着就业的总人数而变动，如果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话。虽然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但我们在眼下更感兴趣的是工资率和劳动力价值的关系。到底为什么要区分这两者？

马克思在这里的首要目的是揭露工资支付的社会意义。[①] 他认为，工资体系掩盖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别，后者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它的生产成本来规定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未能做出这个区分，因而通常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他们更加“庸俗的”同类则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可以用来掩盖利润的真正起源，即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宣称：“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一切痕迹”，因为“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工资的形式］为依据的”[15]（《资本论》第 1 卷，第 539—540 页）。我们已经证明，价值的概念旨在反映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劳动力价值的概念的主要用意则是把剥削的观念保持在分析的前沿。

① 马克思关于工资决定方式的理论还没有得到很多研究。曼德尔（Mandel）（1971）和罗斯多尔斯基（1977）都做过有用的描述，但至今最有趣的、近期的贡献来自罗索恩（1980，第 7 章），他讨论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陈述了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在李嘉图所提供的基础上历史性地演化出来的。

但是马克思究竟要用劳动力的价值来指什么？他认为，决定这种价值的是在“正常……状况”下维持并再生产从事劳动的个人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这组特定的商品随着职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能量消耗得越多，所需要的营养就越多），也会随着“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而变化。劳动力的价值还包括了抚养儿童的成本，而且由于掌握和保持专业技能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这也影响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和其他商品不同”，在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后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16]（《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参见《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2页）。

这个说法需要加以阐明，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它是一些争议性论述的主题。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劳动者通过一种*C–M–C*类型的流通形式竭力维持着他们各自的生存。他们把自己仅有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拿来做交易，才换来了货币工资。然后，他们把这些货币转变成了足以将他们本人的存在再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关系到让劳动者阶级得以再生产出来的流通过程的总体。

然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这种社会再生产的整个流动的每个环节都发生了什么。关于名义上的货币工资和契约条款的谈判（工作日的长度、各个职位的工资率、工作的速度和强度等）集中在第一个环节。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当然是说，在市场上发生的关于工资契约的争执未必会违背一切商品都应该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的规则，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恰好在于它能够生产剩余价值。不仅如此，工资谈判有可能采取的无限多样的形式（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每

日工资率等）实际上掩盖了生产中的剥削性的阶级关系，因为重点全都放到诸多市场交换的方式上面了。进一步讲，个人的工资率也可以很好地掩盖再生产的社会成本。倘若整个家庭的劳动力代替了个别劳动者的劳动力——这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劳动力的供应量可能就会戏剧性地增加，个人的工资率可能就会下降，而再生产的成本（这是由保证家庭的再生产所需的一组商品来衡量的）仍然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资本论》第1卷，第395页）。①

显然，就个人的工资率、工资结构和契约条款而言，在一个据说是“自由的”市场上关于工资契约的讨价还价可以产生无限多样的结果。但是马克思追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工资倾向于在某种社会平均水平附近徘徊，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叫作“自然价格”。于是，问题就在于解释这个自然价格是如何得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这个问题找到了多种答案。马克思的焦点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这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整个过程的下一步，即从工资到商品的转变。

作为货币持有者，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购买他们愿意购买的东西，而且他们必须被看作拥有自主的口味和偏好的消费者。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一点（《大纲》，第283页）。劳动者可以做出选择，也的确做出了选择，而且他们做出选择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情境是经常出现的。即使他们受到制约，只能以资本家规定的价格来购买资本家准备出售的商品——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市场上的自由选择的错觉也起到了非

① 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常被观察到，但也可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识别出来——自1950年以来，我们在美国目睹了一场已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强有力运动。

常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错觉带来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上面生长着消费者主权理论和对贫困的那个特定的解释，即明目张胆地把贫困归咎于受害者，认为他们没能为自己的存活进行恰当的预算。除此之外，这里也为各种次级的剥削形式（例如地主、零售商、储蓄机构）提供了大量存在的机会，这可能又会使人注意不到生产中的剥削，而这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剥削的核心形式。

然而，我们必须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尝试探索劳动力价值的本质含义，即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显而易见，劳动者需要使用价值，否则就无法存活。只要这些使用价值是以商品形式提供出来的，劳动者就需要足够的工资来支付它们的市场价格。劳动力的价值在这里可以联系到实际工资来解释——实际工资是两个方面的交集：其一是劳动者的存活所必需的一组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二是这组使用价值中的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

让我们首先从使用价值的立场来考察这个问题。并非所有使用价值都是作为商品提供出来的。许多使用价值是在家庭中打造的。劳动者只要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在资本之外获得一定的自主（见后面第 6 章）。让我们暂且假定，劳动者所需的基本的使用价值全都必须作为商品来购买。于是，我们必须对这组满足了劳动者的需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加以界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当地考察在劳工的生活水平中起作用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很有帮助。他断定，“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17]（《资本论》第 1 卷，第 171 页），然后简单地撇开了这个大问题。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使劳工的生活水平——它是按照使用价值来界定的——保持不变。

这种手法让马克思得以提出非常重要的理论见解。倘若这组固定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下降了（它必定会下降，因为劳动生产率会提高），那么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对于劳工的生活水平就可以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这对资本家来说当然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的首要来源。V 的减少会导致 S 的增加。

有了这个发现，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各种各样可能的组合了。有可能 V 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下降了（这意味着总的剥削率上升了），同时劳工的生活水平却提高了；也有可能剥削率减少了，生活水平却随之下降了。

但是马克思肯定不会以为劳工的生活水平是保持不变的。它显然会随着历史的、地理的和“道德的”情境而发生巨大的变动，他也极其强调“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18]（《工资、价格和利润》，第 72—73 页）。他还认为需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19]（《雇佣劳动与资本》，第 33 页）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需要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① 49

① 勒博维茨（Lebowitz）（1977—1978）概述了马克思的观点。

由于资本主义演化的前提是生产出“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20]（《大纲》，第409页），所以我们必须预计到由劳工的“正常”生活水平所构成的基准也会无休止地变化。与马克思的大多数关键概念一样，劳动力价值的概念也不是在分析的起点，而是只有在分析的终点才会交代自己的秘密。但我们现在至少有资格了解他的行进方向了。要理解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联系到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

但这个宏大的表述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意味着一切的，从而没有意义的东西：除非我们把它拉回地面，考察一下生活水平、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实际上是通过何种历史过程来调节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这个主题给出了诸多假设，马克思要么予以拒斥，要么把它们重新打造成了他本人特有的分配理论的一部分。我们将依次考察四个主要的假设。

（1）生存工资

马克思有时被描述成一个关于生存工资的理论家。[①]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背离事实的了。他强烈反对拉萨尔关于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学说[21]，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拒绝认为工资是不可动摇地由劳动者的纯粹生理上的再生

① 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论点的谴责可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找到。罗斯多尔斯基（1977，第295—297页）评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工资理论，而鲍莫尔（1976）批评了马雷克（Maarek）（1979）等人，因为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中生有地找到了“铁的工资规律”的痕迹。然而，鲍莫尔持有一个非常古怪的立场：“不论我们是否想要认为工资的价值偏离了劳动力的价值，这都只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按照生理性的生存来界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可以将它解释成一个极端灵活的量。”我认为，一个灵活的价值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是根本性的，这远远不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

产的需要所约束的。作为过程的资本远远比这更为灵活、更有适应能力。

这种误解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由劳动者为了更新自己的生命能量“在物质上必不可少的”商品所决定的[22]（《资本论》第1卷，第173页）。他肯定在资本主义当中看到了一些倾向，它们的运作会把工资压到这种生理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压得更低，从而甚至会威胁到劳动力在物质上的再生产。但也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倾向会把工资率推往另一个方向。这种误解还有可能植根于马克思的一个习惯：在影响深远的整部《资本论》第1卷的大多数篇幅中，他都假定劳动通常是按照它的价值来交易的，还假定生活水平就社会再生产所需的使用价值而言实际上是不变的。凭借这些假定，他才可以推导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使用“生存”“再生产的最低成本”“基本需要”等说法[23]，却没有将这些概念与“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这个观念牢固地联系起来，而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过程包含了后者。

这一切所具有的危险是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论述的真正本质产生了许多困惑。除了生理上的最低限度之外（这个最低限度始终潜伏在幕后），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价值如何规定、关于什么是“生存”似乎还有一些稍许不同的观点。罗索恩正确地抱怨道：

> 马克思用三种方式界定了劳动力的价值，他的出发点依次是：（1）劳动力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成本，（2）工人所习惯的传统生活水平，以及（3）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生产形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生活水平。（罗索恩，1980，第210页）

（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规定了“引导人们找工作或继续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工作所需的最低工资”。）这些界定在概念上并不相等。但是罗索恩接下来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观点。他说，有一条“红线”贯穿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界定：一旦最低限度（不论怎样界定）得不到满足，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要么优质的劳动力的供给会减少，因为工人无法恰当地维持或再生产他们自身，或者干脆离开了资本主义部门；要么会出现冲突和骚乱，因为工人会为了他们所认为的公正的报酬而斗争”（罗索恩，1980，第 210 页）。这条统一的线索最终会对资本的进一步积累造成威胁。我们将在后面第 2.1.4 节继续谈论这个观点。

（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如果认为工资率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变动，那么这个观点丝毫不难接受。但是马克思坚决拒斥了以为供给和需求可以决定劳动力的自然价格的论点，更不用说供给和需求是否能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工的生活水平了。需求和供给对于市场的均衡是根本性的，但在市场达到均衡时，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就连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也必须“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24]（《资本论》第 1 卷，第 538 页）。

51 我们必须十分仔细，才能正确地解释马克思的观点。他从来不认为交换过程对于价值的决定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他坚信一般而言的价值，特别是劳动力的价值只有随着市场交换的繁荣才会出现。规定劳动力价值的力量最终必须通过这种市场过程来表达。马克思所反对的是错误地把供求机制——由于它们在市场上显而易见——识别为在市场中运行的根本性力量。马克思在这里追随了李嘉图，因为他也问道：最初在

劳工市场上决定供给和需求的是什么？我们只要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资本积累对供求双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在供给方面，人口学的变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嘉图欣然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认为劳动者的供给由此就可以通过工资率的上涨来适应资本积累。马克思并不否认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资本论》第1卷，第581—643页）。[①] 但是大概由于任何东西只要散发出一丝马尔萨斯主义的气味，就会令他反感，所以他极少提到这个观点（参见后面第6章）。相反，他专注于原始积累的过程（强制的无产化）、对产业后备军的潜在部门的发动（女性和儿童）、迁徙（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或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爱尔兰——往外迁徙），以及资本主义独有的生产相对过剩人口的机制。在他分析调节劳动力供给的力量时，资本的直接行动或国家这个代理人为了资本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圈地等等）成了主要的焦点。我们很容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人口政策和移民政策也与这个视角——资本对劳动力供给的全面管理——相符，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些。

在需求方面，资本能够通过重组、结构转换和技术变革来调整它的需要——这当然不会没有压力和困难。此外，货币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机动性让资本能够适应不同的人口状况以及各种“历史的和道德的”处境，这些处境至少最初有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劳动力的价值。由于资本积累会导致资本在不同的生产流程和不同的地点之

① 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第5章）试图把某种明确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论述添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中。

间无休止地变动，更不用说生产的社会组织和技术组织会在积累的驱使下无休止地发生结构转换，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表达了积累的要求。

52 我们再次回到了一个观点：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有能力以霸权和控制的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施加影响。“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25]（《资本论》第 1 卷，第 640 页）我认为，若要问劳动力的价值在根本上是由哪些力量规定的，那么这就是马克思想采取的立场。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市场上运行的所有力量都有这种性质。稀缺可能会由于完全处于资本的影响之外的原因而出现。但我们发现，马克思断定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高于价值”，而且这有可能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6]（《资本论》第 1 卷，第 613 页）。通过这样的措辞，马克思实际上表明他想要将偶然的力量与具有社会必要性的力量区分开来，前者可能会使工资起伏不定，后者则依附于一般而言的资本积累，并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他的这种做法是与他的总体战略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价值表达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的社会必要性，并断定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个社会形态中获得霸权时，价值（包括劳动力的价值）才能成为经济生活的调节器。

（3）与工资率相关的阶级斗争

有一个观点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V 与 S 在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因而也蕴含了 v，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是由资本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所规定的。近来，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利润缩减”假设运用了这个观点。这种假设的论述大致如下。劳工的成功斗争（要么是由于劳工的稀缺，要么是由于劳工组织得更好）提高

了实际工资，并降低了利润。由此造成的“利润缩减”使资本积累放慢了，并最终导致了停滞。资本的回应（这要么是有意识的设计，要么是因为别无选择）是制造剧烈的衰退（例如1973—1974年的衰退），以此来规训劳工、降低实际工资并重建利润回升的条件，从而重建恢复积累的条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猛烈攻击这个方案，往往将它斥为纯粹的新李嘉图主义。[①]

这里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尤其必须考察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实质性地改变双方在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并考察与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和劳工的生活水平相关的日常斗争（生活水平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的）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实质性地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马克思很乐意承认工资与利润不断变化的数额是相互制约的，而且它们的平衡“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27]（《工资，价格和利润》，第74页）。

但是马克思还认为，倘若实际工资的上涨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那只是由于我们假定了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额没有扩大，生产也没有扩大。否则，考虑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状况，实际工资和利润率既有可能一同上升或下降，也有可能反向变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

① 格林（Glyn）与萨特克里夫（Sutcliffe）（1972）和博迪（Boddy）与克罗蒂（Crotty）（1975）把“利润缩减”当作经验现象，并给出了两种最简单的、直接的叙述，而伊藤（Itoh）（1978a）给出了一种更有理论性的论述。在对这个论点的几种批判中，最好的是亚夫（Yaffe）（1973）和维克斯（Weeks）（1979）的批判，后者对这个论点——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性的主张的话——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在我看来相当正确的评价。

第 408 页）。马克思认为，只要实际工资的上涨“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28]（《资本论》第 1 卷，第 619 页），它就可以上涨。因此问题在于，当实际工资的上涨威胁到资本积累时，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是否还能使它保持上涨[29]？

马克思拒绝认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一项长期的主张，因为它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难举出他的理由。与分配相关的斗争毕竟是在市场上发生的。对马克思来说，关键的关系却在生产中——这里才是剩余价值的起源。倘若把劳动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解释成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的纯粹权力关系的产物，那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抽象。所以，马克思降低了与分配份额相关的阶级斗争的地位，认为它只是达到均衡的手段；这个地位与供给和需求的地位相当类似。例如在产业周期的进程中，劳工的权力在上行区间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工资超过了价值，但这只是补偿了工资的下降，因为工资在随后发生的萧条中会低于价值。权力关系的变化有可能使得工资在自然价格——这反映了劳动力的根本价值——附近波动。倘若劳工组织很强大，因而工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高于价值，那么这只是因为资本积累没有受到妨碍。因此，马克思明确地告诫工人“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也“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与“‘做一天公平的工
54 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相反，他们“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0]（《工资，价格和利润》，第 78 页）

阶级斗争在这里起到了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助于维持某种尊严感，并击退资本家惯于施加在雇佣对象身上
118 的较为粗鲁的暴力形式。在阶级斗争所构成的基础上还会发生

另一种斗争：既然劳工的生活水平是由一组使用价值构成的，那么这组使用价值是如何界定的（例如，其中包括的是医保，还是对军事保护的强制消费）？这些斗争的焦点是使用价值的领域、人类需要的领域，从而可以构成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的目标是废除以终极的不合理性——为积累而积累——为基础的体系。但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与实际工资相关的斗争只能用来确保劳动力的交易价格就是它的价值，或者接近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也许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的过程来达到，但这绝不是说它仅仅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的相对权力。

十分有趣的是，“利润缩减”的假设如果得到恰当的解释，就会支持这个结论，而不是反对它。资本与劳动权力平衡的变化的确可以改变实际工资，而且这既有可能限制利润率，也有可能提升利润率。这种事情的发生恰好是我们在交换领域中可以预料到的。然而，这只是描述了表面上的变动，却没有触及劳动力的价值本身。如果实际工资的变动与资本积累相抵触，补偿性的力量就会发动起来，拉低实际工资，并在必要时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在市场上的相对权力（要么是通过提高失业率，要么是在政治上或在其他方面限制有组织的劳工力量）。[①] 作为一种对这些表面上的变动所做的描述，“利润缩减”的假设

① 这里的观点当然是说，一旦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平衡严重威胁到了资本积累，就必须采取步骤来纠正它们的权力平衡。因此，1933 年美国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意图是加强工会在市场上的谈判权力，以便帮助美国解决一场消费不足的危机——这是对这场危机的一般解释。我们可以注意到相反的情况：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眼下都企图制约工会的权力，因为对工资的要求（以及让这些要求得以成立的权力）现在被看作慢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权力平衡的这些变化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而且假如没有往往令人生畏的斗争，它们也不会发生。但这种平衡的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变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与积累相关的问题。

是完全可信的，甚至是无法反对的。但正如它的批判者坚持认为的那样，它就资本主义的整个运动规律而言是一种完全不适合的观点，而且就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理论而言肯定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演绎。这样一种阶级斗争与劳动力的根本价值的决定过程几乎毫无关系，尽管它的确对市场的均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需求和供给一样。

（4）积累过程和劳动力的价值

55 马克思彻底拒斥了一切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固定不变的表述（例如生理性的生存工资）和一切认为可变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固定不变的表述（比如所谓的“劳动基金”理论）；他的依据是：“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不断变化的部分”，而且劳动力构成了“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同样必须被解释成一种无休止的动荡[31]（《资本论》第1卷，第609页）。他认为，与分配份额相关的阶级斗争和供求关系都对市场的均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偶尔也都可能会迫使实际工资偏离价值，有时还会偏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归根到底，它们都只是作为更加根本的力量在市场上的媒介来运行的，这些力量规定了劳动力的价值。那么，这些“更加根本的力量”是什么？

我们不难找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大致回答。一种初始的、“决定生产”[32]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划分了资本与劳动，但从此分配关系就必须被看作“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不仅如此，生产和分配还“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33]，这个统一体也包含了交换和消费（见前面第41—42页）。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总体的内在关系来规定劳动力的价值——进一步讲，支配这个总体

的命令就是为积累而积累。我们之前讲过（第 2 页），马克思所建立的概念是关系性的。现在我们遇到了运用这种思路的一个具体实例。这里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是要让这个高度抽象的观点得到更为具体的解释。

我们还没有资格阐明整个论述。但是总体观点大致如下。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有一种均衡的分配，这种均衡的分配是联系到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总体结构来规定的。[①] 总就业也有一条均衡的增长路线，如果用 V 与它相除，就能得出个别劳动力的均衡价值。倘若劳工的整体生活水平上升了（这是用他们所掌控的使用价值来衡量的），倘若这些使用价值还成了劳动力价值所涵盖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的一部分，那是因为资本积累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或者是因 56
为积累的规律并不关心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劳动力的价值必须被解释为一个无休止地变动的基准，调节这个基准的是积累过程。简言之，它可以被界定为*劳动力的社会必要报酬*；也就是说，这份报酬从资本的持续积累的立场来看具有社会必要性。对社会必要性的谈论十分重要。它让我们得以区分劳动力价值的均衡概念与无数偶然的、或然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会迫使工资高于或低于它的均衡价值。

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结论仅仅适用于一种非常狭窄的关于生活水平的观念，这种观念立足于劳动者可以通过商品交换来掌控的物质性的使用价值的量。它并没有规定向劳动者提供

① 有些人将马克思变成了一名关于一般均衡的理论家，为此还拿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所有工具，但这个地方的分析让他们很难受。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无法确定均衡的工资率，因而被迫把生活水平或均衡工资看作永久的、结构性的、外生决定的因素——见马雷克（Maarek）（1979）、罗默（1980）和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第 4 章）。

的是哪一组特定的使用价值（医保或迪斯科），也没有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中的一些在商品交换的领域之外的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工人阶级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自主，而且通过它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选择，它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历史。它之所以有资格这样做，必须准确地归因于一个事实：它从质的交换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这种交换经过了一种被界定为 *C–M–C* 的流通形式。[①]

这种交换对于资本的意义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资本家想要从中获取剩余价值。乍一看，仿佛劳动者得到的越少，资本家得到的就越多。但我们只要观察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就会看到，“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34]（《资本论》第 1 卷，第 572 页）。资本本身必须限制自己“对财富的无限渴望”，以免破坏了把一定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出来的能力。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资本家虽然支付了工资，却又把它们收了回来，因为劳动者要支付工资来购买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分配在这里的职能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联系，或者用马克思喜欢的说法，是价值在生产中的创造与价值在交换中的实现之间的中介联系。无论如何，资本家必须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即有人负担得起、有人欲求或需要的商品。个别资本家无法合理地期望既减少自己雇员的工资，却又为自己生产的商品保持一片不断扩张的市场。

57 这一切使得我们超出了分配本身的狭窄范围。但这恰好是

① 布洛维（Burawoy）（1978）讨论了这个观点，并把它阐发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强烈批判。他指出，工人倘若仅仅对他们可以掌控的使用价值感兴趣，可能就会接受自己在工作地点所受的剥削，甚至会选择合作，只要这有助于他们以物质产品的形式得到利益。资本家感兴趣的是价值，工人感兴趣的则是使用价值，这一点为工作过程中的合作而非对抗提供了基础。布洛维有正确之处，但是总体上实在走得太远了。

马克思想做的。他想让我们看到，要理解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份额，就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35]的总过程。我们将在第3章继续研究这个过程。

2. 熟练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

总的可变资本并不会在个别工人之间平等地分割。它的划分方式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技能水平、工会权力的范围、惯有的报酬结构、年龄和资历、个人的生产率、特定的劳工市场（按照部门或地理来区分）中的相对稀缺性等等。简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异质的劳动力，他们得到的报酬是有差异的。

这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双重问题。第一，工资的差异本身需要解释。第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问题——劳动力的异质性被一些资产阶级批判者看作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让我们看一下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是通过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这个观点同样必须修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构造一种由简单的抽象劳动所构成的价值标准，这也就假定了明显具有异质性的具体的人类劳动——它在技能等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某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被还原成若干简单的抽象劳动。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带有歧义又颇为隐秘。他仅仅声称："经验证明"，这种还原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是"经常进行的"[36]（《资本论》第1卷，第44页）。在一处脚注中，他说明了"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这一切完

全符合劳动力的价值与作为价值本质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区分。从异质的技能到简单劳动的还原过程必须独立于工资率在市场中的决定过程。

马克思并没有花工夫去解释“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指的是什么。既然他诉诸“经验”，就表明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他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对他的批判者来说肯定不是。如果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社会过程是劳动力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交换，像博姆－巴维克[37]（1949）坚持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情况：还原的标准是由实际的交换关系所决定的”，而交换关系本来应该由它们所体现的社会劳动来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仿佛有一个“根本性的、无法逃脱的循环”。所以，价值据说无法独立于市场价格来决定，后者而非前者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是根本性的。于是，马克思较为激烈的反对者——从博姆－巴维克到萨缪尔森（1957）——嘲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认为它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抽象”，并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现代价格理论比马克思的表述优越得多。就连相对同情马克思的批判者——如森岛（1973）——也总结说，上述还原要么涉及有差异的剥削率（这会严重扰乱剩余价值理论），要么意味着不同的技能可以通过工资率转换为共同的尺度（这就彻底摧毁了价值理论）。在如此猛烈的批评面前，还原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变得十分迫切了。

58

一种回应的思路是：只要假定劳动力所赋予的价值与它的生产成本是成比例的，就可以将熟练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这样来确立的还原无法独立于交换过程，也无法凭自身的力量避免博姆－巴维克所指责的循环。因此，罗索恩（1980）和龙卡利亚（1974）都试图识别出一种不用涉及交换就能实现还原的生产过程。罗索恩认为：

熟练劳动相当于许多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不熟练的劳动加上许多体现在熟练工人的技能中的劳动。有一些体现在技能中的劳动本身也是熟练劳动，从而又可以被分解为不熟练的劳动加上体现在技能中的劳动——后面的技能是在更早的时期培养的。只要把这种分解无限向后延伸，我们就可以彻底消除熟练劳动，用一连串在不同的时段进行的不熟练的劳动来代替它。……这种还原……完全可以独立于工资水平来进行，这种分析也避免了博姆－巴维克关于循环的责难。（罗索恩，1980，第8章）

这种做法遇到了诸多困难。简单劳动成了会计单位，而且需要假定简单劳动的生产成本对体系没有影响。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表现为他们所持有的一种不变资本。按照托塔哈达（1977），要实现这样的还原，代价就是要引入某种人力资源理论。这抹掉了阶级剥削的问题，并在一种自我实现的神话中掩埋了现实的社会过程，而这毫无疑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旨趣。托塔哈达接着说道，这些困难源于“提出还原问题的方式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者和试图回应这些批判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在一片由资产阶级批判者界定的领地上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用马克思所界定的术语来回答。让我们回想一下，抽象劳动是在一种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过程表达了生产与交换在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中的根本性统一。

所以，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论述。他说过，抽象劳动

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

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38]（《大纲》，第 297 页）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39]（《大纲》，第 104—105 页；参见《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 1033 页）

只要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本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掌控的商品而存在，抽象劳动就会成为价值尺度。资本积累的过程要求劳动力有一种流变性，即可以在分工迅速扩大的语境下适用于不同的任务。资本家可以创造这种流变性，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司内部组织分工，还可以转变劳动过程，以便降低劳动从一种业务向另一种业务转移时的技术壁垒和社会壁垒。垄断性的技能是资本的死敌。一旦这些技能成了积累的障碍，就必须通过转变劳动过程来压制或消灭它们。垄断性的技能变得无关紧要了，但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第 76 页）。

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不只是一种头脑中的构造；这是现实的、可以观察到的过程，它的运行对劳动者有毁灭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极为关注工匠技能的消亡和“简单劳动”对工匠技能的取代——正如布雷弗曼极其详细地记录的那样，这个取代的过程无情地贯穿了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汽车工业从熟练的手艺生产到大规模的流水线技术的转变——这就意味着熟练劳动被还原成了简单劳动）。[①]

这并不是说资本成功地把这种还原强加到了每个地方；手艺和工匠技能的历史遗风往往有力地抵抗了资本所发动的进攻——马克思是最早承认这一点的人。上述还原过程的历史也不是没有矛盾。把一个层面的任务变得程序化往往要求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为精巧的技能。职位结构变得越来越等级化了，处于最高等级的人——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策划人和设计师等等——也逐渐积累了某些垄断性的技能。这为阶级分析和对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的理解带来了问题——我们将在第4章回到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无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兴起，这是在一个由纯粹的商品交换所支配的社会中、在资本家的霸权控制之下发生的。[②] 在其他任何类型的社会中——其中有小商品生产者、工匠、农民、奴隶等——把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劳动都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在一定种类的社会——它以生产和交换中特定的阶级关系

① 布雷弗曼（1974）。布雷弗曼的论述遭到了无数批评，我们将在第4章予以讨论。

② 德赛（1979，第20页）写道：“因此，劳动的价值比例既是一条公式，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正是为什么抽象的、无差别的劳动这个范畴不是一个抽象，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倾向。”亦见亚瑟（Arthur）（1976）关于抽象劳动的概念的研究。

为特征——出现之后，价值才成了社会活动的调节器。

从这条结论出发，我们就可以回到马克思的批判者在试图让他的论述名誉扫地时拿出的那种例子了——这会让我们有所收获。博姆－巴维克所考察的例子是一名雕刻家与一名碎石工的交换，他想以此证明作为价值的劳动与不同的劳动力的价值是无法区分的，而后者是通过产品交换来决定的。他的例子并没有错。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特定的、个性化的劳动形式，它在一个比较发达的交换总体中甚至再也无法“设想”了[40]。进一步讲，博姆－巴维克的例子中两名劳动者都是个体经营者，其中一名——雕刻家——拥有特殊的垄断性的技能。在马克思感兴趣的状况中，两名劳动者都是由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雇佣的——这里的商品是雕像和道路——而且两者都没有任何垄断性的技能，即使他们为商品赋予的劳动也许具有不同的生产率。博姆－巴维克完全撇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根本不足以对马克思提
61 出有效的批判。博姆－巴维克以为自己找出了一种循环论证，但这是由于他割裂了还原问题与它的根基，即现实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重新塑造了劳动过程，并使商品交换普遍化了。只要把还原问题重新放到这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下，它就变得微不足道了。然后，我们还要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虽然我们充分理解了工资的差异同社会劳动成为价值的本质的方式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这些差异的确存在，需要加以解释。第二，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之下的重组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消除了垄断性的技能，从而完成了上述还原——这为价值理论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在第 4 章谈论第二个问题，因为它向马克思主义体系提出了一些严峻的理论性挑战。

3. 剩余价值的分配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

在马克思眼中，他的著作“最好的地方”之一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地租等等”[41]［《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 192 页］。剩余价值理论把利润的起源解释为对劳动的剥削，而这种剥削是在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中、在生产过程的范围内进行的。分配理论需要研究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马克思把这个步骤看得极为重要。他写道：“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坚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在《资本论》第 3 卷中[42]（第 168 页），马克思宣称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这是一项强烈的主张，也是一场规模庞大、众说纷纭的论战的焦点——它就算没有成为这样的焦点，也需要加以考察。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的论述大致如下。剩余价值起源于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但在个别资本家之间是按照竞争的规则来分配的。

在考察剩余价值如何在于不同部门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之间分配时，马克思证明了商品不能再按照价值来交换了——他在《资本论》的前两卷都假定这个条件是成立的。商品必须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来交换。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就消除一种可能产生的混淆。这些生产价格仍然是用价值来衡量的，不能同实现在市场上的货币价格混淆起来。马克思仍然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一种测量杆。他现在要证明的是商品不再按照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交换了。

为了跟上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必须首先列出一些基本的界

定和记号。生产一件完整的商品所花的时间叫作“生产期间”。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通过交换过程得到实现所花的时间叫作“流通时间”。资本的“周转时间”是给定的资本的价值通过生产和交换得到实现所花的时间——因而是生产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总和。“所消费的资本”是在一个生产期间的过程中被耗尽的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总价值。由于固定资本可能在一个生产期间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却没有被完全耗尽，所以一个生产期间所消费的资本等于或小于“所使用的资本”。我们既有可能将“不变资本”c当作所消费的资本，也有可能将它当作所使用的资本，这取决于我们试图说明什么问题。“可变资本”v是一个生产期间所消费的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是由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来给出的：即s/v。“资本的价值构成”被界定为c/v。“利润率”p是$s/(c+v)$，这个公式可以改写为：

$$p=\frac{s/v}{(s/v)+1}$$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尺度都是用价值来表达的。

我们现在假定，有一种竞争过程会使利润率在所有产业和部门中变得平均化。然后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影响交换比例的是不同的资本价值构成。让我们考察下面的例子。一个经济体有两个产业。第一个产业运用了80个单位的不变资本和20个单位的可变资本，并创造了20个单位的剩余价值，第二个产业的各项尺度则是$20c$、$80v$和$80s$。这两个产业预付的总资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把这些总资本界定为“生产成本”$c+v$。两个产业的剥削率s/v也是一样的。我们再假定生产期间是相等的。但现在我们注意到，第一个产业（价值构成较高）的利润率是20%，而第二个产业（价值构成较低）的利润率是

80%。利润率并没有平均化。

让我们现在假定这两个产业有相同的权重，而且平均利润率 p 是 50%。利润率平均化的后果就是改变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两种商品现在都是按照 $c+v+p$ 而非 $c+v+s$ 所指定的比例来交换的。前一个尺度就叫作“生产价格”。我们再强调一次，这是由价值衡量的，而不是由货币价格衡量的。在竞争中，我们可以期望商品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而不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

对于具有不同周转时间的资本，我们也可以构造相同的论证。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这样做，但我们应该承认周转时间在交换比例的形成过程中是很重要的。由于资本家感兴趣的是一段时期的平均利润（例如资本的年度回报率），所以与每年只周转一次的资本相比，每年周转许多次的资本就能获取高得多的回报率（假定它们的价值构成是相似的，剥削率也是相等的）。资本和劳动倾向于从周转次数较低的部门重新配置到周转次数较高的部门，直到年度回报率变得平均。相对价格也将受到影响，而且这让我们为商品为什么不再按照价值来交换又找到了一个原因。

马克思在这里做的是应用他的一般规则：生产决定分配，但对前者的考察不能脱离包含在其中的分配。马克思所说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程序事实上关系到“分配”的双重意义。它是资本按照一般利润率在不同的产业之间的分配，结果是形成生产价格，而生产价格会导致剩余价值有差异的分配，因为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价值构成和周转时间。

分配的大体结果可以相当简单地加以说明。每个资本家都凭借他运用的劳动力为社会中的剩余价值的总和做出了贡献，并按照他预付的总资本从总的剩余价值中提取了自己的部分。

马克思略显俏皮地把这称为“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会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全部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43]［《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206页］。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价值构成较低的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周转时间较快的产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大于它们以利润的形式取回的剩余价值，而对于价值构成较高的产业（所谓的“资本密集型”部门）或周转时间较慢的产业，情况则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它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错误解释提供了基础——由价值构成较低的产业所支配的国家仿佛会把剩余价值交给由较高的价值构成所支配的国家。①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论战？马克思本人的主张是很强烈的，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所写的序言中也
64 有一些挑衅的评论，这都促使人们把注意力聚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的确十分关键的特征上面：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不幸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解答要么有错误，要么不完整。资产阶级批判者扑向了这个他们所认为的根本错误，想以此让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整个理论名誉扫地，而且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马克思企图把分配从正确的位置挪走，因而必须使分配回到这个位置。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本质。②

① 埃曼纽尔（Emmanuel）（1972）；如果推导出了对转化问题的恰当解答，就能表明价值未必会从价值构成较低的部门转移到价值构成较高的部门，上述错误也就不会出现了。

② 关于转化问题已经有了大量文献。鲍莫尔（1974）、德赛（1979）、莱布曼（Laibman）（1973—1974）、格施泰因（Gerstein）（1976）、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森岛（1973）、萨缪尔森（1971）和谢赫（1978）都从各种视角做了很好的论述。多斯塔勒（Dostaler）（1978a）的一部出色著作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早期历史。

马克思设定了一个场景，其中有五个价值构成各不相同的产业，以此来描绘当利润率在竞争中平均化时，生产价格将如何形成（《资本论》第3卷，第9章）。为了阐述的方便，他假定资本家按照价值来购买商品，并按照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他还假定平均利润率是已知的，而且只要让五个部门拥有相同的权重，并根据预付的总资本计算出剩余价值的平均产量，就可以预先计算出平均利润率。

我们立刻就能看出两个问题。倘若所有商品都是按照生产价格来交换的，这就同样适用于投入和产出。资本家在购买时依据的是生产价格而非价值，这不同于马克思在他的方案中的设定。马克思对此一清二楚，却认为“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44]（《资本论》第3卷，第164—165页）。其二，当资本从价值构成较低的部门再分配到价值构成较高的部门时，剩余价值的总产出就会变化，因而会改变利润率。马克思所设立的转化程序显然是不完整的。它至多是一种近似。马克思并没有强调这一点，恩格斯则进一步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因为他在序言中胜利地宣告说，马克思已经为这个问题确立了真正的解答，可以一劳永逸地让批判者狼狈不堪、哑口无言。

博姆－巴维克（1949）急切地指出了马克思的程序的缺陷，把它们当作根本性的错误，并嘲笑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方案——这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解决转化问题的方案不仅没有让批判者哑口无言，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用来攻击他的弹药。

转化问题在当今具有另一个面貌：尝试从数学上纠正马克思的错误。冯·博特基维茨最先在1907年提供了一个数学解法。他使用了联立方程的思路，并证明了转化问题在某些经过

65 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是有可能解决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识别出求解的条件，并说明这些条件的正当性。

形式上的数学问题却出现了，因为按照联立方程的思路，有必要在价值的结构和生产价格的结构中间使某些量保持不变，否则就无法求解。由于马克思本人认为生产价格的总和应该等于价值的总和，而且总的剩余价值必须等于利润的总和，所以选择这两者作为不变量是最常见的。麻烦的是，在这种特定的数学表述中，这两个条件是无法同时成立的。于是，人们又提出了一大堆不同的数学解法，每种解法都使用了不同的不变性条件。[①]

这使得萨缪尔森（1977）认为，由于选择一种不变量、抛开另一种不变量并没有逻辑上的理由，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根本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数学转化，而是单纯抹掉一组数字、用另一组数字来替换的过程。《资本论》第3卷对生产价格的分析与第1卷所提出的价值理论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所以，后者要么被看作一篇形而上学论文，要么是在通向第3卷的更为根本的价格理论的途中顺道做了“一次无关紧要的迂回”。由于价格理论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已经被“革命化”了（主要是通过边际主义“革命”，这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础），所以就马克思对价格理论的贡献而言，他可以被丢进历史书，做一名“李嘉图的后学小辈”。萨缪尔森就是这样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格斗的。

对萨缪尔森进行回应的一种思路是接受他在数学上的贡献，然后认为他虽然也许是“一名一流的数理经济学家”，却是一名“糟糕的政治经济学家”。因此，莱布曼（Laibman）（1973—

① 斯威齐（1968）描述了博特基维茨的解法，莱布曼（Laibman）（1973—1974）则评论了多种数学解法。

1974）把剥削率选作不变量，他的依据是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张力是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性的标志。尽管后一点也许是真实的，但他的做法意味着工资与利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平衡是唯独由阶级斗争决定的——我们之前否认了这个命题。为了克服萨缪尔森的反对意见，他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第二种捍卫的思路要求将转化问题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按照这种解释，在独立的生产者——他们并不服从资本的规则——相互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的状况下，商品确实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价值关系遭到了掩盖，最终被掩埋在生产价格下面了。这种解释在马克思的一处评论中找到了一些正当性："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45]（《资本论》第3卷，第177页）。恩格斯感到，"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46]（《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于是，恩格斯着手替马克思阐发这个观点，并在他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增补"中针对转化问题撰写了一个冗长的历史学版本。从此，几种较为节制的版本就得到了R. L. 米克（1977，第7章）等作者的推崇。

尽管通过诉诸历史来解决逻辑上的两难听上去非常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但这种历史学的思路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种描述完全背离了我们之前提出的论点，即价值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确立。价值理论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个观点与上述思路是矛盾的。进一步讲，正如森岛与凯特福雷

斯（Catephores）（1978）极为详细地记录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思路表明他“在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求的不是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抽象描述，仿佛可以从中以发生学的方式推导出发达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寻求的是让他得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追根问底的理论工具”。因此，转化问题的历史学版本——即使是一些更有分寸、更为精巧的演绎——必须被拒斥。①

我们既然不能诉诸阶级斗争或历史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倒退回去，把转化当作一种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静止的、非时间性的、分析性的手段”。我们不得不寻找一种合理的数学技巧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在不久前，谢赫（1978）提出要追随马克思所使用的技巧，并设计了一种迭代解法，这个解法在每一轮迭代中都会调整投入品的成本和利润率，直到识别出生产的均衡价格。按照这种看法，马克思仅仅执行了这个序列中的第一轮计算，却没有花工夫去做剩下的计算，因为与给出社会性的结论相比，得出正确的数学解答似乎不太重要。森岛（1973）以他一贯的数学天才证明了如果转化程序被当作一个马尔科夫（markov）过程，许多困难就会消失，因为这些
67 困难只有在用联立方程来处理转化程序时才会出现——生产价格的总和与价值的总和之间的等式可以同剩余价值与总利润之间的等式愉快地共存，正如马克思坚持认为的那样。在森岛看来，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居然如此接近问题的解答，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十分困难，他的数学技巧也极端有限。②

事实上，一些关于转化问题的有趣见解来自非马克思主义阵营。鲍莫尔（1974）和森岛（1973）关于这个问题都有许多

① 森岛与凯特福雷斯（1978）认为马克思也会拒斥这样一条历史学的思路；他们为此给出了详细的、在我看来相当正确的论证。

② 森岛（1973）、谢赫（1978）和德赛（1979）在这里都很有帮助。

正面的、贴切的说法。例如鲍莫尔正确地认为，马克思在根本上关注的是建立一种分配理论，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实际转化是一个附带的问题。[①] 森岛捍卫了一个类似的观点：马克思的努力为的是社会性的见解，而不是数学的精确性，而且从这个立场来看，马克思很好地完成了他打算要做的事情。

那么，马克思所寻找的社会意义是什么？他有力地陈述了他的结论，将转化的后果与资本家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比较：

> 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
>
> 这一切使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的驱动机构越来越隐蔽。由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在这里，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插进来了。这就是资本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商品的平均［生产］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并且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用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正常的平均利润本身好像是资本所固有的，

① 鲍莫尔（1974）值得仔细阅读，因为关于马克思试图怎样利用上述转化，他似乎有最好的把握。多斯塔勒（Dostaler）（1978b）给出了类似的论述，并试图在我们这里所采纳的那种价值理论的框架中调和这些问题。

不以剥削为转移的。[47]（《资本论》第3卷，第827—829页）

利润起源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个事实对于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变得隐晦了。“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态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这又使得“那些陷在竞争斗争中，无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斗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48]（《资本论》第3卷，第167—168页）。关于资本的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这场混乱，却也未能洞察被竞争的现象所掩盖的秘密。马克思则宣称自己“第一次”充分而有效地揭示了这些秘密。

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中出现的拜物教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职能和为统治者辩护的职能，同时也使利润在剩余价值中的起源变得神秘了。这样一种神秘化对于资本是危险的，因为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完全依赖于剩余价值的持续创造和再创造。但是资本家即使可以洞察自己的观念所产生的拜物教，也仍然没有能力扭转一种可能十分严重的事态。不论他们是否愿意，竞争都会迫使他们配置社会劳动、安排生产过程，以便使利润率平均化。马克思现在向我们证明的是，这与剩余价值在社会中的总产出的最大化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在这里为社会劳动的系统性错误配置找到了物质基础，也为劳动过程的组织中的系统性偏差找到了物质基础，这两种差错把资本主义引向了周期性的危机。个别资本家的行为是由竞争引导的，从而必定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本身。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市场的逻辑会迫使他们对生产价格做出回应，而不是直接对

剩余价值的生产所需的条件做出回应。这是对转化问题的研究所带来的关键见解。这个结果会在逻辑上导致尖锐的结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予以探讨。

4. 利息、租金和商人资本的利润

虽然辩论的喧哗和怒火包围了还原问题和转化问题，我们却有些惊讶地发现，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引发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成是因为马克思的租金理论和利息理论还处于骇人的混沌状态，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对马克思留下的残局做出连贯的、彼此认可的说明。

由于分配的这些方面都将在后面几章得到详细的考察，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将局限于从总体上评论一下马克思表现出来的行进方向和他为此提供的理由。

让我们回想一下，剩余价值理论靠自身就能成立，不用依赖于任何分配理论，唯一的例外是一切分配安排中最根本的一 69
种，即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剩余价值在竞争的社会过程中转变成了利润。利润又分割成了多个部分：商人资本的利润、货币资本的利息、地租和企业利润。一切分配理论的任务都是解释剩余价值的这种分配的社会必要性和实现这种分配的社会过程。

从前往后的叙述方式——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到它的分配——不应该使我们受到误导，以为分配关系对于理解生产并不重要。由于马克思认为对生产的考察不能脱离“包含在其中的……分配”，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租金和利息作为生产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后面我将试图证明固定资本的形成——特别是建成环境中物质基础设施的建造——倘若脱离了对分配加以调节的社会过程，就无法得到理解。因此，分配关系影响了生产

条件。马克思自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的确坚持认为，这些影响不论多么重大，都绝不可能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本身。

为了理解什么是决定分配关系的根本逻辑，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流通的总过程开启了一个视角。他描述了价值在一系列形态变化中——在一系列状态的改变中——扩大的过程。最简单地讲，这可以被看作一个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获取更多货币的过程。货币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起通过生产被塑造成了在市场上有待出售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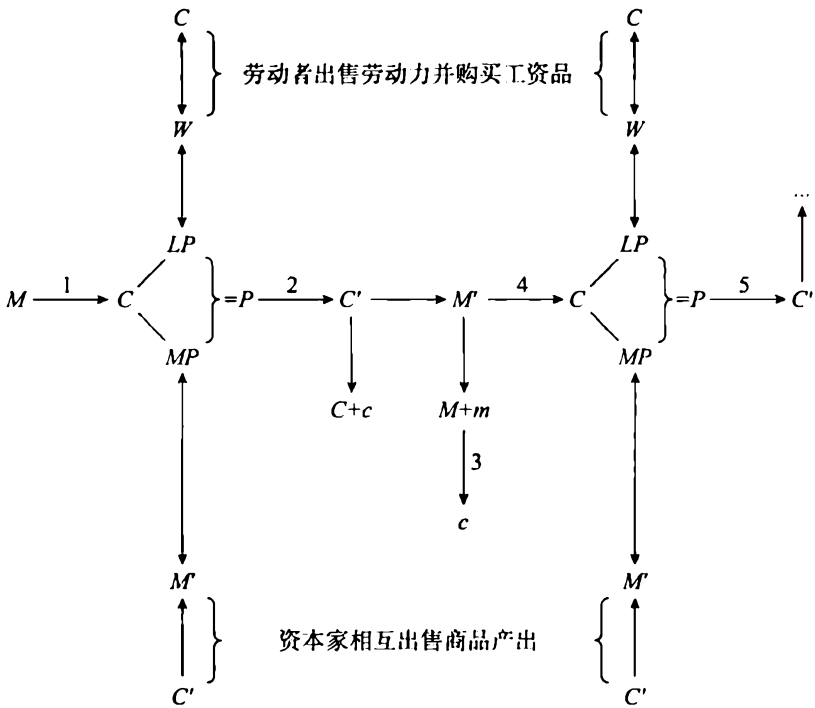
$$M - C \left(\begin{matrix} LP \\ MP \end{matrix} \right) \ldots P \ldots C' - M' \text{（等等）}$$

这个过程结束时的货币要多于一开始的货币，而且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要大于所投入的商品的价值。*M*–*C* 和 *C*′–*M*′ 这两个阶段是由购买和出售所带来的转化，而生产过程意味着对产品的物质转化，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在产品中的体现。

流通过程始于货币，终于货币（加上利润），这是资本流通的典范形式。但我们如果将流通看作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就会发现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分解它。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起点和终点是生产行为，或者是处于货币状态的资本。我们可以
70 创造几扇独立的窗户，分别从中观察资本流通的总体性质（见图 2.1）。我们从每扇窗户都能看到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开头的几章描述了我们从这几扇窗户所能看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货币资本的流通是由一些条件和考虑来调节的，但倘若资本被一种特定的生产过程所束缚，成了生产资本，那么支配它的条件和考虑就会相当不同，而商品资本的流通又是由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条件和考虑来调节的。我们最终感兴趣的当然是整个资本流通，但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若要理解它，就必须首先考察其中的差异。

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资本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还会带来一些问题，而这些都会导致资本职能的专业化。例如，商人资本家对商品形式的资本负有特别的责任，并专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的流通同样需要银行家和金融家的专业技能，他们一旦获得了在总体上把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的权力，就成了收取利息的货币资本家。生产资本家则只需要掌控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就行了。



1. 资本家购买用于生产的商品
2. 生产函数
3. 资本家购买用于消费的物品
4. 资本家购买用于生产的商品
5. 生产函数

M-...-*M'* 货币资本的循环
P-...-*P* 生产资本的循环
C'-...-*C'* 商品资本的循环

图 2.1 资本流通（摘自德赛，1979，第 33 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它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条件调节的，而把资本拆分为不同的循环可以让我们得以确立其中的某些必要条件。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得出其中的充分条件——后者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当中必然处于主导地位的分配安排。我们将在后面几章考察这些充分条件。眼下我们必须仅仅满足于简单地描述一下马克思识别出来的一些分配范畴。

（1）商人资本

资本如果是以商品形式被持有的，就作为商品资本而存在。但由于资本只有作为运动中的价值才能保持为资本，所以商品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资本的性质。这种转化的速度和效率对于资本家极为重要。流通时间（资本取得商品形式所花的时间）会影响周转时间，从而会影响利润率。转化会产生某些成本，必须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扣除——因为销售一个商品虽然实现了价值，却没有创造价值。减少流通时间、节省必要的流通成本对于参与生产的资本家十分重要，因为这两种手段都可以增加留在他们手中的剩余价值。这给商人资本提供了机会。商人承担了营销的全部成本和责任，并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拿走一块作为回报。由于利润率的平均化，商人也应该从预付的资本上面获得与生产者完全相同的利润率。对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而言，这一切所带来的好处当然是周转时间的缩短和流通成本的减少（通过规模经济、职能的专业化等等）。

从价值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生产者面向商人的售价是低于价值的，而商人是按照价值来出售商品的。这个差价是商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它包含了必然会产生的花费和商人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润。这使得商人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出现了

一种奇怪的关系。一方面，这是一种寄生的关系，因为商人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仅仅占有了价值。另一方面，商人资本加速了资本周转，并减少了必要的流通成本，由此扩大了生产者所实现的剩余价值。

（2）货币资本和利息

资本如果取得了货币形式，变成了货币资本，就表现为资本的最纯粹形式——与一切特定的使用价值分割开来的交换价值。这里的悖论当然在于，它倘若没有进入流通、寻求利润，就无法维持自身的资本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正常流通过程要求货币资本被用于商品生产，以便创造剩余价值。这意味着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是它可以掌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然后把它们用于生产，而由此生产出来的价值会超过货币最初所代表的价值。于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就表现为货币资本自身的力量。货币资本最终成了一种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它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就是利率。

马克思评论说："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4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5页）"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50]。

这样一来，货币资本的利息与马克思所说的"企业利润"就分离开来了——后者是参与实际的商品生产所获取的回报。这种分离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个别资本家持有货币时，他们可以选择把它作为赚取利息的货币资本来投入流通，或者通

过商品生产把它直接投入流通。这项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组织本身，因为对大型项目（item）的购买——如对厂房和机器的购买——要么以货币贮藏为前提，要么以一种资本主义的储蓄与借贷体系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让原本极端不平均的投资过程变得平滑。

我们将在第 9 章和第 10 章详细讨论信用体系和货币资本的利息。这里我们只想表明，处于货币形式的资本与处于生产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差别最终会导致货币资本的利息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分离。这种区分相当于把剩余划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它们最终有可能具体表现为货币资本家与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家之间的划分。尽管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即扩大剩余价值，但在划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时，他们未必会一唱一和。

（3）土地租金

73 后面会用一章来大量谈论租金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只需要用最独断的方式来考察它。乍一看，租金在我们所描绘的资本流通中仿佛没有逻辑上的地位。作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的租金是以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的私人所有制所获得的垄断权力为基础的。然而，假如土地一般而言不是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私有制的特权所赋予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土地在农业中甚至成了一种生产资料，因为对土地的清理、改良和在土地上的劳作使它本身成了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资本流通会遇上一道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出现的壁垒。由于土地被用作生产条件或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者可以索取贡金作为回报——即占有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这道壁垒会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土地所有者的阶级权力？这取决于历史

情境。但在一切时代都存在一种权力，即以租金形式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这种权力肯定必须反映出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这些社会关系渗透到了生产过程的核心，并为生产过程的组织和形式提供了条件，不论人们是否愿意。

（4）历史视角中的分配关系和阶级关系

除了租金之外——它立足于土地私有制的垄断权力——剩余价值还分割为货币资本的利息、生产资本的利润（企业利润）和商人资本的利润，这一点隐含在三种资本循环和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三种根本形式中。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单纯是资本流通与由此导致的分配之间的逻辑关系。

例如马克思强调说，资本的所有这些形式——商人资本、货币资本和地租——都在历史上存在过，都可以追溯到现代意义上的产业资本远远没有降临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一种历史的转化过程：这些单独的、具有独立力量的资本形式如何被整合成了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不同的资本形式必须被解释成一些服从于流通过程的东西，支配这种流通过程的是剩余价值在雇佣劳动中的生产。因此，这种历史过程的形式和风格必须成为关注的焦点。

占有剩余价值所用的这些形式——它们全都隐藏了剩余价值的起源——还必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形式既以这些社会关系为前提，又维持了这些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必须修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占主导地位的 74
阶级关系的概念。虽然在作为占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的资本家之间有某种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总的资产阶级概念的基础——但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有许多差异，它们要么被解释为“派系”，要么被解

释为自主的阶级。食利者“阶级”——他们完全以货币资本的利息为生，不能混同于产业资本家——他们会组织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不能混同于推动商品流通的商人资本家或以地租为生的地主阶级。我们是否使用阶级、派系或阶层这些说法在这里并没有太大关系。问题的本质在于认识到社会关系必须依附于不同的分配形式，并由此认识到资产阶级内部必定充满了统一性与多样性。工资与利润的区分——这是一个通用的范畴——倘若没有被看作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就无法得到考察；同样，分配关系按其本质就是社会性的，不论庸人如何努力地想要用拜物教的观念来掩盖它们——仿佛货币和土地魔术般地生产出了利息和租金一样。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虽然这些分配关系以一些重要的方式进入了生产，并为生产提供了条件，但正是对生产过程本身的研究才揭示了分配的秘密。倘若装作不知道这一点，就会受制于现象世界——拜物教在这里阴云密布——而且无法“透过假象”来洞察“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

译注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3 版，第 47 页。
2. 或译密尔。
3.《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499 页。
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40 页。
5.《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41 页。
6.《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5 页。
7.《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8 页。
8.《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6 页。
9.《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40—41 页。
10.《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98 页。前半句在马克思那里并无完全对应的原文。
1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95 页。
12.《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7 页。
1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94 页。

1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15页。
1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17—619页。
1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99页。
1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99页。
18.《全集》第21卷，2003版，第207页。
19.《文集》第1卷，2009版，第729页。
20.《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9页。
21.《全集》第25卷，2001版，第24页。
2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3."生存"原文为"subsistence"，在中译本中对应于多种表述；后两个说法（"minimum costs of reproduction"，"basic needs"）则没有完全对应的原文。
2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16页。
2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37页。
2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8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7.《全集》第21卷，2003版，第208—209页。
2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15页。
29. 原文为"keep the real wage from rising"，其中的"from"疑为衍文。
30.《全集》第21卷，2003版，第211页。
3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3页。
3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页。
3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40页。
3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60页。
35. 资本的"实现"（Realisierung/realization）在特定的语境下相当于资本的"增殖"（Verwertung/valorization）。这两个词在马克思那里是交替使用的，本书则只用"实现"一词，理由见第162页注①；不过，本书引用的马克思的文本中也多次出现"realization"，我仍然遵循了中译本的表述。
3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8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7. 或译庞巴维克。
38.《全集》第30卷，1995版，第255页。
39.《全集》第30卷，1995版，第45—46页。
40."再也无法'设想'（ceases... to be 'thinkable'）"取自前引文"这样一来，（最一般的抽象）就不再只是在特定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Dann hört es auf, nur in besondrer Form gedacht werden zu können / Then it ceases to be thinkable in a particular form alone）"。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特定形式成了无法设想的东西，而是说它不再是唯一的思考方式了。
41.《文集》第10卷，2009版，第268页。
4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88—189页。
43.《全集》第32卷，1974版，第73页。后一句的句式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相同，大致相当于"各尽资本，各取剩余"。
4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85页。
4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97—198页。

4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015页。
4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37—939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87—189页。
49.《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03页。
50.《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12页。

第3章　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有一种看上去完全无害的观点：生产与消费之间、需求与 75
供给之间必须具有某种平衡或均衡。在一般的商品交换体系中，市场的首要作用表现为使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并借此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也建立这种必要的关系。可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整个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中一直是论战的焦点，这场论战不仅规模庞大，偶尔还令人生畏。这场辩论的高强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赌注太大。我们在这里不仅要面对、要迎头撞上对商业循环的解释和对资本主义短期或长期的稳定性的解释，而且要进入论战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最终能否生存。

在马克思的时代，有一个命题处于论战的中心：供给必定会创造对它自身的需求。它通常被称为萨伊法则，而且有诸多

变化微妙的版本。[1] 最简单的版本声称，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向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供给者支付的收入必须等于这些要素所生产的物品的总价格。这意味着“在生产给定的产出时所带来的收入等于这些产出的价值”，而且如果“产出的供给”增加了，就“意味着为这些产出创造需求所必需的收入也会增加”——整个结果就是“供给创造了对它自身的需求”。这条法则的一个推论是不可能有全面的生产过剩或“全面的供过于求”，因而导致危机的要么是“外生的冲击”（战争、革命、大范围的歉收等等），要么是生产的暂时比例失调。
76 一个产业或一个地理区域可能会有生产过剩，但这意味着别的地方出现了生产不足。资本和劳动的转移可以使体系达到均衡。萨伊法则所排除的是全面的供过于求。

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萨伊法则是否有效分成了两派。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当时大多数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条法则的某个版本。“关于全面的供过于求的理论家”——如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给出解释，但他们的学术声誉无法胜过他们的对手。在马尔萨斯看来，全面的供过于求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生产的有效需求。消费欲望的强度（马尔萨斯由此得出了消费者效用理论的一个原始版本）构成了驱动资本积累的根源。与李嘉图的观点相反——李嘉图认为人的欲求是无限的，节俭和储蓄是积累的根源——马尔萨斯不仅看到了消费欲望的不足给积累带来的阻碍，还看到了一个问题：“储蓄一旦越过一定的界限就会消灭利润。”

① 我在这里高度依赖索维尔（Sowell）（1972）关于萨伊法则的一份出色的研究。

马克思把萨伊法则描述为“毫无价值的空话”[1]和“幼稚的胡说”[2]，还深入批判了李嘉图的“可怜的诡辩”[3]，因为他接受了萨伊法则的一个版本——虽然马克思总体上是赞赏他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求助于萨伊的荒谬的前提：似乎资本家进行生产……是直接为了消费，为了使用价值……［而］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4]（《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68页）。李嘉图主义者“不顾对立”，只会恪守需求与供给、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因此，当面临全面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时，他们就沦落到坚持认为“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弄到危机的地步”[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0页）。

马克思在谴责马尔萨斯时也同样激烈，认为后者的分析“幼稚、庸俗和浅薄”，后者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则是“滑稽可笑的虚弱的挣扎”（《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3页）。马克思之所以用词句向马尔萨斯掷出这些雷霆，更多地是由于后者要“为英国现状辩护，为大土地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年金领取者、收税人、教会的什一税、国债、交易所经纪人、教区小吏、牧师和家仆”辩护[6]，而不是由于马尔萨斯在“全面的供过于求”这场论战中的立场。就后一方面而言，马克思肯定了马尔萨斯没有企图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尽管他揭露这些矛盾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并“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7]（第57页）。马克思对西斯蒙第的同情要深切得多，他感到后者“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矛盾”：这个体系“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西斯蒙第可以看到，

“危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这些矛盾构成了“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8]（第56、84页）。不幸的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没有多谈西斯蒙第，他的理由是“对于他的观点的批判，属于我写完这部著作以后才能着手的那一部分——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9]（第53页）。

由于马克思没有完成他的规划，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完整而连贯的危机理论；我们也无法准确地知道他准备接受“全面的供过于求”理论的哪些方面。他对萨伊法则的批判性评论和他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零星说明使得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解释成一名“消费不足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看到了供给与有效需求的不平衡，推动这种不平衡的是广大无产阶级，他们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壁垒，也是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危机的根源。这是保罗·斯威齐等人的观点。[①] 马克思本人难道不是也说过：“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0]（《资本论》第3卷，第484页）？

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1951）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似乎表明，资本积累的持续可以是不受限定、没有界限的。这似乎使马克思与萨伊法则的李嘉图版本达成了一致——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资本是不能被运用的，因为总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由生产本身设立的。

① 斯威齐（1968）；参见布里尼（Bleaney）（1976），他出色地、批判性地研究了消费不足理论的历史。

马克思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多种方式说成了消费不足主义者、关于均衡增长的理论家、关于长期而持久的停滞倾向的理论家，如此等等。[①] 他明显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即总产出的水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且总的收入分配与总产出如果达到了均衡点，就可以促进再生产、促进产出和收入的扩大，并延续多个时期；这使得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看作凯恩斯的先驱。凯恩斯本人尽管求助于马尔萨斯，忽略了西斯蒙第，却无疑将马克思列入了“隐秘的地下世界”中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使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保持了活力。凯恩斯对萨伊法则的攻击——这条法则从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传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手中——与马克思多年前发动的攻击同样猛烈。他们的攻击也有许多重合之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十分有趣——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独立得出的许多成果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1] 中的论述是一样的，而他的出发点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78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讲清楚的。除了方法论、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明显差别之外，凯恩斯本人还非常关注短期现象和政府可以推行的促进稳定的政策，马克思则远远更为关注长期的动态和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变化的发动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但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一旦被投射到长期，就会逐渐展现出某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平行的方面，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息、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商业循环的理论——尽管他对它们的阐述较为薄弱——可以同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有益的对照。此外，我们所探讨的两种理论都

① 关于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哪些不同的方式挪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奥萨恰娅（Osadchaya）（1974）做了有趣的观察。

在迅速演化，因而会有大量的相互影响。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马克思是很容易的，将凯恩斯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例”也同样很容易。①

马克思还被当成了现代增长理论的先驱。这里的传承追溯起来十分有趣。一名在20世纪20年代活动的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Feldman）试图阐发《资本论》第2卷所包含的社会再生产模型（正是这些模型使卢森堡烦恼不已）。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在某些方面预言了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在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李嘉图主义对生产的强调与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强调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多马坦率地承认了费尔德曼对他的恩惠，并强调了自己的目的是通过探寻“资本积累对短期投资、利润率、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来解决马克思和凯恩斯遗留下来的两难。他还试图证明，“存在一定的收入增长率——不论对收入的界定多么模糊——只要达到了这个增长率，就不会导致利润率的降低、投资机会的稀缺、长期的失业和其他类似的灾祸……而且就我们现在的判断来说，这个增长率并没有超出我们在物质上的可能性”。这种平衡增长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动态均衡——并不意味着它在实践中可以自
79 动达到，所以哈罗德和多马都以均衡的概念为基础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慢性的不稳定性——这也很像马克思的做法。②

① 凯恩斯（1936）只是顺便提了一下马克思，但是马克思对卡莱茨基（1971）和罗宾逊（1967；1968）的直接影响要大得多。关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参见杜梅尼尔（Duménil）（1977）、法恩（1980）、马提克（Mattick）（1969）和都留（Tsuru）（1968）。

② 奥萨恰娅（Osadchaya）（1974）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对多马的引用是从她那里来的），但还可以参见布劳格（Blaug）（1978）、埃里奇（Erlich）（1978）、屈内（Kühne）（1979）和克莱勒（Krelle）（1971）。

我概述这一切是为了表明，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因而可以被看作许多不同的、往往非常不相容的当代资产阶级理论的先驱。马克思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同样引发了不同的解释，卢森堡、鲍威尔、布哈林、格罗斯曼（Grossman）和斯威齐的著作所制定的航向是相当不同的，这些差别取决于他们给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哪一个方面——尽管这些都出自马克思本人的作品——赋予了优先地位。①

那么，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讲的？假如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论战就无处立足了。至于马克思为什么没有说清楚他的立场，我们倒是可以确立一个具有合理的确定性的答案。世界市场上的危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会在这里“集中地爆发”[13]——只有在彻底研究了竞争、信用体系、国家等问题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例如，马克思推迟了对西斯蒙第的观点的考察，因为他想要首先为理论准备好根据——他不希望在不充分的概念基础上假想一种理论。因此，他怀着最大程度的谨慎来讨论生产与消费之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谈论通常是在非常特定的语境下、在非常局限的假定下进行的。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若干片面的分析，却没有留下总体的图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著作孕育出了如此多种多样的、经常相互冲突的理论。他所寻求的综合多半要在关于世界市场和危机的著作中才会登场——这部著作永远不会面世了。我们当然完全无法准确

① 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必定会崩溃的重大辩论在本世纪[12]初造就了难以置信地喷涌出来的文献。斯威齐概述了这场辩论的许多部分，屈内（Kühne）（1979）也一样；但还可以参见卢森堡（1951）、卢森堡与布哈林（1972）、格罗斯曼（Grossman）（1977）、潘涅库克（Pannekoek）（1977）和罗斯多尔斯基（1977）。

地确定这部著作可能会是怎样的。但我们可以回顾马克思以他特有的彻底性为我们准备好的一些领地，并找到一些关于马克思行进方向的线索。

1．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对萨伊法则的批判

在《大纲》备受推崇的“导言”中，马克思以高度抽象的方式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开始了他的思考。他在那里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4]，并认为这些不同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结构上是极端复杂的。他批判了他所说的“肤浅的表象”，即“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15]。这样一种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是相当不充分的。那么，充分的阐述到底是怎样的？

马克思看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可以采取三种根本形式。第一，消费与生产可以构成直接的同一，因为生产行为需要消费原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生产与消费在这里是合而为一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它称作“生产性的消费”。同样，消费通常要求有一种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这一点对于人工服务尤其可以成立），而且这种“消费性的生产”（例如在家里准备食物）同样立足于生产与消费的一种直接的同一。生产性的消费与消费性的生产之间的区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变得重要了，因为前者完全处于生产剩余价值的领域，而后者——由于它包含了面向资产阶级的人工服务和工人在家庭中的生产活动（烹饪、洗涤等等）——可能还保持在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领域之外。

第二，马克思看到了生产与消费相互中介的关系。生产创造了消费的材料，也决定了消费的风格或方式，同时还创造了新的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由此为消费提供了动机。另一方面，消费在双重意义上生产出了生产：生产脱离了消费就会变得完全多余，而消费也为生产提供了动机，因为它可以将理想化的人类欲望展示为人的特定的欲求和需要。

第三——这也是最难掌握的一种形式——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使得“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关系性的思考方式，它在这里是以复仇的姿态来运作的。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讲述的是一种过程：生产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流向了消费过程——即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了自己”——反之亦然。这两种过程的统一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生产和消费……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但这仿佛意味着生产决定消费；为了防止误解，马克思很快补充说，“作为需要”的消费本身一旦被设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语境下，就成了生产的一个固有环节——“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并“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来“消费这个对象”[16]。在一个以分工、交换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中，再生产过程必须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我们马上就要研究这个观点的后果。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凭借这种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辩证”观点，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概念思考。它强调了价值必须按照生产与消费的根本性的统一来理解，尽管它们的分离打破了这种统一。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揭

露供给和需求的秘密，并为批判萨伊法则打下基础。让我们追随马克思的脚步走下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雷霆般地写道[17]（第1卷，第113页）："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购买与出售的关系问题放到一个普遍化的商品交换体系的语境下，而不是仅仅放在易货贸易的情境中。要建立"供给与需求"的"形而上学的均衡"，就要把流通过程还原为直接的易货贸易，而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接受的[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7页）。

商品流通意味着从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形式的不断转化。但每个 *C–M–C* 的序列都必须仅仅被看作"许多个这样的锁链"中的一环，这些锁链构成了"在无数不同地点不断结束又不断重新开始的这种运动的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因此，每一次个别的出售和购买都"作为互不相关的孤立行为而存在，它的补充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和它脱离，因此无须……直接同它衔接起来"[1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3页）。出售与购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这种分离制造了危机的可能性——但也只是可能性（《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0—513页）。正是货币让这种分离得以可能，因为一个刚刚卖完东西的人并没有立刻买东西的义务，而是可以持有货币。在打造一种对萨伊法则的直接反驳的过程中，马克思提示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危机概念：

82

［购买和出卖］是彼此分离并且可以彼此独立的。在一定

的时刻，由于对一般商品即货币……的需求大于对所有特殊商品的需求……所有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如果从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就要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在内。这里仍然必须看到，这两个因素的自在的、恰好在危机中强制地得到贯彻的统一，是与这两个因素的……分离和对立相对的。[20]（《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504—505 页）

这里宣告了马克思分析的一个重要主题。他认为："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21]；或者按照他在《资本论》中选用的说法[22]（第 3 卷，第 249 页）："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频繁地用到了均衡[23]的概念。我们应当对这一点做出具体的解释，否则他的分析就会有遭到误解的危险。例如在考察供给与需求时，马克思评论道："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任何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因此，"如果［供给与需求］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24]（《资本论》第 3 卷，第 190 页）。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有通过对这种均衡的不断丧失做出反应才能达到。

为了证明最后这个命题，马克思引述了通过竞争来实现的无休止的调整；这一点无可争议地表明"总是……有什么东

西要平衡……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同样，倘若不是“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那么“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就无法实现[2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99页）。

这一切听上去相当传统，而且的确如此。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之前的和之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由于他强调了偏离均衡的必然性和危机在恢复均衡时的关键作用。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对抗使得这个体系被迫不断远离均衡
83 状态。马克思坚持认为，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所达到的平衡只是一种偶然（《资本论》第2卷，第495页）。因此，马克思颠倒了李嘉图主义的命题——即不均衡是偶然的——并试图识别出资本主义内在的产生不均衡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就必须提出适合于这样一项任务的均衡概念。这也恰好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有必要透过需求和供给的表面现象，甚至透过生产和消费的肤浅性质，以便阐述一种与他的目的相适应的价值理论。只有在价值理论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我们才可以回到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问题，并予以详细的探讨。同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才会转向资本的问题，即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问题——毕竟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实面目。

2.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先前是从使用价值和价格的角度来考察的。我们现在将从价值的立场来考察这个关系，并将之融入剩余价值生产的语境中来理解它。

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资本被界定为一种过程——即“运
160 动中的”价值，它会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不断增殖。现在让

我们考察一下前面的图 2.1 所描绘的流通过程的结构。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考察，最简单形式的资本流通是通过三个基本阶段来完成的。在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当了买方。在第二阶段，资本家充当了生产的组织者，而在第三阶段，他是作为卖方在市场上出现的。价值在每个阶段都在物质上表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它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货币，在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过程，在第三阶段则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流通的预设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不断转换可以在不损失价值的情况下发生。这种转换不是自动的，而且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结果，这里会“产生出一些流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些地雷炸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平滑运行[26]：

>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 $M–C$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 $C'–M'$ 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27]（《资本论》第 2 卷，第 48 页）

然而这里出现了混淆，因为马克思给“流通”一词赋予了双重含义。就“资本流通”而言，我们想到的是资本在它的所有阶段中的运动，其中一个阶段就是流通的领域——一件完成的商品在交换的进程中处在市场上的时间。资本流通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来思考：剩余价值起源于生产，并通过流通得到了实现。尽管这个过程的根本环节也许是生产，但是资本倘若“不

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就不再是资本了[28]。

马克思把“资本的实现”界定为资本在它的各个阶段中的成功运动。[①] 货币资本必须通过生产来实现，生产资本必须以商品形式实现，商品则必须实现为货币。这种实现不是自动完成的，因为资本流通的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

未能实现的资本有多种叫法：“丧失价值的”（devalued）、“未能增殖的”（devalorized）[29]、“贬值的”（depreciated）[30]，乃至“被毁灭的”（destroyed）[31]。马克思——或他的译者——似乎交替地、前后不一地使用这些术语。我将以如下方式限制我本人对它们的使用。“资本的毁灭”指的是使用价值在物理上的损失。我将把“资本的贬值”这个观念的用法局限于讨论资产的货币估值的变化，这也基本符合现代的用法（由此可见，增值与贬值同等重要）。我将把“价值丧失”一词保留给包含在物质形式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遭到损失的情况，这种损失未必会对物质形式本身造成任何毁灭。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起到关键作用。马克思本人采用的一些措辞——例如“价值量的跌落”（depreciation of values）[32] 和“无形损耗”（moral depreciation）[33]——会引起混淆；他甚至对这些措辞加以引申，谈论了“劳动力价值的降低”（depreciation of labour power）[34]

① 有些翻译家和理论家喜欢用“增殖过程”（valorization process）一词来涵盖劳动过程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见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为《资本论》企鹅（Penguin）版写的导言］。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即可以清晰地区分生产中的实现过程与市场上的实现过程（还可以强调两者的关键差别），但它也有一个坏处，即让人注意不到资本在生产和交换的不同领域中的流动所必需的连续性。由于我是用生产与交换的统一来解释价值的，所以我更愿意用“实现”一词来指涉资本的无休止运动和自行扩张；至于我所谈论的是劳动过程中的实现（即增殖）、交换中的实现还是两者的统一，则要么留给上下文语境来说明，要么加上一个合适的修饰词来说明。

和作为人的“劳动者的贬值”（depreciation of the labourer）[35]。文字游戏十分有趣，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词句之间的联系上面。但若我们不能在视野中清晰地觉察到这些措辞所描述的内容，文字游戏就会造成混淆。

我限制了自己对这些术语的用法，使得“毁灭”（destruction）与“使用价值”相联系，“贬值”（depreciation）与“交换价值”相联系，“价值丧失”（devaluation）则与“价值”相联系；我希望这可以澄清马克思一些说法的含义。但若我们未能认识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表达了一种根本性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看到，资本的毁灭、贬值和价值丧失是彼此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那么这种澄清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切危机都是实现的危机，而且会导致资本的价值丧失。只要考察一下资本流通及其可能的拆分方式，就会发现这种价值丧失可以采取不同的可感知的形式：（1）闲置的货币资本；（2）没有得到利用的生产能力；（3）失业的或未能充分就业的劳动力；（4）商品的剩余（过多的库存）。

马克思在《大纲》中（第402页往后）关于这个总体上的观点讲了很多。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再次设法澄清他的论述。例如，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实现”的危机当作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没能为商品找到消费者而产生的危机。于是，实现与对商品的出售就被当成了一回事。但是马克思认为，实现所面临的障碍既存在于流通的每个阶段之内，又存在于各个阶段之间。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流通面临的这些障碍所采取的不同形式。

（1）时间结构和实现的成本

乍一看，马克思在《大纲》中建立的论述似乎略显怪异。

他提出，资本只要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作为生产过程、作为有待出售的产品、作为在商人资本家手中流通的商品、作为有待转移或使用的货币——就是“潜在地丧失价值的”[36]（第621页）。“静止地”处于这些状态中的资本有多种叫法：“被否定的”（negated）、“没有利用的”（fallow）、“闲置的”（dormant）或“被固定起来的”（fixated）[37]。例如，“当资本仍然保持成品形式的时候，它是不能作为资本活动的，所以是被否定的资本”[38]（第546页）。一旦资本恢复运动，这种“潜在的价值丧失”就得到了克服或“扬弃”[39]（第447页）。把价值丧失看作“价值实现过程的”一个必然“要素”[40]（第403页）有一个好处：它让我们得以直接看到资本全面丧失价值的可能性——即危机的可能性——并使我们远离萨伊法则所假定的同一性。只要未能使资本在生产和实现的诸多阶段中保持一定的流通速度，危机就会产生。因此，生产和实现的时间结构成了考察的关键。如果库存积压，如果货币的闲置时间超过了严格意义上的必要时间，如果较多的存货在生产时被持有了较长的时间……危机就会到来。例如，“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卖不
86 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41]（《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14页）。

但这里还涉及更多的东西。每个阶段所花的时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的损失，原因无非在于“时间白白浪费了”[42]（《大纲》，第546页）：

当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它是不能流通的，是潜在地丧失价值的。当资本停留在流通过程中的时候，它是不能生产的……当资本不能投入市场的时候，它便作为产品固定起来；当资本必须停留在市场上的时候，它便作为商品固定起

来。当资本不能和生产条件交换的时候，它便作为货币固定起来。[43]（《大纲》，第 621 页）

因此，资本家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加快资本流通的速度，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生产出来的价值的总量，并提高利润率。假如“资本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以“概念变换的速度”发生的[44]（《大纲》，第 631 页），实现所面临的障碍就可以最小化。资本的周转时间本身是一种根本性的尺度，它也指出了资本积累的某些障碍。由于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可以减少白白浪费机会的时间，所以周转时间的缩短会为进一步的积累释放资源。

资本流通也附带了某些成本。商品必须从它们的生产地点迁移到最后的终点，才能得到消费。马克思把这些物理上的迁移当作物质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见第 12 章），因而认为它们生产了价值。但他认为流通的另一些方面没有生产价值，因为它们应该被看作交易成本，支付这些成本就要扣除剩余价值，不论承担这些成本的是生产者还是专业的代理人（商人、零售商、银行家等等）。会计、仓储、营销、信息收集、广告等方面的成本都被看作必要的流通成本。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货币流通所附带的成本——银行设施、支付机制等等。马克思把这些称作流通的“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45]（必要的流通成本），因为它们是无可避免的成本，只要资本以货币和商品的形式流通，它们就必定会产生。我们在这里还必须将某些基本的国家职能包含进来，因为它们对于维持并改善流通的机制是必要的。这些必要的成本减缓了积累，因为它们必须由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来支付。节省这些成本（包括对劳动力的剥削所带来的成本）可以将资本释放出来并用于积累，

因而是增进积累的重要手段。

时间的耗费会引起一些估算损失，流通也附带了实际的成本：这些构成了资本在实现时面临的一整套障碍。因此，资本积累的驱动必定也表现为减少这些流通成本的驱动——如运输成本、交易成本、营销成本等等。移除或减少这些障碍——就像为积累而积累一样——是资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有很多机会在理论和历史的语境下重提这个观点。

（2）实现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在资本流通的每个环节或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特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在我们考察如下两种过程时依次加以研究：一是从货币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过渡，二是从这些“生产要素”到工作活动的转化——这种工作活动所生产的商品随后必须在市场上找到买方。

（a）如果资本家在市场上找不到数量和性质合适的、价格也与他们个别的生产要求相适应的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那么他们的货币就无法实现为资本。这些货币构成了一种贮藏。这种障碍仿佛不太令人生畏，因为货币是价值的一般形式，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变为其他所有商品。资本家有范围很广的可选项。倘若资本家运用了数量巨大的固定资本——它们的寿命相对较长，那么这些可选项就变窄了。为了实现固定资本的价值，资本家被迫在若干年中维持一种特定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需要特殊的投入。然而总的来看，我们无法乐观地认为所有资本家对原材料投入和对劳动力的全部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进一步讲，由于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要用于再投资，所以一些资本家——他们生产的是其他产业的生产资料——必须扩大生产，以便提前满足未来的需要，而这些

需要未必会变成现实。对劳动力需求的总扩大同样会带来一大堆问题。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会在总体的层面上出现，后面将予以考察。这里的要点是认识到困难和不确定性即使在这第一阶段——货币在这个阶段必须转变成原材料投入和劳动力——也会产生。

（b）在生产过程的范围内，资本家必须利用他们与劳动力的关系，也必须拥有技术，这种技术让他们得以维持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并把剩余价值添加进去。马克思略显讽刺地提到，资本在生产中的实现依赖于劳动者的“价值丧失”。[①] 这一点十分精当。资本家所塑造的劳动过程必须在最低限度上遵从社会平均水平，而他们施加在工人身上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强度必须足以榨取剩余价值。他们必须对抗不间断的游击式的战斗，这种战斗是与工作地的阶级斗争相伴随的；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必须对工作过程施加一种专制的控制。倘若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剩余价值没有被生产出来，最初放在资本家的口袋里的货币资本也就没有被实现为资本。竞争又向资本家提出了进一步的义务：必须与技术变革的整个过程保持同步。对工作过程的重组导致了“价值的革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单位产出的价值也下降了。无法保持同步的资本家会经历资本的价值丧失——之所以会损失资本，是因为个别的具体劳动条件不符合融合抽象劳动所需的条件。资本家显然要克服许多障碍，否则货币资本就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实现。

（c）资本家作为卖方所拥有的物质商品必须找到使用者，这些使用者愿意舍弃的交换价值要等于体现在每件商品中的价值。从具体的物质性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形

① 马加利纳（1975）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论述。

式——即货币——在原则上似乎比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变更为困难。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的确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消费的障碍。这道障碍具有两面性。首先，商品必须满足一种社会需要；它必须是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具体种类的使用价值有明显的界限——例如，一旦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成了自行车的光荣拥有者，自行车市场就会受到严格的制约，只剩下置换的需要。在面对这类市场饱和时，资本就被迫要用各种花招来刺激新的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因此，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的不断演化被看作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个方面表达了一种基本矛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46]（第148页）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着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大纲》和《资本论》中也有许多话确证了这个论点。

但从试图把商品转变为货币的资本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仅在于满足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而在于他们所找到的消费者要有充足的货币来购买其所欲求的商品。对产品的有效需求——以支付能力为后盾的需求——是唯一有意义的尺度（《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6页）。倘若不存在对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就是无用的劳动，投资在生产中的资本也就遭到了损失、丧失了价值。

89 因此，资本家在资本流通中的这一刻是最脆弱的。作为货币持有者和生产过程的主人，资本家都可以实行直接的控制。但在商品必须被交换时，资本家的命运就要取决于他人的行为——如工人、其他资本家、非生产性的消费者等等——他们都持有货币，而且必须以某些方式来花费货币，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一个重大问题就会立刻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通过生产剩余价值来无休止地扩大价值，那么总的有效需求——由此才能通过交换来实现不断扩大的价值——从何而来？

3. 有效需求问题以及分配关系与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

"社会需求"，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47]（《资本论》第3卷，第181—182页）

对有效社会需求的研究将马克思引向了如下结论：

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48]（《资本论》第3卷，第244页）

可见，在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安排与对有效需求——这些有效需求必须足以通过交换来实现商品的价值——的创造之

间有一个根本矛盾。让我们一路追随马克思来得出这个结论。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需求。这种需求对持续的资本积累而言绝不可能是“充足的需求”，因为“工人……总是只能购买社会产品中的这样一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和代表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相等”[49]（《资本论》第2卷，第348页）。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对工资品的需求是不重要的，也不是说这种需求不值得仔细审视。

从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的立场来考察，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不过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为它的用处是把剩余价值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再生产出来[50]（《资本论》第1卷，第573页）。同时，工人发现自己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处于“公司内部商店”（company store）式的关系。“例如，资本每星期支付工资；工人把这些工资花费在小店主等等那里，小店主等等直接或间接地把它存到银行家那里；下一个星期，工厂主又从银行家那里把它取回来，分发给同一些工人，如此等等。”[51]（《大纲》，第677页）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和与这种再生产相伴的消费能力受到资本流通的约束。资本家必须在总体上生产出足够的工资品，并以工资形式发放充足的可变资本，才能确保工人阶级拥有它自身的再生产所需的有效需求。可是个别资本家不断受到竞争的压力，想要压低工资、减少劳动力的价值，而生产工资品的资本家却指望劳动者成为有效需求的一种来源。所以马克思提出：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

——还有一个矛盾：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52]（《资本论》第2卷，第316页）

这个矛盾是无法通过提高工资或改变劳动力的价值来克服的。这类变化只会导致奢侈品转变成必需品——这就显示出了“社会欲求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性”[53]——当均衡“重新出现”时，“社会资本，从而货币资本，会按改变了的比例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进行分配”[54]（《资本论》第2卷，第341页；第3卷，第188页）。

虽然可变资本——它构成了劳动者的有效需求——起源于资本，但是生产工资品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的消费习惯面前很可能是脆弱的。因此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总是感到不满意”，因而他们会想尽办法（戴上资产阶级慈善和文化的面具）“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55]（《资本论》第2卷，第515—516页）。“合理”当然是联系到资本积累来界定的，同人的根本欲求和根本需要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就连劳动者——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屈服于广告商的花言巧语，而政府也介入进来——通常是以社会福利的名义——把消费集体化，以便政府有可能以符合积累的方式来管理消费（通过财政政策和政府开支）。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另一面，即无休止地把实际工资推到更低的水平。这将我们

带回了上述根本矛盾：用劳动者的需求来充当有效需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

资本家是原材料、半成品和各种生产资料的买方（这些生产资料包括生产所需的机器、建筑和各种物质基础设施），因而为这些产品带来了有效需求。他们所购买的不变资本的总价值为生产这些商品的产业的产出提供了总需求。与可变资本一样，这种对不变资本的有效需求起源于资本家。生产的扩大要求增加用于不变资本的支出和用于扩大有效需求的支出。由于技术变革会迫使可变资本的投入被不变资本的投入所代替（生产中的不变资本变得更加密集了），所以我们将目睹一场渐进的转换：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将愈发重要。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总需求在任何时刻都等于 $C+V$，总产出的价值则是 $C+V+S$。在均衡的状况下，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对 S 的需求——对已经生产出来却还没有通过交换得到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需求——从何而来。

为了给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我们首先可以考察资产阶级对奢侈品的消费。倘若需求与供给要达到平衡，资本家阶级就必须把货币投入流通，去购买恰好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等价的商品——事情必定要如此：

> 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用于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投入流通，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是请注意，资本家阶级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这个阶级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56]（《资本论》第 2 卷，第 334 页）

92

这立刻向我们表明，维持积累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整个

资本家阶级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非生产人员的消费，是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同时进行的”，而且资本家必须花费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这是他们的收益——来购买消费品[57]（《资本论》第2卷，第332页）。为了实现这一点，要么需要“资本家阶级的充分的挥霍”[58]（第410页），要么需要把资本家阶级拆分为节俭的资本家与“消费阶级”，后者“不仅是投入市场的产品的巨大排水渠，而且他们自己没有任何产品投入市场”[5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0—52页）。这些“消费阶级”代表了“为消费消费”，他们的存在是“为积累而积累”的一种镜像——后者在生产资本家那里处于主导地位。

马尔萨斯当然看到了资产阶级炫目的消费的必要性，还变本加厉地把这当作资本积累的一项充分必要条件。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的消费必须与积累保持同步，否则危机就无法避免，但他嘲笑了马尔萨斯的看法，马尔萨斯认为这样一个非生产性的消费者阶级——购买者阶级——可以成为积累的解围神（*deus ex machina*）——仿佛它既可以为牟利提供刺激，又可以通过消费来为剩余价值提供实现的手段。当然，个别资本家一般有能力一边存活得相当好，以自己的财富为生，一边等待剩余价值回到自己手中。从这个立场来看，资本家看起来仿佛的确是为了购入消费品才把货币投入流通的，而这些消费品在生产期间结束时将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支付。但这种过程若要成为总的社会过程，就会有明显的界限。既然这些财力资源并不是出自剩余价值，我们就必须考察它们最初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将我们引到了如下这种同义反复的边缘：实现剩余价值所需的财力资源出自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我们最终必须穿透这个同义反复，找出它背后的真相。

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主导地

位的分配条件给剩余价值在交换中的实现树立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远远比存在于生产领域本身的障碍更为苛刻。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60]（《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22—525页）他接着写道："因为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所以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61] 生产过剩——商品的供过于求——"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
93 度……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即工人阶级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总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6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35页）。

为了走出这个困境，一种可能的办法是扩大与非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部门之间的商业关系。这正是卢森堡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解答，这个解答促使她在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来进行的地理扩张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大多数篇幅中都排除了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考察，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领了一切产业部门"[63]（《资本论》第1卷，第581页）。但在《大纲》中（第407—409页），马克思并没有那么拘束。他在那里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因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64]。这将马克思引向了一个普遍的命题，它既适用于地理上的扩散，又适用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不断加深的影响：

资本……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5]

资本有能力为生活方式带来这些革命性的转化，并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关于全面供过于求的理论家并不了解这种能力。从这个立场出发，马克思总结说："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66]（《大纲》，第410页）李嘉图未能了解的是，对旧的障碍不间断的、无可抗拒的破坏和在世界范围内对需要的革命性转化"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67]（《资本论》第2卷，第468页）。

资本积累无可避免地导致了非资本主义部门——包括在远方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会遭到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吸收；马克思虽然接受这个观点，却特地否认了这可以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他简单地认为，解决方案必定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当中，否则就无处可寻。① 94

于是，马克思转而考察了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可能解答。"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

①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追随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见后面第12章。

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68]（《大纲》，第407页）实现剩余价值所需的额外有效需求也许可以简单地来自货币量的扩大——要么直接通过货币商品的生产，如黄金的生产，要么间接通过信用体系。

乍一看，这样一种解答似乎有些道理。对货币的分析表明，货币量的不足会严重阻碍商品流通。在货币不足的状况下，一旦货币的供给增加了，我们往往就会观察到资本积累的加速。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做出一个缺乏依据的推论：货币供给的扩大总能导致积累，原因在于这种做法为产品提供了原本不存在的有效需求。马克思尽管承认信用体系的组织是维系积累的必要条件（见后面第9章），却告诫我们“对于信用制度……的生产力……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69]（《资本论》第2卷，第346页）。但我们仍然会受到一种诱惑，即以为额外的有效需求的来源是信用体系本身。进一步讲，从资本的货币循环 $M–C–(M+\Delta M)$ 的立场来看，仿佛在每次周转的终点都需要更多的货币，才能使 ΔM——利润——得到容纳。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会受到一种诱惑，即接受货币主义幻觉的一个版本：有效需求的问题仿佛可以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大来解决。虽然马克思提出，黄金的生产者所创造的货币的确比他们在生产中预付的货币更多（因为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直接作为货币被投入流通的），但他完全拒绝认为这可以为有效需求的问题提供解答。由于货币是一种流通成本，而不是生产活动的成本，所以依靠货币的生产者来提供额外的有效需求会导致资本不再被用于生产剩余价值，却转而被用于吸收作为流通成本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趋势是力图通过信用体系来节省流通成本，而信用体系显示了求助于货币商品的生产者，把他们作为有效需求的来源是徒劳的。

驱散信用体系周围的“神秘的观念”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将在第 9 章和第 10 章进行详细的考察，但我们最终会发现类似的论点是成立的。 95

然而，马克思是联系到资本的商品循环和生产循环来考察货币的作用的，由此才能向货币主义的幻觉打出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在给定的流通速度下所需要的货币量（加上储备存量所需要的不论多少货币）是与正在流通的商品的总价值相关的。从这个立场来看，“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什么都不会改变”[70]。货币存量也许需要置换或增加，以便顺应交换的扩大，但这与剩余价值在交换中的实现并没有直接关系（《资本论》第 2 卷，第 473 页）。

对剩余价值实现的货币方面所做的这番研究似乎走进了死路。但是恰当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线索，让我们找到对有效需求问题唯一可能的解答。例如，货币主义的幻觉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混淆了货币总量与作为资本来发挥职能的货币总量。通过把不变的货币存量更多地转变为资本，货币资本就可以增加。马克思由此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只有将更多的货币转变成资本，才能提供在交换中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有效需求。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对该问题简单甚至略显惊人的答案。

货币必须在有可能转变成资本之前就存在。进一步讲，与流通中的商品量相对而言的货币不足的确会给积累造成阻碍。但是货币的创造决不能保证把它转变为资本。这种转变关系到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的创造，这种“虚拟资本”是一种作为资本被投入流通的货币，但它在商品中或在生产活动中没有任何物质基础。这种虚拟资本——我们将在第 9 章详细考察它的形成过程——总是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原因恰好

在于它没有物质基础。但这又为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力量：在寻求物质基础时，它可以同体现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相交换。在交换领域中存在的实现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这个解答意味着要创造新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现在必须在生产中得到实现。于是，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回到了生产领域，而马克思当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处于这个领域。对交换中的实现问题的解答转变成了通过在生产中剥削劳动力来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社会必要性，但我们现在是从对实现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流动当中——的研究中推导出这种必要性的。

% 在《资本论》第1卷的题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一章里——这个标题意味深长——马克思首次确立了“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必要性，前提是这里的社会关系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与这一章平行的是《资本论》第2卷的题为“剩余价值的流通”的一章，马克思在那里试探性地从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中推导出了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由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只有通过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才能达到。

然而，无休止的积累依赖于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存在。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的地理扩张应该被解释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寻。资本主义关系渗透了经济体的所有部门，劳动力的各种“潜在”来源（例如女性和儿童）也被发动起来了——这些现象的基础是相似的。于是，我们逐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它是一种无休止地发动革命的生产方式，既要按照一种社会必要性不停地运作以从内部转化它自身，又要

不停地挤压社会世界和物理世界维持它的能力。这当然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资本主义首先会遇到外在的障碍，因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并不具有无限的能力[71]（《资本论》第1卷，第507页）。而且它还会遇到“资本本身的性质上的限制”[72]（《大纲》，第410页）——这些正是马克思试图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现在的成就是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解释了一个观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73]（《大纲》，第99页）他把价值的观念重新打造成了一个必须对这个总体内部的关系加以把握的概念。就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他论述了每一方如何“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并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并向我们说明了当“分配走进生产与消费之间”时必定会发生什么[74]（《大纲》，第94页）。

但是马克思也向我们证明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这架旋转木马不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甚至不是一台润滑良好的机器。他向我们说明了一种必要的关系，它在生产与分配之间、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在消费与新的资本的形成之间，以及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必然处于主导地位。他还识别出了若要达到均衡就必须成立的一整套必要条件——特别是与货币的创造和信用工具相关的必要条件。

但他还向我们证明，在实践中是否能找到这个均衡点是无法保证的。我们最好的期望就是“偶然”达到这种平衡。最 97
坏的期望——这是马克思逐渐要向我们说明的——则是一些强大的力量会驱使体系远离均衡，或者说为积累而积累的体系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不稳定的。随后就会出现危机，它是对抗不均衡、使生产与消费恢复平衡的唯一有效手段。然而，这

些危机会导致资本的价值丧失、贬值和毁灭。忍受这种过程决不会让人舒适——特别是因为它还会导致劳动者的价值丧失、贬值和毁灭。

译注

1.《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62 页。
2.《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70 页。
3.《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600 页。
4.《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32 页。
5.《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67—568 页。
6.《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50—51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56—57 页。
8.《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55、86—87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9.《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52 页。
10.《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48 页。
11. 中译本见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 1997 版。
12. 指 20 世纪。
13.《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605 页。
14.《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40 页。
15.《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0 页。
16.《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4—35 页。
1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8.《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492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9.《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488 页。
20.《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72—573 页。
21.《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77 页。
22.《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77 页。
23. 即“Gleichgewicht/equilibrium”。我之所以把它译作“均衡”而非马克思的著作的中译本所用的“平衡”，一方面是由于本书中出现了“balanced equilibrium growth”等说法，因而如果将“balance”译作“平衡”，“equilibrium”就最好换一个译法；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个概念在后来的经济学中至关重要，而且一般译作“均衡”，所以换成这个译法似乎比较合适。
2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11 页。
25.《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29 页。
26.《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109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7.《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63 页。
28.《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93 页。
29. 这个词在马克思著作的多种英译本中都无法找到。

30. 不妨趁此机会说明两点。第一，“贬值”（Entwertung/depreciation）是与“增值”（Wertsteigerung/appreciation）相对的，“增殖”（Verwertung/valorization）则是另一个概念，指资本对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但本书主要用“实现”（realization）一词来表达这一点，见第 162 页注①。第二，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丧失”（devaluation）有时写作“Wert zu verlieren”，但是往往写作“Entwertung”，与“贬值”完全相同。中译本和英译本都试图在不同的语境下采用合适的译法，但是两者的判断往往并不一致。我在本书中当然以哈维引用的英译本为准。
31. 马克思的著作的中译本有时也将这个词译作“消灭”“破坏”等等，我统一改成了“毁灭”。
32.《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63 页。
3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65 页；第 46 卷，2003 版，第 129 页。
34.《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38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5. 这个说法在马克思著作的多种英译本中都无法找到。
36.《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8 页。
37. 这四个词均见于《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7—8 页，当然也零星地出现在别处。
38.《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545 页。
39.《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438 页。
40.《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82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1.《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83 页。
42.《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545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3.《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8 页。
44.《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19 页。
45.《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22 页。
46.《全集》第 3 卷，1995 版，第 34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02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8.《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72—273 页。
49.《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85 页。
5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61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1.《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72 页。
52.《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50 页脚注。
5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09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4.《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77 页脚注。
55.《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581 页。
56.《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69—370 页。
57.《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67 页。
58.《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456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9.《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48 页。
60.《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92 页。
61.《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95 页。
62.《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605—606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70 页脚注。

6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7—388页。
65.《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90页。
66.《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91页。
6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525页。
68.《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7页。
69.《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83页。
70.《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68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80页。
7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90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40页。
7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4页。后一句引文在马克思那里没有找到。

第4章　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资本论》第 1 卷，第 372 页） 98

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所有误解中，最离奇的一种也许就是把他视为一名技术决定论者。[①] 他并没有将技术变革看作推动历

① 胡克（Hook）（1933）很久以前就试图清除这种解释，但在近些年里它又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复兴。至今最有力的论述是科恩（Cohen）（1978）所提出的：在解释生产力在马克思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首要地位时，他接受了“技术”这个称呼，却不接受“决定论者”这个称呼。科恩的著作尽管对澄清马克思的许多观点有极大的帮助，却也显示出了一旦按照“20 世纪分析哲学独有的清晰和严格的标准”（第 ix 页）来解释马克思，会产生何种后果。按照科恩的说法，马克思把生产力界定为“对象的属性”，而不是对象之间所具有的关系（第 28 页）。生产力的清单包括劳动力（及其所有性质）和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原材料和空间）。科恩分析了马克思的说法，并发现虽然马克思在无数场合都断定生产力的变化会（转下页）

史的力量。对他的论述的这种误解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的用词被给予了当代的含义，同时也是由于他的研究方法未能得到理解。例如按照现在广为接受的界定，技术意味着运用科学知识来创造生产、交换、交往和消费所需的物理硬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指的含义既更为宽广，又更为狭窄。

当马克思说到“技术”的时候，他指的是实际的劳动过程在给定的情形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者说特定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所用的可以观察到的方法。这种技术可以直接从许多角度来描述：劳动者使用的用具和机器、生产过程在物理上的设计、劳动的技术分工、对劳动力的实际运用（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性质）、协作水平、指挥链和权威的等级制，以及所使用的协调和控制特定方法。

于是，任务就在于穿透这个表面现象，并理解特定的劳动过程为什么采取了某些具体的技术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从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这

（接上页）造成社会关系的变化，但“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他都没有从普遍的角度来主张所谓的反作用”（第 138 页）。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是不成立的，因而生产力的首要地位就得到了确立。唯一令人怀疑的地方是马克思说过，正是资产阶级使改变社会关系的生产力变得革命化了。科恩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莫大的刺激”，但为了让这一点与关于生产力的首要地位的论点相容，他断定“资本主义关系的职能是促进生产力的增长——这些关系只要易于做到这一点，就会出现并保持下去”。

就马克思最初对生产力的界定而言，科恩的描述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与“使用价值”一样，这个初始的概念自身并不会让马克思很感兴趣。与使用价值一样，生产力也只有被理解为具体地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社会关系，才会被重新整合到马克思的论述当中。然而，科恩固守初始的界定，未能看出马克思转化了这个术语的用法。《资本论》论述的整个流程恰好适合于阐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辩证的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即矛盾所在，而矛盾会把资本主义无休止地推向新的格局。分析哲学也许善于分析句子，却明显不太善于把握论述的整个流程。

两个角度考察了劳动过程。[①] 马克思的“生产力”指的不外是转化自然的能力。他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什么生产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后果。这些都是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它们的含义。接下来的许多讨论都立足于对它们的恰当解释。它们会被用来阐明生产中的矛盾，就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重性为揭露商品交换的矛盾提供了概念上的杠杆一样。这个平行关系是贴切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最初被当作同一个物质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就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同一件商品的两个方面一样。商品的交换价值有一个外在的指示物，这个指示物具有货币的形态；社会生产关系也有一个外在的指示物，这个指示物具有阶级关系的形式，这些阶级关系主导了整个社会，并渗透了交换、分配和消费，就像它们渗透了生产一样。正如使用价值作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被重新整合进了政治经济学一样，生产力的观念——它本来纯粹是物质性的——也作为通过物质商品的生产来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被重新整合进了政治经济学。鉴于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小心前进，才能确定它们的含义。

我们首先要消除一个常见的产生困惑的源头。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是错误的，也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误解的根源——这种误解将他变成了一名技术决定论者。技术是劳动过程的物质形式，劳动背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通过这种过程来表达的。把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就如同把货币——价值的物质形式——等同于价值本身，或者如同把具体劳动等同于抽象劳

① 瑟伯恩（Therborn）（1976，第356—386页）以非常缜密的方式重构了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整个学术发展中的演变。

动。但正如对货币的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价值的本质一样，对实际的技术的分析也可以“揭示”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这正是本章开头的那段引文所包含的意思。

对现有技术的分析可能是一种有用的（而且必要的）初步研究。但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方法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大纲》，第100—107页）。他是从尽量简单的抽象开始的——这些抽象取自“现实生活关系”[2]——然后建立了比较丰富的、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体系，以便“一步一步地接近”人的活动“在社会表面上”所采取的具体形式[3]（《资本论》第3卷，第25页）。他宣称，只有用这种“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解释我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现象——商品生产、货币和交换、具体的技术形式、危机等等[4]（《资本论》第1卷，第372页）。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和他对“现实生活关系”的关注促使他专注于劳动过程，把劳动过程作为研究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他写道：“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资本论》第1卷，第184页）什么能比这更为根本呢？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是以辩证的方式来看待的。“人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被看作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区别，因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7页）。这种语言非常像黑格尔，但是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并没有脱

离这个立场。[①] 然而，他的焦点转向了研究统一体内部的区别： 101

>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8]（《资本论》第 1 卷，第 177 页）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生产力”的概念处于最简单也最容易理解的形式：它代表了通过人类劳动来转化自然并占有自然的能力。各种劳动工具的使用可以增强这种能力，而这些劳动工具与土地本身一起构成了生产资料，也构成了生产劳动的必要基础（《资本论》第 1 卷，第 180—181 页）。然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社会的产物，“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9]（《资本论》第 1 卷，第 512 页）。劳动过程所用的实际的技术是由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塑造的，而且必然反映了人们在根本性的生产任务中相互联合、彼此协作时的社会关系。劳动生产力是无法脱离这些社会关系来测定的。

进一步讲，工作过程对人的欲求和需要而言既是工具性的，又是目的性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

① 施密特（Schmidt）（1971）给出了一份全面的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7]。正如史密斯（Smith）（1980）所表明的那样，施密特的错误是把自然界定为使用价值的领域，却忘记了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按照“生产出来的自然”这种形式来生产的使用价值（即建成环境，这是一种被人类行为所改变的物理景观）。这种生产出来的自然具有商品形式，因而必须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角度来看待。在这些情况下，自然就不再能被看作完全外在于人类生存、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东西了。我们将在第 8 章和第 11 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0]（《资本论》第1卷，第178页）。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可以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它们可以在物质对象中“对象化”，也可以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变成现实。因此，生产活动包含了一定的关于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也是社会的产物。每种生产方式都演化出了一种特定的科学，一种与它特有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马克思大量谈论了资本主义如何试图把“自然科学”与“生产过程”统一起来，以及一种原则——“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
102 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如何成了“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原则[11]（《资本论》第1卷，第387、461页）。他甚至评论了发明本身如何变成了一桩生意，新的科学认识的产生又如何必定会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的动态当中（《大纲》，第704—705页）。①

可见，劳动过程最初被看作生产力、社会关系与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的统一。这个统一体内部的区别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于它决定了我们会对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技术、任何劳动过程提出怎样的问题。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名挖掘沟渠的人。我们可以描述神经和肌肉的功能，也许还可以衡量挖掘者身体能量的耗费。我们同样可以描述自然的性质（挖掘大地的难易程度）和劳动工具（铲子或推土机）。我们可以按照每小时的工作挖掘了多少英尺的沟渠来衡量劳动生产率。但我们倘若局限于这种直接的物理上的描述，就会错过许多重要的东西。实际上，马克

① 诺博（Noble）（1977）详细探讨了工程科学、技术创新与合作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在内战之后的美国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博纳尔（J. D. Bernal）（1969）的著作依旧是一部经典，可以弥补诺博的著作仍然具有的缺陷。

思会把生产率的尺度视为一种没有意义的抽象。为了恰当地解释这种活动，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有什么目的，它是何种有意识的设计的一部分，以及在这种活动及其结果中体现了何种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我们还必须知道相关的社会关系。做这项工作的是奴隶、雇佣劳动者、工匠、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人、参与到宗教仪式当中的宗教狂热者，还是爱好高强度身体锻炼的富裕领主？同样的物理行为可以具有无限多种社会意义。我们对实际活动的解释不能脱离对它们的社会目的的某种理解。我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为生产率提出一个有意义的尺度。马克思将按照这条思路大量谈论一个观点：同人的欲求和需要相关的生产率大大有别于同创造剩余价值相关的生产率。最后，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了社会意义和社会目的之后，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某些技术，而不是别的技术；为什么某些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比其他观念有优势。最终要紧的是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与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它们都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劳动过程中得到了表达。

由此可见，假如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没有发生彻底的结构转换，生产力的革命就无法完成。不过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变化的推动力就在劳动过程自身的本质中——“当他……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2]（《资本论》第 1 卷，第 177 页）。因此，工作的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关系（辩证关系）处于发展过程的核心。如果将这个过程普遍化，把它作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就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13]（《哲学的贫困》，第 109 页）。

为了更加准确地解剖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劳动过程的统一体内部的区别。例如，倘若一定种类的生产体系的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协作没有出现，或者倘若转化自然的社会能力和社会欲望与可用的生产资料不匹配，那会发生什么？如果生产者渴望得到的成果与生产这种成果所需要的对生产过程的科学认识不匹配，会发生什么？生产力、社会关系与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之间有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对立和对抗。然而，谈论可能性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当中确立这些矛盾的必然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克思试图做的是后者。

他的总体论述是以如下方式进展的。为了生产和再生产，人们被迫发展出社会关系，并力争用符合这些社会关系，也符合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方式来占有自然。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必定会与自然产生新的关系，还会产生新的知识和新的社会关系。强有力的社会束缚也许可以使社会停留在相对静止的状态——马克思把这些状态称作“前历史”。但这些社会束缚一旦被打破（不论通过何种手段），均衡就会丧失，相互矛盾的力量就会登场。生产力、社会关系与关于世界的精神观念之间的矛盾成了张力的首要来源。无休止的克服矛盾的斗争成了历史的推动力。

人类历史的轨迹就是由这些力量支配的，这种总体上的解释可以被用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资本家永不满足地追求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无休止革命。但这些革命所创造的条件与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并不一致。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危机倾向。虽然每次危机也许都可以通过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彻底的结构转换来解决，但是冲突的根本源头从来不会被消除。新的矛盾出现了，它们所引发的危机也具有愈发全面的形式。

唯一能最终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案是消除它们的源头，从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以这种方式来做这番论述大概无法说服任何人。它的用处在于它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第一，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把生产力的变化孕育出来的社会关系，还特别促使我们面对这些变化的阶级基础。第二，我们遇到了一种挑战：必须说明在转化自然的能力发生革命时，这些革命的步伐、形式和方向究竟是否能与稳定的、平衡的增长相一致。倘若并非如此，我们不就可以借此从根本上解释资本主义明显周期性的危机吗？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试图回答这些宏大的问题。但我们需要首先更为仔细地限制我们的概念工具，使它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采取的具体历史形式。

1. 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生产率

我们最初也许会受到一种诱惑，即从纯粹物质性的角度来看待劳动生产率，并以如下方式来衡量它：在某种标准化的时期内，一名劳动者使用某些生产工具能把多少原材料转化成指定数额的成品或半成品。马克思要向这样一种观点开战。[①] 它未能区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还假定资本家对使用价值的生产感兴趣，而不是一般而言对价值的生产感兴趣、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感兴趣。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对劳动生产率的界定：

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

① 布劳格（Blaug）（1968，第231页）指责马克思“骇人听闻地混淆了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但这种混淆与其说出自马克思，不如说出自布劳格对马克思的关系性论述方式所做的错误解释。

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14]（《资本论》第 1 卷，第 509 页）

马克思接着补充了一个颇为隐秘的说法："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这种对生产率的价值界定为马克思提供了打倒庸俗经济学家强有力的工具。"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永恒……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15]（《剩余价值理论》第 1 册，第 393 页）

凭借这种价值生产率的概念而非物质生产率的概念，马克思还可以反驳一种常见的观点：资本本身仿佛出于某种原因是生产性的。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由机器体系的应用所带来的提高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属性，乃至资本的一种产物。资本"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16]（《资本论》第 3 卷，第 827 页）。但这种现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代表了资本家对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加以占有的能力，这种占有使得后者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剩余价值理论》第 1 册，第 389—391 页）。之所以会如此，只是由于特定的阶级关系在生产中具有主导地位，而这些关系只有在大致由资本规定的条件下才会使劳动者有机会获得生产资料。

马克思关于生产率的价值界定也带来了困难。例如，它

催生了一场漫长的、略显单调的辩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什么差别。[①] 由于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被视为"生产"劳动，所以诸多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在服务业和流通领域）最终被描述为"非生产"劳动，无论它们可能具有何种社会必要性。马克思论述的要点是承接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所讨论的劳动者分类，并把这种单纯的分类转换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术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想要走得更远。他肯定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更为详尽的分类，仿佛职业可以分为生产性的一组和非生产性的一组——这样做恰好会使辩论回到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所界定的领地上，而马克思恰好试图把辩论挪出这片领地。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不外是说，对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劳动的任何界定都必须联系到剩余价值的实际生产过程来理解。如果我们拓宽了我们关于这种过程的视角——例如从劳动过程的内部向外拓展，把资本流通的总过程包含进来——那么对生产劳动的界定也会拓宽。"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7]（《资本论》第1卷，第509页）

重要的是劳动者的集体生产率，而不是个人生产率——这 106
个观点会影响我们对生产力的看法。劳动者在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时相互关联、彼此支援，这些做法显然会对他们的集体生

① 倘若有兴趣追随这场辩论，就应该参考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3章）、高夫（Gough）（1972）、亨特（Hunt）（1979）、奥康纳（O'Connor）（1975）和多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1973—1975）。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大量法语文献：见贝尔图（Berthoud）（1974）、弗雷斯内（Freyssenet）（1971；1977）和纳赫斯（Nagels）（1974）。一些作者——比如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还认为，工人阶级的某些派系在主观意识状况方面的差异源自生产性的工人与非生产性的工人的不同地位，因而使这场辩论获得了额外的意义。

产率产生作用。效率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所有劳资关系专家都知道的。资本家的两难在于他要把协作的积极力量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动起来，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发动所凭借的机制必定会被评判为强制性的机制。职务充实（job enrichment）、合作[18]、工人管理整合等策略似乎是专门为了掩盖支配与服从的基本关系而设计的，这种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必然具有主导地位。然而，这要求我们考察阶级斗争在劳动过程本身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2. 劳动过程

《资本论》第一卷最扣人心弦的方面之一是马克思如何从尽量深刻而简单的抽象（如价值）极为流畅地切换到对历史的反思——这段历史包含了与工作日和机械化相关的斗争——进而切换到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在政治上的后果。尽管这部著作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写成的，但它的成就就其本身来看有可能带来某些误导。从他的总体规划语境来看——即使只按照《资本论》另外两卷的阐述——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第1卷所建立的历史与理论的联系并不成熟，对政治后果的推导也太过匆忙。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未必有错。对历史的解释和政治行动都不能等待理论的完善，而这种完善本身只有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的无休止检验才会出现。但是《资本论》第1卷是一份极为诱人的文件，因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当成了最后的定论，尽管它应该被看作一次不寻常的，却只是初步的尝试：它展示了理论、对历史的解释与政治行动的战略是如何彼此规定、相互关联的。

就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的本质而言，马克思论述的争议性在当代的辩论中立刻变得明显了。这场辩论十分重要，

因为劳动过程对于任何生产方式中的工作都是根本性的。倘若马克思描绘它的方式是错的，几乎所有别的讨论也就必须受到质疑。自从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年出版《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以来，这场辩论已经具有了更高的紧迫性和更明确的方向。除了葛兰西（1971）关于“福特主义”让人着迷的论文之外，布雷弗曼的作品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劳动过程在二十世纪的变化进行讨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后来的著作既质疑了马克思原本的观点，也质疑了布雷弗曼对它的延伸。

马克思是围绕“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与“实际上的从属”之间的区分来组织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19]（《资本论》第1卷，第510页）。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形式上的从属”就足够了；一旦劳动者被迫为了生存而出售劳动力，这种从属就会出现。劳动过程如过去一样进行，只不过引入了“统治和从属的经济关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关系，是由于资本家“天然地”（naturally）应该指导并监督劳动者的活动，而且是由于劳动倾向于变得远远更为连续、更有强度，“因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产品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不如说，更少的劳动时间）”[20]（《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25页）。通过交换中的竞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逐渐被当作劳动过程的调节器，尽管劳动者仍旧可以实质性地控制自己的传统技能和自己采用的方法。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并没有发生。唯一相关的强制也只是由于劳动者为了生存而出售劳动力的必要性才出现的。

当资本家开始重组劳动过程本身，以便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出现了。于是，整个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产生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上与此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1]（《结果》，第 1025 页）。换句话说，在一般而言的资本主义当中具有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现在通过对生产力的重组渗透到了劳动过程内部。

资本家所发动的力量出自协作和细致的分工，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则为资本家带来了利润。工人越来越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22]，并越来越服从于资本家及其代表所进行的“专制”[23]控制。社会关系的一种等级制的、权威主义的结构在工作地点出现了。工作方法也许一如既往，但是劳动者在具体任务中的专业化可能会使得这些任务被大大简化，从而可以由没有多少知识和技能的工人来执行。“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24]（《资本论》第 1 卷，第 361 页）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区分，但是生产的技术基础又需要维持劳动力的等级制和劳动技能的等级制，还需要保留工资的差异（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并没有完成）。在这些情形下，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是由于对现有的工作过程的重组，却未必需要资本家进行任何重大投资——尽管可能需要建造新的房屋和建筑，因为协作通常意味着把诸多过程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第 320、355 页）。

资本主义引入了机器体系，又引入了工厂体系这种组织，由此克服了手工业“狭隘的技术基础”[25]。于是，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虽然这的确意味着资本家要主动投资，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机器可以被用来提高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同时还让资本家得以通过调节机器的速度来控制工作过程的强度和节奏。于是，工人成了机器单纯的“附属物”[26]——机器的奴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手艺和工匠技能的消亡以及单纯的看管机器的技能对它们的取代、女

性和儿童的就业——所有这些后果都出现了。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贫困化与劳动过程强加到工人身上的退化有很大关系，后者甚至比低工资和高剥削率更为重要。随着资本家对机器体系的使用，“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27]（《资本论》第 1 卷，第 506 页）

资本家阶级肯定必须对劳动者施加暴力，才能榨取剩余价值；这种暴力最为明显地表现为与自然的关系的退化，劳动过程就是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也激起了对它本身的回应。工人采取了个别的暴力行动、破坏行动——各种各样的工业病理学（industrial pathology）——也针对机器体系的使用和滥用采取了集体的反抗形式。这种暴力反抗所引发的社会斗争在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工业化的国家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中构成了一个核心主题。但是马克思似乎坚持认为，长期来看，工人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形式在工作过程内部进行的反抗必定会败给资本家所能调集的压倒性力量。孤立的反抗形式只能拖延无可避免的事件。只有一种基础广泛的革命运动才可以使劳动者重新获得原本几乎肯定要失去的东西。

不过，这整个过程也不是没有代价和矛盾。任务的程序化要求精巧的管理技能、规划技能和技术性的技能（工程技能）。这造成了一种新的等级秩序（马克思很少关注这一点，尽管它蕴含在维持协作的必要性当中，也蕴含在工厂体系内的细致分工当中）。工人也逐渐不再关心他们所执行的特定任务，而是随时可以适应无论什么新技术，还能够自由地从一条生产线调换到另一条。这些适应能力——它们通常要求会识字、会算数、能够迅速听从指令并使任务程序化——以一些重要

的方式抵消了劳动的退化倾向。这样一种技能虽然与传统的手艺人技能非常不同，却意味着一种新的工人被创造出来了："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28](《资本论》第1卷，第488页)资本将工人从他们的传统技能中"解放"出来，因而同时为工人带来了一种新的、特别的自由。

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到"技能"一词的含义如何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一方面，传统的手艺技能和工匠技能会使拥有它的人获得一定的权力，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垄断性的。这些技能是资本的死敌。它们可能会充当资本积累所面临的障碍（工资率对于它们的稀缺性十分敏感），还可能会阻碍资本主义支配与服从的社会关系在生产中的渗透。如果资本主义要延续，这些技能就必须被消灭。另一方面，新技能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也十分重要：这些技能不仅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具备可替代性——它们是非垄断性的。马克思所谈论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29]往往意味着垄断性的技能直接转变为非垄断性的技能。但前一种技能决不会完全消失。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设计师等人的技能往往成了垄断性的技能。因此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技能所附带的垄断权力是否会通过一个独特的资产阶级派系（即管理者和科学家）的形成而被完全吸收为资本的权力；或者说，它们是否可以被把握为劳工集体权力的一部分。

布雷弗曼（1974）在一部内容丰富、扣人心弦的著作中更新了马克思的叙述，还试图说明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走入"垄断阶段"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用几段话来探讨一种非常巧妙的论述是很困难的。然而在布雷弗曼看来，最为重要的是科学的管理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它们是资本的两个"从垄

断资本主义当中生长出来、并使它成为可能”的方面。两者对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和劳动过程所采取的形式有深远的影响。科学的管理（泰罗主义）导致了用于规划的脑力劳动与用于执行的体力劳动之间的系统性分离，并使后者碎片化、简单化，以至就连一头“受过训练的大猩猩”也能应付。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动让资本能够近乎任意地对生产力进行有组织的革命。它加剧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而且只要与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就能确保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会从工人手中转移到管理层手中——“这种转移在历史上呈现为生产过程在工人面前的持续异化”（布雷弗曼，1974，第57—58页）。这确保了“随着手艺的衰落，工人会沦落到一般的、无差别的劳动力的水平，广泛适应于各种任务；随着科学的成长，科学却会在管理层手中积聚起来”（布雷弗曼，1974，第120—121页）。广大工人的这种“去技能化”（de-skilling）在飞速进展，而且随着资本获得了对劳动过程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完整的控制权，劳动就“在生活中越来越对应于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所运用的抽象”——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完成了（布雷弗曼，1974，第182页）。前面提出的问题（第57—61页）得到了解决。

对资本来说，实质性的问题只剩下一个了：改变工人的习惯并与他们和解——他们是有现实的愿望和思虑的活人，不会听任工作的退化和传统技能的消亡。管理层的策略明显从对工作的控制变成了通过劳资关系项目来控制工人，设计这些项目是为了提高工作满意度、减少异化的感受等等；布雷弗曼把这种变化解释为泰罗主义策略的延伸和深化——这些策略企图渗透到工人自身的心理构造当中。但这种解释也必须被放入它的语境。布雷弗曼最出众的贡献是他设法将两个现象关联起来

了：其一，垄断资本主义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工业的工作过程进行了转化；其二，生活的所有方面在20世纪都经历了转变（布雷弗曼，1974，第271页）。

例如，他说明了生产之外的领域是如何被同样的趋势所影响的。规划和控制的劳动有许多都变得程序化了，因而资本主义为新的技能形式所创造的机会往往都被丢弃了。一种劳动如果涉及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信息流通等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活动也变得更加重要了——就同样会退化、去技能化（de-skilled），许多行政工作也是如此。但是布雷弗曼并没有止步于办公室工作。他把自己的论述推到了社区、推到了家庭生活的核心，在这里他说明了性别分工、家庭组织等问题的深远后果。正如布洛维所说的那样，他讨论了

> 社会生活的商品化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和随之而来的工作的退化——这种退化是在规划与执行的分离中表现出来的。就像癌的成长一样，商品化和退化的鬼怪仿佛具有自身的动力……在社会生活的整个组织结构向它屈服之前，它是不会停息的。对具体原因的关注——为什么这个鬼怪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出现在当前而不是今后——就历史的广阔范围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布洛维，1978，第295—296页）

布雷弗曼的著作尽管得到了普遍的赞扬，被当成了一项重大贡献，却也引发了一阵批评和评论的风暴。由于布雷弗曼的论述明确地植根于马克思的论述，一场广泛的辩论就发生了：布雷弗曼或马克思或他们两人是否充分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这场讨论是高度微妙的，往往还富有个人特

色。一些人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所界定的大致框架中找到了更为严格、更为准确的学说；另一些人并不反对马克思，却反对布雷弗曼将马克思延伸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情境当中；还有一些人对两者都表示了强烈的批评。我在这里绝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这场辩论。接下来我将对一些批评——它们同时针对了马克思和布雷弗曼——进行拼图式的描述。[①]

批判者指控他们两人犯下了诸多罪责。布雷弗曼和马克思尽管对工人充满同情和关怀，却都把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当作受资本的意志支配的、服从这种意志的对象。他们没有看到，工人作为活人被赋予了意识和意志，能够在车间里说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偏好，能够（在对他们合适的时候）做到适应和妥协，但在必要时也可以随时对资本发动持续不断的战争，以便保护自己在生产中的权利。于是，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被还原成了一桩过渡性的事务，只具有相对较小的重要性，而且完全忽视了“工人的反抗作为一种力量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顺应工人而发生变化”[②]。按照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错误描述，在价值规律的运行面前、在支配了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的规则面前，技术性变革和组织性变革是无可避免的回应，但是工人在车间里发动的斗争其实影响了资本主义历史

① 在以这种方式构造批评的拼图时，我完全明白自己没有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不过我也没有完全公平地对待布雷弗曼和马克思。艾尔加（Elger）（1979）概述并评论了关于这场辩论的大量文件，还提供了一份广泛的参考书目。我的拼图也非常倚重布洛维（1978；1979）、爱德华兹（1979）、弗里德曼（Friedman）（1977a；1977b）和帕尔默（1975）。我在这张拼图中还大量利用了《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的特刊（1978，第8卷，第3—4期）、《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特刊（1976，第28卷，第3期）和刊登在《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第3卷，第3期）上的研讨会文章，其中包含了埃尔鲍姆（Elbaum）等人十分重要的开场陈述和拉佐尼克、蔡特林（Zeitlin）等人详细的文章。

② 弗里德曼（1977a；1977b）在这一点上特别强硬。

的进程。[①] 如果用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技巧来恰当地重构这段历史，它所讲述的故事就会大大有别于马克思或布雷弗曼所给出的故事。他们两人将理论建构强加到了历史现实之上，从而扭曲了历史。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拉佐尼克（Lazonick）（1979，第258—259页）说，马克思“误导性地描绘了自动骡子的后果……因为他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只要劳动服从资本，技术就无所不能”［尤其是接受了尤尔（Ure）和拜比吉（Babbage）所拥护的意识形态］。同样，帕尔默、爱德华兹和布洛维把布雷弗曼看作泰罗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宣称，现实的历史表明工人阶级在车间里击败了泰罗主义，并迫使资本家寻找新的、（对于劳动）更加可以接受的控制手段。[②] 资本家之所以不得不妥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人阶级在车间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且是由于新的生产过程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发动反击的力量，还增强了破坏和扰乱的能力——因为这些过程恰好是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依赖的。因此，资本家不得不“制造共识”，并诱使工人进行自愿的合作。[③] 最终的结果是：工作地点中的“争夺的地带”转化成了“妥协的地带”。[④] 资本与劳动的合作涉及劳动过程所采取的形式［职务充实（job enrichment）方案、“责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等等］，也涉及对职位和工资结构的界定（这种结构具有等级秩序，因而可以为工人在企

① 爱德华兹（1979）在《争夺的地带》（Contested Terrain）一书中采纳了这一点，把它作为他的基本主题。

② 帕尔默（1975）、爱德华兹（1979）和布洛维（1978）都讲到了这一点。

③ 布洛维的一份仔细的研究——《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1979）——试图讲述这个观点，而且十分出色。

④ 这些措辞取自爱德华兹（1979）和埃尔鲍姆等（1979）。

业内部，甚至在职业生涯中提供职位的机动性）；这种合作成了当今的风尚，而且逐渐取代了车间里的对抗和冲突。

这些批评可能是毁灭性的。它们不仅挑战了马克思为历史解释和理论解释所制定的基本思路，而且挑战了马克思革命政治的基础本身。[①] 这些批评的提出是严肃的，对它们的记述有时也十分仔细。因此，我们不能漫不经心地撇开它们。针对它们来构造捍卫马克思的观点也有一种好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意思的阐释更清晰，并在某些方面纠正这种阐释。

这种指责——马克思把工人当作“对象”——在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马克思的观点恰好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对世界的直接主观经验来理解世界，而且工人阶级对自己的潜力和力量的想象倘若脱离了真正的唯物主义科学成果，就会受到严重损害。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不是要否认工人的主观经验的有效性，也不是说工人对资本的回应所具有的十足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是不值得评论或不值得研究的。对工人的一些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如何立足的，发明了哪些“游戏”来让劳动过程可以忍受，通过哪些特殊形式的情谊和竞争来相互关联，通过哪些策略——包括合作、对抗和巧妙的躲避——来对付掌

① 例如爱德华兹（1979）认为，职位的等级秩序和工资结构在大公司的“官僚主义”控制之下得到了延续和加强（他断然区分了这种体系与泰罗主义中的“技术性的”控制），从而使工人阶级变得碎片化了，而不是变得同质化了。工人的个体和群体通过对抗与妥协的某种混合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他们当中比较有特权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往往拥有传统的手艺技能）可以赢得他们想要的许多东西（工资和退休金、就业保障、岗位责任等等）。在寡占的状况下，资本也拥有做出这些让步的余地。美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真正的革命性，很可能也不会有；马克思为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吹响了号角，人们却必定置若罔闻。左翼仅有的政治战略是保护由多年的阶级斗争千辛万苦地建立起来的“妥协的地带”（特别是在政治舞台上），并力图通过社会民主的方法、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尽可能地延伸这片地带。对这条思路的尖锐批评可以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1979年12月）中的两篇对爱德华兹著作的书评中找到。

握权威的人，以及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投入的愿望和道德感。同样十分重要的是理解工人如何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如何创造了一些制度并把别的制度化为己用，以及如何建立了自我防卫的组织。

但是马克思试图理解的是工人被迫要在什么东西面前立足，要针对什么东西进行自我防卫；马克思要研究的是无时无刻不在侵犯他们的明显的力量。工人到底为什么必须应付新技术、工作的加速、裁员、“去技能化”（deskilling）、工作地点的权威主义、市场上的通货膨胀等等？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针对资本通过商品生产所进行的流通和积累来构造一种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表明，工人从资本的立场来看的确是对象，是单纯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可变形式——这个要素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这种理论仿佛向工人举起了一面镜子，其中显示了他们自己异化的客观条件，还揭露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他们的历史是由什么力量支配的。建构这种理论所用的技巧超出了对主观经验的简单复述，这也确实是马克思最醒目的成就。

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无可置疑的启示力量，却不能单凭自身就保证无产阶级会把它作为一种行动指南来加以吸收。要锻造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毕竟不能诉诸理论。这种意识深深地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组织结构本身，尤其植根于工作经验。可是马克思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特有的拜物教会同时在资本家和工人面前掩盖剩余价值在剥削中的起源。因此，关于劳动过程的直接主观经验所引出的结论不一定与马克思所表达的结论相同——这种现象的原因恰好已经被马克思本人看破了。不过，主观经验无论如何都是现实的。所以，日常经验的教训与理论的教导之间可能会存在差距——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家决不会舍不得利用并加深这个差距。马克思本人极其强烈地拥护理论的启示力量，因而非同一般地倾向于否认经验的本真性（我们的头脑中立刻会跳出“虚假的意识”这个倒霉的范畴）。进一步讲，有些社会主义者用主观主义和异想天开来编织乌托邦的蛛网，而马克思对他们怀有深重的、毫不妥协的敌意，这使他愈发难以在自己的思想中创造一个空间，让工人阶级主观的、活泼的经验在其中发挥恰当的作用。结果，他无法解决政治意识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十分有趣——布雷弗曼同样认为避开这个问题是明智的。[①]

可是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是不会走开的。它困扰了一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弗罗姆（Fromm）、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等人——他们试图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以便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非革命性。但可以公平地说，工人的两重性——他们既是“资本的对象”，又是“创造性的、活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实际上，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摩擦。一些学者——如史诗般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作者汤普森——主要把劳动者作为创造性的主体来讨论；他们经常发现自己遭到斥责和冷落，被当作“道德主义者”和“空想家”，与他们对立的是一些更有理论头脑的同仁，后者主要关注的似乎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科学的完整性和严格性。汤普森谴责后者“武断地分离了‘生产方式’与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一切”——

① 布雷弗曼（1974，第27页）；布洛维（1978）在打造他对布雷弗曼的批判时极为直接地聚焦于这一点。

从而只是一种自我确证的“理论性的实践”，“最终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却为一切东西作辩护”。更具体地讲，他嘲笑了“关于‘劳动过程’的权威”，认为他们“从来不觉得他们显赫的理论与如下研究相关：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关于‘严守安息日（sabbatarianism）的用处’的著作、我关于‘时间与工作纪律’的著作、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关于‘流浪的工匠’的著作，以及整整一代（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劳动史学家’（这个群体往往被人怀着嘲笑撇在一边）关于工效研究（time-and-motion study）、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的著作”。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批判者毫不意外地从汤普森的著作中汲取了许多力量。[①]

115 那么，倘若我们让工人得以重新成为“创造性的主体”，我们的理论又将如何？汤普森是相当明确的。他写道：“与一些理论性的实践者的观点相反，历史学家从来不知道有哪个工人会让人把剩余价值从他的藏身之处拿走，却不去寻找某种反击的办法（怠工的办法有的是）；而且悖谬的是，通过他的反击，趋势就被扭转了，‘发展的形式’本身也会以预料之外的方式来发展。”（1978，第345—346页）我们在这里抵达了问题的根本：阶级斗争和工人的反抗在改变和引导劳动过程的演化本身时起了什么作用？作为创造性的主体——从而会反抗资本的劫掠——工人是否能由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自己历史的创作者？他们是否能更改技术变革的形式，管理控制和权威的制度体系，工作的组织、强度和速度以及投资和再投资的模式，由此更改资本积累本身的方向、步伐和内容？

① 汤普森（1978，第347—354页）。汤普森与安德森（Anderson）（1980）围绕这种两重性展开了辩论；如果以正确的态度来解读这场辩论，就会产生某种希望：有可能通过新的、远远更为有力的表述来调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直接的经验会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理论则似乎指向另一个方向。我们有可能调和这两者吗?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导说，资本主义是按照一种无休止的、无情的命令来运行的：使生产力革命化（生产力是从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角度来理解的）。我们已经论证了这是一个抽象的命题，可以参考技术变革的细节来加以具体的描绘。[①] 马克思和布雷弗曼在这里也许都会被判有罪，因为他们过于轻率地从这个抽象过渡到了非常具体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策略。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车间里发生的事情，就可以表明工人的反抗与管理层所奉还的压力之间的交错是一桩非常错综复杂的事务，它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强制、笼络与整合巧妙地混合起来，构成了管理层的策略，并在工人那边遇到了同样巧妙的回应——既有反抗，又有合作。正如弗里德曼（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意识到了镇压的局限性和生产过程中工人自治的局限性。双方的策略倘若走到极限，似乎都不是完全可行的，所以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几乎无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种在两者之间波动的平衡。[②]

但这一切有什么意味？首先毋庸置疑，它是说我们若要理解工人的政治意识，就必须仔细考察上述过程是如何运行的。但这一点本身并没有就资本积累的步伐、方向和内容说出什么特别 116
的东西。技术、组织和权威的具体形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可能会有重大差异，只要这些差异不挑战积累过程就行。赚取

① 许多人试图使马克思的解释更加严密，其中有一些是极其有用的；例如参见布莱顿劳动过程小组（Brighton Labour Process Group）（1977）和帕卢瓦（Palloix）（1976）。艾尔加（Elger）（1979）的评论也非常值得参考，原因不仅在于它所包含的信息，还在于它所拥护的立场。

② 弗里德曼（1977a；1977b）和布洛维（1978；1979）都比较仔细地探讨了这种过程。

利润的办法显然比给猫剥皮的办法更多。倘若劳动的价值生产率通过工人自治的某种合理水平可以得到更好的确保，那就听其自然。资本多半不关心劳动的价值生产率是如何保持、如何增进的。生产力这个抽象的概念所把握的正是这种漠不关心。

对马克思而言，他的焦点主要是资本的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它可以适应它所处的各种不同情境——这些情境包含了“自然的”和“人性的”巨大的多样性。例如，资本的机动性、厂房的关闭、“工厂外逃”（runaway shops），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减少尽管会带来威胁，却又是对劳工加以规训的强大力量。资本的这些适应性并不是没有代价和内在矛盾，但从长期来看，马克思的预言是工人的反抗必定会在这些巨大的适应能力面前屈服。在这一切背后进行引导的力量则是利润率在竞争中平均化的倾向。在某处发生了高贵的背水一战，在另一处则出现了特定的反抗——这些斗争也许对于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均发展十分重要（例如，为什么英国的工业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所具有的广阔范围来评判，它们就逐渐丧失了意义、变得无关紧要了。

恰好就资本的一般的适应能力而言，特别是就竞争过程而言，马克思的批判者陷入了最可怕的纠纷。一方面，弗里德曼、埃尔鲍姆等人似乎想要否认竞争对于生产力的持续革命是一种有效的指导命令，以便用生产中的阶级斗争来取代它。[①] 他们仿佛在以最有教益的方式走入劳动过程之后，就忘记了外面的

① 埃尔鲍姆等（1979，第228—229页）认为，竞争分割了资本家，从而制约了资本家用新技术来对工人的力量进行削弱的能力。我们在后面第3节会讨论关系到技术变革，竞争与阶级斗争是如何相互交错的。（We take up the manner in which competition and class struggle intersect in relation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section III below.）

整个世界：竞争性的定价、减少投资和再投资、货币资本的机动性等等。马克思把这些描述为交换中的价值规律与生产中的价值规律彼此之间的规训作用，而这一点完全被忽视了。布洛维自己虽然大量谈论了车间斗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意义，却被迫重新提到竞争，以便解释这些斗争本身为什么没有给劳动过程带来变化。这样一来，他就提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经常隐含在其他这类著作中："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它的救世主。"（1979，第178—179、195页）

十分有趣的是，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可以将车间里的斗争放入恰当的视角。就像与工资率相关的经济主义斗争那样（见前面第2章），车间里的斗争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无休止的游击战的一部分。工人会对资本在技术变革方面的权势施加限制，但是管理层所奉还的压力同样会妨碍任何现实的运动走向真正的工人自治和自行管理。工人的战斗性与管理层所奉还的压力相互拉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趋势："一种长期的、单向的变化被引入了劳动过程。"车间斗争的循环式动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轨迹中的长期变化的均衡器（布洛维，1979，第178页）。从这个立场来看，这些斗争的确必须被看作摩擦性的、过渡性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它们在政治上或在意识形态上不重要。它们可以为更加广阔、更加宏大的政治斗争提供基础，尽管拜物教必定会环绕在它们周围，因而关于它们的经验无法自动转换为政治意识更为普遍的状态。[①]

这类斗争对资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对于体系是一种无休止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出于一个基础性

① 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响应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经济主义的"工会"意识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意识之间的差别。

的、非常根本的原因，它们也有助于稳定事态。持续加速的技术变革对于资本可能具有超乎寻常的破坏力——我们将看到，这是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让我们想象一个每天夜里技术都会变化的社会！）工人的反抗可以制约技术变革的脚步，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竞争制定一条底线，从而可以有助于使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稳定下来。这里有一片“妥协的地带”，资本尽管会犹豫，但或许还是愿意在这片地带上经营。在非常相似的意义上，资本家逐渐看到了调节工作日可以带来的利益，因为不这样做所产生的社会代价已经变得清晰可见了；所以他们也许会逐渐认识到，就技术变革的步伐和方向而言，与劳工进行具有制度化形式的谈判是有利的。资本的问题是避免工作过程中不必要的干扰，并使技术变革达到一种与持续的资本积累相一致的步伐和格局。资本在这一点上未必会成功，而且我们将看到，有一些活跃的力量会使这个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难以成功。但是资本家肯定意识到了潜伏在不受制约的技术变革背后的巨大危险，而且几乎肯定会逐渐将与劳工在车间里的谈判当作一揽子控制手段的一部分——其他手段还包括垄
118 断和国家调节——这些手段会把技术变革限制在某种资本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这个立场来看，他们由于工人的战斗性而受到的温和制约也许会被看作一种帮助。问题当然在于，工人的要求并不总是以温和而著称的；到了一定的地步，资本就必须用它所能调集的一切力量和权力来进行反扑。[①]

于是，我们面前还剩下一个有些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和布雷

① 我认为，布洛维（1979）所发现的管理层与劳工之间广泛存在的合作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当合作双方中的一方掌握了比另一方（归根到底）大得多的权力时，合作的自愿性质可能就要受到合理的质疑。我在读到另一些报道时——嫌疑犯与当局“合作”调查某件犯罪——也会感到几分类似的怀疑。

弗曼都指出，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是由于技术分工、机械化、自动化和科学的管理而出现的。进一步讲，“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演化倾向于创造一种同质的工业无产阶级；由于‘传统’技能和‘前工业’技能的消亡，他们一同服从资本，并将从中发现他们的统一性”。埃尔鲍姆等宣称，这种观点过于简单了。

> 不论生产的技术结构是什么，资本家可能都需要把等级制的分工作为管理方式。在决定这些等级制的结构时，工人的战略群体所发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斗争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能消灭一切“传统”群体——如手艺人乃至外包工人（outworkers）——而且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的关联（尤其是手艺人与不太熟练的工人之间关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从技术变革中出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埃尔鲍姆等，1979，第228—229页）

这里涉及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对劳动过程演化的各种描述在历史上的真实性，又包括政治策略、意识形态、阶级意识等等。但就我们眼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假如劳动过程在历史中的演化并没有走向这样一种还原，我们对一种以这样的还原已经发生为前提的价值理论又能抱有怎样的信任？当然，劳动史学家现在给出的叙述表明，就算这种还原确实发生了，它的过程也走了一条极其曲折而迂回的道路。[①] 我们发现自己被迫要再次反思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

① 蒙哥马利（Montgomery）（1979）、斯通（Stone）（1974）和蔡特林（Zeitlin）（1979）提供了一些出色的例证。

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

119 我们首先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化。首先，管理层所造成的等级制与基于技术的等级制之间的分离在原则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两者的作用都是发动劳动生产力，以便创造剩余价值。其次，马克思毫无疑问并不认为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会使得劳动大军的同质化达到一种任何技能都不复存在的程度。这种还原指的是垄断性的技能的消亡和灵活的技能模式的创造，后者让劳动者的替换变得相对容易了。之后依然存在的技能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如此多种简单的抽象劳动的原因。最后，我们必须回想一下，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还原本身与工资的差异化模式没有直接关系，这种模式建立在生产成本或“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30]（《资本论》第1卷，第197页）的基础之上。由于工资体系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所以它的特征就是包含各种各样的扭曲和反常——例如，计件工资有可能使劳动者的报酬产生实质性的差别，由此给“个性”提供了“较大的活动场所……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31]（《资本论》第1卷，第555页）。马克思无疑没有精细地考察工资决定过程的细节或它的等级秩序。但这不过是因为事情的这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不是非常重要。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有一个本质性的尺度，即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易于再生产、易于替换的技能。所有证据都表明这就是资本主义一直以来的运动方向，在这儿是实质性的反抗，在那儿是数不清的袖珍反抗。只要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仍然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正处于越发趋近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价值规律的进程

中。[①] 至少从这个立场来看，对马克思或布雷弗曼基本的论述思路提出质疑似乎并没有多少依据。

3. 资本主义之下的技术变革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整个历史中都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展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活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困难在于对这种活力的解释需要把它的起源定位在社会中，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的力量，仿佛它本身具有自主的活力。[②] 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马克思作为分析家和批判家都发挥出了最强的力量。他宽泛地把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和组织上的活力归结为一场绝望的斗争，资本发动这场斗争是为了使阶级再生产的条件——这些条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稳定下来。他衡量了这个过程的界限，并探讨了它的矛盾。他打造了一种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理论。他之所以呼吁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需要纠正一些重大的不合理性，导致这些不合理性的是生产力的增长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基础的社会关系之间迅速激化的矛盾。

在着手考察推动技术变革的社会关系的格局时，我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令人困惑的、纵横交错的潮流，它们彼此碰撞的方式十分有趣。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在较低的程度上——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如果要评判对这种竞争的回应，就不能脱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核

① 我们应当做一个说明：竞争的完全性对于纯粹的价值关系在交换领域中的实现同样至关重要，但这种完全性从来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即使——我们将在第5章看到这一点——竞争的完全性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② 马加利纳（1975）出色地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视角。后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希尔彻（Heertje）（1977）。

心分歧，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标志。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家可能会如何回应竞争的加剧。他们可以（1）降低工资率；（2）以更高的强度来使用现有的生产体系；（3）向新的生产体系投资；（4）节省不变资本的投入（让老机器运转更长的时间、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在市场上寻找更为廉价的原材料等等）；（5）找出更有效率的“要素组合”和替代品；（6）改变生产的社会组织（如职位结构、指挥链），以便寻求更有效率的管理；（7）要求工人合作，并要求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保住他们的职位；（8）拿出新的营销策略（产品的差异化、广告等等）；（9）改变地理区位（见第12章）。通过这些回应中的一种，或者通过它们的某种组合，个别资本家就可以期望维持或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选择何种策略取决于环境、可能性和管理层的爱好。在这些状况下，技术变革的进程似乎是很难预料的。

但是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竞争会把资本主义推向生产力的持续革命，不论使用何种手段，也不论是何种类型的革命。资本家在交换领域相互竞争。每个资本家都有可能改变他本人的生产过程，由此使它变得比社会平均水平更有效率。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来源。一旦竞争对手追赶上来，原来的创新者就有充分的动力再次向前跳跃，以便保持他们之
121 前收获的相对剩余价值。有事业心的、有想象力的和个人主义的企业家当然在这里得到了大量机会——在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中，这种令人鼓舞的、高贵的个人不仅极为重要，而且极其频繁地被描述为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活力的唯一根源。[①]

① 在可敬的学者圈子里，熊彼特（1934；1939）大概是这个观点最不加掩饰的拥护者。

竞争的社会后果当然是强行以不断蛙跳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条件当然是市场要保持竞争性——不论任何特定的企业家有怎样的意志。这只会带来一个问题：这样一种过程的界限在哪里？

但是资本家还有高度的相互依赖，而且相互依赖的程度会随着分工的扩大而增加。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变得重要了：

>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32]（《资本论》第1卷，第383—384页）

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乘数效应仿佛是没有尽头的。首先，在一个垂直整合的生产体系的各个阶段中，生产力的任何不平衡的发展都会给投入和产出的平滑流动——从尚未加工的原材料到成品的流动——带来问题。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技术结构如何能恰到好处地使这样一种过程变得均衡。总体上的溢出效应——从一个领域向别的领域溢出——同样很可能以不平衡

的发展和螺旋上升的副作用为标志。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些减
122 少了流通成本和流通时间的技术变革。由于分工扩大了，市场
资本的限度 上的相互作用也变得更为复杂了，所以这些成本倾向于上涨，要求它们下降的压力也会加重。从物质性的立场来看，这里所指的压力是要降低商品迁移所需的成本和时间，还要节省批发、零售和推销的成本。一些创新——电报、电话、无线电、电传等等——也变得迫切了，因为它们会影响货币流通可以具有的速度（如信用体系），从而会影响有可能收集并传播的信息。就连家庭也不能置身事外：为了使生产出来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得到吸收，最终消费所包含的技术必须与这项要求保持同步。

在一定的时刻，个别公司和个别产业之间，乃至整个部门和整个区域之间很有可能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出现巨大的不平均。但是技术状况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每一处的技术状况都可以通过多种相互作用来界定别处的技术状况。探寻这些影响是极端困难的。实际上，由于相互作用极为广泛，后果也极为宽广，所以技术变革仿佛具备了自主的活力，完全脱离了它在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的起源。技术变革可以被“物神化”（fetishized）为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引导资本主义历史的外生力量。人们可以极为有力地认定技术变革是必要的、无可避免的，因而对技术变革的追求——体现在盛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中——成了一个自在的目的。

这一切指明了技术变革没有尽头的、持续加速的螺旋上升，激发它的是竞争，维持它的方式则是在经济活动不断相互整合的领域中回荡的乘数效应。在这些情况下，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技术上的活力，而是它的活力受到了
216 极大的削弱和控制。这个事实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在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中出现的障碍。资本本身所树立的障碍与持续加速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趋向是相反的，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障碍。

任何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都会造成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前者包括用于新的厂房和设备的支出、重新训练劳动力大军的成本以及实施这些变革所需的其他直接的成本。后者包括管理层对新的工艺或新的权威体系缺乏经验，工人由于不习惯一些方法，或者由于认为它们会贬低自己的地位而进行反抗乃至破坏，在岗位上学习会损失时间，再加上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没有包含在最初的计算中的外部效应。任何公司都必须联系到现有的和预期的竞争状况来权衡变革的代价与利益。由于许多成本和利益是未知的，竞争的状况也向来难以预料，所以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爱好作为一个中介要素登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资产阶级解释者同样大量谈论了这一点。

然而，首要的潜在成本是过早地回收尚未完全摊销的固定资本所附带的成本。机器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有在一段时期之后才能被收回。生产力的革命——只要新的设备（更加廉价、更有效率）走进市场——可能会在这里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迫使生产者蒙受重大损失。至于这会将我们带进怎样的领地，我们将在第 8 章进行详细的探讨。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一种讽刺：尽管固定资本本身是为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运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它一旦安装完毕，就成了进一步创新的障碍。因此资本构成了其自身内部自我活力的障碍。

技术变革可能造成的干扰在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整个体系中到处都有迹可循。重大的变革很难得到吸收，因而可能会给体系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发展倘若变得过于不平均，就会孕育出比例失调的危机，例如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与消费

品的生产能力之间的比例失调所带来的危机。撇开危机的规训作用不谈，另一些力量的运作也有助于缓和技术变革任意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干涉，把这种干涉变成一种往往相当精致的生产与实现的平衡体系。倘若创新会将产出提高到体系无法吸收的水平，个别公司自然就不愿意加以采用。公司一旦意识到了运输和通信的瓶颈或市场容量的瓶颈，就会放慢对竞争性的技术变革的推进，并满足于平均利润而非超额利润。由于竞争的最终结果总是某种程度的垄断，所以为了控制技术变革的总体步伐而实行的策略也包括了垄断行为。此外，这一组强劲的潜在控制手段——它们抑制了技术进步的持续加速倾向——还包括国家的主动参与，即借助专利法、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等等。我们将在第 5 章讨论这些问题。

这正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所面临的障碍。它们被用来使变革的步伐保持在资本认为合理的边界之内，因而有助于使一种原本不稳定的，从而十分危险的过程变得均衡。一旦走到极端，这些障碍就充当了资本积累本身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必须被克服，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技术变革的道路从来不是完全平坦的，但是调节它的力量必须具有相当精致的平衡，否则就无法确保资本积累的平稳延续。

如果我们在这幅图景中引入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使这样一种精致的平衡得到维持的一些机制就会变得更为明显。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力的价值倘若从物质性的角度被设定为
124 一种不变的生活水平，就会随着雇佣劳动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但起反作用的力量也会设法确保劳工在生产出来的总价值中获得一个“均衡份额”。倘若劳工的所得大于它的份额，工资也超过了价值，从而威胁到了资本积累，那么引进技术的压力——这些技术可以节省劳动力并引起失业——

就会加重。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可以压低工资，并抑制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力量，因而在面对劳动供给不断变化的状况时，这就成了确保持续积累的关键手法。技术同样可以在车间里或在谈判桌上被用来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马克思认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例如，蒸汽机“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实际上，“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33]（《资本论》第1卷，第435—436页）。资本主义竞争的动力似乎再次指向了对劳工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完全摧毁。

但也有起反作用的倾向在运作——这些倾向为竞争制定了一条底线，从而有助于调节技术变革的步伐。例如，固定资本是否会得到运用取决于“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差额”。鉴于劳动力的价格量在国际上的差别，所以毫不意外，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而英国这个“机器国家”却同时被描述为“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这里的原因可以用相当残忍的方式来说明：“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34]（《资本论》第1卷，第392—394页）当产业后备军变得庞大时，资本就有充分的动力回到劳动密集型的工艺（因而在当代，血汗工厂甚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复兴）。在慢性的劳工过剩时期，对形式较为复杂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刺激肯定会被淡化。

我们还论证了车间里的阶级斗争起到了一种重要作用：它

是达到均衡的手段。这些斗争有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被用来抑制技术变革危险的加速（例如，新技术在引进时需要某种程度的
125 工人合作）。车间里无休止的游击战对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又可以起到消极作用。

但这里的确切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确定，资本积累的命令始终处于幕后。问题在于，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实际形式极为繁多，调节它们的力量也相互交织，因而我们无法轻易地把它们区分开来。虽然技术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全面。毋庸置疑，竞争、相互依赖以及资本与劳动的阶级斗争构成了这里的分析的枢纽。但是相互作用和乘数效应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把新的科学知识直接生产出来所带来的后果也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

这意味着马克思的阐述有一处严重的空白。这是一个缺口，但我们必须正确地解释它的含义。倘若一种特定的劳动过程所包含的技术最终表达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正如马克思经常断言的那样，那么充分理解前者就依赖于全面地阐明后者。因此，对技术的理解必须被看作马克思未曾完成的那条研究思路的最终产物。

不过，我们倘若一开始没有为技术确定某种概念，就根本无法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是通过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抽象概念——它们体现在劳动过程的具体的物质性当中——来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由此就可以从实际技术变革的具体细节中进行抽离出来，仅仅论证生产力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但对这一点更加深刻的理解只有在接下来的研究进程中才会出现，对价值规律本身的理解也是如此。马克思试图证明，生产力的革命最终恰好是与孕育了这些革命的社会关系相对抗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矛

盾就在这里：那就是生产力的演化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对这个普遍命题的证明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们必须首先看一下他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前进了多远，然后设法通过批判性的评价来把他的论述推到极限。

4. 资本的技术构成、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困难的问题：生产力无休止的革命对资本本身具有怎样的影响。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定资本家所采用的具体技术（马克思的这个术语在广义上还包括所有组织特性）忠实地表达了生产力的根本格局。我们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价值，即假定一切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易的（价格反映了价值）。这些假定会让我们的讨论获得更大程度的普遍性，还会让我们得以更加自由地谈论根本性的力量所具有的潜在的具体作用，并使这番谈论在历史经验中拥有普遍化的潜力。我们从先前的说明中应该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设定具有试探的性质，由此得出的一般结论也具有假设的性质。

一种特定的技术状况最初是与劳动力的一定的物质生产率相联系的。这种物质生产率是用不同的、不可比较的单位来衡量的——每个劳动者每小时可以织多少码布、制作多少双鞋、生产多少吨钢铁等等。马克思把这些比例称作“资本的技术构成”。如果将这些比例还原为共同的价值基础，它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期间所运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来表达。比例 c/v 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在一些情况下，比例 $c/(v+s)$ 是一个更好的尺度，因为它更加精确地把握了过去的“死”劳动（资本家所拥有的一切类型的生产资料）与新的、由“活劳动”添加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于是，不同的产业和部门就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资本价值构成来相互

比较了。不变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展现出了较高的价值构成，运用了大量活劳动的产业则位于价值构成的标尺的另一端。

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必须如何求助于技术变革，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意味着资本的技术构成会无休止地改变。下一步就是说明技术构成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价值构成。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引入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他说：这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35]（《资本论》第1卷，第612页）。这个说明直接意味着价值构成变化的原因也有可能与技术构成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有了三个对于接下来的论述十分关键的概念。不幸的是，就资本的技术构成、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的关系而言，马克思的思想中有大量的混乱——后续的文献则有相当巨大的混乱。例如，价值构成与有机构成的区分看上去非常重要。可是在某些地方，我们发现马克思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似乎又强调说应该把这两个术语区别开来。用法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在相对较晚的时候
127 才得出了这些概念，因而未能对它们进行恰当的加工。例如，有机构成的概念只是随着《资本论》第1卷的第三次印刷才出现的——这个概念多半预示了未完成的第3卷中将要提出的观点。不管怎样，这里有相当多的混乱，必须予以清理。①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个观点：价值构成可以由于技术构成的变化之外的原因而改变。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和舍尔比利埃

① 我所持的立场大致类似于法恩与哈里斯（1979）所提出的立场，但我特别受惠于杜梅尼尔（Duménil）（1975；1977）关于这个主题振奋人心的观点。更有数学头脑的学者——如罗默（1977；1978）——现在也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献，但至今最有教益的著作来自冯·魏茨泽克（von Weizsäcker）（1977）。罗宾逊（1978）也不出意外地做出了充满活力的贡献，不可轻易忽视。

时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275—289 页；第 3 册，第 382—396 页），价值构成有可能独立于调节有机构成的力量而改变，也的确会这样改变。在《资本论》关于“绝对地租”的那一章里（第 3 卷，第 766 页），他甚至走得更远：“有机构成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价值构成的百分比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处于有机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从而可以表示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36] 由于在一种生产过程中多半只有一种价值比例可以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个相当不同寻常的说法使我们陷入了某种窘境：如何对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的关系做出确切的解释？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之后就不能将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当作相等的术语了（很多文献经常都是那样做的）。

马克思明显想要将“有机构成”这个术语保留给一家企业内部影响资本价值构成的技术转变。这个标签为价值构成的变动标识出了一种特殊的*来源*。这样一种标识的意义在于：一家企业内部的技术搭配大体上是由个别资本家控制的，他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这个搭配，也的确会这样做，才能不停息地追逐剩余价值，而这要么是为了对竞争做出回应，要么是由于担心阶级斗争的状况。这样一种过程的动态可以独立于生产中投入品的成本波动来理解。

但是价值构成也可以由于个别资本家无法控制的诸多因素而改变。调节价值构成的外部力量具有不同的起源，但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它们分成两组。第一，我们应该考察一些“偶然的、巧合的”力量，它们会影响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投入品的价值。这些力量有很多，包括气候的“意外”（不论它们是否由人的行为所引起）、对贸易的干扰、战争、为了寻找更“有生产力的”资源而对地球表面进行的系统性勘探等等；所有这

些都会影响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我们必须考察多种相互作用和乘数效应，它们会把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它为另一个部门生产的投入品的价值联系起来。这些相互作用虽然起源于工作过程内部，却不受个别资本家控制。换句话说，一种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价值构成十分关键地取决于为这种生产过程生产投入品的企业家所采用的技术的状况。

企业的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这种对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试图用价值构成与有机构成的区分来把握的观点。个别资本家按照经济形势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并选择各自的技术。但他们是在市场的环境中经营的，投入品的价值在这里是由任何个人都无法控制的力量来规定的，尽管企业家关于技术所做的个别选择具有系统性的乘数效应。马克思最终试图证明，个人所做的看似合理的个别选择会威胁到资本积累的基础，从而威胁到资本家阶级的存活本身。马克思试图通过价值构成与有机构成这对概念来把握的正是这个矛盾。

《资本论》第 1 卷是从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别企业家的立场来考察生产的。只有在公司内部能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技术创新得到了考察。马克思虽然提到了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却基本忽略了这些效应可能会给投入品的价值比例造成的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可变资本——生产工资品的产业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劳动力价值的降低被视为资本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个首要来源。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的叙述中的所谓“节省劳动的偏见”。但由于专注于公司内部的技术变革，马克思就可以总结说：劳动的物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价值构成的上升成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倾向。这个观点强有力地出现在《资本论》第 3 卷中[37]（第 212 页）：

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同数工人或同量劳动力，会在同一时间内推动、加工、生产地消费掉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机器和各种固定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也就是价值量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一回事。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

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在马克思的论述 129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对此进行仔细的考察。马克思所说的是公司内部的技术创新会导致“死”劳动相对于“活”劳动的比例倾向于上升。但他并没有向我们证明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更加深入地探究他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最终没有将自己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误解中完全解放出来。让我们看一下这关系到哪些方面。

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从固定资本的存量与流动资本的流量的角度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于是，利润被解释为实际所得的流量，它出自对资产存量（如货币或物质性的厂房）的恰当运用。马克思与这种观念决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他将两者都视为流量。[①] 让我们回想一下，资本被马克思界定为一种使价值得到扩大的过程，因而他所

① 布劳格（Blaug）（1968，第229页）尖锐地指责马克思“在对资本的存量界定与流量界定之间随意挪动，却不提醒读者”，冯·魏茨泽克（von Weizsäcker）（1977，第201页）则评论道：“马克思真正研究的是不变资本（这是一种存量）与可变资本的产品之间的比例，以及可变资本（这是一种流量）的周转速度。”这个界定的后半部分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马克思还对作为流量的劳动过程感兴趣，因为这种流量主动保存了不变资本。

寻找的各种界定都要反映这种过程的流动。劳动力的用处是保存被耗尽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同时添加价值——“[劳动者]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38]（《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资本的价值构成代表了保存下来的价值与添加进来的价值之间的比例。这是两个流量之间的比例。我们已经看到，有机构成的概念使我们专注于一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变革如何使所运用的相同数量的劳动力能够保存并扩大比之前更多的价值。两个困难也由此产生了。

第一，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马克思所衡量的资本价值构成对于生产过程垂直整合的程度是高度敏感的。倘若一种生产过程始于原棉，终于衬衫，那么与所运用的可变资本相比，最初投入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就很小。倘若同样的生产过程被分割为两家独立的公司，一家生产棉布，另一家生产衬衫，那么不变资本的数量看起来就增加了，因为在布匹的生产中体现的劳动现在表现为衬衫制造商所购买的不变资本。

我们可以用图表描绘这个观点（见图4.1）。[①] 让我们考察
130 一种从 t_0 时刻开始、一直进行到 t_n 时刻的过程：最初投入的不变资本是 c_0，新增的可变资本是 v_0，新增的剩余价值则是 s_0。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价值构成是 c_0/v_0。现在让我们考察同样的生产过程，只是在 t_k 时刻把它切成两段，因而这个时刻的总价值就成了整个过程的第二段所投入的不变资本 c_2（见图4.2）。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价值构成是 $(c_1+c_2)/(v_1+v_2)$，而这显然要比 c_0/v_0 大得多。

① 这个观点基本来自杜梅尼尔（Duménil）（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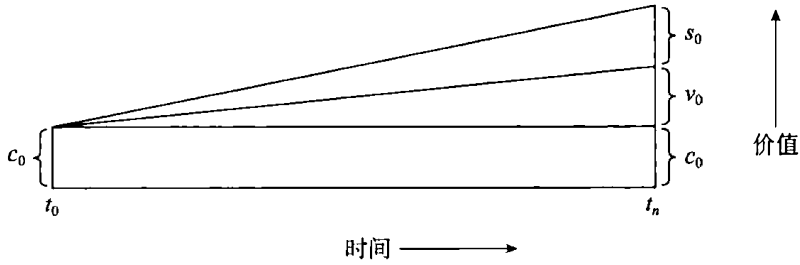


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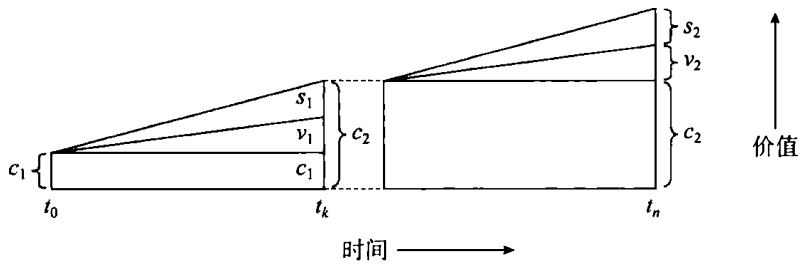


图 4.2

只要用存量与流量的模型来考察这种过程，就会发现不变资本的存量对于垂直整合的程度是敏感的。纯粹的流量模型会按照归谬法迅速退化，以至只有在当前的时刻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才是活劳动，而其他所有劳动都必须被描述为过去的“死”劳动。要挽救后一个模型，就必须考察这些流量是如何被市场交换打破的，而这就使我们再次回到了垂直整合的程度这个问题。

乍一看，这个困难会损害马克思的论述，其实决非如此。他毕竟在对技术的描述中包括了组织特性，而且极为关注集中和积聚的水平，这里必定也包含了垂直整合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有可能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利用这个表面上的困难。如果垂直集中的后果是降低资本的价值构成——当然总是要假定

实际的生产技术保持不变——这就可以提供一个与所谓的“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相反的机制。在过于深入这个观点之前，我们最好考察一下某些重要的、会使它发生改变的情况。

《资本论》第 2 卷讨论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生产行为现在被当成了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充分了解资本的含义，如何把它视为一种过程、一种流动。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对流通成本、周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分析，还展示了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最重要的是，从我们目前考察的问题的立场来看，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周转时间都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变革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流通成本的减少和周转时间的缩短可以有助于加速资本积累。固定资本的运用则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劳动的价值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却要求更长的周转时间，从而减少了积累。这些技术变革对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包括在公司内部和在整个社会中——并没有以任何连贯的方式得到探讨。马克思似乎在少数零星的段落中提出，更快的周转次数会提高价值构成。但在《资本论》第 2 卷里，价值构成或有机构成的概念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显然，资本的价值构成对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相对周转速度是非常敏感的。倘若回收可变资本所花的时间减少了，预付的可变资本就会减少，价值构成也就会提高，尽管劳动力的使用量完全保持原状。不变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更成问题了。我们必须讨论各种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它们可能是以不同的速度来周转的——还要讨论固定资本（机器、建筑等等），它们相对其他项目而言可能周转得非常缓慢。我们很难提出一个尺度来衡量不变资本在这些状况下保存下来的体量。即使将

固定资本的周转所带来的棘手问题放在一边（见第 8 章），不变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也明显会降低资本的价值构成。

因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在公司内部的相对周转时间对于生产中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会有直接影响，而这是与垂直整合的程度相独立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如果所使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相对周转时间增加了，就有可能抵消并盖过由于垂直整合的增进而出现的价值构成的下降。

但是《资本论》第 2 卷所给出的分析还向我们指出了另一些情况，它们会直接妨碍生产中垂直整合的增进。资本的总流通具有如下形式：

$$M - C \begin{pmatrix} LP \\ MP \end{pmatrix} \ldots P \ldots C' - M' \text{（等等）}$$

资本在进入交换领域、证实自己的价值之前，应该在生产中停留多长时间？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段时间应该尽量短暂，因为只有运动中的资本才是价值，也就是说，它必须行动起来，从货币转化为生产活动，再转化为商品、货币，如此等等。因此，资本家有强烈的动力尽可能地加速资本周转。这妨碍了生产的垂直整合，因为后者要求资本在进入交换领域之前在生产中停留更长的时间。把生产过程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公司——它们通过市场交换相互联系——似乎就非常可取了，因为这可以减少资本的周转时间。出于这个原因，就连大公司也宁可将许多生产分包给周转时间较短的小公司。但我们已经看到，这样做的后果是增加资本的价值构成，不论资本家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行何种变化。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这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影响。

《资本论》第 2 卷所建立的框架还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用来分析调节资本价值构成的力量。在

这一卷的最后两章，马克思构造了一个对经济体进行拆分的模型，并考察了均衡增长的条件（见后面第6章）。这个拆分模型为我们探讨经济体各个部门的技术变革所具有的一些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模式。让我们考察一个划分为两个部门的经济体，一个生产必需品（从而规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另一个生产的是生产资料（这是不变资本的要素）。假如必需品的生产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更高的速度，总的资本价值构成就倾向于增加，因为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得到了相对的节省。反过来，假如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提高就会成为一根将总的资本价值构成压低的杠杆。因此，总的资本价值构成是否会随着技术创新而增加完全取决于出现这些技术变革的部门和这些变革在整个经济体中产生的相互作
133 用。[①] 我们在这里就有可能把技术变革区别为节省不变资本的形式、节省可变资本的形式或中立的形式。

第2卷的分析似乎衍生出了一大堆有待考察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对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第3卷几乎没有重新提到这些问题。由于第3卷理应讨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即生产、交换与实现的统一，所以这种遗漏有些令人惊讶。我们可以做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留传给我们的第3卷草稿是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写的，而第2卷所记载的广泛研究当时还没有开展。

假如在完成了《资本论》第2卷未竟的事业之后，马克思又修改了第3卷，那么他会写些什么？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但我们只要记住他的规划的总体旨趣，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

① 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第198—199页）概括了关于这
230 一点的论述。亦见希尔彻（Heertje）（1977）的技术性的说明。

的困惑。我们甚至还可以采取一些相当谨慎、相当简单的步骤来澄清并推进他的论述。

5. 技术变革和积累

我们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必定具有技术上的活力，它的存在为什么要服从一道命令——“不创新即灭亡！”原因相当简单：在资本主义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关系推动并确保了对劳动过程的不断重组，以便寻求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当然不是在虚空中经营的，他们会遇到诸多阻碍——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界限、体现在旧机器和旧设备中的价值在冲销时的问题、变革本身的成本等等。技术变革的步伐、形式和方向会受到重大约束。我们还得知，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实际的技术状况（这些状况应该被理解为硬件的和社会组织的特定格局，这种格局可以维持并提升劳动生产率），一条根本性的命令——无休止地使生产力革命化（这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命题）——就可以得到实现。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有必要强调说，劳动的价值生产率归根到底是唯一的关键。物质生产率的变化不过是一种手段，价值生产率才是目的。因此，技术变革是作为促进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而存在的，因为它会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

我们倘若让这整个过程接受仔细的审视，就会立刻意识到它的矛盾性质。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矛盾内在于资本本身，而且即使脱离了“自然界中的”一切障碍（资源基础的有限性）或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障碍——劳动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必定会激发阶级斗争——这些矛盾也是混乱和压力的主要来源。让我们暂且想象一个世界：“自然界”的赏赐无穷

无尽，劳动者怀着温驯和奴性——这更加符合机器人的特征，而不是人的特征——按照资本的吩咐行事。这样一种可恶的虚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会如何在自身内部制造障碍，从而不断阻挠它自己的发展过程。

第一，让我们考察一下剥削率 s/v 随着劳动力的生产率上升会如何变化。这里当然有一种讽刺："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39]（《资本论》第 1 卷，第 604 页）——但这恰好是资本家在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时的用意。然而马克思在总体上认为，虽然某些技术变革可以提高剥削率，但是提高的速度只会越来越慢（《大纲》，第 340 页）。这是一个很强的命题，需要严格地加以证明。马克思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数学上的极限，认为可变资本在新增的总资本中的比例越小，进一步降低这个比例就越困难。但这里的必然界限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数学上的。我们可以想到，资本家需要维持工人的消费能力，把它作为有效需求的必要来源，由此才能使资本通过交换得到实现。简言之，我们可以想到第 2 章提出的所有论述，它们说明了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有一个均衡份额，偏离这个份额就会破坏一般资本的生产和实现的均衡条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必然的矛盾，它的起因是每个资本家都企图降低可变资本在企业内部的新增价值中的份额，同时却指望把自己的产出售给其他资本家所雇佣的工人。这个两难的出现独立于任何与实际工资率相关的斗争，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斗争在一组合适的情形中如何能帮助资本家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

第二，让我们考察一下总的利润率在全面的技术变革状况下会如何改变。如果我们用 $s/(c+v)$ ——相当于 $s/v/(1+c/v)$ ——来衡量利润率，那么在资本的价值构成提高而剩余价

值率保持不变时，利润率显然就会下降。我们将在第 6 章详细讨论这个观点，但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可能会对总的利润率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可是有机构成的观念告诉我们，公司内部技术变革的首要而必然的趋向是提高价值构成。诚然，我们可以识别出诸多起反作用的影响——面对有机构成的上升，各种相互作用有可能使总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持续追求，个别资本家会凭借暂时的技术优势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虽然后者具有转瞬即逝的形式，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倾向于在社会中创造一种与利润率的稳定相冲突的总的技术搭配。简言之，个别资本家的行为会威胁到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所需的条件。

这一切把技术搭配的问题放到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核心。说它具有核心地位当然不是说它具有塑造资本主义历史的自主的能动性。我只是说包含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的技术是矛盾的所在，这些矛盾是由一些相互对抗的要求所孕育的。马克思通过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的双重概念所把握的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对抗，尽管他的做法相当模糊、相当混乱。一般资本的问题是在有机构成的提高这种持续不断的倾向面前通过企业内部的技术变革来设法使价值构成保持稳定。马克思最终试图向我们证明，只有一个办法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危机。因此，危机可以被解释为劳动过程的强制的结构转换，目的是使整个体系回到某种与平衡积累的条件大致相符的状态。

马克思并没有以这种形式展开论述，也没有探讨其中的所有复杂情况和所有维度。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推进他的论述。然而，其中一个维度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进一步的评论，因为它隐含在我们在这一章已经做过的考察中。

马克思经常大量谈论市场关系特有的无政府状态和无序同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专制、权威和控制之间的反差。这种两极分化在实践中并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尖锐——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改变了后者，而垄断、寡占和“领头定价”（price leadership）这些行为改变了前者。但即使考虑到这些改变，马克思所提出的一般原则似乎还是具有合理的有效性。需要注意的是，有机构成的概念是与企业内部的决定过程捆绑在一起的，因而是处在资本家控制的场域之中的。另一方面，价值构成代表所有的互动效应之后的活劳动、死劳动与市场中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总体关系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它是和通过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无序状态所表达的决定过程捆绑在一起的。

控制的领域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边界是由企业的规模来确定的。这条边界到底划在哪里对于整个经济体的运作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条边界的方位大致是由哪些力量决定的，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倘若在这里分析一下
136 用流量来界定的价值构成，就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果。我们已经证明，垂直整合的程度越高，企业内部的资本价值构成就越低，资本家直接控制的舞台也就越大。与这一点相对立的是使资本周转时间加速的要求，而这需要使生产活动碎片化、实行分包生产，以及促进分工的扩大。这有助于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同时也会以受到调节和控制的生产为代价来延伸混乱的、无政府的交换关系的舞台。我们可以在这两种力量之间逐渐找出某种均衡的生产组织所需的条件，以此来规定垂直整合的程度、公司的规模等等，从而规定市场与企业内部（相对）受控制的环境之间的边界。由于这种均衡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但这也关系到

资本积累的前景。资本的价值构成不能独立于这些组织特性来界定。如果稳定的资本价值构成对于稳定的利润至关重要，那就意味着有某种均衡的、与平衡的积累相一致的组织形式。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非常简单的观点，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不断变化的组织。我们将在下一章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来讨论这个观点。

译注

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29 页脚注。“工艺学（Technologie/technology）”即“技术”。
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29 页脚注。
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30 页。
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29 页脚注。
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15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全集》第 3 卷，1995 版，第 272 页。
7. 中译本见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 1988 版。
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07—208 页。
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6 页。
1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08 页。
1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44、531 页。
1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08 页。
13.《文集》第 1 卷，2009 版，第 602 页。
1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2 页。
15.《文集》第 8 卷，2009 版，第 396 页。
16.《全集》第 46 卷，2001 版，第 937 页。
1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2 页。
18.《资本论》第 1 卷第 11 章所论述的“协作”（Kooperation/co-operation）指的是若干劳动者的协同劳动（关系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在本书中，“co-operation”也指一种非对抗的、妥协的劳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译为“合作”。
1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3 页。
20.《文集》第 8 卷，2009 版，第 507 页。
21.《文集》第 8 卷，2009 版，第 504 页。
2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87 页。
2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85 页。
2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418 页。
2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93 页。
2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61 页。

2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78页。
2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61页。
29. 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术语。
3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30页脚注。
3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39页。
3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40—441页。
3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01页。
3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51—45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7页。
36.《全集》第46卷，2001版，第866页。
37.《全集》第46卷，2001版，第236页。
3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32页。
3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97页。

第5章　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至少就表面现象而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在马克思的时 137
代处于主导地位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点最为明显地表现为生产和营销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海默（Hymer）写道："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代表性的公司就倾向于增大自己的规模：从工场到工厂，再到全国性的公司、多部门的公司，直到现在的跨国公司。"（海默，1972，第113页）虽然政府在整个19世纪从来没有完全以自由放任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活动（就货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对契约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基础的确保而言，政府始终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如今众所周知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行的国家干预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知晓。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组织的整个规模和复杂性——包括政府的和商业的组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演化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些

重大的组织变革，并解释它们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本人经常提到他所说的“资本集中的规律”[1]，恩格斯则大力阐发了这个观点。恩格斯写道，由于需要解决在工场内部实行的控制与“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所以资本会无可避免地集中起来，资本家用这个手段就可以在盲目的市场力量这片大海中使系统性控制的岛屿得到延伸。股份公司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组织上的第一步，但很快“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并让位于大规模的垄断（托拉斯、卡特尔等等），后者寻求的是对市场的支配以及生产和分配中的垂直整合。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恩格斯认为，这些必要的转化并没有“消除”生产的“资本属性”[4]，而是仅仅为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138 在恩格斯之后，希法亭试图全面分析“金融资本”，把这个概念看作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通过各种组织安排来实现的一体化。列宁吸取了希法亭的许多论述，却拒斥了后者的政治主张，并把帝国主义称作“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后来又很快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表达，以此来描述当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演化出来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从那以后，众多作者都试图描述这些组织变革，并对它们进行解释。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引发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热烈辩论。①

① 希法亭（1970 版）；列宁（1970 版）。当代英语世界的辩论多半源于巴兰与斯威齐（1966），但这场辩论在欧洲的转向是相当不同的——见博卡拉（1974）、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阿尔特法特（Altvater）（1973）以及最近由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 7、8 章）、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和费尔利（Fairley）（1980）所做的概括性的陈述。

在大多数时候，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一种所谓的过渡：从资本主义的“竞争”形式过渡到“垄断”形式或“金融”形式，再到当前阶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些作者质疑了用来表示这些阶段的术语，另一些作者则接受了这些术语，认为它们对于描述是有用的，却分别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些术语的含义。接下来我将尝试分析这个过渡的过程，而不会特别纠缠于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我希望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对组织转型的解释，从而可以让一些萦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幽灵得到安息。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提醒自己——这也许是有用的——如果马克思教会了我们任何东西，那一定就是现象世界具有欺骗性，而科学的任务正是透过现象，识别出在它背后运作的力量。马克思的理论倘若如他宣称的那样强健，就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以便解释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资本主义之下发生的组织变革——它们具有戏剧性的和非常明显的形式。

我们首先要将组织变革的问题与前一章完成的关于技术变革的总体论述联系起来。这个联系是直接而明显的，原因无非在于马克思在对技术的界定中特地包括了组织特性。因此，对生产力实行无休止的革命的必要性意味着生产的组织也必须经历无休止的革命。但若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的总体思路是成立的，我们就必须将组织变革解释为一种对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回应。我们还必须预见到，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建立起来的组织会包含强有力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可能是不稳定性和危机的根源。

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想要把对组织变革的分析与对工作过程不断变化的形式的分析割裂开来。我们必须将两者看作一

个整体。然而，聚焦于这个关系中的组织的一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特殊的见解。它还让我们得以考察马克思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适用——他的论述风行于一个以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式相当不同的线索组织起来的世界。

我们已经看到，对剩余价值的竞争性追求和按照资本积累的规律来对劳动者加以规训的需要为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活力打下了基础。资本对劳动生产力的占有向组织上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对协作、细致的分工和机器体系的分析指出了对工作过程的等级组织的需要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生产规模的增大也要求积聚资本，而积聚的主要方式就是积累。

但是资本集中的过程也可以加速资本积聚。规模较大的资本家可以通过竞争或运用各种金融花招（收购、合并等等）来吞掉规模较小的资本家。这一切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往往还会明确地得到国家的批准或鼓励。“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以此为“起点”，“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就可以“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集中（centralization）在“转瞬之间”就完成了积累式的积聚（concentration）要花许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马克思总结说，为了调节资本主义之下不断变化的生产组织，“资本集中的规律”起到了关键作用[5]（《资本论》第1卷，第626—628页）。

这条所谓的“规律”在后来的文献中得到了许多发挥，因为它似乎极好地解释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少数支配性的公司手中的显著的、规模巨大的集中。但与所有马克思的“规律一般的”说法一样，我们应该保持警惕，而不是赋予它绝对的、不受约束的力量。我们既然可以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中识别出起反作用的力量，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

与资本集中的倾向相反的多种力量。

马克思本人极其关注资本集中的现象。他认为垄断是竞争无可避免的最终结果，还认为对控制权的追逐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导致渐进的垂直整合。“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会达到最终极限[6]（《资本论》第1卷，第626—628页）。但他在另一处又认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集中的倾向“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7]（《资本论》第3卷，第246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1页）。总是有某些“排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以便确保“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8]（《资本论》第1卷，第625页）。

马克思所提出的似乎是某种“均衡的”生产组织——它是通过公司的规模、垂直整合的程度、金融集中的水平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来表达的——这种组织是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价值规律的运行相一致的。进一步讲，他似乎认为只要研究集中与分散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就至少可以在理论中找出这个均衡点。与往常一样，我们应该把均衡的概念看作一种方便的手段，借此识别出资本主义社会容易产生的不均衡状况。同样与往常一样的是，我们应该设法识别出资本主义之下有哪些力量扰乱了均衡的生产组织，促成了过度的集中或分散。

问题当然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交代他所谈论的是哪种集中（有金融集中、生产集中等等），也没有明确说出造成分散的“排斥的力量”有哪些，尽管他的确在许多地方讨论了资本出于何种动力才会对自己的经营实行广泛的分包（《资本论》第1卷，第553页），也讨论了资本主义开辟新的生产分支的倾向——这些分支一般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大

纲》，第 751 页）。

然而，既然前一章发现了垂直整合的界限以及生产与交换的必然边界，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中思考资本集中的过程了。垂直整合的增进会降低资本的价值构成（这对谋取利润有好处），却会增加资本的流通时间（这会损害获利的前景）。垂直整合的程度最初可以被解释为这两种动力在对立中的产物。

一些普遍因素现在也可以登场了——它们规定了生产中的资本主义控制的领域与市场交换之间的边界。在市场上，确实“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价值规律是以竞争的“权威”和“互相利益的压力所施加的强制”为后盾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市场的协调来确立的，这些协调决定了“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9]（《资本论》第 1 卷，第 355—356 页）。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是互为条件的。资本主义假如抛开了市场的协调，就无法作为资本主义保持下去了。资本集中以交换为代价延伸了受控制的生产的领域。倘若交换所运行的领域遭到了缩减，以至市场的协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让价值得以确定的过程（见第 1 章）就会变得不太有效，价值规律的运行也会变得无力。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过度集中——假如没有起反作用的“排斥的力量”——“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是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区分，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都十分重要。它们之间的边界或许是流变的，但是显然不能偏离均衡点太远，否则就会严重地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再生产。

马克思评论说，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之下是像“自然规律”一样肯定它自身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或轻率的言论。

价值规律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确保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会委身于这条规律的各种后果，而且必定会持续不断地力图使这条规律的运行臻于完善。这意味着组织变革也应当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来解释。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作为假设予以接受，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解释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结构明显而深远的变化如何有助于使价值规律的运行变得完善。恩格斯大概正是怀着这种精神才会认为，19世纪显著的组织变革是由增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欲望所推动的。

但既然组织形式从竞争过渡到了垄断，又过渡到了国家垄断，这看起来就肯定代表了一种从竞争的“权威”中摆脱出来的运动，因而代表了一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运动。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例如，巴兰与斯威齐认为：

> 我们不能满足于修补和改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背后的竞争模型……为了尝试理解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撇开垄断或者将它仅仅作为一个修饰性的因素引进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分析工作的正中心。（巴兰与斯威齐，1966，第5—6页）

抛弃马克思的“竞争模型”肯定会导致抛弃价值规律——巴兰与斯威齐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旦撤销了这条规律——它是马克思的分析的要害——就不能不严肃地质疑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所有范畴。这些范畴毕竟是以关系性的方式来界定的，所以我们倘若 142
不想扰乱其他所有范畴，就无法改变任何一个范畴，也无法魔

术般地把它从分析中清扫出去。[①]

博卡拉同样接受这个关于过渡的观点——从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再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却以“辩证的”而非单边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过渡，试图由此让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调和。在他看来，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运动试图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以此来克服之前的形式所蕴含的矛盾，而新的形式注定又表达了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矛盾，尽管是以新的、仿佛相当不同的面貌来表达的。我们不应该

由于资本主义始终只是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事实——就误认为生产关系和总的经济结构也会停留在不会转化的状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关系是不间断的转化过程的对象……这些关系在本质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这个过程并没有阻止对这种性质的维护和深化；无产阶级在根本上面临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博卡拉，1974，第 31 页）[②]

博卡拉所提出的这种调和必须在理论中是可靠的，在历史中也是合适的，否则就不会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动态的理论必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一体化对于双方都至关重要。这向来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所以我将按计划前进。在理论中，我将假定价值规律的运行依赖于一组竞争机制的展开，这些机制是为三个根本目的服务的：使商品价格平均化；使公司之间和部门

① 这里有一定的讽刺。虽然巴兰与斯威齐打算在交换中抛弃价值规律，但是布雷弗曼（1974）——他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灵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如何以令人震惊的准确性把握了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见前面第 4 章第 2 节）。价值如何能在生产中具有主导地位，在交换中却不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② 参见泰雷（Théret）与维奥尔卡（Wieviorka）（1978），他们强烈批评了博卡拉的表述。

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最后，还要引导资本的运动并配置劳动力，以便维持资本积累。为了简单起见，我还将完全从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过程的实际机制中抽离出来。于是，我的基本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据说彼此不同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它们的差别在于竞争的程度如何，价格和利润是如何平均化的，以及资本会以何种自行维持的方式流入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各类活动。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所谓“竞争阶段”，比如存在于19世纪40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阶段”。那时的工业活动几乎完全是按照家族式的商业企业的思路来组织的，所使用的会计方法和商业惯例也是极端传统的，以至于19世纪40年代的企业家在14世纪意大利商人的商业环境中都会感到相当自在。所有权与管理权是一回事，公司的规模则让我们可以将整个产业结构合理地描述为一种高度分散的结构。当然，产业的垂直整合在那时也有大量的例子，社会分工正要在其中立足，更为陈旧的垄断形式也还没有从中被消灭——一直延续到1845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10]。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认定后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就像经济活动中仍旧按照前资本主义的思路来组织的众多部门一样（工匠生产、小农式的农业、小资产阶级的商业、工场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形式最终都会被还原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大型的、集中的生产活动只有公共工程或准公共工程——铁路、运河、码头和港口设施等等——以及政府财政。一些主要的银行——比如巴林（Barings）和罗特席尔德（Rothschilds）[11]——有资格建立或推翻政府，而后者的税收权力也越来越被整合到了一个通过政府债务来从事高额金融（high finance）的世界当中。在这些舞台上，经济权力和金融权力的极度积聚使人们

怨声载道。但是工业和农业活动大体上还是小规模的、相当分散的，一般也独立于“高额金融从业者”的直接金融控制，因为后者大体上都不愿意直接而长期地卷入工业和农业生产。生产活动与金融的世界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短期商业信用的供应。

但是指明企业的小规模和经济活动的碎片化是一回事，假定这会导致完全竞争以及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这如何能为持续的资本积累提供充足的基础了。价格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变动是相当显著的。虽然就利润率的差异而言并没有很多系统性的研究，但我们所拥有的证据——它们全都是从货币价格出发的——的确表明，利润率在公司之间、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别。[①] 在竞争中使价格和利润平均化的机制决非完美，而劳动的配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杂乱的。我们不难看到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那时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国民经济的空间整合也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更不用说国际经济的空间整合了。相当小的公司也可以在它们所掌控的本地市场中作为垄断者来经营。交易成本——即流通的必要成本——就体量和价值而言
144 也相对较高，信息的流动——这些信息关系到价格的变动、获利的机会、生产工艺等等——则是缓慢的、零散的、不完整的。资本市场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它们往往是本地性的而非全国性的，而且为货币流动提供方便的整个制度框架（不论货币的职能是让商品得以交换还是成为货币资本）基本不适合在生产中推动迅速的调整。更倒霉的是，就是否能够响应新的获

① 关于利润率的实际状况的研究非常少，相互间隔也很长。关于这个主题最好的、最有教益的著作之一出自布维耶（Bouvier）等（1965）。

利机会而言，传统家庭的所有制结构既有好处，又同样是一道障碍。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是等同的，股份公司的形式对工业和农业活动的渗透也不够深入，所以商业扩张的潜力——不论是通过大规模的经营还是地理上的扩散——严重受制于家庭或有限合伙关系的管理能力。

因此，与组织上较高程度的分散如影随形的是本地化的垄断权力以及各式各样的摩擦和障碍，这些摩擦和障碍妨碍了真正的竞争，阻止了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①] 作为创业先锋的资本家的优势——他们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传奇人物——恰好在于他们能够在所有这些障碍面前引人注目地保持资本积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障碍还包括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式。鉴于总体的事态，即使技术的转移和资本的运动相当引人注目，竞争也不具有，而且不可能具有完全性，无论这种完全性是用哪种标准来衡量的。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一般把资本主义历史的这个时期叫作“古典的竞争阶段”？

答案多半是资产阶级思想将“公司”理想化了，而且这种思想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时扮演了霸权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想象是亚当·斯密和当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共有的：企业家追逐的是自己个人的私利，却又在市场中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因而增进了社会的总体福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公司理想化了，还将小规模的企业物神化（fetishizes）了——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缺乏任何程度的垄断力量，从而被当成了一种理想的主体，仿佛由此就能达到竞争性的均衡。小规模的组织与竞争性之间就这样产生了一种毫无

① 钱德勒（Chandler）（1962，第3页）写道：“公司在本地购买原材料和成品[12]。它们如果是为了离工厂超过几英里的市场来制造产品的，就会通过代销商来做买卖，而这些代销商还要处理另外几家公司的生意。”

道理的联系。

马克思没有被这种想象欺骗。我们也不应该被欺骗。在资本主义的所谓“竞争”阶段，公司实际上相对较小，价值规律的运行并不完善，资本运动的规律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觉察到。因此，19 世纪 40 年代的问题是完善竞争，强化价值规律的运行，并通过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维持积累。流通和迁移所面临的障碍必须被克服，地方性的垄断也必须通过空间整合来消除。交易成本必须大大减少，信息收集和信息传播的机制必须改善，为货币支付、资本流动等事务提供方便的制度结构也必须被创造出来。人们必须为所有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里的讽刺在于，在给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传统的、小规模的公司组织——在资产阶级理论中被理想化为竞争性的楷模——是最严峻的障碍之一。传统的公司组织必须被克服，以便在交换和牟取利润时使竞争更加完善。

由于运输、通信和银行技术的巨大改进，竞争所面临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然而，我们在这几个部门都目睹了大规模的、准垄断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从 19 世纪的标准来看具有相当庞大的市场权力。铁路尤其为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提供了牙床。19 世纪末发生的“组织革命”——它的顶点是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出现——用现代的商业企业取代了家族式的商业企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一种与竞争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障碍相抗衡的尝试。按照钱德勒的说法（Chandler），这种取代的出现意味着“行政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更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利润的增加”。新的组织形式有许多优势：

如果把单位之间的交易变得程序化，就可以降低这些交易

的成本。如果把生产单位的管理同购买单位和分配单位联系起来，就可以减少关于市场和货源的信息的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把多个单位内部化，就可以让物品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的流动得以服从行政的协调。对流动更为有效的调度则可以让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所运用的设施和人员得到更高强度的使用，从而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钱德勒，1977，第6—12页）

钱德勒（Chandler）坚持认为，这种类型的现代商业企业“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时，经济活动的体量所达到的水平已经使得行政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更有利润了”。对利润的追求削弱了交换的作用，延伸了生产领域，因为就一定规模的产出而言，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在市场上比在公司内部更高。通过把这些成本内化，公司就可以减少资本流通所面临的障碍，还可以增强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能力。因此，资本集中可能会提高而非降低使利润平均化的能力。

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现代的商业企业还造成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3]（《资本论》第3卷，第436页）。资本主义从此采取了金融形式，并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14]，甚至远远超出了个别资本家的奢望所能达到的水平。这意味着“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5]（《资本论》第3卷，第436页）。

146

所有权与管理权的这种分离有助于克服旧式的家庭商号在管理上的局限，并为现代的管理技术和组织技术开辟应用的场所。但是危险也随之产生了。亚当·斯密认为，股份公

司会纵容不负责任的企业家用别人的货币来投机——他无疑想到了18世纪早期的投机泡沫。恰好是这些反对意见导致了当局不愿意批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除非是为了大规模的、半公共的工程——运河、铁路、船坞等等。就投机性的暴跌而言，从19世纪中期至今的整个历史表明了这些反对意见远远不是缺乏依据的，还表明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形式所面临的永恒问题是维持自己家里的秩序（见下面第9章和第10章）。

但是规模增加、资本集中、垂直整合和企业的公司形式内部的多样化最终导致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管理者的“看得见的手”所取代。我们的理论告诉我们，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达；那么，这种看得见的手——管理层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协调——与价值的表达有怎样的关系？

垄断控制和市场权力让大公司得以在市场上成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过，虽然管理者可以使用多种定价策略，但是没有哪种策略是完全任意的，而且某些策略——比如按照边际成本来定价——相当服从供给与需求的状况，从而是与任何公开的市场定价完全一样的。尽管最终的价格的确不同于通过竞争性的定价来达到的价格，但是两者绝不会有实质性的偏差，因而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我们的观点：价值是通过市场价格来表达的。只是供给与需求的机制取代了公开竞争的机制而已。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管理者要考虑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增长，并以此为基础来做出决定——这种意见更言之有物（尽管对许多管理者来说，长期也不是很长）。就使用固定资本所带来的问题而言，时间范围的变动和进行有计划的淘汰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管理者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从资本

所有者那里获得了“相对的自主”，从而成为“永久性、权力和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源”——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①] 管理结构越是官僚化，就越是僵硬和不灵活，而且不能够进行重大的适应。由于现代公司把握了科学、技术和计划——还通过专利法演化出了一种调节创新的能力——所以它成功地内化了技术变革的过程。[②] 公司着手生产新的工作过程和新的组织结构，以及新的产品和新的产品线。由于它支配了生产的某些分支，所以它会以其他所有分支为代价来推进自己的分支，而这往往会损害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公司被迫要与政府谈判——原因在于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所以它们公开地、隐秘地、不择手段地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玩弄政治。

在所有这些方面，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都表现为竞争的反面，这也意味着它们似乎不能够按照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来使价格和利润平均化。

但让我们看一下这幅图景的另一侧。庞大的金融集团获得了把资本和人力“转瞬之间”从一条生产线调换到另一条生产线的能力和从世界的一个部位调换到另一个部位的能力。为了收集并使用关于生产工艺、市场和获利机会的信息，它有可能演化出，也的确演化出了极度精巧的体系。交易成本在公司内部降到了最低，关于生产和分配的计划也可以细致入微，仿佛实现所面临的内在障碍是不存在的。虽然有计划的淘汰增加了对固定资本的依赖，但是公司同样可以回应随之而来的许多困难。在所有这些方面，现代公司都提高了在自己的范围之

① 钱德勒（Chandler）（1977）关于这一点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历史研究。很多作者——比如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贝克尔（Becker）（1977）和赖特（Wright）（1978）——都讨论了“管理者阶级”的一般问题。

② 诺博（Noble）（1977）出色地描述了这是如何发生的。

内使利润率达到平均化的可能性。①

然而，谈论可能性是一回事，指明达到平均化的必然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发现利润平均化的秘密和当代竞争形式的秘密，我们就必须穿透现代管理结构的迷宫——正如马克思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深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以便让］赚钱的秘密暴露出来”[16]（《资本论》第1卷，第176页）。

钱德勒是少数有实力进入这片困难的领地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发现十分有趣。从我们目前论述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资本集中的运动从外面看上去是平稳的、仿佛不可逆转的，在内部却与管理结构的持续的、受控制的分散相伴随。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与集中相反的分散运动的秘密——这种运动防止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过度集中而崩溃。一种关于均衡组织的观念变得触手可及了——达到这种均衡的方式是让排斥的、导致分散的力量与集中的力量相互平衡。但这个观念现在是通过把竞争内化到一个公司内部来表达的，这个公司在世界面前呈现为一头集中的、垄断的怪物。

历史证据并非不符合这样一个论点。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回应一些特定种类的问题——之前一个时期的集中的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公司的内部逐渐出现了分散的、多部门的结构。正如钱德勒所说：“现有的管理结构受到了越来越难以容忍的重压，而领土的扩张和产品的

① 这是从帕卢瓦（Palloix）（1971；1973）的著作中可以得出的原则性结论；亦见雷迪斯（Radice）（1975）编辑的文选。尽管在巴兰与斯威齐以及与他们对立的布雷弗曼之间充满了分歧（第244页注①），帕卢瓦却反倒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其一是上面所想象的价值规律在国际交换中的不断渗透，其二是价值规律在生产中的不断渗透（见帕卢瓦，1976）。

多样化——后者的意义要大得多——带来了多部门的组织形式。”通用汽车在1921—1922年的危机期间实行的结构性的重组创造了一种分散的组织：它“不仅帮助通用汽车赢得了美国汽车市场的最大份额，而且帮助它成功地扩张并管理了海外的制造和营销活动。进一步讲，由于这种管理结构，它才能够卓越地执行一项宽广的多样化战略，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汽车市场滑坡之后的几年里制造并出售所有类型的引擎和使用引擎的产品”。竞争很快迫使其他汽车公司相继效仿，尽管只有很有限的几种竞争才能在寡占的市场中运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分散的、多部门的公司结构就在全世界通行了。①

有趣之处当然在于，这种分散的结构所具有的组织方式会使得每个分部（不论是一条产品线还是一片领土）都可以承担财务责任。每个分部的管理者的业绩都可以用这个分部的资本回报率来衡量。中央管理层的职能是监督这些业绩，并联系到每个分部当前的盈利能力或未来预计的盈利能力来配置资源——包括劳动力、管理技能和财务支持。由于交易成本保持 149
在最低限度，所以现代的管理结构在自身内部产生了一种竞争形式，这种竞争往往会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这指明了一条核心结论：就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言，现代的金融集团至少从内部组织的角度来看比19世纪上半叶的祖辈——据说它们达到了完全竞争——更有效率、更有成效。

这种多部门的公司结构和竞争的内化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在本世纪[17]初资本极度集中的阶段，大型的托拉斯和卡特尔形成了；它们虽然理应拥有无比巨大的市场权力，却在一段较

① 钱德勒（Chandler）（1962，第44—46页）；关于英国的经验，汉娜（Hannah）（1976）提供了一份类比研究。亦见斯科特（Scott）（1979）。

短的时期内在财务上遇到了深重的困难。它们之所以会遇到困难，恰好是因为它们有复杂的业务，因而不知道利润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或者不必要的成本究竟是在何处产生的。假如“排斥的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因而多部门的结构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看来就真的临近了。

然而，这些“排斥的力量”是由运行在市场中的外部约束来发动的——这些约束甚至迫使最大的公司也要以某种方式遵守价值规律。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金融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如何维持的，以及这种竞争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贯穿所有经济单位的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不论这些单位的规模或类型是怎样的。

对寡占和垄断的主要检验是市场权力的水平和独立于市场上的竞争压力来决定价格的能力。由于垄断者的决定，或者按照寡占时的“领头定价”（price leadership）策略，市场价格就平均化了。利润率或许也可以平均化，但这种平均化被垄断价格扭曲了，后者想来会偏离在竞争中可以实现的生产价格。

就这个论点大谈特谈是很容易的。在寡占的市场环境中经营的大公司要服从诸多竞争压力。它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精致营销（marketing sophistication）等方式来竞争。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也对竞争现在采取的形式有重要影响。由于公司用借入资金来经营，并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货币，所以它加入了一场普遍的、追求货币资本的竞争。一家企业的业绩是通过收益（即作为利润分配给股票持有者和债券持有者的剩余价值）和长期增长的前景来衡量的。缺乏效率、报酬较低的企业无法长期存活，不论它就价格而言拥有怎样的市场权力。

因此，除了市场中与价格相关的竞争所带有的形式之外，竞争还可以采取许多形式。管理行为和重组将竞争过程内化到

了公司内部（甚至创造了内部的劳工市场），追求货币资本的竞争则把焦点转移到了资本市场——以资本市场为手段，就可以规训哪怕是最强大的经济单位。就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而言，这些竞争形式或许刚好与市场的协调这种古典形式——“看不见的手”据说会在其中引导企业家准确无误地按照价值规律来行动——同样有效，而且在其他方面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

然而，这并不是说竞争可以在寡占时完善地运行。实际上，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了一些联动关系中，比如金融机构与产业公司之间、控股公司的剧增与庞大的金融集团（后者往往不太关注日常管理的细节）之间的联动关系。竞争过程——不论是何种类型——总是很容易由于过度集中而受到损害。相关经济角色的规模、分量和权力本身都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是否会趋近均衡状态，从而是否会确保价格和利润的平均化以及资本积累的延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国家在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中的参与，通过组织安排来维持竞争过程的问题就会变得尤为尖锐。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国家的各种直接干预，而不是把国家作为私有财产权、契约等事务的保护者，也不是把国家作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管理者”（通过在医保、教育、福利服务等方面的投资）。虽然国家干预主义这个大问题实在太过复杂，这里无法进行彻底的讨论，但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识别出一些相互抗衡的集中与分散的倾向，它们既是在国家机器内部表达的，又是通过国家机器来表达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试图调节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通过一组为防止垄断而设计的法律），或者在自身内部产生出分散的行政安排，以此来防止资本的过度集中。在美国，联邦主义

的政治结构和行政结构以及银行业的组织都为高度分散的组织安排提供了出色的例子——这些安排是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本身来维持的。

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经常是以刺激资本集中为目的的。合并和收购有可能受到鼓励，甚至得到补贴，被当作政府资助的产业重组政策的一部分。大规模的、处于私人资本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业务可能会由政府赞助、建造乃至管理——例
151 如，欧洲近年来没有一家新的钢铁厂不是在政府的广泛参与之下建造的。在公共事业、运输和通信的领域中，政府要么进行直接的参与，要么进行调节，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领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自然垄断”，这些垄断的产生是由于大量竞争者在同一个地区的经营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在两地之间修建 15 条不同的铁路是毫无道理的）。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许还试图整顿破产的企业——因为它处于经济中的某个关键部门——并对它进行补贴，以便降低投入私人公司的不变资本的成本。这当然会导致市场价格相对于生产价格的扭曲，还有可能导致利润率按照政府所决定的路线发生结构转换。

政府所奉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它们是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而设计的——无可避免地会对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产生影响，不论它们是否按照凯恩斯的思路来构造。首先，一旦通过国家机器本身来引导资本的流动，政府就会获得高度集中的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在某些状况下，军事开支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可以吸收社会总产品的很大份额。此外，支配税收的法律、关于折旧的安排等等——它们本身可以被构造为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一组工具的一部分——往往对公司的组织具有深远的后果。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在这里谈到它们是为了从一般的理论角度来考察这几种组织安排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与马克思所界定的价值规律的运行相一致。至少从表面上看，政府的活动与对竞争性的交换过程的维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过程中看到了价值规律的运行——仿佛关系甚微，或者毫无关系。与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人们有时这样称呼它——仿佛更是在根本上与价值规律的运行相对抗。①

我们可以聚焦于资本在规训国家时有可能借助的机制，由此降低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解决所有困难，只是指出了一条道路，我们沿着它就可以从一个仿佛很严重的理论僵局中脱身。

我们可以认为，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这个观点——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圈子并不陌生。虽然这样一种观念往往包含了一些真理，但我们在这里不必提到它，因为还有另一些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们同样可以很好地有助于按照资本的要求来规训国家——这里当然要假定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律安排和制度安排得到了维持。这些力量主要是财政的。首先，

①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近些年来集中讨论的主题。这是一场多边的辩论，不可能用短小的篇幅来概括。法恩与哈里斯（1979）、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和赖特（Wright）（1978）都提供了有趣的视角和概述。我在这里的论述中引入国家的方式表明了我对霍洛韦与皮乔托所提倡的思路有一定的赞同。他们仔细考察了国家形式同生产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形式——后两者是通过资本积累的矛盾过程来表达的——之间的必然联系，从中构造并论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我认为这条思路——如果从中剥掉可能很枯燥的逻辑形式主义——可以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之下的国家的许多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至于它是否能带我们一路走向完整的国家理论，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关头还不准备予以思考。我将在这部著作结尾的评论中回到这一点。

税收本身——它们构成了国家活动的命脉——就是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中的一块。国家拿走的份额不能超过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的某个“均衡份额”，否则就会在根本上扰乱资本流通背后的分配安排。我们在这里当然应该注意到，由于生产与消费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当中绝不可能达到均衡，所以凯恩斯主义政策特有的目标就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越是使生产与消费成功地在长期达到了均衡，就越会威胁到在资本主义当中处于核心的社会分配关系。一旦公共政策被迫转过头去维护那些社会分配关系，使生产与消费达到均衡的能力就立刻减退了。

第二，国家若要长期介入直接的生产，通常就必须从资本市场借款。它不能无中生有地借款，而且被迫要为自己在货币资本中的份额参与竞争，尽管它在竞争中有某些特权。它还必须为自己借来的资本提供一个回报率——这份回报的来源必定要么是剥削国家所控制的部门的劳动力，要么是间接地对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征税。

这一切意味着就资本流通和剩余资本的生产这两个根本性的过程而言，国家在某个时刻必须承担财务责任。使这种责任得到凸显的机制往往是错综复杂、微妙难解的。但关于规训的权力大体上会如何行使，我们有充足的例子，可以使上述论点不只是看上去可信。支配性的资本主义权力或它在国际上的
153 代理人——前者比如美国，后者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会向弱小的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它们遵守某些行为标准。倘若某些部门被评判为私人企业的范围，政府在其中的参与可能就会遭到扼制；经济权力在政府中的过度集中也可能会受到抑制。国有企业的经营——因为政府要寻求财政支持——
258 可能会面临苛刻的要求（例如关于效率和盈利能力的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对多个国家进行了财政规训，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名列其中。纽约市政府同样在1973—1978年这个时期受到了规训，规训的力量是在美国的财政体系内发动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结论：一些组织形式和政策是与资本流通、对资本主义分配安排的维持和剩余价值的持续生产相一致的；国家一旦过远地偏离了这些组织形式和政策，就会很快发现自己面临财政困难。简言之，财政危机其实是资本对任何国家——只要它还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轨道之内——实行规训的最终手段。

看起来，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变革的整个历史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前进，决定这种前进的是使价值规律运行得更加完善的企图。按照这种描述，资本主义会对价值规律有更强而非更弱的反应。远离竞争、走向垄断形式和国家垄断形式的运动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它们作为描述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我们在观察中发现，倘若过于刻板地看待这个表面现象，就会在历史中和理论中产生误导。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完全竞争，甚至丝毫也不符合这个理想。资本主义企图变得更有竞争性，由此演化出来的结构却背离了一个真正有竞争性的组织按照主流的形象应该具有的模样。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演化出了新的竞争方式，让价值规律得以通过不同的，却也愈发有效的方式来运行。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俘虏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有竞争性了。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加剧了，财政机制对政府的规训变成了我们每日新闻的一部分。各个分部的管理者在与中央管理层的日常交流中感受到了竞争的锋芒。我们从所有这些立场上都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仍然处于完善的进程中，价值规律终将原形毕露，成为我们生活的绝

对主宰。

不过，说价值规律正在完善并不是说我们正在走进一个资本主义的和谐的纪元。远非如此。价值规律包含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它的运作来塑造的组织安排本身也无法避免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了组织上的长期的不稳定倾向。[①]

对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方面加以控制的驱动倾向于制造出过度集中的资本——在私人部门中和国家中都是如此——而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延续的确是一大威胁。倘若补偿性的、导致分散的力量很难发动，体系就会停滞，会陷入泥沼，会被它自身组织结构的沉重和复杂所俘虏。反之，过度分散以及市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可能会制造出极其不确定的气候，在生产与实现之间制造过多的缺口，因而为了予以补偿，又必须走向集中。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的均衡点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偶然中达到，而且没有什么机制可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对抗关系迫使组织结构失去均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危机所起到的建设性的作用不仅是强制推行狭义的新技术，而且是塑造新的组织结构，使它们更加符合价值规律，因为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进行的资本积累可以在它们所提供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然而，我们将在第 7 章回到这个问题。

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讽刺。价值规律是社会的产物。为它提供根基的社会关系无非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是价值规律本身引发了一长串组织转型，而要完成这些转型，

① 希法亭（1970 版）非常清楚地看到，寡占、卡特尔等组织形式所造成的影响会扭曲生产价格，这种扭曲比其他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扭曲更为严重；因此，垄断倾向于加深不稳定性，而不是纠正这个根本问题。

就必须同时转化阶级关系。从资本所有者那里分离出来、区分出来的“管理者阶级”的兴起，用于干预和调节的政府结构的兴起，劳动分工愈发森严的等级秩序的兴起，公司的和政府的官僚主义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掩盖了价值规律本身背后资本与劳动的简单关系。①

这些广泛的社会变化是价值规律的产物——这一点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它不过是确认了我们的出发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我们试图创造一种与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到头来却发现这些社会关系必须改变，才能顺应这种结构——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改变了自己。或者用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在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和技术机器中的一组矛盾时，另一些矛盾会无可避免地产生。这些矛盾以新的、往往更加令人迷惑的形式得到了重复。当然，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历史和这些形式所经历的转化的历史中，这样一种过程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

译注

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02页。
3.《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06页。
4.《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07页。
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3—72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3页。
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75页。

① 我们在第4章第1节提到，劳动过程的转化倾向于使利润在剩余价值中的起源越来越有可能遭到掩盖，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所表达的那个观点的镜像（we see the mirror image of that idea as expressed in capitalist forms of organization）。这一切表明，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言，拜物教的必然性这个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那个不同寻常的段落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

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1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0.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之后遭受重创，并于1874年解散，但是1845年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到公司存亡的事件。
11. 著名的译法是“罗斯柴尔德”。
12. 疑为“购买原材料并出售成品”，不过钱德勒的书中并没有这句话。
1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5页。
1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5页。
1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7. 指20世纪。

第6章　积累的动态

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活力和无可避免的扩张性。它是由为积累而积累的引擎所发动的，它的燃料则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它构成了一种永久革命的力量，会无休止地重塑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我们如何才能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动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运动规律？ 156

马克思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打造多种关于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抽象描述”。然后，他把这些描述当作“理论对象”，系统性地研究了它们的属性，并由此建立了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的诸多“模型”。每个“模型”都构成了一扇特殊的“窗户”或制高点，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一种复杂得不同寻常的过程。

《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模型”。每一个都反映了三卷《资本论》的每一卷建构这个“理论对象”的方式。马克思在第1卷试图揭示利润在生产过程中

的起源——这种生产过程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庇护下进行的。他构造并阐发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高度强调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过程。但是资本流通可能附带的问题或困难被排除在了分析之外；这里的分析完全依赖于一个简单的假定：资本家在出卖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时并没有遇到困难——因而商品总体上是按照价值来交易的。这让马克思得以自由地建构他的第一个积累模型，这个模型所探讨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规定了剥削率。因此，这个模型虽然牢固地扎根于生产的理论领域，却讨论了生产出来的价值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这个模型以棘手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157 《资本论》第2卷的焦点是资本在它的各个阶段中的流通：

$$M - C\left(\begin{matrix} LP \\ MP \end{matrix}\right) \ldots P \ldots C' - M' \text{（等等）}$$

生产和对劳动力的购买在这个过程中被看作相对不成问题的“环节”。处于焦点的是资本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运动所产生的问题和交换关系中的问题——如果资本要得到实现，这些交换关系就必须具有主导地位。技术变革几乎没有得到强调，而且阶级斗争的宏大思路——尽管在第一个模型中极为明显——差不多完全从这幅图景中消失了。这让马克思得以构造出一个相当不同的积累“模型”：这种积累是通过资本流通的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这个模型植根于资本流通和交换的理论领域，并讨论了资本在消费中的实现所需的条件（见前面第3章）。但是马克思对它的论述并不严格，而是一种想象和试探。

《资本论》第3卷的意图是把前两卷的发现综合起来，并建立一个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同生产与实现所需的条件整合

起来的模型。围绕“利润率的下降和起反作用的倾向”这个主题，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动态的综合模型——即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1]的模型。这个模型在形式上很简单，但这是欺骗性的；马克思用它作为手段揭露了资本主义当中导致不均衡的多种力量，并由此为理解危机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提供了基础。不幸的是，这个模型几乎没有涉及第2卷的探索，因而在理论领域中——这个领域应当同时涵盖生产和流通——缺乏牢固的根据。可见，这个模型必须被当作马克思在理解这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时所进行的初步的、相当不完整的尝试。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第三个模型到底有多么不完整。

本章的意图是概述这些积累“模型”各自的性质，并评估它们的缺点和它们所带来的见解。我试图用与马克思一样的方式来进行论述：生产与交换根深蒂固的矛盾——即让剩余价值的生产达到均衡所需的条件与资本流通之间的矛盾——必须变得清晰可见。这些矛盾的确为我们理解危机在资本主义当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然后，第7章将讨论这个过程的实际机制——这些机制对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至关重要。

1.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倘若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是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2]（《资本论》第1卷，第595页），那么一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转变为新的 158
资本，以便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接近结束时，马克思说明了“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3]，并在这个过程中为积累的动态建立了一个模型。为了便于论述，某些假定被暗中包含进来了。社会中只有两个阶

级：资本家与劳动者。竞争迫使前者至少将他们所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再投资，以便确保将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阶级再生产出来。劳动者没有任何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因而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资本家对他们的雇佣（工人阶级无法为自己生产任何东西）。资本家在按照价值来出卖商品时没有遇到壁垒。流通成本和一切交易成本都被忽略了。经济体被视为单一的整体，因而不同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是可以忽略的。

在这样一个高度简化的经济体中，收益的形式只有两种：工资与总利润，或者从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就是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由于 s/v 代表了剥削率，所以我们可以考察剥削率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关系当中的变化，以此来探讨“工人阶级的命运”的某些侧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可变资本（即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在进一步分配之前）在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对份额。马克思尽管是从价值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却暗中诉诸市场价格，因为他认为工资可以自由地背离劳动力的根本价值。工资率——即实际的剥削率——是由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来规定的。马克思现在必须解释供给与需求的日常现实本身的结构如何能确保剥削率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

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型建立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排除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并假定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都保持不变。在这些条件下，资本积累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不断增加。因此，它会“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4]（《资本论》第 1 卷，第 613 页）。

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增加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可以设想总

人口的增长，或者现有的人口更多地参加了劳动力大军。这种数量的增加未必会与剥削率的任何提高相伴随——受剥削的大量劳动力之所以增加，只是为了与资本积累保持同步。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命运”可能还会改善。工资有可能上涨，而且有可能持续上涨，条件是不妨碍积累的进展。然而，倘若工资超过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慢了积累，那么积累的速度就会做出调整：

> 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5]（《资本论》第1卷，第620页）

资本积累的步伐与工资率仿佛是反向变动的。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不论表面上是怎样，积累始终都是独立的变量，工资率则是取决于积累的变量。最终迫使工资率上升的首先是为积累而积累的命令，因为这道命令推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它远远超出了可用的供给。

这个模型的第一个版本让我们得以联系到资本积累的步伐中的波动来解释工资率的短期振荡。工资所代表的实际剥削率是在劳动力的根本性的均衡价值附近波动的。但这个模型所做的说明并不能保证对均衡的重大偏离在长期也不会出现。倘若劳动力供给的任何增加都会遇到强大的障碍，工资率就有可能远远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以至几乎没有给积累留下任何东西。在这些状况下，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会受到威胁。

于是，马克思为他的积累模型建立了第二个版本。他现在丢掉了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保持不变的假定。在劳

工的稀缺面前，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可以被用作维持积累的手段。就预付的总资本而言，这些变革减少了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工资率，并由此让实际剥削率得到了提高。马克思注意到，这个结果是通过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来达到的。因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成了“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6]（《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

不论资本积累的步伐是怎样的，都有一些机制会让剥削率得以不断上升——马克思确切地说明了这些机制。在可用的劳动供给面前，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大大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简言之，一部分的劳动力大军被抛出了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了。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
160 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7]（《资本论》第1卷，第632页）

这种由技术引起的失业不仅带来了一个劳动力的储备库，从而为剩余价值转变为新的可变资本提供了方便，而且向工资率施加了下行压力：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
 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

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8]（《资本论》第 1 卷，第 639 页）

工资在总产品中的份额必须“绝对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见前面第 2 章），而我们在这里终于发现了保持这个比例的机制有怎样的秘密。大体上受资本家控制的技术变革可以被用来确保将剥削率保持在接近均衡条件的水平，而这个均衡条件是由积累的要求来界定的。至于是否能恰好达到这种均衡，那是无法确保的。工资相对于利润的份额的循环振荡反映了“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9]（《资本论》第 1 卷，第 632—633 页）。

工资率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会被系统性地压制在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水平。我们在第 4 章看到，技术变革的起源是竞争以及对劳工的稀缺或高涨的阶级斗争加以应付的需要。只有当工资率严重下跌，因而固定资本比劳动更加昂贵时——固定资本是为了代替劳动而设计的——产业后备军的增长才会淡化对技术变革的刺激。反过来，只有在对技术变革的刺激被淡化时，工资率才会停止下跌。至于这类因素为工资率设定的下限是否能对应于平衡的积累所需的均衡工资，那就根本无法保证了。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马克思就推导出了一条备受推崇的定理：无产阶级无可避免地会逐渐变得贫困。

从这个积累模型所含有的假定出发，我们可以相当自然地推出这条定理。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积累和技术变革意味着失业者绝对数量的增加——按照这个模型的假定，这种趋势只有在不同寻常的扩张时期才会发生短暂的倒转。失业和就业不足是由资本造成的。于是，工人阶级在就业保障、工资率、工作条件等方面会面临地方性的危机。

161

“无产阶级的增加”是由极为强大的力量所导致的；这些力量倘若不受约束，就会把劳动者降低到单纯的“动物的生存条件”[10]。在马克思的模型所做的假定中只存在一个约束，它关系到创新的动力在工资率的水平愈发下降时的不断减退。由于这个约束相对较弱，所以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其实还是意味着民众的不断无产化，也意味着贫困的增长。这通常被看作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未来所做的错误的“预言”之一。虽然马克思决不会舍不得在政治上利用这个主张，但它事实上不是一则预言，而是完全以第一个积累模型的假定为前提的一个命题。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第二个积累模型——通过扩大再生产来积累——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还有另一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运作。

从马克思的第一个积累模型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三条根本性的结论。第一，资本积累在结构上是由失业的产生来约束的，因而会给大部分工人阶级带来地方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强度是不断波动的。第二，调节工资率的力量倾向于把它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不是维持平衡的增长所需的水平。这第二条结论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积累模型所提出的论述至关重要。第三，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供给的控制（方法是制造产业后备军）削弱了劳工在劳动过程中的力量，并使生产中的阶级斗争的平衡倒向了对资本有利的一边（见第 4 章）。

马克思为了推导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建立的整个理论结构立足于某些强烈的、相当局限的假定。尽管其中一些假定随后在分析的进程中会被丢弃，但另一些假定始终没有受到质疑。现在让我们转向后面这些假定。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对劳动力价值的界定。技术变革既然会减少必需品的价值，就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

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却丝毫没有降低就业的劳动者数量或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已经看到，这是资本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来源。但这也意味着在劳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衡量——保持不变乃至上升时，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却有可能下降（见前面第2章）。马克思在他的模型中不仅没有包含这种可能性，而且实际上假定了按照一定的生活水平（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衡量）把劳动者再生产出来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会始终保持不变。工人的贫困化是相对于这 162
个生活水平来评判的。按照这些假定，可变资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的任何下降都可以自动呈现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马克思还假定，工人的家庭没有能力为自己生产任何东西，因而劳动力的价值完全是通过市场中的商品交换来界定的；这个假定也制造了一些在理论中和历史中都十分有趣的问题。倘若工人可以供养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会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就会提高。从这个立场来看，尽量迫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回到家庭生活的框架中（因而一般会落到女性的肩膀上）是对资本家自己有利的。[①] 于是，这意味着工人必须有机会至少获得有限的、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但是工人倘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与自己的再生产相关的需要，就不太需要参加雇佣劳动了，而且在遇到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劳工斗争时肯定会更加坚韧。从这个立场来看，提高工人对商品交换的依赖才是对资本家阶级有利的。但这意味着要让劳工的生活水平得

① 我们必须在这个语境下考察家庭在确定劳动力的价值时所起的作用这个大问题。参见《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中的辩论——这是由塞科姆（Seccombe）（1974）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亦见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1976）；希默尔魏特（Himmelweit）与莫恩（Mohun）（1977）和马洛斯（Malos）（1980）。

以上升、让劳动力的价值得以提高。

倘若听其自便，那么个别资本家无疑会想方设法地压低工资。因此，“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不费分文的地步”。资本家的这种努力越是成功，他们能够对劳动大军施加的控制就越小：“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11]（《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因此，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冲突：资本家既需要节省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以便提高剥削率，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经济依赖的纽带来控制劳动大军。只有当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家才能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时，资本家才能完全获得在工作地点支配劳动的权力。

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多半密切关系到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家庭中的劳动过程的变化、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变化、家庭生活的结构、阶级意识的状况、阶级斗争的形式等等。马克思在他的积累模型中排除了这些因素。我们实在不能为此责怪他，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困难而复杂的。然而，批判性地审视他模型中的假定的确可以让我们就支配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产生一些有趣的思考。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改变了；这是否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延伸，即通过更强的物质上的依赖——这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来控制劳动？这种对控制权的追逐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持久的倾向：使工人及其家庭在更低的程度上承担自己的再生产成本？这类问题正是我们可以提出来的。①

① 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既然增加了劳动者及其家庭对资本的依赖，就有可能同资本与劳动的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和谈判相联系——布洛维（1979）报道了这种情况。资本家多半意识到了增加依赖是对自己有利的，而且的确往往会专门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来鼓励增加劳工的负债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这促使我们考察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问题：马克思未能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支配性过程展开任何系统性的研究。毕竟，劳动力是唯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的商品。它也是唯一并非直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它是由一种社会过程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家庭向来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至今也仍然如此；这些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可能会受资产阶级影响，会被各式各样的国家干预所束缚，但是归根到底总是处在工人阶级生活的范围内。由于劳动供给的数量和性质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是一个重要的侧面，所以我们或许会期待马克思对它有所谈论，即便这番谈论只是为了把更为详细的考察往后拖延。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发挥，而且后来毫无疑问再也没有提到它。这个遗漏也许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最为严重的缺口之一，而且可以肯定是极其难以填补的，原因无非在于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隐藏在极为复杂的迷宫里，因而分析仿佛无从着手。①

为了在这种批评面前捍卫马克思，我们可以指出，研究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为了确证两点：不论劳动力的供给是怎样的，资本都会制造产业后备军；我们在解释贫困和失业时也可 164
以不用涉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提

① 这个话题值得广泛地加以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汤普森（1963）、福斯特（Foster）（1975）、斯科特（Scott）与蒂莉（Tilly）（1975）、梅亚苏（Meillassoux）（1981）和其他许多学者都承担了这个任务，女性主义文献则对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以一些重要的方式重塑了这场讨论的内容和方向——例如参见艾森斯坦（Eisenstein）（1979）、汉弗莱斯（Humphries）（1977）、哈特曼（Hartmann）（1979）和李科克（Leacock）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42；1972 版）写的“导言”。亦见扎列茨基（Zaretsky）（1976）、东泽洛（Donzelot）（1979）和梅里尼亚（Mérignas）（1978）。

到这些过程，尽管他们的理解是很糟糕的。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理论的攻击——李嘉图欣然接受了这种理论，没有加以批判——是明确而激烈的。马克思极其尖锐地对马尔萨斯式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指责：大量人口的贫困和苦难被归咎于一种据说是“自然的”人口规律。马克思则认为，根本没有“普遍的人口规律”，“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12]（《资本论》第1卷，第62页）积累的一般规律非常成功地证明了资本对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是马尔萨斯所表述的、李嘉图所接受的“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13]。

然而，一旦我们试图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推向更加现实的领地，问题就出现了。马克思提示说，为了做到这种推进，关于积累与关于人口增长的理论必须被构造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写道：积累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人口即活的劳动能力的最大限度增长”[14]（《大纲》，第608页）。进一步讲，“只有在人口这样绝对增加（虽然和使用的资本相比，人口相对减少了）的条件下，积累才能成为经常的不断的过程。人口增加表现为积累这个经常过程的基础”[1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7页；参见《大纲》，第764、771页）。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那样，人口的增长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表现为一个重要的、隐藏的假定。大体上讲，马克思所谈论的过程在绝对人口减少的条件下似乎无法有效地运行，而且劳动的供给越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而迅速扩大，积累的循环波动似乎就会变得越不显著。①

① 见斯威齐（1968，第222—226页）和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

但至于人口的增长与资本积累是由哪些机制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却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见解。在谈论哪些特征会促进人口的高速增长时（较早的结婚年龄、出生率的上升等等），马克思的文字与马尔萨斯并没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仅仅补充了一点——这一点极为重要——由于没有机会获得生产资料，劳工的家庭不论在繁荣的时期还是在萧条的时期都会同样努力地积累它所拥有的唯一“财产”形式：劳动力本身（《资本论》第1卷，第643页）。但是资本主义之下的人口增长的规律——假如有这些规律的话——仍然有待说明。就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而言，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似乎都受困于同一片广大 165
的无知的沼泽。

倘若总人口中参加雇佣劳动的比例提高了，劳动力大军就同样可以扩大。这种“潜在的”产业后备军[16]——这是马克思对它的称呼——可以有诸多存在形式：家庭中的尚未作为雇佣劳动者就业的女性和儿童、独立的自耕农和手艺人、各种各样的工匠，以及其他众多不用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售就可以维持生计的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倾向于消灭所有这些社会形式——其中许多都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遗迹——并提高必须出售劳动力才能生活的人口的比例。在马克思本人的时代，这个比例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相对较小的。只有到了相当晚近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才缓慢地渗透了生活的全部领域，把雇佣劳动变成了生存的一般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在逐步前进：让价值规律得以不受限制地运行的条件正在臻于完善。然而，现代无产阶级的创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原始积累的最初时刻一直到当下，它都包含了暴力的剥夺、各种各样的法律诡计和为数不少的欺诈。因此，对潜在的产业后备军的发动不能被

看作一项简单的或容易完成的任务。①

当全部体格健壮的人口都参加了劳动大军之后，通过上述手段来进行的劳动供给的扩大就达到了极限。尽管这个极限在一些发达的工业经济体中已经快要达到了，但是世界的其他部分还有大量后备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体被消灭的例子，这些经济体的民众也由于市场的力量或物理的暴力而变成了无产阶级。这在19世纪中期发生在了爱尔兰人身上（这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在发挥作用，因为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被引入了美国的劳动力大军，阿尔及利亚人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成了瑞典劳动大军的一部分，如此等等。这一切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问题的边缘，它也触及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资本与劳动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机动性（见第12章）。

对产业后备军的发动——特别是对“潜在”部分的发动——依赖于劳动和资本在社会和地理两个方面的机动性。例如就劳动而言，倘若“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那么利润率就能更快达到均衡，资本积累的激情也能更快得到满足[18]（《资本论》第3卷，第196页；第1卷，第632页）。高度机动的劳动大军对于资本主义成了一种必要。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找出一个矛盾。产业后备军只要仍然存在，从而给已经就业的人带来永久的威胁，就可以起到压低工资率的作用。劳动的机动性无法达到完全从资本的掌握中逃脱出来的程度。就此而言，资本在世界舞台上更高的机动性——由此在全世界阻止了逃

166

① 列宁的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版）仍然值得阅读。[17]

脱的可能性，并把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拖进了商品交换的关系乃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维持为积累而积累是至关重要的。

劳动供给的社会学的、人口学的和地理学的方面对于任何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都十分重要。但是考虑到马克思建立这第一个积累模型的主要目的，这些方面就可以被合理地放在一边。马克思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严格的、卓越的证明：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之下发现了苦难、贫困和失业，那么它们必须被解释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不能被归咎于“自然”。然而，一种更加全面的积累理论要求丢弃一些较为局限的假定；马克思在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模型中就是这样做的。

2. 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积累

在《资本论》第 2 卷的末尾，马克思把资本积累从生产领域中提取出来，并在交换领域中为它的特征建立了模型。“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探讨了让积累以平衡的方式通过经济体的不同部门或“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来进行所需的条件。马克思所构造的“再生产方案”一直以来都持续吸引着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而且对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都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往往处于“地下”。因此，这些方案得到了详细的解剖和分析；研究者还探讨了它们的变种，而且既用它们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用它们来说明资产阶级理论。由于别的地方出版了许多对这些方案的描述，所以我将简单地概述它们的主要特征，并对它们做出解释和评价。[①]

① 完整的描述可以在德赛（1979）、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森岛（1973）和斯威齐（1968）那里找到。

马克思诉诸使用价值的准则来把一个经济体拆分为两个
167 “部类”。第 1 部类生产固定资本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即以生产性的消费为目的的使用价值。第 2 部类则为个人消费——工人的必需品和资产阶级的奢侈品——生产使用价值。之所以要建立一个两部门的积累模型，是为了说明若要使资本积累在长期达到平衡，就必须在生产资料的生产（第 1 部类）与消费品的生产（第 2 部类）之间如何保持一定的比例和一定的相对增长速度。然而，马克思在文本中多次表示，进一步的拆分也是必要的——例如，第 1 部类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可以区别开来，第 2 部类的必需品与奢侈品也可以区别开来。

两个部类中的投入和产出在物质上的数量必须恰好具有合适的比例，资本积累才能平滑地运行。第 1 部类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恰好满足全部生产者对机器、原材料等物品的需要。第 2 部类所生产的消费品的数量必须恰好可以维持劳动大军惯有的生活水平，并满足资产阶级的欲求和需要。商品的物质形态和数量在这些积累模型中起到了潜在的重要作用（《资本论》第 2 卷，第 94 页）。

部类之间的物质交换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由此可见，部类之间的货币交换也必须达到平衡。为了在研究这个过程时避免过多的复杂情况，马克思假定所有商品都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竞争的影响被忽略了，因为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商品是按照生产价格而非价值来交换的。马克思也完全撇开了市场上货币价格的波动、实际的货币流动、信用体系等等。他声称这些再生产方案只讨论使用价值和价值。但他的分析实际上差不多完全是从价值的角度来展开的，几乎没有涉及物理的、物质的数额。

 马克思对价值流动的分析一部分用的是文字，一部分用

的是数字。用代数的方法来表达这个观点要简单得多。第1部类的总产出 W_1 可以表达为 $C_1+V_1+S_1$，对于第2部类则有 $C_2+V_2+S_2=W_2$。如果资本要积累，两个部类就必须各自重新投入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购买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将总产出的价值的各个成分拆解为两个部类：

第1部类（生产资料） $C_1+V_1+S_{01}+\Delta C_1+\Delta V_1=W_1$

第2部类（生产资料） $C_2+V_2+S_{02}+\Delta C_2+\Delta V_2=W_2$

这里的 S_0 表示在再次投资了额外的生产资料 ΔC 和额外 168
的可变资本 ΔV 之后仍然有待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数额。

为了使这个体系达到均衡，第1部类的生产资料的总产出（W_1）必须恰好等于第1和第2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C_1+\Delta C_1+C_2+\Delta C_2$）。如果假定工人和资本家把自己的所有收益都花费在消费品上面，就有 $W_2=V_1+\Delta V_1+S_{01}+V_2+\Delta V_2+S_{01}$。由此很容易证明，为了维持平衡的增长，部类之间需要有如下交换比例：

$$C_2+S_{02}+\Delta C_2=V_1+\Delta V_1+S_{01}$$

用文字来讲，这不过是说第2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必须恰好等于从第1部类产生的对消费品的总需求。倘若不能保持这个比例，就无法维持平衡的资本积累，从而会引发比例失调的危机（即生产资料或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

马克思有一个用数值表示的例子，它具有一些有趣的性质，因而值得加以重构。两个部类的产出如下：

第1部类 $4000C+1000V+1000S=6000=W_1$

第2部类 $1500C+750V+750S=3000=W_2$

需要注意的是，两个部类的剥削率 s/v 是相同的，但是两个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 c/v 和利润率 $s/(c+v)$ 是不同的。利

润率并没有平均化——这是由于马克思做了一个简化，即商品是按照价值而非生产价格来交易的。

为了使这个体系保持平衡，再投资必须具有如下比例：

第 1 部类　$4000C+400\Delta C+1000V+100\Delta V+500S_{01}-6000=W_1$

第 2 部类　$1500C+100\Delta C+750V+50\Delta V+600S_{02}=3000=W_2$

按照这里的设定，马克思假定了只有资本家会储蓄，而且他们只会在自己的部类中进行再投资——这个假定略显怪异，因为按照通常的描述，资本在部门之间是高度机动的。还需要注意的是，再投资的发生并不会扰乱资本的价值构成。这个模型并不包含技术变革。这又是一个怪异的假定，完全违背了第一个积累模型对技术变革的强调。两个部类的再投资率也是不同的——第 1 部类的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变成了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而第 2 部类的资本家只转变了他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五分之一。如果我们依照马克思的数字持续进行多年的积累，这个再投资函数就会发生某种奇怪的变化。为了保持体系的平衡，第 2 部类的资本家必须在第二年和之后的每一年把他们的再投资率提高 20% 到 30%。

这些独特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要归因于马克思对数字的选择，但的确有助于使我们专注于两个部类的相对再投资率——它们对于维护体系的稳定十分紧要。我们如果将这两个再投资率分别记作 a_1 和 a_2，并以同样的方式将两个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记作 k_1 和 k_2，就可以证明扩大再生产当中的均衡交换需要如下条件：

$$\frac{a_2}{a_1}=\frac{1+k_2}{1+k_1}$$

也就是说，相对再投资率必须反映出两个部类的价值构成的差别［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第 191 页］。

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部类中就业扩大的相对速度是按照再投资率和价值构成来变化的。

马克思所建立的资本积累的两部门模型似乎表明，在合适的条件下——包括资本家正确的再投资战略——积累可以在相对没有麻烦的情况下永远持续下去。这个描述了无休止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模型当然吸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严重的两难。假如资本主义可以无休止地保持积累，那么马克思主义者预言资本主义的无可避免的灭亡还有什么根据？甚至连预言危机的无可避免的形成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为这些问题烦恼不已的卢森堡拿出了《资本积累论》这整部论著来猛烈谴责马克思在表述再生产方案时的错误和遗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论战，我们必须考察这些方案所包含的假定和马克思建立它们的用意。

马克思的目的是不难看破的。他希望改进魁奈的名作《经济表》，其中“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19]（《资本论》第2卷，第359页）。简言之，他希望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但他还想要理清这样一种过程所包含的矛盾。于是，他打造了一种手法，让自己得以在各个部类中识别出产量、价值交换和就业的成比例的增长率；倘若这些比例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危机。之所以花这么大工夫来界定均衡，一如既往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均衡状况的偏离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是无可避免的。

为了评判这些再生产方案所描述的平衡而和谐的增长，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中包含的局限的假定。我们首先应该注意

到，马克思的阐述方式违背了资本的概念——资本是一种持续的过程——从而背离了整部《资本论》第2卷在总体上采取的研究思路。这些再生产方案衡量资本的方法是：生产期间开始时可用的一定存量的投入品的价值（初始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上生产期间结束时为了购买额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再分配的剩余价值。必要的平衡是用一种“年初及年末”的会计程序来界定的，这种程序忽略了一年中的一切变化。这种会计程序还假定所有资本都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而且都在生产期间内被完全耗尽了——不存在作为货币或库存的资本，也不存在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固定资本。马克思是从高度简化的存量角度来建立积累模型的，而这可以使分析变得非常容易处理。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偏离了非常基本的，却又更加困难的流量概念，这个概念是他在之前的章节、特别是在讨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的章节试图加以推敲的。

第二，以完全排他的方式来强调价值交换并不符合马克思所陈述的目的，也违反了他的规则：决不能孤立地看待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平衡的增长事实上要求物质性的使用价值与货币交换也达到平衡。假如马克思丢掉了分析的其中一个维度，那还可以原谅，但是丢掉两个维度就无从辩解了；更有甚者，他所指定的意图还是在他的模型中考察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方面。他假如一直遵循这个意图，就会提出一些有帮助的见解。

例如，为了知道价值的平衡交换是否会与使用价值的平衡交换同时出现，我们首先需要的信息是一些技术性的系数，包括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的关联系数以及对商品在交换中的相对价值加以规定的系数。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概念，即可行的技术——它被界定为可以在部类之间同时使物质交换与价值交换达到均衡的生产技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与包含在消费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具有恰好合适的比例，否则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个维度就无法同时达到平衡。这显然对有可能采用的技术施加了严厉的约束。

马克思似乎意识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他在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使技术保持不变。这种处理与第一卷的积累模型对技术变革的强调有显著的反差。这个反差极为鲜明，从而直接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从平衡交换的立场来界定的“可行的技术”与在生产中维持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技术变革之间有潜在的严重冲突。各种要求之间的这种抵触倘若得到了恰当的识别和理解，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之下的危机进行解剖的工具。假如马克思扎实地提出了这样一番论述，给《资本论》第3卷中的积累的综合模型带来困扰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容易得多。因此，我们在下一节和下一章将回到“与技术相关的要求之间的抵触”这个主题，并进行详细的研究。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还含有其他诸多局限的假定，需要加以批判性的考察。他假定社会中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与劳动者——却忽略了分配的其他方面。货币的职能是纯粹的支付手段，没有贮藏，一个部类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投资到另一个部类，利润率没有平均化，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如此等等。有了现代数学的技巧，我们就有可能探讨其中一些假定被丢弃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已经获得了有价值的见解。

森岛在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有趣，因为它有助于阐明马克思致力于研究的一些基本主题。森岛考察了当一个部类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可以再投资到另一个部类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他的结

论是，马克思用数值表示的例子所描述的平衡增长会变得不稳定，“倘若生产工资品和奢侈品的第二部类具有比第一部类更高的资本价值构成（即更为密集地使用资本），平衡的增长路线就会发生……爆发式的振荡”。当第 1 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高于第 2 部类时，我们得到的只是“爆发，而没有波动”，也就是“对平衡的增长路线的单调的背离”。因此，从再生产方案中可以毫不费力地产生强烈的循环波动或长期慢性的不稳定性，而且马克思大概一直希望能对此加以分析。然而，森岛的模型所针对的情况还具有特别的趣味，因为它表明了利润率在竞争中的平均化会干扰均衡增长所需的平衡。这一点本身就巧妙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主题：平衡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森岛，1973，第 125—127 页）。

森岛的模型也包含了一些假定，并受到了公正的批评。德赛就此指出，资本家倘若改变了他们的再投资率，而不是像森岛所假定的那样具有不变的再投资率，也许就能够减弱长期的不稳定倾向和爆炸式的循环振荡的倾向。但这样一来，资本家可能又会造成失业率的循环变动，而这凸显了另一个困难：“可行的技术”和“适当的再投资率”尽管提高了对劳动的需求，却根本不能保证这种提高会与劳动的供给相一致。这将我们带回了第一个与第二个积累模型为持续的资本积累设立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德赛，1979，第 16、17 章）。

172

由此可见，我们也没有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本人思想的错综复杂性。恩格斯从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的笔记中重构的那一章是漫长的、曲折的、吃力的，却仍然具有深刻的想象力，包含了大量很难整合到简化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当中的材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在那之前的一些有趣章节，它们写的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马克思对于潜伏在他所采取的分析思路

背后的困难实在太了解了。倘若在这一大堆材料里面挑三拣四地列出一些问题，把它们说得特别重要，也许就会显得有些令人反感；但有三个问题是十分醒目的。

第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劳动力的再生产被整合到资本流通当中了。工人实际上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20]，在交换领域和生产领域都是如此。马克思虽然在这里不是非常关注细节，却看到了“平衡的积累”要求劳动者用他们所拿到的可变资本从第 2 部类的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这取决于工资率——成了一个可能支持或损害平衡增长的要素。《资本论》第 1 卷所描述的过程解释了工资为什么无法远远超过国民产出的某个均衡比例，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主导性的压低工资率的倾向——它会使工资率大大低于这个均衡比例。在《资本论》第 2 卷中，我们看到了当工资下降到大大低于这个均衡水平时，为什么必定会招致部类之内和部类之间的资本流通危机：劳动在总产品中的份额的迅速变化会干扰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平衡的资本积累。

在交换领域中把工人阶级转变为资本的单纯附属物——“可变资本”——产生了不可胜数的社会后果。一旦工人的消费被整合到了资本流通当中，他们在交换关系的领域中的独立和自主就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资本家必须设法予以消除。生产工资品的资本家不得不生产特定的、符合工人的欲求和需要的使用价值。毕竟，工人作为货币的拥有者可以“自由地”行使消费者的选择权。可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工资来支付的 173
可变资本若要平滑地转换为第 2 部类所生产的商品，那么“合理消费”就是必要的——这种合理性是从资本积累的立场来看的。资本通过复杂的机制伸展到了生活地点，以便确保工人会“合理地消费”，并确保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具有必不可少的

数量和性质。马克思本人嘲弄了“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是如何“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的：因为他们“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感到不满意”[21]（《资本论》第2卷，第515页）。我们还应该把诸多劝说和支配的手段补充进来，包括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来发动的手段（当然通常是以公共福利的名义）；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消费习惯就可以大致遵循“为了积累而合理消费”的要求。然而，我们越是在这条道路上探险，就越是被迫要进入大体上被马克思忽略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① 但从活的劳动者到单纯的可变资本的转换让我们得以觉察到——无论这种觉察多么模糊——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思路：与劳工的生活品质相关的斗争。

第二，马克思在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的问题上有一番简短的游走。这个问题实在带来了太多困难，无法被整合到扩大再生产的模型当中；但在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很长一章里，马克思相当多地谈论了为固定资本项目——它们会持续多个生产期间——找出均衡的投资率的问题。他在那里指出，生产固定资本和流动的不变资本的第1部类必须面对一些独特的问题，如再投资的时机、货币流动等等。他提出，即使在最苛刻、最简化的假定下，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也很有可能造成强烈的循环运动，从而有可能迅速发展成危机。因此，一旦在这里的图景中引入了固定资本，两个部类之间的资本流通就必定会至少在均衡点附近振荡。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一项重要的未竟事业——鉴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单独的考察。

① 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会由于资本积累而转化成听命于剥削的模式，但我们决不应该掩饰这种转化的难度。它在生活地点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斗争，这是资本主义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见卡斯特（Castells）（1977）和哈维（1978）。

第三，虽然货币在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中被当作支付手段，但在文本中有无数说法指出，货币的生产和流通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马克思排除了货币资本和信用体系所带来的问题，理由是它们会掩盖价值流通的实际过程（《资本论》第2卷，第421页）。但他也承认，货币流通和信用的创造具有现实的后果，而且货币商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第1部类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性质（例如，在生产的各个分支当中，只有它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在购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吸收的货币）。马克思在这一切讨论中试图假定“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22]（《资本论》第2卷，第420页）。至于这些货币从何而来、谁对它们的供给负责，以及这种供给如何“促进了”交换或“为资本预付提供了方便”，那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我们将在第9章和第10章回到这些问题。这一切未必会妨碍扩大再生产的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假定了资本仅仅作为商品而存在。但若我们追求的是更加现实的模型——资本在其中还要采取货币和生产用具的形式，这些生产用具会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那么关于货币和信用的整个问题就会成为分析的根本。

这三个话题绝不可能穷尽马克思在分析通过交换来进行的资本积累时提出来的，却未曾解决的问题。我之所以将它们挑出来加以谈论，既是为了显示马克思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讨论是具有想象力和丰富性的，又是为了说明一些在我试图建立的总体论述中极为重要的观点。例如就可变资本的流通而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些力量是与促使无产阶级不断贫困化的力量相反的。通过把第一个与第二个积累模型关联起来，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一些力量，它们可以导致均衡的工资率或工

资在总产出中的均衡份额。一旦过多地偏离了工资在总价值中的均衡份额，很可能就会造成资本流通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会冲击交换领域或生产领域，这取决于工资是高于还是低于均衡价值。决定工资的社会过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阶级斗争等等——确保了这种均衡只能在偶然中达到。生产与消费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当中是无法保持平衡的（见后面第3节）。

那么，就对扩大再生产方案的总体评价而言，我们现在置身何处了？马克思毫无疑问并不试图用他所建立的框架来为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实际状况或投入产出结构的现实状况建立模型。假如按照这样的规划来评判，这些再生产方案就只具有历史的趣味了——这种历史的趣味在它们的时代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却缺乏当代模型的力量。倘若从马克思本
175 人的规划出发来评判，这些方案就可以得到一种相当不同的解释。设计它们是为了在理论中得出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见解，而要产生这些见解，就要为一个“理论对象”——它是针对以交换为手段的资本流通的领域来界定的——建立精密的模型。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见解有怎样的本质，以及它们可能得到何种正当的使用。

在《资本论》第1卷中[23]（第578页），马克思写道：

>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我们在第一个积累模型中也看到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或积累”会如何“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24]（《资本论》第1卷，第613页）。

再生产方案让我们得以从交换关系的立场来考察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在流通时仿佛穿过了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者的身体，并由此将劳动者变成了资本流通本身的单纯附属物。资本家同样被资本流通的规则监禁了，因为只有遵守这些规则，才能确保不变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大以及更多剩余价值的生产。简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规则支配了整个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它的规模会逐渐增加。

单纯从交换的立场来看，这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仿佛的确是相对不成问题的。诚然，对平衡积累的任何完整的描述都应当考虑到无数独特的和复杂的情况。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带来的困难、考虑库存时的问题、货币资本的存量、信用体系的运行等等都是挥之不去的麻烦。但是其中的许多问题要么在分析中消失了，要么至多在持久的再生产过程中——它原本运行得十分顺利——引起了一些循环振荡。

即使详尽地探讨这些额外的特征，也只能稍微敲打一下马克思的模型——它们所描述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是无休止的，而且处于相对没有麻烦的状态。这些模型假如直接就其本身来看待——完全把它们与马克思的总体规划分割开来——就理应受到卢森堡对它们做出的猛烈谴责。卢森堡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事实上是相当正确的：马克思在他的再生产方案中完全没有解释有效需求从何而来，而有效需要是用来在交换中实现商品的价值的。但是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如实地对待了他自己。毕竟，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原则性观点是我们绝不可能通过对交换领域的分析来发现利润从何

而来的秘密。在《资本论》第2卷关于剩余价值的流通的章节，马克思针对有效需求给出了恰好相同的观点。我们不论挖掘得多深，都绝不可能在交换中发现资本是如何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生产领域——“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场所”。因此，正是在生产领域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25]（《资本论》第1卷，第176页）。资本也正是在生产领域中才得到了实现（见前面第3章）。这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因（primus agens）的“为积累而积累”所具有的最终含义。

这一切当然会迫使我们考察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在生产领域中对资本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则，另一边是在交换领域中对平衡的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则。从马克思的总体规划的语境来解读，再生产方案给出了我们所需要的大多数理论见解。只要技术变革被制约在严格的界限内，只要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并始终按照价值来交易，只要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利润率也没有平均化，那么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平衡积累的确有可能是无休止的。一旦我们放松了这些假定，第一个积累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在那里是慢性而长久的干扰——就会出现在交换过程中。在交换中必定具有主导地位的“可行的技术”也就会无休止地被生产力的革命所扰乱。

简单地讲，让生产领域得以达到均衡所需的条件与让交换领域得以达到均衡所需的条件是矛盾的。资本主义所处的状态绝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要求。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就可以建立第三个积累模型了——这个模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证明了这些矛盾为什么是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3. 利润率的下降及其起反作用的影响

《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模型证明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代表了一种生产与流通的统一。马克思在第3卷试图超越“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以便“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26]（《资本论》第3卷，第25页）。

马克思假如完成了他的规划，就必定会把前两个模型的见解综合起来，并建立第三个积累模型。这个模型必定会描述并反映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描绘出它们在现象世界中的表现。对马克思来说，这意味着解释危机的起源、职能和社会后果。

177

不幸的是，马克思未能有效地完成他的规划。关于第三个积累模型可能是什么模样，他只为我们留下了一番初步的勾勒。他的观点立基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他宣称：“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27]（《大纲》，第748页）然而，利润率倾向于降低并不是一个新观点。斯密、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逐渐用尽了力气，最后堕入一种积累速度为零的“静止状态”。马克思极其渴望使《资本论》成为一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真正的运动规律”的阐述，因而他试图建立的模型既要解释所谓的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同时又要识别出资本主义之下的危机的起源。

古典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密）是用资本主义的运作之外的因素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倾向的。李嘉图提出，犯错的是自然界，因为农业生产率受制于回报的递减。像这样诉诸“自然”

是马克思深恶痛绝的；在面对利润下降的问题时，他针对李嘉图讲了十分尖刻的话："他从经济学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28]（《大纲》，第754页）马克思要在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中寻找这些现象的原因。他所构造的论述既卓越又简单。

他说，让我们这样来界定利润率：

$$p=\frac{s}{c+v}=\frac{s/v}{1+c/v}$$

我们从第二个表达式可以看出，利润率与资本的价值构成是反向变动的，与剥削率的上升则具有正向关系。倘若剥削率提高的速度低于价值构成提高的速度，我们就会得出利润率的下降。

一般而言，马克思认为剥削率只能以递减的速度提高（见前面第55页和第155—156页）。在已经严重贫穷的劳动力大军身上压榨出更高的剥削率只会越来越困难，阶级斗争的状况和让工人阶级保持少量消费的需要也会施加限制性的影响。进一步讲，我们可以证明随着资本的价值构成越来越高，利润率对于剥削率的变化就越来越不敏感（见斯威齐，1968）。

178 因此，若要证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重点就在于证明资本的价值构成倾向于不受约束地上升。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提到了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规律"，认为它足以应付这个任务。然后他总结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断发展"，就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引发无休止的利润率下降的倾向[29]（《资本论》第3卷，第212页）。马克思就是凭借这种简单的招数来使利润下降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相容的。

但由于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所以"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

率下降，就会让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是更大、更快”[30]（《资本论》第3卷，第232页）。这条“规律”其实是一种“倾向”，因为它会被一连串起反作用的情况所改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六种这样的起反作用的情况，但是其中两种（对外贸易和股份资本的增加）未能遵循他一贯的假定（经济体是封闭的，剩余价值的概念也排除了分配的情节）。留给我们的是（1）剥削率的上升，尽管上升的速度在减慢；（2）不变资本的成本的下降（从而抑制了资本价值构成的上升）；（3）对工资的压低，使它们低于劳动力的价值；（4）产业后备军的增加（由此减弱了把劳动力替换为机器的动力，从而在技术进步的铁蹄面前保存了某些部门）。在《大纲》中[31]（第750—751页），马克思列举了有可能“以不同于危机的方式”使利润率保持稳定的诸多其他因素。他写到了“一部分现存资本价值的不断丧失”（我假定他在这里指的是有计划的淘汰），“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例如对公共工程的投资），以及“非生产的浪费”（当代的文献如今经常把军事开支用作这方面的例子）。他还继续说道，利润率的下降可以“通过建立这样一些新的生产部门来加以阻止，在这些部门中，同资本相比需要更多的直接劳动，或者说，劳动生产力……还不发达”（即开辟或保存劳动密集型的部门）。最后，垄断也被当作针对利润率下降的一剂解药。

用温和的话说，这里所考虑的一连串因素有些混杂。它们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审视，而马克思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他也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对它们的扎实分析。一些因素——如工资落到低于价值的水平——似乎至多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而另一些因素——如节省不变资本和开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线——似乎具有长期保持利润率稳定的潜力。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因素——如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和对非生产性的开支的投资——或许最好被解释为对利润下降的回应，而另一些因素——如保存或开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以及节省不变资本——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孕育的技术变革而“自然”发生的。

无论这一切有何种可能，马克思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确定的印象：不论是单独来看还是放到一起来看，这一连串混杂的起反作用的情况都无法成功地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长期倾向。它们至多只是拖延了无可避免的事件。所以，他可以将自己的论述坚持到底，得出最后的结论：

> 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32]（《大纲》，第 749—750 页）

表面上，马克思做到了一箭双雕。就利润率为什么必然下降而言，他对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了纠正；同时他又勾勒了一个模型，其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中的具体表现。不幸的是，他的论述是不完整的，也根本没有得到严格的说明。尽管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编辑使这番论述获得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形态，但这份文本还是受困于各式各样的含混。

因此，马克思对这条规律的解释和使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了一场庞大而持久的论战的焦点，同时也在资产阶级的地盘上遭到了大量蔑视（鉴于这条规律所描述的内容，这

种蔑视很难令人惊讶)。人们从诸多立场(包括理论的、历史的、经验的立场)研究了这条规律,仔细考察了它的政治影响,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了解释。我不会尝试去概述这场论战或它的展开方式,因为想要这样做的人可以用关于这个主题的无数文章来尽情款待自己。[①] 但我显然需要对这个模型——马克思的第三个积累模型——做一些评价。

这番评价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第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从利润下降的"规律"本身出发,考察这条主张的严格性、逻辑上的连贯性和历史意义。在更为一般的第二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考察这条规律(或它的某个版本)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综合了前两个积累模型的发现,由此为整个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提供了一种扎实的解释。

接下来我将论证:马克思急于纠正政治经济学家,而这诱 180
使他对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综合模型做了错误的说明。更具体地讲,马克思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接手了利润率会无可避免地下降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一个研究对象,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偏离了他自己论述的逻辑,以至这条原本处于外围的命题仿佛具有了根本性,而根本性的主张却被掩埋在了一大堆外围性的论述中。结果,马克思并没有成功地综合前两个积累模型。他也没有恰当地讨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社会的"表面上"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不过在所有这些缺点之外,他的确设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根本来源很可能是什么:那就是生产力的演化与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基础的社会关系

① 法恩与哈里斯(1979)和赖特(1978)的概述是很有用的。科戈伊(Cogoy)(1973)、德赛(1979)、霍奇森(1974)、森岛(1973)、斯蒂德曼(1977)、斯威齐(1968)和亚夫(Yaffe)(1973)的意见也是很好的样本(A good sampling of opinion)。

之间的矛盾。让我们使这个一般论点充实起来。

然而，首先应当澄清的是这条所谓的“规律”的确切地位。例如，有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是在理论中宣称，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如果存在，就必须用与资本主义的总体运动规律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其二是像马克思毫无疑问在多个场合所做的那样，坚持认为这条规律把握了资本主义动态的唯一内在逻辑，同时又解释了实际利润率的现实的、可以观察到的历史趋势（《大纲》，第748页；《资本论》第3卷，第13章）。事实上，关于这条规律在认识论上的确切地位有大量的混乱——这种混乱的标志是马克思用了多种方式来指涉它，如“规律”“倾向”，乃至“倾向的规律”[33]。为了方便起见，我仍旧把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称作一条规律，但并没有假定这样一个标签给这个论点赋予了任何特殊的认识论地位。

这条规律的理论意义是相当清楚的：恰好由于个别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实行了技术革命，所以与作为资本而流通的总价值相比，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然而，马克思是按照价值而非市场价格来说明这条规律的，因而长期的和短期的货币因素（比如地方性的通货膨胀或金融恐慌）都不能被包含在分析中。这意味着这条规律无法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动态的“表面现象”。不仅如此，利润还被解释为未经分配的剩余价值——分配的项目有租金、利息、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的利润、税收等等。比如说，这意味着产业资本的利润率的上升或下降可能是由分配的变化所造成的，而没有反映马克思所界定的利润率的变动（《大纲》，第751页）。

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提防把这条规律当作直接的历史命题或经验命题的做法。例如，我们不能将美国自1945年以来

关于公司利润的数据汇集起来，并诉诸这些特殊的历史记录来证明或驳斥这条规律。就连更为勇敢、更为精巧的尝试——比如吉尔曼（Gillman）（1957）试图长期记载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和利润率的变化——也是可疑的，因为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尽管必须得到研究，却是很难确立的，而分配安排的变动也极大地将水搅浑了（尤其麻烦的是描述税收）。被价格的变动和分配份额所占据的历史记录无法轻易地与利润下降的规律站到同一个舞台上。①

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这条规律可以承担的分量至多是解释长期而持久的停滞和猛烈的周期性的危机——尽管这也不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倾向于强调危机，但至于资本主义是否可以通过不景气和合理化——它们会在危机的进程中出现，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猛烈——来克服长期衰落的内在倾向，他的文本是相当混乱的。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流派。②

不幸的是，即使作为纯粹的理论命题，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也没有得到特别良好的打磨或严格的界定。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所使用的对利润的界定：

$$p=\frac{s/v}{1+c/v}$$

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真正清楚地说明不变资本 c 指的是什么。可能性有三种：（1）在一年的进程中被耗尽的（保存下来的）不变资本；（2）在一年中一直被使用的不变资本（这就包括了没有被耗尽的固定资本）；（3）为了购买不变资本而预付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诸多要素的周转时间就成了计算的关键）。马克思本人在前两种界定之间摇摆，偶尔也会

① 亦见德赛（1979，第193—198页）所做的讨论。

② 屈内（Kühne）（1979）和斯威齐（1968）总结了一些辩论。

提到第三种。恩格斯认识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第2卷的发现处理得不够公正，于是插入了一整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34]——还经常添加一些句子和段落，以便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表述这个问题时的一处在他看来十分严重的遗漏。

总体上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论述反映了他在第1卷中的思考，却极少涉及第2卷的有力表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留传给我们的第3卷的文本显然是在他针对第2卷开展广泛的研究之前写的）。既然他的分析排除了固定资本
182 和周转时间，留给我们的对 c 的界定实际上就是在一年的进程中被耗尽的不变资本，而对利润的界定根本没有综合前两个积累模型的分析结构。简言之，倘若我们愿意假定所有部门的所有资本都在一个标准的生产期间内被生产出来并被耗尽了，马克思对利润率的衡量或许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局限的界定也许出于某些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却很难充分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在社会表面上”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了。

进一步讲，我们在第4章提出的所有理论性的反对意见——关系到资本的技术构成、有机构成与价值构成的关系——现在完全发挥作用了：它们也反对马克思对利润下降的规律所做的说明。让我们在这里的论述中依次引入这些反对意见。

马克思当然完全明白，技术变革——这会降低固定资本和流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抬高利润率，或者至少抵消所谓的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但他并没有直接解释这些变革为什么不能使总的资本价值构成保持稳定，从而不能在长期使利润率保持稳定。因此，他的批判者指出了一个所
298 谓的偏见：马克思的理论偏向于“节省劳动的”创新，而不是

批判者所说的“节省资本的”或“中立”的创新——有人认为这种偏见在马克思本人的年代是理所当然的，但鉴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技术进步的主流形式，这种偏见已经不再成立了。[①] 这是一种对整个问题略显不幸的描述——我们应该注意到，它源自资产阶级理论——因为马克思关注的只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价值比例的变动。就此而言，凭借《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方案，他手中就有了一件便利的工具，可以探讨两个部类中的技术变革在速度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这两个部类所生产的物品分别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森岛（1973，第160—163页）和希尔彻（Heertje）（1977）由此证明，技术变革的一种特殊分配——这种分配尤其聚焦于以生产资料为产品的第1部类的某些部门——可以导致整个经济体中的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乃至降低。当这样一种结果得以出现时，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眼中恰好指出了资本原形毕露的时刻——资本在这时演化出了在机器的辅助下生产机器的能力（《资本论》第1卷，第384页）。一个致力于用愈发精巧的机器来生产机器的经济体听上去当然有些疯狂，但它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的可能性在技术上的确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在资本主义之下调节技术变革的社会过程是否能保证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

由于个别资本家实行技术变革是为了回应竞争压力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立刻得出结论：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所需的技术变革的特殊搭配至多只能在偶然中达到。实际上，个别资本家由于掌控了自己的生产过程，所以只要设法将自己运用的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

183

① 见布劳格（Blaug）（1968）和希尔彻（Heertje）（1977）。

就可以极为顺利地前进。公司内部的技术创新始终是以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旨趣的。在劳工稀缺或阶级斗争高涨的状况下，个别资本家也有充分的动力节省自己运用的劳动力。反之，与此平行的动力——个别资本家试图节省不变资本的运用——要微弱得多。在资本主义之下调节技术变革的实际过程确实系统性地偏向于节省可变资本，而不是节省不变资本。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无政府性质阻止了技术变革的任何合理应用——“合理”是从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以便维持资本积累的立场来讲的。因此，就积累的要求而言，危机成了使技术结构合理化的手段。按照这样的说法，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在批判者的芒刺面前看来就远远没有那么脆弱了。因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所带来的真正困难不在这里。

从第 4 章第 4 节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构造另一条批评的思路。我们在那里证明了（如果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话）资本价值构成的水平会随着垂直整合的增进而降低。由此可见，个别公司所获取的利润率水平应该随着垂直整合的增进而提高——同样假定其他一切保持不变。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结果是一种幻觉，因为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针对的是被看作单一整体的经济体。他关注的是资本家——从总体上看——用他们所掌控的价值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速度。垂直整合倘若没有与技术变革、不同的剥削模式等等相伴随，多半就不会影响自在的、就其本身而言的创造剩余价值的总体速度。受影响的只是资本家会如何分享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当实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低于平均水平时，简单地增进垂直整合似乎就是一种在公司内部抬高或保持利润水平的办法。劳动力在这些状况下明显有机会遭到错误的配置。

增进垂直整合通常意味着加强资本集中，并使技术远离可

变资本，转向不变资本。垂直整合可能带来的利益也许会由于工作过程中的技术变革而流失。另一方面，较小的公司规模的好处是更快的周转，技术搭配通常也会更依赖于可变资本（虽然并不总是如此）。对生产的拆分——这是与技术搭配的变化相伴随的——也许确实提供了一种抬高总的利润率的手段。麻烦的是，垂直整合也有它的好处，因而会在恰好相反的方向施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判断说，利润率对于组织特性与技术特性的具体搭配是十分敏感的。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所考察的观念是生产的集中与分散的最佳程度——就持续的资本积累而言是最佳的（见前面第 139—150 页）。

正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发，我们才能评价马克思所设想的有可能使利润率保持稳定的一些办法。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办法要求把通常与资本的过度集中相抗衡的“排斥的力量”发动起来。第一，资本家可以开辟新的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从而供应新的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以便补偿较老的、资本较为集中的部门对不变资本越来越大的依赖。我们在这里可以引入“产品创新的循环”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经常观察到，新产品最初是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以较小的规模来生产的，最终则转化成了大批量生产的、不变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我们由此很容易证明，倘若产品的创新要充分补偿利润率的下降，就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快产品开发的速度。这在长期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生产线中增进公司的分工和专业化则为保持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力的机制。从历史上看，生产中的所谓“迂回性”（roundaboutness）有增强的趋势——先前整合起来的生产过程越来越被细分为单独的、专业化的阶段，而这些阶段是通过市场或更加直接地通过分包生产来协调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职能的专业化会导致更高的效

率，资本的周转时间也会减少（我们很快就会更加详细地考察这个现象）。由于较小的公司倾向于更加密集地使用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规模——而且由于职能的专业化会让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性质和劳动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所以结果可能是使总的利润率保持稳定，尽管对生产的拆分理应对利润率不利。①

有些机制阻挡了技术变革的步伐，从而同样有可能抑制利润率的下降。为了淡化竞争、淡化创新的冲动，庞大而有
185 力的组织有一大堆办法——收购、专利法等等。巨大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能会激起向劳动密集型的工艺回归的运动——例如血汗工厂［柯佩尔（Koeppel），1978］——特别是在机器变得比它们要取代的劳动力更加昂贵的情况下。一些批判者将这个论点推得更远了。他们说，对技术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只要从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调换到或重新调换到密集地使用固定资本的工艺，就可以轻易地使利润率稳定下来［霍华德（Howard）与金（King），1975，第207—210页］。范帕赖斯（van Parijs）（1980）则用置盐（Okishio）（1961）的一个证明显示了只要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保持不变，资本家在竞争中选择的工艺就必定会降低所有商品的单位价值（包括劳动力的单位价值），并提高他们自己的临时利润率和社会利润率，不论资本的价值构成有什么变化。只有在垄断时、在劳工的生活水平上升时，或者由于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带来的障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这个强有力的版本才会失效。

通过竞争来进行的创新未必会产生马克思所预言的特殊

① 关于大公司与小公司在劳动关系方面有何种差别以及这一点对于劳动生产率可能意味着什么，布洛维（1979）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后果。然而，它仍然有可能作为导致不均衡和危机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来起作用。假如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就像置盐（Okishio）所假定的那样，那么可变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就会减少，并由此引发生产、分配与实现之间的不平衡，除非对生产资料和奢侈品的需求出现补偿性的加速增长。一个经济体倘若固守这样一条轨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疯癫的”状况：用机器来生产越来越多的机器，或者依赖于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之间愈发悬殊的财富差距。此外，工艺的调换尽管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却更有可能是一种在危机的进程中强行推进的调整，而不是某种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完成的改变。

进一步讲，技术的调换和重新调换会产生成本。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要“迫使”资本家对技术进行重大的重组，从来都只能凭借“大灾难即危机”[35]（《资本论》第2卷，第170页）。由于固定资本的流通和使用所带有的“独特性”，这个观点就尤其准确了。然而，这会使我们置身何处？我们必须讨论马克思对工作时间（working period）、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固定资本的流通等问题的详尽研究，并把它们整合到利润下降的模型当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本溯源，重新界定利润，以便真正综合地反映《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思考。

我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资本被看作一种价值流通和价值扩大的过程。我们从《资本论》第2卷中看到，资本在流通的进程中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物质表达。这提示出了一种与马克思所用的公式相当不同的利润公式[①]：

186

① 杜梅尼尔（Duménil）（1975）激发了这方面的思想。

$$p'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货币资本} + \begin{matrix}\text{原材料、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库存} \\ + \text{半成品和成品的库存} \\ + \text{市场上尚未出售的商品的库存}\end{matrix}}$$

这里的分母意味着要从价值的角度来把握资本流通的不同阶段中的资本总量。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表述没有考虑周转时间的差异，而且假定所有产品都是在一个标准的周转期间内被生产出来并被消费掉的。它还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与资本在各个状态下的总存量相关的流量。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公式的流量版本可能是什么模样。我们倘若不知道生产和流通在经济体的不同部门中有怎样的结构、关于时间有怎样的要求，就根本无法着手对这个版本加以说明。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些结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如果采取了可变资本的形式，就会拥有双重存在：一方面，它的货币形式处于已经支付了工资的资本家与尚未收回这些货币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某处——这些货币是对供应工资品的商品生产者的回报——另一方面，它在商品形式中是作为在资本家的掌控下运作的劳动力而存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状况（《资本论》第 2 卷，第 15—17 章）。

但关于时间的要求是高度多样的，把它们纳入任何利润概念都是极端困难的（例如，不变资本的各个部分是以相当不同的速度被耗尽的）。我们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把流通时间的无限多样性还原为某个公分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理论中和实践中识别出某种“资本流通的正常过程”——我更愿意把它称作“社会必要周转时间”。通过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相类比，我将后者界定为“在正常的生产条件和流通条件

下——这些条件在当时具有主导地位——在一个特殊的部门中周转指定数量的资本所花费的平均时间”。

周转时间短于必要周转时间的公司将获得超额利润，即额外的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为了加快周转时间，很可能会有相互竞争的斗争。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快的周转时间会产生更高的年度利润率。周转时间可以通过诸多手段来减少，其中之一要求把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独立的阶段，并由独立的公司来掌控。我们已经看到，由此带来的动力是在生产体系中创造更强的“迂回性”（roundaboutness）。因此，与生产的不断拆分相联系的利润下降可能会被与更快的周转时间相联系的利润上升所压倒。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多半有一个与稳定的利润率相一致的均衡点。

然而，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概念，就会发现我们正在用它来涵盖众多复杂情况，但我们不应当漫不经心地把这些情况掩埋起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即使在公司内部也是以不同的速度来周转的，而不同部门的平均周转速度很可能有相当悬殊的差别。被封锁在水电工程中的资本也许要花几十年来周转，而在制衣工业设立一家血汗工厂所花费的资本也许过几天就能回收。差别如此悬殊的周转时间如何能被还原为某种共同的准绳，让我们能够比较利润率？

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是很关键的，就像对抽象劳动的解释——它如何成了一条准绳，借此可以评价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十分关键一样。假如周转时间没有共同的尺度，就不可能有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没有一条标准可以决定利润率是比平均水平更高还是更低，乃至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不断地提示了这个问题的

解决方案，却未能坚持到底并得出最后的结论；这个解决方案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机制可以将不同的周转时间还原为共同的基础，而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利率。商品的市场交换有助于把不同的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这个公分母，而环绕在货币本身周围的市场过程（特别是货币市场中的叫作资本市场的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具体生产过程——它们关于时间有具体的、往往极具特色的要求——还原为标准的社会必要周转时间。

然而，这个结论会深重地干扰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他坚持认为，利润的起源和利润率都可以独立于交换的情节来讨论。虽然利润的起源——对劳动力的剥削——的确可以这样来讨论，但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利润率无法独立于交换过程来讨论，除非是在某些高度局限的假定下（我们很快就会予以说明）。

马克思不愿意在他的分析中纳入分配的情节，这个做法源自他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激烈斗争——后者将分配当作根本，却利索地逃过了对社会生产关系加以考察的需要。但是马克思在另一个方向上犯了错误。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拒绝讨论信用体系和利率的作用，从而使一种有可能十分丰富的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无法充分地展开。他甚至未能把与周转时间相关的发现——这些发现尽管是有限的，却有深刻的提示意义——整合到自己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当中，从而使得后者无法被用作一种可行的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综合模型。

那么，就利润下降的规律而言，我们现在置身何处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挽救马克思的至少一部分论述、将损失最小化吗？

乍一看，我们可以做的仿佛至多是非常清晰地列出一些让

马克思的论述得以成立的假定。让我们假定：

（1）社会仅仅由两个阶级组成，即资本家与劳动者。

（2）经济体具有极其简单的结构，即所有商品都是在同一个标准时期内被生产出来并被消费掉的：这意味着一切周转时间都被视为相等的时间，不存在库存、商品贮藏或货币贮藏，而且固定资本没有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

（3）货币的职能是纯粹的交换手段，而且货币准确地反映并衡量了价值。

（4）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是，依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描述，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利润率肯定必须下降（还要假定马克思的利润公式是合适的）。使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饱受困扰的利润下降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这条规律中——如果更加严格地对它加以说明的话——可以收获的最重要的见解。

有些过程一开始就倾向于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只要对它们加以考察，根本性的主张就会出现。马克思实际上向我们证明，个别资本家——他们受到竞争的强制，受困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还要回应价值规律隐蔽的命令——会进行技术上的调整，而这会驱使整个经济体远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36]（《资本论》第3卷，第255页）。换句话说，个别资本家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当中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的，但是由此产生的技术搭配威胁到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破坏了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并使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岌岌可危。简言之，个别资本家必定会以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方式来行动。

不幸的是，马克思掩盖了这条根本性的主张，却专注于它的一种所谓的表达——利润下降的规律——以及这样一条规律所蕴含的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内涵。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同时从他的辩护者和诋毁者那里挽救出来，只要我们回到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矛盾所包含的根本原则，并从技术特性和组织特性的角度——资本主义肯定必须遵从这些特性，否则就无法获得平衡的均衡增长——来探寻这个矛盾的表达。

我们在《资本论》第1卷中看到，个别资本家既然掌控了自己的生产过程，就会在公司内部把技术变革用作资本积累的“杠杆”——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中，他们会用这根杠杆来针对别的资本家；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他们要防止后者过多地占有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者防止后者占有任何剩余价值——他们则会用它来针对劳动者。结果是：生产力无休止的革命和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正是马克思试图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概念来把握的观点。

我们倘若把《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方案推得更远一些——马克思没有时间这样做——就可以提出可行的技术这个概念，它让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成功进行，同时也从物质的、货币的和价值的角度让部门之间和部门之内的“平衡积累”得以进行。马克思在第三个模型中的用意是：总的资本价值构成必须保持合理的稳定，否则资本积累就无法维持。只要退回到再生产方案的框架当中，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说明这是什么意思。可行的技术现在涵盖了技术变革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具体分配，这样才能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这告诉我们，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动态对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十分紧要，而且变革的路线——这些路线必须与平衡的增长相容——

是高度局限的，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过程——它们是由个别资本家调节的，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当中行动的——究竟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可行的技术，让平衡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持久地进行下去？尽管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证明并没有完全走出可能的质疑的阴影，但他相当漂亮地说明了资本家永远只能在偶然中暂时遇到必要的技术搭配和组织搭配，而且个别资本家的行为会无休止地倾向于破坏经济体系的稳定。我相信，关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出的正确解释。我还认为，正是这条根本性的主张被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所掩埋了。

译注

1. 原文为“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大概取自《资本论》第3卷的副标题“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Der Gesamtprozeß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86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7页。
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8—709页。
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16页。
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17页。
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8—729页。
8.《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36页。
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9页。
10.《全集》第25卷，2001版，第412页。
1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92页。
1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8页。英文版页码不可能是第62页。
1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16页。
1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612页。
15.《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41—542页。
1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40页。
17. 见《列宁全集》第3卷，1984版。

1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18页。
19.《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98页。
2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61页。
21.《全集》第45卷，2003版，第581页。
22.《全集》第45卷，2003版，第444页。
2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66—667页。
2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8页。
2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4页。
2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9—30页。
27.《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8页。
28.《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54页。
2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36页。
3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58页。
3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50—15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9页。
33. 后一个说法大概取自《资本论》第3卷第3篇的总标题“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Gesetz des tendenziellen Falls der Profitrate /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34. 即《资本论》第3卷第4章。
35.《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91页。
3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84页。

第7章　过度积累、价值丧失和“第一块”危机理论

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进一步讲，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1]（《资本论》第1卷，第242页） 190

马克思的评论似乎指的是周期性的危机、长期而持久衰落、停滞，乃至某些可能发生的终极的经济灾难。对它们的确切解释在政治上有极大的重要性。“大爆炸”理论家所采取的政治姿态与认为资本主义会以抽泣告终的人是相当不同的。政治上的差别在1890—1926年间分割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它们分割了卢森堡与列宁，分割了坚持“革命”路线的人与想要寻找一条社会民主的道路来走向社会主义的人，如伯恩施

坦、考茨基和希法亭；这些差别经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的不同解释来表达的。今天，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姿态反映在博卡拉的理论中——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而马加利纳之类的作者对这种理论的攻击反映了另一些左翼势力相当不同的政治立场。就阶级联盟、“历史性的妥协”、“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等战略而言，相关的辩论同样是以某种关于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化路线理论为背景的。因此，为马克思的理论寻找一种“正确的”解释不是空洞的、学究的操练，而是一项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任务，我们必须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尽量严格地从事这项任务。

191 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充满歧义。因此，人们以相当悬殊的方式对他的作品展开了解释。[①] 即使在他似乎排除了某些可能性时，歧义仍然存在。例如他坚定地说道：“生产过剩不会引起利润的持续下降，但是它具有持久的周期性。随着生产过剩，就出现生产不足”；“当斯密用资本过剩……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时，说的是永久的影响问题，而这是错误的……暂时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68、497页）。不过，长期而持久的衰落仍然是可能的——它的顶点甚至也许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终极灾难——因为这些周期性危机的范围会拓宽，强度会加剧。马克思在某些地方似乎指出，资本主义的确要面临这样一种命运（《大纲》，第750页）。

我们只能绝对肯定地说出一点：他想要用他对利润下降的规律的阐述来说明关于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的“第

① 关于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不同解释，谢赫（1978）和赖特（1978）都做了概述。

一块”理论。我之所以说“第一块”，是因为——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那样——他未能把《资本论》前两卷的所有见解整合起来，而这妨碍了他在第 3 卷中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我们也发现，在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文稿中，马克思被迫以令人为难的方式——他谈到了理论中完全未经展开的方面——使自己的分析向前迈进。所以，留给我们的是大量未竟的事业。只要审视这些简短的章节——马克思的确在那里明确地考察了危机的形态和形式——就可以得出一张核对表，上面是已经提到的，却尚未得到考察的问题：

1. 固定资本独有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实现方式，以及周转时间的差异所引发的困难。

2. 对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有影响的组织变革和结构变化的过程。

3. 信用体系、生息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要求分析资本流通的货币方面）。

4. 国家对资本流通的干预。

5. 商品流通的物理方面（即商品在空间中的迁移）连同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形态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地理结构。

6. 社会形态内部和社会形态之间的阶级关系的复杂格局（例如，资本家阶级内部的派系区分和无产阶级内部以不同国家的劳动力价值为基础的区分）。

危机理论的任何最终版本都应当包含更多的侧面，而这个 192
列表并没有穷尽这些侧面。社会再生产的领域——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以及为了确保控制权等目的而设计的政治机器和军事机器的再生产——会出现各种错乱，需要加以全面的考察。但是马克思显然认为，若要理解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内在矛

盾就是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第一块”危机理论就不只是一种初步的近似了。相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而这一块理论揭示了这背后的理由。

我们不难提纲挈领地给出这个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第一块”理论所蕴含的阶级关系的结构。我们在《资本论》第1卷中看到，资本积累会“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3]。我们还看到，失业、产业后备军对于积累是必要的，而且这会在一定比例——这个比例是波动的——的工人那里转换成地方性的危机。从《资本论》第2卷中，我们看到了个别的流通行为在哪些条件下才得以聚集起来，成为“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4]过程，从而让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的再生产得以进行。这里的矛盾在《资本论》第3卷中得到了讲述。它们被表达为一种扰乱社会的崩溃，这种崩溃是在社会中的两个主要阶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它们所采取的形式是“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而这导致了一种特别不合理的状况：“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5]（《资本论》第3卷，第245、251页）。

这种危机显然同时冲击了资本和劳动，也冲击了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所需的基础本身。因此，就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第一块”理论而言，我们若要对它的运行方式（modus operandi）提出一种技术性的理解，就必须以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的危机为背景。

1. 过度积累和资本的价值丧失

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的确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资本家对技术变革——只要它能生产剩余价值——怀有必然的激情，但它一旦与“为积累而积累”的社会命令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资本的过剩，即资本与运用它的机会相比是过剩的。这样一种资本生产过剩的状况叫作“资本的过度积累”。

如果流通中的资本量与通过生产和交换来实现这些资本的有限的能力要保持平衡——利润率的稳定就意味着这种状况——那么一部分总资本就必须被清除掉。过度积累的倾向与从流通中清除剩余资本的过程必须在对抗中达到平衡，否则就无法重新建立均衡。这些过程可以在“资本的价值丧失”这个标题下得到考察。

乍一看，“价值丧失”的概念仿佛略显奇怪，甚至毫无意义。毕竟，资本最初就被界定为“运动中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实际上是“价值的价值丧失”，这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矛盾的说法。[①] 马克思的论述的旨趣是既承认矛盾，却又坚持认为存在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语词本身。后者只是为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内在矛盾而设计的。这一切敦促我们对价值概念本身的性质做一些根本性的反思。

① 一些人由于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解释成了一个纯粹的会计体系，所以无法理解“价值丧失”的观念；显而易见，这个概念在森岛（1973）、多布（1973）乃至德赛（1979）的叙述中从来不会露面。它让资产阶级解释者非常难受。冯·博特基维茨（1952）由此认为，马克思有“一种乖僻的欲望：用黑格尔的方式把逻辑的矛盾投射到对象本身上面”。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确深受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影响，因而当我们发现价值的概念以“非价值”的形式包含了自身的否定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马克思的叙述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如何克服了黑格尔特有的“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并使整个观点获得了唯物主义的基础。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说，如果说价值被解释为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方面，“非价值”就可以被解释为丧失了社会意义的人类劳动，而且这种丧失同样是由资本主义独有的过程所导致的。

我们在第 1 章提到，马克思之所以脱离了李嘉图的价值概念——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只是为了在对价值的界定中插入“社会必要”这个限定性的措辞。然后，我论述了对“社会必要性”的谈论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手法，他借此打造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相互矛盾的运动规律的描述。因此，价值的概念作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不能被解释为固定不变的构件，仿佛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分析可以建立在它之上；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具有社会必要性的特征有了更多的掌握，价值概念的含义也会接受无休止的修改。如果资本主义必定充斥着矛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向我们证明的那样，那么价值的概念就肯定必须反映这个事实。换句话说，“价值”不是一个对不稳定的世界加以描述的固定的度量标准，而是一个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有歧义的尺度，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第一节（第 1 卷，第 41 页）就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可能性；他在那里提到，体现在商品中的
194 劳动倘若不能满足社会欲求或社会需要，倘若不是使用价值，那就是浪费的劳动，从而不是价值。这个观点所带来的问题从此就被束之高阁，因为马克思假定所有商品都是按照价值或生产价格来交易的（后者仍然是用价值来衡量的）。但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显示出了一种无休止的倾向，即生产“非价值”、浪费劳动力：要么不运用劳动力，要么用它把劳动体现在不能满足社会欲求和社会需要的商品中——这些欲求和需要的结构出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让我们回想一下，价值并不是任何地方的一切人类劳动的普遍属性。它专门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而我们现在必须看到，它也包含了自身的反面，
316 即价值的非生产和非价值的生产。这正是价值丧失的后果。

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布置好了让这种修改得以成立的概念工具。我们在第3章说明了马克思是如何把价值丧失视为价值流通的“必要环节”的，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资本在流通的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形态变化”：从货币到物质商品，再到生产过程，再到商品，等等。由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所以价值只有持续运动才能保持为价值。这让马克思得以对价值丧失做了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界定：在稍长的时间内“静止地”处于任何一个特殊状态中的价值。尚未被使用或尚未被出售的库存商品、货币储备等等都可以在“丧失价值的资本”这个标题下归并到一起，因为价值没有在运动。一旦价值恢复了运动，继续经历从一个状态进入另一个状态的“形态变化”，那么这种必然的价值丧失——它内在于资本流通本身——就被自动扬弃了。只要资本能在特殊的期限内完成它在所有阶段中的流通，价值丧失就不会导致永久的不良后果。我们从这个技术性的立场可以看到，“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概念恰好隐含在价值的概念本身当中，而且价值一旦脱离了“必然的价值丧失”——这是由资本在各个状态中的流通所导致的——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的论述实际上把价值丧失变成了价值本身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摆脱萨伊法则所假定的同一性，并且证明不仅供给未必会创造对它自身的需求，而且由于资本流通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中无休止地克服它的诸多“环节”或“阶段”之间的分离，所以这里始终潜伏着危机的可能性。[①] 在《资本论》

① 如果我们把“价值”看作人类劳动的社会方面——它是通过资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持续流通来表达的——那么马克思对萨伊法则的批判既然强调了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内部的区别”，就意味着价值本身必须把这种区别内化为“非价值”。这样一来，危机和扰乱的可能性就被内化到了价值的概念本身当中。

195 的大多数篇幅中，马克思都满足于谈论危机的可能性，也仅仅满足于可能性。但当马克思提出“第一块”危机理论时，价值丧失的概念就鲜明地走上了前台，以便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相互矛盾的运动规律所产生的永久的不良后果。价值丧失是过度积累的阴暗面。

第3章提出的论述必定显得相当抽象、相当吹毛求疵，但我们现在有资格利用这些论述所产生的见解了。一般资本的过度积累可以直接转换为过剩资本的各种特殊表现，这些过剩资本被自己在流通的进程中所采取的各个状态所“堵塞”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1. 商品的过度生产——物质商品在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它表达为库存的过剩，即库存远远超出了资本为了正常地完成平滑的流通所需要的库存。

2. 作为投入品的不变资本的剩余库存和作为半成品的商品的剩余库存，它们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资本流通的需要。

3. 生产过程中的闲置资本——特别是没有充分地把自身的能力付诸使用的固定资本。

4. 剩余的货币资本和闲置的现金余额，它们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货币储备的需要。

5. 劳动力的剩余——生产中出现了就业不足，产业后备军的扩大远远超出了资本积累的正常需要，剥削率的上升至少暂时造成了劳动力的价值丧失。

6. 预付资本的回报率的下降，它表达为实际利率的下降、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的利润率的下降、租金的下跌等等。

这个列表概括了过度积累的“表现形式”，并把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生产力的演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壁垒之间的矛盾——作为它们全体的纽带。这让马克思得以揭

露李嘉图的观点在理论中的错误——按照李嘉图，资本可能会过剩，但是总体上不会有商品的生产过剩（《资本论》第3卷，第256页）。马克思认为，如果“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那是相当荒谬的[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96—499页）。

这番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的一场无休止地轰隆作响而又相当执迷不悟的论战，即引发危机的源头应该被解释为“消费不足”（群众没有能力购买资本家生产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商品），还是应该被解释为利润率下降的倾向。[①] 现象世界中的利润率的下降和商品的供过于求都是同一个根本问题在表面上的展现。从理论上看，只有当生产力的无休止的革命倾向同“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处于对立时，这种倾向——它表达为资本价值构成的上升——才能为理解危机的形成过程提供基础。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对立才是根本，因而我们不能把优先地位指派给任何一方。

进一步讲，这番分析表明过度积累的倾向肯定会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表达为一些时期和阶段，我们在这些时期和阶段会目睹市场上的供过于求、库存的急剧上升、生产能力的闲置、货币资本的闲置、失业，以及（分配之后的）货币利润率的下降。只要这样一类事件还相当常规地、周期性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伤痕，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第一块”危机理论抱有一定的信心。我们的解释必须慎重，因为马克思有大量的省略，而且对危机的实际形成过程的分析还有待展开。

① 布里尼（Bleaney）（1976）、谢赫（1978）和赖特（1978）详细讨论了这些困惑。

我们在这个地方至多可以总结说，现有的征兆是充满希望的。

如果过度积累表现出这些表面形式，我们就可以期望它的劲敌——价值丧失——会以相同的可感知的方式来发起攻击。以货币形式被持有的资本可能会在通货膨胀中丧失价值，劳动力可能会由于失业和劳动者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丧失价值，以成品或半成品的形式被持有的商品也许只有按照亏本的价格才能卖完，体现在固定资本中的价值也许会由于固定资本的闲置而受到损失。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机制，它们的影响也会随着我们所谈论的价值丧失的类型而变化。我们还没有资格明确地讨论这样一个过程的所有方面——例如，我们还没有布置好考察通货膨胀以及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所需的框架。但我们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概念工具来对价值丧失做一些更加详细的分析。本章余下来的部分将以此为主题。

2. 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造成的资本“价值的不断丧失”

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的一些特征能“以不同于危机的方式”推迟利润率的下降：“例如，一部分现存资本价值的不断丧失。”[7]（《大纲》，第 750 页）

马克思在这里的想法本质上相当简单。由于商品的价值最初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所以这种价值会随着劳动力的生产率的上升而下降。同样的原则甚至在我们诉诸生产价格时也能成立（但是变化的速度在部门之间是不同的，有些情况下价值还有可能升高而非降低）。因此，在其他一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一般是与商品的单位价值下降相伴随的（《资本论》第 3 卷，第 226 页）。同一件商品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改变自己的价值。

在交换领域中，这个事实表达为初始的购买价格与后来的重置成本之间按实值计算的差别。

这个差距导致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有*增值*和*贬值*的可能性（《资本论》第3卷，第311页）。在某些情况下，贬值可以被理解为价值丧失的一种形式。例如，当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时，商品的单位价值就会快速下降，因而在不变资本的库存中体现的价值、在半成品或成品的库存中体现的价值和在市场上的商品中体现的价值就会面临不断的重新估值——这种估值是联系到劳动力最近达到的社会生产率来进行的。在正常状况下，贬值对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被生产出来并被耗尽的商品只具有边缘性的影响。但是生产过程倘若需要较长的工作时间、大量预留的不变资本的库存或数量庞大的固定资本，那么对于贬值就要敏感得多。必须在市场上长期停留的商品或只能被缓慢地消费的商品——住房、公共设施、运输网络等等——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

对相对剩余价值无休止的追求激起了不间断的“价值革命”，这些革命总是会威胁到一切过去的死劳动的价值，如果这些价值尚未在生产或最终消费中得到实现的话。这个困境虽然在一切地方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感受到，但它在某些领域比在其他领域具有远远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要使个别资本家最为直接地注意到这个困境，很可能是在推出了更加廉价、更有效率的固定资本时，因为这实际上减少了他们所运用的机器的价值。资本家会面临强大的压力，想要避免这些不良后果，因而会尽可能快地把固定资本耗尽；这意味着增加工作过程的强度、采用轮班制度等等（《资本论》第3卷，第113—114页）。要使整个社会最为强烈地注意到上述问题，很可能是在基本的货币商品的价值（如黄金的价值）发生革命时，或者是

在纸币的估算价值出现通货膨胀时——后者是价值丧失在货真价实的现代所采取的社会形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我们尚未发展出讨论它们所需的技术性基础。

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对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同资本集中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考察。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强调说，利润率的下降是与利润量的增加相伴随的；他的意思是，危机的倾向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对衰落，而是由于生产出来的大量剩余价值无法与资本量的扩大——资本想要的是获取剩余
198 价值——保持同步。倘若为了使体系恢复均衡，只需要减少资本的总量，而不需要做别的，那么资本集中——这要求“或多或少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日益被剥夺”[8]（《资本论》第3卷，第219页）——就可以被看作用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的手段之一。较大的资本家收购了较小的资本家，通过一种剥夺使后者失去了资本，而这种剥夺实际上使这些资本丧失了价值，让规模较大的资本家获得了好处。后者可以按照降低过的价值来吸收规模较小的资本家的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于是，同样的利润量就会由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来分享；他们已经设法减少了流通中的资本总量，但这决不会损害他们自己的生产活动。他们实际上使遭到剥夺的较小的资本家承受了价值丧失的代价。由于资本集中在资本主义之下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所以它构成了使得一部分现存资本的价值不断丧失的手段之一。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预料到，周期性的危机会与强有力的资本集中的阶段相伴随。①

马克思提出，“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有助于制止利润率

① 关于英国在20世纪通过并购来进行的资本集中，汉娜（Hannah）（1976，附录1）有一些有趣的数据；阿列塔（Aglietta）（1979，第000页）[9]则汇集了关于美国的类似材料。

的下降；这里所指的价值丧失的形式与通过资本集中来达到的形式相当不同。倘若一定的流通导致了社会中的一部分资本只能获得用它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其余的剩余价值就会被释放出来，可以在其余的资本家之间分配，从而使利润率保持稳定。马克思引用了铁路的例子：它们的生产和经营除了会产生成本，还可能会产生以股息的形式来支付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40页）。这个例子是很有教益的。它不仅表明了社会所需要的一部分固定资本可以出借，并向使用者收取利息，而且表明了物质形式和货币形式的资本都可以出借。由此，组织的股份公司形式的传播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降临（其中可以演化出依靠银行融资的设备租赁等做法）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对过度积累加以弥补的组织调整和结构调整，因为一部分社会总资本的流通现在是为了获取利息，而不是为了获得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全部份额。这样来流通的资本会遭受相对的价值丧失，因为它的所得要少于平均利润率。因此，过度积累的倾向可以通过组织调整来抵消——这些调整增加了流通中的相对丧失了价值的资本的数量。这个观点的困难当然在于马克思被迫提到了分配的情节，但他的论述进行到这个地方时，他所打下的基础还不足以考察利率，也不足以考察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率的趋势所造成的影响。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总体上的薄弱部位，需要加以改正。

199

这个论点可以再前进一步。例如博卡拉（1974）指出，资本倘若在利润率为零的情况下持续流通，就会遭受绝对的价值丧失。这可能会在国家的干预下发生：某些部门（例如公共事业和交通）是在国家的干预下组织起来的，这可以为总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做出贡献，却丝毫没有取回任何比例的生产出来的

剩余价值。国家由此可以对私营部门进行补贴，并人为地提高个别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率。博卡拉认为，这是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阶段中的主要职能。

实际上博卡拉认为，若要理解资本主义在它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化，关键就是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这对原则。他提出，对过度积累的唯一可行的长期回应是实行“结构性的价值丧失”：越来越多的资本必须以相对丧失了价值的状态和绝对丧失了价值的状态来保持流通，才可以抵抗利润率下降的倾向。资本主义的逐步过渡——从竞争形式到垄断形式和金融形式，再到最后的国家垄断形式——应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性重组，这些重组简直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到了一种永久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

博卡拉的论述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特殊演绎。它不是不合情理的，也不是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在某些方面它还是非常诱人的。然而，批判者宣称它是一堆粗略的简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误导。[①]它的主要焦点是资本家如何分享剩余价值，而不是有危机倾向的总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它片面地采纳了马克思关于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论点，并把这个论点纳入到解释资本主义历史的单一而巨大的框架中。最糟糕的是，它看到了资本不断丧失价值的过程，却认为这些过程在总体上解决了慢性的过度积累倾向，因而就资本主义危机的展开方式而言，它严重扭曲了马克思的版本。这些方面的批评大体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资本价值的不断丧失仍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过程，而且对积累产生了可感知的、物质性的后果。博

① 泰雷（Théret）与维奥尔卡（Wieviorka）（1978）详细叙述了这些批评。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受他们的论述。亦见费尔利（Fairley）（1980）。

卡拉的分析就此而言是有帮助的。若要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或者解释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它就不是一个恰当的基础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考察劳动力的价值丧失。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10]（《资本论》第1卷，第319页）。进一步讲，马克思提到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由此指出了“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11]（《资本论》第1卷，第605页）。[①] 马克思不外是在道德意义上利用了“价值丧失”的观念，以便对两种过程进行类比：其一导致了劳动力价值的降低，其二造成了“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3]（《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②] 虽然这些雷霆般的抨击是围绕《资本论》第1卷所提出的单边的积累模型来构造的，但是产业后备军和由技术引起的失业都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而这只可能被视为一种需要：把“丧失了价值”的劳动力留在手中，给未来的资本积累的火焰提供燃料。

3. 由危机带来的价值丧失

在对危机的进程中发生的价值丧失进行描述时，“贬值”

① 马克思尽管在这里用了“贬值”一词，但是显然指的是我们用“价值丧失”一词所表示的意思。[12]

② 就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言，马加利纳（1975）给出了至今最为透彻的讨论。

这个温情的形象就让位于“毁灭”这个更有戏剧性、更加暴力的形象了。在危机的时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内在矛盾都以暴力的突发形式表达出来了，这些暴力的突发可以将“暂时的暴力的解决”强加到矛盾头上，并“使已经破坏的均衡得到瞬间恢复”[14]（《资本论》第3卷，第249页）。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15]（《资本论》第3卷，第253页），所以过度积累就得到了抵消。这种毁灭有可能影响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也有可能同时影响两者：

> 只要再生产过程停滞，劳动过程缩减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顿，实际资本就会被毁灭。不使用的机器不是资本。不被剥削的劳动等于失去了的生产。闲置不用的原料不是资本。建好不用的建筑物（以及新制造的机器）或半途停建的建筑物，堆在仓库中正在变质的商品，这一切都是资本的毁灭……现有的生产条件实际上没有起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发挥生产条件的效能。这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它们的交换价值都化为乌有。
>
> 201 第二，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价值量的跌落……社会的名义资本，也就是现存资本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永远毁灭了，虽然由于不殃及使用价值，这种毁灭正好可以大大促进新的再生产。[1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95—496页）

在严重依赖固定资本的部门中，在毁灭交换价值的同时保存使用价值是特别重要的。在危机的状况下，资本家往往可以几乎白白购入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而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预付的交换价值——以便从倒下的竞争者那里购入固定的不变资本——会有戏剧性的下降，因而资本的价值构成也会有戏剧性

的下降。马克思还提到，这样一种情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会影响对创新的引进——“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17]（《资本论》第3卷，第104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为明确地谈论了价值的毁灭；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他的评论，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列举的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大多数形式都是相互关联的：

> 主要受害的并且受害最严重的，会是……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有一部分仅仅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用于生产的债券，当它预计的收入减少时，将会立即贬值。现有的一部分金银闲置下来，不再执行资本的职能。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只有通过它的价格的极大的下降，即通过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贬值，才能完成它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同样，固定资本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贬值……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按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18]（《资本论》第3卷，第254—255页）

于是，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变得岌岌可危了。社会冲突的阵线出现了；至少从大致轮廓来看，这些阵线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背后的矛盾。例如，个别资本家之间的潜在对抗——他们既要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又要按照资本的阶级利益来行动（见前面第188页）——走上了前台：

> 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竞争实际上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19]（《资本论》第 3 卷，第 253 页）

谁会在资本的价值丧失、贬值和毁灭的重压下首当其冲？这里的战斗很可能是尖锐而激烈的。一旦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兄弟情谊断裂了，就会在分配份额的问题上产生回响，因为地主、金融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以及国家利益都要争相维护各自在剩余价值中的份额。但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只反映了派系的力量。剩余价值在货币形式中的存在——让我们回想一下，这是“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20]——意味着“货币所有者在危机的进程中”无一例外地会“靠牺牲产业家而发财致富”[21]（《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496 页）。危机出现时的结构和方式本身就决定了某些特有的分配结果。

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也是如此。通过把工人抛出工作岗位，资本家实际上丢弃了可变资本，从而将产业后备军所面临的危机这个地方性的问题转化成了一种慢性失调和社会瓦解的状况。即使劳动者运气够好，保住了工作，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也几乎可以肯定会遭到削减；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价值至少会暂时贬值，而这在合适的情况下可能会转换为劳动力价值的永久降低。工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劳动与资本的普遍对抗也会

加剧。

无论损失如何分配，无论由此引发了怎样的权力斗争，使体系回到某种均衡点所需的一般条件都是毁灭流通中一定比例的资本的价值，以便使总的流动资本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潜在能力达到均衡。一旦完成了必要的价值丧失，过度积累就被消除了，资本积累也就可以再度出发了，而且往往会拥有新的社会基础和技术基础。整个循环的进程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资本论》第3卷，第255页）。但是根本性的悖论依然存在：

> 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同时现存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大，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贬值［丧失价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可以继续存在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22]（《大纲》，第750页）

这个关于资本主义之下危机形成过程的“第一块”理论混合了敏锐的见解、混乱的阐述和直观的判断——为这一切充当调料的是马克思惯有的一抹末世论的设想（millenial vision）。但是至少就它所描述的资本价值丧失的社会后果而言，这番叙述尽管不完整，却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我们可以逐渐看到资本家在危机期间是如何互相吵闹的，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吵闹，会按照哪些规则来吵闹；我们也可以逐渐看到各个派系是如何寻求政治权力，以此为手段来将损失转嫁别人的。我们还可以逐渐看到由可变资本的价值丧失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人道悲

剧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内在逻辑是冷酷的、无情的、不可抗拒的，它只对价值规律有反应。可是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特定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人是这段历史的组织者、创造者和参与者。马克思断定，我们建立了巨大的社会事业，它统治了我们，限定了我们的自由，并最终把最坏的退化形式施加到了我们身上。这样一种体系的不合理性在危机期间会变得极为明显：

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23]（《大纲》，第749页）

译注

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70页。
2.《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32、564页。
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08页。
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98页。
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73、279页。
6.《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66页。
7.《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50页。
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44页。
9. “000”为原文，或为衍文，因为美国的材料不应只占据一页。
1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71页。
1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699页。
12. 按照马克思的原文，这里的“贬值”是“Depreziation/depreciation”，也许有别于他一般使用的“贬值”（Entwertung/depreciation），后者是与“增值”（Wertsteigerung/appreciation）相对的。不过，马克思似乎从未将“Depreziation”当作一个严格的概念，而且事实上这个词在德文中是非常罕见的。
1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43—744页。
1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7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82页。
16.《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62—56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119 页。
18.《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83 页。
19.《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81—282 页。
20.《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93 页。
21.《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56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2.《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15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3.《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149 页。

第8章　固定资本

204 技术变革是与飞速流动的潮流和深层的不安定相联系的，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相互矛盾的“运动规律”的分析极度依赖于对这两方面的理解。虽然马克思的技术概念非常宽泛，但他为劳动工具——尤其是机器——赋予了一定的优先地位，把它们作为维护资本积累的战斗中的主要武器。这些劳动工具可以被用在为了相对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斗争中：它们会提高劳动力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由此通过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来压低工资率）。它们也可以被用来在工作过程中使过去的“死”劳动的力量凌驾于活劳动之上，而这会对劳动者造成各式各样的后果（见前面第 4 章第 4 节）。资本家一旦取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就可以掌控这些令人生畏的武器。

但是劳动工具首先必须被生产出来，才能够产生这些有用的结果：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大纲》，第706页）

这些生产力连同它们所包含的技能和知识都必须被资本家占有，必须按照后者的要求来塑造，并作为资本积累的“杠杆”来发动：

劳动［工具］发展为机器体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工具］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2]（《大纲》，第694页）

为了取得对劳动工具的控制权，资本家最初要借助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即原始积累。然而，这意味着“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3]（《资本论》第1卷，第310页）。但随着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变得越来越强烈，资本主义也必须设立一些手段，把“适合于它的目的的”劳动工具生产出来。它只能以它所知道的唯一一种方式来生产它们：那就是商品生产的方式。诸多劳动工具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作为商品被交换，在致力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作过程中被生产性地消费掉，并在它们的使用寿命结束时被新的商品所取代——于是，它们在马克思的词典中就成了固定资本。

我们在第6章考察的积累模型假定一切生产和消费都是在

某个标准的时期内发生的。这些模型讨论的是技术变革的后果，同时却要假定从一个生产期间延续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固定资本并不存在！我们现在必须纠正这个遗漏，并考察固定资本的形成、使用和流通（隐含在技术变革的观念中）与资本积累有怎样的关系。

马克思对固定资本的界定是相当独特的——它实在是非常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界定。首先，由于资本被界定为“运动中的价值”，所以固定资本也必须这样来看待。固定资本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资本通过对物质对象的使用——如机器的使用——来流通的过程。我们由此还可以发现，在考察固定资本的流通时，不能撇开机器和其他劳动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具有的具体的有用后果。在界定固定资本时也不能撇开物质对象所具有的用途。只有在对劳动工具的实际使用会给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方便时，这些劳动工具才能被归入固定资本。

这种界定产生了若干后果。例如，并非所有劳动工具都是固定资本——工匠的用具没有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从而没有被界定为固定资本。在最终消费而非生产性的消费中使用的物品——比如刀叉和房屋——也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消费基金”的一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210页）。可见，固定资本只是社会总财富的一部分、物质资产的总存量的一部分，即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部分。由于同样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方式，所以一些对象之所以被界定为固定资本，“不是由于它们存在的特定方式，而是由于它们的使用”[4]。因此，固定资本的总量可以简单地通过改变现存事物的用法而增加或减少（《大纲》，第681—687页）。这个观点十分重要，足以促使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国家的牛的总存

量中，只有在资本主义农业中被用作役畜的牛才能被视为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可以简单地通过把更多的牛用作役畜而增加。此外，这个例子还表明了一点：牛既然在被用作役畜的同时可以被用作奶牛或肉牛，就具有两种用法，只有其中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固定资本。马克思引用了一个关于街道的类似例子：它既可以被用作“本来意义的生产的交通手段”，同时又可以被“用来散步”[5]（《大纲》，第681—687页）。

马克思对固定资本的界定是与使用相联系的，这种灵活性极为重要。但它也为解释带来了危险。马克思告诫我们：我们不得假定“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6]（《大纲》，第699页）。倘若假定了这样一种同一性，就是将使用价值与价值等同起来，并受困于一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7]（《资本论》第2卷，第225页）这样一种错误的概念最终会走向一个观点：机器仿佛可以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动因素，仿佛能够自行生产价值。因此，我们在考察固定资本时必须始终牢记，在通过剩余价值生产来进行资本积累的语境下，一个对象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区别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首先可以考虑它是如何把自身的价值赋予最终产品的。与作为原材料来发挥职能的不变资本不同，构成了劳动工具的物质要素并没有在最终产品中得到物理上的重建。机器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完成之后仍然留在幕后。倘若机器老化了，固定资本就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彻底的消费，再也不会回到流通领域。不过，固定资本所对应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流通的，“和从它那里转

移到……最终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8]（《资本论》第2卷，第158页）。

固定资本的第二个独有特征是它的特殊的“实现方式，周转方式，再生产方式”[9]（《大纲》，第732页）。它的使用会延续多个周转期间，由此就可以同不变资本的其他“辅助”要素区别开来——后者（例如能源的投入）也没有在最终产品中得到重建。于是，对固定资本的界定会受到不变资本其他要素的周转过程的约束，而且我们已经提到，周转时间绝不是均等的。因此，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虽然最初只是量的区分，但在更加耐用、更加持久的劳动工具得到使用之后，就“硬化”为质的差别了[10]（《大纲》，第692页）。由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成了“资本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它们的流通也展现出了相当不同的性质。由于劳动工具要通过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才能转化为固定资本，所以“资本本身也就生产出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双重流通方式”[11]（《大纲》，第702、727、737页）。所以在绘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时，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关系就成了考察的关键；我们将在下面第2节看到这一点。

我们的思考方式如果是通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来组织的，就在根本上不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所隐含的思考方式——我们在此之前使用的是后者。这两组范畴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在生产内部得到界定的。处于商品形式或货币形式中的资本则“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也不可能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上”[12]。由于一切资本都必须在它存在的某个时刻采取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所以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关系以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都是由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来“中介”的，也都会被资本在这些

不同形式中的存在所改变（《资本论》第2卷，第207—209页）。但在生产领域内部，我们现在就可以识别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对资本的组织形式进行概念思考的方式了。表8.1列出了这两重界定，它们乍一看是令人困惑的。那么，它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表8.1

物质形式	生产内部的范畴	
	剩余价值的生产	资本的运动
厂房和设备、生产的物质基础设施	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
硬原材料、辅助材料、手头的材料		
劳动力	可变资本	流动资本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范畴反映了资本与劳动在“隐蔽的生产场所”内部的关系。由此，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的生产、利润的起源和剥削的本质；它们使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13]（《资本论》第1卷，第176页）。但是资本在生产中的迁移或运动也会遇到某些障碍，它们可能会抑制、有时还会扰乱总的资本流通。固定与流动的两分法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而设计的。然而，它决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利润的起源，因为假如“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区别”，假如花费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与其他原材料不再能相互区别，那么“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剥削……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14]（《资本论》第2卷，第216—219页）。因此，资本阶级经济学家大量谈论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却忽略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这是不足为奇的。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马克思的特点是构造不同的面向世界的“窗户”，以便从不同的观点来理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我们在此之前是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立场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并由此对资本积累的基本过程有了许多理解。但对流通的研究需要不同的范畴。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借助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概念来构造一种对资本在生产中的流通过程的理解。

1. 固定资本的流通

马克思写道：“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15]（《资本论》第 2 卷，第 158 页）为了认清这些独特性，我们将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所以，让我们考察一台机器：它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然后在受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中得到了使用，并在它的使用寿命结束时被另一台机器置换了。

作为商品，这台机器只是潜在的固定资本。它一旦被资本家买下来、被纳入生产过程，就成了固定资本。通过交换行为，生产者实现了机器的交换价值，而购买者现在不得不设法通过生产性的消费来保存这个交换价值。让我们暂时假定这台机器的交换价值在购买时是与它的价值相等的。

与其他不变资本的投入一样，这台机器的价值必须通过生产出来的商品才能传递下去、得到实现。但作为使用价值，这台机器从来不会离开生产过程。它作为使用价值保持了形体上的物质形式，这个物质形式是在多个生产期间内被生产性地
209 消费掉的。可是机器的价值若要得到实现，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流通。这种流通形式的独特性在于：在作为价值继续流通的同时，固定资本在物质上却仍然作为使用价值被封锁在生产
338 过程的范围内（《大纲》，第 681 页）。

这带来了一个直接而明显的困难。物质性的使用价值被生产性地消费掉了，价值则是通过生产出来的商品来流通的——我们必须确定这两者的关系是如何调节的。我们发现，价值的转移乃至价值本身在这里都是由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过程来调节的。

首先，对这台机器的生产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纯粹物理的性质——耐用性和物理的效率是最重要的。因此，这台机器越是耐用，它的价值向最终产品的转移就越慢。但是马克思也坚持认为，闲置的或利用不足的机器只是失去了价值，却没有转移价值：它们遭受了价值丧失。因此，价值向最终产品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条件——工作日的长度、劳动的强度等等——这些条件会影响利用机器的平均速度。

其次，对资本家来说，这台机器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在它的帮助下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重大困难。在竞争性的市场情境中——因而所有商品都是按照价值（或生产价格）来交易的——资本家倘若拥有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更有效率或更加耐久的机器，就能实现相对剩余价值。这台机器有用的程度取决于竞争的状况、市场中的商品的价值和给定的产业中机器的平均效率。我们至少可以假设资本家在这台机器的使用寿命中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将它拿去交换，甚至可以按年度为基准来出租它的使用价值。即使算上已经在生产性的消费中转移掉的价值，这个交换价值也很可能会时常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的步伐显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这台机器的价值会在它的使用期限的进程中做出调整，因而这个价值是一个不稳定的量，而不是一个稳定的量。

当这台机器已经老化、需要置换时，固定资本的流通这出戏就走到了最后一幕。若要再生产固定资本，就必须建立充足的价值储存，以便在这台机器的使用寿命结束时把它置换掉。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独特性：初始的交换价值未必等于置换时的交换价值——前者是需要在生产中予以回收的，后者则是确保生产资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

因此，固定资本的“价值”似乎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决定：
210 初始的购买价格，在它的帮助下通过生产性消费来生产的剩余价值，或重置成本。那么，这台机器的“真实”价值是什么？我们假如连真实的价值都不知道，还怎么可能讨论作为价值的固定资本的流通？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我将论证：这台机器的价值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是由全部三种情形同时决定的。这意味着机器的价值处于无休止的动荡状态——这个结论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这个价值概念并不相容，但是肯定符合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即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避免这些困难的办法是狭窄地聚焦于生产领域中的变化，因为当固定资本的价值——由初始的购买价格来衡量——在生产性的消费中被回收时，生产领域会发生变化。他关于固定资本的流通提出了如下规则：“它作为价值而流通同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是相适应的。”[16]（《大纲》，第 681 页）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注意机器的使用价值的物理属性，在它们的基础上理解固定资本的流通过程——尽管它们也只是基础。马克思关于机器物质属性的长篇研究必须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来理解。我们最终还必须考察使用价值本身是如何在社会中被决定的，以及它是如何被整合到价值理论当中的。然而，我们的起点是机器的纯粹物质属性。

 机器改善了重复的劳动过程的物理效率。这个效率可以保

持不变，也可以提高、降低或在机器的使用期限内展现出诸多起伏。尽管这里的要点是平均水平——与其他地方一样——但是马克思的规则意味着价值的流通方式应该反映出机器在使用期限内不断变化的平均效率。马克思还把机器的耐用性视为“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那一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17]（《资本论》第2卷，第221页）。机器的耐用性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平均水平在这里同样是决定性的方面（第157页）。固定资本的流通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机器在使用中老化的平均速度。

这个“平均”使用期限又取决于“正常的磨损”和“正常的维修”[18]。这些概念很难在某种准确的意义上讲清楚，尽管它们的大致意义是十分明白的。倘若没有恰当的维护，机器的使用期限就会缩短。但是维护需要进一步投入在机器的生产中不曾用到的劳动力和材料。同样的情况对于“正常的”修理也是成立的。马克思把这些开支也当作机器的价值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分散在机器的使用期限中的，而不是全部一起发生的。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把这些开支当作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不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173—174页）。最初对机器的购买使资本家不得不把一部分流动资本配置到固定资本的维护和修理上面：“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19]（《资本论》第2卷，第175页） 211

不幸的是，修理与置换的区分是相当模糊的。机器往往“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20]（《资本论》第2卷，第171页）。整台机器可以通过置换受损的零件来修理，但在组成一台机器的所有零件都被置换之后，整台机器不就被置换了

吗？这类情况使对机器的使用期限的计算变得非常困难。马克思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摆弄这些问题，然而他对它们的解答并不能使他本人满意（《资本论》第2卷，第169—182页）。[①] 到头来，他将所有这些物理上的复杂情况丢到了一边，转而界定了一个关于机器“折旧”的高度简化的模型，固定资本的流通在其中展现出了如下特征：

> 在劳动工具……损耗时，劳动工具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工具中，因而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工具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劳动工具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工具转移的价值份额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5年磨损掉，另一台10年磨损掉，那么，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21]（《资本论》第2卷，第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模型现在叫作机器的“直线折旧”。为了避免混淆[22]，我将用“价值转移”这个术语来指涉体现在机器中的价值在生产性消费中的实现速度。马克思完全明白“线性价值转移”模型是一种过度简化。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总体要旨也有深层的不一致，因为它使固定资本

① 我们将看到，修理与置换的区分问题在建成环境的情况下尤其尖锐（后面第232—235页）。

的物理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处于一种自主的、看似决定性的角色。马克思仿佛掉进了拜物教的陷阱，而这恰好是他极其频繁地予以斥责的。将使用价值作为经济范畴予以接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摆脱一项责任：他必须说明这种使用价值是如何“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的[23]。我们倘若以为线性价值转移模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快就会碰到诸多困难。

例如，按照初始的购买价格（假定它与价值相等）来计算的线性价值转移只有在特殊的、相当不现实的条件下——没有技术创新、机器的成本没有变动等等——才会等于重置投资。只要这些条件不成立，被回收的价值与重置所需的价值之间就会出现偏差。固定资本的持续流通在重置的时刻就会受到威胁。

线性价值转移还假定机器的使用期限是已知的。那么，这种使用期限是如何决定的？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答案。一开始，他求助于一个纯粹物理的概念——机器在建造时拥有了一定的物理能力和耐用性，并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老化。但他也承认，经济上的使用期限也许是不同的。资本家之所以会丢弃一台机器，不是因为它在物理上老化了，而是因为把它置换掉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对资本家来说，机器的使用价值是让他得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且正如马克思明显承认的那样，这种使用价值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们无法预先得知一台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因为它取决于机器体系的设计和成本的变化、技术变革的总体速度和形式、对劳动力的受剥削率有影响的条件（例如起伏不定的产业后备军）、不同的技术在给定的生产线上利润率的差异等等。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规定，机器的使用期限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变动

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相当难以预料的：竞争、对利润的不懈寻求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从中孕育出了技术变革戏剧性的步伐——如狂风一般把机器的使用期限吹得摇曳不定。对价值转移的分析一开始仿佛有一个坚固的物质基础，却被社会过程转化成了一片不确定的泥沼。

固定资本的价值向最终产品转移的速度最初被看作一个仅仅与生产相关的问题，但对它的分析却明显无法独立于市场竞争的寒风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在规定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含义时已经遇到了一个与此平行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撞上同一个问题也完全是应该的，因为固定资本在决定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遇到的规则是：固定资本在生产和公司的范围内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公司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实现利润的能力。那么，我们如何能提出一种在这些情况下探讨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的方
213 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需要在生产过程与交换过程之间——它们既是分离的，却又是相关的——建立某种桥梁。

要解决这些困难，最容易的办法是把固定资本的流通当作联合生产的一种特例。在每个生产期间开始时，资本家都会预付一定的价值总量来购买劳动力、原材料和劳动工具。在这个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拥有的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固定资本剩下的价值量，而后者体现在一台机器中，这台机器可以再次得到使用，也可以被置换乃至被出售给别人。固定资本剩下的价值量被当作生产过程的产出品之一。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冯·诺伊曼、斯拉法、斯蒂德曼和森岛等作者手中是卓有成效的。最后这位作者证明了这个技巧可以被用来确定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即提供一条“经济准则，使企业家可以决定不
344 再使用［一台］特定年龄的［机器］”，并提供一种使价值的转

移与重置成本达成一致的方法。[①] 十分有趣的是，要分析生产中运用的资本，而且这种生产会花费不同的时间期限来生产不同的物品，相关的分析技巧正是马克思本人开创的——斯拉法和森岛都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这一点。有迹象表明，马克思把对联合产品的分析看作一条出路，想由此走出他的价值转移的直线模型所带来的两难。（《资本论》第 2 卷，第 153 页；《剩余价值理论》第 3 册，第 391 页）。他只是未能把这种可能性坚持到底（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因而未能攻克这个问题——后来它成了经济理论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

然而，这个从联合产品出发的理论技巧不只是一种方便的虚构，因为二手的机器市场的确存在，定期的设备租用和出租也不是一桩罕见的事务。此外，由于生产能力的所有权证书可以通过股票形式来交易，所以我们可以识别出另一类市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联系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反映固定资本的存量在当前的生产率。因此，时常对固定资本进行重新估值是有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的。

然而，以严格的方式来探究这个问题的人近年来总结说，把固定资本的流通当作联合生产的一种特例会给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带来严重的两难。例如森岛说道："对联合生产和另 214
一些制造过程的承认……可以鼓励我们牺牲掉马克思本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表述"（森岛，1973，第 180 页）；斯蒂德曼则更为坚决：

① 森岛（1973，第 178 页）。在斯拉法（1960）手中，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见解：对技术的选择、从而对机器的使用价值的选择取决于利润率，因而对技术的调换和重新调换会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所受到的基础性批评之一是它未能考虑到这种调换的可能性（前面第 185 页）；我们现在要尝试更加具体地说明固定资本的流通过程与任意调换技术的可能性之间为什么有冲突。

在固定资本面前，对机器的最佳寿命的选择仅仅是在利润率最大化的进程中被决定的，因而价值量——它们取决于机器的有效寿命——仅仅是在利润率被决定之后才被决定的。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实际工资率是利润率大致的决定因素。我们的任务是说明这些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实际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而不是卷入不得要领的价值计算。（斯蒂德曼，1977，第 183 页）

莱文同样认为，马克思假如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则应用到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上面，就会发现在固定资本的辅助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劳动价值在计算中有本质上的困难”：

固定资本为产品贡献的价值既不是由它的原始价值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它的当前价值所决定的，而是由价值在相关的时期内的变化所决定的。在决定作为商品的产品的价值时，这个因素具有内在的活力，却在价值被还原为劳动时间的量时被丢掉了。在给定的时期内向产品“转移”的价值量是随着所运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速度而变动的。由于商品价值的决定过程是由价值的变化速度来支配的，所以它与任何固定的劳动时间的量之间都有内在的不可还原性。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和当前的劳动时间的总和来决定交换价值。（莱文，1978，第 302 页）

莱文通过一处脚注继续补充道：“若要把劳动价值理论保持为关于交换价值的决定方式的理论……实际上就有必要排除固定资本。”（莱文，1978，第 302 页）

所有这些叙述准确地反映了就固定资本的价值向最终产

品转移的速度而言，得出某种恰当的计算方法是多么困难。[①] 它们也都表明，固定资本的价值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讲，它们都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价值理论倘若仅仅立足于体现在商品中的过去的和当前的劳动时间，就无法与固定资本的流通相调和。马克思本人恰好得出了这个结论。一旦固定资本与流通相分离，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就“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24]（《资本论》第2卷，第223页）。

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把价值作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确必须被拒斥。但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把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非常不同的。[②] 虽然为了方便起见，马克思经常把社会必要劳动等同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但是后者并没有包含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所有方面。让我们回想一下，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所以“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25]（《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这只是简单地延伸了马克思式的规则，即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而且“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26]（《资本论》第1卷，第41、85页）。

① 就此而言，关于联合生产的状况下“正的利润与负的剩余价值”的辩论是很有教益的。见斯蒂德曼（1977，第11章），森岛与凯特福雷斯（Catephores）（1978，第29—38页）和把这个论点作为谬误加以拒斥的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39—48页）。

② 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45页）指出：“斯蒂德曼和森岛都没有运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他们对马克思的概念最根本的背离是两名作者都把价值仅仅看作一个会计概念，而马克思把它当作一种实际现象，这种现象有具体的后果。”同样的批评对于罗默（1979）也可以成立：他试图把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整合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中去，不过这番尝试流产了。

因此，机器的使用价值在使用期限内的变化不会对它的价值毫无影响。在对机器的价值有影响的因素当中，首要的因素是与技术变革相联系的频繁的“价值革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因此，价值比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现象。”[27]（《资本论》第2卷，第72页）技术变革对固定资本的流通起到了破坏稳定的作用，这与它在我们前一章考察的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简单模型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论证了价值不是一个固定的度量标准——这种度量标准无法用来描述变化的世界——而是被马克思当作一种社会关系，它在自身的正中心包含了矛盾和不确定性。因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固定资本的流通之间丝毫没有矛盾。矛盾恰好被内化到了价值的概念本身当中。

2.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正像流动资本是生产固定资本的前提一样，固定资本也是生产流动资本的前提。”[28]（《大纲》，第734页）被用作固定资本的机器和作为投入品的流动的不变资本最初都要被生产出来，而这需要使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资本论》第2卷，第209页）。进一步讲，由于固定资本在没有得到使用时会失去价值，所以为了实现它的价值，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流动资本的不断流动——包括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不断流动。

由于双方对于彼此都是必要的，所以流动资本的流动与固定资本的流动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倘若资本积累要达到平衡，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社会的总资本中的比例就必须按照某种“合理的”规则来划分——从积累的立场来看是

合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把危机归咎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失调，而马克思并不同意。但他把这种比例失调当作征候而非原因，他要寻找产生这种失调的机制。

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个简单的案例：一台机器具有已知的使用期限，并依照“直线”规则把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上面。处于商品形式中的价值在购买的时刻就退出了流通。在这台机器被置换之前，并没有更多的商品撤出流通（除非是为了修理和维护）。然而，通过对这台机器的生产性消费，每年都有商品回到流通，直到体现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所对应的商品在它寿命的最后一年全部回到流通为止。货币流通则走过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进程。它是“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出售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一部分一部分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29]（《资本论》第 2 卷，第 161—167 页）。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家就必须建立货币贮藏，直到足以购买新的机器为止（第 182 页）。

这种交换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时间特征。货币与商品是按照相当不同的时间模式来流通的。在购买机器之后，流通中的货币与商品相比立刻就过剩了。在机器的使用寿命临近终点时则会出现相反的状况。这些不平衡在长期会相互抵消（在我们设立的假定下），因而不会有总体上的不良后果，而信用体系可以发挥的职能是在机器的使用寿命中使货币支付变得平滑。但是固定资本的流通仍然会在短期内施加干扰性的影响，甚至对简单再生产的过程来说也是如此。第 1 部类与第 2 部类之间的货币交换和商品交换（见前面第 6 章）只有在一个不太可能的条件下才会相互适应：社会中的总的固定资本每年“退休”的比例、被置换的比例必须相等。这要求价值转移的速度是固定的，还要求固定资本的存量有一种特殊的年龄结

构。信用体系的缺乏也会引发不平衡，因为资本家必须贮藏货币才能抵偿置换成本，制造机器所需的流动资本也必须在置换之前进行预付。所以马克思总结说："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30]（《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

这个技术性的见解——它是马克思通过曲折的算术的例子来确立的，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将我们引到了一些远远更为宽泛的问题的边缘；当技术变革要求扩大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的比例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生产机器意味着"生产创造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直接创造供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31]（《大纲》，第710页）。换句话说：

> 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32]（《大纲》，第707页）

然后，马克思继续说明了让固定资本得以形成所需的条件：

> 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33]（《大纲》，第707页）

进一步讲，如果固定资本规模很大，寿命很长，而且与生产只具有间接的关系，那么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会愈发突出——“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34]（《大纲》，第707页）。那么，这些剩余的产品和劳动力最初是如何被获取、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

首先，这些剩余可以通过直接的强占和原始积累来获取。例如，一旦从农民人口中形成了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创造必要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爱尔兰人成了世界的铁路苦力和建筑工人，特别是在土豆大饥荒最终迫使他们离开土地之后——这场饥荒本身就是爱尔兰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渗透的产物。即使一些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最初不是由其他资本家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也可以通过强占或改建来取得这些使用价值。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只要简单地改变现存事物的用法，就有可能创造固定资本。资本家可以从工匠和劳动者那里强占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他们也可以夺 218
取消费品，把它们投入生产性的用途。例如在“外包”（putting out）体系中，织工的茅舍原本一直是消费基金的一部分，却逐渐发挥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3页）。当主要为了消费而建造的运输系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同生产相关的活动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这样做的好处是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丝毫不用干涉流动资本。然而，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形成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预先存在的条件——毕竟，资本“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35]（《大纲》，第675页）。例如，18世纪的英国拥

有巨大的物质资产储备（也许是尼日利亚目前所拥有的资产的两到三倍），而且这些使用价值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固定资本，所需的成本极少，甚至没有。通过把旧的建筑物（磨坊、谷仓、房屋、运输系统等等）投入新的、生产性的用途，早期的产业家取得了许多固定资本。固定资本的形成速度从来没有比国民产出的 5% 或 6% 高出很多；相比之下，若要启动资本积累，通常认为 12% 以上的速度是必不可少的。[①] 由于马克思的界定是流变的，所以英国这个反常情况——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引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道路——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强占、改建和原始积累都提供了固定资本，而没有从流动资本中挪走任何东西。这些特征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具有某种重要性——例如，非洲的移民在法国的建设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南欧人对大半个西欧来说也是如此。但若技术变革要起到恰当的作用，资本主义就必须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出生产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这将我们引到了把固定资本的形成所必需的前提产生出来的第二个主要机制。过度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它在资本主义之下必然会定期出现——意味着“一方面”创造“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创造“失业的工人人口”[37]（见前面第 7 章）。劳动力、商品、生产能力和货币资本的剩余都有转变为
219 固定资本的潜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见解。它实际上是说，资本积累的矛盾会定期把固定资本的形成所必

① 按照罗斯托（1960）的《经济增长的阶段》[36]（以及它的有趣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英国在 1783 年到 1802 年间通过使投资率从 5% 倍增到 10% 而完成了经济增长的“起飞”。迪恩（Deane）与科尔（Cole）（1962，第 261—264 页）发现，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剧增并没有多少证据，而且随后的辩论——克鲁泽（Crouzet）（1972）重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结论。马赛厄斯（Mathias）（1973）在这一点上也非常值得参考。

需的前提生产出来。我们接下来将阐明这个异乎寻常的理论见解的一些后果。

我们首先要考察产业后备军的起伏不定与固定资本的形成有怎样的关系，但不考虑任何“原始积累”或对人口中的“潜在”部门的发动。在这样的状况下，相对过剩人口主要是技术变革的产物，因为技术变革会制造失业。但是技术变革通常要求形成固定资本。后者则要求预先形成产业后备军。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节奏以及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的能力似乎是由相互矛盾的情况来调节的。将产业后备军生产出来的过程本身也会吸收产业后备军。这个矛盾一般是通过两个阶段来表达的：首先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然后是广泛的失业和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的停滞。然而，我们若要完整地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必须考察剩余产品又是如何产生、如何被吸收的。

比如说，与过度积累相联系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剩余并不能即刻从消费品工业（衣物、鞋子等等）调换到固定资本项目的生产（如机器、铁路）当中。若要强行推动这样一种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调换，通常就需要一场危机——马克思实际上认为，“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些投资打下了“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38]（《资本论》第2卷，第186页）。假如这样的调换可以即刻完成，也不产生成本，那么过度积累的问题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丧失问题就完全可以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来解决了。那样的话，这种调换的唯一界限就是把固定资本投资的价值实现出来的能力。由于固定资本的运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长期来看，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调换只会加深过度积累的问题。一部分固定资本会由于过度积累而受到处罚——即被迫闲置——

因而固定资本本身会经历价值丧失。过度积累问题的这个短期解决方案会加深长期的困难，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周期性的价值丧失这个普遍的负担推给固定资本。唯一的不同在于，危机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时机和节奏现在会深入地受到固定资本本身的周转过程的影响。

只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调换到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当中，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或许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案的语境下讨论了这种
220 可能性。[①] 他证明了只要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以合适的比例增长，资本积累就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在一个经济体中，制造机器是为了生产出制造机器的机器——从人的需要的立场来看，这看起来是相当荒谬的，但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能够这样来发展，因为资本家只对剩余价值感兴趣，丝毫不在乎他们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是怎样的。要使这样一种疯癫的经济达到极限，流动资本的流量就必须不足以支持对固定资本的继续使用，或者固定资本的形成所要求的技术变革的步伐就必须变得极快，以至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缩短所导致的价值丧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尽管在长期是无法持续的，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经常对高新技术生产发起过度投资，而不考虑已经存在的劳动力过剩或民众的人道需要。因此，资本在短期内可以调换到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当中，以此来回应过度积累——而且固定资本的寿命越长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例如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水坝、铁路等等）。但在长期的某个时刻，过度积累的问题必定会重

① 卡莱茨基（1971，第 13 章）对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做了一个有趣的描述。

新出现，也许还会以更为宏大的规模、通过固定资本本身的价值丧失来显现。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固定资本流通形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39]（《大纲》，第 703 页）在购买了固定资本之后，资本家就不得不在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计算）被完全回收之前一直使用它。固定资本"要求在往后的年份里生产继续进行"，并"预期占有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因而对未来的使用施加了一种强制力[40]（《大纲》，第 731 页）。马克思的焦点是固定资本——它的形式是受资本家控制的机器——对劳工的工作条件所实行的暴政（因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关于机器写了很长的、非常有力的一章）。但我们可以将这一点普遍化。资本越是以固定的形式流通，生产和消费的体系就越是被封锁在特定的、与固定资本的实现相适应的活动中。

这里包含的矛盾应该是清晰可见的。一方面，固定资本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杠杆，对固定资本的进一步投资也至少为过度积累的问题带来了暂时的缓解。另一方面，生产和 221
消费越来越被监禁在固定的行事方式中，越来越被束缚在特定的生产线上。资本主义失去了灵活性，创新的能力也受到了抑制（《资本论》第 2 卷，第 185 页）。

这立刻将我们抛回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固定资本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并不符合它在物理上的使用期限——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但在这方面对我们没有多少启发。就固定资本的流通而言，线性价值转移不再能作为一种充分的描述而成立了。由此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牵涉到更加廉价、更有效率的新机器会如何影响老机器的使用价值，从而会如何影响老机器

的估算价值。马克思注意到——他采用了价格的表达方式——"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41](《资本论》第3卷,第474页;第3卷,第114—115页)。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可能意味着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会在庞大的规模上发生。

第1部类与第2部类之间的交换还有可能遭受干扰。但若技术变革的步伐是平稳的,而且资本家在预计未来的技术时可以具有合理的安全感,那么他们既有可能有计划地淘汰他们的固定资本,又有可能按照某种合理的计划来管理固定资本的流通。[①] 这样一来,技术变革所导致的干扰就降到了最低,它对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影响也会下降为相当微小的振荡。但有计划地淘汰只有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受到约束时才是可能的。因此,若要调节技术变革的步伐、并将有计划的淘汰作为一种可用的手段来抵抗技术变革与它无可避免的结果——即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之间的明显张力,那么垄断、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资助以及创新的应用所受的法律约束(特别是专利法和许可法)就会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如下案例:不受控制的技术变革所造成的不连贯和破坏引起了资本家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形式是做出诸多安排——比如垄断和专利法——来控制技术变革的步伐。[②]

倘若缺乏成功的控制,有计划的淘汰就变得不可能了。一开始,部类之间只有微小的振荡和不平衡,固定资本相对

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与博卡拉关于相对价值丧失的观点是平行的——见前面第7章。

② 诺博(Noble)(1977)描述了专利法自20世纪初以来在美国受控制的使用;他的描述非常符合这里的理论叙述。

于流动资本的比例也是如此，但这些振荡和不平衡很快发展成了爆发式的振荡或对平衡增长路线的单调发散（monotonic divergence）（见前面第 171 页）。固定资本的流通被相互矛盾的力量的罗网所纠缠，而这些力量关系到技术变革、不均衡、危机的形成、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马克思在研究固定资本的流通时所想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

例如，他论证了资本家由于争相寻求相对剩余价值，所以被迫要把“旧的劳动工具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就置换掉，而且这种置换倘若是以“更大的社会规模”发生的，就会“主要”通过“大灾难即危机”来“实行”[42]（《资本论》第 2 卷，第 170 页）。他还提到了“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些改良“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产出自身的价值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重置成本的迅速减少也有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占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占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这第二个占有者用便宜的价钱把大企业买过来，所以一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43]（《资本论》第 3 卷，第 113—114 页）。

在局部危机或全面危机的进程中，固定资本的要素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丧失价值。于是，这构成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44]（《资本论》第 3 卷，第 249、254 页）。简言之，如果总的资本价值构成要在强大的技术变革面前保持稳定，就要迫使一部分固定的不变资本丧失价值。因此，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概念对固定资本的流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马克思总结说：

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5]（《资本论》第2卷，第186页）

可见，当我们在图景中引入了固定资本的流通之后，危机就具有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和一个新的维度。生产力的演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仍然处在事情的正中心。技术变革的步伐——它本身主要关系到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见第4章）——依旧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杠杆和导致不均
223 衡的重要力量。但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生产力的建构方式本身——它们是通过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建构的——会产生一种与进一步的技术变革相矛盾的价值流通形式。技术变革要么减慢（从而夺走资本积累的主要杠杆），要么飞速跃进，并导致固定资本无可避免的价值丧失。然而，危机形成过程的整个物质表现和时间节奏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马克思的“第一块”危机理论（见第7章）显然就行不通了。若要描述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这种理论应该如何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固定资本流通的一些特殊形式

我们之前固守于机器的例子，由此才能够简化固定资本的概念。但是固定资本还包括多种不同的项目，比如船舶和船坞、铁路和机车、水坝和桥梁、供水和排污系统、电站、厂房、仓库等

等。一把镐与一条铁路或许都可以被归入固定资本，但是除此之外，它们的相似性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应当把固定资本的概念拆分开来，并考察一些由此出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另外，关于信用体系的干预会对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在此之前也排除了任何仔细的考察，尽管这个问题一直潜伏在分析的背景中。乍一看，若要克服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矛盾，信用的确表现为一种合适的手段。但是马克思保持了他的本色：他坚持认为，信用一旦成功地发挥了这样一项职能，就会把矛盾内化到它自身的领域当中。矛盾发生了转移，却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提示了这样一种转移，因为他区别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的回流方式”：一边是年金、利息和不同形式的租金，另一边则是销售和利润[46]（《大纲》，第 722 页）。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节阐发这个主题。

由于货币、信用和利息的领域复杂得不同寻常，所以我们必须把相关的考察推迟到下一章。在这里，我们至多可以期望说明信用体系如何肯定必须作为一种处理一些慢性问题的手段而存在，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都是在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的语境下出现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考察一些情境，固定资本流通的问题在其中具有夸张的、非常特别的形式。

（1）规模庞大、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是它的“相对耐用性”的函数，所 224
以“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工具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那一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47]（《资本论》第 2 卷，第 220—221 页）。既然耐用性取决于物理属性，使用价值的物质特性就会对周转时间有重要影响。但是马克

思坚持认为："固定资本的较大的耐久性也不应单纯从物质上来理解。"[48]（《大纲》，第710页）耐用的材料之所以会被纳入固定资本项目，是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好处——例如，"[机器]越是需要时常更新，费用就越大"[49]（《大纲》，第711页）。另一方面，固定资本坚持得越久，就越有可能由于技术变革而遭受价值丧失。

因此，固定资本耐用性的变动取决于经济形势以及物质上的和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提到，"一门生意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周转期间，这取决于它们的耐用性的差别"；这个命题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中的固定资本。可见，当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被创造出来时，就会产生特别的问题，我们需要加以考察。

另外，必须在一开始投入货币流通并退出商品流通的价值量是高度多样的，这取决于所形成的固定资本的本质。船坞和港口所需要的价值量比简单的农具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一些固定资本项目的生产可以是渐进的——可以一点一滴地扩展，比如铁路线——另一些项目则必须在全部完成之后才能投入使用——例如水坝。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固定资本的物理的、物质的存在方式都影响了它在形成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资本在进入某些种类的活动时仿佛碰到了障碍，因为最初涉及的工作规模太大。这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经济形势在这里也会起作用。固定资本投资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些驱动——在生产中达到规模经济，并节省不变资本的运用——而且并不独立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程度。

由于这一切可能性，规模庞大、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的

生产和流通会带来一些非常特别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讨论。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下由于对一些项目的投资和使用——比如现代的一体化的钢铁生产设施、石化总厂、核电站或大型水坝——而引发的困难。

首先，生产这些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本身都相当漫长，因而给生产者施加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政府或国家出资兴办。"[50]（《资本论》第2卷，第233页）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以及信用体系的精巧组织让这些工程得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经营。

另外，这个固定资本的使用者要支出大量货币，而且在生产中收回这些货币要花很长时间——比如30年或更久——这些都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因此，个别资本家也许必定会试图把这些工程的"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51]（《大纲》，第531页）。具有如此规模和耐用性的固定资本在生产或使用时肯定没法不求助于信用体系。个别资本家如果打算购买固定资本，原本就不得不贮藏数额巨大的货币资本；信用体系减轻了这种负担，而且将这个固定资本的支付方式转变成了按年支付。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假定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没有个人储蓄——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若要在当前进行投资，就是在向进行储蓄的其他资本家借债，后者的着眼点是未来的投资或置换。资本家以这种方式保持了对资本的充分运用，尽管大规模的固定资本项目周转得很慢。

信用使得诸多部门之间的货币交换——这些部门生产的是工资品、不变的流动资本或不变的固定资本——在理论上有

可能达到平衡，尽管这丝毫没有直接改变商品交换。但为了让和谐在货币交换中存在，总储蓄就必须与投资的需要达到均衡。这立刻促使我们追问：这样一种均衡如何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得到确立？我们只有在一个完整的语境下——在分析信用体系时——才能讨论这一点。倘若这种均衡状况无法成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它为什么“若非在偶然中”就无法成立（见第 9 章）——那么信用最终也许就会加深而非解决这个问题。

物质商品在部门之间的交换仍然会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遭受干扰；在引入了规模较大、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之后，这些干扰就被放大了。毕竟，“固定资本直接带来的成果越少”，“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52]（《大纲》，第 707 页）。这意味着若要完成这样的工程，就需要大量的强占（奴隶劳动、原始积累等等）或非常强烈的过度积累。由于它们的预期是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未来的劳动成果”，所以它们还监禁了资本，而且监禁的方式并不总是可取的。

假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固定资本的进展——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短期投资到长期投资——在所有方面都是平均的，那么把关于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的理论整合到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当中就比较容易了。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导致了“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53]（《资本论》第 2 卷，第 185 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原因不仅在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且在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

特性”[54]（《资本论》第3卷，第260页）。例如，多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如船坞和港口、运输系统等物质基础设施——都有相对较大的规模，而且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由于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是有张力的——市场交换的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的张力——所以我们应该预料到，在这些因素与一些关于固定资本的决定——资本家要决定如何使用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耐用性的固定资本——之间也将出现相互作用。固定资本在规模和耐用性方面的差别似乎注定是资本主义的不平均发展所具有的一个本质特征。

（2）“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

在有些情况下，固定资本“不单纯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工具，而且还表现为独立的资本形式，如铁路、运河、公路、灌溉渠道等形式，即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等等”[55]（《大纲》，第686—687页）。“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就生产而言执行了非常特别的职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充当了“生产的一般条件”[56]（第739页）——因而可以同封闭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区别开来。

对个别资本家来说，这个差别可以表达为机器与安放机器的建筑物之间的差别。但我们在整个社会中可以观察到，资本家在许多情境中会共同利用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他们作为个人也会以部分的、间歇的或暂时的方式来利用它们（《大纲》，第725页）。这种类型的固定资本与生产之间的独特关系是与一种特定的流通过程相联系的——“它所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以年金的形式实现的，在这里利息代表剩余价值，而年金代表预付价值的陆续回流”[57]（《大纲》，第723页）。实际上，资本家是以年度为基准或以服务费的方式来购买这类固定资

本的使用价值的——安放生产的建筑物是按年出租的，叉车是按周出租的，租借集装箱则是为了把商品带到最后的终点。

这意味着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所有者并不是某个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这一点也为由此出现的流通形式打下了合理的基础。实际上，当资本所有者把资本借给使用者时，资本具有固定的形式，而不是货币形式：

>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的偿还会怎样受它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始终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58]（《资本论》第3卷，第344页）

由此可见，我们如果没有彻底考察货币资本和利息，在讨论固定资本的这种流通形式时就没法走得很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探讨固定资本的段落中排除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仅仅探讨了封闭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评论，对此做一些解释是值得的。例如他提到，高度依赖固定资本的大规模业务——比如铁路——虽然“仅仅提供利息”，但是“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59]（《资本论》第3卷，第437页）。因此，一种有可能拖延危机的办法是将

“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60]（《大纲》，第 750 页）。

相当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提过这个观点，更没有探讨它的后果——包括理论的和历史的后果。① 马克思提出了两点主张。第一，如果固定资本是借出去的，而不是卖出去的，那么它的职能就是货币资本的物质性的等价物。这样一来，只要它的价值可以在使用期限内得到回收，而且可以产生利息，它就可以流通。由于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在流通中并没有获得在它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由此释放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在余下的资本家之间通过竞争来划分，因为他们会力争使利润率平均化。显然，倘若独立形式的资本与封闭形式的资本相比有所增长，那就会释放出剩余价值，从而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抵消马克思所界定的利润率下降。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会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个国家的总资本分为这两种形式的比例”[61]（《大纲》，第 686 页）。这又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规模和组织在过去两百年间的不断变化（见第 5 章）。

第二，我们可以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考察这个大问题。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对利润率的一种界定，即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与所运用的总资本的比例，那么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得越多，一个生产期间所运用的资本与实际消费的资本相比就越多。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的使用则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所运用

① 博卡拉（1974）在对价值丧失的叙述中谈到了这个观点，但是随后就把它归附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结构性价值丧失理论，从而削弱了它的真正意义——见前面第 7 章。马加利纳（1975）虽然正确地拒斥了博卡拉在总体上的理论立场，却没能在这个过程中承认，就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具有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报酬率而言，后者的论述包含了部分的真理。

的总资本现在只包括资本家为了在一个时期内使用固定资本而进行的支付。把封闭形式的固定资本替换为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会减少个别资本家所运用的总资本，即使所消费的总资本也许在增加。个别资本家的利润率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招数来提升。转向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有助于制止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在具体的语境下，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与封闭形式的固定资本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流变的——产业家既可以租借建筑物和机器，又可以干脆把这些项目买下来。当年景变得困难时，我们或许就能预料到设备租赁的增加——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目睹了这种情况。

但这一切假定了资本家所创造的组织形式能够供应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而且它的流通既没有被任何独特的困难所困扰，又没有被任何严峻的壁垒所妨碍。信用体系的活跃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一些组织形式——比如股份公司——也必须被创造出来。这些都是必要条件。此外，固定资本一旦独立流通，就会随之产生一定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与封闭在生产中的固定资本的情况相比，这里的情况会使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实现问题（以及价值转移的计算等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固定
229 资本的使用完全取决于总体的经济状况，而且在使用减少所造成的突然的价值丧失面前要脆弱得多。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这里讨论的固定资本往往是共同使用的，还充当了生产的一般条件，所以虽然公司内部寻求剩余价值的竞争会通过技术变革来推动价值丧失，但是价值丧失的程度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近乎相同的——除非独立的固定资本的供给者也在相互竞争。显然，我们倘若没有非常具体地考察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具有怎样的组织，就无法将这个问题推进得很远。

 马克思关于这种特殊形式的资本的看法远远没有得到较

好的展开。我们对他的论述所做的概括在解答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但与马克思一样，我们肯定必须推迟更加深入的评价，直到我们至少对信用体系确立了一些理解为止。我们在这里只能谈论一些看起来意义重大的观点，但我们还没有为完全充分地探讨它们做好准备。

4. 消费基金

某些商品在消费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有些类似于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这些商品没有被直接消费掉，而是被用作*消费工具*。它们包括了多种多样的项目：餐具和厨具、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住房，以及各种集体消费的手段，比如公园和走道。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消费基金*这个标题下将所有这些项目归到一起。

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区分植根于商品的使用，而不是商品的物质存在方式。项目可以由于用途的变化而从一个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见前面第205页）。例如，体现在仓库和工场中的固定资本可以转变为消费基金项目，比如公寓和美术馆，反之亦然。一些项目同时具有生产手段和消费手段的职能（例如高速公路和汽车）。联合使用总是有可能的。

消费工具未必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工人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劳作来生产自己的住房，并互相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来进行易货贸易。这样一类体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年是很常见的，而且在第三世界经济体所谓的“非正式”部门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下”经济中仍然存在。[①] 230

① 波特斯（Portes）（1980）概述了关于非正式部门和资本积累的文献（主要涉及拉丁美洲）。

劳动力的价值对于消费基金的供应所采取的形式十分敏感，因为前者是按照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来规定的。但由于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关注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所以我们将假定消费基金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被生产出来的。

一件商品对它的生产者来说是流动资本，不论它是如何得到使用的。当它被出售给最终消费者时，它就从流通中消失了，这件商品所对应的价值也就以货币形式回到了资本家那里。商品倘若拥有较长的寿命、一直在被使用，就构成了社会总财富的一部分。但它们的职能就不再是运动中的资本了。就此而言，在对固定资本的持续使用（价值由此作为资本而保持流通）与对消费基金项目的持续使用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差别。

假如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就可以愉快地把消费基金的问题丢到一边了。但让我们从买方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买方必须在某个时刻支付商品所对应的全部价值，才能在未来获得不断流入的利益。他们可以贮藏货币，或者租借这个项目本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支付租金），或者借入购买它的货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支付利息）。按照常规，租金和利息的支付是与许多消费基金项目的使用相伴随的。我们有必要理解这是为什么。

有些消费基金项目——比如住房——需要一笔极为庞大的初始支出，因而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用直接购买的手段来得到它们。如果住房是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租借或货币的借贷就变得必不可少了。倘若脱离了地主、信用体系和国家的干预，资本就不会有机会获得这种广泛的、非常基本的生产形式。[①] 为了购买昂贵的消费品而进行的货币

① 近年来，住房部门在许多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的研究中成为了焦点。参见巴西特（Bassett）与肖特（Short）（1980）。

贮藏也会干扰资本流通，因为它束缚了货币（后者原本可以转变为资本），还充当了一道障碍：收益的流通原本可以通过交换平滑地转化为资本的实现，现在却不行了。于是，信用体系就赶来解围了：它让一些消费者得以进行储蓄（并换取利息），又让另一些消费者得以借入货币，并在相当长的期限内偿还利息和本金。诸多部类的相互交换由此就得到了保障，不用过多地贮藏收益。

然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消费基金的使用被整合到了生息资本的流通当中。借出货币的依据是消费基金项目的使用者的未来收益。这个项目充当了贷款的担保，而这意味着它必须保持商品的性质，即一种有市场潜力的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倘若借方拖欠了利息支付，贷方就必须能够重新占有这 231
件商品，并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许多消费基金项目（住房、汽车等等）都是依靠债务融资来购买的，所以它们的二手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资本既有可能在消费基金内部流通，又有可能通过消费基金来流通——它也的确会这样流通。只要货币资本渗透进来了，消费工具就会采取储存的商品资本的形式。资本在消费基金内部流通的规则成了一般资本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本人推迟了对这一点的任何详细考察，理由是它“涉及到一些进一步的规定（租赁代替出售，利息等等）”，而这些规定还有待探讨[62]（《大纲》，第711页）。这个观点十分精当。但关于消费基金的几个初步要点可以在这里得到有效的确定。

（1）就消费基金中的项目在物理上和经济上的使用期限而言，起规定作用的力量有别于在固定资本的情况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力量。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它会无休止地使固定资本革命化，并周期性地使它丧失价值——在消费领域

中的缺席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倒是存在另一种竞争，约束它的是不断变化的兴致、时尚和把身份的象征展示出来的欲望。只要对资本积累而言的“合理消费”依赖于使消费基金在使用中保持一定的周转，资本就必须把时尚和身份的力量发动起来。无论这一点可能会是怎样，消费基金项目在发生经济上的淘汰时所回应的压力并不同于另一些压力——后者塑造了固定资本的使用。生产力的革命只是间接地制造了经济上的淘汰——更加廉价、更有效率的消费品使对旧的消费品的维护变得不经济了；运输的联络和产业的搬迁使某些区域的住房变得多余了；如此等等。就消费基金而言，对象在物理上、物质上的使用期限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维持市场而言，固有的、物理上的淘汰是与经济上的淘汰同等重要的。

（2）消费基金中二手项目的交换价值大体上是由相等的新项目的价值来决定的。这些项目的可销售性取决于它们的可让渡性和它们产生未来收益的能力（不论它们在物理上的使用期限处于何种阶段）——要使用它们，就要付出未来收益的流量。因此，这种资产的价格是由它可以产生的收益来规定的——这种收益要按照现行利率来折算（见第 9 章和第 11 章）。

（3）对消费基金项目的购买——通过地产抵押和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对于货币的可用性十分敏感。因此，由过度积累的倾向所引发的循环搏动在消费基金的形成过程中十分活跃，就像在固定资本中投资一样。然而，在消费基金内部吸收闲置的货币资本的能力受制于未来收益的流通。与消费基金相关的过度负债可能是一个与过度的固定资本投资同样严重的问题。对未来收益的债权——这些收益源自未来的劳动——可能会远远超过这种未来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于是，消费基金内部的可销售资产在危机的进程中很可能会丧失价值，

过度负债也可能是不均衡的一个根源。另一方面，信用体系既有能力刺激生产（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又有能力刺激交换中的实现（通过消费基金的形成）。我们将在往后的章节更加深入地考察这一点的后果。

（4）消费基金中“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区分也值得一提。与创造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基金相比，资产阶级消费它的收益的方式——往往十分炫目——具有极其不同的后果。让我们回想一下，必需品成本的下降是剩余价值的一个来源。廉价的住房、低廉的租金支付或利息支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为“这些……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63]（《资本论》第3卷，第86页）。工人的住房的形成过程经常在地主、建筑商、货币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一般资本家之间激发出纵横交错的冲突。[①] 这经常会导致国家干预。

5. 生产、交换和消费所需的建成环境

一部分劳动工具，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工具进入生产过程……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劳动工具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

① 我更加详细地考察过这一点，见哈维（1977）。

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人身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64]（《资本论》第2卷，第162—163页）

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混淆固定资本与不动资本（船舶和机车是固定资本，尽管它们会移动；流动资本的一些要素则必须在当地使用，比如水力）。但我们的确必须考察不
233 动的固定资本在一般的资本主义之下、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独特的作用”。一部分消费基金（住房、公园等等）在空间中也是不动的。

这将我们引向了建成环境的概念，它的职能是一种巨大的、人工创造的资源体系，由内嵌在物理景观当中的使用价值组成，可以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得到利用。从生产的立场来看，这些使用价值可以同时被视为生产的一般前提和直接的生产力。因此，我们必须讨论“土壤改良、灌溉渠道、建筑物；机器大部分也是这样，因为它们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在物体上固定下来；铁道；总之，工业产品固定在地面上时所采取的任何形式”[65]（《大纲》，第739—740页）。用于消费和交换的建成环境所具有的异质性也毫不逊色。

建成环境是由一大堆不同的要素所组成的：工厂、水坝、办公室、商店、仓库、公路、铁路、船坞、电站、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学校、医院、公园、电影院、餐厅——这张列表是无穷无尽的。许多要素——教堂、房屋、排水系统等等——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进行的活动所留下的遗产。在任何一个时刻，建成环境都表现为许多景观的大杂烩，而这些景观是按照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规定、在这些生产方式的
372 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塑造出来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当中，所有要素都采取了商品形式。

建成环境的要素如果纯粹被视为商品，就会展现出某些独特的性质。一件商品在空间中的不动性意味着一旦它运动了，它所体现的价值就必定要毁灭。空间方位或空间位置对于建成环境的要素是一个根本的而非附带的属性。所以，它们必须在当地的土地上建造或组装，因而土地和对地租的占有（见第 11 章）就变得重要了。进一步讲，特定要素的有用性还取决于它们相对于其他要素的位置——商店、住房、学校和工厂都必须以合理的方式互相邻近。因此，建成环境的空间秩序这个大问题必须得到考察；要决定把一个要素放在何处，就不能不考虑其他要素在“何处”。

可见，建成环境必须被看作一种具有地理秩序的、复杂的、复合的商品。这样一种商品的生产、它的秩序的建立、它的维护、更新和转化都带来了严峻的两难困境。个别要素的生产——房屋、工厂、商店、学校、公路等要素的生产——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协调，以便让整个复合的商品得以具备恰当的格局。土地市场（见第 11 章）有助于按照用途来配置土地，但是金融资本和国家（主要是通过一个机关来调节和规划土地的使用）也充当了协调者。由于不同的要素具有不同的 234
物理上的使用期限和不同的老化速度，所以问题也就产生了。经济上的折旧——特别是对一些在资本面前发挥了生产力职能的要素而言——同样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由于要素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的要素的有用性，所以由个别的更新、置换或转化行为所发动的贬值和增值具有复杂的模式（这还会影响价值关系）。个别的投资决定所具有的“溢出”效应在空间中被本地化了。同样，在建成环境的一个部位减少投资也很可能会贬低周围的房地产的价值。

既然说建成环境中有商品生产，那就意味着市场可能会由于个别要素的生产和出售而形成——这些要素最终会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些进一步的问题。排他的使用和对使用价值的私人占有可能会在一些要素那里（房屋、工厂等等）确立起来，而集体的使用对于另一些要素是可能的（公路、人行道等等）。整个建成环境一部分是公共的，一部分是私人的，而个别要素的市场反映了不同种类的市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再者，因为建成环境中的诸多要素都发挥了本地化的使用价值职能，所以即使它们的价值已经被资本完全收回了，给它们贴上价格标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只要它们得到了使用，资本家就可以榨取租金，并按照现行利率把租金折算为土地及其附属物的市场价格。因此，两种类型的交换价值并肩存在：旧要素经过折算的租金与新要素的生产价格。这两种价格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推导出来的，却被市场体系调和到了同一个价格结构当中。假如我购买一栋旧房子可以比生产一栋新房子花费得少——两者的性质基本相等——那我为什么要花工夫去建造新的呢？

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会对一般的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流通产生极端重要的影响。不论是旧的房地产还是新的房地产的生产，其中的投资都可以使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回报率。把闲置的货币资本作为房地产来出借就像以货币形式出借一样容易。由于房地产的一部分使用价值取决于它的相对位置，所以货币资本家甚至可以对土地和未来可以从土地中收取的租金进行投资。由于租金被看作土地所有者在剩余价值中占有的部分，所以货币资本现在的投资对象是占有，而不是生产。作为一个理论性的命题，这看起来相当不合理。然而它有物质上的意义：建成环境的生产和使用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了

资本流通的轨道。若非如此，资本就无法在物理景观中以一种总体上有利于积累的方式（其中充满了各种矛盾）来确立它自身了——资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影响自己为了生产、交换和消费所需要的建成环境了。[①]

马克思本人完全明白这一切所具有的更加宽泛的后果。他写道：资本在建成环境中流通的概念意味着“生产过程运行的”单纯的“工艺条件（生产过程运行的场所）”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固定资本的形式”。占有“自然作用物，例如水、土地（特别是这土地）、矿藏等等”在原则上并非不同于占有其他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并通过直接把它们投入使用来把它们转化为固定资本[66]（《大纲》，第691、715页）。土地的改良——不论是为了农业还是为了工业——意味着土地本身“归根到底就要……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67]（《资本论》第2卷，第210页）。

那么，我们倘若没有妥当地考察土地所有权，又怎么可能讨论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流通？一旦我们让土地所有权得以进入我们的研究，租金理论还会远吗（《大纲》，第715页）？我们倘若没有充分理解租金理论和利息理论，就无法获得对眼前问题的充分掌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马克思为什么认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回报是两种不同的回报：一边是年金、利息和各种形式的租金，另一边则是为了利润而直接进行的销售。由此，我们在接下来的三章所面临的任务就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租金和利息必须作为分配形式被充分整合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当中。

① 见哈维（1978）关于这个主题更加详细的分析。

6. 固定资本、消费基金和资本积累

资本家倘若没有形成固定资本，就不能指望长期获取技术变革的利益。因此，他们会创造一种特有的、相当怪异的资本流通方式，它在适当的时候会“硬化”为“资本的一种单独的存在方式”。同样，消费基金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必要的；为了支持商品形式的消费基金的生产，会出现特别的资本流通形式。

这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总体影响是戏剧性的。特定的时间关系被引入了积累模型，而最初对这些模型的说明（见第 6 章）没有涉及任何特殊的时间尺度。建成环境的创造使我们不得不把关于地点和空间的安排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属性。
236 我们现在必须认为，积累过程运行在一种按照资本主义特有的逻辑来界定的时空框架中。由于我们将在第 11 章和第 12 章讨论地点和空间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将把注意力局限于对相关事务的时间方面做一些反思。

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把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和使用中的资本流通过程的总体称作次级的资本循环。在这种次级循环中，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相比，我们必须为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赋予一定的优先地位，因为后者界定了相对的时间尺度，而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是在这个时间尺度中流通的。然而我们观察到——这一点十分有趣——消费基金在形成和使用时的节奏会被逐渐拖进一种模式，从而大致遵循固定资本所经验到的节奏。我们很快就会说明为什么会这样。

固定资本的流通过程并没有确立一种可以用来衡量资本积累的绝对的时间尺度。马克思对机器的物质属性的研究有时近乎是把物质实体的衰败速度——因为有“正常的磨损”[68]——
376 当成了固定资本流通的根基。但是正常的磨损无法脱离某种

已有的关于使用强度的概念来界定，而且经济上的使用期限概念——与物理上的使用期限相对——会很快打破任何简单构造出来的时间度量标准。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其实反映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过程中的总体强度。毕竟，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马克思最初的概念工具的核心特征。因此，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会无休止地重塑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的时间性。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证明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分离会给第1部类与第2部类的相互交换赋予一种循环式的节奏——而且有爆炸的可能性。由于产业后备军的总额起伏不定，而且固定资本（特别是大规模的工程，它们要花费较长的工作时间）在形成时会发生提前和滞后，所以资本积累的步伐似乎无可避免地会有强烈的循环波动。这些波动又为消费基金的形成过程注入了循环搏动，后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由于乘数效应而放大对均衡的偏离。

我们还注意到，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剩余的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的生产——这些状况恰好适合于刺激流动资本流入整个次级的资本循环。由于向次级资本循环的这种调换是可以策划的——这个过程完全有可能包含某种“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es）——所以次级循环表现为一场及时雨，可以吸收剩余的、过度积累的资本。吸收过剩资本的能力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受到限制。固定资本的实现依赖于生产性消费的加强，但是后者在长期会产生越来越多有待吸收的资本。消费基 237
金中资本的实现则依赖于未来收益的扩大，因为这些收益可以抵偿当前的购买所带来的负债。因此，只要没能满足恰当的条件，那么价值丧失的前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浮现出来。但在这个地方，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同消费基金的形成和使用之

间的相互作用就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在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下，生产中的固定资本虽然扩大了，却可以通过消费基金内部资本流通的扩大来实现。这是过度积累问题的一个梦幻般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见第 10 章）。但这两种过程只要可以相互支援、相互滋养，就能拖延无可避免的结局。

这意味着危机的形成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时间节奏——我们最初可以联系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固定资本各个部分的相对流通时间来界定这种时间节奏。然而，可能的流通时间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体系似乎走向了彻底的不连贯——除非我们可以搜寻到一种统一的力量，它把自己的印记留在了整个时间过程上面。从对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产生的核心观点是：利率恰好执行了这样一项职能。它把当前与未来联系起来，为一般资本界定了时间范围。我们如果能发现利率到底是如何得到调节的，就将揭开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秘密，而这是后面两章的任务。

但这里也有一定的讽刺。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物质形式中的流通是通过诉诸纯粹货币形式的资本来调节的。从这里会生发出一个根本矛盾。一方面，固定资本表现为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表现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并表明了“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69]（《大纲》，第 706 页）。固定资本将劳动生产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又确保了过去的“死”劳动（即体现在商品中的资本）对工作过程中的活劳动的统治。从剩余价值生产的立场来看，固定资本表现为“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70]。

另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价值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71]，并与特定技术条件下特定形式的商品生产相联系。它必须掌控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出

于这个原因，固定资本限制了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发展轨迹，妨碍了进一步的技术变革，并对资本进行了强制，原因恰好在于它“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中”。一般资本“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而且试图“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个立场来看，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又表现为“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因为它可以更加即时地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塑造[72]（《大纲》，第694页）。

固定资本从生产的立场来看表现为资本的成就的顶峰，从资本流通的立场来看却只是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所面临的障碍。于是，资本“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73]。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只有两种。它们要么在危机的进程中得到强制的处理，要么转移到某个更高的、更加全面的层面上，并为一种不同的、往往更加深重的危机的形成提供养料。我们现在要牢记这一点，并转向与资本积累相关的货币、信用和金融的整个问题。

译注

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2页。
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92—9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59页。
4.《全集》第31卷，1998版，第76页。
5.《全集》第31卷，1998版，第85页。
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94页。
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51页。
8.《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7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9.《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31页。
10.《全集》第31卷，1998版，第98页。
1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37页。顺带一提，“流通”（Zirkulation/circulation）和“流动资本”（zirkulierendes Kapital / circulating capital）这两个术语是相通的。马克思偶尔也用法文把“流动资本”写作“capital circulant”。

12.《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32页。
1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4页。
1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44页。
15.《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77页。
1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77页。
1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46页。
18.《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95—196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9.《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96页。
20.《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91—192页。
21.《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7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2.“折旧”在英文中是“depreciation”，与“贬值”相同。
23.《全集》第31卷，1998版，第293页。
2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50页。
2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35页。
2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05、54页。
2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85页。
28.《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34页。
29.《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88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0.《全集》第45卷，2003版，第526页。
3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5页。
3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2页。
33.《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2—103页。
34.《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3页。
35.《全集》第31卷，1998版，第70—71页。
36. 中译本见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版。
3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79页。
38.《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07页。
39.《全集》第31卷，1998版，第99页。
40.《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31页。
4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5页。
42.《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90—19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29—130页。
4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78页。
45.《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07页。
4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18页。
4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46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8.《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6页。
49.《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7页。
50.《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60页。
51.《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29页。
5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3页。

53.《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06页。
5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89页。
55.《全集》第31卷，1998版，第84页。
5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39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7.《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20页。
5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384—385页。
5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6页。
60.《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50页。
6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84页。
6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7页。
6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01页。
64.《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81—18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5.《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40页。
6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88、110页。
6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35页。
68.《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95页。
69.《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02页。
70.《全集》第31卷，1998版，第93页。
7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26页。
7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93页。
73.《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90页。

第9章　货币、信用和金融

239 马克思并没有完成他对货币现象和金融现象的分析。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一种非常一般的、高度抽象的货币理论（他在那里概括了《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分析——这些分析虽然更长，却也有更强的试探性）。他关于信用体系运行方式的笔记还处于高度混乱的状态。为了出版《资本论》第3卷，恩格斯想方设法地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恩格斯在他为这部著作写的序言中抱怨说，关于这个理论“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1]。出于对马克思的忠诚，恩格斯最终复制了大多数未经整理的文字。这是马克思的理论一项重要的“未竟的事业”。

我们很难说马克思究竟把这项未竟的事业看得多么重要。他认为对货币的分析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必须放在他对资本流通的研究之前。但他也坚持认为，要理解利润的起源（即剩余价值），

是不用诉诸任何分配范畴的。因此，对信用、金融和生息资本流通的分析甚至被丢到了对利润率的总体变动的分析之后。如此迟缓地引入信用这个角色是否可以得到辩护？这一点令人怀疑。马克思即使在推导利润率下降的倾向的过程中也经常指出，若干问题如果脱离了对信用这个角色的考察就无法得到解答。倘若我们把这些评论放到一起，信用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在关系的拼图中就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复杂的中心部件。但这个中心部件描述了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关系——包括个别资本家与阶级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的派系之间的关系。信用体系是资本本身在尝试应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时的产物。马克思将为我们说明资本的解决方案最终如何加重了矛盾，而不是减轻了矛盾。

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极少关注理论的这个方面。由于 240
许多人——他们的线索主要来自列宁——十分重视“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特定阶段，所以这种忽略就愈发令人惊讶了。希法亭的著作（列宁直接利用了这部著作）出版于1910年，而且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还是迎头讨论信用体系这个主题的唯一重要尝试。[①] 罗斯多尔斯基和德布伦霍夫在20世纪60年代把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放回到了问题的中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对信用体系的论述仍然单薄得可怜。[②]

① 见列宁（1970版）、希法亭（1970版）。

② 罗斯多尔斯基（1977）十分关注货币问题，德布伦霍夫（1971；1976；1978；1979）的著作也是根本性的。曼德尔（Mandel）（1968，第7、8章）所给出的文本在分析中放进了货币和信用——极少有文本会这样做——他在后来的著作中还试图把金融问题保持在研究的前沿。另一些值得注意的贡献来自哈里斯（1978；1979）和巴雷尔（Barrère）（1977），后者试图把关于货币和信用的理论整合到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当中。卡特勒（Cutler）、辛迪斯（Hindess）、赫斯特（Hirst）与侯赛因（Hussain）（1978，第2卷第1篇）关于货币和金融机构总体上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说法，但是完全误解了马克思本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阿明（1974）的贡献也值得一提。

接下来我将设法填补这个理论中的缺口。我的目标是把对货币和信用的分析与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整合起来。这可以让我们更有资格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必定要通过生息的货币资本的流通——引导这种流通的是信用体系——来表达，为什么这些“规律”必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流通的指导。然后，“第二块”危机理论——它把货币现象和金融现象整合到了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理论当中——应该就不会太过远离我们的掌握了。

然而，我们很难设立一种既可以描绘本质，又不会掩饰复杂性的阐述方法。因此，我将材料分割成了两章。我在这一章会从一个相当技术性的观点来讨论货币、信用和金融。我们将首先对货币的作用进行更加完整的演绎——第 1 章简要地谈论过这个话题。这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货币必须独立于资本流通来理解。我们由此就可以看到，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使货币的基本用途具有了新的格局。于是，货币获得了作为生息的货币资本来流通的潜力。然后，我们将考察这种流通形式的职能，以便证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具有社会必要性的方面。本章的末尾将简要地描述一些以具体的方式为生息资本的流通提供方便的主要工具和制度。

我将首先摆放好这些片段，而不会太过关注总体的动态、
241 矛盾的充分展开或由信用体系的兴起所推动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内在转化”。第 10 章将讨论这些更加宽泛的、更加令人兴奋的问题。

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统一了这两章，那就是作为一般
384 的社会权力的化身而存在的货币，它独立于、外在于特殊的生

产过程或特定的商品。[①] 货币资本可以发挥资本家阶级的共同资本的职能，但也可以被私人占有和聚敛。于是，个别行为与资本家阶级的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之间的矛盾（见第 7 章）就变得更加尖锐了。但是马克思也坚持认为，货币仅仅表达了一种或然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最终取决于如何能使社会劳动体现在物质商品中，并由此创造实际价值。正是货币与商品的联系——前者是价值的一般表达，后者则是价值的实际体现——构成了我的大多数分析所围绕的枢纽。

1. 货币与商品

我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一件商品是一个物质对象，同时体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货币形式内部的一切矛盾都是以这种两重性为源头涌现出来的。让我们考察一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这种两重性是如何在交换中得到表达的。价值的相对形式的出现是由于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能通过它自身来衡量，而始终必须通过另一件商品来表达（“20 码亚麻布 =20 码亚麻布”的观点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而“20 码亚麻布 =1 件上衣”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两件商品的交换还预设了它们的等价关系，并指出了等价形式的存在；马克思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本身作为等价形式的根基。这个等价形式必

① 把货币作为社会权力的观点——这种权力是由资本家占有的，而且会转化为货币资本——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的核心，并使它有别于资产阶级的看法；后者归根到底全都倾向于以某个版本的货币数量理论为归宿（见哈里斯，1979；德布伦霍夫，1979）。新古典主义传统中的资产阶级文本［比如尼汉斯（Niehans）的文本，1978］修改了一个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假定——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具有所谓的中立性——并赞同一种更为精巧的关于交易成本、现金余额的供给与需求等问题的分析。由此，货币的数量和形式就得以在资本积累、需求、增长、就业、产出等方面产生现实的影响了。但在这里完全看不到上述货币概念——社会权力的一个根源——也看不到货币与货币资本的区分。

须找到一种物质性的、“尘世的”代表，否则使用价值的交换就无法成为普遍的交换。交换的扩大保证了一种商品会成为一
242 般等价物，即抽象的人类劳动被社会承认的化身。这种商品叫作货币商品。于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就可以由价格——这些商品同这种货币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来代表了。但我们立刻就能看出一个矛盾——抽象劳动是由有形的人类劳动在具体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一种特定的商品来代表的。这个矛盾接下来将一直与我们相伴，尽管我们将看到，它通常会采取更加神秘化的形式。

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货币商品也具有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它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规定的（尽管这种劳动是具体劳动）。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并提供了一个价格标准，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可以借此得到评估。但这些价格的实现依赖于交换过程，从而涉及交换价值。由于交换的干预，价值比例之间的必然关系转变成了“单个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之间的或多或少偶然的交换比例”。结果，市场价格偏离了价值。马克思坚持认为“这并不是……缺点”，因为假如不允许价格在价值附近波动，那么由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没有规则性的盲目”，需求与供给之间无休止的振荡就不可能达到均衡。[2]（《资本论》第 1 卷，第 102 页）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商品流通提供方便。因此，它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是在货币商品的帮助下发生的，而货币商品的价值就被规定为对这些交换的反映——“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3]（《资本论》第 1 卷，第 95 页）。从这个立场来看，货币采取了相对价值形式。相对价

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对抗之所以会保持在货币形式本身当中，是因为货币商品现在体现了两种价值尺度：其一是它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二是它平均可以交换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价值的这两个代表当然应该相互一致。但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没有规则性的盲目”永远会阻碍这种完美的出现。这两个代表的相互背离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频繁出没，反复纠缠我们。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让我们暂且假定黄金是唯一的货币商品。一定数量的商品按照价格来流通所需要的黄金数量是用流通中的黄金总量乘以它的流通速度来规定的。这个公式——$MV=PQ$——与李嘉图等货币数量理论家所运用的公式是相同的。马克思也使用这个公式，却拒斥了货币数量决定价格水平的观点——这是货币数量理论家的基本信条（《资本论》第 1 卷，第 123—124 页）。[①] 价格归 243
根到底是由价值（或“生产价格”——见前面第 2 章）来规定的。但是货币和商品的流通速度每天都会波动，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黄金的需要是波动的，价格也有可能强烈地偏离价值，除非可以找到某种办法相对及时地增加和减少流通中的黄金数量。马克思认为，黄金储备的存量——即贮藏——对于顺应这些波动是必要的（《资本论》第 1 卷，第 134 页）。于是，所需要的黄金总量就等于商品按照价值来流通所需要的黄金加上储备所需要的不论多少黄金。

黄金当然必须首先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人们或许还需

① 德布伦霍夫（1971；1979）和哈里斯（1979）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评论了货币数量理论。

要额外的黄金，以便替换由于磨损而失去的黄金，或者为扩大的商品生产提供方便。但是供给黄金的能力是由具体的生产条件所支配的，而且由于任何货币商品都必定是稀少的，也必定具有特别的性质，所以我们发现黄金的供给（或其他任何货币商品的供给）是无法即时调整的。再者，当黄金发挥了纯粹的流通手段职能时，它的生产成本就必须被看作必要的流通成本的一部分，或流通的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的一部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黄金在发挥货币的职能时（与此对立的是具有货币之外的用途的黄金）必须永久停留在流通中，决不能成为个人消费或生产性消费的一部分。作为交换的“润滑剂”的供给者，黄金的生产者会占据一些资源，使它们无法被用于生产。

对黄金的称量和校准是既冒险又微妙的。当黄金被用作纯粹的货币商品时，它与其他金属货币的共同点是笨重、昂贵而烦琐，尽管它拥有一些在发挥货币的职能时必不可少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恰好是因为拥有这些性质，它才会变得笨重、昂贵而烦琐。一旦货币商品变成了铸币，烦琐的称量就可以被简单的计数所取代了：

> 铸币是这样的金块，它以一定的花纹和形状表示它含有镑、先令等货币计算名称所指的金的重量。正如造币局价格由国家规定一样，铸造的技术事务也由国家担任。作为铸币的货币……有地方性和政治性，讲不同的国语，穿不同的民族制服。因此，作为铸币的货币，它的流通领域是由共同体的界限所限定的国内的商品流通，这是不同于商品世界的普遍流通的。[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07 页）

然而有了铸币之后，把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就出现了。铸造品质的降低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而铸币的生产必须受到谨慎的控制。立法变得迫切了，国家也通常会承担铸造的责任（尽管受政府调节的“自由铸造”——即由私人生产铸币——也是可能的）。国家必然会起到经济主体的作用。[①] 铸币又可以被代币或纸面符号所取代。可兑换的纸币把票面价值与指定数量的基本货币商品联系起来了。这些纸币有一个优势：它们的数量可以更加轻易地适应对货币的需要的任何增加——增加的原因是商品交换的体量的扩大等等；这些纸币的生产也远远没有那么昂贵，因而有助于削减流通成本。然而，这样的经济体若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允许纸币的总量超出纸币可以兑换的货币商品的数量。在正常状况下，这个差别不会带来问题；但在危机期间，可兑换性经常必须被中止。这凸显了一切纸币的一个独特劣势。钞票一旦被投入流通，就再也无法被取出来了（至少不能以黄金铸币退出流通的方式被取出来：后者可以被熔化，并用于其他目的），所以下调纸币的供给，以便顺应商品流通的体量萎缩就变得不可能了。通货膨胀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纯粹的纸币——“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不可兑换的纸币”[5]（《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27页）——完全割断了货币与任何货币商品的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于是，货币的供给从生产所受的任何物理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了，而且供给的灵活性和流通成本的节省这两个优势可以更好地确立了。但是国家权力也由此变得远远更为重要了，因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后盾必

① 德布伦霍夫（1978）详细讨论了货币与国家的关系。维拉尔（Vilar）（1976）给出了一份关于多种货币形式的有趣的历史研究。

须取代由货币商品提供的后盾，否则纯粹纸币的使用者就无法对纸币的稳定性和价值抱有信心。

从纯粹的流通手段的立场来看，货币同样完全可以采取不论多少种形式。唯一要紧的是对交换进行润滑的能力。因此，如何选择货币所采取的形式就取决于各种形式在克服交易成本时的相对效率。实际上，交易成本可以被完全消除，并被会计成本取代，因为交易可以记录在账簿上，并在每天、每月、每年或诸如此类的时期结束时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结算。从这个立场来看，除了“计算货币”之外，货币都可以被消除。

但是货币不只是单纯的流通手段。即使撇开它作为价值
245 尺度的职能——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周期性地企图丢弃这项职能，以为它无关紧要，但这种做法并不成功[①]——货币仍然拥有一些独特的“先验”属性。毕竟，货币代表了货真价实的交换价值，从而站在了其他一切商品及其使用价值的对立面。货币相对于交换获得了独立的、外在的权力，因为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正是社会权力的化身。进一步讲，这种社会权力可以由私人占有和使用。我们现在必须研究这一点的意义。

货币让出售与购买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分离开来。易货贸

① 尼汉斯（Niehans）（1978，第 140 页）评论了一种广泛的倾向：把商品货币斥为“人类社会不够开明的阶段”所留下的“野蛮的遗迹”；他的思路如下：“在当前的时代，商品货币是唯一一类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中经受住了检验的货币。除了战争、革命和金融危机这些简短的插曲之外，西方的经济体从历史的黎明一直到当前的时代几乎都处于商品货币的体系中。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从 1973 年开始才宣称，与商品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是货币体系的正常特征。我们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知道西方世界是否最终在商品货币之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正如人们经常宣告的那样，或者说当前的时期是否会仅仅成为另一段插曲。”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则表明，我们的确“仅仅”处于“另一段插曲”中，它多半会以金融危机、战争乃至可能的革命为特征。

易的局限可以得到克服，因为一个经济主体可以在一个地方出售商品、取得货币，并在另一个地方、在后来的时刻用这些货币来购买价值相等的商品。于是，交换就从萨伊法则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了（见前面第79—83页）。但这种情况若要发生，就要求货币的社会权力就时间和空间而言都保持不变。货币必须能够发挥受信任的价值储存的职能；但用来储存价值的货币越多——这些货币无法被用来使价值得到流通——流通的货币成本就会变得越高。

赶来解围的是把货币作为“计算货币”的用法。因此，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位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6]（《资本论》第1卷，第127页）。信用货币起源于私人约定的汇票和信用券；它们一旦开始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就取得了社会货币的形式。这些货币具有双重优势：它们可以即刻适应商品生产的体量变动（生产者可以简单地增加或减少他们相互之间流通的汇票），还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所需要的货币商品的数量可以减少为活跃的流通所需要的数量加上账目结算所需要的数量和一笔以防万一的储备基金。

信用货币在另一些方面却有些独特。一张私人约定的汇票无论有可能流通到多么遥远的地方，都始终必须回到它的发源地才能被赎回。其他货币形式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流通的。一块黄金可以不断转手，并一直保持流通，根本不用回到它的起点。这些货币形式从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尽管投入了私人的用途。相反，信用货币是由私人创造的货币，却可以在投入流通时服务于社会目的。然而，当原本的债务还清之后，信用货币就从流通中消失了。信用货币在私人的活动中不断地被创造、被毁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一方面，它描述了私人和机构（比如银行）按照商品交易的体量来即时调整货

246

币量的能力——信用货币可以任意扩张和收缩（与黄金不同）。另一方面，发行信用的人必须服从某种纪律，信用货币的品质也必须得到保证，否则信用货币就无法安全地流通。

一开始，约束信用货币的是特殊的个人所参与的一组特殊的商品交易。倘若商品交易没有按照预想的价格来完成，或者一些个人破产了，那么信用货币的“毁灭”就会走上一条更加不祥的道路。信用货币会直接“丧失价值”或“贬值”，因为债务得不到偿还。信用货币无法转变为其他货币形式（除非在大打折扣之后，有人或许愿意冒险买进一张可能毫无价值的汇票）。信用货币的“正常”毁灭在这里表达为一种反常，而这种反常是商业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特征。然而，信用货币的“价值丧失”是一个可能具有社会后果的私人问题。国家发行的纸币的“价值丧失”（通过改变可兑换性或简单地让印钞机加班工作）则在极大程度上是一桩社会事务（它特有的后果却具有私人的、再分配的性质）。我们将在第 10 章讨论货币的“价值丧失”和“毁灭”。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无论使用哪种信用货币，在形式上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过程。

货币机构需要使不同的信用货币相互联系，并把它们与“实际”货币——比如黄金或以国家为后盾的法定货币——联系起来。这些机构起源于货币经营者，他们会对货币流通的纯粹技术性的方面加以管理，以便达到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并从中拿走一定的份额。当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时，货币经营者也许会对交易进行记录，还会聚集在一起，创办清算银行的原型（《资本论》第 1 卷，第 137 页）。然后，他们也许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货币，并为无数汇票——它们发源于个别的商品生产者，并在他们之间流通——给出一个集中的贴现函数。货币经营者在某个时刻也许会发现，用自己的汇票来代替无数

个别生产者的汇票是更加方便、更有效率、更有利润的。于是，货币经营者就成了银行家。银行券的发行只是把这个问题形式化了，因为这些银行券不外是向银行签发的汇票。随着银行的出现，货币体系中等级安排的第一级就到位了：银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取代了由个别生产者发行的汇票。

银行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它为汇票提供了一家中央清算所，从而大大节省了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第二，当银行发行自己的银行券，或者允许人们向它们签发支票时，它们就用自己的保证代替了无数个别资本家的保证。在交换体系相对简单时，个人的知识和个别资本家之间的信任也许可以保证所产生的债务的品质，但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这就无法构成信用体系的合适基础了。信用曾经只是个人的信任问题和个别资本家的信誉问题，银行却试图把它制度化。大多数发源于个别资本家的汇票都将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银行货币。但是银行若要保持自己货币的品质，就必须保留拒绝汇票的权利，因为一些汇票在它看来是有风险的或无价值的。银行对个别资本家的信誉进行了监督，并充当了后者的中介。

但是银行也是相互竞争的私人机构。它们作为商品交换的推动者也必须产生相互关系。它们必须找到一些在彼此之间结算账目的手段。每家银行都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保持一定的黄金存量。在正常状况下，黄金储备必须只是流通中的商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只要可以结算银行之间的账目就足够了。然而当市场上的商品价值难以确定时，对充足的货币商品储备的需要就变得更加紧迫了——否则银行就有可能破产。另一方面，到处运送并储存黄金是不方便、有风险、无效率的。银行必须找出某种别的办法来使不同的银行货币可以自由地相互兑换。

某种中央银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为银行提供了既可以相互结算账目，又不用到处运送黄金的手段。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央银行必须拥有高品质货币，以便保证银行之间的交易是安全的。只有当中央银行对个别银行的货币品质或健康程度表示满意时，个别银行的货币才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中央银行的货币。中央银行构成了货币机构等级制的第二级。作为站在高地上的指挥官，中央银行可以设法保证私人银行货币的信用度和品质。

248 对中央银行的需要可以由多种制度安排来满足。一家非常强大的银行或银行集团可以承担这个角色。例如，在1907年的崩溃之前，J. P. 摩根[7]与纽约的另一些银行一起在美国执行了这样一项职能。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遇到了双重困难。由于银行会相互竞争，所以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这会损害银行理应维护的货币品质。一个私人群体是否能够起到保证人的作用？这取决于它与体系中的其他银行相比有怎样的权力。只有最强大的一方才能保证本国货币的品质，因为这是一件只有他们才能负担的奢侈品。美国在1907年发生的金融恐慌之所以决非偶然地走上了一条无法控制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J. P. 摩根的权力当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为中西部和西部的竞争者正在兴起。另一个困难是：倘若某家银行可以发挥这样一项职能，它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就始终很容易在它的私人董事那里遭到武断的、任意的使用。①

因此，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是与其他银行分隔开来的，而且被授予了某些垄断的特权。由于竞争的必要性被免除了，所以

① 在1907—1913年间的美国，对货币品质的私人保证崩溃了，随后形成了以国家为后盾的联邦储备体系；科尔科（Kolko）（1977）对此给出了一种非常吸引人的解释。

中央银行可以投身于它仅有的任务：捍卫本国货币的品质。为了发挥这项职能，中央银行就要成为国家的黄金储备的保管者。这使它获得了一种权力：拒绝把“劣质的”银行货币兑换成中央银行的货币，以此来驱逐前者，而后者是唯一一种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黄金的货币。

作为本国黄金存量的保管者，中央银行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领土上才能保证货币的品质。于是，中央银行承担了在国家之间平衡收支的任务。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可以兑换成黄金的时代，后者一直在世界性的交换中发挥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但一旦一些国家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抛弃了这种可兑换性，在国际范围内使金本位保持完好就会变得愈发困难（特别是当资本成为跨国资本时）。如果在国家之间平衡账目的唯一办法是借助不同国家的通货，这些通货就必须可以自由地按照某个确定的汇率来相互兑换。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市场上保证各国货币的品质。某些极其强大的国家——比如 19 世纪的英国和 1945 年到 1971 年间的美国——可以起到“世界的银行家”的作用。当世界的大多数黄金储备都被锁在诺克斯堡（Fort Knox），美国就国际收支平衡和世界贸易而言也具有支配地位时，由 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美元本位就可以占据主导地位，美元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一般等价物。但由于国际收 249
支平衡的恶化以及西德和日本所带来的愈发激烈的竞争，美国在国际上遭受了 J. P. 摩根在与中西部和西部的银行竞争时所遭受的处境。在随后的 1971 年，美元的价值丧失标志着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崩溃；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人们设立了一系列填补空白的权宜之计，还试图建立某种超国家的优质纸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纸黄金”）。但正如德布伦霍夫（1976，第 48—53 页）所指出的

那样，这些尝试都立足于一个谬误的主张：仿佛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可以发挥最终的价值尺度职能。除了用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来约束各国的货币之外，人们尚未找出任何办法来保证它们的品质。

这段历史还提醒我们，货币政策只要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运行来设计并执行的，就会遇到两难。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和美国）允许自己的货币在国际上被用作结算账目的储备货币，从而无休止地受困于一种政策上的两难：要么捍卫本国资本的利益，要么捍卫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的利益。当一个特殊的经济体支配了世界共同体的生产和贸易时，这些两难就会相对减弱；但在国际环境变得更有竞争性时，它们又会变得更加尖锐。但若没有某种稳定的储备货币，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就根本无法运行——这就是国际货币体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以来面临的困境。

虽然我们对整个结构进行了严重的过度简化，当然也抽离了历史形势的复杂性，但是货币机构的特性——层叠的等级制——可以相当清楚地被确立为信用货币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样一个等级秩序的必要性可以追溯到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根本矛盾。尽管信用货币仿佛极佳地适应于它们的职能——即几乎没有摩擦的流通手段——但它们是否有能力代表“现实的”商品价值却会受到持续的怀疑。在这个等级制的任何一个特定层次上，关于某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的观念也许都显得多余，但是确保货币品质的问题始终存在——假如不能保证一定面额的信用货币确实代表了实际的商品价值，货币的品质还算什么？

在这个等级制中，级别较高的机构保证了级别较低的货币的品质——银行之于个别资本家是这样，中央银行之于私人银行是这样，事实上的“世界的银行家”之于各国的中央银行也

是这样。但在这个等级制的顶端，到底是什么确保了货币的品质？黄金？“纸黄金”？“黑色黄金”（石油）？美元？在这个层次上，把货币作为一种必要的价值尺度的观念并不愿意死去。马克思评论说：“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8]（《资本论》第1卷，第142页）货币机构的等级秩序在本地和本国的层次上克服了等价形式与相对价值形式之间的矛盾，也克服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矛盾，到头来却在国际舞台上让对抗处于未曾解决的状态。

我们还必须就货币机构的这个等级结构提出另一个观点。乍一看，位于这个等级制顶端的人——特别是中央银行的官员——仿佛牢固地控制了货币流通，从而有资格强有力地影响商品生产和交换。马克思明确拒斥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央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9]（《大纲》，第124页）中央银行在一国之内的垄断地位并没有使它获得有效的控制权，不论货币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10]的权力多么令人生畏。同样道理，只有在使用自己私人汇票的个别贴现业者无法前进时，私人银行家才能行使控制权。

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货币管理局所能做的至多是拒绝给信用货币贴现——后者在等级制中存在于较低的级别——以此来实行“金融镇压”（financial repression）。[①] 国际货币基

① “金融镇压”这个术语是麦金农（McKinnon）（1973，第7章）所使用的，我在这里使用它不是因为我同意麦金农对它的技术性界定，而是因为它形象地描述了我在这里研究的现象。

金组织可以动手规训民族国家，中央银行可以规训银行，银行则可以规训商品生产者。然而，这样来行使的权力是否定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因此马克思立即承认，货币供给的不足、不适当的金融结构或——在当前的语境下——从紧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对商品生产的扩大造成障碍，并在某些情况下加深危机——英国在颁布了“错误的”1844 年银行法之后，在 1847—1848 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11]（《资本论》第 3 卷，第 516 页）。但在他看来，根本没有哪种货币权力可以凭自身的力量魔术般地带来商品生产的扩大。对体系的实际推动是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来进行的资本积累。因此，马克思强烈反对货币主义学说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以为货币的供给具有创造性的效果。①

251 以上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这番分析表明，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之间的核心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在货币机构的等级制中转移到了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货币的诸多衍生职能——例如价值储存和支付手段——还引发了进一步的困惑。但若我们要解释货币所采取的不同形式——货币商品、铸币、可兑换的和不可兑换的纸币、各种信用货币等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作为一种驱动的产物，这种驱动要求使货币臻于完善，使它作为交换的“润滑剂”变得没有摩擦、没有成本，又可以即刻调整，同时还要维护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不确定性和“无规则性”会促使不同的经济主体在特殊的局势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对不同种类的货币产生需求。例如在

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货币主义的批判，德布伦霍夫（1971）和哈里斯（1979）都给出了很好的叙述。

危机期间，经济主体一般会寻求安全的货币形式（比如黄金），但当商品生产十分兴旺、交换关系不断扩大时，对信用货币的需求就必定会上升。

有了这些一般的见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而考察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会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被投入使用了。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基本矛盾将在资本主义之下变得尤为显著，但是各种职能和各种形式的货币也将获得一些相当引人注目的、往往又极其巧妙的用途。

2. 货币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所构造的货币理论是从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研究出发的，却丝毫没有涉及资本流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方针，是因为货币经济是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资本论》第2卷，第116页）。他认为，我们倘若企图从对资本流通的研究中推导出对货币的理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但出于相同的原因，我们倘若企图仅仅从某种一般的货币理论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之下货币流通和金融运作的复杂世界，就同样太大意了（《资本论》第2卷，第30页）。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混淆货币与资本，还必须认识到“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12]（《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我们现在必须更加仔细地考察这种“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在按照非资本主义思路来组织的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我们发现“货币使商品流通”，而且“商品……使货币流通”——“因此，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13]（《大纲》，第186页）。从根本上讲，货币流通的顺序与商品

252

流通的顺序是相反的。但当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时（货币的流动由此在空间、时间和数量上都背离了商品交换）、当货币出于无论什么原因被贮藏起来或从贮藏中被取出来时，复杂的情况就出现了。在把货币的生产者整合到这样一个货币体系当中时，也很容易扰乱它原本十分简单的逻辑。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资本主义流通形式，问题似乎就非常不同了；这种流通形式的最简单的表达是

$$M - C \begin{pmatrix} LP \\ MP \end{pmatrix} \ldots P \ldots C' - M'$$

不过马克思坚持认为，货币在发挥资本的职能时，仍然“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14]，即作为流通手段［它促进了

$$M - C \begin{pmatrix} LP \\ MP \end{pmatrix}$$ 和 $C' - M'$ 这两种交换］

和价值尺度（否则如何能确证 M–M' 是一种增加？）。因此，货币的职能“只是由于它们和［资本流通］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15]（《资本论》第 2 卷，第 77、81 页）。

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与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单纯流通”之间的“可以感觉到的区别”首先是资本使用货币的新方式。“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16]（《资本论》第 1 卷，第 2 篇）还取决于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只有当劳动力——它能够生产出来的价值比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更多——可以作为商品来使用时，货币才能作为资本来流通：

> 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已经存在了……不

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17]（《资本论》第 2 卷，第 29—30 页）

于是，雇佣劳动就在原本也许截然不同的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之间形成了一座桥梁。一方面，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交易；它之所以显得特殊，是由于它是生产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买方与卖方的简单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18]（《资本论》第 2 卷，第 117 页）。社会生产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的内部与外部都得到了表达。正是通过由雇佣劳动提供的桥梁，资本才可以在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中持续流动（危机的干扰当然不算在内）。倘若不存在雇佣劳动，货币就无法转变为资本。

即使如此，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也不是一桩没有痛苦的事务。我不能从口袋里拿出 10 美元或 10 英镑，并即刻把它转变为资本。我必须在每条生产线上预付一定数额的货币资本，以便购买建筑物、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因为剩余价值的生产需要它们才能启动。我必须贮藏足够多的货币才能开始做生意（贮藏的数量随着生产线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铁路与制衣工业中的血汗工厂）。但是贮藏会使货币退出流通，而这种现象如果大规模地发生，就有可能干扰货币和商品的流通。信用体系成了一种必要。到那时，我只要将口袋里的 10 美元存进银行、换取利息——它立刻就会作为资本被借出去——就的确可以将它转变成资本了。

资本流通给货币体系加上了额外的责任和负担；为了应对它们，就必须把信用体系组织成金融运作的基础。我们将在后面第 6 节详细考察信用体系的职能，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有效地

勾勒出资本对它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价值的保存和扩大需要连续性和平滑的协调，生产的物质基础却是以不连续和不协调为特征的。部类之间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交换——倘若它们具有不同的工作时间、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必须以某种方式变得平滑，资本的货币循环、商品循环与生产循环之间的协调也必须建立起来。由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都需要周期性的大额支出——这些支出原本只能来自贮藏——所以只有当货币资本可以从一个生产领域快速迁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时，利润率才能平均化。

出于这些原因和另一些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产儿——信用体系——诞生了，生息资本也逐渐起到了对资本流通来说非常特殊的作用。可是这个细致复杂的信用和金融的世界必须树立在由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所界定的货币基础上。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货币永远只能发挥货币的职能，尽管它可以作为资本投入流通，或者作为借贷资本以供使用。只要这个货币基础还充斥着矛盾，金融的世界就树立在摇晃的
254 基础上。资本主义金融如果挣脱了货币体系的枷锁，就会把矛盾内化到自身当中，并进入一种与自身的货币基础相对抗的姿态。马克思大量谈论了这种对抗，我们也将在第 10 章尝试理解这种对抗为什么从货币和金融的方面给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施加了一种独特的转折。

我们可以有效地勾勒这种对抗的基本轮廓，即使这只是为了指出分析的行进方向。我们可以大致按照如下思路来展开论述。

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资本家还可以占有内在于货币的社会权力，并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来运用，由此在生产中把
402 剩余价值生产出来。总的资本流通的逻辑迫使他们创造新的

金融工具和精巧的信用体系，而这种信用体系会把货币和生息资本推向一种对资本积累来说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竞争的强制力会迫使作为个别的经济主体的资本家滥用这个体系，从而损害货币的社会权力本身：通货的价值或许会降低，慢性的通货膨胀会发生，货币危机会被制造出来，如此等等。结果，由于他们通过信用体系这个代理人来把货币用作流通手段，货币的其他使用价值——即价值尺度和价值储存——就遭到了损害。因此，必须采取步骤来维护货币的品质。从紧的、紧缩的货币控制变得必要了。这些控制要么出现在危机的进程中，因为资本家迫不及待地要持有基本的货币商品（例如黄金），把它作为价值的唯一合法代表；要么这些控制是作为一项有意识的政策的一部分，由强有力的货币管理局来实行的，而货币管理局是作为国家的臂膀来运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中的政治主张对于理解资本积累的动态就变得十分关键了。[①] 然而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若要抑制金融领域中的无节制倾向，最终都要回到永远真实的货币基础。

接下来，我们将试图一步步阐明货币现象与金融现象的关系。我们的起点是利息和生息资本，它们是运行在信用体系内部的根本范畴。然后，我们将进而联系到资本流通来简单地描述信用体系的职能和工具。在我们展开这两方面的论述时，它们与货币基础的冲突仿佛都没有起到任何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将有资格在下一章解答一些更为宽泛、更为复杂的问题，它们牵涉到危机形成过程的货币方面和金融方面。

① 见德布伦霍夫（1976）对国家、金融与积累的关系的讨论。

3. 利息

255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19]（《资本论》第3卷，第593页）

我们可以很快确定让货币借贷和高利贷得以繁荣所需的条件。通过交换关系的扩大，货币“把自身确立为一种外在于生产者、独立于生产者的权力”[20]。它由此取得了一种社会权力，可以由私人占有和使用。高利贷的出现就是由于私人以货币借贷的形式使用了这种社会权力。它损害了“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21]以及这些社会特有的政治组织形式。它有助于打破封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也有助于把作为生产者的小农、工匠和“小市民”同他们对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离开来。虽然高利贷具有“革命的作用”[22]，但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否定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创造性的。“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23]（《资本论》第3卷，第36章）对高利贷的禁止和法律制裁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出现的。

高利贷者既然占有了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就会妨碍资本流通。这道障碍必须被打破：

产业资本在它的产生过程中还必须使［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生息资本就会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就会仅仅成为产业资本本身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式。但是，作为独立形式的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必须先被摧毁并从属于产业资本。对生息资本使用行政权力（国家），强行降低利率，使生息资本再也不能把条件强加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信用制度……信用制度是它自己的创造。[2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68—4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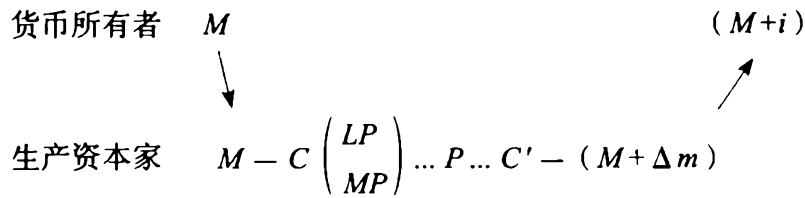
与另一些主要的分配范畴——如租金和商人资本——一样，利息也被看作一种古代的占有形式，并被资本主义按照它自身的具体要求所驯服了。因此，“高利贷”和“货币资本的利息”在马克思的词典中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这个差别 256
不能归因于货币形式本身，因为货币只能发挥货币的职能：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25]（《资本论》第3卷，第600页）

马克思所想的条件恰好是让货币得以转化为资本所需的条件。简言之，货币必须能够掌控他人的劳动——雇佣劳动必须已经存在、已经在原始积累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放高利贷的行为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货币的社会权力就可以被它的所有者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样就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踏出了第一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现在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一

方面，货币的社会权力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这对于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的启动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里预设了一种对货币财富合适的分配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决定生产的分配”[26]。另一方面，货币权力在资本家手中逐渐的积聚和集中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导致的。货币权力的积聚在资本主义之下不仅是一个必要的分配条件，而且会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论》第3卷，第355页）。

这一切使货币在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面前处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货币尽管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而存在的，却外在于、独立于任何实际的生产过程。由此，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与作为资本的使用者的资本家之间就出现了区分——后者要用这些货币来从事剩余价值的生产。借出与借入的活动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建立了一种阶级关系。马克思以如下方式讲解了这种关系。货币所有者指望通过借出货币、收取利息来增加自己的资本，而这意味着一种流通形式：$M-(M+i)$。让我们假定这些货币被借给了一名从事生产的资本家，而且他本人没有货币资源。我们由此可以得出：



但是货币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一般是作为独立的司法个体而相互对峙的。贷方倘若不能得到某种类型的报酬，显然就不会出借自己的货币。生产者倘若不能赚到什么东西，也就不会借入货币。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分割了剩余价值，前者收取的是利息，后者收取的则是企业利

润。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关注的是角色，而不是这些角色会以哪些特殊的方式被人格化，而且由于资本的使用者总是可以选择出借他们所拥有的不论多少货币并收取利息，而不是进行再投资，所以马克思总结说："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27]（《资本论》第3卷，第374—378页）由此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货币资本是在任何实际的生产过程之外的财产，对这些货币资本的占有就"只有"把利息作为"果实"；企业利润则是在生产过程之内运用的资本所"独有的果实"[28]。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应该以如下方式来解释：

$$M-C\left(\begin{matrix}LP\\MP\end{matrix}\right)\ldots P\ldots C'-(M+\Delta m)\begin{cases}i\text{（利息）}\\p\text{（企业利润）}\end{cases}$$

因此，生息资本可以被界定为资本所有者为了按照现行利率得到回报而出借的任何货币或货币的等价物。

在这里的论述中引入一些评论和告诫可能是有用的。首先，货币所有者可以将货币借给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之外的经济主体——商人、土地所有者、政府、资产阶级的诸多派系乃至劳动者。货币也可以由于诸多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目的而被借出去。由于货币所有者主要关注的通过利息来增加自己的货币，所以只要回报是有保障的，他们多半就不会关心货币被借给了谁、被用于何种目的。这制造了一些困难，而马克思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出于足够可信的理由把它们抛到了一边。既然一切利息支付归根到底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由剩余价值来提供，考察的关键就是生息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分析加以限定尽管

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当我们试图揭露决定利率的力量时，这种限定也会制造同样多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思路有一个优点：它使我们专注于两种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固有的阶级关系。“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29]（《资本论》第3卷，第382页）马克思拒斥了一种资产阶级的看法：仿佛企业利润实际上是作为工人的企业家用管理技能换来的回报。
258 他并不否认协调和管理是生产活动，却坚持认为工资在这里的决定过程最终会与一般工资达成一致，原因不仅在于“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而且在于“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30]（《资本论》第3卷，第389页）。尽管对所谓“管理者阶级”的工资的决定过程来说，这是一种相当简化的看法，但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企业利润作为一种回报超出了为监督支付的工资，不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企图以何种可能的方式把这种利润假扮为工资的一种形式。在我们随后将遇到的一些情况中——特别是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那里——这种假扮将变得尤为有效（见后面第276—278页）。

但既然利润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理解这种关系的本质和后果。作为资本的货币在生产之外的存在以及借出与借入的活动都意味着货币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31]。这种使用价值存在于它“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能力”当中、存在于它“在平均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32]的能力当中。简言之，作为资本的货币成了一种商品，尽管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商品，具有“独特的让渡方式”[33]（《资本论》第3卷，第338—352页）。货

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关系的要害就在于这些“独特性”——它们是在资本本身获得了商品的性质时才出现的。

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作为贷方的货币资本家与作为借方的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货币资本家与货币的使用价值分开了，没有收取任何等价的回报；这种现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商品交易。货币资本家所期望的是在一段指定的时期结束时收回初始的货币资本加上利息。首先，一般的资本流通由此获得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维度，而这为我们讨论周转时间、流通时间、生产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开辟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些特征上来。其次，这使得货币仿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增长”，甚至使得时间本身仿佛就是货币。马克思高度专注于揭露这种观点中的拜物教：他非常具体地证明了利息之所以会在给定的时期内加到货币资本上面，是由于生产资本家在这个时期内设法生产了足够多的剩余价值，从而抵偿了利息支付（《资本论》第 3 卷，第 348 页）。货币资本家只要可以规定利率和偿还时间，就可以直接控制剩余价值生产的强度。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货币资本家对产业资本家的这种潜在强制力（见后面第 301—305 页）。

作为商品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但它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怎样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种独特性。 259
货币是价值的代表，绝不可能比它所代表的价值更有价值。可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它可以被用来生产更多的价值，后者具有剩余价值的形式。我们由此得出了一个在马克思看来完全不合理的表达：价值的价值就是它生产出了更多的价值！由于“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34]（《资本论》第 3 卷，第 354 页）。作为商品的货币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没

有“价值”或“自然价格”。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原因推出这一点：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并不涉及物质生产过程，从而不涉及劳动在商品中的体现。

这番论证略显拗口，但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自然”利率理论的拒斥——这个学说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广为流传。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同样会拒斥任何关于货币资本的“价格”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理由是资本在这些理论中被物神化（fetishizes）了，成了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被赋予了自行扩大的神秘力量（《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3—540页）。

那么，利率是如何决定的？[①] 马克思求助于需求和供给，却没有做任何别的解释。他在其他所有情况下都拒斥了这样的解释，理由是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在达到均衡时就不能用来解释任何东西了。利率对于这条规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它是由市场的力量——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在竞争的状况下确定的。进一步讲，假如没有“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利率就会成为“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35]——“这种决定本身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36]（《资本论》第3卷，第356、354页）。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些评论。马克思要么是说，利率的决定过程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任意的，倘若不被当作一种经验性的准则，就无法接受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要么我们可以将他的说法解释为利率不是直接由价值规律调节的。我

① 在马克思对利率现象所做的分析的范围内，哈里斯（1976）对规定利率的力量做了有用的介绍。

偏向于第二种解释，而且有两个依据。第一，采取第一种立场对马克思来说是非常不典型的，而且与他在决定利率的力量上面花费的苦心完全不一致。第二，我们发现马克思在三番五次给出的说法中都提出，利息和企业利润是由“特殊的规律”所决定的。[37]（《资本论》第3卷，第375页）。他还指出，虽然利率的下限在原则上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但“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38]（第358页）。每当马克思提到起反作用的情况时，我们通常都会在不远处找到某种均衡的概念。这里的均衡“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马克思随后坚定地指出了他的行进方向：“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39]（第419页）

我们可以总结说，并没有一种由作为商品的货币的价值来调节的“自然利率”，尽管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是那样认为的。货币的价值和价格完全是“不合理的”表达。利率是通过一种市场过程来调节的，其中供给和需求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现在必须确定，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具有怎样的结构。不幸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对这个过程的连贯分析。我们将不得不填补一些空白。但我们倘若没有首先理解货币资本可以具有的多种用途和资本主义要求它发挥的职能，显然就无法理解对作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倘若没有全面地理解金融运作的制度框架和中介——金融运作由此汇集并合并了作为可贷资本的货币——就无法理解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供给。简言之，我们需要解剖信用体系的职能和工具——这种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产物，它让资本得以驯服高利贷，并把后者转变成了与它自己具有内在矛盾的目的相适应的生

息资本的形式。

我们将在后面两节对信用体系展开详细的分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体系最初仿佛是没有矛盾的，仿佛就资本流通而言运行得十分完美。这将为下一章对矛盾的考察打下基础。

4. 生息资本的流通和信用体系的职能

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的流通预示了货币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他们控制了货币的社会权力，而且是靠利息支付来维持生计的。这样一个阶级的实际存在不能仅仅归因于一种个人的欲望——即不想再花工夫去从事生产——尽管资本家在有机会的时候往往恰好倾向于那样做。任何货币资本家阶级的范围和权力以及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事实上都被束缚在相
261 当严格的界限之内。“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40]（《资本论》第3卷，第377—378页）

实际上，由于货币资本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只会吸收剩余价值，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感到疑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容忍这些似乎是寄生虫的人？理由有两条。第一，资本流通为货币赋予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作用，即一般等价物，而这种作用无可避免地为纯粹的货币资本家阶级提供了维持生计的潜在来源。第二，生息资本的流通发挥了某些至关重要的职能，因而资本积累要求货币资本家获得一种外在于、独立于实际生产过程的权力，并主动宣称自己就是这种权力。我们接下来将解释这是如何做到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最终会出现的总体图景是：平衡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在货币

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使权力和职能的配置达到一种特定的平衡——货币资本家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之外经营，产业资本家则在这种过程之内经营。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确定这个平衡点位于何处，并解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如何无可避免地破坏这种平衡，到头来又通过危机使它得到恢复。

我们走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联系到资本积累来讨论生息资本的职能。这将帮助我们联系到产业资本来确定对生息资本的需要和对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货币资本家的需要。但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必须始终记住，货币永远只能发挥货币的职能。生息资本的流通永远会受到这样一条规则的约束。这意味着信用体系的建立虽然使货币的职能和形式变得细致复杂了，但这些职能和形式是存在于简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当中的。在资本主义之下，这些职能和形式以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既不可能、又不可取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普遍化、发展”[41]（《资本论》第3卷，第400页）。然而，这种“发展”的进程会导致“现实的运动……变得神秘莫测”，以至于基本问题几乎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42]（《资本论》第2卷，第29—30页）。所以我们有双重任务：既要描述信用体系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又要严格地观察信用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关系。

我在六个大标题下面考察信用体系的职能和生息资本的流通，但并没有考虑这些职能如何可以融合在一起或表达了怎样的矛盾。

（1）货币发动为资本

货币倘若没有作为资本来流通，就可以被当作潜在的或可 262
能的货币资本。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社会中的许多货币要么作为流通手段得到了活跃的运用，要么被一些经济

主体用作价值储存，因为他们出于无论什么目的需要维持一笔储备基金：

> 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43]（《资本论》第2卷，第493页）

货币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被信用体系发动为资本。第一，银行可以将货币交易的流量转变为借贷资本。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会用自己的信用货币（银行汇票或支票）来代替现金，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内化到它们的经营当中，并依靠补偿性存款（compensating deposits）和提款来提供永久的货币余额，而这些余额就可以转变为借贷资本。因此，从现金支付到支票支付的变化（例如用支票来支付工资和薪水）可以被看作从普通的货币交易中产生借贷资本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第二，金融机构聚集了“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资本”，并把这些货币转变成了资本。由此，虽然“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44]（《资本论》第3卷，第403页）。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可以飞速前进。进行储蓄的个别资本家可以向进行再投资的资本家放贷并收取利息；这也降低了贮藏的

水平，因为资本家可以聚敛信用，同时使自己的货币储备作为生息资本保持活跃。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中的所有经济主体，只要它们出于无论什么原因需要一笔储备基金。一切阶级的储蓄都可以被发动为货币资本。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资本家、食利者、地主、政府、工人、管理者等等都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变成了储蓄者。一切阶级的储备基金不分轩轾地被归并到了一起，变成了“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数额］”[45]（《资本论》第3卷，第368页）。这带来了一些概念上的问题，同时也使潜在的混乱和矛盾呼之欲出了。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工人的立场。他们之所以会储蓄，一般是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满足老年的需要、支付非常规的花费（疾病、妊娠、安葬等等）；他们也有可能在年景较好、工资高于价值时进行储蓄，以便应付年景较差、工资低于价值的“下雨天”。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应当包含工人一定水平的储蓄。但在这些储蓄被发动为资本时，工人同样可以收取利息。这仿佛把工人变成了货币资本家，从而触犯了我们先前说明的价值规律，因为工人现在有资格得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了（但见后面第274页）。进一步讲，工人由此就把一大笔赌注押在了对体系的维护上面——剥削他们的正是这个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毁灭会导致他们的储蓄毁灭。另一方面，由于工人的储蓄成了货币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工人的组织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权力——为了控制工会退休基金、保险基金等等所发动的争斗就随之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被引入了阶级斗争。

不论这一点可能有怎样的社会意义，货币资本的供给都明显受到了两种影响：其一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主导地位的分配安排，其二是不同的经济主体为了有效地运行而必须维持的

多种“价值储存”。经济主体既是储蓄者，又是赚取工资的人、地主、产业家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的行为所受到的压力在前一种情况下与在后一种情况下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因而信用体系内部的实际关系就变得非常难以分辨了。

（2）流通成本和流通时间的减少

马克思认为：“一项主要的流通费用，就是货币本身。”[46]（《资本论》第3卷，第435页）信用体系有助于提升货币流通的效率，并节省交易成本。因此，它有助于减少即使在简单商品生产当中也会发生的流通成本——这些成本是必要的，却又是非生产性的。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信用体系在简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自然基础”[47]。

同样，信用体系也可以有助于移除资本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自由流动所分别面临的各式各样的障碍。例如，需要极长的生产期间的商品可以分期支付。这让生产者得以在同一个生产期间内把同一个资本周转多次。货币在产业之间的流动——这些产业对生产期间的要求是极其不同的——也有可能由于信用的使用而变得严丝合缝。流通时间的差异和远距离贸易的增长同样构成了信用体系的“物质基础”[48]之一，而信用的增长又让商品得以向更加遥远的市场渗透（《资本论》第2卷，第251—252页；第3卷，第480—482页）。消费者倘若希望在较长的时期内取得一个物品（比如一
264 栋房子）的使用价值，或许也会试图采用通过“赊购”来进行定期支付的做法。在所有这些方面，信用体系都让货币得以持续流通，同时又容纳了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不连续性。所有周转时间都借助信用体系还原成了“社会必要周转时间”。

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周转时间是失去的时间；马克思经常强调说，加快资本周转的需要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49]（《大纲》，第659页；《资本论》第2卷，第282页）。周转时间的减少实际上会释放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由此就可以被用于进一步的积累。我们可以在信用体系内部分辨出一种乘数效应——使用货币资本来加速周转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货币资本。①

在无数商品的迁移、分工的扩大以及差别极度悬殊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面前，使货币流动保持连续性的需要和减少周转时间的需要有力地刺激了信用体系的创造。倘若没有信用，整个积累过程就会停滞、破灭。

> 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50]（《资本论》第3卷，第481页）

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信用让萨伊法则所预设的同一性得到了有力的支撑，远远比其他货币形式有可能给出的支撑更加有力。购买与出售可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中越来越相互分离。在这些状况下，危机的可能性也高了许多。信用不仅让货币的传统职能得以扩大、普遍化、发展：它还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产生了恰好相同的影响。

① 德布伦霍夫（1971）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评论了资产阶级理论对货币乘数与信用乘数的区分，并证明了这种区分没有多少意义。

（3）固定资本的流通和消费基金的形成

固定资本要求在往后的年份里生产继续进行……还预期占有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预期创造未来劳动的果实……决不是信用制度的发明。**它的根源在于固定资本的价值的特有实现方式，周转方式，再生产方式。**[51]（《大纲》，第731—732页）

265 这个说法中引人注目的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信用体系的兴起与对未来劳动果实的预期这三者之间隐含的关系。固定资本的流通给资本施加了巨大的负担。资本家必须贮藏足够的货币，才能不仅偿付初始的购买价格，而且在价值通过生产被收回之前度过一段时间。信用体系对于促进固定资本的流通变得至关重要了。即使假定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没有个人储蓄，在当前进行投资的资本家也可以从进行储蓄的资本家那里——后者的着眼点是未来的扩张或置换——借入货币并付出利息。由于固定资本的流通会“硬化”为一种独立形式的流通，而且由于它的规模、数量和耐用性都会随着资本积累而增加，所以资本主义必定会演化出愈发精巧的信用体系，以便处理固定资本的流通所带来的问题。

倘若没有机会获得信用，“独立类型”的投资——特别是在建成环境中——就无法完成。长期投资可以转变成年度支付；资本可以大规模地集中，从而能够资助庞大的业务，比如铁路、水坝、船坞和港口、电站等等。信用同样为个人对寿命较长的商品的消费——摩托车和住房都是很好的例子——提供了方便，政府则可以通过债务融资来提供公共品。资本还能以商品形式出借。设备、建筑物等等都可以被货币资本家购

买，并被借给支付利息的使用者。最终的结果是：生息资本可以通过诸多与固定资本相关的方式来流通。所有流通形式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利息支付是与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相联系的。

出于这个原因，信用成了流动资本的流动与固定资本的流动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联系。这两种流动在行进中是由非常不同的鼓手来指挥的，因而在协调上带来了直接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察信用体系的运行如何能把资本的剩余和人口的过剩重新引向固定资本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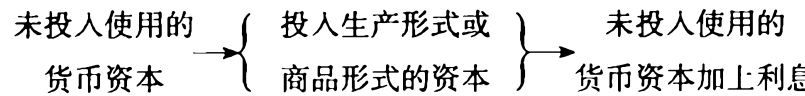
我们在第 8 章提到，当过度积累的流动资本必须调换到固定资本的流通当中时，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困难。比如说，鞋匠闲置的货币资本可以通过信用体系被抽走，并与失业的劳动者一起投入铁路等工程的建造。但这没有触及鞋匠所持有的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商品。通过创造与剩余的鞋子和闲置的生产能力相等的货币价值、并把这些货币作为铁路建设中的资本投入流通，资本的确就可以从一个领域调换到另一个领域。但这种调换的发生没有以任何现实的商品交换为后盾。信用体系是以“虚拟资本”的形式——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后盾的货币资本的流动——来运行的。这里的预期当然是铁路建设所造成的就业的扩大会增加对鞋子的需求，因而会扫除剩余库存，使闲置的生产能力重新开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预付的虚拟资本随后就以实际价值的形式得到了实现。

每当信用被预先提供出来时——它的预期是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事实上就隐含了“虚拟资本”的范畴。虚拟资本让过度积累的流动资本得以平滑地调换到固定资本的形成当中——这个过程在短期内可以完全遮盖危机的表现。但是虚拟价值的创造处于实际的商品生产和实现之前，因而永远

是一桩冒险的生意。信用体系成了资本积累的利刃，但这样的金融活动也随之带来了各种危险。信用体系内部的虚拟价值与受实际价值约束的货币之间的缺口拉大了。这为信用体系内部的危机设立了舞台。既然投机会导致如此深重的危险，为什么资本主义最初要容忍虚拟资本？我们现在必须从一般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4）虚拟资本

首先，我们可以将生息资本的流通界定为一种交集：一面是资本的货币循环，另一面是商品资本的循环和生产资本的循环：



当资本作为货币而存在时，它拥有各种优点：普遍的可交换性、使用的灵活性、机动性等等。生息资本若要履行协调的职能，就最好保持自己在特定的用途面前的灵活性，即无休止地停留在生产之外，不投入特定的产品。但在生息资本流通的进程中，贷方必须在特定的期限内牺牲自己的货币的灵活性，才能换来利息支付。在这段时间里，货币被束缚到了特定的使用价值上面（商品、生产用具等等）。问题立刻就出现了。贷方也许不能够或不愿意在太长的时间里放弃对自己的货币的控制，但是借方需要在这段时间内为自己的经营提供资金。然而，虽然贷方（储蓄者）与借方看似无穷多样的需要很难协调，但这个困难只是一个征候，它的背后是一种更为深层的两难。生息资本只要投入特定的使用价值，就会失去协调的力量，因为它失去了灵活性。障碍恰好出现在

生息资本本身的流通过程内部。若要移除这些障碍，就要创造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可能性位于货币形式本身当中，尤其与信用货币的出现有关。让我们考察一种情况：一名生产者用一件尚未出售的商品作为抵押来获取信用。他在实际的出售发生之前就取得了与这件商品等价的货币。这些货币随后可以被用来购买新鲜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而，贷方持有一张票据，它的价值是以一件尚未出售的商品为后盾的。这张票据可以被描述为虚拟价值。任何种类的商业信用都会创造这些虚拟价值。这张票据（以汇票为主）倘若开始作为信用货币来流通，就成了流通的虚拟价值。信用货币（它总是具有虚拟的、想象的成分）与直接受货币商品约束的“实际”货币之间由此就打开了一道缺口（《资本论》第3卷，第573—574页）。这些信用货币倘若作为资本被借出去，就成了虚拟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虚拟资本的创造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然而，只要我们把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与固定资本的流通过程联系起来，偶然性就转变成了必然性。对货币资本的预付现在必须从未来的劳动出发，而不是将已经存在的商品作为抵押。进一步讲，它在预付之后就必须在固定资本的整个使用期限内受到束缚，并在这段时间里被投入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唯一的抵押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而它所服从的决定过程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正如我们在第8章看到的那样。实际发生的事情是：由固定资本界定的对未来劳动的债权被信用体系转变成了货币资本对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定份额所行使的债权。货币资本的投资对象是未来的占有。因此，预付的货币资本从最开始就必须被当作虚拟资本，因为它没有以任何坚固的抵押为后盾。进一步讲，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是不确定的，

会随着竞争的状况、技术变革的步伐、剥削率以及资本积累和过度积累的总体动态而改变。不过即使面对如此的不确定性，预付的货币资本也必须至少在固定资本的使用期限内受到束缚。这为生息资本的流通带来了严峻的障碍。

为了对付这些障碍，可以设立诸多解决方案。金融中介可以挺身而出，将储蓄和风险聚集起来，以便能够短期借入、长期借出。在这样做时，它们的预期既可以是未来的储蓄，又可以是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这两者最终必定会变成一回事，因为储蓄是从收益中产生的，而收益是从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让生产者以年度为基准对他们的债务进行

再融资，或者直接销售未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股份所有权。股票的购买和出售让货币所有者得以保持灵活性和流动性，股票的价格则可以按照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发生的变动来调整。

这些解决方案——它们在信用体系内部把虚拟资本制度化了——造成了一些困惑。“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52]（《资本论》第3卷，第466页）但是所有权证书并不能让人“支配这个资本”，资本本身也不能被撤回，因为所有权证书只是对一部分未来收益的债权。所有权证书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纸质副本可以流通，现实资本则不行。“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53]但作为纸质副本，所有权证书纯粹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形式”[54]。因此，这些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可能会按照自身的规律来波动，而这些规律与“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55]（《资本论》第3卷，第466—477页）。

但这些波动的价格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某种与生产资本的状况相关的现实情况。我们在第 8 章提到，固定资本的价值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规定，因为初始的购买价格、置换成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速度全都给出了不同的价值尺度。由此产生的关于固定资本的价值的概念是一个无休止地变动的量，而竞争的状况、技术上的活力和资本积累的步伐本身都对它有影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动反映了固定资本的存量本身的价值变动。

不幸的是，所有权证书不断变动的价格还会由许多别的力量来塑造。进一步讲，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收益的唯一形式。例如，租金和税收也是收益。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56]（《资本论》第 3 卷，第 464 页）这些收益可以按照现行利率来折算，它们的所有权证书也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政府债务（这对马克思来说是终极的虚拟资本）和土地（见第 11 章）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却可以获得价格：

> 如果这是国债券，那就只是对它的买者来说是资本；它代表着买者支付的购买价格，代表着他投在国债券上的资本；它本身不是资本，而只是债权。如果这是地产抵押单，那它就只是有权获得未来地租的凭证……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实际的资本，也都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57]（《资本论》第 3 卷，第 475 页）

269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货币资本的投资对象都是占有。货币（多半）并不关心收益的最终来源，只会根据利率、投资的安

全性、自己的流动性等等来对政府债务、地产抵押、股票、商品期货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投资。“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58] 马克思认为，这使得生息资本变成了“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59]，在这里“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60]。他说，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61]。一旦债权的积累远远领先于现实的生产，信用体系的“颠倒现象”就“达到完成的地步”了[62]（《资本论》第3卷，第464—472页）。

马克思谈论这一切的首要目的是从我们身上清除一个观点：对某种未来收益的可销售的债权是一种现实的资本形式。他希望提醒我们，倘若对占有的投资（对租金、政府债务等项目的投资）看上去与对生产的投资同等重要，这个社会就是颠倒错乱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最终只有后一种投资才是要紧的——“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么，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好处呢？”[63]（《资本论》第3卷，第424页）倘若全部货币资本的投资对象都是占有，而不是实际的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时日无多了。当信用体系使“颠倒现象……达到完成的地步”时，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就会受到威胁：因而正如马克思不知疲倦地指出的那样，在危机的进程中，体系被迫要寻找一种更加坚固的货币基础，而不是由信用货币或虚拟资本提供的基础。既然信用体系造就了如此严重的颠倒错乱，为什么还要让这样一种事态得以延续？

我们在一步步探讨积累过程及其矛盾时发现，虚拟资本恰好包含在资本本身的概念中。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对于资本积累是必要的。若要克服固定资本给未来的积累制造的障

碍（见第 8 章），就必须借助一般而言的信用体系，特别是虚拟的资本形式的创造。信用体系让虚拟资本得以繁荣，由此才能支持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转化，并应付一些越来越大的压力——产生这些压力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总资本开始以固定的形式流通了。虚拟资本与固定资本本身对于积累是同等必要的。我们在后面将遇到的一些情况会使这个结论尤为突出。鉴于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如何普遍化、如何发展时所采取的总体思路，我们就不应该对生息资本的两面性感到惊讶：它的流通既是积累的救星，同时又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虚拟资本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了。

（5）利润率的平均化

利润率的平均化会遇到无数障碍。但是生息资本的自由流动（虚拟的资本形式的存在强化了这种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障碍。一般利润率当然“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64]，而这些特殊利润率在不同的公司、产业和企业之间都处于无休止的动荡中。“在不断的不平衡中”通过竞争出现的“平均化”预设了资本可以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流向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域[65]（《资本论》第 3 卷，第 366 页）。信用在这里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例如，它“使积累资本恰恰不是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是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的地方”[66]（《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482 页）。但是信用不只是一种有助于达到一个关键目的的手段：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

有同一形式——货币……［个别资本家的］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表现为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资本也……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67]（《资本论》第3卷，第368页）

简言之，信用体系表现为一种对个别资本家的差别巨大的活动加以协调的中枢神经系统。生息资本——它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共有资本——是根据利润率的差异来流动的。进一步讲，利率对资本主义来说可以发挥“气压计和温度计”[68]的职能，利润率则不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只是由于货币资本的全部供给和需求“同时发生作用”[69]，利率才会出现，才是一种已知的结果（市场每天都会把它报出来），而且是统一变化的（尽管马克思确实承认，利率在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因此，当长期利率实质性地超过了在一条给定的生产线上可以收取的企业利润时，产业家就有充分的动力把自己可能拥有的无论多少剩余都放进货币市场，而不是进行再投资。因此，利率所提供的信息和生息资本可以发挥的职能让资本的流动可以得到远远更为迅速的调整，从而让一组使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更加完善了（《资本论》第3卷，第366—369页）。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是外在于生产的，是与生产之内的“作为职能的

资本相对立的”[70]（第379页）。不幸的是，全体资本家所属的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转变成了货币资本家这一个阶级的共有资本，而后者的特殊利益并不总是与一般资本的利益相一致。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矛盾。

（6）资本集中

信用体系“起初……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71]（《资本论》第1卷，第626页）。就此而言，我们发现“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集中］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集中］的原因。”[72]（《大纲》，第122页）让我们考察一下这是如何可能的。

由信用体系带来的资本集中充分释放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力量和潜力，使这种变革成为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见第4章）。规模经济更加容易达到了，家庭商号的组织能力所带来的障碍可以被克服了，大规模的工程（特别是内嵌在建成环境中的工程）也可以开展了。有了虚拟资本的辅助，在从事这一切时就可以不用过多地打断货币资本的自由流动了——危机期间当然不算在内。但是信用体系还提供了同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所具有的破坏稳定的作用相抗衡的手段。例如，股份资本的增长就是马克思所列举的对利润率下降的倾向起反作用的情况之一。如果一些业务的资本价值构成特别高——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固定资本——它们就可以通过信用体系来组织，从而不用“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现在只要“仅仅提供利息”，就可以被生产出来[73]（《资本论》第3卷，第

240、437 页）。过度积累的流动资本可以“调换”到固定资本的一种有助于提高利润率的流通形式当中。[①] 资本的价值构成
272 同样可以通过增进垂直整合来降低，利润率则可以通过加快周转时间来提高。就算一切办法都失败了，原始积累的暴力过程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正中心继续进行，因为到处肆虐的“信用冒险家”[74] 会通过使别人的资本丧失价值来赚钱——“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75]（《资本论》第 3 卷，第 440 页）。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包含了毁灭的力量；在为了约束这些力量而发动的斗争中，信用体系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虽然由信用体系带来的资本集中的确是马克思最为强调的，但是分散的力量——新的生产线的开辟、分工的扩大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当中内在的分散——也的确可以通过信用体系集结起来。货币资本的集中可能会与生产活动在组织上的分散相伴随。金融的组织形式与产业的组织形式之间由此出现了区分；同时，为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又涌现出了特定种类的关系（见第 10 章）。因此，信用手法和金融花招的剧增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且从这个立场来看，这种剧增确实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资本积累的原因。

5. 信用体系：工具和制度

虽然我们肯定可以在难以把握的金融世界中找出许多戏法，但是信用体系并不是靠魔术来经营的。人们必须找到执行任务的手段，而手段会激发出制度，制度又需要由人组织

① 这是博卡拉（1974）关于相对价值丧失的理论的意义——前面第 7 章讨论了这个理论。

和运行。居住在金融世界中的银行家、金融家、股票经纪人等等在分工中发挥了高度专业化的职能。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自身建构成了资产阶级内部一个特别的阶级。由于信用体系的职能实际上是一种调节资本运动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这个阶级似乎占据了指挥经济的高地，并在高地上与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代表的产业资本家或商人资本家对峙。

可是货币资本家——我们将这样称呼他们——也要在矛盾中挣扎——信用体系内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没有扫除它们。例如，银行家也是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必须用他们所能掌控的一切诡计来从事交易——这些诡计时常把他们拖进金融破产的深渊。另一方面，他们理应充当社会总资本的“负责任的”代表，并完全“从公共利益出发”明智地使用他们的权力。 273
他们理应将每个人的货币都保管得“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安全”。

为了使两个不可调和的角色相互和谐，人们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尝试，而在金融的世界中出现的许多复杂性都反映了这些尝试。尽管这也许显然是事情的真相，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考察资本主义之下出现的金融工具和制度，因为它们确实在物质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后果。马克思本人主要聚焦于银行，并对股份公司做了初步的分析，还提到了——尽管通常只是顺带一提——形形色色的专业化金融机构，比如面向工人的一便士储蓄银行（penny savings banks）、保险公司等等。他不可能预料到消费信贷、退休基金和现代信用体系的其他装备的广泛增长。所以，为了更新马克思的分析，仿佛有许多工作要做。

然而，我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些范畴来描述制度安排看似无穷的多样性——这些安排是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在不同的国家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穷尽一切的分析是

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寻找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并由此理解内嵌在信用体系中的工具和制度会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我们将在四个大标题下面考察这个话题。

（1）金融中介的一般原则：资本的流通和收益的流通

一切金融运作始终是以一种初级的交易为基础的：交易的一方是拥有剩余价值的经济单位，另一方则是出于某种目的希望利用这些剩余的经济单位。这些经济单位可能是个人（不论来自哪个阶级）、公司、政府、工会、教会和王室等机构、专业组织和商业组织、退休基金、慈善机构、银行等等，而可能的目的也包罗万象（作为产业资本或商人资本来流通；购买房屋、竖立纪念碑、开展竞选活动、为喜爱的情妇购买乡间的庄园、建造教堂等等）。

金融机构聚集在一种需要周围：找到有效率的办法来收集、积聚这些剩余，并在必要时把它们转变成货币形式，以便随时把这些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投入流通。在这片看似巨大的混乱当中，我们应当首先坚决地区分马克思所说的*收益的货币形式的流通*与*收益的资本形式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第443页）。

我们已经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后一种形式的流通——即
274 把剩余价值转变为货币，并用它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收益的货币形式的流通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过程。例如，让我们假定工人设立了一些机构，比如英国早年的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或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它们让一些工人的储蓄得以被用来帮助另一些工人购买房屋，并让前者获得利息支付。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外是工人的收益（可变资本的
430 收益）在工人阶级内部得到了再分配，即从拥有剩余的家庭转

移到了在购入自己需要的房屋时必定会陷入赤字的家庭。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利息支付——它显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答案十分简单。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的货币化使他们屈服于生息资本形式上的统治，而不是实际上的统治；生息资本集中协调了工人储蓄的供给与工人对住房的需求。

收益的流通是很广泛的。它涵盖了资产阶级对干粗活的仆人的雇佣、一切阶级对众多服务的支付等等。通过信用体系，许多这样的交易都转变成了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而消费者只要能在未来提供收益，就可以得到贷款。这个领域中的交易可以变成虚拟的交易，就像在资本流通的领域中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将收益的流通当作首要的研究目标，因为所有这些收益都起源于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因此，他聚焦于资本流通的基本过程，排除了其他一切考虑。然而，因为信用体系倾向于把收益的流通与资本的流通不分轩轾地合并起来，所以我们对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理解实在太容易变得模糊不清了。

理论上，我们或许可以在信用体系内部区分出若干“微型循环”（mini-circuits）。这些循环可以在工人阶级内部、在资产阶级内部、在政府之间，以及在这些不同种类的经济单位之间将有剩余的单位与有需要的单位联系起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把利息支付直接解释成在借出去的货币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块。利率仅仅被用来在消费领域中调节收益的借入和借出。它与资本流通的唯一联系——这种联系却也十分重要——是这些信用安排可以有助于造成个人贮藏的减少和对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这些微型循环非常不同于把不同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的循环，也非常不同于把来自收益的储蓄与对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所进行的投资联系起来的循环。

让我们暂且假定诸多微型循环是相互孤立的。每个循环的利率都是在它的领域之内确定的，而且多半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变动。但是货币始终是货币，不论是在谁的口袋里。货币会逐渐从利率较低的循环流向利率较高的循环。这正是*利率平均化的倾向*。

马克思假定了一个统一的、均等的利率，而这预设了一个高度整合的信用体系的存在。于是，体系的碎片化可以被解释为职能专业化的结果。在供给方面，对储蓄的发动会给不同种类的经济单位带来不同的问题。一便士储蓄银行（penny savings banks）、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和储蓄与贷款协会、国民储蓄网络、互助会（benefit societies）、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等等可能都很适合工人，但这些机构不太适应于处理洛克菲勒家族的储蓄或盛产石油的阿拉伯教长（sheiks）的储蓄。大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同样需要专门处理。在需求方面，小企业贷款、农业信用、为购买消费品（摩托车、住房等等）提供的融资、基于政府债务的资助、与大规模的工程（铁路、公共运输系统、公共事业等等）相关的融资以及对大型跨国公司的需要的满足是形态各异的业务，要求通过专门的特长来处理。

由此导致的金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碎片化的[①]（虽然各国的体系在这个方面有巨大的差别，例如美国的体系是高度分散的，法国的体系则是高度集中的）。[②]这种碎片化确实意味

① 尽管希法亭（1970 版）的叙述是过时的，但他对金融结构的描述仍然无比有趣。

② 对法国金融结构的传统描述可以在库蒂埃（Coutière）（1976）和莫兰（Morin）（1974）那里找到；法国可以同英美相比较：关于英国的材料见雷维尔（Revell）（1973），关于美国的材料见《货币与信用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oney and Credit）——《亨特委员会报告》（Hunt Commission Report）（1971）对它进行了更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试图围绕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主题做一些全面的比较。

着金融市场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我们肯定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国家分辨出利率的差异，而且由于融资针对的是不同种类的活动，所以不同的贷款利率是存在的。然而，现代信用体系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高水平的整合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往往极端碎片化的结构当中。例如在美国的储蓄与贷款协会那里，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于其他地方给出的利率是高度敏感的。因此，向住房市场供应的抵押资金会被经济体的其他部门对货币的需求所影响。利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在按照本地的通货各自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之后）也会很快激起货币资本的流动——“热钱”会流向实际利率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使长期利率倾向于平均化的强大力量显然在起作用。然而，这些力量的后果是作为收益的货币的流通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在金融体系内部变得几乎无从区分了。

（2）股份公司和虚拟资本市场

我们在第5章论证了资本必须从家庭商号所施加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无法扩张、无法存活。公司的组织形式充分释放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力量，激励了新知识的生产，还让生产、组织和销售中的规模经济得以出现。同时，它分离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带来了一种解放货币资本的融资形式：货币资本成了一种独立的力量，成了生产和商品流通之外纯粹的资本主义财产。

按照股份的原则来组织的公司是通过向货币资本家出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货币的。所筹集的货币作为资本投入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因而要假定这里的经营不只是想要“欺诈”[76]）。投资者持有所有权证书，并收取利息（根据情况的不同，利息可能是固定的或变动的）。所有权证书只是对未来生产的剩余

价值一定份额的债权，而且是可销售的。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把自己的股票和债券抛售给别的投资者，由此回收自己的货币。这种购买和出售导致了一种特别的市场的诞生，那就是股票市场。这种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它是所有权本身流通的市场。

但是所有权是以许多形式出现的。任何类型的所有权证书原则上都可以交易。政府可以出售对一部分未来税收的权利。对商品的所有权可以在商品没有实际转手的情况下交易，或者可以在实际的商品生产之前交易，就像在商品期货市场中那样。对土地、建筑物、自然资源的权利（后者包括石油钻探、矿产勘探的权利等等）也可以交易。不同的虚拟资本市场看起来与资本主义之下的财产所有权形式一样多。

这些市场的复杂性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为了处理由不同种类的所有权所造成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又出现了诸多专门机构和机制（例如，地产抵押市场的运行与商品期货市场非常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权证书都是“纸质副本”[77]，它们本身并没有价值，尽管它们是按照价格来流通的。这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规定了这些价格？第二，所有权证书究竟还是某种实际价值的副本吗？

所有权证书的价格一般是由持有者有资格获得的当前收
277 益和预期的未来收益来确定的——这些收益都要按照现行利率来折算。由于现行利率是由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来确定的，所以价格的变动方式显然可以在预期收益的变动面前获得完全的自主。另一些因素——比如销售的难易度、安全性、持有期限、关于税收的规定等等——还会进一步改变价格。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关注这些细节，因为主要的焦点是这些一般价
434 格与它们最终必须代表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为我

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让我们可以设法解释在信用体系中出现的虚拟价值（虚拟价格）如何能大大远离由“货币基础”表达的价值，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在股份公司的情况中，现实的资本（它的形式是铁路、生产所用的厂房等等）确实存在，而所有权证书——它会产生股息（利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实际能力为后盾的。问题在于分辨这种后盾的坚固程度；投资者要得知这一点，公司就需要充分披露财务状况。否则，公司就可以想办法使自己看上去仿佛处于很强的（或很弱的）地位，仿佛远远强于（或弱于）自己的实际状况，由此就可以相应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例如，借来的货币可以被用来补充股息支付，以此来鼓励对企业的进一步投资，尽管它只是看上去赢利，其实并不赢利（这种过程叫作“股票掺水”，在20世纪早期非常多见）。①

在商品市场的运行中，实际价值通常潜伏在幕后的某个地方，而且投资者不外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对价值的实现状况进行投机的——如果撇开明显的欺诈案例的话。这种投机活动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倘若没有遭到过多的操纵，就可以导致价格的平均化。商品期货市场可以发挥类似的职能，因为它可以为商品所有者提供指导，告诉他们在某个给定的时刻应该储存商品还是释放商品。但这需要对商品形式的价值在未来的生产做出预期。地产抵押市场（关系到土地和建筑物的价格）所带来的问题尤为复杂，只有在彻底研究了作为经济范畴的租

① 关于投机商如何通过这种活动使别人的投资丧失价值、让自己大发横财，我们可以从公共交通的融资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历史中找到一些触目惊心的例子——见亨德里克（Hendrick）（1907）和罗伯茨（Roberts）（1961）；奇普（Cheape）（1980）则描述了相关的背景。

金之后才能理出头绪（见第 11 章）。

政府债务同样很难理出头绪。马克思把它视为虚拟资本的一种纯粹幻想的形式。国债所代表的货币早就已经花掉了（发动战争、支付国家的花费等等），所以投资者交易的是债权的证书，它的后盾不过是政府对剩余价值生产征税的权力。这番描述肯定适用于大多数国债。但也有一些形式的公共开支不符合这个模型。如果一家市政企业——它是通过从资本市场借债来融资的——以一定的价格来出售商品（电力、燃气、供水、交通等等），使得它所创造的收益足以支付债务的利息，还留下了足够的收益来进一步扩大业务，那么它在原则上就与一家股份公司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它的所有权形式和它的定价权力。如果它的活动有一部分或全部是由税收补贴的，问题就开始显得非常不同了。但是国家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例如在医保和教育方面）可以从事许多生产活动。通过改善社会中的生产力，国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剩余价值的生产。投资于国债的货币不会仅仅因为进入了公共财政的框架就自动停止自己作为资本进行的流通。只要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而得到了增进，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税收——这些税收又为最初投资于国债的人构成了利息支付的基础——那么生息资本就可以持续流通。这当然就是“生产性开支”理论，它为各种各样的国家活动提供了理由。[①] 尽管这样一种结果是可能的，但这个事实决不能

278

① 奥斯曼（Haussmann）男爵开创了国家的“生产性开支”这个观念：他在第二帝国期间对巴黎实行了戏剧性的重建计划［见平克尼（Pinkney），1958］。这个观念现在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公共财政理论的标准伙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特别沉寂，只有巴克（Barker）（1978）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框架，值得加以阐发。

保证实际价值的确是由这些国家干预创造出来的。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有权证书的价格与这些证书所代表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都必定会被掩盖。收益本身不是直接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约束的，而是由分配的规则和一整套制度安排来中介的；这些规则和安排虽然有助于协调生息资本的流动，却掩盖了收益与实际价值的关系。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也有干预的力量，因为价格是按照利率来折算的收益。可是虚拟资本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至关重要，因为生息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只有通过这些市场才能得到确保。我们在前一节证明，这种流动发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协调职能。有了虚拟资本市场，就有办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协调力量加以协调。

（3）银行体系

银行与其他金融中介的区分十分重要。[①] 储蓄银行、退休 279
基金和保险基金、储蓄与贷款协会和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账户等等都会发动储蓄，但这些储蓄来自现有的价值量。在这些状况下，在价值的生产之前进行储蓄是不可能的。这条限制并不适用于银行：银行是通过它们所给出的信用来给出信用并创造货币价值的。当银行用自己的汇票来代替在资本家（和其他人）中间相互流通的汇票时，它们就创造了虚拟的货币价值。这些虚拟的货币价值随后就可以作为资本来出借。这意味着银行可以将货币的流量——这些货币被用作支付手段——转变成“自由的”货币资本。银行可以在价值的生产之前创造货币资本。这种能力

① 格利（Gurley）与肖（Shaw）（1960）有效地讨论了这个区分，尽管他们的角度是资产阶级的。

的唯一界限是维持一定的货币储备的需要——倘若银行的客户对货币的需求有任何急剧的增长，就要靠货币储备来支付。当储户对银行的信用货币失去信心，转而寻求“现实的货币”[78]（即货币商品或以国家为后盾的法定货币）时，就会发生对银行的挤兑。

银行从虚拟价值中直接创造货币资本的能力十分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之下有一个无休止的问题：找出必然存在的闲散资源，让资本得以从相对非生产性的用途重新配置到更有生产性的用途当中——生产性当然总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界定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原始积累和强占直接或间接地强行推动了上述重新配置（间接的途径是高利贷）。在后来的阶段，对储蓄的发动逐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原始积累的重要性相对衰落了，而且由于社会的总储蓄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是完全通过信用体系来发动的，所以从银行体系内部的货币流量中创造货币资本就成了闲散资源唯一无比重要的来源——对资本流动的重新配置需要这些闲散资源才能强行推动。闲散资源的其他来源只有一个：即过度积累；但即使在这里，闲置的生产能力和过剩的商品也必须首先在银行体系中货币化，重新配置才能发生。进一步讲，随着市场交易的体量越来越高，而且这些交易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完成的，银行体系的能力——在实际价值的生产之前产生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增强。

280

马克思之所以聚焦于银行的角色而非其他种类的金融中介，恰好是因为前者结合了货币与金融两方面的职能。德布伦霍夫（1978，第57页）正确地总结说：“银行体系是信用体系的战略部门”，因为银行“是唯一把对支付手段的管理与对货币资本的管理结合起来的机构”。这两个管理上的角色巧妙地

相互补充，因为资本积累的进展要求在任何现实的生产之前以货币形式把虚拟价值创造出来。但我们已经提到（前面第247—249页），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假如不受约束，就会对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造成永恒的威胁。由于虚拟价值的创造成了一种必然的诱惑，而不只是一种长久的诱惑，所以这种威胁会不断变本加厉。

在这些情况下，过度投机的可能性是十分巨大的。虚拟价值（信用货币）是作为资本被投入流通的，而且转变成了虚拟的资本形式。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79]（《资本论》第3卷，第469页）。为了讲述“颠倒现象”会如何在信用体系的银行部门中“达到完成的地步”，马克思花费了许多篇幅来愉快地详细讲述事例。对货币品质的严重威胁是很明显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第1节看到的那样，对这种威胁的回应是创造一种机构的等级制，并明确地将保护货币的品质作为目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一般都位于这个等级制的顶端（我们暂且撇开了这个问题的国际性方面）。中央银行若要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防止虚拟价值离开实际的商品价值太远。它不能把严格的同一性施加到这两者身上——即使我们假定它有这样做的力量——因为那会阻拦自由货币资本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可以强行推动新的积累形式。它也不能放任信用货币肆无忌惮地创造。于是，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中央银行的业务是一门“技艺”——可是他们不承认这是一门“科学”[见尼汉斯（Niehans），1978，第12章]。

然而结果是：“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80]（《资本论》第3卷，第572页）尽

管“金属准备”一词隐含了来自货币商品的直接约束，但若剥掉这种约束，上述结果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调节信用的流动，以求维护货币的品质。于是，在两种需要之间——其一是通过创造信用来维持资本积累，其二是维护货币的品质——就存在张力。倘若前者受到了妨碍，我们的结局就是商品的过度积累和特定的价值丧失。倘若任由货币的品质每况愈下，我们就会面临由慢性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普遍化的价值丧失。现代的两难就这样整齐地呈现出来了。

281 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统一在银行体系内部，中央银行则在民族国家内部成为了至高的调节权力。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信用体系所提供的手段会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乃至资本的整个派系。但必须有人对调节者加以调节。中央银行企图履行这项职能。但由于这些调节权力落在了资本的一个特定派系手中，所以它们几乎必定会遭到歪曲和损害。这直接将我们引向了国家在货币和金融事务中的参与这个大问题。

（4）国家制度

现代信用体系一般会展示出私人活动与国家活动的高度整合，而国家机器的一个分支现在完全致力于直接或间接地管理信用体系。我们不难讲清楚这样一种高度的国家参与有哪些原因。

资本积累要求生息的货币资本可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持续地流动。这种流动在过度投机、扭曲和其他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信用体系会无可避免地把它们孕育出来——面前也必须得到维持。某种调节显然是需要的，否则生息资本的流通在进展时就无法摆脱严重的、慢性而长期的干扰。货币资本家——银行家和金融家——对自身加以调节的能力（不

论他们多么敏锐地洞察到了自己对整个资本家阶级负有的责任）严格地受制于他们相互竞争的立场和他们对派系的效忠，而派系位于资本家阶级关系的内部结构中。一种有限的调节可以在垄断竞争时出现（例如，英国的“五大”银行[81]直到最近都在自行调节方面干得非常出色），但是稳固的调节力量必须立足于垄断，后者又肯定必须服从国家的调节。因此，中央银行不仅是现代信用体系的枢纽，而且是国家机器控制权的一个中心。

然而，对国家调节的需要既不是从中央银行开始的，也不会到中央银行为止。一旦货币资本家未能调节自己的剩余，国家就必须介入进来，消除一些最坏的滥用股票交易的形式（“股票掺水”和其他种类的欺诈），货币资本的供给所遇到的障碍也可以通过国家对存款和储蓄的保证来移除。出于经济的或社会的理由，国家可能还会觉得有必要刺激某些种类的信用流动（出于这个理由，住房金融通常会作为一种特别的信用市场被放到一边）。国家甚至有可能设立一些有特别目的的信用机构（针对农业信用、萧条地区的发展规划、小企业贷款、学生贷款等等）。因此，信用体系是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

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干预是可选的、或 282
然的，因为它们取决于货币资本家的自行调节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总体状况——这种阶级斗争是通过国家机器、在国家机器内部表达的。倘若否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强烈的、压倒性的政治内容，那同样是愚蠢的。但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国家绝不可能摆脱它的一般责任，即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的相互矛盾的力量内化到了信用体系本身当中，而且在其中加深了，所以制度化的国家干预是一种无可

避免的回应。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只有诉诸国家权力才能调节货币资本家的经营；这直接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来控制国家？从更加一般的理论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只有诉诸级别更高的制度化安排——这是国家机器的特征——才能约束在信用体系内部发动的强烈的矛盾；这促使我们考察资本与劳动根本性的阶级对抗以及双方的诸多派系之间的对抗是如何内化到国家当中的。这些问题当然既巨大又重要。不幸的是，它们超出了眼前这部著作的范围。[①]

译注

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8—9 页。
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22—12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15 页。
4.《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501 页。
5.《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513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事实上，纸币的“强制流通”（having compulsory circulation）和“不可兑换”（inconvertible）是一回事，马克思在原文中只写了前者。
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49 页。
7. 在本书写作时，J. P. 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尚未与美国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合并为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这场合并发生在 2000 年。
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66 页。
9.《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71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0. 这往往是中央银行的别称。在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等同时使用汉语和英语的地方，“Monetary Authority”的汉语名字是“金融管理局”。
1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4 页。
1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74 页。
13.《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137 页。
14.《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94 页。
15.《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90 页。

① 不幸的是，就如何理解国家、货币体系与信用体系的关系而言，最近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都相当缺乏见识。在我看来，若要解释资本主义之下的国家的许多做法和国家机构的差异化结构，这种关系就具有相当的根本性。德布伦霍夫的著作之所以具有杰出的品质，恰好是由于她对这种关系十分敏锐。

16. 即《资本论》第1卷第2篇的总标题“货币转化为资本”。
1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8—39页。
18.《全集》第45卷，2003版，第133页。
1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71页。
20. 这句话出处不明，至少不是马克思写的。
2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74页。
2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75页。
2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74—675页。
24.《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18—519页。
2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79页。
26.《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1页。
2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0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9页。
3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37—438页。
3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378页。
3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393—394页。
3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390页。
3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396页。
3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399页。
3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07页。
3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1页。
3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01页。
3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73页。
4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4页。
4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50页。
42.《全集》第45卷，2003版，第38—39页。
43.《全集》第45卷，2003版，第554—555页。
4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53—454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3页。
4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3页。
4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50页。
48.《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80页。
49.《全集》第31卷，1998版，第659页。
5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4—545页。
51.《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31页。
5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9页。
5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5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1页。
5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6页。

5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19页。
5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9页。
5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8页。
6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6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35页。
6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6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79页。
6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1页。
6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18页。
66.《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46页。
6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3页。英译本在此采用了一种解释性的翻译，但所表述意思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与译自德语的汉译本是一致的，故此处直接引全集译法。
6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11页。
7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26页。
7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2页。
7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69页。
7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6页。
7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05页。
7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98页。
7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9页。
7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40页。
7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484页。
7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32页。
8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48页。
81. 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国家地方银行（National Provincial Bank）和威斯敏斯特银行（Westminster Bank）。近几十年较大的变故有：国家地方银行与威斯敏斯特银行于1970年合并成了国家威斯敏斯特银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又于1999年被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收购；米特兰银行于1992年被汇丰集团全面收购，并于1999年改名为汇丰银行（HSBC Bank）。在今天的英国——不再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巴克莱集团、汇丰集团、劳埃德银行集团和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合称四大银行。

第10章　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金融资本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拥有独特的历史。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他关于不同种类的货币资本的流通过程留下了大量不太连贯的文字。他对金融资本的界定隐含在其中：那就是一种以信用体系为中心的特定的资本流通过程。后来的作家们倾向于抛弃这种从过程出发的观点，并把这个概念当作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联盟——一种对一般的积累过程施加了巨大影响的权力集团——的一种特定格局。不过，除了希法亭关于这个主题的基础性著作和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文中对希法亭一些观点的重复之外——后者影响很大，这个概念一直都完全没有得到分析。它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间传说，却几乎没有引发一丝辩论。 283

由于这个概念处在这种具有特权的领域，所以每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适合于论战或者适合于科学时，它就会定期复活。不同的作者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当然经常引来批判性的评

论，尖锐的辩论偶尔也会由于如下问题而爆发：是银行家控制了公司，还是公司控制了银行？[①] 然而，辩论的中心问题一般是：被称作“金融资本”的权力集团是如何建构的，这个权力集团相对于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重要性？最初建构这样一个权力集团的理由——它存在的社会必要性——大体上并没有受到质疑。

本章的目标是对两种关于金融资本的看法——其一是从过程出发的，其二是从权力集团出发的——进行比较，并说明对前者的探讨——这种探索特别强调了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如何有助于识别出一些相互抗衡的力量，它们在资产阶级内部同时创造并破坏了步调一致的权力集团的形成。同时，我也将论证对这些过程的恰当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
284 一定的优先地位，因为这种理解会让我们就资本积累的动态和危机的形成获得一些深刻的见解，而对权力集团的形成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机制进行任何程度的钻研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章的结尾将是“第二块”危机理论，它力求将我们对作为过程的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的理解与对生产的不均衡问题的理解整合起来——第 6 章和第 7 章谈论了后者。

1. 马克思眼中的信用体系

我们在第 9 章详细考察了信用体系给资本流通带来的诸多技术性职能和利益。我们倘若把信用体系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许就可以将它看作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总的资本流通借此得到了协调。它让货币资本的重新配置得以在不同

① 见菲奇（Fitch）与奥本海默（Openheimer）（1970）同斯威齐（1971）的辩论；这场辩论在赫尔曼（Herman）（1973；1979）和科茨（Kotz）（1978）那里有诸多回音。

的业务、公司、部门、区域和国家之间进行。它促成了不同的业务之间的严丝合缝、分工的迅速发展和周转时间的减少。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并在导致资本集中与导致资本分散的力量之间进行仲裁。它有助于协调固定资本的流动与流动资本的流动之间的关系。利率会根据未来的需要来对当前的使用进行贴现，各种形式的虚拟资本则会把货币资本在当下的流动与对未来劳动果实的预期联系起来。

生息资本可以发挥所有这些作用，因为货币代表了一般的社会权力。因此，当货币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时——这种积聚反映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它们就逐渐表达了一种资本主义财产的权力，这种财产处于任何特定的商品生产过程之外、外在于任何这样的过程。货币资本一旦在信用体系中被发动起来，就可以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共有资本来运行（《资本论》第3卷，第368页）。

只要得到恰当的组织和管理，在信用体系中聚敛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精巧地协调整个经济体的各种投资决定，由此对资本积累的引擎进行微调。这种货币资本不关心任何特定的运用，因而可以被用来把作为集体的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强加到个别资本家身上。只要个别资本家——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行动，并企图在竞争的环境中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所采用的技术、所做出的决定与平衡的积累不一致，信用体系就会让人感到有希望控制这些错误的行为。个别行为与阶级需要之间的深刻矛盾——它会对资本积累的路线施加一种极其强大的、破坏稳定的影响，我们在第7章论证了这一点——看上去是可以控制的，甚至也许是可以调和的。资本主义虽然原本是无政府主义的、未经协调的，却可以通过对信用体系的恰当组织和管理来获得稳定性。或者说看似如此。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信用体系所具备的潜在的巨大力量。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见第3章和第6章）。信用的恰当配置可以确保两者在数量上的平衡。购买与出售之间的缺口——马克思对萨伊法则的拒斥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得到弥合，生产与消费也可以达到和谐，以便确保平衡的资本积累。例如在今天，住房建设信用流量的任何增加倘若脱离了地产抵押融资的流量的同步增加——后者为购买住房提供了方便——就会无济于事。信用可以被用来同时加快生产和消费。通过信用体系内部看似简单的调整，固定资本的流动与流动资本的流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协调。资本实现过程中的一切联系都可以服从信用体系的控制，只有一个例外。这唯一的例外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尽管在信用的辅助下，人们可以购入投入品、卖出产出品，但这不能代替通过使用价值的具体生产来进行的对自然的实际转化。如果后者要服从总的阶级控制，金融家与产业家就必须合为一体（列宁和希法亭后来都提到了这个观点）。

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些“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它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面前充当了一道障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工资、租金、利息、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分配份额难道不能通过信用体系来改变吗？由信用助长的通货膨胀肯定可以削减工资，工人的储蓄也同样可以通过信用体系被发动为资本，到了危机期间可能又会丧失价值（《资本论》第3卷，第508页）。此外还有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例如地产抵押和消费信贷——借此可以改变工人的实际收入（第609页）。进一步讲，就任何种类的未来收益而言，它们的所有权凭证的购买和出售都会把分配的其他方面（即对租金、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占有）整合到货币资

本流通的一般体系当中。信用体系还为资本集中提供了方便，并让资本得以挣脱家庭商号的枷锁，使其作为公司资本来运行；于是，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安排就可以发生转变，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见第 5 章）也可以得到管理。如果说有一套完美的分配安排可以确保平衡的资本积累，银行和信用就为趋近这样一个均衡点提供了潜在的手段。

至少从表面上看，信用体系包含了一种潜力，可以跨越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与实现之间、当前的使用与未来的劳动之间，以及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抗。它也提供了在个别资本家与资本家的阶级利益之间进行仲裁的手段，从而提供了对导致危机的力量加以抑制的手段。有了这样一件具有强大潜力的武器，资本家阶级就有充分的动力使它变得完善。确实有大量证据表明，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总会在解决的进程中把信用体系推向新的格局（美国的金融结构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彻底转化是一个壮观的例子）。这一切确认了第 9 章所传达的基本信息：资本主义倘若没有信用体系——它让各种协调得以可能，因而每天都会变得更加精巧——就存活不了太久。

那么，危机怎么还是会发生？马克思回答说：信用之所以能“扬弃资本价值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把这些限制提升为最普遍的形式”[1]（《大纲》，第 623 页）。他的意思是说，信用的使用倾向于在长期把问题弄得更糟，因为它只能处理交换中出现的问题，却从来不能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此外，信用在一大堆情况下都有可能给生产者带来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加重比例失调的倾向和过度积累的倾向。让我们考察一些这样的情况。

第一，由信用体系促成的利润率的平均化使竞争变得完善了，而且通过技术变革来赚取相对剩余价值的企图也由此加

速了，而不是削弱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还确保了商品会按照生产价格而非价值来交易。由于技术变革步伐的加快和生产价格为生产给出的错误信号从一开始就会推动过度积累的倾向，所以在这个方面，信用会加深而非减弱不均衡的倾向。

第二，信用体系为金融家赋予了一定的独立权力，并把他们作为“一般资本”的代表同其他资本家分隔开来了。银行家和其他中间人所构成的“阶级”把自身插入了储蓄者（许多储蓄者都属于货币资本家“阶级”）与“产业资本家阶级”之间[2]（《大纲》，第 852 页）。股份公司的管理者也凝结成了一个单独的管理者阶级，他们管理的是别人的货币（《资本论》第 3 卷，第 86—90 页）。信用体系的成长在资产阶级内部孕育出了新的派系或“阶级”（马克思经常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管理者这几个不同的阶级理应对生息资本的运用负责，把它用作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共有资本。他们对货币资本的配置多半应该为一般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可是他们作为个人又受到竞争的约束，因而会按照自己直接的私利或派系的利益来行动。

287 由于银行家和其他“高额金融的绅士”处在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可以着手将信用体系仿佛“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从而可以占有“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3]（《资本论》第 3 卷，第 478 页）。“巨大的集中”在信用体系中成为可能，并给予了“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4]（第 545 页）。货币这种外在的社会权力在金融寡头手中的积聚显然不是一种纯洁的祝福。

因为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所含有的权力是任由个人占有和利用的，所以信用体系就成了资产阶级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

和个人权力较量的场所。这些权力斗争的结果显然十分重要。可是马克思偏偏极少关注这方面的事务。他近乎把它们看作一种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展开的不言而喻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掩盖了一组远远更为深层的根本性的关系，即作为资本的生息货币的流通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在这一章证明：就资本积累的矛盾动态而言，把金融资本作为过程的理论——认为它既不同于一组特定的制度安排，也不同于一张资产阶级内部统治者的名单——可以揭示出许多原本一直被隐藏的东西。

还有第三道障碍会阻碍信用体系作为资本积累的微调装置来运行：这道障碍的出现是因为货币资本不会特地分辨自己来自哪里，或者流向何处。例如，一切社会阶级的储蓄都归并到了一起，因而每个人都承担了储蓄者的角色，不论他有何种社会地位。工人的储蓄与货币资本家的储蓄相互融合，往往变得无从区分。信用体系所汇集的货币权力具有一种宽泛得不同寻常的社会基础。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对储蓄的偏好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都有可能改变金融家与其他阶级之间、特别是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货币资本同样不会分辨自己的用途，因为它的流动一般是为了占有无论什么类型的收益。尽管这让生息资本的流通得以将政府债务、消费者债务、生产者债务、对股票的投机、商品期货和地租整合起来，甚至也许还能对它们加以规训，却没有办法防止为了占有收益而进行的投机性投资走向彻底的失控。更糟糕的是，债权的积累可能会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且债权即使在实际生产中可能并无基础，也可以继续流通。例如，即使对完全没有生产力的土地的所有权证书进行投机，也有可能助长虚拟的积累过程，只要这些所有权证书可以在别

的出售和购买中被用作抵押就行。19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个人和银行所持有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实际上充当了货币——但由于杰克逊总统坚持要求所有对联邦土地的购买都必须用金币来支付，这种纸面的兴旺就戛然而止了。因此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5]（《资本论》第 3 卷，第 470 页）

信用体系一开始表现为一种理智的手法，表达了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利益；它表现为一种手段，可以克服"对生产的内在的束缚和限制"，从而可以将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提升到新的、更加完善的水平——但它终于变成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6]。虚拟资本"颠倒错乱的形式"走上了前台，让"颠倒现象"得以在信用体系内部"达到完成的地步"。信用体系最初仿佛巧妙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却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之所在。

马克思总结说：信用体系使得"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企业出现了"，使得个别资本家被"社会"的、"联合"的资本形式（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等等）取代了，使得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了，使得引起国家干涉的垄断被创造出来了，还使得"新的金融贵族"兴起了。由此，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并建立了世界市场。但它也加速了危机的形成，并把资本主义"解体的各要素"带到了前台。马克思把这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7]（《资本论》第 3 卷，第 438—441 页）。

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做很多阐发，但是历史做到了这

一点，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注释者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人们为了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于20世纪金融运作的现实而对它们进行了怎样的解释、充实和改造。然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记住，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充分解释“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措辞到底指的是什么，尽管它十分高调，非常抽象，还有些难以捉摸。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对这个措辞提出一种解释，并观察它是否能较好地反映在资本主义之下使用信用的两难。

2. 列宁和希法亭眼中的金融资本

列宁写道：“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8]他认为，银行可以将货币的社会权力积聚到它们手中，可以作为“一个集体的资本家”来经营，从而不仅可以“控制”一切商业的和工业的经营，甚至还可以“控制”[9]整个政府。由于产业家寻 289
求的是垄断权力——主要诉诸资本集中——所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有联合的倾向。因此，“金融资本”被界定为“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10]。①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有控制力的“金融寡头”。它系统性地转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投射到了世界舞台上。列宁写道：“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11]然后他

① 列宁（1970版第1卷，第703页）；后面的引文均出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说，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2]。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达方式现在是资本主义愈发戏剧性的不平均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彻底结构转换。以“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13]为后盾的统治性的金融寡头会在“核心”国家鼓励“工人贵族”[14]的形成，以此来收买劳工，使他们保持和平；世界的其他地方则被越来越深地推进了依赖、屈服和反叛的状态。金融寡头内部的竞争和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只会高涨，不会减弱。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战争。由此，列宁以金融资本的概念为起点，得出了一种对20世纪帝国主义令人瞠目的分析。

可是，列宁的论述所包含的理论内容决不能说是清晰的。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阐发金融资本的概念；至于它究竟以什么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化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也仍然很难看清。他的许多观点是从霍布森、布哈林和希法亭所提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框架中得来的，这多少有些兼收并蓄。[①] 只有希法亭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为金融资本的概念给出了一个非常坚固的理论根基。列宁虽然强烈批判了希法亭的政治路线，却似乎接受了希法亭所提出的金融资本的基本概念，只有一点保留意见。这唯一的保留意见关系到希法亭关于货币

① 霍布森（1965版）、希法亭（1970版）和布哈林（1972a）。布哈林的著作是在列宁的著作之后出版的，但是多半对列宁有影响，因为列宁至少在出版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之前一年就为布哈林的著作写了序言。丘奇沃德（Churchward）（1959）记述了由列宁的笔记所显示出的广泛阅读背景，而阿里吉（Arrighi）（1978）批判性地考察了霍布森的贡献。

的“错误”看法。[①] 至于这个错误的本质，列宁为我们留下的却是一片黑暗。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错误是多么关键。但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希法亭的贡献。

希法亭在论述的总体模式上忠实地复制了马克思。他首先考察了货币的各种形式，进而说明了——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做的那样——信用对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如何是必不可少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银行最初只是货币流动的中介，但是积累的进展使数量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落到了银行手中，因而银行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中”[15]，并把他们的活动与产业资本的活动整合起来。由于产业家只要有机会获得银行资本，就可以拥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经营的规模方面），所以他们必定会越来越指望源于外部的借贷资本。希法亭说（列宁也赞同这一点）：金融资本

> 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以前被分开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现在被置于产业和银行的支配者通过紧密的个人联合而结成的金融贵族的共同领导之下。这种联合是以大垄断联合从而消除个别资本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当然，资本家阶级同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16]（希法亭，1970 版，第 409 页）

希法亭对这种统一体在制度上的表现——它创造了垄断、托拉斯、卡特尔、证券交易业务等等——做了长篇的讨论，而且也得到了列宁的赞同。他指出，对所有权证书的投机——对

① 列宁（1970 版第 1 卷，第 678 页）。关于希法亭的著作的缺点，丘奇沃德（1959，第 79 页）陈述了列宁的看法。

虚拟的资本形式的投机——必然会起到关键作用。金融寡头的兴起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改变了阶级斗争的维度。希法亭假定国家成了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并且金融资本在世界舞台上是作为一国的资本来运行的。由此，他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对帝国主义及其矛盾的解释。他的论证是以如下方式串联起来的。

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金融资本的兴起（这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就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引起了国家的干涉。国家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为了回应金融资本的要求而打造的——把关注的重心放到了资本输出而非商品出口上面。国家之间的关系（竞争、贸易保护、统治和依赖）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化成了世界舞台上充满冲突的不平均发展。这些矛
291 盾的表达方式现在是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金融寡头与“其余的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的不平衡。它们都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

希法亭（1970 版，第 17 章）在这里诉诸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一个特定版本。他认为，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会扭曲价格信号，还会产生许多不平衡，例如在部类之间（两个部类所生产的是生产资料与工资品）、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卡特尔和垄断可以控制技术变革的步伐，也可以控制价格，但这不过是加深了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的价格扭曲——“卡特尔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价格调节中的干扰，这些干扰最终导致比例关系失调，从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17]（希法亭，1970 版，第 401 页）简言之，卡特尔无法扫除危机。信用体系即使完全处在金融寡头的统治之下，也同样会失灵，因为利率归根到底必须用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态来解释，而不是用前者去解释后者。
456 任何打造信用货币的尝试——以求使这个具有内在的不稳定

性的体系保持稳定——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希法亭随后提到了马克思的一个看法，但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体系在危机的进程中必定要回到它的“货币基础”，要扔掉在繁荣的阶段取得的大量虚拟资本（1970 版，第 372 页）。贸易保护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的关系都被看作这些推动危机形成的基本倾向的特殊表达，并且是由金融资本的寡头性质来规定的。

列宁在两个方面有别于希法亭。第一，就主要的帝国主义权力而言，他似乎接受了金融资本与一国的资本之间的同一性；到了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状况时，他往往就会切换到一种超国家的金融资本概念——这个立场与霍布森相似。就此而言，列宁的表述比希法亭更加模棱两可。[①] 第二，他提到了希法亭在货币理论中的错误。至于这个错误的本质或后果，列宁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启发。德布伦霍夫最近直接面对了这个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加以讨论。

德布伦霍夫认为（1971，第 81—93 页），希法亭只是在模式上追随了马克思。他把金融资本看作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体，这使得他构造了一种“关于货币现象的金融理论”，而马克思建立的是“关于金融的货币理论”。这个差别十分重 292
要。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时并没有涉及资本流通，而他的货币理论就是从这番分析中建立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首先识别出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矛盾，并在由此打下的基础上研究了这个矛盾在货币作为资本来流通时会如何加剧。这个矛盾在希法亭的著作中几乎

① 丘奇沃德（Churchward）（1959，第 78 页）指出，列宁甚至质疑了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基本概念，并在笔记中写道：“说‘金融资本 = 银行资本’，还不够吗？”[18] 阿里吉（Arrighi）（1978）强调了霍布森与希法亭的差别。

完全消失了。货币现象被还原成了“资本主义金融的纯粹器官”，完全受金融资本控制。希法亭所描述的金融资本既有霸权，又有控制力，而马克思所描绘的金融资本却必定会掉进它自身内在矛盾的罗网。对马克思来说，核心矛盾位于他所说的金融体系（信用）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希法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向货币基础的回归在危机期间是必不可少的——却未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就要讨论这个话题。

3. 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经常宣称，资本主义在危机的进程中会被迫抛弃对金融的虚构，并回到真金白银的世界，回到永远真实的货币基础。他戏谑地描述说，货币体系“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体系本质上是新教的”，因为后者的力量来自信仰，即“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他接着指出：“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体系也没有从货币体系的基础上解放出来。”[19]（《资本论》第3卷，第592页）虽然信用经常“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20]，但是中央银行始终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21]（第572—573页）。换句话说，“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22]（第606页）。

马克思谈论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对这一点的理解至关重要。乍一看，他的观点仿佛略显过时，因为他明确地诉诸贵金属，把它作为货币体系的“枢纽”——这是19世纪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只要探究马克思论述的逻辑，就可以识别出一条适用于

一般资本主义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可以直接追溯到货币的双重职能，即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当货币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它必须真实地代表在它的帮助下流通的价值。货币在这里“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即体现在商品中的价值的一种外在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尺度。之所以将一种特定的金属——比如黄金——作为这个尺度的根基，是为了确保这种测量杆在采取物质形式时尽量准确、毫不含糊。这种做法的矛盾当然在于，一种具体的、特定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例如黄金——被当成了抽象劳动的物质代表。另一方面，当货币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它必须把自己与价值的“真实”代表分割开来，让市场价格得以偏离价值，并证明自己是交换过程灵活的润滑剂，而这种交换过程是难以预料的，还会无休止地变化。就此而言，纸币和信用货币的运行可以既不受限制，又有创造力。

在简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当中，货币的这两个方面是在一种不安定的、对抗性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正如我们在第1章提到的那样，资本流通的出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黄金的“内在”价值与货币的“反映”价值之间的缺口——后者的尺度是借助这些货币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然而，对资本流通过程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必须演化出一种精巧的信用体系，并创造虚拟的资本形式，否则就无法存活。货币的“虚拟”形态——信用“货币”和纸“币”——被推到了极端，它们与社会劳动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薄弱了。倘若社会劳动的坚实代表是货币商品（黄金），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流通加深了后一种意义上的货币同金融之间的分离。马克思关于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的

概念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以稍微明确一点的方式来探讨这个矛盾的本质。

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当货币和“虚拟的价值形式”篡夺了货币商品的地位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假如信用的创造与在社会中开展的社会必要劳动保持同步，信用对资本流通的影响就是有益无害的。但是信用的创造几乎势不可挡地会走向彻底的失控；另一方面，过度积累的问题也始终潜伏在幕后。一旦虚拟价值最终没有以社会的劳动产品为后盾，或者一旦对信用体系的信心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遭到了动摇，资本就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重新建立它在社会必要劳动的世界中的立脚点。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它要么可以使自己的全部经营牢固地依附于货币商品（黄金），把后者作为唯一终极的价
294 值尺度，要么可以找出某种别的办法来与实际商品生产的物质过程建立直接的联系。两种方式都有缺陷。

在第一种情况下，一切价值都必须转变为货币商品，由后者证实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这是马克思所熟悉的一般情境——“一当信用发生动摇……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对流动性的需求和对其他货币向黄金的可兑换性的需求发生了急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可用的金和银——它们“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23]（《资本论》第3卷，第574页）。结果是：

>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

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24]（《资本论》第3卷，第516页）

然而，这一切假定了纸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贵金属。马克思并没有考察另一种情况：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在20世纪已经成了常规——事情就显得非常不同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关于金融体系与货币体系的冲突所要讨论的是根本性的差别，还是单纯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一步步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其他货币无法兑换成黄金的条件下，规训信用体系和虚拟资本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央银行身上。通过提升利率，中央银行可以“如俗话所说，把螺丝拧紧”，即增加信用货币转变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所需的成本，从而给投机狂热降温，抑制虚拟资本的创造[25]（《资本论》第3卷，第543页）。通过明智的管理以及对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操纵，强有力的货币管理局可以期望避免商品的价值丧失，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货币的品质，使它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劳动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应该与整个经济体的价值生产率增长相匹配。中央货币管理局的这种政策立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成了常规，因为人们当时盲目地捍卫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却导致了极其惨重的商品价值丧失，连资本主义的存活本身都岌岌可危了。

马克思会主张这样一种政策立场是建立在幻觉上面的。首先，中央银行无法将自己从世界贸易中完全孤立出来，也无法切断自己与某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它的自主会被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所限制。倘若中央银行主动藐视国际货币体系的

规则，该国的货币可能最终就会在其他国家的货币面前丧失价值。在货币等级制的国际层次上，“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观念并不愿意死去”[见前面第250页（边码）]。一国的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一切中央银行的权力。倘若没有清晰地界定世界货币——自1973年以来就是如此——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会陷入危机。

马克思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就算没有任何来自国际货币的制约，中央银行的权力——它是受到严格限定的——也完全不足以抵御危机的形成。我们论证了（第7章）资本主义有一种慢性而长期的倾向，即产生资本的剩余——产生过度积累的状况。我们现在必须继续考察另一种情况：虚拟资本肯定必须在实际的资本积累之前被创造出来，而这意味着“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26]（《资本论》第3卷，第505页）。只要实际的商品价值的扩大与先前创造的虚拟资本保持同步，那就永远不可能出问题。但一旦过度积累变得明显了，虚拟价值的实现和商品形式的价值的实现就会受到威胁。在这样一个时刻，对货币的需求在严格意义上就是对流动性的需求。在这样一个时刻，向货币基础的回归肯定会毁灭虚拟资本，并使商品丧失价值。面对这样一种状况，中央银行唯一行得通的防御手段是印刷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以便把剩余全部买下来，由此实现虚拟资本的价值。马克思明确地排除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资本论》第3卷，第490页），因为他所假定的货币体系是以黄金为后盾的——有限的黄金储备阻碍了中央银行介入进来，“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27]。

但若一国的货币无法兑换成黄金，中央银行确实就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抵抗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了。然而这样一来，

它就使自己的货币丧失了价值。简言之，过度积累的倾向转变成了猖獗的通货膨胀的倾向。马克思并没有考察这样一种可能性或它的后果。尽管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论述的总体结构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如果商品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并没有社会必要性，捍卫它们的名义价值就是不合理的，就像盲目地恪守金本位，以求捍卫作为纯粹的价值尺度的货币也是不合理的一样。猖獗的通货膨胀与商品的价值丧失是同样难以忍受的。

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 296
间的矛盾最终会以“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商品形式的资本”之间的矛盾作为归宿[28]（《资本论》第3卷，第460页）。在过度积累的状况下，资本家阶级似乎可以做出选择：是让货币丧失价值，还是让商品丧失价值；是通货膨胀，还是萧条。货币政策致力于同时避免这两者，最后到头来却只会同时引发这两者（正如资本主义当今的状况所显示的那样）。

金融资本的权力明显是非常有限的。例如马克思明确地认为：“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尽管“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危机”[29]（《资本论》第3卷，第490页）。这条结论适用于一切可能的货币危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30]（第517页）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展，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不仅加剧了，而且变得愈发令人生畏了。希法亭完全没有看到这些矛盾，因为他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这个错误代价很大。列宁尽管认识到了这个错误，却没有纠正它，倒是更愿意用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界定作为手段来说明资本

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如何投射到世界舞台上。

可是就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而言，《资本论》第3卷关于银行和金融的饱受磨难的几章里埋藏着一种有力的解释。只要联系到《资本论》第1卷提出的基础货币理论，我们就可以逐渐理解为积累而积累和资本流通如何割裂了货币的两项职能——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又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树立了一种深度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是作为社会劳动的价值尺度的货币的世界，另一方则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运作的错综复杂的世界。马克思并没有完整地分析这种对抗的所有可能的维度——例如，通货膨胀可能会造成价值丧失，或者这种对抗可以表达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国际竞争。但我们仍然必须就其本身来领会他的深刻见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

4. 利率和积累

在调节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之间的关系时，高品质货币的利率（中央银行的货币的利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97 这重新提出了一个问题：一般利率是如何规定的？第9章得出的答案是：规定一般利率的是对生息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我们现在必须识别出这些力量。

在需求方面，我们必须首先在对货币的两种需求之间做出区分——其一是*支付手段*，其二是*购买手段*。两者都与整个资本流通相关，却占据了这个过程两个相当不同的环节。在开展新的生产时对货币的需求与在实现已经创造的价值时对货币的需求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后者在过度积累的时期特别盛行，前者则一般出现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仍然高涨的状况下。这两种需求当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时

间上的间隔关系。当下对投资信用的需求很可能会导致后来对销售信用的需求。

不论把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还是支付手段，资本家都不是唯一对它有需求的经济主体。各式各样的需求都会从收益的流通中产生。工人和资本家都会寻求消费信贷和地产抵押融资（这些是购买手段），也都会试图在任何实际的交换之前就对他们所持有的某些资产加以货币化（这是支付手段）。对生息货币的总需求既来自资本流通，又来自收益流通。但这两种形式的流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倘若资本家手上有尚未出售的物品库存，让他们获得信用就会与扩大消费信贷发挥同样的职能（在经过了市场的中介之后）。若要使资本流通和收益流通得到润滑，若要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就需要信用。资本会产生收益，而收益最终必须经过流通回到资本那里，否则体系就无法得到平滑的再生产。生产中的实现与交换中的实现之间的根本统一必须得到维护。

因此，对作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不是决定利率的唯一因素，而是一揽子远远更为复杂的需求的一部分——这些需求是向信用体系及其货币基础提出来的。这些拆分十分重要。它们指出了需求的不同出发点和货币可能具备的用途的多样性。它们强调了生息资本的“正确”（从资本积累的立场来看）配置——它可以配置到生产、流通、交换、地主所有制、行政、消费等诸多活动中——是多么难以测定。它们指出了由于资本流通的总过程的缺口而引发失灵的可能性——但也只是可能性。它们更加具体地说明了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和各式各样的“颠倒现象”可能会如何在信用体系内部爆发，并由此毁灭生产与实现之间通过交换所达到的精致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应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最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对一个

事实产生了敏感：对信用的需求可以指示出积累的动态所处的相当不同的状态，从过度积累到收益流通所遇到的异常的堵塞全都包含在内。

生息货币的供给要服从一些同样十分复杂的决定因素。马克思认为，这种供给有一部分是资本积累的产物，有一部分是由“各种和……积累……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所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由看似完全独立的事件所造成的[31]（《资本论》第3卷，第507页）：

1. 一部分在积累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作为货币的剩余被产业家、商人、金融家、地主和国家所持有，而工人也可以用可变资本来进行储蓄。经济主体也许不会让这些剩余闲置，而会争取把它们作为生息资本投入流通。

2. 过度积累会产生过剩的闲置货币（从而降低利率），因为很少有机会能把货币作为一般资本来运用。

3. 银行体系有能力通过诸多技巧来发动货币——第9章已经描述了这种能力——因而可以引发“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借贷资本的积累[32]（《资本论》第3卷，第495页）。

4. 债务和虚拟资本可以逐渐作为借贷资本来流通，只要每个人都对经济的健康怀有信心就行——至少从短期来看，心理预期的状态对于私人约定的债务向社会性的货币形式转变的过程十分重要。

5. 如果所积累的货币具有随时可以用作生息货币的形式，分配安排和相关派系的相对权力就同样有可能对这些货币的数量产生戏剧性的影响。地主或许会压榨农民，国家或许会通过税收来占有一切阶级的财富，强大的金融寡头或许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把庞大的货币资源汇集到自己的掌控之下，如此等等。

6. 货币供给不寻常的波动（例如黄金流量的扩大或缩小，或者国家对货币的印刷）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或减少可以用来向生息货币转变的货币总量，直到价格的调整将这些影响吸收掉为止。

影响了生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具有杂乱的异质性，因而利率必定是高度不稳定的。我们不需要关注短期的波动——与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利率每天都在振荡，因为供给与需求在市场中要达到相互均衡。要紧的是长期的根本利率。有两种可能的机制也许会让原本杂乱的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获得某种外表上的秩序和连贯性。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种可能性：利率在“加入生产过程”之前就由“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所支配了——这场斗争关系到剩余价值的划分和资本的“价格”[33]（《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09页）。资本主义社会中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斗争的征兆。马克思丝毫没有否认它的重要性：重点是要确定它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根本利率大致反映了产业家与金融家的权力关系吗？假如这样想，就会把利率的决定因素的其他所有侧面（例如围绕收益的流通来决定利率）都下降为一种外围的、纯粹次要的角色。一般而言，马克思并不反对把直接的生产关系放到问题的前沿。然而我将证明，产业家与金融家之间不断的游击战以及资本与劳动围绕工资率所进行的斗争（见第2章）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种游击战归根到底不过是整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必然有助于使利率保持在均衡位置附近，而这个均衡位置是联系到持续的资本积累来界定的。产业与金融的权力关系的不平衡会强行造成对均衡的偏离，从而威胁到积累。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存活依赖于产业利益与金融利益达到某种恰当的权力

平衡。这是一条重要的结论，因为它表明金融资本的权力（不论这个权力集团是如何被制度化、如何被界定的）必定是一种受到约束的权力，永远不可能不受限制或者拥有彻底的霸权。

至于根本利率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黑暗中。唯一的可选项是联系到资本积累来设想一种均衡利率。这样一种均衡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实现）的活动与生息货币的流通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它运行在收益流通与资本流通必然交错的地方。恰好因为信用体系是一个集中的协调者，所以利率的变动必须有助于持之以恒地维护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

那么，为什么要花工夫如此细致地将影响生息货币的需求和供给的力量列举出来？答案极其简单。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出自一些极为不同的物质活动——这些活动也由此规定了实际利率——因而均衡利率只能在偶然中达到。不均衡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调节生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力
300 量，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如何扰乱了利率的均衡，从而促使经济远离了稳定的平衡增长，走上了推动危机形成的道路。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想要向我们交代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我将尝试重构他关于积累周期的学说，并说明利率的变动在积累的矛盾动态转换为特定形式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时如何起到了关键作用。

5. 积累周期

人们常说，马克思没有商业循环理论。[①] 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马克思探寻了资本积累、产业后备军与工资率之间的循环搏动的关系；他为产出的爆发式振荡和生产的各个部类

① 见斯密（1937 版）、威尔逊（Wilson）（1938）和谢尔曼（Sherman）（1967）。

之间的交换奠定了分析的基础；他为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总体上的时间节奏建立了一种综合模型（见第 6 章和第 7 章）。他关于固定资本流通的研究（第 8 章）也揭示了创新、扩大、更新和价值丧失的周期。问题在于把这些片面的见解融合成一种统一的关于时间动态的叙述。否则，资本主义看起来就仿佛受困于可能差别巨大的循环搏动，它们在经济体中穿行的方式仿佛也是令人困惑的。

利率的波动位于循环运动的中心，而且会将某种秩序的外表强加在后者身上。马克思拒绝把这些波动当作一种始因（primum agens）。它们是一种核心的中介联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是通过它们来表达的。这个观点恰好是他在研究了规定利率的力量之后所确立的。但我们还看到，利率可能会被各式各样武断而任意的特征所影响。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试图撇开产业循环的日常动态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货币问题和金融问题（《资本论》第 3 卷，第 358 页）。他转而为资本积累的一般循环进程构造了一种高度简化的叙述。他的意图是把握如下多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积累、技术变革、固定资本的形成、就业和失业以及工资率、消费者需求、虚拟资本的形成、信用货币的激增，以及最终在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危机期间向货币基础的回归。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解读《资本论》第 3 卷（第 26—35 章）来重构马克思的叙述。积累过程会经历诸多阶段：停滞、复苏、基于信用的扩张、投机狂热，以及暴跌。

（1）停滞

随着暴跌而出现的停滞阶段是以对生产的严重扼制和较低的利润率为特征的。价格会被迫下跌，因为生产者要按照低于生产价格的水平才能把剩余库存卖出去。失业到处都是，

工资一般也会下调。有效需求十分微弱，因为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和资产阶级的收益）减少了。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处于低谷（因为商品交换的体量下降了）。对信用体系的信心遭到了严重的动摇，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了，因为人们对未来收益的期望十分悲观。货币主要被用作价值尺度，还被用来把不相干的虚拟资本从经济中剥掉。商品的实际周转时间会急剧缩短，因为找不到可以延长周转时间的信用。不过，利率也很低；由过度积累产生的可贷的货币资本的过剩现在是显而易见的。货币资本的这种剩余与安全稳妥地运用这些货币的机会是相对的。

停滞的阶段一般是“温情的”技术调整的阶段（在宽泛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技术调整包括组织和制度的变化）；与危机相伴随的严重不景气则与此相反。这些调整会使得生产技术、使得生产价格的比例逐渐与平衡的资本积累相一致。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随后发生的就是扩张。

（2）复苏

在停滞的阶段中会出现诸多机会。工资和利率的下降把剩余价值的较大份额留给了企业利润，而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较低的价格。丧失了价值的资本（商品、固定资本、建筑物等等）可以用白菜价买到，因而减少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支出，降低了资本的价值构成。经受住了风暴的生产者通常会在流动性上赢得强势地位——他们可以用真金白银来支付账单。较低的利率和劳动力的剩余也为与长期的固定资本的形成相关的融资制造了最佳条件。

一旦大多数剩余库存都卖出去了，温和的扩张就开始了。这会让价格得以上升；由于工资仍然较低，剩余价值现在仍旧

会有较大的份额变成企业利润。利润率回升了，而这引发了商业信心的恢复。既然之前存活下来的商户在流动性上处于强势地位，谨慎的扩张也许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这些商户可以用自己的资金来支持生产的扩张。

由于对体系的信心有一些恢复，所以较低的利率也许会促成与某些长期的固定资本投资相关的融资（可能会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专注于这种类型的投资会扩大第 1 部类的就业，而且由于需要较长的生产期间，所以这种投资还会创造有效需求，却不用预先“提供任何供给要素”[34]（《资本论》第 2 卷，第 315 页）。这些有效需求会在消费品部门（第 2 部类）中被觉察到。两个部门之间的爆发式振荡倾向慢慢发动起来了。

产业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倾向于比银行家和金融家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的现金储备足以支持他们的扩张，也足以在相互之间提供商业信用，以便在截然不同的周转时间等问题面前确保生产的连续性。银行的借贷资本对于这个目的是不必要的。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某种大规模的固定资本的形成来吸收这些借贷资本，但这种吸收比不上自由货币资本逐渐扩大的供给——导致这种扩大的是所有阶级储蓄的增加、可以被银行转变为借贷资本的货币流量的增加等等。因此，利率仍然很低。

虚拟资本的数量增加了；但在这个阶段，新的提升通常关系到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投资，所提供的商业信用也受到实际流通的商品的紧密约束。这种类型的虚拟资本的创造既是必要的，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紧随其后的通常是资本积累的扩大。因此，它并没有给对健康的货币基础的维护带来威胁。

竞争在这个阶段是相对放松的。商户的自行融资会造成渐进的、不平均的积聚，许多差异巨大的实际利润率也可能会共存，因为要紧的是生产资本的循环。信用体系迫使利润率平均

化的力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强烈的显现。

收益的流通好转了，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需求也同样好转了。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加强了，消费品部门也逐渐在资本积累的活力中承担了主导角色。

（3）基于信用的扩张

对经济体系的信心到此为止一直在复苏。就业的扩大、工资的上升和资产阶级的收益的增加都预示了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收益的流通增强了，并由此创造了对一切类型的未来收益（地租、税收、地产抵押等等，以及企业利润）的乐观期望。

303 但前一个阶段零敲碎打的扩张现在揭示出了生产能力中的一大堆不平衡，从而揭示出了整个生产用具的投入和产出的瓶颈。与剩余的生产能力相关的一切痕迹现在都消失了。新的投资对于创造新的供给、特别是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供给表现出了必要性——这些要素包括原材料以及作为投入品和机器的半制成品。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调换到了对第 1 部类的投资，因为不变资本的价格随着供给的短缺而上涨了。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家为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的能力和在相互之间提供信用的能力被耗尽了，因为他们的现金储备达到了极限。他们被迫求助于银行和金融家；于是，后两者在面对产业资本时的权力就加强了。信用体系可以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总体上的协调者来一显身手了。对货币资本和流通手段的需求扩大了。这种需求本身引发了货币资本和流通手段的供给，因为对体系的信心现在还十分强大，甚至足以让债权得以作为货币资本的一种形式来流通。虚拟资本的数量逐步领先于实际的资本积累，作为实际的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与流通中的多种

形式的纸币之间的缺口也在逐渐变宽。

但是信用体系的权力在产业面前的增长还倾向于迫使利润率平均化（企业利润与利率的联系现在是非常有力的）。追求可贷资金的竞争变得更加尖锐了，利率也开始上升了。一旦劳动出现了短缺，产业家就会被推入为了相对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斗争。工资倾向于超过劳动力的价值。强有力的技术调整成了一种必要。我们目睹了“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这需要越来越多的借贷资本，并越来越牢固地使得产业为货币资本服务。但是企业利润只是未来收益的其中一种形式：为了吸引借贷资本，为了得到资金，产业家必须与土地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政府债务的经营者等等相互竞争。“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35]（《资本论》第3卷，第488页）

（4）投机狂热

基于信用的扩张导致了价格上涨，原因无非在于流通手段的总量现在远远凌驾于社会的劳动产品之上。不仅如此，失业也几乎消失了，而且工资率开始飙升——马克思评论说，劳动条件在危机前夕总是处于最佳水平。对工资品的有效需求依然强劲，但较高的工资现在逐渐减缓了资本积累，同时利率的上升也削减了企业利润。产业家陷入了“利润缩减”，拼命想办法在困境中为自己创造一条出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信用体系的辅助和怂恿，因为信用体系到此为止一直在助长生产和实现。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要的代价就是创造数量庞大的虚拟资本，为“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36]腾出地盘。

在这种投机狂热背后，均衡明显受到了深度干扰。部类之

间、生产与分配之间、流通中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与实际的价值产出之间的比例失调都在增长。资本的价值构成在迅速上升。劳动力并没有让资本积累得以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持续扩大，实际的剥削率也在下降。只有虚拟资本的积累可以粉饰这些裂痕。投机泡沫的爆裂只是时间问题。

（5）暴跌

危机的开端通常是由一次触目惊心的破产来触发的——这次破产动摇了对虚拟的资本形式的信心。由此引发的恐慌立刻把人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诸多信用货币的品质上面。向“天主教”式的货币基础的回归以复仇的姿态开始了。一旦生产者和商人竭力要偿还自己的债务，那么种类合适的货币——即受到货币商品紧密约束的货币——就会马上出现慢性而长期的短缺。利率爬升到了“高利贷极限程度”[37]（《资本论》第3卷，第360页）。先前延伸开来的支付链被破坏了，资本流通也暂时散落为千百个不相连的碎片。乍一看，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因为问题仅仅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38]（第490页）。对流动性的需求会迅速上升：

> 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39]（《资本论》第1卷，第138页）

商品资本的流通所受的干扰使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变成了唯一安全的财富形式。为了寻求建立价值的现实基础，商品

形式的资本被毁灭了：

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40]（《资本论》第3卷，第483页）

大群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岗位，工资率陡然下坠，收益的流通也遭受了慢性而长期的干扰——这是对资本流通的破碎做出的反应。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破灭了，价格也崩溃了。“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41]（《资本论》第3卷，第516页）

资本和劳动者的价值丧失都在飞速进展。资本家企图通过相互吞并来活命。劳动者同样被献到了祭坛上——这座祭坛就是资本主义背后的不合理性。危机对经济体系进行了不合理的合理化，凶狠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景观中一路碾了过去。

6. 关于货币管理的政治

对积累周期的这种“拆卸”式的叙述揭示出了一些以紧密交织的方式彼此联结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存在于就业与资本积累之间，技术变革、再投资率与竞争状况之间，不同部类的生产与实现之间，资本流通与收益流通之间，生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产业资本家与金融家的相对权力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作为社会劳动的尺度的货币之间，最后是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表达的商品

之间。[①] 我的意图是说明资本主义的诸多矛盾会如何在动态的序列中相互联动、相互累积，并由此产生积累的初始激增和最终结局：资本和劳动双方的残酷的价值丧失。

然而，资本积累的实际历史进程是一桩远远更为复杂的事务。首先，它会被形形色色看似不相干的情况所影响——这些情况包括战争、革命、歉收、干旱等等。其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身的结构有无数微妙之处。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可以在危机的进程中实质性地改变工资率的调整方式以及技术变革的步伐和方向。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一体化改变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资本的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也可能会为积累过程注入特别的转折。这类复杂情况使每个周期都变得独一无二。马克思显然试图抽离这些巧合的特征，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将追随他。

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专门加以考察。那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积累周期的作用。倘若不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完整的分析，就很难讨论这个问题。[②] 但在这里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国家机器的某些方面——比如中央银行——必定要处于民主的控制之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尽管是以非常笼统的方式——资本的价值丧失在哪些情况下才得以在通货膨胀中转化为货币的毁灭。

要调节社会中的货币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某种普遍

① 卡莱茨基（1971）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商业循环的早期作品大量利用了马克思，却得出了与凯恩斯相近的结论。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总过程的动态建立模型这个大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提出来了；自那以来，它在有数学爱好的学者那里就一直是兴趣的焦点。见谢尔曼（Sherman）（1967）、魏斯科普夫（Weisskopf）（1978）和森岛（1973），后者的研究是高度数学化的。

② 货币和金融的问题是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当中的？在这方面最好的研究之一来自德布伦霍夫（1978）。

接受的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来约束它。这样做的劣势在于，社会劳动的价值会被生产黄金的具体劳动条件所约束。倘若后者有了变化，社会劳动在价格上的一般表达也就会变化。马克思并没有为这个问题花过多的工夫。他认为，黄金的供给即使偶尔会激增（例如在1849年的“淘金热”之后），也只会产生暂时的冲击，然后就会被价格的调整所吸收（《资本论》第1卷，第98页）。

一旦把铸币、代币、纸币和信用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引进来，国家就卷入了对货币的调节。国家发现自己被拖进了关于货币管理的政治活动，甚至可能要采取某种积极主动的立场，不论自己是否愿意。[①] 例如到了18世纪，参与资本主义商业的主要国家都会有意识地推行使各自的通货贬值和升值的战略，因为它们要无休止地谋求商业的和政治的优势。重商主义学说反映了这些实践。羽翼丰满的信用体系的兴起和以法律为后盾的虚拟资本形式的创造都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尤为深远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第9章看到的那样，保卫高品质货币的任务最终被移交给了某种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有权力设定其他货币兑换为自己的货币所需的条件，所以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调节市场利率（《资本论》第3卷，第542页）。它无法任意行动。它所受的制约包括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黄金储备和在世界舞台上与某种超国家的货币的其他联系。我们还必须提到马克思的一条规则：“中央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42] 这意味着当中央银行要回应货币

307

① 德布伦霍夫（1978，1979）给出了一些背景，维拉尔（Vilar）（1976）则构造了一份让人着迷的历史研究。

市场的压力时，这些压力只能源自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体系中心。不过，它做出回应的方式也很重要，因为中央银行所做的决定（或通过立法硬塞给它的决定）对于循环振荡的减弱或加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度积累的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价值丧失。危机一开始往往表现为货币危机，而这正是由顽固不化、刚愎自用的中央银行强加给社会的。

当中央银行用金本位来紧密约束自己的货币时，它是几乎没有丝毫回旋余地的。一旦所有资本家都想在高品质货币中寻求庇护，有限的黄金储备就会迫使中央银行把利率提升到“高利贷极限程度”。当其他货币向黄金的可兑换性被永久（而非暂时）中止之后，中央银行货币的数量和这种货币的利率就可以变成政策工具了。中央银行的“技艺”就是用这些政策工具来尝试使资本积累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进程保持稳定。同时，中央银行的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分隔也在形式上产生了持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更加详细地讨论这种可能性。

7. 通货膨胀：价值丧失的一种形式

通货膨胀的阶段和事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大量存在。任何对这些现象的全面解释都必须内嵌于一种完整的关于价格决定方式的理论。显然，价格有可能由于一大堆不同的原因而上升或下降。[①] 我们如果撇开任何经济体系都会承受的各种随机的冲击——收成不佳、战争和关于战争的流言等等，也撇开市场价格的无休止振荡——这些振荡是同需求与供给在市场

① 马克思对图克（Tooke）关于价格变动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抱有令人惊讶的尊重——这个主题从此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经济史的焦点。

中的均衡相伴随的，就可以识别出诸多力量，它们影响了各种商品根本性的生产价格的变动。

为了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斗争应该会提高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价值生产率，从而使商品变得廉价（《资本论》第1卷，第319—320页）。若能在更加肥沃的土地上扩大生产，为原材料开辟新的来源，找到更加廉价、更有可塑性的劳动力，以及减少流通成本（特别是交通成本），加起来就是一整套倾向于迫使价格下跌的力量。与这些力量相对，我们又必须列举出与自然资源枯竭相联系的成本的上升、交通拥堵和生产用具的其他瓶颈、劳工的阶 308
级斗争、不断增强的垄断等等。价格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平衡所决定的——这些力量具有难以置信悬殊的差别和特殊性。

然而，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情况是一种更为简单的逻辑。[①] 马克思对积累周期的研究表明，价格在停滞的阶段被压低了，随后会逐渐上涨，并在兴旺的时期加速攀升。在暴跌时向货币基础的回归则会迫使价格发生崩溃。倘若构造一种更加灵活的货币基础，不是用货币商品来约束它，而是让不可兑换的、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在危机期间得以印刷，那么价格在这种时候的下降多半就可以得到制止。

这样一种政策与它的对立面——允许商品的价值跌入绝境，以便使高品质货币保持完好——相比，表面上仿佛完全是

① 令人惊讶的是，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在基础上令人惊讶地薄弱。哈维（1977）和罗索恩（1980）是基本的阅读材料，雅各比（Jacobi）等（1975）则评论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诸多马克思主义思路所带有的一些问题。谢尔曼（Sherman）（1976）、斯威齐与马格多夫（Magdoff）（1972）、德布伦霍夫（1979）、法恩（1979a）、马提克（Mattick）（1980）和曼德尔（Mandel）（1978）都试图从相当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合情合理的。但它违背了马克思的规则，即价值的实现无法通过单纯增加货币的供给来完成（见第3章）。它还意味着货币必须抛弃作为社会劳动价值尺度的作用。进一步讲，倘若有一种观点以为资本主义严重的危机倾向——我们在第7章概述了这些倾向——出于某种原因可以被这样一种政策所驯服，那就显得有些荒唐了。可能发生的事情至多是危机所采取的形式改变了。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让我们回想一下过度积累的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与使用资本的机会相比，过多的资本被生产出来了，因为个别资本家——驱动他们的是竞争和通过剥削劳动力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的企图——所采取的技术会驱使经济远离平衡的增长路线。这种不均衡还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就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社会中的潜力而言，生产价格——它们是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来形成的——会给出错误的价格信号。此外，由于虚拟资本在实际的积累之前就被创造出来了，所以这种根本性的不均衡有遭到掩盖的倾向。

虚拟资本和投资于虚拟资本的生息资本在危机的进程中很有可能被毁灭，而价值丧失对如下流通过程之内的任何一个状态中的资本都可以造成冲击：

$$M - C\left(\begin{matrix}LP\\MP\end{matrix}\right)\ldots P\ldots C' - M'\text{（等等）}$$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中央银行货币的扩大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309 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来看，倘若从商品或所有权证书（虚拟资本）向货币的转变——这里的价格要让平均利润率得以实现——越来越困难，过度积累的第一个征兆就出现了。*C–M*这个过渡始终是困难的，因为它所涉及的运动是从一种特定

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或所有权证书）到社会权力最一般的存在形式的运动——后者就是货币。阻碍这个过渡的似乎是有效需求的缺乏或可支配货币的短缺——这两者是一回事。个别资本家和其他金融主体（私人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信用来绕过这个困难。资本家收取的是与尚未卖出的商品等价的货币（还包括附带的平均利润率）。级别较低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会迅速扩大。于是，中央银行会受到一种压力，即扩大高品质货币的供给。倘若中央银行满足了这个要求，总的流动性看上去仿佛就可以得到保持，同时价值在交换中的实现所面临的一切障碍仿佛也都被移除了。

不幸的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以有诸多使用方式。它可以滋养虚拟资本的流通，从而使投机狂热高涨。它也可以转变为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对所有权证书的有效需求）。凯恩斯坚持认为，后者对经济的稳定而言比前者更加重要；他试图通过特定的财政政策（而非纯粹的货币政策）来引导有效需求，以此来促进稳定，而不是加深不均衡的倾向。以下是这个观点的一个简化版本。在萧条的时期，国家可以实行预算赤字——这种赤字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借债来偿付——由此创造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尽管有效需求的提高解决了交换领域中的实现问题，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的增加——它的供给并没有任何相应的增加——会迫使利率升高，可能还会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这会对工业和商业的经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虽然对银行资本明显没有影响），还会强行推动价值丧失，而国家的政策最初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价值丧失而设计的。然后，有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增加高品质货币的供给，以便使利率回落。中央银行如果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就可以有助于避免商品的价

值丧失。[①]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战略同时还促进了虚拟资本的实现。例如，倘若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引来了大量投机活动，对住房不断扩大的有效需求就会使这种投机保持旺盛的生机，同时也会增加对砖头、木材等商品的需求。对虚拟资本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用自己的虚拟资本（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存量的增加）代替了大量由私人持有的、散布在信用体系中的虚拟资本。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由此创造出来的虚拟价值是否能在资本流通的后续阶段中得到实现。

既然 C–M 这个环节得到了成功的，尽管还是成问题的解决，负担就转移到了货币身上：倘若它不能在“正常的”期限内重新投入流通，它本身就会遭受价值丧失。这些货币有三种可能的用途。

1. 再投资到生产当中的货币必须跨越一条分界线：

$$M - C \begin{pmatrix} LP \\ MP \end{pmatrix}$$

M 的增加会提高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并扫除两者供给的任何剩余。这会给价格带来上行压力；在危机的语境下，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下跌决不会像原本应该下跌的那样多。“技术的不景气”也绝不会像正常情况下那样剧烈，而且生产者甚至有可能受到一种压力：继续进行技术调整，并使调整的模式更加符合扩张阶段而非收缩阶段的特征。例如，工资

① 哈里斯（1979）指出，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了同一种根本性的货币理论，它本质上是一种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始终包含一种强烈的货币主义视角，因为中央银行必须起到恰当的作用，否则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就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把货币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划分开来的是在规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时，国家可以获得何种程度的自主权。

的下跌可能不足以刺激人们回到劳动密集型的业务。资本的价值构成在这些状况下不太可能回到均衡位置。

2. 货币的投资对象可以是占有，即购买未来收益的所有权证书（土地、股票、政府债务等等）。国家所创造的虚拟价值最终只会增大经济体中由私人持有的虚拟资本的数量。于是，这些虚拟资本如何通过生产来实现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了。

3. 资产阶级可以将一部分额外的货币挪用到自己的消费当中。这会增加对奢侈品的需求，因而又会抬高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需求。

因此，国家额外投入流通的货币必须在某个时刻通过生产来实现。这确认了马克思在研究剩余价值的流通时得出的一项根本性的发现（《资本论》第 2 卷，第 17 章；参见前面第 95—96 页）：交换领域中的实现最终是以生产领域中的进一步的实现为前提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的基本论点：过度积累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就生产中的技术搭配而言（包括资本的集中程度、垂直整合等等），它的建立所经历的过程确保了它与进一步的平衡积累是不一致的。在交换领域中创造额外的货币不会给这些过程带来任何改变。印刷货币也无法纠正这个问题。价格信号的扭曲实际上使不均衡变得更糟了。不景气的力量若能充分发挥，就可以促使体系回到一种按照资本的价值构成来衡量的均衡位置，但这种力量被抑制了。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得到了鼓励，但它们会破坏体系的稳定。过度积累的趋势很可能会增强，而不是受到制约。

面对过度积累的迅速发展和虚拟资本数量的螺旋上升，倘若个别资本家和其他的私人主体继续在相互之间提供信用，继续把由中央银行印刷的货币作为后盾，那么信用体系疯狂的方

面可能就要横行霸道了。以国家为后盾的货币原本要为社会必要劳动充当一种坚固的尺度，现在却脱掉了任何这样的伪装。既然货币几乎无法对资本家实行规训，那么除了竞争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任意提升价格了。他们在交换中实现了利润，尽管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正在衰减。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不堪一击的。普遍化的通货膨胀出现了，不均衡的根本倾向也变得更糟了——除非有起反作用的力量登场（比如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或中央银行对恢复货币纪律必要性的自觉认识）。

然而结果是：商品的价值丧失可能会在通货膨胀中转变为货币的价值丧失。我们必须重申，这并不是通货膨胀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而且任何强烈的通货膨胀——作为实际历史的一段插曲——都可能是诸多不同力量的产物。我们对这里考察的这种通货膨胀进行了一种非常具体的解释。

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化同时也意味着与过度积累相伴随的价值丧失过程的集中化和社会化。我们应该注意到，价值丧失最初只是私人的事务（个别公司破产了；特定的商品一直卖不出去），最后却具有社会性的影响（失业、收益流通的减少等等）。通货膨胀最初是一桩社会性的事务，却具有私人的、特殊的后果。因此，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化具有某些技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值得加以探讨。

第一，价值丧失的社会化会减轻特殊事件对积累循环的基本节奏的影响。个别公司的破产——原本可能会带来损失——
312 可以得到避免或吸收（例如通过政府的“救助”），由此产生的成本分散到了整个社会头上。这类事件使整个体系轰然倒塌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第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价值的不断丧失”（见第7章）可以转变成一种“温和的”、不断的通货膨

胀；一些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平衡的增长——价格结构的转变会为有计划的淘汰和新的投资给出信号。第三，积累过程中微小的振荡可以得到控制，有时甚至可以受到操纵，并为短期的政治目的服务（后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政治性的商业循环”，即在选举前夕使用货币政策来制造经济中的虚假兴旺）。[①] 然而，虽然在危机的短暂痉挛中，价值丧失的温和发作有时也会造成极其凶狠的打击，但这些发作的代价可能会变成通货膨胀在若干年间的温和涌动，从而得到减轻和分散。

价值丧失在通货膨胀中的社会化还把过度积累的影响即刻分散到了全体社会阶级当中。但对这些影响的感受绝不是相等的。分配的后果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马克思指出，金和银在16、17世纪的贬值“贬低了”与资本家相对的“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从而有助于货币权力在资本家手中的积聚[43]（《大纲》，第805页）。“在同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期间”，“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倾向于“保持不变”，而这会使他们在这些时期的购买力“相对下降”[44]（《资本论》第3卷，第491页）。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在价格紧缩的时期——这是由于向货币基础的回归而发生的——很可能会获利，但在价值丧失转化为持久的通货膨胀时则会受损。

通货膨胀还倾向于将储蓄者的货币权力再分配给债务人，因为后者是用贬值的通货来清偿债务的。然而，这种现象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利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利率时，按实值计算的利率就是负的。负的实际利率表示货币储蓄遭受了全面

① 就政治对商业循环的操纵而言，最早看出这种可能性的大概是卡莱茨基（1971）。博迪（Boddy）与克罗蒂（Crotty）（1975）在“利润缩减”理论的语境下——我们在前面第52—54页拒斥了这种理论——讨论了这个观点。

的价值丧失。倘若名义利率是随着货币资源的变化而变化的，大资产阶级的储蓄就有可能在通货膨胀的铁蹄下得到维护，工人阶级的储蓄则有可能丧失价值（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508页）。

最重要的是，价值丧失向持久通货膨胀的转化让资本家得以实现一个心仪已久的目标。马克思评论说："资本家阶级……永远不会反对工联，因为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
313 终可以像他们现在不过偶尔……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45]（《资本论》第2卷，第340页）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货币商品的严格纪律就必须让位于一种更加宽松、更加灵活的做法：由国家创造不可兑换的纸币。倘若国家能处理好有效需求的问题，并同步扩大货币的供给，那么个别资本家即使面临剩余价值生产的衰落，也可以简单地通过调整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来使利润率保持稳定。市场中唯一的短期限制是与价格相关的竞争。由于垄断、寡占和"领头定价"（price leadership）这些行为的发展，与价格相关的竞争也会减弱。出于这个原因，通货膨胀在"垄断资本主义"当中经常被归咎于公司的行为。这些行为具有重要的辅助性影响，但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这种通货膨胀具有远远更为深厚的根基：即从商品的价值丧失到货币的价值丧失的总体转化。

阶级斗争在通货膨胀中会有戏剧性的变化。对工资的削减很难直接实施，而且一般会引发工人阶级非常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回应。在普遍化的通货膨胀中，雇主可能会做出让步，使名义上的货币工资得到增加，由此减轻工人直接反抗的强度。至于实际工资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完全取决于通货膨胀率，而且个别资本家可以宣称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责任。于

是，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就在通货膨胀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战略只要成功了，就会让资本家得以通过减少实际工资来达到更高的剥削率，由此与过度积累的问题相抗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描述的调整工资的机制（见第6章）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家甚至也许有可能借助通货膨胀来管理对工资的调整，而不用求助于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这条曲线描绘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的意义是它仿佛为政策制定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目标。①

结果，与名义工资相关的斗争逐渐转变成了与实际工资相关的斗争。于是，工人发现自己在两线作战。他们在工资契约中谋求严格的关于生活成本的条款，以便防止价值丧失的代价在通货膨胀中落到自己身上。我们从中可以推出一种关于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理论，它把价格的上升归咎于贪婪的工会。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理论语境下，这种理论只在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由于工人的阻碍，通货膨胀无法使劳动力遭受惨重的 314
价值丧失，因而过度积累无法得到纠正。但是工人也必须面对一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初正是它们让价值丧失得以转化为通货膨胀的。阶级斗争的焦点可能会从资本与劳动的直接对抗转变为工人与国家的对抗。后者由此就成了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保护伞。在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帮助下——这种帮助并不那么含蓄——通货膨胀甚至可能看起来仿佛起源于没有效率、没有成效的政府，起源于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① 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一种经验性的观察结果：工资率的增加与失业的水平之间至少在数年中存在一种反向关系。这一点随后被变本加厉地当作一条普遍的理论命题，即失业的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一种权衡。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失业和通货膨胀一同增加——使这整个论述遭到了质疑（见法恩，1979a）。

就直接的起因而言，这种责难是正确的。它所忽视的是阶级关系的根本结构，因为最初正是这种结构产生了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危机。

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变似乎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以缓解直接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形式所带来的压力，甚至可以减小使工资率达到均衡所需的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它还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在所有阶级中社会化了，而国家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这种社会化提供了盾牌。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以夺取国家权力为导向的阶级联盟的形成。通货膨胀平息了冲突，因为它扩展了冲突，并把冲突重新聚焦到了国家头上。

但是通货膨胀无法纠正过度积累的趋势。如果说它做了什么事情，那就是减轻并推迟了过度积累的影响，从而加深了问题。国家的政策让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得以不断累积，直到它具有了猛烈爆发的可能性。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了非生产性的虚拟资本的重负，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也逐渐削弱了（这会造成本国的通货相对于世界货币的价值丧失），价格结构也变得极其不稳定，从而丧失了它们作为协调的力量所应有的连贯性。最重要的是，对生产的合理化——这是过度积累的唯一解决方案——无法得到恰当的发动。简言之，即使价值丧失在通货膨胀中社会化了，过度积累的问题也不会飘然离去。

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人们为通货膨胀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它们全都要求国家的参与方式做出某种基本的改变——这种观察十分有趣。

第一，国家可以为经济体重新建构一种严格的货币基础。这种货币基础虽然未必要由一种货币商品来约束，但是确实意味着货币政策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会迫使利率上升），意

味着政府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会减少，还意味着让原始的市场力量得以发动起来，而这些力量会使商品和劳动力丧失价值。国家可以按照传统来推行一场萧条，它的作用是转换生产用具的结构、消除过剩的虚拟资本、规训劳工等等。

第二，国家可以对工资和价格实行控制，或者试图通过某种收入政策、通过与劳工的“社会契约”（这通常相当于使劳动力遭受某种经过谈判的价值丧失），以及通过面向产业的投资战略来给通货膨胀降温。这类干预必须与货币的和财政的约束相伴随，否则就没有机会见效。货币主义者认为，这类政策仅仅扭曲了价格信号，由此摧毁了恢复资本积累所需的任何恰当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意这个判断；唯一的例外是一种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国家所实行的价格结构、所设立的投资战略能使资本的价值构成保持稳定。这种情况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国家的政策这个代理人来遭受一种有阶段、有组织的价值丧失。

第三，国家可以与资本勾结，尝试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并指望由此压低价格、抵消剧烈的通货膨胀。有人认为，通货膨胀的根基在于未能提高生产率。我们在这里采用的理论则指出，最初引发过度积累的正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语境下不受控制的、不平衡的发展。通货膨胀既然是从价值丧失转化而来的，就无法通过一种不分轩轾地提高生产率的计划来纠正。国家可以尝试改变技术搭配（迫使企业合并、为某些部门提供特殊的税收鼓励、由国家对研究和开发进行资助等等）。但它若要纠正过度积累的问题，就无可避免地要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强加到资本和劳动的某些部分身上。由于这类纠正要求国家对生产用具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所以它们尽管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而言也很难说是

良好的预兆。

虽然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在短期内确实可以借助通货膨胀来避免，但是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倘若商品没有丧失价值，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无法得到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为了回应过度积累，资本可以使货币或商品（或两者的某种混合）丧失价值。但只有商品的价值丧失——包括劳动力的价值丧失——才能强行推动一种结构转换，让资本积累得以恢复平衡。

由于在资本主义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关系的约束，现存的各种经济选择是极为局限、令人丧气的；也许没有什么现象可以更好地证明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不合理性了。一个更为重大、更为广阔的选择是：要么维护这些阶级关系，要么消灭它们，从而一并消灭由它们产生的矛盾。

8. 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316 本章有两种金融资本的概念在运作。第一种是关于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概念；第二种是关于资产阶级内部一个制度化的权力集团的概念。两种概念本身都不是完全充分的。我们现在必须争取把它们合在一起。

从表面现象来看，有组织的金融权力令人印象深刻，看似高深莫测，而且使人畏惧。金融体系被笼罩在神秘中，而神秘是从十足的复杂性中诞生的。它涵盖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央银行、遥远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互联动的各种金融市场所构成的复杂整体（其中有股票交易所、商品期货市场、地产抵押市场等等）、代理人（经纪人、银行家、贴现业者等等）和机构（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商人银行、信用合作社、储蓄银行等等）。最重要的是，它包

含了一连串强大得难以置信的私人银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France's Credit Agricole）、英国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银行家及其同伙在巴塞尔、苏黎世、伦敦、纽约和东京来回穿梭。明显会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决定是在国际会议上做出的；这表明世界的银行家实际上不仅控制了个人的生活（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而且控制了哪怕是最大的公司和最强有力的政府。国家的一个方面——中央银行——由于致力于保护货币的运行，所以甚至一向都逃脱了民主的控制；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上述形象就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

在货币权力的十足分量面前——这种权力既存在于这些机构当中，也存在于运营这些机构的精英的老谋深算当中——普通公民倘若堕入一种彻底畏惧的状态，那也是可以原谅的。金融体系是神秘的，通过这个代理人来运行的力量是强大的——谜团就这样产生了。这个谜团为阴谋论提供了便利的温床——对世界分而治之的阴谋、为全球性的统治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如著名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由包含多家银行的强大的阴谋集团所执行的计划、巨型公司及其政治代表等等。

科学的任务正是使这一切不再神秘，是把穿流在金融体系的血脉中的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出来，是揭露这种控制力量背后的内在的脆弱，尽管它在表面上仿佛拥有彻底的霸权。若要恰当地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巧妙地将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融合起来。

正统的经验研究一般会陷入僵局，会败给一些看似无法解决的谜题。例如，倘若一名头脑中充满阴谋的精英拥有极大的权力，众多可以对资本积累进行微调的精致工具对于他都

触手可及，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周期性的一头栽进危机的滑行？
317 或者换一条思路：既然金融家公然卷入了唯利是图的、过度的
占有，还卷入了疯狂的投机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寄生行为，而这
资本的限度 只会促使社会坠入突发的混乱和无序，那么他们如何又能在有秩序的积累过程中——推动这种过程是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它运行起来的则是整个阶级的共有资本——同时表现为头脑清醒的守护者？

只要把金融资本看作生息资本的一种充满矛盾的流动——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概念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总体看法，即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就会有助于穿透这些僵局，解开这些谜题。它会帮助我们理解当“金融资本”被视为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权力集团时所产生的不稳定格局，或者说——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它会帮助我们理解研究者最初在为“金融资本”寻求一个前后一致的界定时所经历的困难。它还将进一步说明第 5 章首次谈到的一个话题：资本主义的组织转型的动态。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

（1）作为金融家和货币资本家“阶级”的金融资本

控制货币流动的人——货币在生产面前是外在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了战略性的地位。若要把这种战略性的地位转变成一种现实的权力基础，首先就需要把货币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集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发生。第一，少数富裕得不同寻常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将社会中的大量货币权力积累到自己手中。第二，少数强大的机构可以控制分散在无数个人手中的货币权力，因为单个的人是缺乏力量的。当少数富裕的家庭——比如梅隆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492 拥有大多数货币财富、并强有力地参与到对其余的人的控制当

中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一就在生息资本流通的战略中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为金融资本给出了第一个初步的界定。①

然而，这种权力需要恰当地执行协调的职能，而这与它在战略中心的过度集中是不一致的。金融部门内部必须保持竞争，否则对利率的调整就没有办法回应资本积累，货币资本也无法自由流动，无法避免垄断行为一般会引起的偏差。然而，金融部门内部的竞争有诸多形式。有时它表现为金融帝国之间的激烈的争斗；有时它是从一些社会机制中产生的，这些机制在资产阶级内部维持了货币权力的广泛分散；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由法律的规定所保证的，这些规定包括将某些机构限制在某些种类的活动（例如住房金融）之外，为经营的地理范围划定界线（例如，美国对跨州的银行分行进行了限制），甚至就特殊种类的金融机构可以持有的资产组合而言，法律还规定了管理这种资产组合所需的基本条件（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通常是在这些约束下经营的）。至于货币权力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体系中实际上存在于何处，则往往有一定的含混。例如，当今的许多货币财富是以退休基金的形式积聚起来的，而这引起了一场不太有趣的关于“退休基金的社会主义”的辩论（这种观点认为，多数民众凭借退休金的储蓄而在社会中拥有了较大比例的虚拟资本），还引起了一场现实的、非常激烈的争斗，这场争斗的目的是控制由退休基金代表的货币权力。同样，大量货币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未必意味着这些少数人会主动控制这些货币的使用。他们也许会试图把自己的财富分散到各种各样的机构当中——这些机构的经营是与他们相

① 列宁在某个地方怀疑这个界定是否充分［见丘奇沃德（Churchward），1959］。这个初步的界定也为菲奇（Fitch）与奥本海默（Openheimer）（1970）的视角提供了基础。

独立的——以便规避风险。

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彻底的碎片化和分散化也是有害的。纸币的品质最好由拥有垄断权力的中央银行来保证。倘若未能把货币权力集中起来，这就同样充当了一道障碍，阻碍了从货币向资本的转变和后续的资本积累——因为积累依赖于资本集中。资本主义可以按照公司和集团的形式来进行迅速的重组——我们在第 5 章看到，这些步骤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是必要的——但若不能同时改变把货币权力集中起来的能力，这种重组就无法发生。

因此，集中与分散的张力在金融权力集团内部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明显（见第 5 章）。这一点可以通过诸多方式来证明。例如，它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什么展现出了高度分散的、看似混乱的金融体系（使这个体系保持运行的是花样百出的、零敲碎打的立法，制定这种立法的资产阶级一直间歇性地试图抵抗过度集中的威胁），同时美国的特色又是货币财富在少数家庭中的极度积聚，而这些家庭是借助少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来经营的。[①] 它还有助于解释银行为什么在某些舞台上要相互竞争，同时在另一些舞台上又要形成联盟和财团，时常还要形成阴谋集团，以便把充分积聚的货币权力汇集起来，并在为资本积累提供资金时就一些大规模的、长期的方面做出应对。
319 制度结构和金融实践的改组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中，从而制造了大量困惑。这些困惑和矛盾如果被看作生息资本的流通本身中根本张力的物质表达，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它们不过是一种根本性的要求所具有的表面现象，这种要求就是在金融体系内

① 多姆霍夫（Domhoff）（1978）和蔡特林（Zeitlin）（1974）关于这一点提供了详细的信息。

部使集中与分散达到平衡。

（2）作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统一体的金融资本

由希法亭提出的、大体上为列宁所接受的金融资本的概念关系到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这种统一是选择性的，因为只有在大银行和庞大的产业企业所构成的基础上才能把金融资本限定为一个独特的权力集团。出于这个原因，金融资本的概念——特别是在列宁手中——在一定的时候会与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不知不觉地、不分轩轾地合并起来。

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肯定是一种充满压力的统一，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很明显，倘若脱离了对银行服务的广泛使用，大公司当然就无法开展自己的业务，而银行当然也极度渴求掌控大公司所产生的巨大的货币流量。在这个意义上，大规模的银行资本与公司资本对于彼此都是必要的；它们存在于相互共生的关系当中。假如这就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统一体的全部含义，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希法亭和列宁都指出了更多的东西：他们断定这种统一是一种初步的统一，它统治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并把世界瓜分为多个区域，使它们屈服于少数大银行和大公司的共同权力。

把金融资本作为一种流动来分析可以揭示出金融运作与生产剩余价值的经营之间的根本性统一和对抗。资本积累的循环表明——假定国家没有进行主动的干预——权力的平衡在循环的进程中会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变换。不断变换的平衡反映了商品与价值的货币表达在积累过程中的相对分量。在早期的上行阶段，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产业资本，因为要紧的是商品。在后来的繁荣阶段，相互统一的产业利益与金融利益推动了基于信用的商品价值的扩张。在危机时，货币就是

一切，银行仿佛将产业资本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因为过剩的商品无法转变为货币。但是银行本身也有可能倒闭，因为对高品质货币的需求（对黄金或中央银行货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供给。在危机深重时，谁掌握了终极的货币，谁就拥有权力。

或然的事件和外部的干预——特别是政府的干预——会
320 大大改变资本积累的循环。但就资本的商品形式与货币形式的统一和对抗而言，各种模式的变换并没有被消除。它们不过是转化成了新的格局。它们会继续为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权力关系变换提供基础。换句话说，组织安排、制度安排连同经济主体的实践都必须被看作积累过程的产物，这种过程只可能通过一种方式来前进，即货币与商品在资本——“运动中的价值”——这个统一体内部无休止的对立。把金融资本看作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统一在原则上是不容反对的，不过这种统一应该被看作一种内化了张力、对抗和矛盾的统一。

这留下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矛盾是哪些特定的方式被内化到特殊的组织结构当中的？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个大规模的集团公司。许多金融运作都被内化到了公司当中，看上去还与生产相互统一，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是欺骗性的。大公司被迫要把竞争的机制加以内化，否则就无法存活（见第 5 章）；同样，它们也被迫要维持金融与生产的分离。这为公司内部的冲突开辟了前景——这种冲突直接回过头来关系到资本的货币形式与商品形式的对抗。然而，控制权的一体化为公司在危机期间的存活或在繁荣时期的扩张提供了别样的战略。金融诡计——收购、合并、资产拆卖（asset-stripping）等等——与在生产性经营中的投入同样重
496 要。因此，公司之间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具备了一个全新的

维度。但是根本问题不会因此而改变。倘若所有公司都企图通过纯粹的金融诡计来存活，却没有加强生产或对生产进行结构转换，那么资本主义就时日无多了。斗争的表现形式改变了，就像制度框架和组织框架也改变了一样，但是背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我们必须从一个有些类似的角度来看待一场略显尖刻的辩论：是银行控制了公司，还是公司控制了银行。[①] 控制权实际上是如何建构的？这一点绝不是显而易见的。形式上的界定（例如一定百分比的股份）极少能把握无休止地变换的实践。由于资本积累的过程无一例外地产生出了多个阶段——有时商品是多余的、货币是短缺的，有时却相反——所以我们必须预计到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权力关系会发生无休止的变换。从这个立场来看，若要在一种充满矛盾的过程面前建立组织上的统一，那么把公司的高层放进主要银行的董事会、并把银行的总裁任命为公司的董事似乎就是一种无效的尝试。

但在这里把问题丢下也是错误的。控制模式的变换——银行控制公司或公司控制银行——还必须被看作一种不断的探索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过程的目标是一种可以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面前加强它的存活能力的组织形式。市场价格的无休止振荡对于均衡价值的确立是根本性的；在恰好相同的意义上，若要在金融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建立均衡的关系，以便最好地适应于积累过程的每个特殊环节，那么控制权的平衡在银行家与公司之间的无休止振荡就是必不可少的。占据了战略中心的“阶级”——这种战略中心结合了金融与生产——

① 见菲奇（Fitch）与奥本海默（Openheimer）（1970）同斯威齐（1971）之间的交流。

在给定的情境中也许可以得到清晰的界定；但它肯定仍然是一种不稳定的格局，因为在它上面运行的是相互矛盾的压力和要求。①

因此，希法亭所提出的统一的金融资本概念必须被评判为一种过于单边、过于简化的概念，因为他并没有讨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一体化是以何种特定的方式把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加以内化的。他所能做的至多是从非常笼统的、不具体的角度来断定金融资本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仅仅有助于加剧这些矛盾。他未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3）金融资本和国家

在中央银行的层次上，金融资本——无论怎样界定——是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直接整合起来的。但是国家一般会通过远远比这更为宽泛的一系列活动来影响生息资本的流通，并与这种流通相关联。国家规定了法律的和制度的框架，往往还设计了一些高度差异化的渠道，生息资本可以借此在不同的业务中流通——这些业务包括消费者债务、住房金融、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往往会规定利率的差异，或者对信用进行直接的配置，由此就可以沿着不同的渠道来调节生息资本的流动。货币财富和控制权集中与分散的程度同样对于国家活动是高度敏感的——这些活动包括财政政策、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和影响通货膨胀的货币战略。国家本身以国债的形式吸收了一部分生息资本的流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定数量的虚拟资本

① 因此，我强烈赞同汤普森（1977，第247页）对金融资本给出的界定："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一种相互接合（articulated）的联结"，其中银行资本是支配性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这些虚拟资本可能会随着借债的政府单位或机关的不同而出现进一步的差异——例如，美国政府的债务在性质上不同于纽约市的债务）。中央银行及其所有与本国的货币量相关的权力则处于这个错综复杂的体系的中心。

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完全卷入了生息资本的流通过程。我们不能以为国家的这个方面——这只是一个方面——在资本面前拥有哪怕是相对的自主，因为它必然是按照资本运动本身的形象来构造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的行政人员要管理生息资本的流通，他们的职能则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效忠于谁。由此，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与同样参与了生息资本流通的货币资本家、产业家和金融家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必然的统一。外在地看，国家的一个部门看上去仿佛直接变成了产业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同谋。对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界定走上了前台：全部三种利益在这种界定中得到了统一。①

这种统一包含了一个矛盾，也包含了转化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信用体系会“引起国家的干涉”[46]，同时也会使资本社会化，并把对社会劳动的控制集中起来。社会化的资本——这是由国家的调节和控制所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在成长时无可避免的产物。因此，信用体系构成了“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7]（《资本论》第3卷，第438—441页）。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聚集到了生息资本的总流通这个统一体内部的对抗上面。中央银行毕竟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即

① 希法亨实际上倾向于把国家包含到他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当中，因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统一是在民族国家中完成的。这样一种表述会带来问题，因为国际金融就其组织形式而言有时是基于国家的，有时又是超国家的。金融与国家的联系显然具有非常复杂的本质——见德布伦霍夫（1978）和霍洛韦（Holloway）与皮乔托（Picciotto）（1978）。

规训行为不当的产业家和银行家，并对他们进行惩罚，因为他们处在一场积累资本并争夺积累的利益的竞赛中，从而无可避免地会有过分的行为。国家机器必定要行使规训的权力，因而它与资本的其他所有派系之间经常会爆发公开的冲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即使政治权力在一些国家明显落在了资产阶级手中，这种冲突也会存在。对资本加以调节和控制的能力尽管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有利的，却必然位于国家机器内部。于是，工人阶级的运动看起来仿佛也可以支配资本，只要它能获得对国家机器内部的战略中心的控制权。但是事情的反面随后立刻就变得明显了。由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资本本身的纯粹反映，所以就连社会主义的政府（正如许多人在付出代价之
323 后发现的那样）也只能力求更加有效地管理生息资本充满矛盾的流动而已。诚然，对制度结构以及流动的方向和数量进行各种调整可以为工人带来利益。但这些再分配是有限度的：它们严格地受制于在生息资本的流通中同样处于主导地位的必要统一。国家若要脱离与资本同谋的立场，就只有彻底废除这种流通形式才行。若非如此，阶级斗争就会内化到国家当中，因为国家负有双重责任：一边服务于生息资本的流动，一边争取满足工人的需要。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都决不能被看作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统治性的权力集团内部一个不成问题的同伙。一些根本矛盾——生息资本的流通受困于这些矛盾——经常外化为国家（特别是中央银行）同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对立。因此，国家的作用始终是神秘而矛盾的。就连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由资产阶级运行的，也是为了资产阶级而运行的——也无法回避这些矛盾。

 这一切一旦投射到国际舞台上，就会变得更成问题。作为

本国货币品质的守护者，中央银行要与其他中央银行发生关系，以便一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即使在这个体系牢固地植根于一种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时也是如此。因此，就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困境而言，中央银行予以回应的能力会实质性地被它的黄金储备和它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所影响。但是国家也获得了某些调节资本流动的权力——它可以通过保护关税、外汇控制和移民政策来调节商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乃至可变形式的资本。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无法脱离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竞争来讨论。

让希法亭和列宁感兴趣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有什么联系。希法亭聚焦于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国家权力的框架中所达到的统一——内在矛盾却消失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权力集团为了支配世界而相互斗争。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时也采用了希法亭的思路。但他还利用了霍布森，后者将金融运作看作一种独立的手段，可以用来控制世界上的政府。列宁写道：金融资本是“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48]。这种现象要能发生，生息资本的流动就必须具备超国家的一面，必须凌驾于国家之间单纯的权力关系之上。政府是在自己的边界之外约定债务的，因而要服从一 324
定的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不论这种纪律是否由强有力的、国际性的银行家来推行［比如19世纪的罗特席尔德银行（Rothschild's）和巴林银行（Baring's），或者今天的由私人银行组成的财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超国家代理人］。国民经济的运转同样可能要服从国际性资本流动的规训，而货币资本的流动尤为重要。列宁断言：在金融资本的阶段中，

通过货币资本的输出而非商品出口，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49]。

在这里，金融资本与国家的关系所具有的神秘性质变得无比清晰了。尽管国家机器构成了生息资本流通的战略控制中心的内核，但这种流通同时又是自由的，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规训单独的民族国家。国家在与资本流通的关系中既是受到控制的一方，又是进行控制的一方。[①] 至于哪种力量具有支配地位，那取决于形势。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不均衡必须被看作在一个变动的均衡点附近无休止的振荡——这个均衡点是由相互抗衡的力量所决定的。这种均衡是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的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可以将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化保持在动荡不安的道路上。倘若未能维持这种均衡——它所面对的是无休止地扰乱它强大得无法置信的力量——资本主义体系就必定会被推入全球危机，而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权来相互竞争。战争表现为一种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见后面第 438—445 页）。

不幸的是，这里提出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超出了与我的分析相邻的范围：我想要谈论的是另一个核心观点，即金融资本（不论怎样设想）与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统一体内部的矛盾之上的。任何对国家的分析和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分析都必须理解这些矛盾的本质和起源，并把这种理解放在自己的关注的正中心。

① 布哈林（1972a）的研究《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50] 大量谈论了这个观点，值得仔细研究。

9.“第二块”危机理论：生产、货币与金融之间的关系

“第一块”危机理论（第7章）揭示了危机在生产中的起源。由于自相矛盾的统一必然在生产与交换之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危机无可避免地会在交换中得到表达。资本在这里既可以表现为商品，又可以表现为货币。由于货币是一种独立的形式，价值的等同性借此“可以在任何时候确定下来”[51]（《资本论》第1卷，第154页），所以危机必然具有货币的表达。前面两章的主题是分析信用、生息资本的流通、虚拟资本的形成以及其他所有金融的和货币的复杂情况；这些分析为关于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和表达的理论添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第二块”危机理论了——它力求把相关事务的金融方面和货币方面同早先对生产中导致不均衡的力量所做的分析整合起来。

让我们暂且将注意力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或者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资本主义——只要后者以单一的、无差异的货币体系为特征，它与国家就是一回事。于是，我们必须讨论的最为奇特的事实就是信用体系如何把资本放到一起，使它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共有资本，因而有可能抵消个别资本家的错误行为——这些行为是生产中不均衡的主要根源。然后，我们可以将所有让生产与实现、消费和分配得以全面协调的至关重要的力量补充进来。在信用体系内部显然具备充足的力量，可以抵消生产中的不均衡倾向。这种力量无法得到直接的应用，而是必须在交换领域中通过价格信号和其他信号来传达。

这些力量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它们会得到这样的使用。实际上，资本主义早年的主流是阶级的共有资本在使用中产生的

利益会被私人占有，因而信用体系是投机性的危机所在，这些危机的爆发与生产中的不均衡是相对独立的。这些投机性的危机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它们可能会使剩余价值的生产受到重压，从而干扰资本积累的进程。于是，危机的起源看起来仿佛就仅仅是金融操纵了。马克思拒斥了这种解释，并给出了很好的理由。可是“第二块”危机理论必须始终让投机得以相对自主地兴旺起来，这种兴旺涉及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对土地的出售、商品价格和商品期货（包括金和银等货币商品的价格和期货）以及各种各样的纸面资产。这些投机狂热未必可以解释为生产中不均衡的直接表现：它们有可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出现，也的确会这样出现。但是马克思证明了它们只是浮在表面上，而导致不均衡的潮流要深沉得多。他还向我们证明，过度积累会为这些投机狂热的成熟创造条件，因而如果后者接二连三地发生，那就几乎无一例外地标志着前者的存在。这里的困难是将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其一是纯粹浮在表面上的无休止投机，其二是危机在生产中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更加深沉的节奏。

对积累周期的分析为一种关于金融现象与生产动态之间
326 关系的看法开辟了道路——这种看法更好地整合了这两个方面。它说明了生产的内在矛盾如何在交换中表现为价值的货币形式与商品形式的对立，而这种对立随后又如何通过信用体系这个代理人变成了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全面对抗。于是，后一种对抗构成了最终击沉资本积累的礁石。这番分析所描绘的积累周期仿佛是在没有不相干的投机活动的情况下运行的。这不是事实。虚拟资本的形成对于整个动态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是不相干的，或者说有哪一样是不相干的，则只有在危机已经完成了合理化的工作之后才能确定。

可见，表面上的投机对于积累的动态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价格的变动对于价值的形成必不可少一样。

这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积累周期的观念中唯一无比重要的缺陷上面——这个缺陷促使马克思把这个观念掩埋在了一组试探性极强的、极其碎片化的表述中，以至于人们或许可以公正地指责我将一个观念硬塞给了马克思，仿佛他实际上并不这样认为。我指的是在说明这种周期时所使用的非历史的方法。每个周期看起来都与其他任何一个周期一样（见前面第5节），因而在危机走完了它的进程之后，资本主义体系仿佛就回到了原状。这很难与马克思所关注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运动规律相符，除非我们愿意认为这种演化是在接连不断的积累周期进程中完成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对积累周期运作方式的解释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倘若从资本主义长期演化的立场来看，积累周期就是作为手段来运行的，而远远更为深沉的社会转化过程是借助这个手段来完成的。这些过程必须至少暂时减弱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根本张力，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然而，如果基本的阶级关系保持不变，矛盾就只会转移，只会在另一个层面上被重新创造出来。积累周期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可以在其中相互适应。与经济的上行相联系的投机活动让个性化的、私人的试验得以进行——这种试验涉及新产品、新技术（包括组织形式）、新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乃至全新的文化、阶级格局以及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这种原子主义的试验热潮创造了大量多余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同时却又为资本积累的后续阶段打下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所忽视的正是投机的这个方面。暴跌会对生产进行合理化和结构转换，从而消除不相干的要素——旧的和新的都会

被消除。它还会按照资本家阶级的要求来规训社会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因而一般会引发某种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回应；
327 这种回应不仅来自劳工（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来自资产阶级内部诸多受到影响的派系。这种时候会出现由阶级实行的而非由个人完成的创新，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以镇压为后盾。罗斯福的新政恰好符合这样一种解释。最终的结果必须是把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带回到某个均衡位置，而积累过程由此就可以再度出发了。

在对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化进行提纲挈领的叙述时，马克思描绘了一种类似的过程：

>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2]（《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1 页）

从内部转化自身的能力使资本主义成为一头略显奇特的野兽——它可以像变色龙一样无休止地改变颜色；它可以像蛇一样蜕皮。对生息资本流通的研究说明了这些内在的转化在发生时所借助的具体物质手段。我们看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必须在一定的时刻呈现出新的面貌：即生息资本的流通。金融资本由此破茧而出，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控制力量，却也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并以慢性而长期的不稳定性为特征。它的出现
506 不是一桩抽象的事务，而是要求创造新的工具和制度、新的阶

级派系、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以及资本流通本身的新渠道。这一切与资本主义的必要演化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信用体系的权力倘若被发动为一种对生产中的不均衡加以抵消的力量，就必须同样转化为阶级权力的一种毫不含糊的工具——这不是说它会落到资本家的这个派系或那个派系手中，而是说运用它的方式必须能确保资本在积累中的再生产。于是，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是由中央银行和国家机器的诸多其他分支来执行的——承担了这个重任，即确保资本的再生产。在捍卫本国货币的品质时，诉诸国家机器的其他方面，而不是仅仅依靠中央银行是有好处的：这种做法有能力从结构上把信用体系内部各种各样的市场信号和力量转换成一种与生产中的不均衡相抗衡的力量，以此来回应这种不均衡。我们在第 4 节看到了这如何能把危机的直接表达从 328
商品的价值丧失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丧失。“第二块”危机理论必须主动包含这种可能性。

然而，尽管国家的政策目标也许是毫不含糊的，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却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通货膨胀并没有在生产中完成所需要的结构转换，还以一些重要的方式使积累周期的结局发生了偏差，从而在长期不太可能弥补生产中的不均衡。于是，国家的政策目标必须是对结构转换进行组织，即对一场它希望可以受到控制的危机进行组织。这样一种策略会遇到两道障碍。第一，阶级斗争（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而且存在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诸多派系之间）逐渐被内化到了国家机器当中，带来了各式各样无法预料的后果。第二，经验表明，控制的程度与企业的成就成反比。要使资本主义演化出新的形式，官僚化的创新和结构转换相对于“自由市场”版本的创新和结构转换就是一种比较不活泼、比

较不可行的过程（前面第 5 节概述了这一点）。前者唯一的优点当然是让暴跌的最坏方面可以受到控制。

危机应该被看作暂时的、循环的事务——它们的顶点也许是资本主义的大灾难这个最终结局——还是应该被看作长期的、持久的衰落，并在迅速发展的内在矛盾面前以逐渐的退化和弱化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存在大量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第二块”危机理论区分了周期性的暴跌——它们始终是资本主义内在转化的催化剂（也许最终会催化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一些长期问题，这些问题是随着资本流通、阶级形态、生产力、制度等方面不可逆的转化而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那样，资本本身的不断社会化会对这些长期问题产生强烈影响，而影响的途径首先是信用体系这个代理人，最终则是具有社会必要性的国家干预。由此，周期性的暴跌也转变了自身的性质。它们不再是一种本质上是原子主义的、个性化的过程所产生的总体社会影响了，而是从最开始就成了一桩社会事务。国家有责任通过它的政策来创造一种它希望可以“受到控制的衰退”，这种衰退的长期后果是使资本积累回到正轨。

资本主义内部转化的可选项变得越来越有限了：它们越来越局限于国家机器本身当中的创新。一旦国家创造性地管理经济的能力达到了极限，那么国家权力愈发权威主义的使用——这种使用既针对资本，又针对劳动（尽管对后者的影响通常具有大得多的毁灭性）——似乎就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危机牵
329 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框架、制度框架和政治框架，对危机的解决也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力量的运用。由此，关于资本主义转化的整个问题域——不论是通过演化的
 方式，还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就改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问题和前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只要我们丢掉关于封闭体系的假定，并考察危机形成过程中的国际性方面，那么上述变化就会获得尤为鲜明的含义。“世界货币”的规训力量——不论这种货币是如何建构的——和不同的货币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资本和劳动在世界舞台上的机动性提供了背景。当拥有不同货币体系的彼此敌对的国家相互竞争，要使对方在价值丧失面前首当其冲时，危机就会消散。力争把通货膨胀、失业、闲置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商品等等向外输出成了国家政策的枢纽。危机的代价是按照彼此敌对的国家在金融、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差异来分散的。正如列宁坚持认为的那样，战争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解决方案之一（这是一种壮观而直接的通过毁灭来进行价值丧失的手段）。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金融统治成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核心问题。我们将在第 13 章讨论这些问题。

译注

1.《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11 页。
2.《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265—266 页。
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41—542 页。
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18 页。
5.《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33 页。
6.《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499—50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494—500 页。
8.《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61 页。
9.《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50 页。
10.《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401 页。
11.《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91 页。
12.《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401 页。
13.《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74 页。
14.《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30 页。
15. 该引文出处不明。
16.《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4 版，第 343 页。

17.《金融资本》，第 338 页。
18.《列宁全集》第 54 卷，1990 版，第 375 页。
19.《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7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0.《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50 页。
2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48 页。
22.《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85 页。
2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50 页。
2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84 页。
25.《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16 页。
26.《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72 页。
2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5 页。
28.《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22 页。
29.《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4—555 页。
30.《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85 页。
3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74 页。
32.《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62 页。
33.《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565—566 页。
34.《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49 页。
35.《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3 页。
36.《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00 页。
3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404 页。
38.《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5 页。
39.《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62 页。
40.《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46—547 页。
4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84 页。
42.《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71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3.《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214 页。
4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6 页。
45.《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376 页。
46.《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497 页。
4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00 页。
48.《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95 页。
49.《列宁全集》第 27 卷，1990 版，第 380 页。
50. 中译本见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英译本的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但这与原本的顺序（“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是相反的，中译本的书名则符合原本的顺序。
5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180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2.《全集》第 31 卷，1998 版，第 501 页。

第11章　租金理论

公平地说，租金给马克思带来了巨大的烦恼。他试图“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并“摆脱一切使地租受到歪曲和模糊不清的附加物而去纯粹地考察地租”[1]（《资本论》第3卷，第624页）。可是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全部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记录下来的试探性的思想。于是，它们看起来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较早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表述与《资本论》中的少数经过了充分打磨的段落有实质性的差别；他在后一部著作中的分析虽然十分广泛，而且往往富有洞察力，却也被某些困难纠缠——这些困难并没有轻易地屈服于他的手指通常具有的魔力。他造成了一大堆困惑，并在少数顽强的心灵之间引起了一场重大而持久的论战，因为他们试图摸索出一条道路，穿过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作 330

品所留下的雷区。[①]

租金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向地主进行的支付，为的是有权利使用土地及其附属物（内嵌于土地的资源、放置在土地上的建筑物等等）。土地如果在这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待，显然就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它是否还能具有价值？倘若它具有价值，这种价值的存在又如何能与价值理论——这种理论要么立足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比如李嘉图的理论），要么在马克思那里立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调和？

331 体现在土地中的改良诚然是人类劳动的结果。房屋、商店、工厂、公路等等都可以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因而可以在通过建成环境来进行的流通的进程中被当作价值（见第 8 章）。于是，租金的一部分可以被当作固定资本或消费基金的利息的一种特例。带来问题的是租金的另一部分，即独立于土地的改良、只与原始的土地相关的纯粹的支付。马克思把这个部分叫作地租。在没有额外说明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将把地租当作租金，并假定与改良相关的利息是以其他方式来计算的。

马克思当然坚持认为，租金支付并不是向土地进行的，租金也不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类支付是向地主进行的；倘

① 列宁（1956 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考茨基（1970 版）的《土地问题》[亦见巴纳吉（Banaji）（1976）用英文写的概述]是马克思之后的两部经典。更加晚近的、有趣的研究有雷伊（1973）、波斯特尔－维奈（Postel-Vinay）（1974）和特莱布（Tribe）（1977；1978），他们对各自认为的马克思较为严重的错误采取了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思路。鲍尔（1977）和法恩（1979）则回过头来使问题大大靠近了马克思原本的意图。埃德尔（Edel）（1976）对最近的一些尝试——即在城市中为马克思的概念找到应用的方式——所做的评论十分有用，但并没有讨论法国人对这个主题的贡献——见利皮耶茨（Lipietz）（1974）、托帕洛夫（Topalov）（1974）和德谢尔瓦（Dechervois）与泰雷（Thèret）（1979）。一份很好的关于资产阶级租金理论的历史研究可以在凯佩尔（Keiper）等（1961）那里找到。

若没有全面的商品交换、经济的充分货币化以及土地私有制的一切法律的和司法的圈套，这类支付就是不可能的。但他同样明白，这种法律基础并不能决定任何东西；对租金的完整解释必须使这种表面上向土地进行的支付与聚焦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可以相容。

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马克思能相当清楚地看到李嘉图错在哪里。但他没能想出如何走出同样的困境。他持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不容许分配的情节进入他的理论的中心——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把租金当作一种纯粹的分配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但就像利息的例子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分配关系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担任战略性的协调角色。生息资本的流通不会直接生产价值，却有助于协调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当然充满了各种矛盾）。那么，资本为了追寻租金而进行的流通是否能发挥类似的协调作用？后面我将尝试证明，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深深地掩埋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土地市场的基础是占有租金的能力，而土地市场运行的关键正是资本通过使用土地来进行的“恰当的”流通，因而是为各种业务塑造一种“合适的”空间组织的整个过程（其中充满了矛盾）。与生息资本一样，对租金的占有就资本积累而言同时起到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为了发挥协调的职能，它所付出的代价是让土地投机的颠倒错乱的形式得以产生。但这样一番论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几乎无法分辨，而且他似乎非同一般地不愿意承认地主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任何积极作用。

他在这里的两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他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无休止格斗。李嘉图主义者将地主描绘为寄生虫，即封建时代无用的、多余的残留物。马尔萨斯让他们获得了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他们是消费者，因而是有效需求的来源。面

332 对这一切，马克思把自己置于何地？他显然不想将自己放进马尔萨斯的阵营。他难道能既与李嘉图保持距离，又不表现出对马尔萨斯的支持吗？因此，他公开站在李嘉图一边。但这随后就给他带来了一个两难。一方面，他不能把地主当作纯粹被动的、寄生的主体，仿佛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他无法为两种现象给出理论基础：其一是在资本主义之下仍旧存在的对租金的占有，其二是土地所有者这个独特的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当他从后一个方面考察土地所有权时，他很难避免一条结论：租金不只涉及一种单纯的分配关系，在它当中或在它背后还存在某种生产关系。

他当然完全明白，土地所有权在最初的“决定生产的分配”[2]中——劳动由此与土地中的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里也潜伏着一种怀疑，即“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看起来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3]（《资本论》第3卷，第622页）。在“看起来”这个模棱两可的动词背后有一个更加坚定的观点，即这的确有可能是事实。随着他的论述的推进，这种看法的力度也有一些加强。倘若支配性的阶级关系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那么“资本家不得不把他所侵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再同不劳动的第三者分配的情况，只是后来才出现”[4]（《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52页）。如果说这还不够明确，那么他后来还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就是“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并彻底分离了土地所有者与对土地的控制权[5]（《资本论》第3卷，第618页）。

我们当然完全有可能感到疑惑：是什么迫使资本同如此衰弱的社会群体分享自己的油水？但是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我

们随后恰好会在同一页上读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增殖价值的形式”；我们还会读到令人尤为惊讶的说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6]后面这个想法在关于“阶级”的一章得到了讲解——恩格斯把这一章放在了《资本论》的末尾。这部著作在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动态的解释，但我们到了最后却得知，事实上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阶级有三个——这看起来实在太奇怪了。

那么，既然土地本身按其定义就不是价值的来源，土地所有权又可以在什么意义上“增殖价值”？在剥掉了所有“受到歪曲和模糊不清的附加物”之后，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到底有何种阶级地位？租金使土地所有权站在了谁的对立面，资本家、劳动者还是这两者？简言之，对租金的 333
占有导致了谁对谁的剥削？①

由于在现象世界中，生产的各个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看起来仿佛被赋予了魔术般的力量，仿佛由此成了价值的来源，所以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变得愈发难以寻找了。我们也许可以预料到，马克思在讨论这些拜物教的观念时把他的尖锐发挥到了极致（《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53—540页；《资本论》第3卷，第48章）。可是他也承认，倘若生产者“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7]。个别生产者除了关心自己为工资、利息、租金和不变

① 雷伊（1973，第24页）以这种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资本所进行的支付之外，就只能把心思用在自己赚取的利润上面了（《资本论》第3卷，第830—835页）。他们所支付的租金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对一个也许的确是拜物教的范畴所做的回应也具有非常现实的后果，必须予以考虑。有了价值理论，我们就很容易剥掉必然存在的拜物教——它们笼罩了日常经验——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价值理论本身的框架中界定一种连贯的地租理论成了一项理论性的挑战。这是我们手上的当务之急。

我将分阶段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从土地的使用价值开始。这可能会被看作一个有些不合适的起点，但是物质特性在这里是从社会性的方面来考察的，只要我们较好地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产生危险。然后，我将考察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作用，以便设法识别出土地所有制的真正资本主义形式。前两节提供的是基础和必要的背景，为的是解剖租金的形式、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自相矛盾的作用以及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由此发生的与分配相关的斗争。最后一节则将土地所有权视为运作在土地市场上的“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并试图在这个基础上为地租的存在进行充分的辩护——地租发挥的是协调的职能，即按照用途来配置土地，并以反映了竞争的方式和听命于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塑造地理组织。土地所有制的这些积极作用同样具有消极的后果。但作为一般资本的一个派系的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社会基础由此就得到了界定。

1. 土地的使用价值

土地连同劳动者构成了“一切财富的源泉”[8]（《资本论》
334 第1卷，第507页）。在处子般的状态下，土地是“人类劳动
516 的一般对象”[9]，是一切生产的“原始的……条件”[10]，而且储

藏了看似无穷多样的“天然存在的”[11]潜在的使用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178页；《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3—44页）。然而，这样一个普遍的概念只能提供一种帮助：它指出了一些条件，资本必须要么加以应付，要么加以修改。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价值必须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考察。

在关于私有房地产的法律当中，私人可以对“一定量的土地”取得垄断权力，“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12]（《资本论》第3卷，第615页）。土地既然是可以垄断、可以让渡的，就可以作为商品来出租或出售。在某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清晰的私有财产权很难建立起来——例如空气、流水和其中的游鱼。我们在这里将不考虑这些问题。

土地本身还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产。相反，包含在土地中一些（但不是全部）使用价值不仅可以再生，而且可以通过商品生产来创造（例如工厂、堤岸、房屋、商店等等）。在一个国家，适合于某些类型的人类活动的土地数量可以通过在建成环境中创造使用价值来改变。但是地球表面上的土地总量无法由于人的能动性而得到显著的增加或减少（尽管填海造陆对于当地可能十分重要）。

在从这些非常一般的观点向前推进时，我们要面对一连串精细的区分，例如完全“自然的”使用价值与人的行为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分，或者人们在生产和开采中主动使用的土地与单纯被用作空间的土地之间的区分（《资本论》第3卷，第774页）。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在所有这些意义上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13]。但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所以让我们以后一种区分为起点。

（1）作为再生产和开采基础的土地

土地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可以被开采出来（如对矿物的开采），可以在生产中作为“自然力”来发动（例如风力和水力），或者可以被用作持续再生产的基础（如在农业和林业中）。在前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将使用价值称作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农业则有些特殊。土地在这里不仅提供了养分的存量——种植和畜牧可以将这些养分转变为食物和各式各样的原材料——而且发挥了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的职能。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包含在土地本身当中。①

335 对租金的占有并不是以这种物质条件为基础的。马克思对农业租金的许多分析都致力于攻击这样一种错误的概念，并解释它可能会如何产生。倘若以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与并非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之间的区分为基础，就可以有效地提出资本的利润（资本被看作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与土地的租金（土地被视为并非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之间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幻觉中最流行的一种（《资本论》第3卷，第825页）。它意味着“地租是由土地……产

① 马克思的术语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他用了多种方式来指涉土地：生产条件、生产的前提、生产要素、可以在其上进行生产的要素、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3、48、54、245页；《资本论》第3卷，第774页）。下面这段话最好地显示了他是出于什么想法才做出这些区分的：“真正的农业地租……是为了获得许可在土地这个生产要素上投资……而支付的东西。土地在这里是生产要素。”就此而言，它也许可以被看作不变资本的一种形式（不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就建筑物、瀑布等对象的租金来说，“获得支付……的自然力，是作为条件加入生产的，不论是作为生产力或者是作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后者对马克思来说显然指的是不折不扣的空间］，但是它们不是这一特定生产领域本身的要素。其次，说到矿山、煤矿等的地租，土地则是可从其中取出使用价值的储藏库。这里为土地支付地租，并不是因为土地像在农业中那样作为可以在其上进行生产的要素，也不是因为土地像瀑布和建筑地段那样作为生产条件之一加入生产，而是因为土地作为储藏库蕴藏着有待通过勤劳来取得的使用价值”[14]（《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45页）。

生的”[15]，还意味着土地具有价值，尽管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这些主张同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都是不一致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幻觉可能会如何产生。我们把社会意义直接归结为纯粹的使用价值上的区分。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资本主义之下土地所有权的标志是“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16]（第618页）。掌控生产资料的只有资本，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包含在土壤中还是包含在工厂中。这里当然假定了土地所有制的中间形式（比如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已经让位于土地上的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见后面第2节）。

土地里面和土地上面的使用价值是“大自然的赐予”[17]，它们的量和质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劳动力的物质生产率会随着自然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些自然状况是垄断性的、不可再生的。资本家只要有机会获得优质的使用价值——矿物资源、强大的“自然力”或自然肥力更高的土地——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利润）。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转瞬即逝的技术优势才能短暂地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然而相比之下，这里的相对剩余价值被永久地固定化了[18]（《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95页）。这个区分对于理解租金的基础十分重要。

马克思给出了一个很有教益的实例。一名资本家使用瀑布（这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来开动机器，而另一名资本家使用的是煤炭（这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任何资本家都可以到市场 336
上购买煤炭和机器。但是瀑布“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才能够支配它”。进一步讲，拥有瀑布的工厂主有资格“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

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19]（《资本论》第3卷，第645页）。由于享有自然的优势，这些工厂主很可能会无休止地获取超额利润。土地所有者可以占有这些超额利润，并把它们转变为地租，丝毫不用降低平均利润。

超额利润的水平（其中隐含了租金的水平）是由个别生产率与平均生产率的差别以及在这个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价格来规定的。必须强调的是，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20]，而且即使不转变为地租，超额利润也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的主动因素是资本流通，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然而，倘若平均生产价格甚至低于在大自然的“赐予”的辅助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后者就变得没有用了（蒸汽机就是这样消灭水车的）。因此，超额利润的“永久性”必须相对于技术变革的总过程来评判。

这将我们引向了一个一般的问题：人的行为是如何改变“自然力”的？土壤能够被改变，而且改变的方式对于农业生产率非常重要。这种形式的技术变革——它发生在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壤中——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性质。它通常只能缓慢地完成——在马克思看来，这个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与工业相比，技术变革在农业中的步伐相对较慢（《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93—96页）。不过，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较短期的，如化学性质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较长期的，例如修排水渠、建设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经营建筑物等等”[21]（《资本论》第3卷，第619页）。这种资本叫作土地资本，它是固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仅会以正常的方式流通，多半还会以正常的方式被耗尽（见第8章）。这种固定资本至少应当赚取利息。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对土地肥力的这些投资所具有的后

果。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肥力“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肥力可以通过“对土壤结构进行人工改造，或者只是改变耕作方法”来改善[22]（《资本论》第3卷，第651页）。让我们考察一下前一种可能性。两种独特性会立刻凸显出来。连续的投资有能力相互累积，并产生永久的改良。相反，对机器的连续投资并没有这样一种效果。实际上，工业中的技术革命往往会导致旧设备的价值丧失。土壤的改良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服从价值丧失。土壤“只要处理得当，就会不断改良”[23]（第781页）。因此，土地的生产能力遭到毁灭的情况不能与工业中盛行的毁灭相比较（第813页）。

第二种独特性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一块土地的永久改良通常意味着把“另一块位于别的地段……上的土地所天然具备的那种属性”创造出来[24]（《资本论》第3卷，第746页）。资本在一个地点创造的生产条件对另一个地点来说却是大自然的赐予。在投资全部摊销之前——任何永久的改良到那时都会成为免费的利益，从而在原则上与大自然的赐予没有差别——资本的利息与土地的租金之间的边界会显得有些模糊。“于是，资本为土地带来的生产率——后来与土地的‘自然’生产率重合起来了——就这样抬高了租金。”出于这些理由，马克思驳斥了李嘉图的看法——即租金是向“土壤的原始的、不可毁灭的力量”所进行的支付——因为这些力量既是自然的产物，又同样是历史的产物。

（2）空间、地点和区位

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不论派别）是通过租金这个理论概念来处理空间组织的问题的。我们将在后面证明，空间组织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受到多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而为它们提供基础的正是租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土地不仅可以被用作生产资料，而且可以被用作“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空间基地”[25]——人们需要空间，因为它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6]（《资本论》第3卷，第774、781页）。

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探讨空间的使用价值，但有诸多相关的谈论散落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例如，他在《资本论》中对空间的讨论是以纯粹的常识为基础的，没有诉诸任何特殊的空间理论来予以制约。但在那里也隐含了某些理论原则：自那以来，这个问题恰好就在关注空间问题的人中间不断产生困扰和
338 分歧。[①] 这些困难更多地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它们的解决方案近在咫尺，只要我们可以回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基本概念。

让我们回想一下，使用价值不是“悬在空中的”，而是“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27]。区位、处境、形状、尺寸、维度等空间属性从一开始就应该被看作一切使用价值无一例外都具有的物质属性。我们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在空间的观点上”把一切对象等同起来，把它们“作为空间的不同点”加以区别，并考察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28]（《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

① 在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当中，昂利·列斐伏尔（例如1974）是至今最为坚持不懈地试图把空间的维度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利皮耶茨（Lipietz）（1974）尝试对资本积累理论进行一种更为传统的“空间化”；《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10卷第3期，1978）的关于不平均的区域发展的特刊也提到了类似的主题。“空间拜物教”的问题——这种拜物教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地点与地点或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引起了大量论战，尤其是在地理学家中间。尽管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都一致认为阶级关系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是如下问题仍然会产生：若要把空间范畴之间的对抗——比如城镇与乡村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发达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对抗等等——视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属性，那么这种看法如何才是有用的，在什么时候是有用的［见皮特（Peet），1981；史密斯（Smith），1981；苏贾（Soja），1980］？

第 143 页）。但是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才加以考虑”[29]。最终要紧的是使用价值的社会方面。但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无法脱离交换和价值的形成来理解使用价值的这个社会方面。

于是我们注意到，商品“必须到市场上”才能交换（尽管所有权证书的交易可以在一个区位发生），而这最终涉及空间中的物质运动。后者对于价格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交换变得普遍而完善了，所以商品流通可以“打破……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30]。由此形成的价格反映了不同区位的各种具体劳动条件下的生产状况。简言之，交换过程会通过价格的形成来无休止地抽离关于区位的详情。这为我们从不受地点约束的角度来思考价值的概念开辟了道路。在特殊的区位和特定具体条件下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成了一种社会平均水平，它横贯了一切区位和一切条件。

资本积累要求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乍一看，我们在这样一种分析中仿佛可以放心地把空间撇到一边。但是积累一旦被剥去了它在使用价值和货币中的物质基准，就只能得到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研究。我们在第 1 章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围绕的枢纽始终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所以这里的诀窍是：在理解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物质性的空间属性时，也要把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概念一起发动起来。由此，使用价值的空间属性在社会方面的含义才可以得到阐明。接下来我们将沿着这条路线采取某些试探性的步骤。

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使私人获得了对于一定量土地的排他权力。这意味着一种绝对的空间概念，它最重要的属性之一是 339
一种个体化的原则，这种原则是通过对一定量空间的占据所具有的排他性来建立的——在我们的空间中，不会有两个人既

占据恰好相同的位置，又被视为两个单独的人。[①] 对绝对空间的控制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并不局限于私人，而会延伸到国家、行政区划和其他任何种类的司法个体（juridical individual）身上。土地私有制——它在实践中通常是通过地籍测量和地图的绘制来记录的——清晰地确立了私人对地球表面的哪些部分拥有排他的、垄断的权力。

当商品生产者将产品拿到市场上时，它们在他们的推动下穿过的空间最好被界定为相对空间。[②] 个体化的原则在这种空间概念中被打破了，因为许多个体相对于另外某一点可以占据相同的区位——例如，距离市场正好十英里的生产者可以不止一个——此外，在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度量标准有可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按照成本或按照时间来衡量的距离是彼此不同的，而且两者都非常不同于物理上的距离（见第 12 章）。

区位更加有利的生产者（“更加有利”在这里是从较低的运输成本角度来衡量的）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与自然肥力的差别一样，这些超额利润从一开始就应该被看作永久固定的东西；相比之下，与转瞬即逝的技术优势相联系的相对剩余价值通常只具有暂时的形式。由此可见，在有利的区位拥有土地的

① 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指的是一种关于空间的“容器式的观点”：空间是不可改变的、永恒延续的、不会变化的。这种观点的归宿实际上是假想一组固定的坐标，物质就在其中运动。我在另一处（哈维，1973，第 13 页）论证了空间“就其本身而言既不是绝对的，又不是相对的或关系性的，而是可以视情况成为其中一种，或者同时成为全部三种。关于恰当的空间概念的问题是通过与空间相关的人类实践来解决的”。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就这里所考察的情况而言，我们会把私有房地产或其他领土性的区划看作固定的单元，资本就在其中流通。绝对空间的概念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土地私有制正是这样来表达的。

② 在近一百年左右的物理学中，相对空间观压倒了牛顿的绝对空间，但是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相对晚近的时候才觉察到了这个观点（哈维，1969，第 13 章）。与通常情况一样，马克思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清楚地在交换过程方面认识到了空间的相对性。

人可以将这些超额利润转变为地租，而不会影响平均利润率。

但由于土地可以供所有人使用——而不只是供生产者使用——所以我们必须从包括消费活动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的立场来考察“更加有利的”区位具有哪些影响。当我们离开严格的商品生产领域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形势和偶然情况可能就会登场。毕竟，资产阶级的消费偏好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塑造它们的是多变的口味、时尚的奇想、威望的观念等等。然而，只要我们能很快说明土地对劳动力商品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表面上的不连贯就可以稍许减弱。按照马克思关于运输成本的一般规则，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从而劳动力的价值对于上下班的成本十分敏感。倘若全体工人所获得的工资率是均等的，居住在“有利区位”的人与住得更远的人相比就拥有相对优势。若要确保住得最远的工人可以进行再生产，并按照这种需要来设定工资的水平（这在劳工稀缺的状况下有时可能会发生），那么其他所有工人就会获得比价值略高的工资。由此可见，持有土地的人可以将这种超额工资转变成地租，丝毫不会干扰劳动力的价值。我们有必要把这类情况与盘剥性的租金和其他次级的剥削形式——土地所有者会以这些形式对占据他们土地的劳动者实行剥削——区别开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从劳动力的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当然加进了地租，正如在某些情况下，强大的土地利益集团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把资本家的利润作为代价来赚取超额租金。

劳动力的例子表明，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研究资本主义当中的众多不同的活动中的每一种，设法探索每一种活动的合理基础和在区位方面引导它们的原则，并由此为不同类别的活动中的租金报酬建立基础。有些活动——如批发、零售以及货币和金融的职能，比另一些活动——例如行政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

和科学的职能所在的位置，更加适合于以此为基础的讨论。然而，特定区位的使用价值归根到底不能脱离众多活动五花八门的需要来理解；马克思对这些需要只有外围的关注，所以他把它们排除在了自己的分析之外（《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70页）。①

一旦我们承认，相对优势虽然是任何景观的永久特征，却会无休止地相对于特殊的地块而改变，那么以位置为基础来占有租金就成了一桩远远更为复杂的事务。这些相对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交通工具的开发、新城市的兴建、人口的增长等等”而“历史地发生变化”[31]（《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12页）。运输业能力的变化尤其重要，因为“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32]（《资本论》第2卷，第249—250页）。在一些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抹平由区位引起的差别，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恰好相反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第650页）。至于这种现象在资
341 本主义之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肯定必须发生，第12章将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们目前需要知道的不外是特定地块的区位优势可以由人的能动性来改变。这意味着资本本身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对运输和交通的投资）可以创造空间关系。由此，使用价值的空间属性就可以回到分析的领域中了——这些属性是由社会创造的性质，从而在对价值规律的运行展开充分的研究时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主题。

（3）区位、肥力和生产价格

区位的影响和“自然生产率”[33]的差异会以大量令人困惑

① 区位理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思路是什么模样？这还有待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将在第12章讨论。

的方式混杂在一起，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则会相互抵消。人们也许会抛弃肥沃的，可是地段不佳的土地；偏爱不那么肥沃的，可是位置更加有利的土地：

> 位置和肥力的互相矛盾的影响和位置因素的可变性（位置因素会不断被抵消，会发生不断的、累进的、起抵消作用的变化），会交替地使同样的、较好的或较坏的土地同旧的耕地发生新的竞争。[34]（《资本论》第3卷，第769页）。

但是反过来，一大片肥沃的土壤可以对坐落在附近的较差的土壤产生“相邻”效应或“溢出”效应：“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这块较坏土地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可耕地连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在位置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35]（《资本论》第3卷，第669页）

不同的活动对于区位还会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对于特殊场所的其他质的属性却不是这样。一般而言，农业对于肥力和区位是同等敏感的，而工厂、住房、商店等等主要对于区位十分敏感。但是领地的性质——排水、坡度、朝向、健康程度等等——对于后者的选址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某些种类的工业化的农业几乎完全不依赖于它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自然生产率。马克思评论道：“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作为商品”从外面“加入农业”，而这意味着它可以进一步从土壤的特定性质中解放出来[3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54页）。

不同的活动会为了使用空间而相互竞争。马克思明确地撇开了这种过程（《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70页），尽管

他略显不明智地说出了一点轻率的意见（而且或多或少是离题的）：所有非农业土地的租金都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
342 的”[37]（《资本论》第3卷，第773页）。他本来应该认为租金是同时由许多相互竞争的活动来决定的。这种概念背后的观点是：土地所有者并不关心他们所收取的租金是从劳工的工资里扣除的，是从资本的超额利润乃至平均利润中扣除的，还是从其他任何收益形式中扣除的。马克思本人确实完全明白，“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他也尖锐地指责了土地所有权的“巨大的权力”如何“可以把……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即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38]（《资本论》第3卷，第773页）。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投资如何改变了空间关系和特殊场所的土地的性质，就会遇到更加严重的困难。资本在这里拥有一定的选择范围。货币可以被用来改善交通，从而把更加肥沃的土地开放出来以供开发；或者它可以被用来改良已经得到耕种的劣质土地。因为前一种策略处理的是空间的相对性，所以它很可能是对许多土地所有者有利的，而后一种策略局限于个别所有者，具有更强的排他性。即使我们把这样一种差别所导致的明显的社会问题抛在一边，对使用价值的两个方面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也仍然有待研究——它们有时会相互强化，有时则会相互抵消。马克思假如稍微花一点工夫来详细研究这一点，就会对租金的某些方面有所觉察——他的分析现在遗漏了这些方面。

马克思事实上绕过了所有这些困难，因为他排除了区位的问题，仅仅专注于肥力的差异，仿佛只有这些差异才会影响农业。这种简化让他得以推导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农业商品的生产价格通常是由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

润率来规定的。这极大地偏离了价格在工业中的决定过程——在那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偏离是可以得到辩护的，理由有两条。第一，生产率“基于自然的”差异不能像在工业中一样通过技术变革来消除（超额利润对于有福之人——他们拥有比较肥沃的土壤——是永久固定的）。第二，农业生产的扩大要求把较为劣质的土地吸收到耕地当中，还要求只在更有利润的情况下才对优质土壤上的生产进行强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最差的土壤都必须始终实现平均利润率，否则就无法继续得到耕种。这正是马克思迫不及待地想要确立的原则。它为他的大部分租金理论打下了基础。

他当然认识到了情况决不会这么简单。例如，他假定了农业商品的需求与供给是均衡的。他还假定了肥力与区位的相互作用、资本对这两者的投资所具有的差异化模式，以及土地上 343
不同的生产线和生产分支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都不影响上述原则在理论中的连贯性。我们将在后面第 3 节回过头来考察这些假定的有效性。但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于一定量土地的排他权利。

2. 土地所有权

马克思写道：“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39]（《哲学的贫困》，第 154 页）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旧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遭到了“解体”[40]，转变成了一种与持续的资本积累相容的形式。从这个立场来看，资本可以被看作“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41]。后者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42]（《大纲》，第 276—277 页；《资本论》第 3 卷，第 782 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之

下的土地所有权的标志是“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的联系”[43]遭到了极其彻底的解体，以至地主可以将关于土地的所有权利——土地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生产条件——都授予资本，并收取连续的货币报酬（monetary payment）。由此，就对劳动的支配（对土地的控制让这种支配得以可能）和积累的后续进展而言，地主承担了被动的角色（《资本论》第3卷，第617—618、636页）。因此，虽然“人们尽可以把其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支付的含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本质的区别”[44]（第883页）。于是，对租金的占有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45]（第634页）。

从封建租税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转化的实际历史——即封建所有权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屈服的实际历史——充满了复杂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纵横交错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所造成的。[①]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开始的，而土地所有权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4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43页），所有还会出现一些困难。土地所有制的初始条件有巨大的差别；其中一些条件——比如英格兰的条件——
344 看起来比别的条件更加易于转化。[②] 由于劳动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的分离对于雇佣劳动的形成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

① 雷伊（1973）和特莱布（Tribe）（1978）对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做了描述；多布（1963）和希尔顿（Hilton）（1976）则讨论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个一般问题。

② 雷伊（1973，第73页）认为，封建所有权——它会屈服于货币和商品生产的影响——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条件（比如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因为它被迫要提高租金。

原始积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资本在创造土地所有权的现代形式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样。与商人资本和高利贷一样，土地私有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又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47]（《大纲》，第 252 页）

马克思关于这段历史的总体叙述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封建的劳役租转化成了实物租金，最后又转化成了货币租金。这种转化预设了“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48]（《资本论》第 3 卷，第 797 页）。价值规律开始通过市场交换来调节价格了。封建租税的货币化开启了出租土地并收取货币报酬的可能性，并最终开启了将土地作为商品来购买和出售的可能性。基于城市的资本可以渗透到乡村并转化那里的社会关系了。除了较为温和的货币化的过程之外，还有更加贪婪的高利贷者的行为（他们花了很多力气来使传统的土地持有者放松对土地的掌握），最后还有暴力的剥夺（不论国家是否批准）：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忍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49]（《资本论》第 1 卷，第 732 页）

但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倘若只是通过土地所有制的私有化以及生产者对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体系形式上的从属来建立的，就未必能纯粹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各样的中间形式都有可能出现，我们或许最好按照雷伊的方式把它们解释为一种又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接合”（articulations）。这并不是说我接受雷伊的基本结论：仿佛资本主义之下的租金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分配关系，它反映了与资本主义相互接合的另一种生产方式（例如封建主义）所具有的生产关系（雷伊，1973，第60页）。然而，就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出现的情境而言，雷伊的概念是高度适用的。

345 例如，土地所有者经常直接剥削从事劳动的生产者。这对于奴隶经济（如内战之前的美国南部）是成立的，对于存活到今时今日的农民生产体系也是成立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有充分的动力榨取最高的租税，原因不仅在于这可以使地主的收益最大化，而且在于这可以迫使农民越来越辛勤地工作，并以愈发低廉的价格（因为供给增加了）为市场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从这个立场来看，地主阶级对农村的农民所进行的苛刻的剥削是与工业资本主义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为城市的工人提供了廉价的食物，也为工业带来了廉价的原材料供给。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强大的联盟可能会在土地利益集团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诞生。

但与一般的绝对剩余价值一样，这样一种剥削农村的形式也有自身的界限。生产的中间形式倾向于抑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50]（《资本论》第3卷，第807页）。出于这个原因，这些中间形式最终会让位于一种生产体系，后者完成了劳动对资本的（而非对地主的）实际上的从属，并将土地从抑制生

产力发展的障碍中解放了出来。这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发生：完全移除土地所有者在三个方面的任何直接的权力——使用土地的权力、在土地上运用劳动力的权力，以及对预付资本的权力——只让他们收取货币报酬。

土地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形式是如何诞生的？马克思显然并不觉得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演绎是四平八稳的。他后来宣称自己仅仅试图“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可是有些人“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转化成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对这些人进行了抨击，并坦率地承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1]（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选辑》，第312—313页）。

例如，有一个问题令他有些烦恼：在美国等国家——那里并没有需要被取代的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会采取何种形式？他在这里的论点是，资本如果没有找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就会“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52]，原因非常简单：“劳动者同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生产的基本条件。”[53]（《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51页；第2册，第310页）他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殖民理论的一章谈论了同样的观点。但他偶尔也提示说，土地所有权在美国采取的形式有些特别（《资本论》第3卷，第669—672页；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选辑》，第226—228页）。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更加深入地考察这种形式，因为我们将看到，美国人看待土地的方式从最开始就与纯粹资本主义的考虑所规定的方式最为接近，而且美国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尽管这种对

应关系即使在这里也是远远不准确的)。

晚年的马克思转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探寻土地所有权在俄国的历史。他对一种可能性十分入迷:俄国的农村公社也许为“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占有形式”提供了基础,而不用“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54]。在他看来,这种过渡能否发生取决于是否预先消除了一些“破坏性影响”——主要来自货币资本和商人资本——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会从四面八方袭击这些公社的占有形式。在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公社的传统占有形式的确有可能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55](《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书信选辑》,第340页)。

但即使就西方而言,马克思也必须承认,有大量历史上的差异把不同民族的乃至不同区域的经验区别开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些残留的特征,它们是“自中世纪的自然经济以来……一直沿袭到现代”[56]的,但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关系在历史环境中的不平均渗透,而这些环境“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需要加以仔细的经验研究[57](《资本论》第3卷,第787—793页)。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实际历史是一桩既充满混乱又使人混乱的事务。我们很难在这段历史中找出一种关于土地所有权必然向资本主义形式转化的逻辑。

这些混乱仍然与我们相伴。如果前资本主义的要素在社会中有强大的根基,因而土地所有权可以施加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农村的寡头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也依然占据上风,那么上述混乱就会成为重大论战的焦点。在这些社会中,雷伊的论点仍然是完全成立的,因为它指出,世界许多地区与土地相关的关系在使自己适应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令时都

迟钝得不同寻常。[①]

但这些混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同样明显的。正如马西与卡特拉诺（Catelano）（1978）最近证明的那样，英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再作为一种统一的、相对同质的阶级利益而存在了（甚至也许从来就不是那样），而是由混杂的、异质的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包含了古代的制度（教会、王室、大片的贵族庄园等等），又包含了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基金和退休基金），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个人所有者（包括拥有自己的房屋的工人）、公司所有者和政府机关。倘若认为地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之一”，这种观点就很难与上述异质性相调和。但我们只要努力探究这种多样性，就可以逐渐在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中找出一种指导性的核心特征，不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直接利益到底有什么要求：这个特征就是越来越强地将土地当作纯粹金融资产的倾向。这里出现了一条线索，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土地私有制是以何种形式、何种机制向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

土地如果可以自由交易，就会成为一种相当特别的商品。因为大地并不是劳动产品，所以它无法具有价值。对土地的购买“不过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58]（《资本论》第3卷，第808页）。任何收益的流入（比如年租）都可以被视为某种想象的、虚拟的资本所带来的利息。对买者来说，在他账上列出的租金是为了购买土地而花费的货币的利息，而且原则上与类似的投资——政府债务、企业股票、消费者债务等等——并没有差别。他在每种情况下花费的货币都是生息资本。土地

① 除了雷伊（1973）之外，阿明（Amin）（1976）、拉克劳（Laclau）（1977）和泰勒（Taylor）（1979）也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打造了各有特色的论述。

变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而土地市场不过是作为生息资本流通的一个特殊分支来运行的——尽管它有一些特别的性质。在这些条件下，土地被当成了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它的购买和出售是以它所提供的租金为依据的。与所有这些形式的虚拟资本一样，交易的对象是对未来收益的债权，而这指的是对使用土地所得到的未来利润的债权，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对未来劳动的债权。

我将证明，当土地的交易被还原为生息资本流通的一个特别分支之后，土地所有制就达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得出这个结论，尽管有诸多提示散落在他的文本中——这些提示表明，土地的交易确实可以被当作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805—813页）。一旦这样一种状况变得普遍了，土地持有者就全部卷入了生息资本流通的一般体系；倘若忽视这个体系的命令，就会自食其果。例如，作为所有者的生产者会面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购买土地，还是从别人那里租借土地。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做出怎样的选择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正如资本家在把自己的资金用于生产时可以从自己的资本身上获取利息和利润一样，如果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是为他们所有的，那么他们也可以从自己的资本身上获取租金和利润。但这里的角色是完全分离开来的。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生产者可以轻易地抛售土地、再从别人那里重新租借土地，也可以同样轻易地将土地抵押给银行。租金必须要么直接支付给别人，要么间接地以一种被放弃的收入的形式来支付——这种放弃是由于生产者未能将
348 土地所代表的虚拟资本发动起来，未能把这些货币投入运动、并通过生产来实现剩余价值。但这也预设了土地本身所服从的
536 生产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例如，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已经被消

灭了）。进一步讲，倘若没有精致巧妙、无所不包的信用体系，私有房地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是无法想象的。马克思极少谈论这个观点。我们将在后面第 6 节回到这个问题。

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中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应当具有哪些特征？对此加以说明肯定很有好处，无疑也很有用。但我们还应当说明土地所有权是经过何种历史过程才被还原为这样一种状况的。对土地进行让渡和交易的能力决不能保证它会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来交易，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土地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按照这样一条简单的原则来自由交易。由商品交换的增长、货币关系的扩散和信用体系的成长所构成的条件在当时的语境下有利于人们越来越将土地当作一种金融资产。土地作为一项投资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十分安全，而且按照传统，拥有土地会带来威望），所以它在剩余资本面前始终是脆弱的。剩余资本越多（包括短期的、由过度积累造成的剩余资本和长期的剩余资本），土地就越有可能被吸收到资本流通的一般框架当中。地产抵押市场的成长、作为金融资产的土地为国家带来的税收（从而强行推动了货币化）以及原始积累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货币化所经历的整个复杂历史（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这段历史做了部分叙述）也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很可能正是因为需要在土地上使生产力革命化，需要将土地开放出来、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土地所有制才被迫还原成了对纯粹金融资产的持有。这意味着农村的传统剥削形式（从农民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不再能满足一般资本的需要了（即食物和原材料的供给）。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与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变成了对抗——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正是以这种对抗为特征的。

土地被当成了纯粹的金融资产，土地持有者也被还原成了

货币资本家的一个派系，只不过他们出于无论什么原因决定持有对租金的债权，而不是对另外某种形式的未来收益的债权；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没有相互矛盾的方面。[①] 就土地而言，拥有生产资料在正常状况下意味着拥有对收益的债权，而这些收益是一种性质十分独特的使用价值所附带的（见前面第 1 节）。使用土地时的垄断权力——这是土地所有制的条件本身所隐含的——永远无法完全剥掉自己的垄断的方面，因为土地从肥力、区位等质的角度来看是五花八门的。就对租金的占有而言，由这种垄断权力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在其他种类的金融资产那里是不会出现的，除非是在特别的情况下。垄断控制当然可以在任何部门出现，但它作为一个慢性的、无法消除的方面无可避免地感染了生息资本通过购买土地来进行的流通。因此，在对未来的租金进行投机的情况中，投机“颠倒错乱的形式”和“颠倒现象”不仅会在信用体系内部达到“完成的地步”（见第 10 章），而且很可能会被极度放大。将土地所有制整合到生息资本的流通当中也许可以将土地开放出来，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却也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这种整合是在以占有和垄断控制为特征的语境下做到这一点的，因而必定会使土地投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不稳定的总体动态中获得深远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反复回到这个主题。

349

3. 租金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租金在资本主义之下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形式：垄断租金、绝对租金和两种类型的级差租金。这些范畴

① 斯图坚斯基（Studenski）与克罗斯（Kroos）（1952）记载了一些与失控的土地投机相关的比较不同寻常的情景。

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改造。在刚刚开始自己的研究时，马克思宣称：

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这是从重农学派起直到现在的理论论战的焦点。李嘉图否认这种可能性；我断定有这种可能性。[59]［《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134页］

然而奇怪的事情是，级差租金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占据了数百页，而对绝对租金的讨论是极其概括的。我将证明：马克思最初之所以关注绝对租金，决定性的原因与其说是他做过深入的理论考察，不如说是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十分入迷；他的真正贡献是把级差租金理论推向了全新的领地。

（1）垄断租金

一切租金的基础都是一定量土地的私人所有者所拥有的垄断权力。但我们可以假定——这并不会造成矛盾——由于每块土地都有不同的品质和不同的区位，所以使用者会自由地相互竞争，而土地所有者同样会为了他们可以收取的租金而相互竞争。然而，这些竞争性的状况在一些时有发生的情 350
况下并不具有主导地位。垄断租金由此就可以得到实现。有两种不同的情境似乎都与此相关（《资本论》第3卷，第775页）。第一，就一定种类的活动而言，地产所有者所控制的土地具有极其特别的品质或区位，因而也许能够从渴望使用这片土地的人身上榨取垄断地租。在生产领域中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片葡萄园所生产的酒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可以轻

易地以垄断价格来出售。在这种情况下，“是垄断价格造成地租”[60]。马克思显然并不认为这种类型的垄断租金在农业中会非常广泛地存在；但他提出，房租和地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也许只能从这些角度来解释（《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0、38页）。例如，有威望、有身份的区位为垄断租金的实现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些租金来自资产阶级的其他派系。第二，土地所有者可能会拒绝把自己控制的未曾使用的土地释放出来，除非能得到一笔极高的租金，以至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也被迫要高于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它依赖于土地的稀缺性以及土地利益集团共同的阶级权力和地位——所收取的租金造成了垄断价格。这种形式的垄断租金对于所有部门都有可能十分重要，而且有可能影响粮食作物的成本和工人阶级的住房的成本。

在这两种情况下，垄断租金当然都取决于将产品（葡萄酒、粮食或住房）的垄断价格实现出来的能力。再者，垄断租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扣除整个社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来对总的剩余价值进行的一种再分配（《资本论》第3卷，第833页）。这里的考察可以排除第一种情况，因为任何关于一般的商品生产的研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种外围的关注——它就像古董和艺术作品的交易一样。第二种情况则带来了一些更加一般的问题，我们最好联系到绝对租金来加以讨论。

（2）绝对租金

我们不难借助手头已有的工具来推导出绝对租金的存在条件。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在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的部门中推行技术变革一般是很困难的（见前面第336页）。农业是最明显的例子。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可能性：农业中的资本价

值构成要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我们假定利润率在所有部门中得到了完全的平均化，农业中的生产价格就会大大低于价值（见第 2 章第 3 节）。换句话说，一定规模的资本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多于它以利润的方式获取的剩余价值，因为各个部门是按照自己运用的劳动力来为总的社会剩余价值做贡献的，却要按照自己预付的总资本来获取剩余价值。但这个推测“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成比例的分配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流出上”[61]，而且要假定利润率的平均化没有遇到障碍。一旦土地所有权在资本的这种自由流动面前树立了一道系统性的障碍，可能就会产生绝对租金：

> 但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一些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这种特殊生产部门，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土地所有者，就作为这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在资本或资本家面前。[62]（《资本论》第 3 卷，第 761—762 页）

由此可见，农产品可以按照高于生产价格的水平来交易，从而产生绝对租金，同时又按照低于价值的水平乃至恰好按照价值来出售。绝对租金的存在可以丝毫不用触犯价值规律。李嘉图由于一种表面上的两难而否认了绝对租金的可能性，马

克思则巧妙地克服了这个两难。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过多的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十分密集（资本的价值构成较低）——被地主“攫取”[63]（这是马克思的用词）了一部分，因而这个部分没有参加利润率的平均化。诚然，商品是按照垄断价格来出售的。但这表示的是农业中的剩余价值未能由于再分配而进入价值构成比平均水平更高的部门，而不是剩余价值由于主动的再分配而进入了农业——这是垄断租金的情况。绝对租金的水平既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状况，又取决于新近开垦的土地的面积。产品价格的上涨不是租金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尽管商品仍然是按照低于或等于价值的水平来交易的[64]（《资本论》第3卷，第762—763页）。

对这种绝对租金的概念做几点评论是必要的。第一，它的有效性经常依附于对所谓的“转化问题”的成功解决（第2章第3节）。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后者所犯的“错误”彻底摧毁了他的绝对租金概念。的确，绝对租金的水平取决于可用的超额利润，但那是在所有相互作用和反馈作用都已经得到考虑之
352 后。我认为，不仅马克思的绝对租金概念远远没有受到干扰，而且他关于绝对租金的思路说明了转化过程应该如何得到恰到的解释。[①] 马克思的目标是识别出剩余价值在社会过程中（特别是在市场交换中）建立了哪些分配规则，并证明这些规则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完全分离的，因而双方有可能发生冲突。假如生产与分配之间没有这样一种分离和对立，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整个解释就会倒塌。我们现在遇到的是这种对立的一个特定版本。由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必要性所导致

① 通过援引马克思在1862年的书信，雷伊（1973，第40页）证明了正是对租金的研究将马克思引向了（与价值相区别的）生产价格的概念，而不是从后者到前者。

的分配安排——即占有租金的能力——有可能与持续的资本积累发生冲突。马克思最终试图向我们证明，对农业的“合理”组织是不可能达到的。土地的使用必定是不合理的，这不仅是从满足人的欲求和需要的观点来讲的（因为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是从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持续积累的立场来讲的。这是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到这一点。

第二个要点是：绝对租金既取决于地主是否有权力针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来制造一道障碍，又取决于农业中较低的资本价值构成是否能延续。倘若价值构成变得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了，绝对租金就会消失（《资本论》第3卷，第765页；《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44、393页）。那么，土地所有权给投资的自由流动造成的障碍在何种程度上阻拦了农业的改进，从而确保了绝对租金的延续所需的基础？马克思只在一个地方略微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12页），而且这似乎不是他的主要观点。的确，土地上时代错乱的社会结构——例如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与农业生产力的滞后相关联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绝对租金与这些结构的延续拴在一起。他反倒是联系到大规模的土地所有制——它是向资本主义农业开放的——来考察绝对租金的。农业中较低的资本价值构成可以更多地归因于这个部门在技术和科学上的滞后，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一旦农业追赶上来——它在某个时刻必须这样做——绝对租金就消失了，土地所有者就只能收取垄断租金，如果有可能的话。[①]

① 雷伊（1973）将马克思的绝对租金理论描述为一场“惨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就一些终究只是细枝末节的东西提出了许多细致的理论。但是雷伊倾向于从这样一场“惨败”出发来斥责马克思的全部租金理论，而这是严重错位的。

但如果地主的权力足以榨取绝对租金，他们为什么不迫使
353 商品价格超过价值、达到一个任意的垄断价格，以便同时获取垄断租金？他们有可能，也经常会人为地使土地退出生产，从而抬高余下土地的租金（《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332—333 页；《资本论》第 3 卷，第 757 页）。答案是：地主在某些状况下也许的确会这样做。但是后果是根本不同的。就绝对租金而言，地主并没有直接干涉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们只是在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方面进行了干预。垄断租金则主动扼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在这些租金被加到消费者身上时，当然就不是那样了），并迫使剩余价值从其他部门再分配到地主手中，而不是再分配到农业当中。两者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也很可能是相当不同的。

然而，这两种类型的租金都取决于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将垄断价格实现出来的能力。因此，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同时限制了地主占有绝对租金和垄断租金的能力（第 12 章将讨论这种竞争的空间方面）。虽然土地所有权有能力凭借对土地的拥有来给投资树立障碍，但这种能力并没有自动假定这片土地的使用者有资格为自己生产的商品索取垄断价格，也没有自动假定作为资本家的生产者愿意支付地主索取的过于高昂的租金。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认为“在正常条件下”，农业中就连绝对租金也索取得很少，不论生产价格与价值有怎样的差别[65]（《资本论》第 3 卷，第 771 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马克思为什么相当概括地讨论了这个最初对他显得极为重要的问题。绝对租金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他发现，真正的理论问题与其说是李嘉图未能承认绝对租金，不如说是李嘉图错误地解释了级差租金。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个话题。

（3）级差租金

在较早的著作中，马克思显然认为李嘉图关于级差租金的表述是合理的、不成问题的。但在《资本论》中，他逐渐发现了李嘉图的表述中的问题和疑惑，并概括性地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极少对这种理论做出提示，《资本论》也根本没有对它进行完整的研究。然而，鲍尔和法恩最近的著作逐渐阐明了马克思在那几章里的雄心壮志，虽然那几章看似充满了迂回的论述和细致的算术运算。①

推导级差租金的第一形式（DR-1）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得到了描述。当土地被用作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时，其中的产品的市场价值是由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来规定的——这 354
种土地之所以具有最高的生产价格，是因为它的肥力和区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组合。因此，较好的土地上的生产者可以获取超额利润。如果我们假定资本在不同品质的土地上得到了同等的应用，这种超额利润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永久的特征。它们可以在不影响市场价值的情况下转变为DR-1。换句话说，DR-1是由个别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别来规定的，而市场价值是由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条件来规定的。这个概念原则上与李嘉图所提出的概念并没有差别。

诚然，马克思修改了李嘉图的看法：他证明了当区位和肥力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得到了考虑之后，农业就可以轻易地向更加肥沃的土壤扩张，并同样轻易地向更加贫瘠的土壤扩张（这取决于这些土壤所在的位置），因而李嘉图在总体上的假定——农业中的回报是递减的——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十分有趣的是，马克思本人在打造他的论述时又把区位从考察中

① 接下来我将高度倚重鲍尔（1977）和法恩（1979），特别是后者。

排除出去了，并仅仅专注于肥力（《资本论》第3卷，第651页）。这种排斥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区位优势不仅对于农业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工业的某些分支同样重要——这削弱了农业的情况的独特性。还会发生一种情况：区位优势的“永久性”处于无休止变动的进程中，造成变动的是对交通的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地理分配和人口的地理分配的转变。因此，区位优势会出于同农业本身也许毫无关系的原因而改变，而且这些原因无论如何都是大致处于个别生产者的控制之外的。高度复杂、高度普遍的社会过程导致了变化的发生，尽管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所有类型的）地租的投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马克思在他的图景中排除了投机（《资本论》第3卷，第776页）和区位，也排除了不同的用途之间的竞争。我们将在后面第6节谈论这些问题。

鉴于这些简化的假定，DR-1是很容易解释的。它反映了使肥力的差异变成生产的永久特征所需的物质条件。土地所有权如果占有的是DR-1，就会在市场价值的决定过程面前采取中立的立场，因而就资本积累的滞后或其他任何社会弊病而言，它都可以免受一切责备。

一旦我们在这幅图景中引入了级差租金的第二形式（DR-2），这种解释就要经历实质性的修改了。我们可以相当轻易地为DR-2设立一个脱离DR-1的版本。它不过是表达了资本在肥力相等的土地上的不同应用所产生的结果。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DR-1必须始终被看作DR-2的*基础*；他的研究的整个旨趣正是探索这两种租金形式到底是如何“同时互为界限”的[66]（《资本论》第3卷，第737页）。最终要紧的是
355 这两种租金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那么容易理清的。
546 马克思正是在这里最为彻底地离开了李嘉图，并为一般的租金

理论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然而，我们要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倘若每个地方的土地都有相等的肥力（而且区位是没有影响的），那么 DR-1 就不存在了。倘若所有生产者投资在自己的土地上的资本都具有恰好相同的数额——这叫作“正常的”资本投资——那么也不会有 DR-2 了。但若一些生产者所投资的资本多于“正常的”水平，并按照他们所投资的资本的比例赚取了回报，那么他们的个别生产价格就会低于由“正常”资本的应用所规定的市场价值。于是，这个差额的全部或一部分可能就会作为 DR-2 被地主占有。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资本流动是由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来组织的。我们假定了农业是完全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且“没有一块土地是不用投资就提供产品的”[67]（《资本论》第 3 卷，第 704 页）。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从一些独特的条件出发——这些条件依附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土地私有制的现象——来理解资本是在何种逻辑的引导下流入农业的。在构造关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地租形式的理论时，这显然是我们所面临的所有任务当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本——它被看作价值的流动——在这里要面对一种独特的情况：它必须主动经过土地本身来流动（土地是为他人所有的），才能作为剩余价值得到实现。

我们可以立刻提出一些评论。资本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积累的步伐和资本在农业中的积聚，但它对于信用体系的存在和在资本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总体状况也是高度敏感的——“在资本紧迫时期，即使未耕地能给租地农场主……提供平均利润，也不足以”使资本流入农业，而“在资本过剩时期，即使市场价格不上涨，资本也会涌到农业上来”[68]

（《资本论》第3卷，第770页；参见第676、690页）。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使这些外部条件保持不变，尽管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过度积累的倾向（第7章）与固定资本在农业中创造的改良（第8章）可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还应该记住，有时会发生地主同时是金融家的情况，而这时有可能出现一些独特的流通形式。在这些情况下，地主所占有的货币租金可能会在流通中直接作为信用回归农业。由此，地主同时收取了租金和利息，生产者的所得则局限于企业利润——在压迫性特别强的状况下，企业利润可能到头来更加类似于管理者的工资。

然而，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考察资本的
356 “正常”流动所发生的转变具有哪些后果。马克思认为，这可以是一种由连续的投资所造成的“逐渐的”变化——“新的经营方法一旦普及，成为标准的经营方法，生产价格就会下降”[69]（《资本论》第3卷，第706页）。因此，DR-2的基础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遭到侵蚀。由于DR-2是把资本的流动转到土地上所得到的产物，所以它至少在一开始必须同样被看作一种短暂的而非永久的结果。那么，地主如何能有资格占有DR-2？一旦投资创造了永久的改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连续的投资往往可以相互累积，而不是使对方丧失价值），最明显的例子就出现了，尽管这个例子也是最无趣的。“这种改良虽然是资本的产物，但起着和土地性质的自然差异完全相同的作用。”[70]（第707页）但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投资破坏了“肥力相等”的假定，从而为占有DR-1创造了基础。肥力最终是社会的产物。DR-2直接转变成了DR-1。

因为DR-2“在任何一定的瞬间，都只是出现在这样一个
548 领域内，这个领域本身又是级差地租I的形形色色的基础”[71]

(《资本论》第3卷，第677页)，所以还会出现一些更加有趣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会发现，DR-2只有在DR-1的基础上才能被占有。正是后者将前者的原本十分短暂的性质转变成了永久的结果，而这种永久性足以让一种对租金的占有得以发生。让我们看一下这是如何可能的。

由于肥力始终意味着“一种经济关系”，所以它会随着“发展水平”而变化[72]（《资本论》第3卷，第651页；前面第336页）。因此，倘若脱离了“正常”资本的应用（以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方法），就无法识别出最差的土地。但是“正常的”资本也必然会随着土壤的本质而变化（假定生产同样的商品，适用于重黏土的“正常”资本就不适用于轻质壤土）。由于资本在应用时所面对的肥力是五花八门的，所以“正常”资本的概念就变得同样五花八门了。因此，“正常的”情况是资本在肥力并不相等的土壤上得到了不相等的应用。由此，马克思考察了当人们进行额外的资本投资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他考察了九种情况，并按照两种方式把它们做成了交叉列表：市场价格是保持不变、上升还是下降；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相对于第一次投资是提高了、降低了还是保持不变。只要借助特殊的组合，马克思就能够展示出一些情境，其中“最差的土地”要么退出了耕种，要么仍然是调节器，要么被更加劣质的土壤所取代了。DR-1——我们最初认为它反映了永久的差异——现在变得可变了，而变动的依据是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这是由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反映的）以及流入农业的资本的生产率。进一步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即使投资的生产率正在下降，也无法导致市场价格的上涨，除非这些投资是在最差的土地上进行的（第680页）。由于增加的投资在正常情况下会被用于较好的土地，所以生产在较好的土地上的不断积聚完全有可能

导致市场价格的下降和 DR-1 的减少——甚至在投资会造成回报递减的状况下也是如此——因为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彻底停止了（市场价格的调节器由此变成了较好的土壤）。

这一切有两个直接后果。第一，正如法恩（1979，第 254 页）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假定 DR-1 与 DR-2 的相互作用仅仅是一种相加”。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种租金形式实际上是如何“同时互为界限”的。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也都不再可能把这两种租金形式分离开来了，不再可能区分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结果与肥力的自然差别所带来的“永久的”结果。对租金的占有所需的真正基础变得隐晦了。最终，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级差租金，却不知道它的起源。但是土地所有者占有它的确切方式对市场价格和资本积累确实是有影响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论述尤为有趣的第二个后果变得明显了。

让我们考察一种情况：生产率递减的追加资本被应用到了最差的土壤上面。“是生产价格平均化为平均价格，还是第二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变成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完全取决于“土地所有者”是否能“赢得时间，把在需求满足以前……所得到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固定下来”——他是按照第二次投资所决定的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的[73]（《资本论》第 3 卷，第 744 页）。土地所有权的干预在这里影响了市场价值，而且土地所有者在资本积累面前的中立姿态也削弱了。

让我们反过来考察另一种情况：生产率递减乃至生产率为负的追加资本来到了优质的土壤上，而市场价值始终保持在由最差的土壤上的生产条件所规定的水平。由于没有占有租金，所以“直到最好土地的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和一般生产价

格变得相等……以前，还可以……使用生产率不足的、甚至生产率越来越不足的追加资本”，从而消除了优质土壤上的超额利润和级差租金。然而，“在土地所有权规律的支配下……追加资本尚能按一般生产价格来进行生产的情况形成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同一土地上的追加投资就必须停止……这样一来，在生产率不足的场合下，个别平均价格的平均化就遇到阻碍”[74]（《资本论》第 3 卷，第 735 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的干预和对租金的占有似乎就资本积累而言产生了有利的结果。它们妨碍了资本沿着原本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渠道（尽管并非不生产利润）来流动。

最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所有权关系在“自古就从事耕作的国家”[75]与在其他国家的不同影响——在前者那里，尚未耕 358
种的土地存在某种“最低价格”，而在后者那里，资本在流动时的唯一阻碍是清理新的土地所花的成本。很明显，后者会产生粗放的投资形式，前者则会产生密集的投资形式（《资本论》第 3 卷，第 672 页）。然而，“资本在较小土地上的积聚……会增进每英亩的地租量，而在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在较大土地上的分散……却不会引起这个结果”。因此，“如果有两个国家，它们的生产价格是一样的，各级土地间的差别是一样的，所投资本的总额也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一国主要采用在有限土地上连续投资的形式，另一国主要采用在比较广阔的土地上并行投资的形式，那么，每英亩的地租，从而土地的价格，在前一个国家就比较高，而在后一个国家就比较低，虽然地租总额在这两个国家是相等的”[76]（《资本论》第 3 卷，第 692 页）。

所有权可以对市场价格、资本积累、生产的分散程度等方面造成积极的、消极的或中立的影响。还有一条附带的结论：级差租金在某些状况下甚至可以在最差的土地上产生（《资

本论》第3卷，第44章）。[①] 马克思在早得多的时候就得出了这些一般结论，只是没有用任何证据来加以支撑。他写道："地租……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产品价格，但它决定生产方式；是把大量资本集中在少量土地上，还是把少量资本分配在大量土地上；是生产这种还是生产那种产品。"[77]（《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15页）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对租金的占有对于资本积累是有社会必要性的、完全是破坏性的，或者是一个无关的问题。这条结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土地所有权和对租金的占有在资本主义之下自相矛盾的作用。

4. 地租和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相矛盾的作用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不只是一个"历史前提"，而且"始终是它的基础"[78]（《资本论》第3卷，第617页）。这意味着对租金的占有和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所需的社会必要条件。这样一种社会必要性的基础必须得到牢固的确立。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倘若资本主义要继续存在，那么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它对于挡在路上的其他社会障碍一向是毁灭性的——就要让土地所有权完好无损（尽管是以一种经过转化的状态），并让
359 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直接剥削工人，也不……说出一些在道义上宽慰自己的理由"——得以占有租金（这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原本可以累积到资本当中）[79]（第829页）。简言之，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再生产有何种现实的社会基础？

① 法恩（1979，第266—268页）考察了租金如何可能在最差的土地上产生。

马克思的答案非常清楚：

土地所有权却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它的作用只限于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不过，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某种作用，不仅因为他对资本施加压力，也不仅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前提和条件（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进行剥夺的前提和条件），而且特别因为土地所有者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条件之一的人格化。[80]（《资本论》第 3 卷，第 821 页）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三种作用。

（1）劳动者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的分离

“假如土地……供每个人自由支配，那么，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他人的无酬劳动的‘生产’，就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完结了。”[81]（《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册，第 43—44 页）由于土地作为一种原始的生产条件具有根本性，所以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拉进商品交换，或者必须被迫进入商品交换。地主从农民身上榨取租金的行为具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迫使农民告别了他们的至少一部分产品，而不是自己消费这些产品。但是资本若要达到对劳动的完全支配，就必须首先形成一支雇佣劳动大军，即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原始积累要使人离开土地，才能产生雇佣劳动者。一种特定形式的土地所有权承担了这个历史角色，而且会继续承担这个角色，如果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拓展和深化还需要它的话。当资本遇到土地私有制并

不存在的局面时，它就必须主动采取步骤来创造土地私有制，以便确保雇佣劳动的产生。资本主义需要使劳工没有机会获得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这种需要丝毫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前进而减弱。实际上，它始终是一种永久的必要性，如果资本与劳动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需要得到确保的话。

对资本主义的延续来说，土地所有权在劳动与土地之间设下的障碍具有社会必要性。但在给劳动制造土地所有权这道障碍时，资本也给自己制造了障碍。为了让雇佣劳动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对租金的占有也变得可能了。这正是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的矛盾地位的一个方面。

（2）土地所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原则

资本家要组织劳动与土地的分离，就要确保“土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如果土地变成国有，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权……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8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4页）。土地国有制不应该与“人民所有”相混淆——后者实际上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基础[83]（第104页）。但在土地国有制和对租金的废除面前有一道严峻的障碍。资产阶级的许多成员（包括资本家）都是土地所有者；除了这个客观事实之外，“对一种所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84]（第44页）。这另一种形式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资本从中得出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性。因此，对土地私有制的维护乃至强化可以为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发挥意识形态的和合法化的职能；所以有人认为，把拥有房屋的特权（即占有一种生产资料的特权）赋予工人阶级是很重要的。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将租金看作一种附加的支

付（side-payment）；之所以让土地所有者得到租金，是为了维护一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土地所有权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和司法的方面具有重要的后果，但它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租金形式，也不足以解释土地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形式所造成的矛盾。

（3）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流动

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对租金的占有，资本在土地上的流动和经过土地的流动——土地既是生产条件，又是生产资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发生了改变。尽管我们大量谈论了土地资本为资本流动带来的“障碍”，也大量谈论了对租金的占有给资本积累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是土地所有权其实还起到了一种作用：它强行推动了资本在土地上的恰当的配置。困难的是确保这种积极作用可以得到加强，消极作用则可以受到限制。

在垄断租金和绝对租金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所带来的障碍很难在资本主义的基本要求面前得到辩护。因此，就资本在土地上的恰当配置而言，从而就有效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资本积累的维持而言，对这些租金形式的占有必须被看作一种完全消极的影响。出于这个原因，一般资本的利益显然在于使绝对 361
租金和垄断租金受到严格的约束，确保它们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马克思坚持认为它们必须如此），而且只会零星地出现。

最有趣的问题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的：两种形式的级差租金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前面第3节）对市场价格的形成、资本的积聚与分散以及资本积累可以具有积极的、消极的或中立的影响。不幸的是，针对垄断的和绝对的租金形式的大多数抨击——同时也针对土地所有者在这些情境中寄生的、多余的作用——都延续到了对级差租金的讨论当中。因此，人们强调了

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极少注意到它的积极作用：它协调了资本在土地上的流动和经过土地的流动，从而大体上支持了进一步的积累。让我们从积极的方面考察一下土地所有权。

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使农业合理化"，使得农业可以按照"社会化的方式"、凭借"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运用"来经营[85]，并能够产生剩余的农产品，而这对于资本在工业生产中的积累至关重要。至于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能否达到恰当的均衡，以及社会中的总劳动在农业内部的各条生产线上能否达到恰当的配置，这些都十分关键地取决于土地上的资本和经过土地的资本是否能够自由流动（《资本论》第3卷，第617—618、635页）。与所有先前的或别样的控制土地的方式相反，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之下采取的形式表现为一组完全与资本的要求相适应的最佳安排。虽然这些安排也会导致对地租的占有，但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土地得到了解放，转化成了可供资本运行的开放场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59页）中非常简练地说道："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86]——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它还把土地的经营同资本积累连在了一起。

对级差租金的占有在一种意义上加强了竞争，而不是限制了竞争。通过把相对永久的超额利润作为租税收走，地主起到了在相互竞争的生产者之间使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生产者既然要相互竞争，就必须以新的生产方法为基础来竞争（与在工业中一样，这些新方法可能很快就变得普遍了），而不是以"不公平"的优势为基础来竞争——这些优势要么来自"大自然的赐予"[87]，要么来自继承下来的前人的辛劳，这些辛劳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以前。在不公平的优势被消除之后，竞

争就会迫使生产者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使生产合理化。这条原则的延续是对资本主义在竞争中产生的空间组织的合理化，我们将在后面第6节看到这一点。

麻烦的是，人们没有办法确保租金的占有者会得到，而且只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回报。马克思对级差租金的分析的卓越之处现在变得明显了。DR-1（这是仅仅由于地主而存在的）与DR-2（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而存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不可能区分谁应该得到多少：实际的关系变得隐晦了。地租的存在不仅将土地的使用同竞争和随之涌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了，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困难。地租最初表现为一种可以带来合理化的巧妙手法，可以协调在土地里面和土地上面的投资，最后却成了矛盾、混乱和不合理性的根源。[①] 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解释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活跃斗争。某种社会过程必须公开而清晰地从实际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立场来规定已经变得隐晦的东西。

5. 地主与资本家的分配关系和阶级斗争

每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出来的总价值是按照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利润和税收的形式来分配的。租金在这份年度总价值中的均衡份额是多少？这种均衡份额是如何决定的？最明显的答案是诉诸各个阶级的相对权力，并把分配关系看作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从土地所有权的立场来看，这样一种斗争具有多个维度，因为土地所有者站在了土地的全体使用者的

① 这解释了《资本论》（第3卷，第617—622页）中一个原本有些令人困惑的主题：土地所有权同时被看作使农业生产合理化的重要手段和各种各样破坏性影响的根源。

对立面——资本家（他们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或者仅仅用作空间）、农民、工人、金融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诸多其他派系。所占有的租金既可以出自收益（由此产生了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又可以出自在生产中直接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地主多半不关心租金的特殊来源，只要租金一直滚滚而来就行。

马克思关于地租的理论研究仅仅探讨了在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地主与资本家那里的相对份额。但它要求我们观察与分配份额相关的明显斗争——这种斗争表达了一些更加深层的力量，它们限定了相关阶级的相对权力。

让我们以地主与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为例。倘若
363 后者被看作独立的、控制了自己的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地主对他们来说就直接存在于剥削关系当中，而且有充分的动力勒索尽可能多的租金，以便迫使农民进行劳动，并迫使他们扩大商品生产。地主与农民直接展开了斗争。决定结果的是力量。[①] 资本的利益——常年获得充足而廉价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给——在于同地主结盟，并促使土地上的剥削水平不断提高。

倘若地主所占有的租金是来自将土地用作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局面就非常不同了。前者如果足够强大，就可以占有资本家的大多数利润。但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些限制性的情况，它们会实质性地改变阶级关系。地主虽然可以强迫农民进行劳动，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强迫资本家进行投资。由于最大化地榨取租金会减少资本在土地上的流动，所以这对地主来说显然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实际上，我们只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就会看到地主有强烈的动力将土地开放出来，供资本流动。毕

① 地主试图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而不是榨取直接作为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地主与农民的斗争同与工作日相关的斗争进行类比。

竟，土地的使用价值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让他得以占有租金，因而要紧的只是每英亩的租金。土地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则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生产资料：要紧的是预付资本当中的租金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这两个视角的差别让一片“妥协的地带”得以存在于它们之间。例如，在预付资本的租金率保持不变乃至减少的同时，土地的租金率却可以继续上升（《资本论》第 3 卷，第 683 页）。在某些状况下，地主有强烈的动力保持被动，并将土地所有权在资本的流动面前设下的障碍降到最低。①

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被还原为一种永久的和谐。例如，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与作为独立生产者的资本家是不容易区别的；地主也未必足够老练，在碰到资本时未必能看到转换策略、调整眼光的好处——他们原本的策略是最大化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租金。再者，社会劳动的发展导致了“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88]，因而土地所有权变得“越来越能够攫取”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了[89]（《资本论》第 3 卷，第 637—639 页）。哪个地主在赢得了这样一种能力之后会忍住不用呢？地主陷入了无休止的困境：要么拿得太少，而这是明显的愚蠢；要么拿得太多，而这会招致惩罚。

364

同样的张力盘旋在与永久的改良相关的契约条款上面。改良虽然也许是由资本家实行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就会“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例如，建筑物所带来的利益

① 我们可以立即看到，这意味着地主应该把从农民身上榨取的租金最大化，并压低从农业资本家身上占有的租金。波斯特尔－维奈（Postel-Vinay）（1974）提供了大量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雷伊误解了这些发现的意义，从而以为它们不符合马克思的租金理论。

“在租约有效期间，属于产业资本家即建筑投机家或租地人”，但之后就“和土地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最终使他的地租上涨”。这是“土地所有者日益富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一”。但这也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同时还是对建成环境其他所有形式的投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人会“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90]（《资本论》第3卷，第619—622页）。

租佃的期限和条款以及对资本投资的公正补偿——资本投资带来了永久的改良——会引发斗争，这种斗争不出意外地在资本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中成了订立契约时的核心问题。与关于工作日的契约一样（这实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核心），这种斗争最终也是由国家通过法律或判例来调节的。

这种斗争的结果对资本积累有重要影响。如果资本对于它自身所创造的永久改良取得了永恒权利，超额利润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中就会成为一种永久的而非暂时的特征。原本将土地的开发与竞争拴在一起的力量淡化了。社会劳动在各种活动中的配置会遭到扭曲，无法符合平衡的积累。各种活动在空间中的过度积聚几乎肯定会发生。诸多严重的不平衡会在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中出现。

地租理论表明，若要避免这些结果，土地所有权就必须无情地占有任何一种永久的优势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不论这种优势是否由人的能动性所创造。但若地主的占有过于快速或过于残酷，最初对投资的刺激也就会淡化。在这两个相反的要求之间是否有可能识别出一个均衡点？最显而易见的均衡点是在投资全部摊销的时候。但这个均衡点是很难识别的，甚至也许不可能识别出来，因为这些投资在物理上的使用期限

是极长的，而它们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受制于一般的固定资本流通所面临的一切含混（见第 8 章）。由于固定资本的使用期限是按照利率来标准化的，而且由于租金类似于一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所产生的利息，所以这种冲突至少是由某种社会过程调节的（尽管利率并不完全是一种连贯的或没有矛盾的调节器，正如我们在第 9 章和第 10 章看到的那样）。

虽然这一切涉及了明显的张力，但这些张力有诸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资本主义社会史的立场来看，最有趣的解决方案也许是由所有者占据的家庭农场。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产者既是资本家，又是土地所有者，因而这两个角色的冲突仿佛就消失了。马克思把这样一种情境视为一种例外和巧合（《资本论》第 3 卷，第 751—752 页）。他的理由很难否认。作为所有者的占据者要偿付购买土地的价格；即使土地是终身保有的、已经留传了许多代，也不能漫不经心地把被放弃的收入丢到一边——这种放弃是由于虚拟资本被土地的“价值”封锁住了。在许多情形中，所有者在名义上的占据掩盖了一种地产抵押关系（这等同于租金）和一种信用关系（这等同于在当前的生产中使用的借贷资本的利息），只将企业利润留给了作为所有者的占据者。由于土地所有制保证了生息资本的流通，所以农业中自有产业（owner-occupancy）的现代形式不过是完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可以期望的一切。实际上，这里有可能出现一些怪异的流通形式，值得加以更充分的研究。倘若生产者依附于契约，亲自从事大多数劳动，而且欠了金融机构一大笔债务——原因是地产抵押支付和在当前的经营中欠下的信用——那么这位名义上的“作为所有者的占据者”或许就更应该被看作一名管理者乃至劳动者，他收取的是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种“计件工作”的份额。我们有必

要一如既往地穿透表面现象，确定实际的、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关系。

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最为明显地发生在三个方面：（1）契约的条款如何调节土地的使用；（2）租金有多高；（3）租期有多长，以及如何对改良加以补偿。不过，还有一些更加一般的因素也会影响分配安排。地主的收益——租金——构成了资产阶级总体收益的一部分。这些收益既可以被贮藏起来，又可以被重新投入流通。在前一种情况下，一般的资本流通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在后一种情况下，收益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奢侈品等等来继续流通，或者可以转变为货币资本，并通过信用体系来流入生产和消费。收益的使用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购买奢侈品而回流的收益可以在刺激有效需求时起到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无法为资本解决“实现”
366 的问题（第3章）。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也是作为社会的“消费阶级”之一来运行的，他们的活动被整合到了资本流通的总体动态当中。但鉴于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的定位，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活动扰乱了农业与工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基本的工资品的生产（特别是食物的生产）与奢侈项目的生产之间的必要的比例关系。

地主将收益用作货币资本的情况推敲起来更加有趣。它显示了土地所有权与银行强有力的潜在联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种联系很容易观察到，而且极为重要。它还意味着一种强大的潜力：一边发动剩余产品离开土地（方法是迫使生产者进入商品交换），一边通过从无数小生产者身上占有租金来集中资本——尽管是集中在土地所有者手中。地主只要以生产性的方式来使用他们所集中的资本，而不是进行炫目的消
562 费、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就会在资本积累的历史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非常核心的作用。

实际上，资本主义所赢得的胜利之一正是迫使土地所有者发挥这样一种积极作用，并把这作为他们存活的条件。但这里有一条尤为普遍的阶级斗争的阵线，因为土地利益集团肯定未必愿意把自己掌控的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也未必愿意把自己集中的货币权力仅仅用作需要投入流通并成为资本的货币。但是货币的社会权力最终注定要支配土地的社会权力。使用土地来获取货币长久以来就是土地利益集团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所追求的目标，而这在长期意味着土地所有权会融合到所有类型的食利者当中——这一点是简单明了的。[①] 土地利益集团失去了自主的、独立的作用，而且必然会转化为资本本身的一个派系。土地利益与工业利益的斗争在19世纪的英国是历史性的，性质相似的斗争也一直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国家进行；但是土地利益与工业利益会在生息资本流通的框架中同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转化，上述斗争也都必须被放到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个过程中，租金在生产出来的总的剩余价值中的份额只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是两个准独立的社会阶级公开的阶级冲突的产物，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内化到了对生息资本的流通加以规定的逻辑当中，而生息资本是在诸多形式的虚拟资本——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产生的——中间流通的。这促使我们更加直接地研究生息资本是如何逐渐通过土地本身来流通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6. 土地市场和虚拟资本

① 斯普林（Spring）（1963）和汤普森（1963）记录了英国的土地贵族是如何作为资本家、金融家等等被逐渐吸收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的。

367 马克思并没有对土地市场展开任何详细的分析。在他看来，构造地租理论具有优先性，因为他认为真正的理论挑战是在这个地方。但当我们认为货币的起源植根于体现在商品中的不同价值形式时，我们并没有面面俱到地说明货币和信用的作用；同样，用资本化[91]的地租来约束土地价格的起源也没有穷尽关于资本主义之下的土地市场可以说出的全部重要内容。土地市场展现出了独特的性质，也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它们值得从它们本身出发来加以分析。

地租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土地——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如何可能具有价格，如何可能作为商品来交换。地租构成了土地的“价值”；通过资本化，它成了某种想象中的资本的利息。人们购买和出售的不是土地，而是它所带来的地租所有权证书。所花费的货币相当于一种生息投资。买方取得了对预期的未来收益的债权，即对未来劳动果实的债权。简言之，土地的所有权证书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见前面第 266—270 页）。“如果资本作为货币、土地、房屋等等出租，那么它作为资本就变成商品；换句话说，在这种场合，投入流通的商品就是作为资本的资本。”[92]（《大纲》，第 724 页）我们已经确立了这些观点。①

对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价格加以调节的基本力量是利率和对未来租金收益的预期。利率的变动会在一个总体框架中——界定这个框架的是资本积累同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见第 9 章和第 10 章）——施加强有力的时间节奏，并引起土地价格的变动。利率下降的长期倾向或货币资本的暂时

① 就土地的持有而言，社会动力——威望、象征性的重要地位、传统等等——在实践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在这里将它们从考察中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在纯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并没有直接的根基。

过剩一般会导致土地价值的提升（租金则保持不变）。

对未来租金的预期是不断变化的——它是由未来的资本流动和未来的劳动所约束的——而这同样会影响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出于这个原因，就连未曾使用的土地也可以获得一个价格（《资本论》第3卷，第669页）。土地的交易中始终存在投机的要素。我们现在必须确立这一点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大体上把投机从他的眼界中排除出去了。然而，他的确谈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提到，就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住房建设而言，建筑业的利润是极少的，而“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而取得的”[93]，因而“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94]（《资本论》第3卷，第774—776页；第2卷，第234页）。土地持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采取被动的立场。他们起到了主动的作用：他们所创造的条件让未来的租金得以成为占有的对象。当前资本的预付和劳动的应用确保了未来租金的增加。

368

这种情况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而马克思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意义。土地持有者可以主动追求对价值的占有，由此将土地上的生产强行推入新的格局，甚至把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和强度推到原本也许达不到的水平。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当然要以土地本身的名义来强迫未来的劳动承受不断提高的剥削水平。运行在土地上的虚拟资本不仅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而且产生了矛盾，值得加以仔细地审视。它发挥了某些重要的协调职能，从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逻辑中使对租金的占有既得到了合法化，又得到了辩护。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生息资本一般有助于在不同的生产线之间协调劳动力的配置，并使利润率平均化；它在土地市场中的流通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协调了土地的使用。土地的

独特性给这个过程添加了一些新的疑惑。在实践中，资本家极少会被迫放弃自己在一块特殊的土地上享有的相对永久的优势（即肥力或区位），因而极少会推进另外的使用土地的方式，尽管后者可以产生更高的租金；特别是如果对这样一种变化进行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立刻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被收走，他们就更加不会那样做了。一旦生息资本在土地市场中的流通是为了无休止地寻求未来地租的提升，并对土地的价格做出相应的规定，那么局面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生息资本的流通在土地上推进的业务是与尽善尽美的使用方式相符的——这些使用方式不仅从当前来看，而且从对未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预期来看都是尽善尽美的。土地所有者如果将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就恰好执行了这样一项任务。他们对资本进行强制（例如通过抬高租金），或者与资本合作，以便确保提升的地租可以被创造出来。在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积极主动地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前者承担了开发商的角色，试图获取提升的租金，资本家则获取利润。[①] 于是，马克思所提到的那类情境就实在太容易出现了：提升的租金远远超过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利润。

通过无休止地争取将土地投入“尽善尽美的使用方式”，地主创造了一种排序的手法，可以用来筛选土地的用途、强行配置资本和劳动，而这些配置原本也许是不会出现的。通过对
369 未来的展望，他们也将一种流变性和活力注入了土地的使用，而这种流变性和活力原本是很难产生的。土地所有者在这个方面越是活泼，土地市场就越是活跃，土地的使用也就越是可以

①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开发商的角色所进行的最好的理论研究之一出自拉马什（Lamarche）（1976）。

联系到社会要求来调整——在当前的情形中，社会要求就是资本积累。

就资本主义之下的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和对租金的占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论述了。不仅对租金的占有具有社会必要性，而且土地所有者肯定必须在追求租金的提升时起到主动的作用。这种行为并没有任何前后矛盾，条件当然是土地仅仅被当作一种金融资产，一种向所有投资者开放的虚拟资本的形式。生息资本越是自由地在土地上游荡，寻找可以占有的未来地租的所有权证书，就越是可以良好地完成它的协调作用。

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土地市场越是开放，剩余的货币资本就越会不顾一切地筑起堆积如山的债权，并试图通过对土地上的生产本身进行掠夺和毁灭来实现自己过多的期望。对占有的投资——这对于上述协调职能的发挥是极为必要的——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95]和可能十分严重的扭曲的根源。对土地的投机对于资本主义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投机泛滥会周期性地成为毁灭资本本身的泥沼。

如果我们研究空间组织的问题——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个话题也从他的理论眼界中排除出去，仅仅把它作为一项外围的关注——这些协调的力量连同它们的消极后果所具有的意义就特别明显了。土地市场塑造了资本在土地上的配置，从而塑造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地理结构、空间中的技术分工、再生产的社会经济空间等等。诸多经济主体都可以回应由土地的价格所形成的信号。土地市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联系到竞争推动了地理结构的合理化。

进一步讲，土地所有者在地理结构的形成和转换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动的作用——条件当然是他们要将土地当作纯粹的

金融资产。让我们考察一下交通的联络。使这些联络革命化的刺激源自一种需要：减少商品的流通时间，在地理上对市场加以延伸，以便制造一种可能性，即让原材料的投入变得廉价，使实现的基础得到扩大，并同时加快资本的周转时间。如果租金取决于相对区位，而且相对区位很可能由于交通的改善而发生转化，那么对运输的投资很可能就会提升相邻地区的土地的价值。土地所有者很可能会因此而获利（或亏损）。他们对交
370 通的投资所在的地点和时间拥有相当保险的利益。他们甚至也许会愿意在蒙受损失的情况下推进这种投资（但是最好还是使用别人的货币，或者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以便从地租的提升中获益。这个诡计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就被英国的土地利益集团学会了，而且自那以来就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侧面。

土地所有者一般会卷入一种竞争：哪一种特殊的开发模式、哪一组特殊的投资和业务在提升未来的租金方面拥有最佳的前景。在按照竞争来塑造使用土地的地理模式时，提升的租金在土地持有者中间造成的竞争是决定性的。土地市场的存在使协调成为可能，而且价格信号就此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种竞争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消极后果。剩余资本可能会以挥霍的方式被投入运作；个别的土地持有者由于会按照自己的直接利益来行动，并试图使自己可以占有的地租最大化，所以或许会用一些从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的立场来看毫无道理的方式在土地上强行配置资本。在资本主义之下从总体上制造不均衡的力量（见第 7 章）由此具有了土地所有权的版本；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把 DR-1 与 DR-2 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特殊问题补充进来。这些相互作用确保了没有哪个土地所有者可以限制生产方案的成本和
568 利益，尽管这些方案是他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推行的。总的来

看，通过土地市场的运行来对资本主义的地理加以塑造的力量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当中：它们可能会瓦解为不连贯的恶劣处境和周期性的投机泛滥。未来的劳动会被强行推入不可持续的格局（不论是从劳动、从资本还是从双方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防止这样一种瓦解，并同时维护作为一种基本的协调手法的土地市场。

在这些情境中，资本只有两道防御阵线：垄断或国家的控制。两种解决方案都不能免于内在的矛盾。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集中，土地的开发过程被垄断了，而这让土地的开发得以成为一个连贯的过程，因而投资的诸多协同效应就可以按照有利的方式来布置。很凑巧，这里有一种诱惑：土地所有制可以与高额金融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所以“金融资本主义”的土地版本在历史上要早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产业资本的版本（第10章）。[①] 这种垄断所带来的麻烦当然是开启了占有垄断租金的可能性——这种占有形式一般是对资本积累有害的。金融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掌管自己的账户来抵消这种倾向。为了维护整个生息资本的流通， 371
信用体系规定了土地市场的结构。于是，通过使各种形式的生息资本流通相互联动，一种双重协调就出现了。这种解决方案的麻烦在于，土地市场尽管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协调，却逐渐更为直接地暴露在了信用体系本身的全部内在问题面前。

最后一道防御阵线是国家；为了抵抗土地市场周期性地承受的不连贯和投机狂热，国家可以动用诸多权力：调节土地的使用、没收土地、规划土地的使用，最后还有实际的投资。虽

① 马克思认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所打造的寡头统治是由“新土地贵族”“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大手工工场主”所构成的“自然盟友”[96]（《资本论》第1卷，第724页）。

然国家无疑可以将自己的印记留在地理结构上面，但它的这种做法未必能有效地用竞争来约束土地的使用，或者用资本积累来约束地理结构的转换过程。倘若国家的参与程度过高，就同样会逐渐使所有权的整个有效性——包括对一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土地的所有权——遭到质疑。

为了将土地配置到各种用途当中，土地的价格和土地市场是基本的协调手法，资本主义离不开它们。它只能争取限制它们的运行，由此使它们变得不那么不连贯，在投机的无序面前不那么脆弱。我们可以进而从这条一般结论中推导出两个后果。

第一，倘若脱离了土地私有制的垄断权力，也脱离了这种权力所赋予的占有租金的能力，那么土地的价格就无法存在。租金和土地私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都具有社会必要性。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再生产和对租金的占有这两种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界定。我们在这一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我要为这番论述加上一个重要的告诫。土地所有制只有将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才是行得通的。其他所有形式的土地所有权都必须让位。土地必须成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必须被当作可供生息资本流通的开放场地。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向前走了多远，那是历史研究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价值规律导致了这样一种转化过程——这是无可争议的。

第二，土地的价格既把握了资本积累的时间性（显现为利率的变动），同时又把握了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在空间中的具体分配，因而把时间与空间的因素统一在了由价值规律界定的单一框架中。但它不是以被动的或中立的方式来做到这一切的。

土地的价格必须通过对未来租金的占有来实现，而这种租金又立足于未来的劳动。因此，资本既然支付了土地的价格，就会强迫劳工在由利率规定的期限内在特殊的区位从事非常特定的活动——如果在购买土地时预付的资本没有丧失价值的话。[372] 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价值规律的运行是如何束缚活劳动的。我们将在第 12 章讨论这个后果进一步的影响。

生息资本在土地的所有权证书中的流通与一般的虚拟资本的流通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从区位的方面给未来的资本积累指出了道路，并充当了一种强行催化的角色，按照积累的根本性命令重组了积累的空间格局。它有时过于强硬了（超出了资本或劳动的承受能力），有时又走错了方向（因为当货币资本的流通遇见并利用土地私有制所附带的垄断特权时，出现扭曲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个事实不过是证实了土地市场必然会内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根深蒂固的矛盾。由此，它恰好把这些矛盾强加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物理景观上面。可是与此同时，为了力争在组织土地的使用时可以有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它又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协调手法。

译注

1.《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704 页。
2.《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8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702 页。最后半句的原文是“es als überflüssig und schüdlich erscheint / it appears superfluous and harmful”，中译本译作“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并没有“看起来”（erscheint/appears）一词。
4.《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167 页。
5.《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97 页。
6.《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698 页。
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40—941 页。
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0 页。

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9页。
10.《全集》第34卷，2008版，第41页。
1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209页。
1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5页。
1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5页。
14.《全集》第34卷，2008版，第271页。
1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01页。
1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7.《全集》第30卷，1995版，第617页。
18.《全集》第34卷，2008版，第102页。中译本并无“永久地”一词，只有“这些超额利润的固定化”，英译本则译作“those excess profits in agriculture become permanent fixtures”。
1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26—727页。
2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28页。
2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8页。
2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33—734页。
2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83页。
2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44页。
2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83页。
2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5页。
27.《全集》第44卷，2001版，第48页。
28.《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154页。
2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50页。
3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35页。
31.《全集》第34卷，2008版，第348页。
32.《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77页。
3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13页。
3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0页。
3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54页。
36.《全集》第34卷，2008版，第54页。
3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4页。
3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4—875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9.《文集》第1卷，2009版，第638页。
40.《全集》第30卷，1995版，第236页。
41.《全集》第30卷，1995版，第234页。
4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84页。
4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4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99页。
4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14页。
46.《全集》第34卷，2008版，第269页。
47.《全集》第30卷，1995版，第208页。

4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01页。
49.《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42页。其中“克兰财产”即clan property，宗族财产。
5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12页。
51.《文集》第3卷，2009版，第465—466页。
52.《全集》第34卷，2008版，第344页。
53.《全集》第33卷，2004版，第25页。
54.《文集》第2卷，2009版，第8页。
55.《文集》第3卷，2009版，第590页。
5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90页。
5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94页。
5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13页。
59.《文集》第10卷，2009版，第193页。
6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7页。
6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61页。
6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61—862页。
6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64页。
6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63页。
6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2页。
6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34页。
67.《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98页。
6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6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98页。
7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99页。
71.《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62页。
72.《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33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73.《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42页。
7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31—832页。
7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57页。
7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81页。
77.《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572页。
7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6页。
7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39—940页。
8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929—930页。
81.《全集》第34卷，2008版，第41页。
82.《全集》第34卷，2008版，第4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83.《全集》第34卷，2008版，第112页。
84.《全集》第34卷，2008版，第42页。
8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6—697页。
86.《文集》第1卷，2009版，第643页。
87.《全集》第30卷，1995版，第617页。
88.《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17页。

8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719页。
90.《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99—701页。
91.“资本化”（capitalized）包含了“折算为现值”的意思，前面第8章、第9章已经出现过。
92.《全集》第31卷，1998版，第122页。
93.《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61页。
9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875—876页。
95.《全集》第46卷，2003版，第528页。
96.《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32页。

第12章　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从里到外都是引人注目的。各个民族虽 373
然拥有极其多样的历史经验，居住在差别大到难以置信的物理环境中，却在国际分工当中被拼接成了一个复杂的统一体；这种拼接有时是伟大的，有时是通过哄骗，但在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施加无情而粗野的强力。货币关系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乃至私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除了人类活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之外——这是通过市场来推行的——实际上的从属也不断补充进来，而这要求通过原始积累来把劳动转变为劳动力商品。社会关系的这种彻底转化并不是以平均的方式前进的。它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走得更快。它在这一处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在那一处则更受欢迎。它在一处地方的渗透是相对和平的，在另一处地方的渗透则使用了种族灭绝的暴力。

与它相伴随的还有一些物质上的转化，它们具有惊心动魄

的范围和十分激进的后果。新的生产力被生产出来了，而且散布到了地球表面上的各处。大量积聚的资本与劳动在复杂得难以置信的都市地区走到了一起，运输和通信系统则在全球伸展成了宽广的网络，让信息、观念、物质产品乃至劳动力得以相对轻易地四处迁移。工厂和矿场、学校、教堂、购物中心和公园、公路和铁路到处散落——整个景观是不可磨灭地、不可逆转地按照资本主义的命令来创建的。这种物理上的转化同样不是以平均的方式前进的。这一处有大量积聚的生产力，那一处则相反，只有相对空旷的区域。一处地方的活动紧密地积聚在一起，另一处的发展则相反，是四处蔓延的、相隔遥远的。这一切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

374 这是不同寻常的历史地理变化，我们迫切需要对这个表面现象进行理论的考察。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如何去做，却不幸没有很多理论性的指导。[①] 困难在于，我们为这个问题

① 关于空间组织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格外地零散、格外地没有系统性。关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大量五花八门的文献，其中充斥着空间的概念。但那些术语是描述性的，并没有良好的理论根据。“中心与外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等措辞轻易地在这些文献中来回出没，却没有得到多少深入的思考。对空间格局进行生产和维持的力量往往在特殊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描述中消失了。就如何构造理论而言，有帮助的文献还要有限得多。我发现帕卢瓦（Palloix）（1975a；1975b）和艾达洛（Aydalot）（1976）的表述非常具有提示意义。昂利·列斐伏尔（1972；1974）多次使人们注意到了空间生产、空间政治和空间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所具有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城市的语境下）。关于城市化的丰富的文献——例如在卡斯特（Castells）（1977）之后出现的文献——是很有用的，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关于区域发展的研究同样还需要以某种严格的方式来将整个问题讲清楚［见利皮耶茨（Lipietz）（1977）；《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 10 卷第 3 期，1978）；杜隆（Dulong）（1978）；桑托斯（Santos）（1979）；卡尼（Carn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以及马西（1978；1979）的有趣的著作］。德戈德马尔（de Gaudemar）（1976）的研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写作，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谢赫（1979—1980）关于对外贸易和价值规律的研究也十分锐利。接下来的两章还无可估量地受益于我与比阿特丽斯·诺法尔（Beatriz Nofal）和奈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讨论，他们为这最后的两章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观点。

找到的思考方式既要在理论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又要足够强健，以便处理一些明显的困惑、对抗和冲突，因为资本主义之下的人类活动的空间接合（articulation）是以这些现象为特征的。此外，有待观察的现象仿佛具有无穷的多样性。它们包括了极其不同的事件和过程：由大片土地的管辖权所引发的个别战斗，不同的民族国家所实行的殖民政策和新殖民政策，市区内部住宅的差异化，街头帮派关于“地盘”的战斗，为了传递社会意义和符号意义而对空间进行的组织和设计，不同的市场体系（金融体系、商品体系等等）在空间中的接合，劳动分工的区域性的发展模式，产业后备军的分布在空间中的积聚，围绕共同体、区域、国家等领土概念来建立的阶级联盟，如此等等。

在这种多样性面前，我们实在太容易屈服于“空间拜物教”了，即从空间的角度（*sub specie spatii*）把一切现象等同起来，并以为空间模式的几何属性是根本性的。反过来的危险是以为空间组织仅仅反映了资本积累和阶级再生产的过程。接下来我将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我将区位看作人类活动的一项根本的物质属性，但也承认区位是在社会中生产出来的。由此，空间格局的生产就可以被当作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总体上的时间动态中的一个“活跃环节”。

第 11 章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观点打下了理论基础。我们 375
在那里证明了空间是一切使用价值的一种物质属性。但是商品生产会将使用价值转变为社会性的使用价值。可见，我们必须考察使用价值的物质性的空间属性——特别是区位——如何在商品生产中转变成了社会空间。由于商品生产涉及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所以我们若要从社会的方面来理解空间格局，就同样必须理解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在空

间格局的生产和使用中是如何相互整合的，并从这种理解向前推进。第 11 章对土地市场的研究为我们要走的路提供了一个范例。我们现在必须构造一种更加全面的论述。

具体的有用劳动是在特殊的地点生产使用价值的。在不同的位置开展的不同的劳动通过交换行为才进入了一种相互关系。空间整合——各个区位的商品生产在交换中的联系——是必要的，否则价值就无法成为抽象劳动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多半正是由于想到了这一点，才会写下这段话：

> 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1]（《剩余价值理论》第 3 册，第 53 页）

由此可见，倘若未能建立空间整合，价值形式的普遍性就会受到干扰。在一些情况下，这或许还会导致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换，即不同的交易体系之间的不平等交换：[①]

> 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

① 埃曼纽尔（Emmanuel）（1972）探讨了不平等交换这个主题，谢赫（1979—1980）则探讨了国际交换中的价值这个一般问题。

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2]（《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05—106页）

那么，空间整合是如何建立的？商品交换是一项必要条件，“一般等价物”（比如黄金）的可用性也是如此，因为它是世界性的交换所需的货币基础。商品和货币在空间中的迁移所面临的物理障碍必须被降到最低。然而，空间整合的充分条 376
件是由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所给定的。[①] 毕竟，“价值在资本上的独立化程度比在货币上要高得多”[3]（《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31页），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大纲》，第408页）。作为资本的货币和商品在地理上的迁移不同于产品和贵金属的迁移。毕竟，资本是以一定的方式来使用的货币，绝不等同于货币的全部用途。

如果空间整合是通过资本在空间中的流通来建立的，我们就必须专注于资本和劳动力迁移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不能诉诸一些常见的资产阶级观念，它们谈论的是单独的“生产要素”的机动性——仿佛生产要素是一些“东西”，可以从空间中的一点被推到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必然要稍许复杂一些。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劳动过程——其中运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具有不同的周转时间——来迁移。进一步讲，可变资本的机动性与劳动者本人的机动性之间的关系还在阶级斗争中引入了另一个维度，而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流

①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未能做出一种区分：一方是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另一方是资本流通；除了这个瑕疵之外，他的著作是很有趣的。

通所带来的问题也需要专门注意。从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如下描述出发，我们可以自动得出这种拆分：

$$M - C\begin{pmatrix} LP \\ MP \end{pmatrix} \ldots P \ldots C' - M' \text{（等等）}$$

资本迁移的能力取决于它所占据的状态是以上各个状态中的哪一个。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资本在每个状态中分别可能具有怎样的机动性，然后把这些单独的运动整合为一种对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时间节奏和空间节奏的理解。我们或许可以期望以这种方式来阐明空间整合是如何通过资本本身的具体的、物质性的流通过程来建立的。

1. 运输的联络和作为商品的资本的机动性

使货物到处迁移的能力界定了商品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机动性。[①] 这种机动性取决于运输的联络，而这些联络是由商品的重量、尺寸、易碎性、可贮存性等属性来限定的。马克思认为："空间条件，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5]（《大纲》，第 533—534 页；《资本论》第 2 卷，第 149—151 页）因此，运输业是生产价值的，因为它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会使"劳动对象"发生物质性的变化——"空间的、位置的变化"[6]。运输业"所出售的"产品是"位置的变动"[7]（《资本论》第 2 卷，第 52 页；《剩余价值理论》第 1 册，第 412 页）。

377

与其他任何中间投入品一样，"位置的变动"这种商品的价值也会进入其他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全部商品的价值包含了具有社会必要性的全部交通成本——这些成本可以界定为使产品到达最后的终点所需的平均成本。迁移的成本并不是

① 德拉艾（de la Haye）（1979）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基础性文本收集到了一起。

唯一需要考虑的。运输的流程倘若是常规而可靠的，就可以减少对原材料和成品库存的需要，从而可以将“没有利用的”资本释放到活跃的积累当中（《资本论》第 2 卷，第 142 页）。要确保资本流通的连续性，就必须创造有效率的、在空间上整合起来的运输系统，并围绕某种由多个市中心形成的等级制来组织这个系统［比如勒施（1967）和克里斯塔勒（1966）的区位理论所描述的等级制］。迁移的速度也是至关重要的。“空间距离”由此就还原成了时间，因为“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8]（《大纲》，第 538 页；《资本论》第 2 卷，第 249 页）。

迁移的成本和时间的减少以及运输服务的常规性和可靠性的改善都属于“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9]。马克思从非常一般的角度描绘了由此而来的使运输的联络革命化的冲动。他写道，资本必须“摧毁……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必须“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0]，以便把资本的周转时间减少为“转瞬之间”[11]。“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流通费用来说就越是重要。”[12]（《大纲》，第 524—539 页）随着其他部门的技术革命扩大了可供交换的商品的数额，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也变得绝对必要了（《资本论》第 1 卷，第 384 页）。

这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商品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机动性是在相对空间的框架中达到的——这个框架会无休止地改变——因为“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费用和时间距离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13]（《资本论》第 2 卷，第 249 页）。迁移的平均成本的下降直接减少了所迁移的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间接后果也具有毫不逊色的

重要性。简单来讲，如果我们把价值看作一种由整合在某个交
378 换网络中的所有位置来确定的社会平均水平，这个网络由于运输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的扩大或缩小就会改变价值关系。之前没有机会获得的产品和资源——它们是通过新的交通安排才走进交换网络的——可能会对价值（和生产价格）产生惊人的影响。简言之，各个位置所组成的领域——“价值”的平均水平是在这个领域中达到的——取决于在特定的运输联络当中建立起来的空间整合的水平和程度。由此可见，一些关键的量——如劳动力的价值、资本的价值构成等等——对于运输业所承载的生产力是高度敏感的。

由于空间关系会随着对运输的投资而改变，所以不同区位上的资本家的相对财富也是如此。一些资本家遭受了劳动力、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住房等等）的价值丧失，另一些资本家则至少暂时享受到了超额利润以及可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升值。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这条结论必然要修改第 7 章提出的关于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一般概念：*价值丧失——不论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始终属于特殊的地点，始终要指定自己的位置。*

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条原则所具有的深远后果。在这里，让我们把注意力局限于它在运输业本身当中的影响。由于区位的变化是在同一时刻被生产并被消费的，所以直接的生产过剩和价值丧失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固定资本才有可能丧失价值。但是运输业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十分广泛，而且其中有许多都内嵌到了建成环境当中，成了公路、铁路、终点站等等。这类固定资本在价值丧失的寒风中尤其脆弱。但是价值丧失始终处在特殊的路线上，或者处在特殊的地点——这一处的终
582 点站不再有贸易了，那一处铁路线上的交通被新的高速公路

所取代了。运输业中生产力的革命始终是在指定的区位发生影响的。因此，这个产业内部的竞争就取得了一些独特的性质。之所以会这样，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旦固定资本内嵌到了土地当中，竞争的各方就成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空间中的“自然垄断者”。这种“自然垄断”的性质意味着两座城市之间的几条相互竞争的铁路线基本上是毫无道理的，几家运输公司则有更强的理由在共同的路线上竞争（比如在公路货运当中）。由于修建铁路线、船坞和港口、机场等等往往需要数量巨大的资本，所以资本家倘若不能在风险面前保护自己——指定区位的价值丧失会由于竞争而产生风险——可能就会不愿意投资。这意味着需要限制竞争，还需要创造由国家调节的乃至国有的垄断。这里有一个两难。竞争为这个产业中生产力的革命化所带来的刺激被淡化了。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一般又要 379
求无休止地减少迁移的成本和时间，要求消除一切空间壁垒、“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4]。

这个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把运输业中的资本分割开来就行：其一是在建成环境中流通的一种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其二是在空间中自由迁移的其他种类的资本（卡车、船舶等等）。价值丧失受地点约束的性质在后一个部门降到了最低，开放的竞争和投资所面临的障碍也相应减少了。于是，对由交通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而言，真正严重的问题就仅限于在建成环境中独立流通的固定资本。

只有借助信用体系和国家的参与，这样一种分割才能发生（《大纲》，第523—533页）。由此，“自然垄断”的要素可能会服从共同的调节和控制，价值丧失的影响也在相应的程度上社会化了。进一步讲，正如我们在第7章和第8章看到的那样，这类投资可以按照仅仅产生利润的方式来组织，从而可以降低

资本的价值构成在总体上受到的上行压力。坏处在于，运输业的这个部分中技术变革的步伐要服从相关的资本家（例如由金融家组成的强大的阴谋集团）或国家官僚的经济权力和政策，有时还要服从他们的胡思乱想。于是，运输业中的投资战略对新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所进行的协调就变得成问题了。土地价格的变动（即第 11 章讨论的那种变动）现在进入了我们的图景，因为在对用于运输的、不动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这些设施所服务的地区的土地价值会上涨，而组织这些投资的人往往可以占有相关的利益（这对于国家和相关的资本家都是成立的）。这意味着放任土地投机、放任对租金和土地税的占有是有利的（从一般资本的立场来看），因为它们是拉动、推进并引导投资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给第 11 章提出的一般论点——对租金的占有在资本主义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协调职能——找到了又一个确证。然而结果是：用于运输的基础设施的创造依赖于投机的和政治的机制，而不是较为寻常的市场机制。

这一切包含了一些重大的矛盾。资本积累的要求是越来越多的资本都应该转向交通运输工具的生产（《资本论》第 2 卷，第 251 页）。但是运输业一般在自身的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以及较弱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力量。因此，这个弱点必须通过补偿性的预付款来抵消——这些预付款来自运输业所服务的部门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否则总的利润率就得不到维持。

但最糟糕的是，我们看到了虽然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创造物质基础设施来克服空间壁垒，但这些基础设施在空间中是不动的，在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面前也是高度脆弱的。公路、铁路、运河、机场等等一旦移动了，就会失去自己体现的价值。

因此，为了建立空间整合、消除资本流通所面临的空间壁垒，价值必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固定在土地中。由于运输系统是生产出来的空间，所以它所体现的价值迟早也会变成有待克服的壁垒。若要维护运输网络内部的特殊价值，就意味着制约一般价值的进一步扩大。于是，运输系统内部的强烈的价值丧失和结构转换就变得无可避免了，而这会对空间格局的塑造和各个层面的空间整合造成各种后果。这是一个核心矛盾，它改变并限定了商品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机动性。

2. 可变资本和劳动力的机动性

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但它的机动性是由一些非常特殊的条件来支配的。它是唯一一种可以凭借自身的动力把自己送到市场上的商品。因此，“劳动的机动性”这个术语在经济话语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在资产阶级理论中，而且经常在日常用语中指的是劳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于任何目的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只要他乐意就行。这种契约自由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权概念和公民自由概念是十分关键的。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这些积极自由的意义，却坚持认为应该把它们联系到事情更加黑暗的另一面来看待。劳动者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5]（《资本论》第 1 卷，第 169 页）。原始积累的过程使大多数劳动者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包括获得土地的机会）中获得了“自由”；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活。

这种自由所具有的两重性会转换为两种极端不同关于它

在地理上的机动性的看法。[①] 作为创造性的主体（见前面第111—119页），劳动者无休止地在世界上游荡，试图逃脱资本的劫掠，躲开剥削最坏的方面，并始终力争改善自己的处境，往往还能取得一些成功。资本肯定必须顺应这种过程；就此而言，劳动者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地理。然而，劳动者倘若
381 被看作一个在本质上由资本统治的对象，就无非是可变资本，即资本本身的一个方面。在可变资本的运动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规律是内嵌在对一般资本的机动性和积累加以调节的规律当中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第二种观点。这样一来，他就要抵抗处于主导地位的、与劳动者的所谓自由相关的资产阶级神话。鉴于雇佣劳动的一般状况，劳动者在迁移时的自由恰好转变成了它的反面。为了寻求就业和一份基本的生活工资，劳动者不得不跟随资本，不论后者流动到何处。这意味着资本“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16]，而且消除了“阻碍［资本家］任意占有这种或那种劳动的一切法律限制或传统限制”[17]（《资本论》第3卷，第196页；《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3页）。它同样导致了原始积累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干扰和毁灭——马克思用了许多篇幅来考察这种过程。它还促使资本家采用对垄断性的传统技能并无依赖的劳动过程。这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对资本来说，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是“无所谓”[18]的，而这种态度直接延伸到了工人身上：“自由工人”必须承认，“他

① 关于列宁和卢森堡对劳工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迁徙的看法，德戈德马尔（de Gaudemar）（1976）有一番出色的讨论，而且做了很好的概述。

们的劳动始终是［为自己］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货币”[19]。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劳动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20]。于是，工资的差异为资本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按照资本的需要来协调工人的脚步。劳动力的通用性、它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和工人对工作内容“无所谓”的态度对于“资本的流动性”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的意见是：这些条件“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北美合众国表现得更突出”[21]（《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4、1034页）。在这些条件下，“劳动者的自由”实际上被还原成了“资本的自由”[22]（《资本论》第1卷，第671页）。劳动者越具有机动性，资本就越可以轻易地采用新的劳动过程，并凭借更佳的位置来获利。劳动力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个命题并不是没有矛盾。如果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应该满足资本的需要，劳动者在迁移时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失业者组成的后备军——他们由于技术变革而极其不堪地从自己的生活资料中获得了“自由”——只有在仍然可以为资本所用时，才能创造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有利的条件。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必须留在原地。法律的规定或其他社会机制必须堵住逃脱的路线——例如，土地所有制和租金可以阻止劳动者回到土地，从而可以阻止他们逃脱资本的掌握。资本也不能容许产业后备军相继死去，除非它可以“从 382
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或者将*潜在的*后备军而非活跃的后备军发动起来[23]（《资本论》第1卷，第269、642页）。若非如此，资本就必须想办法通过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障、福利方案等等来维持后备军的生存，并使它停留在原地。个别资本家无法轻易地承担这些重负，所以它们一般被移交给了

国家。

于是，诸多两难就出现了。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一种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工厂法的制定和对工作日的调节——就其自身而言就值得为之斗争。后备军的状况是阶级斗争的焦点——问题变成了谁来承受社会支持体系的成本，以及资本如何才能维持自己获得劳工储备的机会。不同的政府或许会为了这个问题而争吵；但从当前论述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自由的”机动性被资本家的欲望所抑制了——他们想要把劳工储备保持在原地。当劳动者拥有技能时，或者当资本家对教育、岗位培训、医保等等进行投资时，这条原则就会变得尤为明显。劳动力的质由此就变得重要了。例如马克思注意到，在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荒时期，“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24]（《资本论》第3卷，第134页）。资本家有丰富的策略可以将自己看中的工人束缚在特定的公司里和特定的区位上。关于迁出和迁入的政策可以按照特殊资本家的吩咐来操纵，公司本身则有可能仅仅授予不可转移的年资权利和退休金协定，而它们会给工人的迁移充当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大公司甚至还可以在内部的劳工市场上通过晋升和奖励方案来控制地理上的机动性。由此，劳动力在社会和地理两个方面的机动性就可以按照特殊的需要来布置了。但是特殊的需要未必能与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相容。个别资本家或资本的个别派系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制约了劳动力总的机动性，而这可能会损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出于这些原因，劳工“自由的”机动性瓦解成了一团相互矛盾的要求，即使纯粹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

由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由一些过程所支配的，所以

它的机动性也必须在这些过程的语境下来理解。养育一名劳动者要花很多年，而且根深蒂固的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一旦取得就很难改变。此外，劳动力是唯一一种在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生产出来的商品。工人养育了自己的子女；不论他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制度有多么精巧，劳动力的再生产都始终处于直接的资本主义控制之外。不过，为了促进一定数量和一定性质的劳动力的生产，还需要经久耐用的、往往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它们很难建造，也同样难以拆除或转化。[①] 这些基础设施也有可能吸收相当数量的资本（主要是以政府债务的形式）。

劳动力的供给也必然会展现出内在的差异。首先，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总是具有“联合产品”的一面——男人、女人和儿童、老年和青年、弱者和强者统统可以被用于剥削。其次，有助于把一种类型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社会基础设施也许会抑制另一种类型的创造。这里出现了当代都市中住宅差异化的逻辑，因为为了专业人士的再生产而组织的社区必定不同于专为蓝领工人的再生产所用的社区。如果与历史、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叠加在一起，社会再生产的这种地理上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就会具有尤为突出的形式。可见，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本地的、区域之间的乃至国际性的专业领域所形成的相对永久的拼装。这种拼装随后也有可能与劳动力价值的显著差异和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的显著差异联系起来。

资本家有可能，也的确会抓住这些差异，并主动使用它们来对工人阶级分而治之——所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民

① 东泽洛（Donzelot）（1979）和他的批判者提供了有趣的见解。

族主义、宗教的和族群的偏见对于资本流通都十分重要。然而这样一来，在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机动性面前的障碍就在资本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延续，而这种机动性长期来看对于资本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如果一些社会政策可以消除劳工市场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等等，资本家可能就会在支持与反对之间来回摇摆——他们的立场要视情况而定。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社会再生产的适当机制若要得到维持，可能就会与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机动性不一致。马克思注意到，这种机动性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一般是毁灭性的，而且必定会打碎并损害家庭和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从资本的立场来看，某些消极后果会从中涌现出来。倘若劳动力的一些性质是与社会再生产的一种特殊体系相联系的，而且甚至对于资本家的一个派系也很重要，那么后者——出于纯粹的自利——可能就会试图通过私人的慈善或国家来使家庭和共同体的制度稳定下来。出于这些原因，一部分资产阶级或许会支持改善市民生
384 活（civic improvement）、教育改革和城市改良、住房措施和医保措施等等。[①] 但这样一来，资本家所支持的差异化就必然会在个人的机动性面前充当障碍。

我们可以再次识别出资本在根本上的张力和两面性。劳动者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机动性是一项重要的属性，需要加以发扬。但是资本家也需要把劳工储备保持在原地，细分劳工市场——这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并支持一定品质的劳动力适当的社会再生产。这些相互矛盾的冲动源自一般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会对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产生相互抗衡

① 对工人阶级的福利所做的投入可以是道德的和物质的改良，19 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城市改良运动为此提供了壮观的例子。

的影响，不论工人自己的意志是怎样的。

但是工人绝不只是资本的对象。地理上的机动性对他们来说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它代表了逃脱暴政和压迫的可能性——包括资本对劳动实行的暴政和压迫。它代表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争取，尽管在工人回应资本所给出的物质奖励（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时，这种争取也会给资本以可乘之机。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一般资本要依靠工人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无休止的追求——这种生活是从物质的和货币的角度来界定的——并把它作为手段，以便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布置劳动的机动性，又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例如，劳动者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有助于使工资率按照劳动力的平均价值来达到均衡，从而使资本积累保持平衡（见第 2 章）。

但是地理上的机动性也给劳动者施加了一些负担。传统的支持机制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干扰，而这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我们虽然可以将机动性作为一种逃脱手段来提倡，却在这里遇到了相反的一面。家庭和共同体中有个人交往的网络、支持系统和细致的应对机制，此外还有制度的保护，更不用说政治动员的机制了——这些都可以在工人及其家人创造性的努力之下被建立起来，并在阶级斗争的海洋中成为有实力、有特权的岛屿。对这些“岛屿”的保护往往在工人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家庭、共同体、地方和文化环境强烈的忠诚在地理上的机动性面前充当了障碍。工人还可能会以为，对别的工人的排斥——出于经济、社会、宗教、族群、种族等方面的理由——对于保护已经建立的有实力的“岛屿”是十分关键的。马克思在探索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英国和爱尔兰的工人在 19 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当中具有复杂的政治

关系。[①]

385 结局是：劳工如果无法完全逃脱资本的掌握，就要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他们可以逃到别处，寻找美好的生活，也可以留在原地进行战斗。这个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季节性的、周期性的乃至相对长期的迁徙（加上为了照顾留守的家人而寄出的汇款）是一些折中的解决方案。选择权归根到底是属于劳工的，不论资本具有怎样的影响。但是讽刺依然存在。劳工所走的道路不论是哪一条，都具有一种潜力，即转变为某种对资本有利的东西。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只要一项根本条件——它界定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保持完好，这种潜力就必然会实现（尽管会有许多巧合和疑惑）。劳动者如果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就没有逃脱的办法。这当然是马克思一直试图着重强调的政治观点。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它的要求是废除雇佣劳动。

既然不存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解决办法，资本与劳动就被迫要围绕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进行斗争和妥协，而这些斗争和妥协具有千奇百怪的模式。资本与劳动都有迁移的权利，而在两种权利之间，决定性的就是力量。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并不容易解释。工人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斗争——要么移到别处，要么留在原地，为了改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而战斗——但若这些目的始终只是有限的，他们可能就会帮助资本主义保

① “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25]（《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236—237页）

持稳定，而不是削弱它或推翻它。另一方面，资本的胡乱迁移可能会扰乱劳动再生产的条件，从而恰好威胁到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所需的基础。于是，资本可能会被迫重新进入为家庭和共同体提供支持的模式，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基础。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从双方的立场来看都不是一桩毫不含糊的事务。这种状况对于理解劳动的机动性是根本性的。这种状况将始终存在，直到工人不再必须为了生存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售为止。

3. 货币资本的机动性

不同形式的货币——金条、铸币、钞票、信用等等——就它们在迁移时可能具有的方便性和安全性而言是十分不同的。金币——它单位重量的价值很高——在物理上的迁移并不那么昂贵，但是花费的时间、连带的风险造成了明显的局限。在现代的条件下，信用货币是一切货币中最机动的。它们在 386
全世界的迁移可以同与它们的使用相关的信息和指令所能达到的速度一样快。它们所面临的唯一的物理障碍是通信系统，因为要通过它才能传送信息。

因此，信息传输技术的改进对于资本积累是根本性的，就像交通的革命一样——后者加强了商品的机动性（《大纲》，第 161 页）。[①] 我们有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电传、电子转账等等——它们都能帮助信用货币在“转瞬之间”穿越空间。这种货币资本明显可以在基本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游荡；它可以整合并协调生产与交换，却几乎不用理会物

① 见德拉艾（de la Haye）（1979），他在介绍马克思关于这个话题的作品时强调了通信方面。

质性的空间壁垒。由于马克思认为（见前面第 1 章），只有在一个整合良好的交换体系演化出来之后，价值才会变成商品交换的调节器，所以信用货币的迁移越是自由，交换关系就越是完美地反映了价值关系，把货币商品称作一般等价物也会变得越有意义。

但我们立刻遇到了某些悖论和矛盾，它们以社会性的方式妨碍了哪怕是信用货币的自由的机动性。信用货币只能运行在某些牢固的制度安排的语境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马克思坚持认为，一切“观念性”[26]的货币形式都拥有“地方性和政治性”[27]；他的《资本论》关于“货币”的一章也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影射：只要货币被用作纯粹的流通手段，他就会把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于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和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我们的图景。在货币的迁移面前出现了社会壁垒，因为货币体系的后盾是不同的法律安排、制度安排和政治安排。因此，虽然人们在创造信用体系时想要使它尽量免于物质性的空间约束，但是悖谬的是，这种驱动立足于领土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某些状况下可能会阻碍货币的迁移。我们在前面遇到过这种矛盾。商品在空间中的机动性取决于运输网络的创造，而运输网络在空间中是不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克服空间壁垒的唯一办法都是创造特殊的空间结构。当后者也变成壁垒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必定会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28]（《大纲》，第 410 页）。

信用货币假如是直接由一种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来约束的，当然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游荡。但是信用货币从

这样的根基中解放出来了，而这是它首要的优点。例如，它肯定必须在上行区间从货币紧缩中解放出来，否则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组织就无法获得新的格局。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在危机期间很可能会在“高品质的”货币面前丧失价值。于是，这种高品质货币所在的区位和它作为社会劳动的尺度所具有的实力就变得重要了。当黄金仍然发挥了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就构成了货币基础。当以国家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在一国之内发挥了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时，能在国内算得上是信用货币的后盾的就只有中央银行货币的供给和品质了。于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确立了汇率，国际汇兑则会按照不断波动的汇率来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价值——它要么显现为黄金储备，要么显现为民族国家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都成了信用体系的根本支撑。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越强，它在为信用体系提供坚实的货币基础时就越是游刃有余。马克思完全明白这些关系的重要性，他关于危机的形成和“金属流出”[29]所写的东西（《资本论》第3卷，第35章）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结局是这样的：信用体系尽管能以信息的迁移可以达到的速度在世界上游荡，却同样会遇到由不同国家品质各异的货币的存在所带来的社会障碍（货币的品质取决于该国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黄金储备、中央银行的政策等等）。[①] 在危机期间，信用货币被迫要重新与具有地理差异的货币基础关联起来。每个民族国家都力求保护自己的货币基础，否则就无法确保信用体系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它要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加强价

① 曼德尔（Mandel）在《第二次低潮》（*The Second Slump*）中的分析以很有教益的方式研究了这些过程是如何在一个特殊的局势下走到一起的。

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者占有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价值（通过殖民的或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与资本的流动（无论以何种形式）相关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自然就出现了。因此，每个民族国家或许都会觉得有必要通过限制资本的迁移（借助保护关税、生产补贴、外汇控制等等）来保护自己的货币基础。劳动力的迁移或许也会受到控制。

但这整个逻辑现在回过头来在自己身上倒塌了。货币基础构成了信用货币的基础——信用货币是最机动的资本形式——但为了保护货币基础，也许有必要限制一般资本在空间中的机动性！这样一种情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不稳定性滋养了不确定性，因而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管理局进一步采取了守势。于是，我们就顺利地推进了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如果没有任何超国家的协定（比如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商定的那种协定），那么当危机以地理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展开时，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如何瓦解为一片混乱。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个主题。

4. 生产过程的区位

388 剩余价值起源于具体的劳动过程，后者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当中组织起来的。对自然界的物质转化——即社会性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必然是在特殊的地点发生的。在劳动过程的期限内，商品的生产要被束缚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运输业（它所生产的产品是位置的变化）。只有在劳动过程已经走完了自身的进程之后，位置的变化才可以不用引发所运用的资本的价值丧失。每种劳动过程的期限都是由所运用的资本的实际周转时间来规定的。这些周转时间越长，改变位置就越困难，除非相关的资本的各个部分——机器和库

存——可以在迁移时仅仅产生微不足道的成本。倘若要依靠周转时间较长的、内嵌在土地本身当中的固定资本，生产者就会在较长的时期内牢固地扎下根来。如果国家或资本的另一个派系（如地产所有者、金融家）掌握了固定资本的这些要素，并在短期内把它们出租给使用者，那么生产者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上述局限中解放出来。

在资本主义之下，生产所在的位置是一桩非常错综复杂的事务，要服从众多决定因素。对个别资本家来说，一个特殊位置的优势取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成本、从这个位置到市场的交通成本——市场上要有充足的有效需求——生息资本的成本、各种各样辅助服务的成本和可用性，以及土地的价格。这些成本会由于许多原因而变化：自然界的慷慨（所谓的“自然”资源禀赋）、对劳动力的价值有影响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中间投入品的成本、有效需求的水平等等。生产者还会参与空间竞争——也就是说，他们会为了有利的场所和位置、为了支配特殊的市场范围等目的而相互竞争。这些因素当然在资产阶级的区位理论中得到了讨论。[①]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它们。

“竞争的强制规律”[30]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倾向于忽略空间方面。马克思在对租金的分析中（见第11章）简短地暗示了这些方面，偶尔也会在其他地方提到它们。实际上马克思经常宣称，竞争的实际运作方式可以合理地留到后面再详细讨论。他所感兴趣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关系，而这些关系要在竞争、供给和需求、价格的波动，以及市场特

① 伊萨德（Isard）（1956）所做的概述仍然是最好的，勒施（1967）关于这整个主题的著作也仍然是最引人入胜的。

有的其他所有表面现象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工作之后才会占据主导地位。就他的目的而言，一种粗略的关于完全竞争的假
389 定就足够了。那么，如果我们更加明确地在论述中加入了竞争的空间方面，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竞争中，相对的区位优势会转换为超额利润。与使用了更好的技术的资本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一样，这种超额利润可以被看作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个别资本家若要获得它，就要既按照社会平均水平来出售商品，却又按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本地成本来进行生产。它必须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永久形式区别开来——后者会通过劳动力价值的下跌来影响整个资本家阶级。为了保持清晰的区分，我将沿用超额利润这个术语来表示个别资本家可以通过技术优势或区位优势来获取的相对剩余价值。由于生产者可以任意搬迁，所以较好的区位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就像较好的技术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一样是转瞬即逝的。另一方面，倘若人们发现超额利润是相对永久的，它就会作为土地的租金（区位租金）被收走（见第 11 章）。由于对租金的占有，或者由于生产资本在地理上的机动性，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的利润率倾向于在各个区位之间平均化。

然而，我们在这里的焦点是空间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由此在地理上具有的机动性。为了对论述的行进方向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开始。让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家都会以年度为基准来周转资本的全部要素，而且他们每到年末都可以自由地改变区位，而不会引发任何价值丧失。让我们再想象一个封闭的平面，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在这上面会凭借相同的技术、通过生产并交换同一种产品来积累资本。最后让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家关于这个平面上的获利机会都拥有完备的
598 信息。每到年末，资本家都可以按照使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区

位来改变空间格局。但他们随后会用自己积累的资本来做什么呢？倘若一个资本家扩大了产出、改变了区位，以便使价值实现的前景最大化（包括生产和交换中的实现），那么其他资本家就要被迫跟进，以便捍卫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①] 在一个封闭的平面上，总的长期后果是：对个别的、由区位带来的超额利润的追求会迫使平均利润率越来越接近于零。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它意味着在一个封闭的平面上，追求相对的区位优势的竞争在积累的条件下倾向于产生一种与进一步的积累背道而驰的生产景观。个别资本家——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并力图在强制性的竞争压力下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改变区位，直到进一步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消失为止。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点看起来有了一个空间版本。[②]

这个模型并不是特别现实，但是的确有助于识别出一些有用的初步假设。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认为导致“空间均衡”的过程——资产阶级的区位理论大致说明了这些过程——与将资本积累导向危机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反过来，一些起反作用的力量（包括在危机的进程中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生产的空间经济推到某种似乎是慢性而长期

① 就不同形式的空间竞争而言，关于区位理论的资产阶级文献充满了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讨论。为了便于论述，我在这里采用了一个高度简化的版本。这里的问题不是描述竞争的过程，而是找出竞争的结果背后的社会关系。

② 我们由此应该看到，勒施在《区位经济学》（*Economics of Location*）中提出的空间均衡——它包含了市场范围整齐的六边形网络和中心地带的等级制——是一种没有积累的景观，而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不一致的。这些景观并没有得到评论，而且勒施本人在把动态注入自己的论述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这并不令人惊讶。技术变革被当成了从外部给定的、未经解释的现象，尽管我们真正必须说明的是竞争压力如何在一个区位体系内部引起了技术变革，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观点更加仔细的研究表明，出于深层的结构性原因，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空间均衡”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是一种不可能性。

的不均衡状态，因而有可能起到一种重要作用，即拖延、限制或解决积累在空间中的全面危机。这些假设的大致意义是确认如下几点：区位在总的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中是一个活跃的环节，我们后面所说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连同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彻底的结构转换都在危机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甚至有可能得到一种“空间修复”（这是我们的称呼）。接下来我将力求使这些干瘪的观点变得有血有肉。

（1）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技术抑或区位

资本家作为个人可以期望为自己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即通过采用更好的技术或找到更好的区位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在追求超额利润的竞争中存在一种直接的权衡：是改变技术，还是改变位置。例如，区位不利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采用更好的技术来补偿这个劣势，反之亦然。可见，超额利润的这两种潜在来源之间的关系值得仔细考察。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个别资本家在这两种情况下获得的超额利润在原则上都是暂时的。一旦其他资本家采用了同样的技术，或者挪到了同等有利的位置，那么超额利润就会消失。
391 假如搬迁可以即刻完成，而且没有成本，那么由区位造成的超额利润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可以忽略——例外的情况是垄断性的、特别的资源，这类资源会导致对租金的占有。由于搬迁会遇到障碍（如成本、完成给定的劳动过程所花的时间等等），所以拥有相对区位优势的“岛屿”就可以通过资本的行为被生产出来。我们可以准确地把这种现象与第二种级差租金的情况（见第 11 章）进行类比。超额租金相对永久的空间格局会消磨
600 资本家在有利的区位推行技术变革的动力，除非超额利润作为

土地的租金被收走。我们在这里再次肯定了第 11 章探讨的论点，即对租金的占有起到了一种重要作用：它会使各个区位的生产者的利润率平均化，由此迫使个别资本家回到一条狭窄的直路，即通过技术变革来寻求超额利润。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个情境：在一个有边界的平面上——其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有限的——生产资本的机动性和对租金的占有已经使所有区位的利润率变得平均了。随着对剩余劳动的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将被迫采用新技术来追逐超额利润。这些新技术会干扰并改变先前达到空间均衡所需的条件（均衡是用利润率的平均化来界定的）。空间竞争以诸多方式被重新激活了：

第一，技术更好的生产者也许会以其他生产者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而后者被迫要通过改变位置或采用新技术来进行回应。倘若新技术可以造成规模经济，而且在劳动力的价值面前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永久形式），那么在这个平面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会保持不变。它只是得到了再分配。倘若新技术要求增加预付资本，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尽管有优势的个别资本家仍然很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我们在这里再次生动地看到了利润率下降的空间方面。如果利润率要保持稳定，一些竞争者就必须被逐出市场——而这意味着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

第二，如果生产者提高了他们所运用的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就会导致三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1. 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与创新者相邻的地区可能会降低，从而触发失业、工资的下降和额外的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机会，条件是本地劳工市场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扩大（我们暂且假定劳动不具有机动性）。

2. 这个相邻地区的工资品市场会衰落，而这对工资品的本地供给者至少暂时是不利的。他们的回应可能是创新或搬迁。

3. 本地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上升，而这对供给者暂时是有利的。

很明显，总的相互作用是不可胜数的，经济体也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安定下来”，达到某种“空间均衡”，并使利润率再度平均化。

第三，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范畴可以通过技术变革来相互替代，而这也会起到一种作用，即改变区位优势的计算方法：

1. 由于劳动过程的变化导致了从熟练劳动到不熟练劳动的转变（或相反的转变），所以获得不同种类的劳动供给（包括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机会所具有的意义就改变了；设计与执行的分离甚至有可能让资本家得以决定把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在区位上分割开来，尽管这个过程原本是整合起来的。

2. 一种原材料对另一种原材料的替代具有直接的区位上的后果，这些后果取决于资本家是如何“在自然界”获得这些材料的。

3. 不断变化的工艺改变了资本对于总的空间约束的敏感程度——水力所容许的区位是小规模的，它们在空间中既受到束缚，却又是分散的；蒸汽机把生产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却又使区位更加紧密地被便利的运输节点所约束了；电力则让生产得以相对不受约束地分散或积聚，只要实际情况需要的话（参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377—378 页）。

第四，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协作、细致的分工和机器

体系的运用——全都倾向于促进生产活动在空间中的不断积聚。这种趋势由于规模经济而得到了加强，还有可能由于资本的不断集中而得到促进（见第5章）。分工中相互依赖的增长（它的反面是为了控制在空间中相互区分的市场而进行的竞争）意味着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完全有可能使得生产活动聚合在大型的市中心。马克思经常对这些过程做出暗示，但他也指出：虽然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31]，但是社会分工和新的产品线的开辟也刺激了领土分工，还刺激了地理上的分散（《资本论》第1卷，第328—329、388页）。生产在地理上的积聚同领土的专业化和分散之间的张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不能脱离与资本积累相关的技术上的活力。这些地理上的影响又为个别资本家通过位置的迁移来（暂时）获取超额利润创造了机会。

以上所有观点可以使我们得出一条一般结论：通过技术变革来追求超额利润与通过搬迁来追求超额利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倘若从区位中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被消灭了（由于生产的机动性或对租金的占有），个别资本家就被迫要通过技术变革来寻求超额利润。后者一般又会给从区位中获取超额利润的做法创造新的开端。换句话说，生产越是接近某种空间均衡的状况（例如利润率在各个区位的平均化），个别资本家相互竞争的动力——通过技术变革来扰乱这种均衡的基础——就越大。这一点独立于其他任何同样会对空间均衡的基础加以改变的力量——比如劳动的机动性或交通的变化。我们也许可以总结说，竞争同时促进了生产的空间格局的转变、技术搭配的变化、价值关系的结构转换和资本积累的总体活力在时间中的变动。在诸多力量的这种变化无常的混合中，竞争的空间方面是一种活性成分。倘若没有任何起反作用的力量来加以制约，

个人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经济保持在一种不连贯的、狂乱的、类似于抢座游戏的状态。[①]

我们如果放宽了最初的假定——固定的劳动供给和有边界的平面——就要修改上述结论。在劳动过剩（因而剥削率较高）的状况下，竞争的动力——它会引起技术变革或搬迁——会大大减少；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平面上，在资本主义的地理边境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就变得重要了。此外，还有另一些倾向于使区位模式保持稳定的影响也在运作。我们现在要转向对它们的考察。

（2）资本在生产中的周转时间——地理惯性、时间惯性和价值丧失的问题

资本在生产中运用的不同要素会在不同的产业中以不同的速度来周转。这些周转时间越长，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经济
394 中的地理惯性和时间惯性就越大。这种惯性尤其是由价值丧失的威胁所施加的。

只有在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即所运用的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固定资本等等）的全部周转时间和工作时间会同时结束——个别资本家才可以在迁移时不用引发价值丧失。缺乏这种同时性则意味着迁移始终会附带某种程度的价值丧失。唯一的问题是：程度有多大，有何种后果？“合理的”搬迁规则不外是要求从迁移中赚取的剩余价值超过所引发的

① 这与科普曼斯（Koopmans）和贝克曼（Beckman）首先提出的资产阶级论点是平行的：只要不同位置上的各个设施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那么在分散进行的利润最大化的状况下，就没有哪组价格能确保以最佳的方式来把生产活动分派到各个位置上去。在这里，价格体系的失灵使任何区位模式都变得不稳定了。

价值丧失。但有什么社会过程能保证资本主义可以趋近于实施这样一条合理的规则?

价值丧失的威胁给技术变革的步伐和调整区位的速度都施加了限制。周转时间越长，生产的空间经济中的地理惯性和时间惯性就越大。由此，生产的景观就稳定下来了——与上一节识别出来的狂乱的不稳定性相比，这种起反作用的影响并不是全然不可取的。但另一类问题随之出现了。

大量运用固定资本的产业无法轻易地搬迁。如果一个生产体系的特征是相互依赖和彼此竞争、各个产业在周转时间上的差异、聚合与分散的特定结构等等，那么协调的问题就会到处存在，生产的空间重组所面临的障碍也会在相应的程度上成倍增加。于是，空间和区位对个别资本家而言就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活跃来源。出于同样的原因，由空间重组造成的价值丧失也成了愈发挥之不去的威胁。结果，天平也许会从慢性而长期的不稳定性倒向区位上的停滞。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矛盾正是给固定资本的流通带来困扰的矛盾，而且是一个更加深入的版本。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固定资本（包括内嵌在特定的生产景观当中的固定资本）来使劳动的价值生产率革命化，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固定性（即特定的地理分配）变成了有待克服的障碍。不稳定性与停滞——前者是新近形成的资本所产生的，后者则与过去的投资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理中是时刻存在的。

若要理解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经济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基础就在这里。同过去的技术搭配和空间格局告别往往会导致严重的价值丧失。但若未能使技术搭配和空间格局“合理化”，过度积累的危机就会获得最初的根基。在危机的进程中发生惨重的价值丧失“解放”了资本，使它可以同

395 时确立新技术和新的空间结构。[①] 但我们现在必须在这幅已经很复杂的图景中进一步添加一个的褶皱。我们已经证明了价值丧失总是指定地点的。它未必会在整个平面上平均地扩散。实际上，空间竞争的本质恰好确保了资本家在一个地点获取的超额利润是以其他地方的价值丧失为代价的。因此，危机的展开在整个平面的表面上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5. 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

生产资本家如果可以用“服务费”来购买内嵌于土地的资本所带有的使用价值，或者以年度为基准来进行购买，就可以更加轻易地改变区位，而不会引发价值丧失的严重惩罚。因此，倘若内嵌于土地的资本是归另一个人所有的，那就对生产资本家有好处。若要实现这种好处——它适用于其他所有经济主体（商人、金融家乃至劳动者）——那么总资本的一部分就要在建成环境中作为“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来流通（见第 8 章）。在这里起作用的一般原则是：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在地理上变得更加机动，而代价是把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冻结在原地。

这样一种状况具有内在的冲突。如果说自由的迁移使一部分资本从潜在的机动性中获得了充分的好处，那么另一部分资本就肯定会由于被封锁在原地而遭受各式各样的、不确定的重新估值（包括上涨和下跌）。如果说封锁在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是归资本的一个单独派系所有的，那还会给派系之间的冲突设立舞台。我们现在要考察这种现象的根据。

① 这个主题在马西（1979）和沃克（Walker）与斯托普尔（Storper）（1981）最近的著作中得到了探讨。

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具有独特的必要性：它意味着生产和实现的体系演化出了一种特别的类型，从而为经济主体界定了新的角色。土地所有者收取租金，开发商在改良的基础上获取租金的增量，建筑商赚取企业利润，金融家提供货币资本，以便换取利息，同时还可以对建成环境在使用中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收益进行资本化，把它变成虚拟资本（房地产的价格），国家则可以将（当前的或预期的）税收用作一些投资的后盾——这些投资尽管是资本不能或不愿从事的，却可以扩大本地资本流通的基础。不论谁来填补这些角色，它们都是存在的。当资本家购买土地、用自己的货币在上面进行开发和建造时，他们就承担了多重角色。但他们在这种活动中预付的资本越多，他们直接投入生产的资本就越少。出于这个原因，建成环境的生产和维护往往具体表现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体系，它会把经济主体联系起来，而他们会单独地或通过有限的组合来扮演各种角色。①

396

要理解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诉诸分配的情节——租金、利息和税收。租金（见第 11 章）是土地价格的基础，起到了在土地上配置资本和劳动的作用，引导了未来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位置，还塑造了地理分工和社会再生产的空间组织。只有当土地成了纯粹的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时，这一点才能成立。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必须作为纯粹的金融资产来自由交易。由此，租金就被利息同化了，变成了利息的一种专门通过区位的属性来识别的形式；货币资本同样可以转变成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并以这种方式出借，以便换取利息支付（见

① 关于这种把建成环境生产出来的体系，托帕洛夫（Topalov）（1974）和拉马什（Lamarche）（1976）做了一些分析。

第 8 章）。因此，生息资本可以直接在建成环境中流通，由此产生的收益可以被资本化，所有权证书则可以交易。国家还可以发行以未来的税收为代价的债券，以便促进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这些债券同样可以被资本化，可以转变成虚拟资本的形式。

在这整个体系中，生息资本的流通扮演了霸权的角色。货币资本会在生产和实现的各个侧面持续地施展自己的权力，同时把空间配置也带进了自己的轨道。信用体系影响了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国债的流通。由此，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建筑商、国家和使用者就承担了压力。进一步讲，虚拟资本的形成让生息的货币资本得以在固定的、长寿的、不动的使用价值的日常使用面前以连续的方式流动。这些收益的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尽管这些资产本身是不动的。这种做法有不可胜数的好处。通过租金、利率和税收的波动，生产的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的缺口可以得到连续的监测；若要在一个地点减少投资、在另一个地点进行投资，土地、房地产和政府债务的市场就可以提供详尽的信号。倘若让某种固定不动的资产可以在使用期限内得到多次微小的价格调整，重大的、一次性的价值丧失就可以得到避免。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投入或撤出货币资本（有时获利，有时亏损）。价值丧失无所不在的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因为这一处的特殊收获也许可以抵消并盖过另一处的严重损失。即使大规模本地化的价值丧失真的发生了；信用体系或国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吸收。

不同的经济主体占有了不同类型的收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中介可以放进一个共同的框架，即发挥了根本性的协调职能的信用体系（见第 9 章）。于是，时间和空间被还原成了

一种共同的、由社会决定的度量标准，即利率，它本身代表了运动中的价值。资本流动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同时得到了界定。例如，在从大地中取出资源时、在占据边远的土地时，这些活动的速度是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利率来决定的，而不是按照另外某种关于当下的或未来的福祉的概念来决定的。随着利率的波动——利率本身是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来进行积累的产物（见前面第 296—305 页）——资本流动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也会膨胀或收缩。

在这个一般体系中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特别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处理日常的协调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建成环境中的特殊要素的生产、使用、转化和废弃所带来的。[①] 例如，金融机构的“贷款红线”（red-lining）[32] 和城市的更新往往会导致有组织的废弃。国家还会建立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战略，并相应地引导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法律的和行政的调节也出现了，目的是控制并改进相邻土地不同种类的用途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这些利益和成本是相互作用的。这类安排改变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机制——这些机制是以虚拟资本的交易为基础的。于是，就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的生产、改变和转化所用的手段而言，一种等级制——由市场的、制度的和国家的手段所构成——就被创造出来了。

这些错综复杂的安排的总体目的是确立独立的流通手段和独立的流通形式，由此就可以按照一般的资本和劳动五花八门的要求来塑造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然而，为了达到这个宏大的目标，代价也是惨重的。例如，对租金的占有培养了一种拜物教的幻觉：土地乃至区位可以直接生产价值。类似的

① 见迪尔（Dear）与斯科特（Scott）（1981）和斯科特（1980）。

幻觉包围了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的流通。虚拟资本毕竟是虚拟的。对未来劳动的债权的所有权证书在流通时具有内在的投机性。信用体系无论如何都容易引起疯狂的投机，而为建成环境中的空间格局的生产提供基础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整个体系倾向于给这些状况提供方便，有时还倾向于使这些状况恶化。不仅如此，与分配份额相关的派系斗争——它们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开发商、金融家、建筑商和国家之间——可以轻易地退化为血腥的恶斗，而这些恶斗在物质上的后果往往同对一般的资本和劳动的实际需要不太相关，或者毫无关系。为了尝试创造对资本积累有利的物质条件，地主、开发商、金融家等等得以无拘无束地占有剩余价值（他们并没有组织剩余价值的实际生产，只有建筑商是例外），而这里面似乎有某种歪曲。它尤其显露出了一个问题：占有多少才是合适的？这
398 个问题并没有清晰的答案，而且就算有答案，也根本无法保证它是在资本主义之下运作的力量可以达到的。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持久的担忧：过多的资本或许会在“非生产的”土地投机和房地产投机中流通，或者在国债中流通，并以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为代价。

那么，为什么要容忍由不动产投机商、土地经纪人等等组成的大军存在？如今答案应该很清楚了：对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的投机是必要的恶。诚然，过多的投机会把资本从实际的生产中挪走，后果则是面临价值丧失的命运。但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扼制投机同样会产生令人厌恶的结果。建成环境中的空间格局的转化会遭到抑制，未来的资本积累所必需的物理景观也不会有希望变成现实。假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某种中间路线，那就太妙了。但这是不可能的。
610 猖獗的投机和不受抑制的占有——它们对资本而言是昂贵的，

对劳动而言则可能是对生命的消磨——产生了混乱的躁动，新的空间格局由此才能成长。在信用宽松和扩张的阶段所完成的投机性的结构转换很可能会随后在危机的进程中被合理化。新的空间格局的创造会引起投机的浪潮，而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至关重要，就像其他投机形式一样。鉴于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过程所具有的形式，这些过程毫无疑问可以极其轻易地进一步增强在信用体系内部周期性地表现出来的颠倒错乱。我们可以确凿地总结说，在危机形成和解决的一般过程中，空间格局的创造和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环节。

6. 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土性

在资本主义之下为生活和工作提供支持的社会基础设施并不是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深度和稳定性的，否则就是无效的。它们还具有地理上的差异。至于它们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为什么会成这样，那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但它们之所以一直是这样，是由于有强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运作。对这些力量做一些阐述是值得的。

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既具有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又履行了种类繁多的职能。它们会调节契约、交换、货币和信用，还会调节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集中、劳动条件（比如工作日），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诸多其他方面。它们往往界定了阶级斗争的特殊框架。它们所提供的手段可以用来生产科学技术知识、新的管理技巧以及为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交流提供方便的新手段。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还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服务等等），并在一切五花八门的方面促进了文化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生活）。它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也提供了

意识形态辩论的讲坛。更加险恶的是监视和镇压的手段：当社会坠入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漩涡时，这些手段总是最后的招数。

资本家雇用了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来维持并加强这些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它们时而紧密、时而松散地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结合成了一种由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体系。对这些社会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进行恰当的解剖所需要的考察要远远多于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给出的考察。可是我们必须进行一番探索，才能识别出在它们的空间演化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要力量。社会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在它们各自与资本流通所具有的关系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互平行，尽管要讲清楚这两者决不是同等容易的，因而它们会比较模糊不清。接下来我将大量阐发这个观点。

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同要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力资源复合体”（human resource complex），它要大于各个部分的单纯总和。这样一种资源复合体是很难改变的，原因无非在于它里面看似不同的要素之间有强大的纽带——宗教与教育的强有力联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就此而言，“人力资源复合体”是根本无法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即时调整的。它构成了人类的地理环境的一部分，资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适应。进一步讲，它对文化的、种族的、族群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历史中的一切微妙之处都有深切的敏感。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要么是从某种先前存在的社会的摇篮中孵化出来的，要么是在后来的年代强行从外面添加进去的。已经有了差异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一些“原材料”，新的人力资源复合体必须从中被塑造出来。最初的原材料的性质很容易从结果中分辨出来。社会基础设施的各个要素的组织形式和历史确保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和领土安排绝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直接表达

而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国家机器、行政部门、有组织的宗教等等尤其可以成立。

然而我们的论点是：资本流通在转化、创造、维持，甚至恢复某些社会基础设施时要以另一些社会基础设施为代价。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相互联系的大致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基础设施必须由剩余来支持，而这在资本主义之下意味着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支持。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它们解释为树立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①] 因此，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其中被雇用的人提供支持的 400
价值流通把在工作地点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过程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延续整合起来了。

问题在于，这种关系在概念上是怎样的？在一个极端，有人坚持认为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在经济基础面前具有独立的力量和相对的自主（这意味着不受约束地对剩余价值征税的权力）。在另一个极端，有人认为社会基础设施仅仅反映了资本积累的要求（这否认了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以及历史和传统的意义）。[②] 按照后一种概念，地理组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变得缺乏意义了——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土性仿佛仅仅反映了地理分工的需要和资本所要求的空间组织的其他侧面。两种概念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需要某种打破僵局的办法。

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一直认为，资本流通必须被看作一种连续的价值扩大的过程。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不过是这

① 我见过一些估计，大体上是说资本主义每七年就会再生产出它的全部总财富。

② 见阿尔都塞（Althusser）与巴里巴尔（Balibar）（1970）、科恩（Cohen）（1978）、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1978）和汤普森（1978），他们的意见可以作为样本。

个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必须联系到整个过程来探索这个环节的意义。

通过向资本征税而得来的价值会在流动中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从而会以有效需求的形式——对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有效需求——回归资本。资本在这里并没有损失。于是，被雇用的人表现为纯粹的“消费阶级”，因而间或可以起到与比例失调等问题相抗衡的作用（见第 3 章）。但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所吸收的时间是失去的时间。总的资本周转时间会由于这个流通领域的扩大而延长，而这有损于价值的扩大。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地理再分配也都是可能的。对在一个地点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征的“税”可以在世界的另一边作为有效需求重新出现——这对于罗马的天主教会之类的组织是成立的，就像它对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可以成立一样。即使本地并没有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消费中心也有可能出现。这些中心的主流人口是“消费阶级”，识别它们的主要方式也逐渐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行政的、研究的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职能。至于这些通过社会基础设施来进行的对价值流动的地理再分配是由哪些原则支配的，却很难予以确立。除了周转时间的一般限制之外（周转时间本身也是可塑的，因为地理上的迁移变得更加容易了），地理再分配在最坏的情况下似乎是任意的和偶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则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派系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
401 （这些派系也包括“消费阶级”，它们有自己的特定利益），其中一些资产阶级也许还会以城市、区域或民族国家的名义在地理上界定自己。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这个问题。

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也有可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价值所具有

的“生产率”的概念尽管很难精确地讲清楚，却绝不是多余的（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它与对物质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是平行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改善可能会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劳动力的质和量可以通过医保和教育来改善，也可以通过大量无形的手段来改善——它们会影响纪律、职业道德、对权威的尊重、自觉性等等；这些改善可能会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带来有益的影响。倘若工人看来是难以驯服的、无法无天的，那么为什么不从报刊或布道坛上对他们进行说教，或者运用道德制裁、法律权力或镇压权力来恐吓他们？因此，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些价值可以被看作为了强化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而设计的投资。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流入行政和监管部门的价值，只要它们有助于维持资本的周转过程在加速时的安全和平稳。我们可以再引用另一个事例：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提供支持的价值流动也可以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新技术）直接回到生产领域。无可否认，社会基础设施这个“环节”在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类价值流动本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它们仅仅强化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既困扰了资本家，又困扰了我们——识别出让这种潜力得以实现的条件、手段和形势。个别资本家只要很有可能获得利益，也许就会尝试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有限的投资，因而会推动研究和开发，由此改善劳动力的性质（医保、岗位培训等等）。但由于许多利益既不确定，又容易扩散，所以资本家必须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通常是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并由此找出集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一般场地，所以我们不可能直接分辨出由它庇护的价值流动有哪些代表了资本的直接需要，又有哪些出自其他阶级所施加的压力。

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许多价值同价值生产率的改善毫无关系，却与收益的流通密切相关。资本家或许被迫要向“消费阶级”缴纳剩余价值，因为后者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征税的政治权力。工人阶级或许也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例如，对意识形态控制和
402 镇压的投资关系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所带来的威胁；只有当工人积累了足够的力量、需要加以笼络时，通过社会开支来整合和笼络工人的需要才会出现。

然而从资本积累的立场来看，只要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这是社会条件的改善所产生的后果——可以抵消并盖过资本周转时间的增加，那么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不会给资本带来损失。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用的规则，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总的价值流通中这个特殊“环节”的作用做一些评估。

社会条件的改善往往要酝酿较长的时间。它们会在一段时期内吸收价值，往往到了很后来才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生利益（例如，使劳动者适应社会并对他进行教育要花许多年）。这使得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成了吸收剩余的理想场地——这些剩余来自资本的过度积累——由此就可以拖延价值丧失，因为有效需求在投资的时期是不会减少的。由于不同种类的社会投资具有不同的偿还时间，所以国家要有合适的财政管理，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积累过程造就稳定的前景。

但这里归根到底会出现一些两难，它们恰好与建成环境中的投资所面临的两难是一样的。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所以过度积累这个根本问题就加剧了。另一方面，倘若社会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导致这样一种增长，相关的投资就必定会被评判为非生产性的投资，其中吸收的价

值实际上也就丧失了。因此，资本由于在社会基础设施中非生产性的流通而遭受的价值丧失就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前景。然而，投资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它们的内在性质，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利用它们的能力——倘若劳动过程改变了，需要不熟练的劳动力，那么对熟练的劳动大军的教育就白费了。出于这个原因，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尽管最初表现为一种很容易使资本积累保持稳定的手法，却变成了一片不确定的泥沼——在国家的社会开支所遇到的周期性财政危机中，这一点显得十分现实。①

这类投资还展现出了另一种独特性。它们不会（像机器一样）在使用中老化，而是像土壤肥力的改良一样是可再生的而非可耗尽的资产，从而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渐进的累积。科学知识的收获不会老化，在法律的精致、教育的策略、管理和行政的技术专长等方面的收获也是一样。劳动大军的态度同样有可能以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方式来渐进地演化。价 403
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也可以造成优质的条件在地理上的积聚。于是，这些区域在积累面前表现出了“自然的”优势，因为这里累积了很多“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生产资本很可能会被吸引到这些区域。

但起反作用的倾向也在运作。社会基础设施相对永久的优势可以为榨取区位租金提供基础。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会产生成本——这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因为对它们的维持有一个前提，即资本要以“克制的”形式来使用它们（这一点与对土壤肥力的维护有明显的平行关系）。倘若维护的成本上涨了（相对于有竞争关系的区域），资本家的区位优势就

① 奥康纳（O'Connor）（1973）提供了一份振奋人心的分析。

会减弱。资本家如果厌倦了支付沉重的税负或克制自己对剥削的渴望，就有可能（往往是在新的、与不熟练的劳动相适应的劳动过程的辅助下）迁移到新的社会环境中，那里的“人力资源”比较贫乏，但是维护的成本也要低廉得多。由此，在先前享有特权的区域积累的资产就被毁灭了，在创造它们时吸收的价值也丧失了。

这将我们更为直接地引向了整个问题的地理方面。社会基础设施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归根到底是通过资本流通才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会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尽管这要经过各式各样巧妙的中介和转化。就连仍旧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要素最终也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能被再生产出来。然而，由此演化出来的社会地理不会单纯像镜子一样反映资本的需要，而是矛盾的所在之处，这些矛盾十分强大，可能会带来扰乱。在一个历史时刻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塑造的社会地理未必符合后来的要求。由于这种地理很难改变，往往是高额的长期投资的焦点，所以它会变成有待克服的障碍。新的社会地理必须被生产出来，而这往往给资本带来了巨大的成本，通常还与人类的不少苦难相伴随。出于这个原因，社会基础设施在地理上周期性的结构转换通常是与危机的进程相伴随的。于是，体现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所遭受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更不用说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毁灭和对建立在社会制度和人文制度周围的一切形式的地方主义的毁灭了——成了危机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核心要素之一。[①]

① 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创伤——纽约市的“财政危机”——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

因为社会基础设施的诸多方面或它们为资本积累带来的优势本身在地理上是机动的，所以我们还必须修改这幅总体图景。例如，由于先前提到的那种价值转移，研究和开发的职能就可以放置在远离生产的地点。许多这样的职能倘若聚合起来，就可以带来优势，还可以使资本家有机会获得所需要的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因而这些职能往往会被拉到一起，形成少数主要的中心，而全新的产品线又会在它们的养育下得以启动［帕罗奥图（Palo Alto）周围的硅片产业[33]恰好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这种投资所带来的“产品”也是可以迁移的。知识和高度熟练的劳动——两者都需要巨大的花费才能获得——在地理上是机动的，因而“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失”（brain drain）在地理再分配的总过程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纵横交错的迁移实在太过复杂，不会轻易地服从理论分析。这些迁移对不同的产业——其中的劳动过程是不同的——所具有的意义也有巨大的差别。然而，对空间格局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演化所做的任何考察都必须承认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迫切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压倒性的特征。国家为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价值提供了一条最为重要的渠道。这正是税收的意义：国家可以对税收这种收益形式加以配置，以便维护和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由于国债是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手段，所以资本市场和利率就要发挥协调和监督的力量。国家的参与之所以会出现，一部分原因在于个别资本家无法合理地做到一些事情，为此必须找出一些集体的手段，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阶级斗争需要国家机器的调解，否则在社会较为敏感的地区就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种类的投资了。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些投资有可能既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可以改善创造剩余价值的社会条件），又有稳定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在较长的

时期内管理有效需求），那么这种参与就会采取一种新的形态。于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就成了资产阶级用来管理积累过程的全套武器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工具（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军事开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管理行为的界限如今已经不言而喻了（又见第 10 章）。

从我们当前话题的立场来看，国家参与的意义值得简要地加以阐明。国家只要在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国家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承担了总的管理者的角色，就可以运用等级制的组织形式来区分价值流动本地的、区域的、本国的和超国家的方面。由此，国家在领土上的组织——民族国家的边界至今还是最重要的——就成了唯一能让投资的动态得以开展的地理格局。这种领土性的组织当然不是不变的；彻底的重
405 组时常是必需的，理由是改善行政效率等等。[①] 可是在任何特殊的时刻，国家权力在领土上的组织都会形成固定的地理环境，投资过程则要在其中运行。于是，国家被迫要相互竞争，要使自己提供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条件对资本有吸引力。它们为了资助自己的债务，还被迫要为了货币资本而竞争。结果，国家失去了在政治上统治资本的权力，被迫采取了服从的、竞争的姿态。在危机的进程中，由于人力资源复合体（human resource complexes）的价值丧失和毁灭成了一种必要，而某个国家需要承担这种价值丧失和社会毁灭的代价，所以国家与国家会在剧烈的竞争中相互对立。由此，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的一般原则至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中转变成了指定国家的价值丧失和社会毁灭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层面上是如何展开的？第 13 章将再次予以讨论。

① 这种过程的生动例子有本地的和区域的政府重组、建立共同市场的尝试等等。

7. 作为整体来看的资本和劳动的机动性

我们到此为止都隐含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是从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相互交错的运动中构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必须观察一下看似多样的、不连贯的运动背后是否有任何统一；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必须揭开其中包含的矛盾。

资本流通中的统一和矛盾的概念（见第 3 章）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给出了必要的基础。如下过程所包含的每个状态中的资本都有一种特别的、以独有的方式来界定的在地理上进行迁移的能力：

$$M - C \begin{pmatrix} LP \\ MP \end{pmatrix} \ldots P \ldots C' - M'$$

由于资本被界定为运动中的价值，所以它肯定必须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这意味着在过渡的时刻，资本（和劳动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肯定必须具有两种以上的形式。因此，每次过渡都构成了不同的空间迁移能力之间相互制约的交错。整个流通过程是由多次这样相互制约的交错所组成的，而每次交错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例如一般来讲，*M*–*C* 要远远比 *C*–*M* 容易进行，这不仅是因为货币是社会权力的化身，而且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更加容易到处迁移。我们可以总结说，这些相互制约必然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总的机动性。

406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脱离了危机的资本积累要求资本流通在一定的期限内——第 4 章考察的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完成，那么上述约束还会进一步收紧。不能在这个期限内流通的资本会丧失价值。但是空间迁移要求资本在迁移时停留在一个特殊的状态中——例如作为货币或商品。这会增加周转时间。

马克思的措辞——“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4]——现在具有了以成倍的力量击中要害的意义。资本流通对时间的要求限制了在每个状态中可以用于空间迁移的时间。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统一把资本在地理上的迁移保持在了严格限定的约束之内。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会改变这条结论。首先，它在严格意义上适用于正在经历标准的自行扩大过程的个别资本。社会中的总流通是由数不清的这类个别过程所构成的，它们的起点和终点也都在不同的时刻。因此出现了一种机会：不同的时间过程在空间中有无数相互替代的机会。个别资本家可以在账上收取货币，尽管生产过程尚未完成、商品尚未出售。一个产业区域的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在前半年赚到的货币借给另一个区域的农民，这些农民则在收获的时节过后偿还这些货币。空间迁移所受的一些约束在个人层面上显得非常紧迫，但在流通过程被看作一个整体时，紧迫性就大大降低了。信用体系尤其为长距离的转移和高度多样的时间过程之间的替代提供了方便。但是替代的重要性也有助于解释聚合。个别资本家和劳动者越是聚集在一起，找到种类合适的劳动力、原材料、置换零件等物品的可能性就越会提升——替代使个别资本家的流通过程出现破碎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这里有一种张力：信用体系使分散成为可能，聚合则在过渡的其他时刻显得较为可取。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或者仅仅考察一下价值在其中的流通），空间迁移的时间纪律（temporal discipline）就会受到更深的干扰。这些流通形式具有双重影响。第一，由于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许多方面在空间中都是固定的，所以地理上的机动性问题就转变成了对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其他形式的资本要在这些环境中流通——加以转化的问题。鉴于漫长的

周转时间和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这种转化过程必定是缓慢的。第二，相关周转时间的长度让替代得以在长得多的期限内存在。让我们从货币资本的立场来考察这个问题。流通有多种 407
可能的路线。依照标准的路线，资本要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严格纪律之下投入生产过程、转变为商品并在市场上出售。但是货币也可以流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物质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它还可以流入科学和技术、行政的改善；或者诸多社会基础设施的创造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会改善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这几条路线上的时间纪律要宽松得多，因为周转时间要长得多。这解释了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如何可以在需要时远远走在其他机动性的前面——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力有大量时间可以用来追赶。可是长期来看，所有这些不同的流通形式都必须相互关联。为了建立虚拟的关系，可以借助信用体系，并按照利率来对所有周转时间进行标准化（见第 9 章）。这正是货币本身，它试图在自己可以采取的不同路线上实行共同的纪律。但与虚拟的价值运动相反，实际的价值创造依赖于一切流动在实际生产面前的连续性。因此，各种流通过程必须以图 12.1 所描绘的方式直接流入对方。每条路线对时间都有不同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测，它们也为空间迁移提供了极端不同的机会。可是生产与实现在根本上的统一必须得到维持，必要的话就通过危机来强行维持。我们可以总结说，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其中的流动在时间上是脱节的——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统一才能使差别巨大的地理上的机动性服从共同的纪律。 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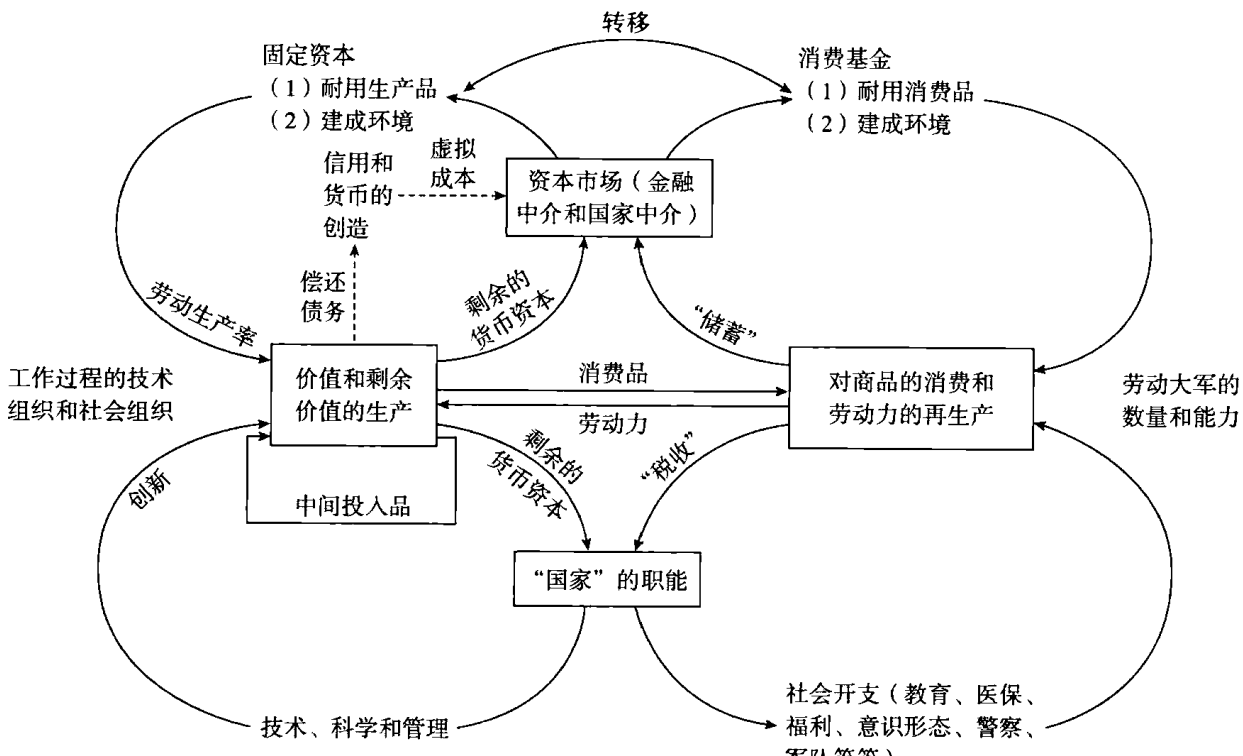


图 12.1　资本流动的路线

（1）互补性

一旦把流通过程拆分成许多看似独立的体系，就会在生产与实现的统一体内部制造张力。但这种拆分也会令人赞叹地使资本主义适应于一项任务：即按照长期的、总体的要求来塑造空间组织和流动。不同种类的资本可以通过迁移来相互补充，以便寻求一种新的空间秩序。倘若以一种面貌出现的资本无法穿透空间壁垒，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资本或许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在这一处开拓道路的也许是货币资本的运动，在那一处也许就是携带商品的商人。就连在某个边境追寻自由的劳动者也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空间格局的转化是通过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蛙跳”来进行的，因为这些资本和劳动力被赋予了非常不同的机动能力。只要互补是在不可或缺的期限内完成的，这里面就不会有危险。

然而随着条件的改变，不同种类的资本倾向于先后承担 409
主导角色。商品和黄金的迁移尽管曾经是资本国际化的利刃，却在19世纪晚期逐步被作为信用的货币资本的运动所取代了——这场转变见证了日益精巧的信用安排，也见证了作为经济帝国主义的“救护天使”（ministering angel）的（不论哪种）“金融资本”的兴起。虚拟资本和国家的干预还越来越倾向于把生产资本从它先前经验到的比较紧迫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直接投资变得更加可行了，与之伴随的当然是跨国公司等新的组织形式的兴起，目的是确保货币、商品、生产和劳动可以通过迁移来互补。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商人、金融家、产业家与劳动者在空间格局的转化中的相对意义一直在变动。

关于对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需要做一些专门的考察。由于免去了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严格约束，

长得多的提前和滞后在这里就成为了可能。至于这些可能性是否会实现、会有何种影响，那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必须要有剩余资本和能够集中这些剩余资本的组织形式——通常是国家，但是有时是一群强有力的金融家——才能运用这些剩余资本来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然后等待若干年，再收取某种回报。这也意味着必须自觉地认识并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需要。反过来，这些投资也有可能被看作未来资本流动的利刃，从而被看作用来对地理加以转化的首要工具——未来劳动的结构也是由此形成的。然而，这把利刃有特别的风险：它是未来资本流动的地理格局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生产、劳动力和商业未必会追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开辟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投资实际上当然会丧失价值。

这将我们带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理论性见解和历史上的论战的边缘。商业资本家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来交易——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易货贸易——资本主义生产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则要苛刻得多。地理扩张意味着首先必须建立所有权、法律、行政和基本的物质基础设施，比如交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必须得到确保。国家这个代理人对于这一切是至关重要的。它肯定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但这类国家开支的生产率是无法保证的。倘若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也许就能把其他形式的资本引诱到互补的投资格局当中，因为投资的回报在偿还了最初的支出之后
410 还能有盈余。或者国家可能会试图迫使资本的其他要素和劳动服从自己，以便保证自己的投资的生产率。但是价值丧失的风险始终是挥之不去的。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
626 趣的实例。国家的控制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的。勘测者确

立了土地私有制（由此就可以用租金来把劳动者排除在土地之外），运输和通信的联系被建立起来了，法律体系得到了确立（当然是有益于交换的），前资本主义的民众也变成了无产阶级并受到了规训（在必要时靠的是强力和压迫，但也可以通过法律、教育、传教活动等等）。这一切要花费数额巨大的货币。因此，在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辩护背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治相当于一种巨大的、长期的、投机性的投资，它也许是有成效的，也许不是。资本家通过帝国主义得到了多少利益？这场辩论真正说来关系到这种投资是有成效的，还是实际上丧失了价值。对前资本主义的民众造成的毁灭和资本家所达到的较高的剥削率并不能保证殖民的冒险是合算的买卖。这些冒险的失败也不能证明发动它们是出于某种仁爱的企图，即给世界上的“落后”区域送来启蒙和发展。它们只是被资本主义的活力——资本积累和价值丧失——卷进去了。简言之，这些投资对于积累的延续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①]

然而，这种活力并非没有模式。我们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越来越被还原成了利率的一种表现，而利率本身反映了资本积累的状况。过度积累通常会压低利率，从而延伸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于是，资本家就有能力探索地理边境，或者设法生产一些在越来越遥远的未来才会有成效的使用价值——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资本最终会遇到它本身的性质中的限制，从而招致危机——危机往往以飙升的利率为特征，而这再一次限制了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由于一切形式的资本对于利率都十分敏感，所以它们倾向于在

① 在这个方面还有一场非常有教益的辩论：铁路在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是引领了发展，还是延缓了发展。

共同的纪律之下运行。这一点足以解释资本主义在空间中的发展所具有的搏动的节奏。[①] 这种过程中的下行趋势和矛盾是以生产与实现的统一被打破为标志的，同时又是以互补性——高度差异化的资本原本可以通过迁移来互补——被干扰为标志的。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干扰的基础。

（2）矛盾和冲突

411 高度差异化的流通形式和空间中的机动性或许可以让资本主义能够按照资本积累的规定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地理。但它们也无可估量地提高了形成危机的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出售与购买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离为马克思对萨伊法则的攻击提供了基础（见第3章）。在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中，空间和时间中的分离必定会减轻许多。由于不同的流通过程之间的互补是更加难以确保的，所以形成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增。为了理解危机形成过程的空间方面，我们在这里要寻找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基础。

我们在第3章看到，价值丧失是流通正常的一面。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无法通过资本流通的恢复来完全回收的损失。诚然，无数“偶然的”和个别的价值丧失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资本和劳动力没有以不可或缺的形式和数量在合适的时间处在恰好合适的地点。这些价值丧失背后的原因一般是计算错误、远见的缺乏、糟糕的信息、不可靠的运输系统等等。它们未必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中某种更为宏大的过程的一部分，而是从事商业、探索新的空间格局、界定新的地理上的机会所

① 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1973）关于19世纪大西洋经济的研究很好地描述了这些现象，沃克（Walker）（1977）关于郊区化的研究也是如此。

需要的正常成本的一部分。然而，使这些风险最小化的努力并非只有微不足道的效果。聚合、运输的改进和其他种类的地理组织都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正常的成本。

即使价值丧失的前景十分微小，相关的张力也会引发强烈的相互竞争的潮流，这些潮流可能会发生溢出，有时还会导致派系冲突。只要不同种类的资本是分别由不同的人所有的，就会滋生对抗。货币资本家也许同商人互不相让，双方也许都同生产者有冲突，而另一些人的赌注是把沉没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价值维持下去，因而对他们造成威胁的是信用货币流变的运动、工厂外逃（runaway shops）等等。一种资本的机动性可能会对另一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威胁。当价值丧失的全面危机爆发时，每个派系都会力争把价值丧失的代价硬塞到另一个派系头上，而这经常意味着资本家会把迁移当作威胁提出来，甚至真的会迁移。就资本流通的总体统一中的差异而言，马克思相关分析的社会意义现在变得更为明显了。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我们可以解剖不同种类的机动性之间的矛盾和互补性。我们将在第 13 章考察这一切可能会如何具体表现为领土之间的较量。

迁移由于可以被当作威胁和反威胁，所以也成了资本与劳动的斗争中的一件重要武器。我们几乎不需要详尽地阐述这里所运用的诸多策略和方法——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揭示。但关于这种斗争的结果，我们还要注意到某种有趣的东西。倘若工人在雇佣劳动体系的范围内卷入了无限制的个别迁徙，他们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至多就是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在各个地点的平均化，而这种平均水平是与资本积累的延续相一致的。他们倘若留在原地、共同斗争，或许在这片领土上就可以过得更好。资本并不总是可以轻易地用迁移来回应他们。

尽管信用货币的机动性和工厂外逃都是很难对付的武器，但是资本的另一些派系已经把一些价值内嵌到了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当中，而运用这些武器并不总是可以避免毁灭这些价值。

然而，资本不受约束的机动性与工人不受约束的机动性并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率（由利润率来代表）十分敏感。利润率的平均化未必会给劳动者带来物质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平均化。实际上一般来讲，倘若有差异的劳动力价值和工作条件可以得到保持，资本家就很有可能获利。因此，资本不受约束的机动性比劳动不受约束的机动性更加适合于资本积累——这或许可以说明20世纪的一种趋势：限制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机动性。

在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危机所做的解剖中，关于价值在生产与实现中的统一和矛盾的观点是根本性的。我们在这一章看到了在分析地理上的机动性所具有的高度差异化的形式之间的交错时，我们可以如何延续上述观点。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资本的不同派系要寻求更有利润的空间秩序时，它们可能会如何经常阻挡对方的道路，又同样经常相互补充；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和劳动可以如何在阶级斗争中把空间作为一件武器来使用。这一切把自身的印记留在了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演化上面——这种增长和演化是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具体地理环境中发生的。因此，导致危机的力量正是从这种地理环境具体的物质性中产生的。

译注

1.《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278页。
2.《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112页。
3.《全集》第26卷第3册，1974版，第141页。

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88页。
5.《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2页。
6.《全集》第26卷第1册，1972版，第444—445页。
7.《全集》第45卷，2003版，第65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8.《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6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9.《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2页。
10.《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8页。
1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24页。
12.《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21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3.《全集》第45卷，2003版，第27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8页。
15.《全集》第44卷，2001版，第197页。
16.《全集》第46卷，2003版，第218—219页。
17.《文集》第8卷，2009版，第507页。
18.《文集》第8卷，2009版，第515页。
19.《文集》第8卷，2009版，第494页。
20.《文集》第8卷，2009版，第515页。
21.《文集》第8卷，2009版，第494页。
2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772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11页。
24.《全集》第46卷，2003版，第149页。
25.《文集》第10卷，2009版，第328—329页。
26.《全集》第31卷，1998版，第504页。
27.《全集》第31卷，1998版，第501页。
28.《全集》第30卷，1995版，第390页。
29.《全集》第46卷，2003版，第644—645页。
30.《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68页。
31.《全集》第44卷，2001版，第381页。
32.“红线”一般是指拒绝给受歧视的对象（按照收入、地区、种族、性别等方式来界定）提供银行、保险、医保、地产抵押等服务，甚至限制他们的购物、工作等等。
33.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
34.《全集》第30卷，1995版，第538页。

第13章　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413 《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讨论了“现代殖民理论”。乍一看，它的定位有些奇怪。在整部《资本论》的大多数地方，马克思都明确地排除了对外贸易和殖民贸易的问题，理由是对它们的考察只会导致“把［资本积累的］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1]。马克思在理论中一般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资本论》第1卷，第591页；第2卷，第470页）。那么，既然这部著作在倒数第二章仿佛已经到达了自然的顶点——马克思在那里用宏大而华美的修辞宣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和无可避免的“人民群众对少数掠夺者的剥夺”[2]——为什么又要在末尾将上述问题暴露出来？

马克思在这一章的公开目的是揭露对“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描述中的矛盾，并借此重申自己分析的连贯性。按照资产

阶级的描述，资本在历史上的起源是生产者富有成果地发挥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劳动力的源头是一种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双方则分别是通过勤奋和节俭来积累财富的人与选择不这样做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3]。在那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被迫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生产条件的真理”[4]。只要劳动者“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5]。资本不是一种物质产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立足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也就是说”，它立足于“劳动者的被剥夺”[6]。这正是资产阶级在推动殖民计划时被迫在新大陆发现的秘密（《资本论》第1卷，第33章）。

这一章是一段简洁的尾声，它所属的主题之前已经谈到了：原始积累决不是“田园诗式的”，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 414
载入人类编年史的”[7]（《资本论》第1卷，第714—715页）。资产阶级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掌握权力、维持权力；这一点也很容易使人民群众的斗争——把局面颠倒过来，“剥夺剥夺者”[8]——合法化。但这一章的定位表明，马克思所想到的是某种更加宽泛的东西。

为了了解马克思的意图，一种怪异的平行关系也许能提供一条线索：他的论述与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识别出来的问题（黑格尔，1967，第149—152页）是平行的。黑格尔考察了人口和产业在市民社会中的内在扩大；与马克思一样，他也找出了一种“内在的辩证法”，它在一极造成了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造成了贫困的逐渐积累。资产阶级社会似乎不能够通过自身的任何内在转化来停止这种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与之伴随的一种创造——即赤贫的贱民。因此，它被迫要寻

找外在的解脱。“市民社会的这种内在的辩证法，把它……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找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存资料，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多的物资，或者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9]更有甚者，“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建立殖民地的驱动，以便为自己的民众提供新的机会，并为自己“在工业上”提供“新的需要和……新的劳动园地”[10]。简言之，黑格尔为建立在资本积累之上的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

黑格尔丢开了*内在转化与外在转化*这两种过程之间的确切关系，也未能指明市民社会是否能通过空间扩张来永久地解决它的内在问题——这有些不符合他的特点。① 马克思关于殖民的一章正是要处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他是否有意这样做。虽然“外在转化”可以为产业提供新的市场和新的场地，但是必要的代价是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和对他人的剩余劳动加以占有的能力再次创造出来。这不过是把最初引起问题的条件重新复制出来了。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扩大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外贸易的增长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11]（《资本论》第2卷，第408页）。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外在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内在转化”：迫使社会戒绝为积累而积累的做法，并设法发动自然的和人类的能力来追求一种只有超出了“必然王国”才会开始的自由[12]（《资本论》第3卷，第820页）。

415 鉴于马克思十分喜欢与黑格尔的幽灵格斗，我们很难相信

① 阿维内里（Avineri）（1972，第7章）概括了黑格尔的总体论述，赫希曼（Hirschman）（1976）则把一种对黑格尔论述的解释与一种略显随意的对马克思的解释相互并列。

他在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唯一写完并出版的主要著作时未曾想到这一切。[①] 与往常一样，他的逻辑是无可挑剔的，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毁灭性的。可是这一章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它仅仅确认了“外在转化”首先会导致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然后会导致实际上的从属，不论资本迁移到何处。当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卷入了资本的轨道时，这种过程就遇到了外部的界限。在达到这个界限之前，“外在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仿佛是完全可行的。当马克思简要地评论对外贸易的一种作用时——对外贸易可以抵消所谓的利润下降规律——他近乎承认了这一观点。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确实有可能以诸多方式提高利润率。但由于这意味着国内“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又“加速了积累过程”[14]，所以到头来只是加剧了最初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过程。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却会在长期变成它的反面。但是马克思也被迫总结说，利润下降的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而且“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15]（《资本论》第3卷，第237—239页）。那么，这些“情况”有哪些，长期又是多长？马克思的最后一章——他明显想要把它作为一种针对黑格尔的含蓄回应——最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总体稳定中发挥的作用——地理扩张和领土统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它一直是激烈的论战和往往很尖锐的辩论

① 在《资本论》的一篇后记（第1卷，第19页）中，马克思声称自己在“将近30年以前”就研究过黑格尔[13]；他所想到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奥马利（O'Malley）为后一部著作写的“导言”是非常有用的。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解读在马克思后来的大部分学术生涯中都是与他同在的。

的焦点。[①] 黑格尔在这么多年以前如此简洁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却尚未构造出全面的、无可辩驳的答案。那么，资本的问题可以得到“空间修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地理环境在危机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 不平均的地理发展

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马平川的表面上发展起来的——仿佛在这个表面上设有无处不在的原材料、同质的劳动供给和在各个方向上都同等的运输设施。它被插入了千姿百态的地
416 理环境，并在其中成长、扩散；就自然界的慷慨和劳动生产率而言，地理环境包含了巨大的多样性，而且这“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6]（《资本论》第 1 卷，第 512—514 页）。在资本主义之下释放出来的力量攻击、侵蚀、瓦解并转化了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在原始积累中形成的雇佣劳动、劳工的大规模迁徙、具有鲜明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过程的兴起，最后还有整个资本流通把一切整合起来的运动——它们力图“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并“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主义“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7]（《大纲》，第 410 页）。

但是资本主义也“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8]，而这迫使它生产出了地理差异的新形式。第 12 章描述的不同

① 关于帝国主义有数量庞大的文献。参见巴勒特－布朗（Barratt-Brown）（1974）、肯普（Kemp）（1967）和阿明（Amin）（1980）所做的综述。

形式的地理上的机动性会在资本积累的语境下相互作用，由此建造、打碎并创立了生产力分配的空间格局，并在社会关系、制度安排等方面产生了类似的差异。在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经常会支持以旧的面貌来创造新的区分。前资本主义的偏见、文化和制度发生了革命，但这只是说它们获得了新的职能和意义，而不是说它们被毁灭了。这对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部落主义是成立的，对于教会和法律这样的制度也是成立的。于是，地理差异表现出来的面目经常是不真实的：它们仿佛只是历史的残余，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主动重新建构的特征。

可见，我们有必要认识到，领土的和区域的连贯性——这在资本主义当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辨的——是资本主义主动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它被动接受的，不是一种对“自然”或“历史”的让步。真正说来，这种连贯性是从资本积累的时间限制向空间限制的转变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被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既然需要用时间来克服空间，剩余价值就同样必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被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

只要坚持这个观点，资本主义之下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所需的基础立刻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了。如果剩余价值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被生产出来，那么生产技术，分配结构，消费的方式和形式，劳动力的价值、数量和性质，以及所有必要 417
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就必须在这个区域内统统相互一致。劳动过程的每次变化都必须与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变化相匹配，否则资本积累的稳定基础就无法得到保持。[①] 每个

① 这个观点强烈地呈现在了艾达洛（Aydalot）（1976）的著作中。

区域都倾向于演化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规律，与这种规律相关的是特殊的物质生活水平、劳动过程的形式、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安排等等。

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完全不符合资本主义始终力求达到的普遍主义。区域的边界无一例外是模糊的，而且会接受无休止的修改，因为随着交通和通信的改进，相对距离也会改变。但是区域性的经济体从来就不是封闭的。长期来看，资本家无法抵抗一种诱惑：参与区域之间的贸易，从不平等的交换中攫出利润，并把剩余资本放到利润率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工人肯定也会受到一种诱惑，即迁移到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此外，过度积累的倾向和价值丧失的威胁也会迫使一个区域内的资本家扩展它的边境，或者干脆把自己的资本迁移到更加青翠的牧场上去。

结局是：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发展受困于相互对峙、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空间壁垒和区域性的区分必须被拆毁。可是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要求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从而形成了有待克服的新的空间壁垒。资本主义的地理组织把这些矛盾内化到了价值形式当中。这正是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的不平均地理发展这个概念的含义。

2. 地理上的集中与分散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相互抗衡的力量之间的对立来表达的——这些力量会造成资本流通在地理上的积聚或分散。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考察尽管是碎片化的，却也十分有趣。例如，他在《资本论》中主要致力于解释生产力在市中心难以置信的积聚以及生产和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相应变化。他所把握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生产在城市中的

迅速聚合，因而这些城市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工厂[19]（《资本论》第1卷，第352页；《大纲》，第587页）。他还说明了促进聚合的力量如何可以一层层相互累积，在已经确立的区位上吸引新的对运输的投资和消费品产业（《资本论》第2卷，第250—251页）。这一切要求无产阶级在大型的市中心不断地积聚并扩大，而这要么意味着在市中心彻底改变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要么意味着“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20]（《资本论》第1卷，第269、488、581、642页）。进一步讲，在主要的市中心出现“浮动的”产业后备军是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劳动者拥挤在“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1]当中——这一切还会由于诸多次级的剥削形式（如房租）而加深——而这成了资本主义形式的产业主义的标志。资本积累与贫困的积累是如影随形的，而且都会在空间中积聚起来。

这些聚合的倾向明显会遇到物理的和社会的界限。交通拥堵的成本、物质基础设施在使用时越来越大的刚性、租金的上涨和空间的缺乏本身都会抵消并盖过聚合的经济效果。贫困的积聚构成了阶级意识和社会动荡的温床。空间上的分散逐渐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我们在这里要提到另一些力量：它们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运作倾向于造成“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22]，并把世界整合为以国际性的领土分工为特征的单一体系。若要理解资本流通在整个地球表面上的迅速分散，关键就在于信用货币的机动性和消除空间壁垒的倾向。高额利润的前景引诱资本家在各个方向上进行寻找和探索（《资本论》第3卷，第256页）。资本积累将自己的罗网扩散到了全世界愈发宽广的范围，最终将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卷进了资本的流通过程。

但是分散也会遇到强有力的限制性约束。数量庞大的资本内嵌在土地本身当中，社会基础设施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劳动过程对资本的束缚也局限了它的机动性——这一切倾向于使资本保持在原地。昂贵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对于由积聚带来的规模经济也是高度敏感的。

地理上积聚与分散的倾向相互对立、彼此冲突。它们之间的稳定均衡是无法保证的。促进聚合的力量有可能很容易一层层相互累积，并产生对进一步资本积累有害的过度积聚。促进分散的力量同样有可能很容易失控。技术、通信和运输的手段、资本的集中与分散（包括垂直整合的水平）、货币和信
419 用的安排，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都会发生革命，而这会实质性地影响正在运作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因此，当资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空间格局进行深化和拓展时，它有时不得不使深化和拓展的阶段同时发生，有时又不得不使它们相继进行。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生产力在一个地点的加速发展和在另一个地点的相对滞后，社会关系在这一处的迅速转化和在那一处的相对死板。城市化以及区域性的和国际性的发展这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事情的方案中找到了自然的位置。[①] 但它们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仅仅以单边的方式来理解的。城镇与乡村之间、中心与外围之间、发展与不发达状况的发展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生的强加。它们是由多种相互

① 见迪尔（Dear）与斯科特（Scott）（1981）；卡尼（Carn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

交错的力量所造成的连贯产物，这些力量运行在资本流通过程的总体统一当中。

3. 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的区域化

无可否认，阶级斗争和派系冲突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空间性的、往往是领土性的一面。为这类现象所做的辩解往往将它们当作根深蒂固的人类情感的产物——对地点、“土地”、共同体和民族的忠诚会孕育出市民的自豪、区域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或者把它们当作人类群体之间的同样根深蒂固的憎恨的产物，这些憎恨的基础是种族、语言、宗教、民族等等。但是先前的分析让我们得以脱离这些情感来解释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的区域化。我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的情感在区域之间的冲突中是不起作用的，也不是说这些冲突不能自主地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我只想主张：在资本的流通过程本身当中存在一种物质基础，它使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可以在区域之间表现出来。[①]

这种基础立足于一种导致冲突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的产生是因为一定比例的社会总资本必须变成不动的资本，以便让余下的资本在迁移时获得更大的灵活性。资本的价值一旦被封锁 420
在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就必须得到捍卫，否则就会丧失价值。在最低限度上，这意味着要把余下的资本

① 国家的、区域的、本地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会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得到清晰的分析，除非是从一种纯粹政治的和战略的立场来分析，而这种立场立足于某种总体上的阶级斗争概念。这个问题十分深刻，而且充斥着矛盾。奈恩（Nairn）（1977）、戴维斯（Davis）（1978）和阿明（Amin）（1980）最近的贡献更加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猛烈的批评。面对这些问题，我不会假装已经识别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我只想揭示由区域的界线来规定的某些种类的派系分化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所具有的物质基础。

的流通过程在一定的期限内约束在一定的领土上，以此来保卫这些投资所预期的未来劳动。

资本的一些派系比另一些派系更加致力于不动的投资。土地和房地产的所有者、开发商和建筑商、本地政府和持有地产抵押债务的人可以打造一个本地联盟，以便保护并促进本地的利益，防止本地化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所带来的威胁——他们会因此而收获颇丰。无法轻易迁移的生产资本有可能支持这个联盟，还有可能受到一种诱惑，即通过与工资和工作条件相关的妥协来收买本地的劳工，使他们保持和平，并购买他们的技能——由此获得的利益是劳工的合作和本地市场上对工资品的有效需求的上升。由于斗争或历史的意外，劳工的一些派系也设法在剥削的海洋中创造了享有特权的岛屿，因而或许也会集结到这个联盟的事业当中。进一步讲，资本与劳动在本地的妥协如果有助于本地的资本积累，整个资产阶级也许就会予以支持。在由此打下的基础上，一个基于领土的联盟就兴起了；它包含了资本的诸多派系、本地的政府乃至整个阶级，以便在特殊的领土上捍卫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包括积累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联盟的基础立足于一种需要：把一定比例的资本变成不动的资本，以便使余下的资本获得迁移的自由。

这个联盟一般会参与积极拥护共同体的活动，而且会为了共同体或国家的团结而努力，因为这种团结是捍卫诸多派系利益和阶级利益的手段。各个地点、城市、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具备了新的意义，因为每个联盟都试图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领土来夺取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所带来的利益，并把这些利益限制在自己手中。当更加全面的危机出现时，价值丧失肯定必须到来；至于首当其冲的是哪个地点，则会爆发

尖锐的斗争。这些客观的物质条件为共同体的和谐和国家的团结等观念提供了大量养料。这些观念对于劳工的派系和资本的派系都是有意义的，双方也都经常可以方便地追逐基于领土的利益。由此，资本可以期望通过与工人阶级妥协——工人阶级在地理上是碎片化的——来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样一来，它也分裂并削弱了自己。劳工有可能强化自己在本地的地位，但是代价是丢掉更有革命性的要求，并在自己的行列中呈现出领土性的分野。于是，全球性的阶级斗争瓦解成了诸多基于领土的冲突，它们会支持、维护，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重建各式各样的本地偏见和闭关自守的传统。

然而，每个基于领土的联盟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都会受到强大的干扰力量的威胁。资本的一些派系——特别是货币资本家——更加容易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对生产资本来说，倘若迁移到更好的区位可以使它收获相对剩余价值，它也几乎不可能视而不见。资本的一些派系会挣脱本地的联盟，在别的地方寻求更高的回报。虽然资本与劳动在某些问题上（比如给廉价的进口货物设立关税壁垒）或许会结盟，在另一些问题上或许会妥协，但它们之间的对抗永远不会消失。一旦阶级斗争加剧了，资本的一些派系就有可能受到一种越来越大的诱惑：逃离这片领土，或者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等手段来回击有组织的劳动力。本地联盟的连贯性总是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派系在一片领土上有不同的赌注，这取决于它们所拥有的资产的本质和它们所掌控的特权。有些人在本地联盟中是比另一些人更加坚实的伙伴。但在对本地承诺的美德与迁移的诱惑之间，所有派系都觉察到了某种意义上张力。例如，鉴于土地所有者所持有的资产，他们也许看起来在任何本地的联盟中都是“自然的”支柱。但若土地被当作一种

纯粹的金融资产，土地公司的投机行为就有可能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扰乱本地联盟。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发现货币资本家也受困于类似的两难，尽管他们所控制的资产是高度机动的。倘若一家强大的银行持有一片领土上的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的地产抵押债务，却抽走了所有剩余的货币资本，把它们送到了利润率最高的无论什么地方，那么它就损害了自己债务的品质。为了实现它已经持有的债务的价值，这家银行或许被迫要在一片领土上以较低的利润率来追加一些投资，尽管它在别的地方可以收取更多的利润。从事生产的资本家同样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本地联盟来支持本地基础设施的改进，由此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或者他们可以迁移到据说条件更好的另一个地点。他们还可以用迁移来威胁比较脆弱的伙伴，胁迫后者做出让步（例如税收减免）。劳工在这些压力面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们或许会避免将自己的要求推向革命的方向，因为他们害怕引发资本外逃——那会损害他们已经赢得的特权。

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不会因此就被废除。它们只是具备了领土性的一面，这一面会与其他形式的斗争一同运行。正如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寻求会同时诉诸技术和区位一样，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也必定会以恰好相同的方式在空间和时间中展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是一种以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演化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而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作为特殊的空间格局
422 而存在的。在这里运作的相互抗衡的力量把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中的机动性放进了充满张力的、容易出现矛盾的地理环境。于是，当围绕资本积累及其矛盾而发生的阶级斗争要为积累找到新的基础，或者要找到替代积累的方案时，基于领土的冲突就成了斗争手段的一部分。领土性的联盟和领土之间的冲突应

该被解释为阶级斗争的总体历史中的活跃环节，而不是反常的现象。

4. 等级安排和资本的国际化

资本流通时的固定与运动之间、积聚与分散之间、对本地的承诺与对全球的关注之间的张力使资本主义的组织能力受到了极为沉重的压力。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以不断探索并修改组织安排为标志的——这些组织安排要能缓解并限制这些张力。于是，组织上层叠的等级结构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结构可以将本地的和特殊的东西同抽象劳动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就联系起来。危机被接合（articulated）起来了，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也要在这些组织形式中展开；不过，这些形式本身在资本积累的危机面前往往需要发生戏剧性的转化。

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一种层叠的等级结构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第9章证明，不同品质的货币所形成的等级制对于资本积累的进展是必要的。本地对流通手段的需要只有以这种方式才有可能与作为价值尺度的一般等价物关联起来。本地的和特殊的事件——比如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通过信用交易来创造货币——可以借助货币体系中机构的等级制来整合到世界性的货币协议当中。我们还论证了这个等级体系中存在矛盾，而且在一个层面发生的事情未必能与另一个层面应当发生的事情相一致。例如，危机的最终表达正是金融体系与它的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由于一些国际机构占据了指挥整个等级制的高地，所以它们命中注定的一项任务就是维护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品质。由此，危机无一例外地表现为货币协议的这种等级制中诸多层面之间的冲突。

其他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也到处存在，而且在自身中都展

现出了类似的张力。例如，跨国公司拥有全球视角，却必须
423 在诸多地点同当地的情况相整合。[①] 它们或许极度依赖于在本
地分包生产的模式，因而或许会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对本地
的领土性联盟的支持。它们把资本集中到了自己的组织当中，
但这无一例外地会与空间中的分散相伴随（见第 5 章）；这意
味着某种程度的对本地的承诺和责任，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有
能力在本地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跨国公
司与本地的整合使得在一个特殊的地点保留或关闭一家分厂
的决定成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跨国公司的等级制内部，在一
个层面有道理的东西未必在另一个层面有道理。跨国的商人资
本也要面对同样的两难。对本地的承诺与在可以获得剩余价值
的无论什么地方占有剩余价值的努力是有张力的，需要全球性
的战略来弥合。尽管权力看起来仿佛总是位于这些等级结构的
顶端，但这种权力的最终来源总是在特殊的地点进行的生产。
跨国公司内化了固定与迁移之间、对本地的承诺与对全球的
关注之间的张力。它们唯一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按照有意
识的计划来组织自己对空间的占有和自己的地理环境的历史。
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计划是在资本积累的环境中设想的，但是
积累受困于不确定性，而且充斥着矛盾。

出于类似的原因，政治体系也是按照类似的等级制的思路
来组织的。[②] 尽管民族国家在这个等级制中占据了一个关键地
位，但是超国家的组织也反映了对全球协调的需要，区域的、
城市的和社区的政府安排则将普遍的关注与纯粹本地的关注
联系起来了。在这个等级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到处都是冲突，

① 雷迪斯（Radice）（1975）；帕卢瓦（Palloix）（1973；1975a）。

② 关于法国区域权力的组织，杜隆（Dulong）（1978）的讨论是非常有趣的。

因而任何国家理论倘若把国家作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现象，就会成为笑柄。尽管位于国家层面的权力可能是很大的，但对任何当局来说，使本地的要求与全球的要求相互整合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倘若某个国家所追求的角色是世界的银行家，这场冲突就会变得特别尖锐。它应该以资本积累在全球的前景的名义来接受乃至策动自己边界内某些本地的经济体的毁灭吗？或者它应该试图保护这些经济体，并奉行狭隘的，乃至孤立主义的政策吗？后一种做法最终意味着自给自足，意味着开放的全球积累模式的丧钟。

金融、生产、国家等领域中有诸多这样具有等级组织的结构，而且城市为了确保商品迁移的效率，也有一些等级制的结构；这一切以尴尬的方式相互吻合，由此界定了多个级别——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级别（这里只是用常见的范畴来大致反映我们的意思）。基于领土的联盟可以在这当中的 424
任何一个级别上形成。但这种联盟的本质和政治活动倾向于从一个级别向另一个级别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有时相当戏剧性。阶级斗争、派系斗争和领土之间的竞争的模式同样会变动。在一个级别上显得十分根本的问题到了另一个级别就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一些派系在一个级别上是活跃的参与者，到了另一个级别可能就会从场上淡出，甚至会变化。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有一大团凌乱的组织安排，它们为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资本流动的动态提供了中介，还提供了众多不同的讲坛，使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可以借此展开。

这些安排是凌乱的、错综复杂的，而这往往会掩盖它们作为传送手段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们把特殊的、具体的行为与抽象劳动在全球的影响关联起来了，由此确认了政治经济学可以将个人整合到市民社会的复杂总体当中。例如，工人倘若要在

特殊的地点和时间购买房屋，就有可能在地产抵押协议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这种协议是契约传统所准许的，是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他们每月向银行的支付反映了一种摊销时间和一种利率，而这两者以经过中介的方式反映了资本积累在全球的状况，这种中介则是金融体系中的各个特殊机构的实力和安全性以及国民经济在世界贸易面前的实力。所有这些中介归根到底都是由每月向银行（或平行的金融机构）的支付来把握的，都要还原为这种支付。在另一个极端，倘若世界经济看起来处于混乱的边缘，而国际上的银行家力求为它带来稳定，那么他们的这种行动所处的语境既包含了无数个别的决定，又包含了区域之间的斗争、阶级联盟、派系联盟等现象的混乱交错。他们一旦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或许就会着手创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用它们所拥有的权力来规训和哄骗民族国家，从而强行推动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会以至关重要的、有时是创伤性的方式来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类中介会如何影响危机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

5.“第三块”危机理论：地理的方面

不论在什么地方，资本家都会表现得像资本家一样。他们所追逐的是通过剥削来扩大价值，但他们不考虑社会后果。他们积累了过多的资本，但他们最终创造的条件会导致价值丧失——个别的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在危机中丧失价值。然而，这是在一个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框架中发生的，产生这个框架的是多种多样的资本和劳动力在机动性方面的差异，而所有这些机动性都在资本的流通过程本身所施加的时间约束中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动性把个性化的、具体的劳动过程塑造成

了“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23]，抽象劳动也由此被界定为价值。

我们的任务是构造一种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第三块”理论，它特别承认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当中界定的社会空间所具有的物质特性。让我们回想一下，“第一块”危机理论讨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本来源。“第二块”危机理论则考察了一些时间动态，而塑造它们并为它们提供中介的是金融的和货币的安排。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第三块”危机理论，它必须把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整合到危机理论当中。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讨论众多同时出现的、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例如，由区位优势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与由技术优势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权衡往往会让资本家在面对竞争者时拥有相当大的余地。由于缺乏独一无二的决定因素，理论思考就变得困难了。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采用一些极度简化的假定，以便把握危机在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中的形成过程的本质。

（1）特定的、个别的和具体地点的价值丧失

资本和劳动力——不论前者以什么面目出现，也不论后者是什么类型——倘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碰巧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就很有可能遭受价值丧失。数不清的投机操作使得空间和时间中的恰到好处的协调成了一种偶然情况，除非金融体系或国家有意识地行使了计划的权力。在事件的正常进程中，一些个人将遭受资本或劳动力的价值丧失，另一些个人则将获得可观的利润或找到报酬很好的职位。由此造成的无数特殊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未必会在某种更为宏大的模式中结合起来。它们不外是通过竞争来进行的资本积累所造成

的正常的人道成本或社会损耗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价值丧失是一种社会性的规定。它不是说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绝对无法在一个特殊的地点运作，而是说这种劳动过程不能至少产生平均利润率。价值丧失始终会把特殊性和个别性（即具体劳动）同普遍性和社会性（即抽象劳动）融合起来。价值丧失也始终会指定特殊的地点和时间。第二，更加全面的危机形式立足于由本地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件所构成的这种混合，而且是从这种混合中产生出来的。正如马克思（通过考察出售与购买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分离）攻破了萨伊法则所预设的同一性、把它变成了危机的众多可能性一样，无数特殊的、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也以同样的方式制造了一些裂口，而它们的溃烂可能会使危机具有更
426 加全面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必须说明溃烂的伤疤如何会在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过程中转变为开裂的伤口。

资本家只要通过技术变革或区位的变动来追寻相对剩余价值，就会引发价值的革命。于是，以较差的技术来运用的资本或在较差的区位上运用的资本就会丧失价值。这种过程十分复杂，因为通过运输和通信的改善来加快周转时间的驱动会改变相对空间，从而把较好的区位转化为较差的区位，或者相反。个别劳动者为了追寻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迁移加重了这里的混乱——资本原本有机会获得廉价的剩余劳动资源，但由于劳工的迁徙，这个优势也许就被削弱了。总体效果是：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变得不只是一桩随机的、偶然的事务了。空间竞争在这一处导致了工厂的关闭，在那一处则导致了铁路联络的丧失。与此相关的工作的丧失和本地对工资品或不变资本有效需求的减少会引起空间经济中
650 的调整，而这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价值丧失。通过阶级冲突所

具有的合理化的力量以及与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和相对形式相关的竞争，价值丧失被系统化了，变成了一定的空间格局。然而，空间格局由于价值的革命而不断发生的结构转换必须再次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正常特征。[①]

（2）危机在区域内的形成

过度积累源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矛盾。这些矛盾打破了资本渴望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建立的统一。这种统一只能强行通过价值丧失的危机来恢复。然而，生产和实现必须在给定的周转时间内完成，我们之前还证明了这在某些状况下会转换为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总的效果是很难描述的，因为所有个别资本都是在特殊的区位经营的，都有自己特定的生产条件、交换条件（包括交通）和实现条件。

简单地讲，我们最初假定了所有相互依赖的资本的生产和实现都是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发生的。资本积累在这个区域内进展的速度取决于本地无产阶级的扩大、阶级斗争的状况、创新的步伐、总的有效需求的增长等等。但由于资本家总是资本家，所以过度积累必定会出现。惨重的价值丧失的威胁挥之不去，市民社会也似乎注定要经历社会性的危难、扰乱和动荡，而这些现象是与有利于积累的条件的强行恢复相伴随的。

427

当然，恰好是这种“内在的辩证法”迫使社会通过某种“空间修复”来寻求解脱。区域的边境可能会后退；通过输出

① 马西（1981）从英国的电子产业和电气工程产业出发深入地探讨了这个观点。

资本、商品或生产能力，或者通过从别的区域输入新鲜的劳动力，一个区域也可以获得解脱。区域内过度积累的倾向仍然是不受抑制的，但由于连续的、愈发宏大的“外在转化”，价值丧失就得到了避免。这种过程多半可以一直持续，直到耗尽了所有外在的可能性，或者其他地区由于不愿意仅仅被当作便利的附属物而进行了反抗。

但一旦一个区域向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开放了自己的边界，这个区域内的价值关系就会逐渐反映“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24]。价值的革命同样完全可以是从外部强加的。整个区域在竞争中的地位之所以有可能受到侵蚀，是因为别的区域经历了对自己的生产用具、社会关系、分配安排等等进行内在的结构转换所造成的不安和悲剧。这个区域不仅远远不能通过创造外部的关系来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或许还会被迫由于外部的压力而面临更为残酷的价值丧失。区域之间的竞争成了当今的风尚。各个基于领土的联盟的相对实力也成了一项重要的因素。

问题的混乱程度现在变得非同一般了。相互区分的“内在转化”与“外在转化”变得难以分离了。区域的“边界”很容易被资本和劳动的迁移所渗透，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本地的联盟在某些问题上是靠不住的——这一点恶名昭著；运行在诸多级别上的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又会为协调给出不同的可能性。在一个地点出现的过度积累问题有可能通过另一个地点的进一步发展或价值丧失来缓解，而缓解的程度取决于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交错。

但是结局是：一些区域兴旺了，另一些区域则衰落了。然而，这未必是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预兆。不同区域的资本积累的节奏也许只是得到了松散的协调，因为协调立足于各种形式

的资本和劳动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往往相互冲突的机动性。[①] 由此，积累周期中的回升和下滑的时机有可能随着区域的不同而不同，而这会造成有趣的相互作用。先前几个版本的危机理论所预设的积累过程的统一性被打碎了，变成了不同的、区域性的节奏；它们既可以轻易地相互补偿，又可以同样轻易地发展为某种庞大的、全球性的暴跌。存在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全球积累的步伐可以通过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补偿的振荡来维持。发展程度并不平均的地理环境有助于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转变为由迅速的积累和价值丧失所构成的相互补偿的区域格局。

（3）转换危机

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平稳的调换尽管在整体中创造了一种补偿性的振荡模式，却会遇到强大的障碍。边界可能会被关闭，前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抗拒原始积累，革命运动可能会涌现，如此等等。但是障碍也会从资本积累整个自相矛盾的逻辑本身当中产生。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些障碍。

世界越是向地理上的结构转换开放，过度积累的问题就越有可能很容易找到临时的解决办法。与人口的增长一样（见前面第7章），地理扩张也为持续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危机被还原成了微小的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es），只有当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从一个区域调换到另一个区域时才会发生；危机甚至可以将自身保留下来，仅仅引发区域性的价值

① 见卡尼（Carn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学报》（Journal of the 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的特刊（第10卷第3期，1978）。

丧失（有时可能会十分猛烈）和为了促进空间中的流动而设计的对空间结构（如运输系统）的重大调整。

问题当然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就越倾向于在导致地理惯性的力量面前屈服。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描述过的那个矛盾的一个版本，这个矛盾就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资本流通越来越被监禁在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当中——打造这些设施是为了支持某些种类的生产、某些种类的劳动过程、分配安排、消费模式等等。固定资本的数量的增加和生产中周转时间的延长制约了不受抑制的机动性。简言之，正如生产力的增长将过去的投资这个沉重的负担强加给资本，从而阻碍了未来的资本积累的活力一样，它也恰好以同样的方式在地理上迅速的结构转换面前充当了一道障碍。为了在一个区域内保护并提升已经投入的资本的价值，领土性的联盟就出现了；它们往往变得越来越强大，根基也更深了。

所有这些力量以联动的方式加强了地理惯性的趋势，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发生迅速的结构转换。更糟糕的是，惯性的力量在价值丧失的压力面前也许会加强而非放松它们的掌握，从而使问题恶化——本地的联盟也许会采取行动来保障已经赢得的特权，维持已经做出的投资，使本地的
429 妥协保持完好，并在空间竞争的寒风中通过对进出口的控制、外汇控制和移民法来保护自己。新的空间格局无法建立，因为区域性的价值丧失没有办法走完自己的进程。可见，资本主义不平均的地理发展采取了一种与区域内的或全球级别的持续的资本积累都完全不一致的形式。

地理惯性的力量越是具有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就越是深重，转换危机也必须更加残酷，以便恢复被扰乱的均
654 衡。本地的联盟必定会遭到戏剧性的重组（最恐怖的例子是法

西斯主义的兴起），技术搭配必定会遭到突然的改变（从而引起旧工厂惨重的价值丧失），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必定会得到完全的重建（这往往会给国家开支带来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空间经济也必定会得到彻底的转化。个别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为价值丧失付出了实质性的代价。资本主义则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中收获了残酷的成果。

然而，尽管这些转换危机有可能十分残酷，但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在全球级别上彻底的结构转换仍然带来了恢复均衡的前景，因为它重组了各个区域性的部分。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被限制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的全球结构当中。

（4）建立新的安排来协调空间整合与不平均的地理发展

并非一切形式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空间扩张都能减轻过度积累的问题。实际上，空间格局既有可能助长问题，也有可能解决问题。这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了对空间格局和资本流动加以塑造的协调机制上面。例如，我们在第 12 章证明了货币、商品、生产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取决于固定的、不动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创造。如何能改变后者，以便顺应运动中的资本扩大的体量？

我们在第 8 章看到，新的运输系统和通信系统可以用过度积累的资本来建造，尽管代价是过去体现在商品中的资本会以某种方式丧失价值。新的投资很可能不会丧失价值，除非期望中的扩张在预期的空间格局中未能变成现实，或者更多的竞争性投资过于迅速地累积在了对方头上。运输系统和通信系统转化的步伐被这些因素限制了。它们扩张的速度未必足以顺应不断把大量商品向新的区域加速迁移的需要。对空间本身的克服需要固定的空间结构，而这些结构却成了有

待克服的空间壁垒。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另一些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基础设施的安排：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些安排倾向于展现出一种以各种各样杂乱的重合和不连续为特征的层叠的等级结构，却又可以将劳动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本地的和特殊的方面同全球的和普遍的方面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些安排的许多表面上的杂乱反映了一个事实：它们处于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例如，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体量有了戏剧性的增加，而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们在这个等级制中创造了全新的层面（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机构），各个层面之间也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跨国公司也要以类似的方式摸索新的组织形式，以便应付不断变化的形势。政治体系和行政体系同样一直处在适应的压力之下。

然而，这些等级结构不能即刻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首先，每组制度既是按照运营它们的人的特殊利益来调整的，又是随着外部的压力来调整的。跨国公司会采取行动来保卫自己获得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机会；它们会试图遍布在空间中，并排除竞争；它们还对垄断非常感兴趣，对协调特殊的要求与全球性的要求也非常感兴趣。它们一旦有资格管理稀缺性，也许就会仅仅按照自己的利益——对这种利益的界定是很狭隘的——来组织国际贸易，以至组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的整个模式。它们很可能会用自己的权力来从别人那里偷窃、强占和骗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对于银行家（不论处于等级制中的哪个层面）、政治家、行政人员等等同样可以成立。这类强占会扰乱协调，或许还会使人们有必要在这个等级制中不断创造新的层面，以便规训其他层面。

就算这个等级体系中的管理者并没有向纯粹的唯利是图

屈服，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往往足以影响地理扩张的步伐和方向。这对于庞大的企业和主要的金融机构尤其可以成立，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它在名义上有权力按照处于统治地位的领土性联盟的利益来控制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国家（或别的单位）之间的竞争或等级制的各个层面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不平均发展的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讲，这些等级结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跨国公司的演化依赖于新的国际货币协议和国家干预的新形式。这些整合意味着在决定由谁来履行哪种协调职能时，相关的权力斗争是地方性的。这些权力斗争在开战时也往往完全不顾资本主义的总体需要。

但即使没有这些滥用，固定性与机动性的根本张力——它从一开始就孕育了等级安排——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无休止的和不连贯的活力面前，起协调作用的安排所具有的稳定性终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属性。两者之间的张力必定会在某个时刻断裂。

在这样的时刻，协调机制就会出现危机。必须对层叠的等级结构进行重组、合理化和改革。必须形成新的货币体系、新的政治结构、新的组织资本的形式。分娩的阵痛往往十分难熬。但只有按照这种方式，已经变得挥霍而臃肿的制度安排与资本积累的根本要求之间才有可能产生较为紧密的关系。倘若改革的结果是好的，至少看起来就有协调的可能性，即通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来吸收过度积累的可能性。倘若改革失败了，由此导致的不平均发展就会加深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全球危机会随之发生。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关系——包括起协调作用的等级安排——进行彻底的结构转换。

6. 向全球危机发展

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和扩张决不可能纠正资本主义所承受的内在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的问题无法在一瞬间通过某种“空间修复”的魔术来解决。不过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更加全面的危机是从本地的、特殊的事件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产生出来的。在具体的、个别的劳动过程和市场交换的基础上，这些事件进一步发展成了抽象劳动质量的全球危机：危机以价值的形式出现。周转时间所受到的时间约束和空间约束确保了诸多区域差异会随之产生。因此，危机是通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来造就的，这种发展则是通过等级制的组织形式来协调的。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价值丧失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总是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被感受到的，而且会发展出特有的区域格局、部门格局和组织格局。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可以在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调换（这两种调换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调换到对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彻底的重新建设当中，所以上述影响可以扩散开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尽管转换危机不太具有创伤性，但是全球危机是通过它们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

可见，全球危机是由于“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2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
432 第120页）而形成的。为了更加具体地探讨这种结合的过程，我们要采用一些实在是极度简化的假定。让我们假定全球被划分为“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区域性的经济体。各个区域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联系起来的，而这些流动处在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安排的庇护下——这些安排对于这些流动的结果是中立的。资本积累的节奏会随着区域的变化而变化。然
658 而，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倾向普遍存在于一切区域。因此，

每个区域都被迫要周期性地试图使自己与外部的关系发生某种转化，以便减轻自身内部的价值丧失危机所带来的不安。

马克思完全认识到了这些情境的存在。例如他提到，英国人在过度积累的状况下“为了开辟市场，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资本贷到国外去”；资本必须“飞速”生产，冲破空间壁垒，由此“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26]（《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22页；《大纲》，第416页）。危机是在这些机制中消散，还是从中发展起来？这成了有待解决的问题。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当一个区域的资本家要在另一个区域处理自己过度积累的资本时，可用的手段有很多。我们将依次讨论每种可能性。

（1）外部市场和消费不足

如果在英国过度积累的资本被作为支付手段借给阿根廷，让后者将英国生产的过多的商品全部买下来，那么这给过度积累带来的缓解至多只是昙花一现，在总体上避免价值丧失的希望也是可以忽略的。若要奉行这样一种战略，就要假定资本主义的危机可以完全归结为消费不足——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明显地表现为有效需求的缺乏。马克思不仅坚决地拒斥了这个论点的原始版本，而且同样坚决地拒斥了上述区域间版本（interregional version）。他提出，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外是在由信用助长的上行阶段中，过度积累的影响在空间中扩大了，而且显现为区域间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差额日益增长的缺口。当信用体系回过头来倒塌在自己的货币基础上面时——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是必然的——事件的顺序就会被区域间的这些差额所改写。他以如下方式描述了一种典型的顺序：

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使英国的支付差额……得到结清……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

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27]

于是，价值丧失的代价会回过头来被强加到的区域头上：

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是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清偿大量债权。[28]（《资本论》第3卷，第491—492、517页）

令人丧气的是，这个顺序听上去很熟悉。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空间修复”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前途的。可是显而易见，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场所，因而就连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可能性，让无可避免的危机至少可以得到延缓。例如，倘若阿根廷有大量黄金储备，英国却没有，那么后一个国家生产的过多的商品

就可以用金币来支付。平衡可以通过金币在区域之间的转移来保持。这可以抑制危机的形成过程。但它在长期无非只有一个结果：即祈求黄金的生产者成为资本流通整个过程宏大的稳定器（见前面第 93—96 页）。

当资本主义变得高度依赖于同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贸易时，还会出现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可能性。马克思承认，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29]（《资本论》第 2 卷，第 110 页）。由此带来的缓解程度取决于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它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来把自己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能力。但要抑制危机的形成，这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30]（《资本论》第 3 卷，第 257 页）。倘若没有卷入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做到了，也有一些相关的矛盾会使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变成权宜之计。“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向你销售一些它的产品，那是不行的。”因此，“英国工业界越是依靠印度市场，他们就越是感到在他们摧毁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31]（《论殖民主义》，与恩格斯合著，第 52 页）。问题不再是通过贸易来寻找外在的解脱了，而是要在新的区域以新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来打造新的生产体系。我们现在要直接讨论这种前景。

434

（2）为生产而输出资本

作为购买手段（而非支付手段）借给外国的剩余资本可以促使新的生产力在别的区域形成。这类对外的举动与过度积累的总过程之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它符合马克思的一个

论点，即实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生产的扩大来解决。但它随后不过是把“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两难转移到了别的区域，同时又加重了本国的过度积累。马克思认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32]（《资本论》第3卷，第256页）由此，平均利润率就会提高（《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436—437页），利润在长期下降的倾向也会加快（《资本论》第3卷，第237页）。如果国外的生产的扩大降低了不变资本的要素和工资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那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资本的价值构成暂时降低了，剥削率则提高了。于是，更多的资本被生产出来了。

这意味着若要缓解国内的过度积累，就必须把剩余的货币资本（或与它等价的商品）送到国外，以便在新的区域以不断加速的方式来创造新鲜的生产力。进一步讲，生产力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来使用，否则资本就无法得到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社会关系——雇佣劳动——必须就位，而且必须能够与生产力并行扩大。因此，生产力的地理扩张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我们再次得出了一个命题（见前面第163页）：在劳动大军迅速增加的条件下——要么通过原始积累，要么通过自然增长——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不太剧烈的。我们很快就会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一点的后果。

输出生产力意味着要整个地输出一揽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中包括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似乎是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问题的唯一办法。它孕育了诸多区域性的影响——这取决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在每个区域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

由于机器制成品所带来的竞争（在廉价的运输成本的辅

助下），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和产业形式遭到了毁灭；这“迫使”一些国家“变成”了原材料的供给者。“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33]（《资本论》第1卷，第451页）然而，只要领土分工保持不变，资本流通几乎就肯定会给资本和劳动在领土之间的流动造成越来越深重的转换危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在新的区域内强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转化领土分工。按照马克思的期望，这样一种转化会在印度发生：

> 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它］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34]（《论殖民主义》，与恩格斯合著，第85—87页）

由于印度内部对资本主义渗透的抗拒，再加上英国人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预期的过渡在印度推迟了很久。然而这里的理论观点是：如果这些过渡被无论什么原因阻挡了，本国对进一步过度积累的资本加以处理的能力就同样会在长期受到阻碍。空间修复被否定了，全球危机也无法避免了。因此，资本主义在新的区域内不受约束的增长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是一种绝对的必要性——我们的头脑中立刻会跳出美国和日本。

正是在这些场所，过多的、过度积累的资本才可以最为轻易地得到吸收，并由此创造进一步的市场机遇和进一步的赢利性的投资机会。但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类两难。新区域中的新生产力会给基于本国的产业带来竞争的威胁。进一步讲，资本倾向于在新的区域过度积累，因而这个区域被迫要为自己寻求空间修复，借此避免内在的价值丧失。

价值丧失是最后的结果，不论是哪种价值丧失。本国要面临“第 22 条军规”（catch-22）[35]。资本输出在新的区域导致了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发展，却通过国际竞争给国内带来了价值丧失。国外不受约束的发展限制了国际竞争，却堵住了进一步输出资本的机会，从而引发了由内部产生的价值丧失。于
436 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在“门户开放”（open door）、自由贸易与在封闭的帝国内部自给自足这些政策之间犹豫不决——这是不足为奇的。①

不过，在这些约束下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可选项。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36]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新世界”的“物质条件”[37]也不能在一天之内创造出来。资本主义的强化和扩散是一种长期持续的革命性转化，需要连续数代才能完成。这种过程是通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来进展的，而本地的、区域性的和转换危机都是其中的常客；全球危机的推进——人们一开始经验到的全球危机通常是越来越剧烈的转换危机——则依赖于耗尽进一步按照资本主义的思路来进行革命性转化的可能性。这不依赖于新的生产力在地球表面的四处传播，而是依赖于新鲜的劳动力的供给。我们现在要转向这种前景。

① 加德纳（Gardner）（1964）关于美国的“新政”外交的研究非常好地把握了这种冲突的本质。

（3）无产阶级和原始积累的壮大

国际分工、技术和组织以及生产力的分配会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动；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资本积累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这里隐含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等人的分歧：它的核心要点不是说殖民不能给资本主义的矛盾带来暂时的缓解，而是说若要做到这一点，殖民就必须与原始积累相伴随。《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现在具有了以成倍的力量击中要害的意义。资本积累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而这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原始积累。

但是原始积累会以许多面貌出现。货币形式的渗透和商业的渗透“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38]（《资本论》第3卷，第331—332页；《大纲》，第224—225页）。但是由此导致的劳动过程的形式和社会生产关系是高度多样的，这要视初始条件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原始积累给出的“经典”叙述并不适合在别的地方重现，除非我们能遇到大致平行的条件。马克思本人也认识到了一些可能的变种。资本家可以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来运营种植园式的殖民地；它们虽然要为世界市场提供产品，在形式上也整合到了资本主义当中，却没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 无论这些国家从它们的奴隶的剩余劳动中榨取的简单形式即子棉或谷物形式的剩余产品量有多大，它们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简单的、没有等级差别的劳动，因为对外贸易使它们能够把这种简单的产品变成任何形式的使用价值。[39]（《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02—303页；第3册，第243页）

437

传统的、基于农民的社会中的剥削方式也可以转变为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领域，实际上却并不从属于资本。与国家权力向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直接转变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关的整个辩论——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场辩论——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就连马克思所说的“本来意义的殖民地”——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也免不了在原始积累的总体框架中表现出一些细致微妙的差别。马克思说：“这里”

从事农耕的大量殖民者，虽然也从宗主国带来或多或少的资本，但并不是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这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自己从事劳动的农民，他们主要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活……他们是，并且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依然是那些多少已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的农场主的竞争者。[40]（《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02—203页）

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41]（《资本论》第1卷，第765页）

劳动者过了许多代才最终得到了“自由”，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中间步骤，社会生产关系也可以采取许多中间形式。每种形式都会至少以剩余产品的形式来向资本支付自己应付的额度。但随着资本主义的革命力

量逐渐增强，这些中间形式就让位于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了。新一轮的原始积累会攻击并侵蚀在前几轮中建立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过程所经历的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铭刻在人类的编年史上的[42]。暴力的、间歇性的游击斗争——它们是在极其不同的领地上、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下开展的——会周期性地爆发，并变成相互对立的经济体系的代表之间的重大对抗。这正是新世界的社会地理和人文地理——这种创造是与其中设立的新的物质条件相匹配的。

但随着资本主义耗尽了用前资本主义的和中间的社会形态作为代价来进行原始积累的可能性，它就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劳动力的新鲜来源。到头来它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它必须吞食它自己。一些资本家尽管在名义上仍然可以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却逐渐在形式上屈从于别的资本家——主要是通过信用体系，但也可以通过被较大的公司束缚的分包生产模式，或者通过对垄断货源的依赖。另一些资本家由于竞争的加剧和破产而被迫直接加入了无产阶级，有时是以兼职的方式，有时是以全职的方式。资产阶级当中的另一些阶层同样失去了自己曾经的独立性，变成了单纯的雇佣劳动者，尽管是在一种具有精细分层的等级体系中。

马克思当然完全明白资本家很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但他的注意力主要局限于价值丧失的一些阶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以已经存在的资本家为代价的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论》第 1 卷，第 626 页）。危机在不断的深化和拓展中进入了全球性的格局，把资本主义吞食自身的倾向转化成了多种多样的相互确保毁灭[43]，后者会周期性地作为价值丧失的终极形式被释放出来。

（4）价值丧失的输出

谁会在残酷的价值丧失时期承担价值丧失的重负？区域间的争斗一般会退化为与此相关的斗争。失业的输出、通货膨胀的输出、闲置的生产能力的输出成了这场比赛的赌注。贸易战、倾销、利率战、对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的限制、移民政策、殖民主义的征服、对附属经济体的压制和统治、在经济帝国中对分工的强行重组，最后是通过战争来给敌国的资本造成物理上的毁灭和强行的价值丧失——这是一些现成的方法。每种方法都要求凶狠地操纵经济权力、金融权力或国家权力某个方面。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涌现到了前沿；它觉得只要某个无所不能的权力可以统治世界，就可以借此纠正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疾病不可能被如此轻易地抑制。可是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而言，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退化也起到了它的作用，条件是足够多的资本必须在这种过程中被毁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世界有许多职能，可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产生；但它们经常会为资本和劳动的价值丧失提供极为方便的掩护。我们很快就会回到问题的这个方面，因为我认为它是无比严重的威胁，不仅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存活（但这无关痛痒），而且威胁到了人类的存活。

7. 帝国主义

439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一种帝国主义理论。他大概会在打算讨论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几本书中面对这个主题[《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112—113页]。由于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只能推测他会如何把帝国主义的主题——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是有目共睹的——与资本积累的理论整合起来。

自马克思以来，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研究虽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很难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框架中为各自的发现找到根据。于是，它们无法构造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只能给出一大堆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①] 当它们终于直接植根于马克思的思想时，它们又倾向于仅仅诉诸某个方面——对国外市场的追求、剩余资本的输出、原始积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或诸如此类的方面——而不是诉诸整个理论。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则宣称要超出马克思，纠正他的疏漏和所谓的错误。许多这样的文献既是有力的，又是令人信服的。它们在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以人类进步的名义所实行的劫掠面前构成了令人动容的见证。它们也把握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是多样的，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是同等多样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旗帜下被打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压迫性的统一体。

在这些文献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形象把剥削与“空间修复”的主题戏剧性地统一起来了。中心剥削外围，都市剥削偏远地区，第一世界压制并冷酷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是从外部强加的，如此等等。阶级斗争被分解成了外围的社会形态与压迫的中心来源之间的斗争。乡村针对城市进行抗争，外围针对中心进行抗争，第三世界针对第一世界进行抗争。这种空间形象极为有力，因而甚至轻松地流回到了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结构所做的解释当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区域性的不发达状况被看作一种连贯的剥削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的都市剥削了这些区域，而这种都市本身也要维持作为“内在的新殖

① 见巴勒特－布朗（Barratt-Brown）（1974）、肯普（Kemp）（1967）和阿明（Amin）（1980）所做的综述。

民地”的贫民区。《资本论》的语言似乎被一种同样扣人心弦的形象——一个地方的人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所取代了。

这里的挑战是对有时仿佛是相互对抗的思路加以重建，并把它们整合到单一的理论参照系当中。就现状而言，它们的联系要么是通过情绪、通过诉诸剥削的事实来建立的，要么被投射到了一些尽可能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帝国主义被抽象地视为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之间的暴力对抗；这些层面随后在特殊的格局中、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逐渐一层一层地“接合”（articulated）起来，而这种接合取决于所发动的斗争的结果。第三条思路是卢森堡和列宁所共有的：资本主义倾向于系统性地面临一些内在矛盾，而帝国主义被看作这些矛盾的外在表达，它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具有统治地位，而且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庇护下出现的。这类作者直接求助于“空间修复”的观念，却将马克思对这个话题的忽视仅仅解释成了一个历史问题——历史使大师过时了。这些思路都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帝国主义在马克思本人的时代活得很好，在他的通俗作品中也经常得到评论（见他与恩格斯合著的《论殖民主义》[44]）；关于生产方式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观点在《大纲》中就创立起来了，尽管只是以初步的方式。可见，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仍然有待延伸，以便包含许多人提出的不同理论——他们都试图通过帝国主义来陈述剥削的历史经验。我无法在这里以完全充分的方式应对这个挑战。但我对资本主义空间动态的叙述——正如最后这几章所呈现的那样——如果再有几分微妙的不同，可能就有助于在积累理论中为许多可以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东西界定一种物质基础。

我在最后两章试图着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空间格局的生产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必然是一种活跃的、建构性的环节。正

如协作方法的改进、机器体系更加广泛的使用等因素一样，空间格局的形态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手段对于理解这些动态也十分重要。所有这些特征都必须被吸纳到一种关于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宽广概念当中。由于积累是以这个概念为枢纽来运转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以它为中心并从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这种自相矛盾的活力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表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①

我们已经看到，空间格局的生产和转化要借助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机动性（包括资本在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中的运动）。存在于这些机动性的必然统一当中的互补和对抗为生产、交换和消费产生出了一种不平均的、不稳定的、充满张力的地理景观。积聚的力量与分散的力量相抗衡，从而产生了中心与外围，而惯性的力量可以将中心与外围变成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相对永久的特征。分工采取了领土的形式，受空间约束的资本流通也采取了为区域所限制的格局。由此提供的物质基础使得阶级联盟和派系联盟可以捍卫并强化在一个区域内运动的价值。只要阶级斗争可以在一个区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片妥协的地带，有组织的劳工就有可能集结起来支持这样的联盟，以便保护已经赢得的职位和特权。因此，资本流通的区域化是与阶级冲突和派系冲突的区域化相伴随的，而且被后者加强了。

价值规律倾向于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在越来越大的区域

① 关于危机的作品——比如赖特（1978）和谢赫（1978）的综述所提到的作品——往往完全忽视了地理的维度，或者将它当作一种附属物；关于帝国主义的作品在思考危机如何在不平均的发展这个框架中形成并扩大时则往往有一种怪异的天真。虽然曼德尔（Mandèl）（1975）的《晚期资本主义》[45]和阿明（Amin）（1974）的《世界规模的积累》[46]远远不够完善，但它们的优点是把地理的方面大致保持在了视野内。

差异中包含了自身的否定。于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和不平等交换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区域内的极度积聚可以变成统治他人、剥削他人的基础。在价值丧失的威胁面前，每个区域性的联盟都企图用他人作为手段来减轻自己内部的问题。与价值丧失相关的斗争转向了区域性的斗争。但是区域差异由此就变得不稳定了。进一步讲，资本和劳动力五花八门的机动性还倾向于损害在它们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区域结构本身。国际竞争和使利润率平均化的冲动（尤其是使货币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成了击沉区域性联盟的礁石。减少周转时间的努力使相对距离具有了新的秩序，又使区域的边界成了无稽之谈——这些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很容易渗透的（即使有海关和移民局官员的巡逻）。当价值丧失即将来临时，资本和劳动力的个别要素既可以轻易地逃往最安全的避风港，也可以同样轻易地留在原地进行战斗，以便把代价输出到别的区域。

结果是一团乱麻：趋于同质性的和趋于区域差异的各种运动是混乱无序的。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别是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无法扼制这种无序。这些组织尽管完全缺乏直接的、创造性的影响，但在它们的高层一般积聚了巨大的、压迫性的权力——包括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用来直接提高剥削率（主要是通过运用国家机器的压迫性机关），或者用来在派系之间或区域之间对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任何派系或区域倘若想要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强加到另一个派系或区域头上，就要控制国家内部的战略中心、国际货币体系、金融资本的机构等等，因而相关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帝国主义当然不只涉及这些。不过，许多可以被当成帝国

主义的东西都立足于一种现实，即一个区域的民族在某个有优势的、统治性的、压迫性的权力的庇护下剥削另一个区域的民族。我们现在证明了这样一种现实恰好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当中。因此，传统的偏见、区域的和民族的争斗之所以能得到延续和重建，是由于它们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这个不断演化的框架中有一种物质基础。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联盟在区域内的形成、为了控制具有等级秩序的机构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周期性的暴力对抗。然而，认为这些现象在资本流通中有一种“物质基础”并不是要宣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也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即使它们有时可以在同质性与区域差异之间、在地理上的积聚与分散之间达到某种大致的均衡——为未来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我们不难找出一个核心矛盾。我们所描述的过程让剩余价值在地理上的生产得以背离它在地理上的分配，正如生产与社会中的分配同样是相互分离的一样。由于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与分配的脱节是击沉持续资本流通的礁石之一，所以我们有把握总结说，我们在这里描述的过程拓展并深化了危机的形成所需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结论。简言之，可以在长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加以抑制的“空间修复”并不存在。

8.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作为价值丧失最终形式的世界大战

在20世纪，世界已经两度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而坠入世界大战。在一代人的空间中，世界两度经历了资本通过物理上的毁灭而遭受的惨重的价值丧失和把劳动力作为炮灰来进行的终极消耗。阶级战争所造成的恶果当然也是死亡和

伤残，主要的起因是资本在工作地点对劳动施加的日常暴力，以及原始积累的暴力（包括以资本主义“自由”的名义对其他社会形态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重大损失是由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所引起的。如何能从一种诉诸阶级关系的理论出发——在它看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对于解释历史是根本性的——来解释这一点？

这当然是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中全力研究的问题。但正如我们在第 10 章看到的那样，他的论述受困于模棱两可。金融资本是一国的还是国际的？进而，国家权力对军
443 事和政治的运用同资本主义一种无可置疑的趋势——创造跨国的形式并打造全球性的空间整合——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垄断和金融资本极为强大，而且无论如何都倾向于同谋，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不用相互毁灭的方式来抑制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而，是什么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成了一种必要？

“第三块”危机理论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提出的解释是：这些战争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是建构性的环节，而不是反常的、偶然的现象或单纯的过度贪婪的产物。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当一个区域内运作的“内在的辩证法”驱使它为自己的问题寻找外在的解决办法时，它就必须找出新的市场、新的输出资本的机会、廉价的原材料、成本低廉的劳动力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倘若不只想要成为暂时的权宜之计的话，就要对未来的劳动提出要求，或者直接要求无产阶级的扩大。这种扩大可以通过人口的增长、对后备军的潜在部门的发动或原始积累来完成。

 资本主义对新鲜的劳动供给的渴求是永不满足的；这可以

解释它为什么会猛烈地追求原始积累，即毁灭、转化并吸收它在无论什么地方找到的前资本主义的民众。倘若劳动的剩余是唾手可得的，而且资本家并没有由于竞争而使自己的命运植根于一种错误的、无法吸收这种劳动的技术搭配，那么危机一般就只具有短暂的期限，只会稍微晃动一下持续全球积累的总体轨迹，而且通常会在一种不断演化的结构中——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中——表现为温和的转换危机。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准伙食。一旦资本家既面临劳动供给的短缺，又一如既往地受到竞争的催促，就会通过技术创新来引发失业，从而扰乱生产与实现之间、生产力同与之伴随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均衡——这时，真正的麻烦就开始了。因此，倘若原始积累的前沿关闭了——原因要么是可能性被完全耗尽了，要么是前资本主义的民众加强了抵抗，要么是某个统治权力建立了垄断——那就会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在资本主义走入20世纪时，人们逐渐越来越强地感受到了这场巨变。这场巨变在资本主义陷入更加深重的全球危机的泥潭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无可抗拒地导致了多种由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而一同发生的原始积累和价值丧失——就此而言，这场巨变远远超过了垄断形式或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些机制一如既往地具有错综复杂的细节，在实际的历史局势中也是高度混乱的，因为相互冲突的力量形成了数不清的纵横交错。但我们可以构造一条简单的论述思路来阐明一些重要的观点。任何区域性的联盟倘若要延续资本积累的过程，就必须维护自己获得劳动储备和“自然力”（比如关键的矿产资源）的机会——否则这些自然力是能够被垄断的。只要这两种储备在本地的大多数资本所流通的区域中存在，就不会出现多少问题。一旦内部的前沿关闭了，资本就必须指望别的地

方，或者面临价值丧失的风险。区域性联盟感受到了两种资本之间的紧张：其一是内嵌于地点的资本，其二是为了在别的地方创造新的、永久的积累中心而迁移的资本。人们逐渐感受到了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资本为了有机会获得劳动储备和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主题迎头撞上了自给自足的欲望，即在内在矛盾和外在压力面前以自给自足为手段来维护某个特殊区域的地位——这里指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处于主导地位的那种自给自足，当时的英国封闭了英联邦的贸易，日本扩张到了中国东北和亚洲大陆，德国扩张到了东欧，意大利则扩张到了非洲，由此使不同的区域相互对立，各自追求自己的“空间修复”。只有美国发现，奉行一种以国际主义和多边贸易为基础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合适的。战争最终打响了，为的是制约自给自足，并使整个世界向地理扩张的可能性和无限的不平均发展的可能性开放。这种解决方案树立在价值丧失和毁灭之上——虽然资本主义的残暴历史向来记载了多次价值丧失和毁灭的发作，但这一次是最为残酷的几次之一——而这对它很有利：1945年之后，它就在美国的霸权之下得到了一心一意的推行。带来重大好处的不仅是资本的巨大毁灭，而且是这种毁灭的不平均的地理分配。从大萧条的恐怖中拯救世界的不是某种光荣的“新政”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世界上的各国财政部施加的魔术，而是全球战争的毁灭和死亡。

表面上，战后世界的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仿佛是非常不同的。（一切形式的）资本在全球迁移的自由让资本家得以在不平均的地理毁灭这个框架中有机会通过地理扩张来获得即时的“空间修复”。资本在这个基础上的迅速积累导致了独立的、区域性的积累中心的创造，在一些情况下还导致了它们的再创

造——这些中心包括德国、日本、巴西、墨西哥、东南亚等等。区域性的联盟又一次建立起来了，而且为了不断萎缩的获利机会而相互竞争。自给自足的威胁再次浮现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出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但是发动这次战争所用的武器具有巨大的、疯狂的毁灭力量，而且这次战争所导向的原始积累会用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代价。

自卢森堡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被一种观点所吸引：若要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军事开支是一种方便的手段。军事硬件可以在一瞬间被淘汰掉，国际上的张力也很容易受到操纵，变成一种关于增加国防开支的政治要求——这些都为上述观点增添了光泽。人们有时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国防预算来保持稳定的，尽管这类做法从社会中剥夺了更有人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计划。不幸的是，这条思路是在消费不足主义的模具中铸造的。我之所以说它“不幸”，与其说是因为这种解释是错的，不如说是因为本书的理论关于军事开支所提出的解释还要险恶得多、恐怖得多：资本主义不仅必须用资本和劳动的剩余来购买武器，支付武器的价格，而且必须把它们投入使用。为了使价值丧失达到如今所需要的水平，资本主义只有这一种可以支配的手段。这个观点就其后果而言是令人恐惧的。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可以让我们宣布：资本主义离去的时刻到了，资本主义让位给某种更加理智的生产方式的时刻到了？

译注

1.《全集》第45卷，2003版，第528页。

2.《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74—875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3.《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81页。

4.《全集》第44卷，2001版，第877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5.《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79 页。
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87 页。
7.《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21—822 页。
8.《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74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9.《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46 节。有两个翻译上的问题。1. 关于“内在的辩证法”（inner dialectic），中译本无“内在的”一词，与德文本一致。本书作者引用的 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现有 2008 年版）则有“内在的”一词。2. 关于“生存资料”（Subsistenzmittel/means of subsistence），中译本作“生活资料”，但是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是“Lebensmittel”，这里“生存”（Subsistenz）与“生活”（Leben）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不过，《资本论》的英译本（两种译本都一样）的确把“Lebensmittel”翻译成了“means of subsistence”。参见本书第 49 页（边码）。
10.《法哲学原理》，第 248 节。
11.《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525 页。
12.《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929 页。
1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2 页。
14.《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64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15.《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66 页。
1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86 页。
17.《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90 页。
18.《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90 页。
19.“总工厂”（collective workshops）一词见《文集》第 8 卷，2009 版，第 536—537 页。
20.《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311 页。
2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744 页。
22.《全集》第 30 卷，1995 版，第 388 页。译文根据本书的表述做了调整。
23.《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278 页。
24.《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278 页。
25.《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129 页。
26.《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130 页。
27.《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56—557 页。
28.《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585 页。
29.《全集》第 45 卷，2003 版，第 127 页。
30.《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86 页。
31.《全集》第 12 卷，1998 版，第 169 页。
32.《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85 页。
33.《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519—520 页。
34.《全集》第 12 卷，1998 版，第 249—251 页。
35. 源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61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基地的一个医院为背景。空军上尉约翰·尤赛林（John Yossarian）对战争和军队腐败的官僚体制感到幻灭，试图通过装疯扮癫以停止执行轰炸任务。根据第 22 条军规的规定，疯癫之后可以停飞，但需要申请。

然而如果个人感到有危险而提出停飞，即说明申请人神志正常，因此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尤赛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停飞的目的，最后只能开小差逃往中立国瑞典。该词现用来比喻无法逃脱的两难境地。（摘自《牛津英汉汉英词典》，2013 版）

36.《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686 页。

37.《全集》第 12 卷，1998 版，第 251 页。

38.《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370 页。

39.《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1974 版，第 266 页。

40.《全集》第 34 卷，2008 版，第 335 页。

4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76—877 页。

42.《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822 页。

43. “相互确保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是核武器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威吓性的军事战略。

44. 大致相当于《全集》第 12 卷，1998 版。

45. 中译本见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版。

46. 中译本见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版。

后　记

446 这种类型的著作不容许得出结论。至少按照我的理解，辩证的思考方式杜绝了在任何特殊的地方把论述封闭起来。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耐人寻味的格局——我在“导言”中做了评论——会迫使论述向上、向外行进到各式各样的新的领地。一旦开辟了有待回答的新问题、有待采取的新的研究路线，就会同时激起对基本概念的重新评价——比如对价值的重新评价——和对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工具的不断重铸。在仔细地研究马克思时，我们可以获得的最不寻常的见解或许正是思想错综复杂的流变性、新开端的不断创造——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如此。很奇怪的是，资产阶级哲学家经常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描述为一个封闭的体系，无法经过验证程序的核实，而他们必须依赖验证程序才能寻求将他们自己的假说最终变成普遍的、不可挑战的真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奇怪：他们抱有深沉的承诺，其中的热情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们把这些承诺转变

成了教条主义的空论，从而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思考方式一样封闭了新的开端，尽管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彻底否定了这种封闭。

真正说来，每个终点都应该仅仅被看作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只是凡人，很难接受这个真理，更不用说以创造性的方式与它的后果相互斗争、相互嬉戏了。不幸的是，正如马克思本人评论的那样，“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因而确实只有“劳苦”的“攀登”才能通向知识的“光辉的顶点”[1]。然而，尽管科学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并不试图为论述编造一张没有缝隙的罗网。模糊的形式从最初神秘化的阴影中浮现出来，获得了较为坚固的形态，因为它们的各个特征从新的制高点被照亮了，从新的概念所打开的“窗户”中得到了研究。我们逐渐分辨出来的远远不是一组没有形式的关系。但若每个终点都不过是一个起点，之前的篇章所做的努力就应该促使我们考察有待采取的新路线、有待构造的新概念、有待探讨的新关系。这篇后记的目的正是讨论这些问题。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关键的商品——劳动力——本身是在资本家无法直接控制的社会关系中得到生产和再生产的。奇怪的是，马克思并没有较为密切地在所有维度上关注这个具有多重维度的悖论。这个悖论当然不只是简单地探讨不同区域的人口增长的时间节奏与资本积累的空间动态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番探讨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因为长期的积累总是预设了无产阶级的扩大。然而我们决不应该忘记，虽然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劳动者却不是。尽管资本家或许会把他们看作拥有胃的“手”，“就像某种海滩上的低等生物”[2]，正如狄更斯曾经描述的那样，但是劳动者本身是人，拥有各式各样的情感、希望和恐惧，会为了塑造自己的生活——其中至少要包含最低限度的满足——而斗争。不同数量、不同性质的

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条件存在于这种生活的正中心。虽然工人很容易由于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文化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最终没有什么可以颠覆他们对自己的再生产中某些非常基本的过程所实行的控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儿女是由他们再生产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近年来都高度关注这些主题，而研究城市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把城市看作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工人阶级的家庭、共同体、文化、分层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复杂表现如今得到了大量研究。强有力的女性主义批判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见解和贡献。我们无比需要对这些研究加以综合：实际上，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进一步讲，我们在从事这项任务时必须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对分析来说，劳动力在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中的再生产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当不同的维度。它不是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仅仅做了一点补充，而是构成了一个与给《资本论》的理论提供基础的出发点根本不同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商品，而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工人阶级的儿童的出生。随后的过程——社会化和教导，学习和规训——可能会把这个人转化成某个拥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而且愿意把这种能力作为商品来出售的人。这些过程值得我们尽量仔细地加以研究。

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进行的再生产如何能与劳动者实际生活的再生产相互吻合、相互交织？这成了一个问题。这两个维度在它们的对立中把握了五花八门的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性与追求利润的枯燥现实之间的核心张力。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类型的统一，否则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达到哪怕是外表上的社会稳定，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重大脱节肯定必须是

危机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标志是严重的市民纠纷。可是没有哪种过程可以轻易地或直接地统治另一种过程，尽管它们相互之间是彼此依赖的。人们必须找出协调的手段，找出许多相互约束的机制，以便以某种方式使社会在相互分离的各个部分中保持足够的均衡，从而防止任何全面的社会崩溃。这个主题也已经在别的地方得到了探讨，主要的角度是在生活空间中发动的斗争与基于工作的斗争之间的关系——前者涉及住房、卫生、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斗争背后显然有某种统一。双方也都知道这一点。工人知道，在共同体中学会的垄断性技能可能就工资率和工作条件而言具有可观的成效。资本家长久以来就明白，他们若要在生产地点统治工人，就必须在再生产的地点对工人施加重大的影响。但这些联系十分疏远，起反作用的影响也具有复杂得不同寻常的运作方式。价值丧失的危机——资本和劳动会一起受到打击——必定会在工作地点和共同体中发出回响，从而有可能恰好在根基上震动市民社会。

为了履行协调和相互约束的职能，首要的可能渠道是通过现代国家五花八门的制度。我在眼前这部著作中之所以没有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若要完整地处理这个有争议的主题，就应当等到仔细地分析了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之后。不过，之前的篇章也没有完全忽视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它是无所不在的：它既为契约和司法个体的自由提供了保证，又是一种压迫性的权力，打造并维持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国家要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制定一条底线，也要调节就业的状况。它可以为资本集中提供方便，但在寻找集中与分散的平衡时——以便维护资本价值构成的稳定——它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会从事一些商品的生产（主要是在建成环境中），因为个别资本家不能够

或不愿意提供这些商品，不论它们作为进一步积累的条件可能有多么紧要。它会用计划的权力来直接塑造资本主义的空间经济，从而甚至可以调节地理上的积聚与分散之间随处可见的张力。通过中央银行的支撑，它在一定品质的货币的供给中扮演了霸权的角色。对国家的财政职能和货币职能所做的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管辖的领土上对积累的时间动态和空间动态加以干预的可能性具有宽广的余地。由此，国家体系成了一组具有等级秩序的组织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些组织会把个别劳
449 动与作为抽象劳动来表达的总体联系起来。国家既然占据了这样一个战略地位，而且确实被赋予了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些终极武器，就会变成阶级联盟在形成时所围绕的核心制度。于是，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就被迫要为这样一种联盟服务了。分配安排可以得到改变，对占有的投资可以受到控制，虚拟资本可以被创造出来，价值丧失的倾向也可以由此转变为通货膨胀。国家成了一种核心制度，区域之间的冲突借此才发展起来，每个区域联盟也要以此为基础来为自己寻求“空间修复”。

简言之，国家在资本再生产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讲，政府若要在众多矛盾面前通过干预来保持资本积累的稳定，就必须内化这些矛盾——这是成功的代价。它接受了一项可疑的任务：针对价值丧失来推行必要的苦药。但至于它要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做到这一点，它却拥有某种选择权。它可以通过严厉的劳动法、财政约束和货币约束来把代价定位在自己的领土上。或者它可以在世界舞台上通过贸易战争、好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寻求外在的解脱，并最终以诉诸军事力量为后盾。价值丧失的终极形式是军事对抗和全球战争。

 我们在之前的文本中考察了现代国家的所有这些方面。不

过，它们并没有为一种全面的国家理论提供足够的基础。被忽略的要素太多了。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知识的生产和使用——知识既是生产中的一种物质力量，又是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武器——全都必须被整合到论述当中。当我们力图完成这项任务时，两件事情变得明显了。第一，一些制度（比如中央银行）虽然对于资本的再生产是极其根本的，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与另一些制度完全分离的——后者处理的是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第二，某种统一必须在不同的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某种平衡必须被找出来，否则社会作为一个正在运转的整体就无法得到再生产。这提出了权力的配置、合法性、民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庞大的、论战性的文献中直接面对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注意力由此就必须聚集到为了控制国家机器、控制存在于其中的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上面。阶级斗争从生产地点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但是随后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如今逐渐转化成了众多相互冲突的格局。我们已经识别出了这种过程的某些特征：资本和劳动都分割成了不同的派系，有时还会围绕某个区域性的联盟来重新建构它们自身。一旦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生活的其他方面——科学和技术精英的形成、管理职能和官僚主义的发展等等——单纯的、底层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往往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分辨了。就此而言，我认为《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一章对资本主义之下的阶级问题所做的讨论具有象征意义。这一章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它的内容不能太过严肃地看待。它提出，资本主义之下实际存在的阶级格局必须被解释为一系列力量的产物，这些力量既可以支持资本积累，又可以支持劳动者的再生产——劳动者被当成了劳动力商品的承

担者。因此，我们无法对阶级格局做出先天的假定。它们是被主动生产出来的。若要分析资本主义独有的、远远更为复杂的阶级格局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只承认劳动力的购买和出售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经济生活的核心——就只是一个出发点。动荡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中运作——我们在之前的篇章里试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这种动荡——由此创造出来的压力导致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包括基于领土的联盟）的形成。但对阶级的效忠、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决不具有即时的可塑性。由此造成的张力值得我们尽量仔细地加以审视。毕竟，若要恰当地理解阶级斗争，就必须理解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一开始是如何打造、如何保持的。

这样一条思路可能有助于建立一座桥梁，把一种往往显得极其严重的脱节联结起来：一方是关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家，另一方则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实际的历史地理、试图对其中各种高度复杂的内容加以重构的理论家。理论家也许想要用心编织自己的论述，以便“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从而“一步一步地接近”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3]（《资本论》第3卷，第25页）。这样一来，“材料的生命”也许就“在观念上反映出来”了[4]（《资本论》第1卷，第19页）。但是内嵌在这样一种理论重构当中的概念工具绝不是唯心主义的抽象。它是从劳动力、（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价值和作为过程的资本这样的范畴和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实际的历史转化——通过原始积累、货币形式和市场交换的兴起、资本家为了控制生产领域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来锻造的。这些范畴本身诞生于实际的历史经验。

一旦我们运用这些植根于历史的范畴来打造新的解释，理论就开始了。凭借这种手段，我们并不能期望解释所有东西，甚至不能对单个事件获得充分的理解。这些并不是理论应该处理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毋宁说是创造理解的框架、细致的概念工具，以此来掌握在社会转化错综复杂的动态中运作的最有意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解释一些普遍的命题：为什么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空间分工在地理上的重组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具有社会必要性。我们可以理解内嵌在这些过程当中的矛盾，也可以说明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危机倾向的历史地理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可以理解新的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是如何形成的，还可以理解它们如何能表达为领土格局，又如何能退化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理论可以给出的正是这些类型的见解。

但是理论倘若无法说明历史或政治实践，肯定就是多余的。更糟糕的是，错误的理论思考——这绝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特权——有可能造成误导和神秘化。没有哪个理论家可以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在理论的纬线与历史地理的纬线[5]之间，可感知的联系必定会在某个时刻出现。《资本论》第1卷的说服力恰好源自理论思考的概念工具对历史证据的支持和后者对前者的支持。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保持并改进的正是这种统一。

不过，这种统一体内部的区别也有自身的地位，只是需要得到恰当的解释。这种区别可以是创造性张力的所在之处，是构造新的见解和理解时的着力点。倘若以不成熟的方式来坚持理论与历史实践的统一，可能就会导致瘫痪和停滞，有时还会导致完全错误的表述。结果，我们要么费力地把难以驯服的历史地理填进了一种由几个简化的范畴来描述的动态当中，

要么创造了新的、只在特殊的事件中具有历史根据的范畴，因而它们只能把握表面现象，永远无法把握内在的社会意义。

可见，如果接受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区别，甚至追问它的最终极限，就会有一定的好处，原因无非在于它们的不平均发展会在统一体中开启新的视角，尽管这种统一肯定必须在它们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用两条腿跑步要比将两条腿绑在一起、一路跳着走更快。

但是归根到底，重要的还是统一。理论是与历史的和地理的重构协同发展的；它们全都被抛进了政治实践的火焰，形成了一种理智的熔炉，从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策略，借此可以对社会进行理智的重构。这项任务十分紧迫，因为世界受困于各式各样疯狂的危险——包括全面核战争的威胁（这是价值丧失的一种可耻形式）——这种紧迫性肯定不需要证明。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这些界限，就要靠我们找出办法，超越资本本身的界限。

译注

1.《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4 页。
2. 我在狄更斯的多种著作中都没有查到这句话。
3.《全集》第 46 卷，2003 版，第 29—30 页。
4.《全集》第 44 卷，2001 版，第 21—22 页。
5. 这两个“纬线”分别是“weft”和“woof”，它们是同义词。

参考书目

马克思的著作

Capital,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67. 452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0.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0.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 O'Mal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0.

Early Texts (ed. D. McClellan),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72.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6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63.

Grundrisse, Pengui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73.

Notes on Adolph Wagner, in *Value: Studies by Marx* (ed. A. Dragstedt), New Park Publications, London: 1976.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63.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ppendix to *Capital*, vol.1), Pengui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76.

Texts on Method (ed. Terrell Carver), Barnes and Noble, New York and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75.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part 1 and 2, 1969; part 3, 1972.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78.
Wages, Price and Profit,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65.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

Collected Wor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volumes 1—12, 1975—1980.
453
The German Ideolog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0.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2.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52.
On Coloni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2.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55.

恩格斯的著作

Anti-Dühring,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47.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62.
The Housing Ques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2.

其他征引著作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Althusser, L. (1969), *For Marx*,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Althusser, L. and Balibar, E. (1970), *Reading 'Capital'*, London.
Altvater, E. (1973), 'Notes on some problems of state interventionism', *Kapitalistate*, vol. 1, 96—108; vol. 2, 76—83.
Amin, S.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Amin, S.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min, S. (1980), *Class and Nation,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Current Crisis*, New York.
Anderson, P.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Anderson, P. (1980),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Arrighi, G. (1978),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Arthur, C. J. (1976), 'The concept of "abstract labor"',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vol. 5, no. 2.

Avineri, S. (1972),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Aydalot, P. (1976), *Dynamique Spatiale et développement inégal*, Paris.

Ball, M. (1977), 'Differential rent and the role of landed prope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1, 380—403.

Banaji, J. (1976), 'Summary of selected parts of Kautsky's *The Agrarian Ques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1—49.

Baran, P.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Baran, P. and Sweezy, P. (1966),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Barker, C. (1978), 'The state as capita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eries 2, no. 1, 16—42.

Barratt-Brown, M. (1974),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Barrère, C. (1977), *Crise du système de crédit et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Paris.

Bassett, K. and Short, J. (1980),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Structure: Alternative Approaches*, London.

Baumol, W. J. (1974),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what Marx "really" meant (an interpreta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2, 51—62.

Baumol, W. (1976), 'Review of *Introduction au Capital de Karl Marx* by G. Maarek',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82—87.

Becker, J. F. (1977),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Benetti, C. (1976), *Valeur et répartition*, Grenoble.

Benetti, C., Berthomieu, C. and Cartelier, J. (1975), *Economie classique, économie vulgaire*, Grenoble.

Bernal, J. D. (1969 edn.), *Science in History* (4 vols.), Cambridge, Mass.

Berthoud, A. (1974), *Travail productif et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 chez Marx*, Paris.

Blaug, M. (1968), 'Technical change and Marxian economics', in D. Horowitz (ed.),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Blaug, M. (1978 edn.),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London.

Bleaney, M. (1976),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London.

Boccara, P. (1974), *E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sa crise et son issue*, Paris.

Boddy, R. and Crotty, J. (1975), '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7, no. 1, 1—19.

Böhm-Bawerk, E. von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ed. P. Sweezy), New York.

Bouvier, J., Furet, F. and Gillet, M. (1965), *Le Mouvement du profit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Braver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Brighton Labour Process Group (1977), 'The capitalist labour process', *Capital and Class*, vol. 1, 3—26.

Bronfenbrenner, M. (1968), ' "Das Kapital" for the Modern Man', in D. Horowitz (ed.),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Bukharin, N. (1972a),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Bukharin, N. (1972b),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R. Luxemburg and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Burawoy, M. (1978),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labor process: Braverman and beyond',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8, 247—312.

455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Carney, J. G., Hudson, R. and Lewis, J. R. (1979), *Regions in Crisis*, London.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Chandler, A. (1962),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Chandler, A.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Cheape, C. W. (1980), *Moving the Masses*, Cambridge, Mass.

Christaller, W. (1966),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Englewood Cliffs, N. J.

Churchward, L. G. (1959),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Imperi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5, no. 1, 76—83.

Clarke, S. (1980), 'The value of value', *Capitaland Class*, vol. 10, 1—17.

Cogoy, M. (1973),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theory of accumulation: a reply to Paul Sweezy',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Bulletin*, vol. 2, no. 7.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 -a Defense*, Princeton, New Jersey.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1976),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 (CSE Pamphlet no. 2) .

Coutière, A. (1976), *Le Système Monétaire Français*, Paris.

Crouzet, F. (1972),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utler, A., Hindess, B., Hirst, P. and Hussain, A. (1978),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2 vols.), London.

Davis, H. (1978),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de Brunhoff, S. (1971), *L'Offre de monnaie*, Paris.

de Brunhoff, S. (1976), *Marx on Money*, New York.

692 de Brunhoff, S. (1978), *The State, Capital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de Brunhoff, S. (1979), *Les rapports d'argent*, Grenoble.

de Gaudemar, J. P. (1976), *Mobilité du travail et accumulation du capital*, Paris.

de la Haye, Y. (1979), *Marx and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Deane, P. and Cole, W. (1962),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London.

Dear, M. and Scott, A. (eds.) (1981),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Desai, M. (1979), *Marxian Economics*, Oxford.

Dechervois, M. and Théret, B. (1979), *Contribution a l'étude de la rente foncière urbaine*, The Hague.

Dobb, M. (1940),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Dobb, M. (1963),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Dobb, M.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Dobb, M. (1975—1976), 'A note on the Ricardo-Marx-Sraffa discussion',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9, 468—470.

Domhoff, W. G. (1978), *The Powers That Be*: *Processes of Ruling-Class Domin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the Families*: *Welfare versus the State*, London.

Dostaler, G. (1978a), *Valeur et prix*: *histoire d'un débat*, Paris.

Dostaler, G. (1978b), Marx: *la valeur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Draper, H. (1977),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Part 1;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Dulong, R. (1978), *Les régions, l'Etat et la société locale*, Paris.

Duménil, G. (1975), 'L'expression du taux de profit dans "Le Capital" ', *Revue économique*, vol. 26, 198—219.

Duménil, G. (1977), *Marx et Keynes face à la crise*, Paris.

Edel, M. (1976), 'Marx's theory of rent: urban applications', *Kapitalistate*, vol. 4/5, 100—125.

Edwards, R.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Eisenstein, Z. (ed.) (1979),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Elbaum, B., Lazonick, W., Wilkinson, F. and Zeitlin, J. (1979), 'The labour process, market structure and Marxist the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227—230.

Elbaum, B. and Wilkinson, F. (1979),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steel

industr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275—303.

Elger, T. (1979), 'Valorization and "deskilling"; a critique of Braverman', *Capital and Class*, vol. 7, 58—99.

Elson, D. (ed.) (1979),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London.

Elster, J. (1978),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Marxist perspectives*, vol. 1, no. 3, 70—101.

Emmanuel, A.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Erlich, A. (1978), 'Dobb and the Marx-Feldman model: a problem in Soviet economic strate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 203—214.

Fairley, J. (1980), 'French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4, 305—325.

Fine, B. (1979a),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inflation', in F. Green and P. Nore (eds.), *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457 Fine, B. (1979b), 'On Marx's theory of agricultural rent',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8, 241—278.

Fine, B. (1980), *Economic Theory and Ideology*, London.

Fine, B. and Harris, L. (1979), *Re-Reading Capital*, London.

Fitch, R. and Openheimer, M. (1970), 'Who rules the corporations?' *Socialist Revolution*, vol. 1, no. 4, 73—107; no. 5, 61—114; no. 6, 33—94.

Foster, J. (1975), *Class Struggl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Frank, A.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Freyssenet, M. (1971),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travail productif et travail improductif*, Paris.

Freyssenet, M. (1977), *La division capitaliste du travail*, Paris.

Friedman, A. (1977a), *Industry and Labour*, London.

Friedman, A. (1977b), 'Responsible autonomy versu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labour process', *Capital and Class*, vol. 1, 43—57.

Gardner, L. C. (1964), *Economic Aspects of New Deal Diplomacy*, Boston.

Gerdes, C. (1977),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in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9, no. 2, 39—64.

Gerstein, I. (1976),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valu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 243—291.

Gillman, J. (1957),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London.

Glyn, A. and Sutcliffe, R. (1972),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Godelier, M. (1972),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London.

Goldsmith, R. W.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Gough, I. (1972),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in Marx', *New Left Review*, vol. 76, 47—72.

Gramsci, A. (1971),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Grossman, H. (1977), 'Archive: Marx,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roblem of dynamics', *Capital and Class*, vol. 2, 32—55; vol. 3, 67—89.

Gurley, J. G. and Shaw, E. S. (1960), *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 Washington, DC.

Hannah, L. (1976),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 London.

Harris, L. (1976), 'On interest, credit and cap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145—177.

Harris, L. (1978), 'The science of the econom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7, 284—320.

Harris, L. (1979), 'The role of money in the economy', in F. Green and P. Nore (eds.), *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Hartmann, H. (1979),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and Class*, vol. 8, 1—33.

Harvey, D. (1969),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Harvey, D. (1975),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Antipode*, vol. 7, no. 2, 9—21.

Harvey, D. (1977), 'Labor, capital and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6, 265—295.

Harvey, D. (1978), 'Urbanization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 101—131.

Harvey, J. (1977), 'Theories of inflation', *Marxism Today*, January.

Heertje, A. (1972),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Schweizerisches Zeitschrift für Volk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vol. 108, 33—45.

Heertje, A. (1977), *Economics and Technical Change*, New York.

Hegel, G. W. (1952 edn.),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Hendrick, B. J. (1907),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and their making: street railway financiers', *McClures Magazine*, vol. 30, 33—48.

Herman, E. S. (1973), 'Do bankers control corporations?' *Monthly Review*, vol. 25, no. 1, 12—29.

Herman, E. S. (1979), 'Kotz on banker control', *Monthly Review*, vol. 31, no. 4, 46—57.

Hilferding, R. (1970 edn.), *Le Capital financier*, Paris.

Hilton, R. (ed.) (1976),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Himmelweit, S. and Mohun, S. (1977), 'Domestic labour and capita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 15—31.

Hindess, B. and Hirst, P. (1975),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Hindess, B. and Hirst, P. (1976),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London.

Hirschman, A. O. (1976), 'On Hegel, imperialism, and structural stagn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1—8.

Hobson, J. A. (1965), *Imperialism*, Ann Arbor, Michigan.

Hodgson, G. (1974), 'The theory o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New Left Review*, vol. 84, 55—82.

Hodgson, G. (1980), 'A theory of exploitation without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4, 257—273.

Holloway, J. and Picciotto, S. (1978),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London.

Hook, S. (1933),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459 Howard, M. C. and King, J. E. (197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London.

Humphries, J. (1977),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 241—258.

Hunt Commission Report (1971),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Hunt, E. K. (1979), 'The categories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3, 303—325.

Hymer, S. (1972),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Isard, W. (1956), *Location and Space Economy*, Cambridge, Mass.

Itoh, M. (1976), '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0, 307—340.

Itoh, M. (1978a), 'The form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risis',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2, 129—155.

Itoh, M. (1978b), 'The inflational crisis of capital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4, 1—10.

Jacobi, O., Bergmann, J. and Mueller-Jentsch, W. (1975), 'Problems in Marxist theories of inflation', *Kapitalistate*, vol. 3, 107—125.

Jacot, J.-H. (1976),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t fluctuations conjuncturelles*, Lyons.

Kalecki, M. (1971),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London.
Kautsky, K. (1970 edn.), *La question agraire*, Paris.
Keiper, J. S., Kurnow, E., Clark, C. D. and Segal, H. H. (1961),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Rent*, New York.
Kemp, T. (1967),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Koeppel, B. (1978), 'The new sweatshops', *The Progressive*, vol. 42, no. 11, 22—26.
Kolko, G. (1977),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Kotz, D. (1978), *Bank Control of Large 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Calif.
Krelle, W. (1971), 'Marx as a growth theorist', *German Economic Review*, vol. 9, 122—133.
Kühne, K. (1979), *Economics and Marxism* (2 vols.), London.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
Laibman, D. (1973—1974), 'Values and prices of p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7, 404—436.
Lamarche, F. (1976),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urban question', in C. Pickvance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Lazonick, W. (1979),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echnical change: the case of the self-acting mu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231—262.
Lebowitz, M. A. (1977—1978),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eds',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1, 430—447.
Lefebvre, H. (1972), *La droit à la ville: suivi d'espace et politique*, Paris.
Lefebvre, H.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Lenin, V. I. (1956 ed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Lenin, V. I. (1970 edn.), *Selected Works* (3 vols.), Moscow.
Levine, D. (1978), *Economic Theory*, London.
Lipietz, A. (1974), *Le tribut foncier urbain*, Paris.
Lipietz, A. (1977), *Le capital et son espace*, Paris.
Lösch, A. (1967),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New York.
Luxemburg, R. (195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Luxemburg, R. and Bukharin, N. (1972 ed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aarek, G. (1979), *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s Capital: a Study in Formalization*, Oxford.

460

Macfarlane, A. (1978),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Magaline, A. D. (1975), *Lutte de classes et dévalorisation du capital*, Paris.

Malos, E. (1980), *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 London.

Mandel, E. (1968),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ndel, E. (1971),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Mandel, E. (1975), *Late Capitalism*, London.

Mandel, E. (1978), *The Second Slump*, London.

Massey, D. (1978), 'Regionalism: some current issues', *Capital and Class*, vol. 6, 106—125.

Massey, D. (1979),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Regional Studies*, vol. 13, 233—244.

Massey, D. (1981), 'The U. K.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 and locational change', in M. Dear and A.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pp. 199—230.

Massey, D. and Catelano, A. (1978), *Capital and Land: Landownership by Capital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Mathias, P. (1973), 'Capital, credit and enterpris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2, 121—144.

461 Mattick, P. (1969), *Marx and Keynes*, London.

Mattick, P. (1980),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Age of Inflation*, London.

McKinnon, R.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Meek, R. L. (1973),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Meek, R. L. (1977), *Smith, Marx and After*, London.

Meillassoux, C. (1981), *Maidens, Meal and Money*, London.

Mérignas, M. (1978), 'Travail social et structures de classe', *Critiqu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New Series, no. 3, 24—56.

Montgomery, D. (1979),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London.

Morin, F. (1974), *La Structure financière du capitalisme français*, Paris.

Morishima, M. (1973), *Marx's Economics*, London.

Morishima, M. and Catephores, G. (1978), *Value, Exploitation and Growth*, Maidenhead, Berks.

Morris, J. and Lewin, H. (1973—1974), 'The skilled labor reduction problem',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7, 454—472.

Nabudere, D. (197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London.

Nagels, J. (1974), *Travail collectif et travail production*, Brussels.

Nairn, T. (1977),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iehans, J. (1978), *The Theory of Money*, Baltimore.

Noble, D. (1977),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New York.

O'Connor, J.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O'Connor, J. (1975),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r',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 297—336.

Okishio, N. (1961),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vol. 7, 85—99.

Ollman, B. (1971),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Ollman, B. (1973), 'Marxism and political science: a prologomenon to a debate on Marx's method',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 491—510.

Osadchaya, I. (1974), *From Keynes to Neo-Classical Synthesis: a Critical Analysis*, Moscow.

Palloix, C. (1973), *Les firmes multinationales et le procès d'internationalisation*, Paris.

Palloix, C. (1975a), *L'internationalisation du capital*, Paris.

Palloix, C. (1975b),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circuit of social capital', in H. Radice (ed.),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alloix, C. (1976), 'The labour-process: from Fordism to neo-Fordism', in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London.

Palmer, B. (1975), 'Class, conception and conflict: the thrust for efficiency, managerial views of labour, and the working class rebellion, 1903—1922',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7, no. 2, 31—49.

Pannakoek, A. (1977), 'The theory of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1, 59—81.

Peet, R. (1981), 'Spatial dialectics and Marxist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5, 105—110.

Pilling, G. (1972), 'The law of value in Ricardo and Marx',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 281—307.

Pinkney, D. H.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New Jersey.

Portes, A. (1980),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 in A. Portes and J. Walto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Postel-Vinay, G. (1974), *La rente foncière dans le capitalisme agricole*, Paris.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Poulantzas, N.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Radice, H. (ed.) (1975),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oney and Credit (1961), *Money and Credit, Their Influence on Jobs, Prices, and Growth*,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Revell, J. (1973), *The British Financial System*, New York.

Rey, P.-P. (1973), *Les alliances de classes*, Paris.

Ricardo, D. (1970 edn.),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London.

Roberts, S. (1961), 'Portrait of a robber baron: Charles T. Yerke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35, 344—371.

Robinson, J. (1967),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Robinson, J. (1968), 'Marx and Keynes', in D. Horowitz (ed.),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Robinson, J. (1977),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Monthly Review*, vol. 29, no. 7, 50—59.

Robinson, J. (1978),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Kyklos*, vol. 31, 5—20.

Roemer, J. (197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6, 403—424.

Roemer, J. (1978),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the real wage and Marx's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7, 152—166

Roemer, J. (1979), 'Continuing controversy on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fixed capital and other issu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379—398.

463 Roemer, J. (1980),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Marxian economics', *Econometrica*, vol. 48, 505—530.

Roncaglia, A. (1974), 'The reduction of complex labour to simple labour',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Autumn.

Rosdolsky, R.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Rowthorn, B. (1980),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

Rubin, I. (1972 ed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Samuelson, P. (1957), 'Wages and prices: a modern dissec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7, 884—912.

Samuelson, P. (1971),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9, 399—

431.

Santos, M. (1979), *The Shared Space: the Two Circuits of the Urban Econom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Schefold, B. (1977), 'Fixed capital as a joint product', *Jahrbucher für National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Schmidt, A.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Schumpeter, J.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Schumpeter, J. (1939),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Scott, A. (1980), *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 London.

Scott, J. (1979), *Corporations, Classes, Capitalism*, London.

Seccombe, W. (1974),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vol. 83, 3—24.

Shaikh, A. (1977), '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 in J. Schwarts (ed.),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Santa Monica, Calif.

Shaikh, (197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sis theories', in 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 S. Capitalism in Crisis*, New York.

Shaikh, A. (1979—1980), 'Foreign trade and the law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3, 281—302; vol. 44, 27—57.

Sherman, H. (1967), 'Marx and the business cycl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31, 486—504.

Sherman, H. (1971), 'Marxist models of cyclical growt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28—55.

Sherman, H. (1976), *Stagflation: a Radical Theory of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New York.

Smith, A. (1937 ed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Smith, H. (1937), 'Marx and the trade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192—205.

Smith, N. (1980)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unpublished ms.) .

Smith, N. (1981), 'Degen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patial interactionism and radical eclectic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5, 111—118.

Soja, E. (1980), 'The socio-capit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0, 207—225.

Sowell, T. (1972), *Say's Law: an Historical Analysis*, Princeton, New Jersey.

Spring, D. (1963), *The English Landed E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Sraffa, P. (1960),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London.

Steedman, I. (1977),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Stone, K. (1974), 'The origin of job structures in the steel industry',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6, no. 2, 113—173.

Studenski, P. and Kroos, H. E. (1952),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weezy, P. (1968 edn.),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Sweezy, P. (1971), 'The resurgence of financial control: fact or fancy?' *Monthly Review*, vol. 23, no. 6, 1—33.

Sweezy, P. (1979), 'Marxian value theory', *Monthly Review*, vol. 31, no. 3, 1—17.

Sweezy, P. and Magdoff, H. (1972), *The Dynamics of U. S. Capitalism*, New York.

Taylor, J. G. (1979), *From Modernization to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Therborn, G. (1976), *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 London.

Théret, B. and Wieviorka, M. (1978), *Critique de la théorie du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Paris.

Thomas, B. (1973),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London.

Thompson, E. 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Thompson, E.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Thompson, F. M. L. (1963),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Thompson, G. (197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econom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6, 235—283.

Tilly, L. A. and Scott, J.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Topalov, C. (1974), *Les promoteurs immobiliers*, The Hague.

Tortajada, R. (1977), 'A note on the reduction of complex labour to simple labour', *Capital and Class*, vol. 1, 106—116.

Tribe, K. (1977), 'Economic property and the theorization of ground rent',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6, 69—88.

Tribe, K. (1978),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Tsuru, S. (1968), 'Keynes versus Marx: the methodology of aggregates', in D. Horowitz (ed.),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Tucker, R. (1970),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Uno, K. (198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a Purely Capitalist Society*, Brighton.

Vilar, P. (1976),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London.

van Parijs, P. (1980), 'The falling-rate-of-profit theory of crisis: a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by way of obitua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2, 1—16.

von Bortkiewicz, L. (1952),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vol. 2, 5—60.

von Thunen, J. H. (1960 edn.), *The Frontier Wage*, (trans. and ed. B. Dempsey), Chicago.

von Weizsäcker (1977),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nd average period of production',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vol. 87, no. 2, 198—231.

Walker, R. A. (1977), 'The suburban solution: urban reform and urban geography in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Walker, R. A. and Storper, N. (1981), 'Capital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forthcoming). vol. 5, 473—509.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Weeks, J. (1979),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squeeze" hypothesis',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3, 259—280.

Weisskopf, T. (1978),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cyclical crises', in 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 S. Capitalism in Crisis*, New York.

Wilson, J. C. (1938), 'A note on Marx and the trade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 107—113.

Wolfstetter, E. (1972), 'Surplus labour, synchronized labour costs and Marx's labour theory of value', *Economic Journal*, vol. 83, 787—809.

Wright, E. J.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Yaffe, D. (1973), '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 186—232.

Zaretsky, E. (1976),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Zeitlin, J. (1979), 'Craft control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ngineers and compositors in Britain, 1890—1930',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263—274.

Zeitlin, M.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9, 1073—1119.

人名索引

467 注：这份索引没有包含脚注中引用的著作的作者——见“参考书目”。这里也不包含马克思。（索引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即本书边码。——编者注）

迈克尔·鲍尔（Ball, M.）353
保罗·巴兰（Baran, P.）141
奥托·鲍威尔（Bauer, O.）79
威廉·鲍莫尔（Baumol, W.）67
爱德华·伯恩施坦（Bernstein, E.）190
保罗·博卡拉（Boccara, P.）190, 199
欧根·冯·博姆－巴维克（Böhm-Bawerk, E. von.）57—58, 64
哈里·布雷弗曼（Braverman, H.）59, 106—107, 108, 118—119
尼古拉·布哈林（Bukharin, N.）79, 289
迈克尔·布洛维（Burawoy）, 110—112, 116

安·埃·舍尔比利埃（Cherbuliez, A.-E.）127
瓦尔特·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W.）377
西蒙·克拉克（Clarke, S.）36

苏珊·德布伦霍夫（de Brunhoff, S.）240, 249, 280, 291—292
梅格纳德·德赛（Desai, M.）36, 171
莫里斯·多布（Dobb, M.）36

理查德·爱德华兹（Edwards, R.）112
伯纳德·埃尔鲍姆（Elbaum, B.）118
黛安娜·艾尔森（Elson, D.）37
琼·埃尔斯特（Elster, J.）3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Engels, F.）38, 63—64, 66, 138, 172, 179, 181, 238

本·法恩（Fine, B.）36—37, 353
埃里希·弗洛姆（Fromm, E.）114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106, 114

于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 J.）114
劳伦斯·哈里斯（Harris, L.）36—37
格奥尔格·黑格尔（Hegel, G.）414—415
鲁道夫·希法亭（Hilferding, R.）138, 190, 240, 283—285, 288—292, 319, 321, 323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Hobson, J.）289, 323
杰弗里·霍奇森（Hodgson, G.）35
马克斯·霍克海默（Horkheimer, M.）114
史蒂芬·海默（Hymer, S.）137

卡尔·考茨基（Kautsky, K.）190
米哈乌·卡莱茨基（Kalecki, M.）78
约翰·凯恩斯（Keynes, J.）77—78, 309, 312

斐迪南·拉萨尔（Lasalle, F.）49
威廉·拉佐尼克（Lazonick, W.）112
弗拉基米尔·列宁（Lenin）, 138, 190, 240, 283, 285, 288—292, 319, 323—324, 329
大卫·莱文（Levine, D.）35, 214
奥古斯特·勒施（Lösch, A.）377
格奥尔格·卢卡奇（Lukács, G.）114
罗莎·卢森堡（Luxemburg, R.）77, 79, 93, 190

A·马加利纳（Magaline, A.）190[1]
托马斯·马尔萨斯（Malthus, T.）51, 76, 92, 164, 331—332
赫伯特·马尔库塞（Marcuse, H.）114
多琳·马西（Massey, D.）346
罗纳德·米克（Meek, R.）36, 66
安德鲁·梅隆（Mellon, A.）317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ill, J. S.）40, 76, 78, 177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Morgan, J. P.）248—249
森岛通夫（Morishima, M.）35, 43—44, 58, 66—67, 171—172, 213—214

布莱恩·帕尔默（Palmer, B.）112
杰弗里·皮林（Pilling, G.）36

468 弗朗索瓦·魁奈（Quesnay, F.）6, 169

皮埃尔－菲利普·雷伊（Rey, P.-P.）344, 346
大卫·李嘉图（Ricardo, D.）14—15, 23—24, 35, 39, 45, 51, 76—78, 83, 93, 127, 164, 177, 193, 195, 215, 242, 330—332, 337, 349, 351, 353—355
琼·罗宾逊（Robinson, J.）36
约翰·洛克菲勒（Rockefeller, J.）317
约翰·罗默（Roemer, J.）36
亚历山德罗·龙卡利亚（Roncaglia, A.）58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 R.）36, 340
罗伯特·罗索恩（Rowthorn, R.）50, 58
伊萨克·鲁宾（Rubin, I.）36

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 P.）58, 65
安瓦尔·谢赫（Shaikh, A.）66
让·西斯蒙第（Sismondi, J.）76—77, 93
亚当·斯密（Smith, A.）39, 41, 45, 105, 144, 146, 177, 191, 378
皮埃尔·斯拉法（Sraffa, P.）213, 39—40
伊安·斯蒂德曼（Steedman, I.）35, 213—214
保罗·斯威齐（Sweezy, P.）36, 77, 79, 141, 164

爱德华·汤普森（Thompson, E.）114—115
拉蒙·托塔哈达（Tortajada, R.）58
米哈伊尔·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 M.）219—220

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维茨（von Bortkiewicz, L.）64
约翰·冯·诺伊曼（von Neumann, J.）213

译注

1. 这是 Nguyen Huu Dong 与 Albert Gueissaz 两人合用的笔名。

主题索引

资本积累（accumulation of capital）[参见周期；过度积累（cycles; over-accumulation）]，8，28—29，32，34—36，50—57，59，76—78，86，103，109，113，116—117，123，131，136，139—141，158—159，208，218，226，235—236，238，246，253—254，261，266—272，280—282，284，286—287，296—307，310—312，317，320—321，325—329，333，338，343，352，357，360—361，369，374—376，379，381—383，386，389—391，393，402—404，410—415，418，422—423，427—445

为积累而积累（for accumulation's sake），29，33，37，54—55，87，92，96—97，125，157，159，176，192，414，434

平衡的资本积累（balanced）[参见均衡（equilibrium）]，104，135，160，167—176，188—189，216，261，285，308，311—312，364，384

债务积累（of debts）[参见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268—271，278—282，287—288

资本积累的规律（law of），157—176

资本积累的模型（models of），158—189

农业（agriculture），334—337，341，350—354，361，364—365，435

银行（banks），33，86，90，143，145，150，246—251，262，272—281，283，288—292，298，316—329，366

中央银行（central），247—251，280，294，296，306—309，316，318，327，387，430，448

资产阶级（bourgeoisie），74，109，163，287，340，359—360，365，413—414，435—436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参见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69，91，101，232—238，265，271，276，278，331，334，364，376，378—379，395—398，406—407，418，448

官僚主义（bureaucracy）[参见国家（State）]，147，154

资本（capital）[参见资本流通；生息资本的流通；固定资本（circulation of capital；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fixed capital）]

资本集中（centralization of），130，137—155，183—184，191，197—198，224—225，256，262，265，271—272，284—285，289，311，317—318，321，392，398，409，423，448

流动资本（circulating），129，206—210，215—223，227，238—239，265

资本积聚（concentration of），22，31，130，139，224—225，256，262，355，358，370，392，417—419

不变资本（constant）[参见资本的构成（composition of capital）]，45，62，91，126，129，167，170，178，181—184，206—208，225，227，238—239，333，392，434

资本的概念（concept of），20—25，39，42，83，129—132，185，194，205，251—254，268—270，317

虚拟资本（fictitious），95—96，265—271，276—280，284，288，290，293—295，300—309，314，318，321，325，333，347，365—372，395—398，407—409，448

金融资本（finance），138，146，150—151，198，233，239，283—329，370，409，442

商人资本（merchants'），33，69—72，85—86，255，298，344，346，395，409，423

货币资本（money）[参见生息资本的流通（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20—22，69—70，72，85，87，95—97，146，149，152，186，191，227，231，234，237—238，254—282，285—286，317，324，348，396，404—407，421，441

生产资本（productive capital），20—22，70—74，85，256—259，409，420—421，428

可变资本（variable）[参见资本的构成；劳动力的价值（composition

of capital; value of labour power)], 44—57, 62—63, 89—91, 113, 125, 128—129, 134, 160—164, 170, 186, 203, 206—208, 227, 298, 376, 380—386, 388, 392

资本家阶级 (capitalist class) [参见阶级的概念; 阶级关系; 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的矛盾——个人与阶级相对 (class concept; class relations; class struggl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individual v. class)], 21—35, 40—41, 43, 52—54, 59, 87—89, 106, 135, 152—154, 158, 162, 169, 171, 188, 191, 201—204, 232, 235, 268—272, 284—288, 312, 314, 317, 326—327, 332—333, 358, 361, 401—402, 420—424

资本家阶级的派系 (factions), 26, 71—74, 191, 202, 252—260, 286—288, 298, 360—366, 388, 395—398, 411—412, 420—424

资本流通 (circulation of capital) [参见资本; 生息资本的流通; 固定资本 (capital; 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fixed capital)], 20—25, 27, 69, 80—94, 105, 131, 145—147, 152, 167—177 (原文为 167—7, 应为 167—77 之误), 186—188, 194, 208, 231, 239—240, 251—254, 269—271, 273—282, 293, 296—307, 317, 336, 348, 355—372, 376, 383, 395—398, 400—401, 404—412, 419, 424, 435, 441

不变资本的流通 (constant capital), 156—157, 172, 186—187

剩余价值的流通 (surplus value), 170, 172—176, 186—187

可变资本的流通 (variable capital), 170, 172, 174, 186—187

流通费用或流通成本 (circulation costs), 71—72, 86—87, 94, 121—122, 131, 143, 158, 243—248, 263, 377

生息资本的流通 (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参见资本流通 (circulation of capital)], 230, 238, 239, 253—282, 283, 286, 297—309, 316—329, 331, 347, 349, 366—372, 396—398

收益的流通 (circulation of revenues), 92, 230, 232, 237, 273—276, 297—307, 311, 365—366, 401—402

流通时间 (circulation time), 62, 71, 85—87, 121—122, 131, 258, 263, 369

阶级联盟 (class alliances), 30, 190, 283, 314, 317—329, 344—346, 348—349, 363, 368, 370, 374, 420—424, 427—428, 441, 444, 448—450

阶级的概念 (class concept), 20—21, 24—25, 32—35, 39, 71—74, 449—450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24—25, 32—35, 110—119, 401—403, 412

阶级关系 (class relations) [参见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

资本与劳动相对 (capital v. labour), 22—38, 42—43, 46—57, 61,

89—91, 107, 123—125, 156, 160, 169—174, 177, 201—203, 207, 252—256, 312, 359—360, 390—395, 411—412, 442—443, 447—448

资本与地主相对（capital v. landlords）, 332, 343—349, 359—372

资本派系之间的阶级关系（amongst factions of capital）, 70—74, 239, 256—258, 272, 281—284, 286—287, 298—300, 312, 317—329, 395—398, 400, 405, 410—411

货币资本家与产业家相对（money capitalists v. industrialists）, 256—260, 286, 288—292, 298—307, 317—329

阶级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参见再生产（reproduction）], 5, 32—35, 46—51, 68, 80—81, 94, 103—104, 135, 154, 175, 192, 256, 289, 327, 359—362, 374, 396, 420—422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参见阶级关系（class relations）], 3, 27, 30, 32—34, 41—44, 50, 52—54, 65, 106—108, 111, 127, 133—134, 188, 202—203, 232, 263, 282, 289—292, 308, 313, 320, 326—329, 343, 376, 380—385, 398, 404, 411—412, 419—424, 426, 437, 441, 449—450

资本派系之间的阶级斗争（between factions of capital）, 70—74, 299, 362—368, 411—412, 419—422

与劳动过程相关的阶级斗争（over labour process）, 106—119, 133, 183, 383—385, 411—412

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within the State）, 282, 314—315, 321—329, 401, 448—449

与工资率相关的阶级斗争（over wage rate）, 52—56, 160, 174, 177, 382—385, 411—412, 420—422

殖民（colonization）, 93, 345, 374, 387, 413—415, 436—438

商品（commodity）, 1—38, 40, 46—49, 56, 64—72, 81—83, 85—87, 91, 94, 98—99, 126—127, 161—162, 167, 170, 174, 191—192, 194—196, 200, 207—208, 216—217, 227, 230, 233, 241—245, 250—251, 265, 276, 294, 296, 319, 329, 341, 348, 375—376, 376—380, 416, 427, 429

共同体（community）, 110, 383—385, 419—422, 447

竞争（competition）, 28—33, 61—69, 77, 79, 82, 90, 107, 116—117, 120—125, 127, 135, 138—139, 142—148, 158, 167, 171, 176, 184—186, 188, 204, 209, 212, 226, 228—229, 231, 254, 259, 268, 271, 286, 289, 303—307, 317, 341—342, 349—350, 353, 361, 364, 378, 388—395, 398, 405, 424—425, 430, 441, 448

空间竞争（spatial）, 388—395, 420

国家之间的竞争（between States）, 289—292, 296, 323—324, 329,

419—424, 438—445

资本的构成（composition of capital），62—64, 125—136, 159, 168—169, 177—189, 201, 301, 304, 311, 315, 351—353

消　费（consumption），8, 16, 41—44, 75—83, 89—87, 99, 157, 167—168, 172—174, 205, 218—219, 229—233, 236—237, 264—265, 274, 285, 297, 300—307, 339—340, 365—366, 369, 416—417, 428—429, 432, 434

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80—83, 91, 208—210, 216

合理消费（rational），91, 173, 231

消费基金（consumption fund）[参见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 205, 218, 229—238, 274, 325, 331, 407

资本主义的矛盾（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参见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危机；价值丧失；利润率下降；过度积累（class relations; class struggle; crises; devaluation; falling rate of profit; overaccumulation）], 2, 21—23, 32—35, 75—76, 82—83, 96—97, 103—104, 133—134, 177—179, 188—189, 192—203, 219, 237—239, 261, 269—270, 272, 287—288, 290, 304—306, 318—320, 325—329, 349, 371—372, 384, 412—415, 418—419, 422—423, 427—431, 440—441, 444—445, 447—450

集中与分散相对（centralization v. decentralization），137, 143, 146—155, 226, 272, 318—319

信用体系内部的资本主义矛盾（within credit system），223, 272—273, 281—282, 286—288, 316, 322—329

金融体系与货币基础相对（financial system v. monetary base），253—254, 291—296, 316—320, 325—329, 387, 422, 432—433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对（fixed v. circulating capital），220—223, 237—238, 394

个人与阶级相对（individual v. class），63, 67—68, 90, 120—121, 128, 133—135, 183, 188—189, 201—203, 241, 284, 286, 325, 382, 326—327, 382, 389—390, 426

机动性与不动性相对（mobility v. immobility），92, 234—235, 372, 376—380, 386, 389—395, 397—398, 411—412, 418—419, 430—431, 440—441

货币形式中的资本主义矛盾（within money form），11—13, 21—23, 242, 249—254, 292—293, 325—329

生产与交换、消费、实现相对（production v. exchange/consumption/realization），89—94, 157, 176, 285, 309—310, 432—434

生产与分配相对（production v. distribution），63, 67—68, 89—94,

196, 285—286, 352

对生产的控制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相对 (production control v. market anarchy), 128—136, 140—141

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相对 (productive forces v. social relations), 90, 98—100, 103, 120, 125, 180, 188—189, 195—196, 326—327, 426

价值形式中的资本主义矛盾 (in value form), 35—38, 193—196, 215

协作 (co-operation), 31—32, 103, 106, 108, 112—114, 139

公司 (corporation), 137, 148—155, 276, 316—329, 382, 409, 422—423, 430

股份公司 (joint stock), 146, 198, 258, 276—278, 283, 288

信用体系 (credit system) [参见生息资本的流通; 利息 (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interest)], 12, 72, 77—79, 94, 122, 143, 167, 173—175, 187, 191, 201, 216, 223, 225, 228—238, 245, 239—251, 253—282, 290, 297—315, 321—329, 348, 355, 367, 370—371, 379, 386—387, 396, 406, 409, 418, 432—433

危机 (crises) [参见资本主义的矛盾; 价值丧失; 利润率下降; 过度积累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devaluation; falling rate of profit; overaccumulation)], 36, 52, 54, 68, 75—79, 81—83, 85, 97, 103, 120, 135, 153—154, 157, 169, 171, 173, 176—203, 222—223, 253, 264, 286, 291, 300—315, 317, 320, 324—329, 352, 387, 390, 394—395, 398, 403, 410—412, 415, 422, 425—445, 450

比例失调的危机 (of disproportionality), 75, 123, 168—176, 216, 286, 291, 366, 400

固定资本形成过程的危机 (of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219—223, 227, 237—238, 291

危机的地理方面 (geographical aspects), 424—445

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monetary and financial), 153, 180, 201, 244, 246, 253—254, 266, 269, 284, 295, 324—329, 387

实现的危机 (of realization) [参见实现 (realization)], 83—94

转换危机 (switching), 219—220, 236, 265—266, 428—431, 435, 443

消费不足的危机 (underconsumption), 54, 77—94, 195—196, 432—434

周期 (cycles) [参见资本积累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53, 75, 78, 160, 164, 171—173, 175, 221—222, 236, 243, 300—307, 312, 319—320, 325—329, 427—438

分散（decentralization），137，143，146—155，272，285，318，321，448

需求与供给（demand and supply），9—10，18，75—84，89，146，242

劳动的需求与供给（for labour）［参见劳动力（labour power）］，50—52，55，87，158—166，171，176，194，204，219，300—305，310，388

货币的需求与供给（for money）［参见货币（money）］，12—13，944，174，297—298，300—315

货币资本的需求与供给（for money capital）［参见资本；生息资本的流通（capital；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259—260，274，277—279，297—299，300—305，367

生产的部类（departments of production），8，166—176，220，225，230，236，300—305

价值丧失（devaluation）［参见危机；过度积累（crises；overaccumulation）］，32，84—85，97，178，193—203，219，237，246，272，280，285，294—296，300—307，309—315，328—329，337，372，378，387—389，391，394—395，397—398，402—403，405，409—412，420，425—438，448—449

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of fixed capital）［参见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198—203，209，219—221，228，234

指定地点的价值丧失（place-specific），378，391，403，420，425—431

开发商（developers），395，420

不均衡（disequilibrium）［参见危机（crises）］，157，170—172，232，286，299，306—315，325—329

分配（distribution）［参见资本—商人资本；利息；利润—企业利润；租金；税收；工资（capital--merchants'；interest；profit--of enterprise；rent；taxes；wages）］，36—37，39—74，89—94，100，152—155，181，185，187，239，285—286，298，312，331—333，351—353，362—366，397，417，428，434，449

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5，31—32，37，59，81，99，107，118，121，136，184，272，284，361，373，392—393，396，418，435，438

详述（detail），99，107，139，184，392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76，89—97，134，172，175—176，300—307，309，313，365，388，402，420，426，432—434

均衡（equilibrium），9—10，12，18，50，55—57，75，77—79，81—82，90—91，96—97，132，136，140，142—144，157，160，168—189，193，200—203，225，236，260，270，299—300，310，321，324，327，362—366，

389—395, 429, 448

交换（exchange）, 4, 9—17, 19—21, 23—24, 28, 30, 33—34, 41, 51, 56—58, 62—68, 75, 80—83, 93—97, 100, 126, 130, 132—133, 135—137, 140, 151, 157, 162, 166—170, 172, 176, 188, 192—193, 216—217, 230, 242—243, 247—248, 250—251, 253, 255, 258—259, 261—262, 338—339, 344, 369, 373, 375—376, 388, 398, 426, 432—434

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 1—5, 9—13, 14, 16—22, 28—29, 99, 170, 197, 200—201, 206, 214, 231, 241—242, 338, 375

对劳动的剥削（exploitation of labour）[参见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23—38, 44—58, 61—63, 65, 89, 95, 108, 113, 152, 156—166, 177—179, 187, 208, 212, 308, 313, 380—385, 393, 403, 434

次级形式的对劳动的剥削（secondary forms）, 47, 231, 267, 340, 342, 362, 397, 424

工厂（factory）, 31—32, 108—119, 137

利润率下降（falling rate of profit）[参见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crises）], 134, 157, 176—189, 195—197, 222, 227—229, 239, 271, 390—392, 415, 434

家庭（family）, 31, 47, 110, 381—382, 447

家族式的商业（business）, 142—144

家庭的生产（production）, 41—47, 162—165

拜物教（fetishism）, 17—18, 36—37, 40, 68, 72, 74, 113, 117, 122, 144, 206, 211, 258—259, 333

封建主义（feudalism）, 25, 27, 255, 343—347

金融结构（financial structure）[参见制度或机构（institutions）], 271—282, 286, 316—329, 422—423, 430—431, 441

金融家（financiers）[参见资本—金融资本（capital-finance）], 26, 71, 143, 202, 272, 285—288, 298, 316—329, 355, 370, 379, 395, 409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参见通货膨胀；国家（inflation; State）], 137, 151, 305—316, 321, 325—329, 402, 404, 448—449

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 6—7, 36, 62, 69, 78, 87, 123—124, 129, 131, 146—147, 167, 170, 173, 175, 178, 181, 188, 191, 195—199, 204—238, 264—268, 271, 284—285, 300—307, 325, 331, 336—337, 355, 364, 378—379, 388—389, 394, 407, 428

固定资本的价值丧失（devaluation of）[参见价值丧失（devaluation）], 198—203, 209, 219—223, 228, 231, 234

固定资本的耐用性（durability），224—226
独立形式的固定资本（independent form of），226—229，265，379，395—398
固定资本的价值（value of），182，208—215，221—223，228—229
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参见帝国主义；地理组织（imperialism；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93，178，191，295，413—414
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与实质上的从属相对（formal v. real subordination of labour to capital），107—108，134，345，373，415
未来的劳动（future labour），220—222，225—226，232，237—238，266—270，276—278，368，370—371，397，409，420，443

地理组织（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参见空间（space）]，142—145，191，233，318，333，354，369—371，373—405，415—416，428—431，448
地理上的积聚（concentration），358—364，392，406—407，417—419，448
地理上的分散（dispersal），358，392，417—419，448
地理扩张（expansion），93，96，307，393，397，410—411，414—445，448
黄金（gold）[参见货币—货币商品（money--commodity）]，94—95，242—251，254，293，295，306—307，312，385—387，433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s），78—79
等级制（hierarchies）[参见制度或机构（institutions）]，422—425，427，430—432，441
劳动过程中的等级制（in labour process）[参见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31—33，60—61，99，107—109，112—113，118—119，154，438
管理层所造成的等级制（managerial），145—149，154
货币的等级制（of money），247—251，280—281，295，422
城市的等级制（urban），377，423
历史（history），6—8，10，15，23—24，27—28，33—35，43，49—50，55，59—60，65—66，73—74，101，103，106，108，111—119，122，135，137—155，162—163，165，181，196，199，203，255，333，340，343—349，359，365—366，373，399，409—410，414—415，439—440，443
贮藏（hoarding），12，83，87，171，216，225，230，243，252—253，262，265，274

意识形态（ideology），25，32，41，47，681，11—12，114，117，122，

192, 360, 399—401, 413—415, 424, 449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63, 93, 138, 283, 289—292, 295—296, 323—324, 329, 387, 409, 414, 433, 435—436, 439—445

产业利益或工业利益 (industrial interest), 26, 202, 255—257, 263, 286—287, 289—292, 298—300, 319—325, 345, 348, 409

产业后备军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参见人口; 失业 (population; unemployment)], 43, 51, 96, 124, 159—166, 178, 192, 200, 202, 204, 212, 219—220, 300—307, 313, 374, 381—382, 418, 443

通货膨胀 (inflation) [参见危机; 价值丧失 (crises; devaluation)], 180, 196—197, 244, 254, 280, 285, 295—296, 307—316, 328—329, 438, 449

信 息 (information), 9, 110, 122, 142—145, 147, 373, 386—387, 389, 398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s)

物质基础设施 (physical) [参见建成环境 (built environment)], 232—235, 395—398, 406, 411, 417—418, 420, 428—429, 440

社会基础设施 (social), 398—407, 411, 417—418, 420, 428—429, 440

制度或机构 (institutions) [参见等级制; 法律体系; 国家 (hierarchies; legal system; State)], 25, 113, 144, 150, 240, 260, 262, 271—282, 290, 316—329, 383—387, 397—399, 416—417, 422—424, 430—431

利息 (interest) [参见资本—金融资本; 生息资本的流通; 分配 (capital-finance; circulation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distribution)], 18, 39—40, 43—45, 61, 68—72, 78, 89, 180, 191, 198, 223—227, 230, 234—235

利率 (rate of), 187—188, 195, 237, 253—282, 284, 294, 296—307, 312, 317, 321, 322, 331, 336—337, 355, 362, 365, 367, 372, 388, 395, 407, 410

投 资 (investment), 24—29, 167—174, 225—226, 262, 271, 274, 279, 300—307, 310, 342, 396

知识 (knowledge), 101—103, 107, 204, 276, 403, 449

劳动 (labour) [参见阶级关系; 价值 (class relations; value)]

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相对 (abstract v. concrete), 14—16, 57—61, 100, 187, 338, 375, 422—426, 431—432, 448

总劳动 (collective), 105—106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mental v. manual），31—32，108—110，139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相对（productive v. unproductive），104—107

简单劳动（simple），44，57—61，107—109，118

熟练劳动（skilled），31—32，57—61，107—109，10，139 118—119，375，381—385，392，402—404，448

劳动力（labour power），5，22—38，45—57，59—60，83，87，107—108，129，150，252—256，307，340，373，380—385，391，412，415，420，436—438，443，447—448

劳动力的价值丧失（devaluation of）84，89，97，191—200，312—314，424—425

劳动力的量和质（quantities and qualities），57—61，96，99，124，163，382—385，392，401，416

劳动力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参见再生产（reproduction）]，6，22—27，46—47，56，81，90—91，161—167，172—173，235，382—385，395，399—405，412，418，420，444—450

劳动力的供给（supply of），50—52，55，57—61，96，158—166，183，194，216，300—305，310，388，391

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参见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production；surplus value--production of）]，6—7，29—31，59—61，68，83，87，99—119，124—125，133，135，139，209—210，236，333—334，376，381，388—395，403—405，416，418，422，428，436

阶级斗争和劳动过程（class struggle and），99，106—119，124，161

劳动过程的强化（intensification of），31，46，115，120，197

土地（land）[参见租金（rent）]，39，73，96，101，233—234，268，276—277，310，330—372，380—383，388，395—398

对土地的剥夺（expropriation of），217，359—360，380—383

土地的肥力（fertility of），334—337，341—343，351—354，356—357

土地市场（markets），233—234，277，344，347，367—372，388，395—398

地主（landlords），26，73—74，76，111，202，230，255，257，262—263，298，312，331—372，395—398，420—421

价值规律（law of value）[参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value）]，15—16，19，23，33，119，125，140，144，149—151，154，188，203，259，263，341，344，349，351，371—372，396，417，439，441

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laws of motion of capitalism），1，9，14，20，54，

82, 125, 153—154, 156—157, 175, 177—204, 207, 240, 273, 299, 326
法律体系 (legal system), 18—20, 25, 46, 380—381, 386, 397, 410
位置或区位 (location) [参见地理组织; 空间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space)], 120, 233—235, 337—343, 349, 354, 368—371, 374, 377, 381, 388—395, 402—405, 421, 425—427
区位理论 (theory), 377, 388—395
奢侈品 (luxuries), 8, 90, 167, 185, 232, 310, 365—366

机器 (machines) [参见固定资本; 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 (fixed capital;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7, 31—32, 45, 91, 105, 108—119, 121, 124, 133, 139, 185, 204—223, 392, 435
管理者 (managers), 108—109, 115, 146—147, 257—258, 286, 398
市场 (market) [参见交换 (exchange)]
资本市场 (capital), 145, 265—271, 275—281, 309—312
土地市场 (land), 233—234, 277, 344, 347, 367—372, 388, 395—398
世界市场 (world), 79, 93—94, 191, 288, 295, 375—376, 427, 434—439
数学公式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s), 43—44, 64—66, 171
生产资料 (means of production), 5—6, 8, 22—38, 45, 55, 72, 83, 87, 91, 98, 103, 126, 132, 167—168, 185, 205—207, 217—220, 229, 267, 333—338, 344—345, 348, 353, 355—360, 363, 392
精神观念 (mental conceptions), 101—103
研究方法 (method of enquiry), 1—4, 6, 26, 36—38, 79—81, 98—101, 111—119, 142—143, 156—157, 174—175, 208, 446—447
军事 (military), 151, 178, 192, 329, 444—445
机动性 (mobility)
资本的机动性 (of capital), 51, 116, 165, 231, 289, 324, 376—412, 415, 418, 423—431, 433—436, 440
劳动的机动性 (of labour), 51, 165, 376, 380—385, 391, 393, 411—412, 416—417, 421—431, 440
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25—26, 33, 35, 38, 46, 52, 60, 65, 73—75, 82, 94, 96, 99—104, 108, 110—111, 118—121, 165, 176, 191, 193, 235, 253, 288—289, 322, 330—332, 334, 343—345, 361, 372, 390, 431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pre-capitalist), 50, 93, 143, 233, 255, 261, 343—348, 410, 433, 441, 443

货币基础（monetary base），253—254，291—296，300—308，312—315

货币（money），9—14，16—18，33，46，69，81，83，85，87，94—95，100，179，174，188，191，195，207，223—224，227，238—251，307—315，338，348，376，381，385—387，398，416，422—423，427，429，433

货币流通（circulation），12—13，72，145，167，173—175，216—218，224—226，244—252，262—264，279—281，293，319，344，376

货币商品（commodity）[参见黄金（gold）]，11—13，197，242—246，294—295

价值尺度（measure of value），11—13，241—251，254，280，292—296

流通手段（medium of circulation），11—13，188，243—254，262—263，292—296

纸币（paper），244—251，293—294

货币品质（quality），246—251，254，269，280，303—304，307—315，318—319，322，327，387，422—423，448

货币量（quantity），12—13，244—249

作为社会权力的货币（as social power），12—14，241，245，254—256，284，287—288，344—347，366，373，405

货币转化为资本（transformation to capital），13—14，21—25，240，251—254，256

货币的流通速度（velocity of circulation），12—13，243

垄断（monopoly），117，123，135，137，146—148，150—155，178，185，199，221，249—250，287—292，313，430，443

垄断资本主义（capitalism），110，138—155，289—290，313，319

地产抵押（mortgages），231，268，276，285，347—348，365，421，424

民族或国家（nation）[参见国家（State）]，386，404，419，422—423，442

自然、大自然或自然界（nature），5，10，14，23，98，100—101，108，177，204，335—337，340—342，356，361，388，392，416

需要（needs），5—7，47—50，54，80，90，93，132，167，172，232

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参见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价值丧失（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crises；devaluation）]，75，85，190—203，218，225，231，236，265，271，279—280，286，288，293，295—297，300—308，311，314—315，325，348，355，378，394，402，410，424，426—438

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75—77，92，190—191，195，217，288

农民（peasants），26，165，255，298，335，345，348，352，359，437

有计划的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参见价值丧失（devaluation）]，146—147，178，221—222，312

计划（planning），147，397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7，15，23—24，36—37，43—45，47，65，75—78，79—83，105，129，164，177，179—180，187，193，216，330—332，337，349

政治战略或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ies），30—31，37，106，112，114—119，190，430—431

人口（population）

人口增长（growth），51，158，164—165，443

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理论（Malthusian theory of），164

相对过剩人口（relative surplus）[参见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51，124，159—166，190，217—218，225，236，265—266

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参见阶级关系（class relations）]，52—54，106—172，124，148—150，245，256—258，260，271，276，282，284—288，292，296，299，317—329，352—353，362—365，385，411—412，414，419—423，430—431，437，441—442

价格（prices）[参见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9—14，17—20，24，30—31，58—59，61—68，83，143—144，146—147，149，158，167，180—181，212，231，234，242—251，258—260，291，300—307，308—315，325，338，341—342，344，355—358，367—372（原文为367—2，应为367—72之误。），388，393，396

价格对价值的偏离（deviation from values），17—20，36，242—243，293

垄断价格（monopoly），350—351，353

生产价格（prices of production）[参见转化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44，61—68，145—149，167—168，196，243，286，308，336—340，350—353，355—358，378

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27，51，165，205，217，219，225，256，272，279，344，348，359—360，380—381，413—414，428，434，436—439

生产（production）[参见劳动过程；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labour process; surplus value--production of）]，6，18—19，22—35，41—44，55，61—69，72—83，84—97，100，109—110，116，118，132—133，

135—138, 140, 147, 154, 156—157, 166, 170, 174, 176, 178—179, 183—184, 186—188, 190—192, 207, 211—212, 220, 225, 235, 241, 250—251, 253, 261—262, 264, 266, 276, 285, 300—307, 310, 320, 325—327, 334, 339, 345, 350—352, 354—357, 365, 369, 375, 381, 388—396, 406—407, 410, 412, 426—429, 434—436

生产和资本流通（and circulation of capital）, 41—44, 62—63, 83—97, 123, 132, 156, 166—176, 213, 291, 299, 307, 311—312, 325, 405, 442—445

生产与消费（and consumption）, 5, 9, 37, 41—44, 55, 75—83, 89—97, 166—174, 220, 285, 291, 299, 325, 405, 417, 442—444

生产与分配（and distribution）, 39—74, 80, 89—94, 352—353

新的生产部门（new branches of）, 8, 55, 133, 140, 178, 184—185, 297, 326

生产期间（period）, 62, 170, 173—174, 258, 263

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参见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76—77, 93, 98—104, 107, 109—111, 115—125, 133, 138, 176, 180, 189, 196, 286, 315, 326—329, 345, 348, 352, 361, 371, 378, 412, 419, 421, 426, 428, 434—436, 438, 448

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 of labour）, 5, 15, 30—33, 53, 102, 104—108, 116, 126—128, 131—133, 145, 159—162, 178, 197, 204, 215, 226, 237, 307, 335, 383—384, 394—395, 401—402, 416

利润（profit）[参见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falling rate of profit; surplus value）], 38—40, 42—43, 45, 52—54, 61—68, 71, 76—79, 116, 129, 134—136, 147, 176—189, 195—198, 214, 228, 239, 313, 336—338, 342, 379, 412, 421, 425, 434

企业利润（of enterprise）, 69—74, 180, 257, 259, 270, 285, 301—302, 355, 362, 365, 395

利润率的平均化（equalization of rate）, 62—69, 116, 143, 145, 147, 149, 168, 171, 176, 187, 227—228, 253, 270—271, 284, 286, 350—353, 361, 368, 389, 391—393, 412, 441

超额利润（excess）[参见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relative）], 30—31, 336—339, 342, 351, 354, 357, 364, 378, 389—395

利润的起源（origin of）, 13, 21—35, 43—44, 61—68, 176, 187, 208, 239

利润缩减（squeeze）, 52—54

财产、所有权或房地产（property）, 18—20, 145—151, 164, 255—256, 271, 276—278, 384, 286, 332, 343—349, 360, 371, 410—411,

413—415
公共工程（public works），143，146，151，178，220，265，278

资本的实现（realization of capital）［参见资本流通；剩余价值（circulation of capital; surplus value）］，16，56—57，62—63，83—97，123，133，157，175—176，185，192，202，216，226，228，256，285，297，308—310，365，395—398，406—408，410，412，426，434
虚拟资本的实现（of fictitious capital），266—270，277，291，295—297，421
关系（relations）
内在关系（internal）［参见研究方法（method of enquiry）］，2—5，8，55，80—81，142，238—239，446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between use value，exchange value and value），2—5，8，20，24，42，85，170，206，241—242，338，375
租金（rent）［参见分配；土地；地主（distribution; land; landlords）］，18，33，39—40，42，44—45，61，68，73，89，180，195，223，230—231，234—235，255，268，277，285，287，302，330—372，388—389，390—396，403
绝对租金（absolute），349—353，359—360，370
级差租金（differential），349—358，391
垄断租金（monopoly），349—353，359—360，370
再生产（reproduction）
扩大再生产（expanded），157，161，166—176，186，220
简单再生产（simple），166—167
社会再生产（social）［参见阶级关系（class relations）］，5—6，32—35，46—51，68，80—81，94，103，175，188—189，192，201—203，256，361—362，396，400—404，416，418，420—422

储　蓄（savings），230，262—263，265，267，274—275，279，281，286—287，312—313
萨伊法则（Say's Law），75—83，85，194，245，264，285，411，425
科学（science），99，101—102，109—110，139，147，345，401，404，407
科学的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109—118
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25，52，118，372，437—438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 of capitalism）［参见阶级关系（class relations）］，7，15，17—18，23—28，40—44，55，60，98—102，107，115，

120, 122, 125, 141—143, 154—155, 165, 178, 180, 189, 195—196, 222, 225, 233, 362, 365, 373, 388, 399—405, 412—415, 417, 421, 434, 443

社会主义 (socialism), 40, 103, 112, 114, 117, 120, 322, 328—329, 346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 [参见价值 (value)], 14—16, 32—35, 61—68, 127, 170, 196, 242, 293

空 间 (space), 81, 83—84, 194, 233—237, 245, 263—264, 337—343, 425—430

绝对空间 (absolute), 339

空间整合 (integration of), 375, 377—380

空间组织 (organization) [参见地理组织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143—145, 191, 232—237, 331, 337—343, 362, 369—372, 373—445, 448

空间修复 (spatial fix), 415, 427, 431—438, 442—445

投 机 (speculation), 33, 190, 265—271, 276—280. 284, 287, 290, 302—305, 309—310, 317, 323—327, 331, 348—349, 354, 367—372, 379, 397—398, 421

劳工的生活水平 (standard of living of labour) [参见劳动力的价值 (value of labour power)], 8, 30—31, 47—51, 53—54, 55, 123—124, 161, 167, 185, 384—385, 402—403, 420—422, 426

国 家 (State), 18—19, 25, 30, 34, 51, 76, 78—79, 86, 91, 117, 123, 137, 139, 150—154, 163, 173, 191, 199, 221, 225, 230, 232—233, 265, 279—281, 290—292, 297—315, 370—373, 378—379, 382—383, 386—388, 395—399, 401—402, 404—405, 408—411, 420, 423, 425, 437

国债 (debt), 265—271, 276—278, 287, 310, 321, 347, 381, 396—398

国家的货币 (money) [参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244, 246—250, 254, 257, 262, 268, 272—274, 280—282, 294—296, 298—315, 322—329, 362, 364, 374, 448—449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monopoly capitalism), 138—155, 190, 199, 289—290, 313, 319, 321—329

股份资本 (stock (and share) capital) [参见资本—虚拟资本 (capital--fictitious)], 39, 178, 198, 213, 268, 276—278, 310, 347

存量与流量 (stocks and flows), 170, 186

罢工 (strikes), 124, 162

生存工资 (subsistence wage), 47—51

剩余资本 (surplus capital) [参见过度积累 (overaccumulation)], 190—203, 217—218, 300—307, 348, 355, 367, 369, 401, 434, 444—445

剩余产品（surplus product），5—6，42—43
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绝对剩余价值（absolute），29—31，107，345，348，426
剩余价值的概念（concept of），20—24
剩余价值（的）分配（distribution of）[参见分配（distribution）]，36—37，39，42—43，62—74，152，256—259，278—279，301—315，350，353
剩余价值（的）生产（production of），20—35，39，42—43，45，56，62—68，80，83，87，91—94，100，102，104—105，113，134，137—143，205，208，210，213，232，257—259，267—268，274，276，279，286，290—293，319，325—329，350，353，355，357—358，362，368，386—395，397—399，401—404，416
剩余价值的再投资（reinvestment of）[参见资本流通（circulation of capital）]，29—33，87，160，167—173
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30—31，48，50，67，107，128，133，135，139，161，185—186，189，197，204—205，209，222，231—232，236，297，307，335，364，389，421，425

税收（taxes）[参见分配；国家（distribution；State）]，143，151—152，180—181，268，276—278，285，298，302，320，348，362，379，395，400—401，403—405
技术（technology），7，15，98—104
技术的调换（switching of），185
可行的技术（viable），170，176，189
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参见资本—资本集中；固定资本；劳动过程；生产力（capital--centralization；fixed capital；labour process；productive forces）]，28，30—33，51，58—61，91，98—136，137—155，159—166，181—189，204—217，220—238，267，271，276，286，291，300—307，310—312，315，317，326，336—337，342，350—352，361—362，377—379，389—395，404，418，421，425—426，436，440，450
领土性（的）组织（territorial organization）[参见地理组织；空间（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space）]，289，319，374，386—387，398—405，416—417，419—424，427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86—87，143—145，147，158，242—248，263—264，307
转化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参见生产价格（prices of

production)], 3—4, 36, 44, 21—28, 351—354

运输和通信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86—87, 121, 123, 145, 199, 218, 229, 231, 309—342, 354, 369—370, 373, 376—380, 386, 388, 409—411, 417—418, 426, 428—430

周转时间 (turnover time), 62—64, 71—72, 85—91, 131—132, 181, 184, 186, 191, 253, 258, 264, 284, 301, 369, 376—377, 388—395, 400, 406—409, 426, 431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 (of fixed capital), 206—209, 219, 224—237

社会必要周转时间 (socially necessary), 186—188, 194, 237, 406—409, 428

失业 (unemployment) [参见产业后备军; 人口—相对过剩人口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population--relative surplus)], 32, 36, 78, 85, 124, 159—166, 192, 196, 300—305, 311, 313, 391, 438—439

不平均的发展 (uneven development), 51, 116, 121—123, 226, 289—290, 346

不平均的地理发展 (geographical), 346, 373, 390, 394—395, 403—404, 415—417, 424—445

城市化 (urbanization), 344, 373, 383—384, 392—393, 406, 417—419, 420

使用价值 (use values), 1—9, 42, 46—49, 53—56, 72, 76, 83, 99—100, 104, 166—168, 170, 200—201, 206, 208—217, 233—238, 241—242, 258—259, 285, 331, 333—343, 363, 375, 388, 396

高利贷 (usury), 255—260, 279, 344

价值 (value) [参见劳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labour;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 1—38, 39, 43—44, 46—49, 58—60, 64—67, 81, 83—88, 96—97, 118—119, 138, 141—143, 167—168, 181, 193—194, 206, 208—215, 222, 241—243, 258—260, 321—322, 332—333, 335, 338, 367—372, 380, 386, 393, 396, 400—404, 417, 419, 431, 446

劳动力的价值 (value of labour power) [参见劳工的生活水平; 工资 (standard of living of labour; wages)], 22—38, 42, 45—57, 90, 123—124, 128, 157—166, 230, 263, 340—341, 378, 383, 388—389, 391, 412

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 137—146, 129—135, 183—184, 272, 311, 418

工资 (wages) [参见分配; 劳动力的价值 (distribution; value of labour

power)], 22—38, 39—40, 42—61, 65, 74, 89—90, 107, 119—120, 134, 158—166, 174, 204, 300—307, 333, 362, 381—385, 391, 402—403, 420—422

工资在国民产值中的均衡份额 (equilibrium share of national product), 49, 134, 159—161, 172—174, 185, 285, 310

实际工资 (real), 46—57, 91, 185, 196, 214, 312—314

工资和劳动力的价值 (and value of labour power), 46—57, 158—166, 178

雇佣劳动 (wage labour) [参见阶级关系 (class relations)], 15, 22—38, 40, 42, 61, 165, 175, 253—254, 344—345, 359—360, 412, 415, 434, 436—438, 447—448

战争 (war), 289, 324, 329, 438, 442—445, 449

欲求和需要 (wants and needs), 5—7, 56, 80, 90—91, 101—102, 184, 194, 352

就业的女性 (women in employment), 31, 108, 124, 162, 165

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 [参见阶级的概念; 阶级关系 (class concept; class relations)], 39—40, 44—57, 89—93, 94, 112—119, 134, 189, 298, 305, 322—323, 359—360, 382—385, 399—405, 420—421, 447

工人阶级的消费 (consumption) [参见劳工的生活水平 (standard of living of labour)], 89—93, 94, 134, 172, 177, 360, 384—385, 402—403, 420—422

工人阶级的文化 (culture), 56, 113—114, 163, 173, 399—405, 447

工人阶级的退化、贫困 (degradation/impoverishment), 44—57, 89—93, 108—119, 160—166, 192, 194, 202—203

工人阶级的组织 (organization), 30—35, 53—54, 57, 113, 124, 312—313

工人阶级的储蓄 (savings), 263, 274—275, 285, 287, 312—314

工人阶级的分层 (stratification) [参见等级制 (hierarchies)], 31—33, 60—61, 107—109, 112—119, 438

工作日 (working day) [参见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absolute)], 29—30, 46, 53, 117, 364, 382, 398

工作时间 (working period), 185, 197, 225, 236, 253